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丝绸之路

屯垦研究

赵予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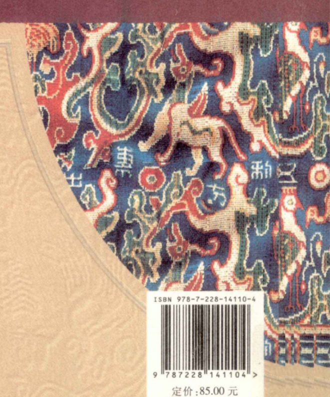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研究最权威最全面最系统的学术巨著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题写书名



ISBN 978-7-228-14110-4

9 787228 141104 >

定价：85.00 元

丝绸之路

屯垦研究

赵予征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屯垦研究/赵予征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12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ISBN 978-7-228-14110-4

Ⅰ.①丝… Ⅱ.①赵… Ⅲ.①丝绸之路—屯垦—农业史—研究 Ⅳ.①F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268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2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6开
印　张　24.5印张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册
定　价　85.00元



出 版 说 明

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1]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为我们揭示出东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纵观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它不仅凝结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且汲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高度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华文明”。[2]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图书——《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出版，不仅为国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0年过去了，伴随着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为了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在丝

① 林梅村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3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2008年年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新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除了保留原有的几种选题之外，又从全国已出版或待出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了20余种有代表性的选题列入丛书，计划分批推出，陆续出版。这批研究成果，以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线，以西域研究为重点，注重突出学术著作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由于入选的研究成果在出版时间上跨度较大，此次再版前均由作者对书稿内容做了全面修订，有的甚至做了重大修改，补充了新的资料，借鉴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为了使读者了解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特邀请中西文化交流史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先生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文中的精辟论述和真知灼见，是读者开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一把钥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自始至终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支持。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丛书选题的书稿进行了学术评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从而保证了丛书的学术质量。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所限，丛书在编辑中难免挂一漏万，有所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12月6日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学研究

（总序一）

丝绸之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绸之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丝绸之路概念最早是19世纪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欧洲探险家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西部地区在古代曾经呈现过的多元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历史上这些由多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19世纪中叶，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了丧权辱国、危机四伏的国难时期。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当时走在这股热潮前列的是德国巴登—符腾堡人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1868年李希霍芬接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第二次到中国考察，到达上海后受英国商会委托，对中国地貌和地理首次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省，还到了东北（满洲），摸清了中国的资源和开发的前景。1872年返回德国后，李希霍芬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会长，致力于写作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unddasauf Gegrundeter Studien，1877~1912年，5vols.），到去世前出版了1、2两卷。他从亲身的考



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这和中国领土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受到李希霍芬的影响，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追踪他的足迹，先后7次到中亚和中国西部进行地理考察和考古发掘。差不多同时，俄国人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cholas Przwevalsky）和奥勃鲁契夫(Obrochev)、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先后率领探险队，在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新疆和西部地区。他们在楼兰古址进行田野发掘，堂而皇之拿走了新疆石窟寺院中的彩塑佛像，将尘封已久的吐鲁番盆地的古物成箱运出中国国境。他们还设法进入了敦煌石窟的藏经洞，攫取了前所未闻的精美壁画、塑像、铭记、经卷和丝织品。原先保存在石窟寺和遗址中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成了伦敦、巴黎、柏林、新德里和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莱比锡）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后来赫尔曼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哈佛燕京学社，1935）一书中加以宣扬，从而使丝绸之路为世人所熟知。

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当时欧洲人设计的西方文明框架，是以地中海世界为主体的一大文化圈，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古文明一一囊括入内，并称其为“中东”，剩下的东亚（欧洲人称为“远东”）和中亚（欧洲人称为“突厥斯坦”），无非是西方文明东扩的支脉而已。可见在国家丧失主权以后，学术无法自主的情况下，文化的研究、历史的阐释要取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

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所以在阐释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时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从人种到文化全都来自西方的说法。尔后50年，不仅仅是由于丝绸之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更多的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得力于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的考察，有了重大的进展。由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经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这样的研究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绸之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先前已五次来华进行地理考察与探险活动，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斯文·赫定，会同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由于这样的共识，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担任瑞典团长，从北京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河套、宁夏，奔赴新疆哈密、吐鲁番，抵达乌鲁木齐。1930年10月科学考察团调整阵容后，扩大到调查楼兰古道和罗布泊，测绘塔里木盆地，考察甘肃古迹和戈壁沙漠，还到内蒙古进行民族学调查，去川藏边境考察动植物。考察工作在1935年告一段落，作为总结，斯文·赫定在同一年用英文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科学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绸之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开展多元文化研究，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丝绸之路学研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物管理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的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绸之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丝绸之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最初的100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绸之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入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学这一研究领域所推出的部分成果。

丝绸生产技术是6000年前人类文明史中极具工艺价值的一项伟大发明，它诞生在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



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根据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交流大约进行了2000年之后，像波斯、拜占庭这样的文明古国，才从中国学到了从养蚕、缫丝到纺纱、织锦的全部工艺流程。因此，丝绸之路提出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丝绸之路学的研究，也必然是一项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这算是我在这套丛书出版时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供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沈福伟

2010年11月10日于苏州大学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总序二）

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换与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于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文献记载表明，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就与葱岭以西地区有较牢固的联系，而遥远的古希腊也具有对远东地区的模糊认识。昆仑山玉石的东输对于中原玉文化的兴盛有非凡作用，斯基泰人的东迁南下对于中亚和南亚的人种与文明有着深刻影响，两者更表明中原与西方的交通道路在远古时期便实际存在。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就在今天阿富汗市场上发现了绕道印度而来的中国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可见，汉代中国政府开辟丝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远古交通道路的重新认识和拓展，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原地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延伸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于唐代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区、阿拉伯地区以及波斯、中亚、南亚、东亚往来互通的交流格局。西方各地区的文化汇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特产渐次西传，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诸地的生活习惯。元代的欧亚大陆交通达到空前畅通，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



丝织品名副其实为中国的独特创造。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和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丝织物，意味着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蚕丝织物的生产。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则与丝绸有密切的关系，以致后世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流通道统称为丝绸之路，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产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被认为写于公元前5世纪阿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The Achaemenid Empire of Persia)的《旧约·以西结书》(Ezekiel,16:10;16:13)有一段提到耶和华要为耶路撒冷城(Jerusalem)披上最美丽最豪华的衣裳。耶和华在形容世间最美丽的织物时两次提到“丝绸”。这意味着此时的波斯帝国境内已有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也说波斯人喜爱米底亚(Medea)式的宽大上衣，而此种衣物的材料正是后来被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的中国丝绸。这种轻薄衣料的来历令希腊人浮想联翩，如猜疑出产于羊毛树上，或推测得之于蜘蛛腹中。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丝绸也已传至欧洲，因为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希腊雕刻和彩绘人像所穿衣服都极为稀薄透明，似为丝绸面料。汉唐时期，丝绸不仅是北方陆路交通线上的主要贸易品，也是中国政府赐赠西方国家的主要礼品。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贸易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Altay)、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绿洲之路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道路。这条通道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说穆天子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道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尽管自中原通往中亚以及西亚、南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在很早以前就已自然地存在，但其真正的辉煌与繁荣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体现，则始于汉唐时期。从此，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同时中国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

说道中西文化交流，还不能不强调西域。

西域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历史地理概念。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

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与唐代的西域概念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西域则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藩，并且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各自的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也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而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丝绸之路研究所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屏障。从地理位置看，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M.A. Stein)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地球上几大文明区域在此发生碰撞。不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并未使其与周围世界隔离，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优势免遭彻底同化。上述地理特征也造就了西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点的文化特征，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个性张扬，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并不同于西方。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地域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朝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与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然而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

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



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兵戎相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界定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这样看来，西域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既可视为“天下”的边缘地区，又可视为“天下”与“绝域”的中间地带。这也正是西域的独特性所在。

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我看了丛书选题目录及其作者，大都是能体现丝绸之路研究学术特色的上乘之作。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能够看到即将有如此众多的成果问世，由衷感到高兴，应约写下如上文字，权当为序。

张国刚

2010年11月23日于北京清华园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丝绸之路与西域屯田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与屯田

丝绸之路有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后来又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本书研究的主要是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开始养蚕、缫丝、织绸。到了汉代，制造丝绸的技术有了新的提高。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我国织造的丝绸运到中亚波斯（今伊朗）、地中海沿岸及罗马等地，引起西方人的惊奇和喜爱。人们便把我国称为"丝国"，把这条道路，称为"丝绸之路"。汉武帝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于公元前101年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数百人，在轮台、渠犁一带进行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使者和商贾。据《汉书·张骞传》载：西汉"张骞凿空"后，"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惜"丝绸之路"并非通达无阻，由于历史诸多原因，而是时通时绝。由此，"丝绸之路"便和西域屯田结下了兴衰与共的特殊关系。

从西汉开始在西域屯田戍边，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屯垦事业有兴有衰。对屯垦事业的评述，有褒有贬，毁誉兼有。

纵观两千多年的屯垦史，凡兴屯田，西域兴，边疆就迅速得到开发，经济繁荣，丝绸之路畅通，各族人民的交流和团结就加强，边防巩固，祖国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当屯田废弛的时候，边境就不安宁，甚至产生分裂祖国统一的封建割据政权，往往招致强敌入侵，丝绸之路阻绝，经济凋零，生灵涂炭，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纳入中国版图以来，西域的稳



定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安危。清代名将左宗棠在论述新疆的战略地位时写道:"盖新疆本秦陇之屏障,燕晋之藩篱,亟宜经营。"他又追溯历史的教训:"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①]在经营西域中,"屯垦戍边"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来,西域维护祖国统一与阴谋分裂的斗争,时断时续,异常尖锐复杂。实践证明,屯垦戍边实边,是新疆这个特定地区的客观需要。因此,历史上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是屯田戍边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三国时的政治家曹操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②]元世祖忽必烈讲道:"古者,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有国者,善用其法,则亦养兵息民之道也。"[③]明太祖朱元璋教导其部下说:"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④]他曾先后让两个儿子率河南、山西的卫军到蒙古筑城屯田。一个儿子去辽宁,一个儿子到甘肃率军屯田。清代名将左宗棠写道:"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于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于事定之后,以规划久远。"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历史上也不乏一些不识大局,目光短浅的决策者,他们往往侈谈什么"西域绝远","荒凉贫瘠"。认为经营西域是"耗中事边",得不偿失。忽视西域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它对祖国安全的战略价值,忽视屯垦戍边,于是出现了屯垦戍边的时兴时废。清代李鸿章就认为,统一新疆是"徒收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的漏卮"。他觉得新疆是个包袱,因此主张"暂弃关外"。当然用不着屯田戍边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已证明了屯垦戍边的重要性。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力每况愈下,而新疆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始终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再一次印证了屯田戍边的历史贡献,它将永载史册。

在经营西域中,"屯田戍边"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边疆稳定、祖国统一、西域开发、丝绸之路畅通、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历史的贡献。但历代屯田的命运,并不能令人满意。历代屯田沿着一个"兴起——繁荣——忽视——湮灭","一代而终"的怪圈运行着,汉代如此,唐代如此,清代也没逃出这个规律。这里除有中原动乱、政权更迭、强敌入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边境动乱时,屯田戍边就显示出其特殊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屯田戍边的重要性是容易为人所认识并积极加以扶持的;但当边境安定,国泰民安之时,人们就往往不太注意它的存在及其战略价值而轻视它,甚至废弃它。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版》20卷。
② 司马光:《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宋濂撰:《元史·世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张廷玉等撰:《明史·太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清代屯田布局，重北疆而轻南疆，由于在天山以北大举屯田，有效制止了沙俄蚕食和鲸吞的阴谋，而南疆则发展甚缓，以致浩罕煽动叛乱接连不断，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

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经济建设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个师转为经济建设师，到新疆、广东、山东、云南、江苏、宁夏等省开荒造田，有的办农场，有的办工业、搞石油，有的搞建筑。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7个师开进黑龙江省"北大荒"。这些整师整团集体转业的部队，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将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由军转民。如铁道兵开进北大荒的师，改组为农场管理局，团长改任场长，政委改任书记，战士变成农工。

1954年，党中央、毛主席认真分析了新疆的形势后，决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保留了解放军的体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并赋予屯垦戍边的使命，执行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平时生产，有警持枪击敌，无警放下手中的武器。

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和伊宁"5·29"暴乱事件，兵团农四师迅速派民兵平定了叛乱，并奉命派大批干部和职工进行"三代"，减少了边民越界逃跑后的损失。毛主席接到报告称赞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

20世纪80年代初，"三股势力"在新疆连续制造动乱和暴乱事件。邓小平果断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生产建设兵团在"确保新疆社会稳定中要起中流砥柱的作用"。

到2007年底，新疆生产建兵团有人口258万余人，耕地面积1 560万亩，辖14个师、175个农牧团场，遍布天山南北。兵团人借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东风，乘风破浪，阔步前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加快了发展速度，为率先在西北地区全面进入小康而奋勇前进。



第二节　屯田起源初探

屯田是一项伟大而奇特的政策，"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①]。故两汉以来，历代英明的君主，有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积极倡导与组织屯田。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屯田是千古之策。"[②]因此，屯田世代沿袭，无代无之。屯田始于何时?众说纷纭，大体有西汉说、秦说、西周说三种。

现在主张屯田是创于西汉的学者较多。其根据是，西汉初年，匈奴不断跃马南下，肆意掠杀，严重地威胁着边境的安全。汉廷曾采用和亲、忍让的办法，结果无效。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上言："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旧居。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去时至，转牧行猎于塞下，我守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则远县才至，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不安矣。"又说："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叩石，布渠答(指铁蒺藜)……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民称圣明。"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③]，是为民屯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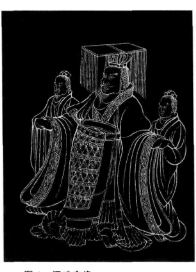


图1　汉武帝像

大规模的推广屯田，则是汉武帝执政时期。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④]

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徙山东"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⑤]。其后又于元狩五年(前118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和太和元年(前104年)三次移民实边，在西北地区置民屯[⑥]。

① 《大学衍义补》。
② 《史纲评要》。
③ 班固撰:《汉书·晁错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班固撰:《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班固撰:《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司马迁撰:《史记·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以上民屯，规模巨大，人口达90余万。

西汉军屯，始于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幕南无王庭”，匈奴远遁。“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

太初元年(前104年)“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三年，“益发戍田卒十八万(至)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3]。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后，于轮台、渠犁皆置田卒遣使者校尉领之[4]。昭、宣之际，军屯继续发展。昭帝采纳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兵田轮台”。又元凤四年“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楼兰”[5]。宣帝时，先有地节二年遣侍郎郑吉将免刑罪人屯田渠犁，“积谷以攻车师”[6]，是为犯屯之始。后于神爵之时，采纳后将军赵充国“罢兵屯田，以待其敝”之策，置军屯于湟中，“分步兵九校吏士各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7]。最后在战胜先零羌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宣帝又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1.5万人至敦煌，“穿井渠，建庐仓，积谷通渠”[8]。以屯田为征讨昆弥之基地。又遣常惠将三校士卒屯田赤谷城[9]。直到元帝之世，军屯仍积极推行。

唐启宇、杨寿川先生持这种观点：汉文帝始创屯田，武帝发展屯田，昭、宣之世，屯田臻于完备。

臧嵘先生则认为，屯田不是始于汉代，而是更早地始于秦始皇之时。《史记·主父偃传》提到秦始皇在朔方屯田实边是为“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原文是：“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不屯田，何以省转输戍漕。《史记》中记载的约七八处，主要在我国北方的河套一带，以及南方的桂林、象郡、南海等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边疆长期定居下来。如《汉书·地理志》载：“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这些谪民，就是从内地迁往边疆的政治移民。

刘光华先生则认为秦时没有屯田。

第三种观点认为屯田既不是始于汉代，也不是秦时，而是更早，创始于西周。于省吾先生曾对甲骨文关于“圣田”一词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研究考证，认为“圣”字即“垦”字。“圣田”即“垦田”。据此结论说：“商代统治阶级为了扩大生产，集中

① 班固撰：《汉书·晁错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 班固撰：《汉书·赵充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⑧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⑨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财富，在农业方面除去大令众人（众人是商周时的奴隶）协田和藉田外，又派遣爪牙率领众人，到远方异域，经年累月地从事艰苦劳役，对劳动人民剥削和压迫。”[1]关于垦田上的劳动者，于先生认为是“众人”或“族人”。领导者是商王的爪牙，远方异域，指被征服的其他方国。

于先生进而对周金“六自”、“八自”（引者注：西六自、殷八自是国家的正规部队）中的“冢司土”、“司佃事”、“司艺”等予以考证后结论说：“总括上述，则周王朝所辖的军队，既然都设有冢司土、司佃事、司艺、司牧及冢司马等专职，以掌管土地、农佃、种艺、放牧、马政等各项有关生产方面的事务，则在军队的物质生活供应上，只要取偿于军队的经常驻在地，便可以自给自足，省却了转粟输刍之劳。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屯田制。”[2]

屯田究竟始创于何时，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屯田制创始于西周，逐步发展演变，到西汉时，屯田有军屯，有民屯，还有犯屯，其制度也逐渐臻于完善。

西域屯田始于西汉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据《汉书·西域传·乌孙国》载：汉武帝为“断匈奴右臂”，联络乌孙共同反击匈奴，“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肱雷为塞”。在此筑塞屯田，为西域最先屯田者。以后相继在轮台、渠犁、北胥鞬、赤谷、伊循等地进行屯田。以西汉为鉴，历代相沿。纵观历史，凡兴屯田，西域安，丝路通；屯田废，西域乱，丝路绝。大量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东汉时屯田的三废三兴，影响到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① 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载《考古》1973年第4期。
② 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八自”及其屯田制》，载《考古》1964年第3期。



第一章　西汉时期西域屯田

西域的屯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历代相沿不废。说起汉代西域的屯田，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形势，不能不提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以及出使西域的张骞，远嫁乌孙的细君、解忧，首任西域都护郑吉，叱咤风云的班超、班勇父子，还有那成千上万为开发边疆胼手胝足、含辛茹苦作出伟大历史贡献的屯田士兵，特别是那些在西域维护祖国统一的诸国首领和各民族人民。

第一节　西汉初年的形势

公元202年，刘邦和项羽在垓下（今安徽固镇）决战，项羽兵败，在乌江（今安徽和县）自刎，刘邦称帝，建都长安，国号汉，史称西汉或前汉。当时面临的形势是：由于秦末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社会动乱，加上战争的破坏，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生产下降，经济凋敝。内部有分裂势力的割据，在北方有匈奴奴隶主政权的侵扰和掠夺。为了巩固政权，从汉高祖起，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60多年期间，在经济上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招抚流亡，轻徭薄赋，鼓励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消灭割据势力，平定叛乱，加强中央集权。对匈奴则采取忍让、和亲政策，以换取边境的稳定。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起初在蒙古高原阴山一带。当楚汉相争，逐鹿中原之时，尚处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匈奴逐渐强盛起来，乘机扩张，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1]，不断向周围民族发动战争。它东灭东胡，占有内兴安岭、辽河上游一带；北败丁零诸部，拓地远至贝加尔湖；西驱大月氏，并统治了西

①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域天山一带和塔里木盆地东北部；而在南面则与西汉北部郡县相接。势力强大，称霸一时。匈奴将这一辽阔广大的地区分为三部：中部由单于（即君主）直接统治，王庭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东西两部设左右贤王分治。作为一个奴隶主军事政权，匈奴强悍尚武，擅长骑射，野蛮掠夺，“得人以为奴婢”[①]。西汉临近匈奴的郡县、人口和财物，就成了匈奴掠夺的对象。西汉必须进行正义的抵抗，否则，国家民族的命运，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堪设想的。

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围攻太原，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前去作战，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被匈奴40万骑兵围困长达七天七夜，援绝粮尽，万分危急。幸得陈平献计，以厚赂向冒顿阏氏（即妻子）行贿，求她劝说冒顿网开一面，刘邦才得以逃回长安。

由于国力不足，无法反击，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宗室之女立为公主，嫁给冒顿，每年还要奉送大量财礼，结为兄弟之国，约定互不侵犯，企图以此换取边境的安宁。但匈奴并不因和亲而友好，反而更认为软弱可欺，仍然在西汉边郡大肆掠夺。刘邦去世后，冒顿在公元前192年致信吕后，极尽侮辱，蓄意挑衅，吕后只有忍让。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均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杀死汉朝都尉，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并进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汉朝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匈奴的侦察骑兵甚至逼近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只200里，大有兵临城下之势。公元前174年，汉文帝派使者赴匈奴修好，老上稽粥单于意甚骄横。其幸臣中行说气势汹汹地对汉使者说：“汉使毋多言，愿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乃稼穑也。”[②]就是说：“把你们的丝绸、粮食和米酒赶快交来，质量要好，数量要多。要不然我派骑兵把你们的庄稼踏个稀烂！”[③]汉景帝时，公元前144年，匈奴抢劫汉在北方御苑中的军马，汉军吏卒2 000多人战死。虽然汉朝自高祖历惠帝、吕后、文帝直到景帝，一直采取和亲政策，但“匈奴数背其约，边境屡被其害”[④]，抢劫边郡，杀虏吏民，给汉朝造成严重威胁，给汉朝边境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汉武帝决策对匈奴进行反击。

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实力雄厚，国富民强，进入全盛时期。

针对当时的形势，汉武帝提出：不反击匈奴，“天下不安”[⑤]。他决心改变对匈奴妥协、忍让及屈辱和亲的被动局面，着手策划军事反击。

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三次重大战役。

①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河南战役：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匈奴大举进攻汉朝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这时武帝不受“胡兵东进”的牵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组织河南战役。命大将军卫青等率精骑数万，攻取“河南”（指黄河以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大败盘踞此地的楼烦王和白羊王，收复秦时河南地，并“置朔方、五原郡”[①]。为了巩固与开发这一地区，主父偃上言：“朔方地肥饶，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②]武帝从其计。随即“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③]，筑城屯田以戍边。

河西战役：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精骑万余，两次出陇西，击匈奴右地，大败匈奴军。驻守河西的匈奴浑邪王4万余众降汉。自金城（今兰州）以西至盐泽（罗布淖尔），匈奴从此绝迹。汉在此地先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大举屯田。据《史记·平准书》载：“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规模是很大的。此举不仅切断了匈、羌联系，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域的走廊。

漠北战役：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十万，还组织“私负从马14万匹”随军行动。又以步兵数十万人转运辎重，分道深入漠北，打击匈奴主力。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与匈奴主力相遇，经过一场恶战，大败匈奴。单于仅率数百骑突围远遁。汉兵追至漠北之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郡塞外二千余里，大败匈奴左贤王，斩获七万余人。经过这一战役，匈奴损失八九万人。“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至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④]，大兴屯田以备边。

三大战役其意义是深远的：

一是消灭了匈奴的有生力量，打击了匈奴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保障了边境人民的安全。

二是自河西战役后，打通了中原通西域的走廊。河西走廊的南面是羌人聚居之地，北边为匈奴所控制。匈奴常联络西羌，共同寇边。自设河西四郡以后，切断了匈奴与羌的联系。《后汉书·西域传》载：“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胡羌，使南北不得交关。”

三是大兴屯田，是西汉巩固边疆、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重大战略措施之一。收复河南，立即与朔方郡募民十万以屯田。特别是河西和漠北战役后，“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⑤]。仅酒泉、张掖以北的居延一带就有田卒18万人[⑥]。汉武帝大规模地进行屯田，这是一个有

① 班固撰：《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班固撰：《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司马迁撰：《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远见卓识的措施。它不仅满足了数10万汉军的粮糈供应，保证了边境安全和丝绸之路畅通，而且成为西汉经营西域的前进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没有河西四郡的设置，没有河西的屯田，西汉统一西域，"汉之号令班西域"，是不可能实现的。

河西兴屯田，为以后西域屯田积累了经验，应该说，西域屯田是河西屯田的继续。

第二节　张骞出使西域

为了取得从军事上反击匈奴的胜利，汉武帝积极联合受匈奴压迫的民族和地区，以组成联盟，共同对付匈奴。恰在这时，汉武帝从匈奴俘虏那里获悉有关大月氏的一个重要情报。

大月氏原是河西走廊敦煌一带的强大游牧部落，被匈奴击败，老上单于杀死月氏王，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大月氏人被迫西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汉武帝听说西迁后的大月氏王对匈奴恨之入骨，一直想报杀父之仇，只愁势单力薄，孤立无援。他决定立即派人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



图2　张骞像

出使西域谈何容易？匈奴右贤王派人控制着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河西走廊，日逐王在西域焉耆一带设有僮仆都尉（即奴隶总管），实行严密监视。路途遥远而艰难，必须是刚毅坚强、智勇兼备的人才能完成出使任务。朝廷出榜招贤，汉武帝手下的郎官（侍从）张骞勇敢地站出来，揭榜应召，主动要求承担出使西域的历史重任。

公元前138年，张骞率百余人，以曾是奴隶的匈奴人甘父为向导出了长安。过了陇西，一行人全部被匈奴骑兵俘获，押送到王庭，分配到各部落做奴隶。张骞和甘父等人被送到西部一个部落看管起来。单于为拉拢软化张骞，给他娶了匈奴妻子，还生了儿子。但张骞牢记使命，"持汉节不失"[①]。十年之后，趁监视放松，毅然逃脱，继续西进。跋山涉水，备尝艰辛，有时只有靠甘父沿途射猎禽兽来充饥。他们穿车师（今吐鲁番）、入焉耆、经龟兹（今库车）、过疏勒（今喀什），翻越葱岭（今帕米尔），在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费尔干纳盆地以西）等国协助下，终于到达大月氏。

不料，大月氏在征服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后，安居乐

① 班固撰：《汉书·张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业,复仇心理日渐淡漠,已不愿再与匈奴打仗了。张骞见联合之事没有结果,便在邻近各国考察之后,于公元前128年踏上归途。沿昆仑山北麓向东,经莎车、于阗、若羌等地,进入羌地(今青海西北)时,再次被匈奴骑兵俘获,又扣留了一年多。后乘匈奴内乱之机,带妻子和甘父逃出,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此行历时13年,出发时百余人,只回来他和甘父两人。这次出使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了解了西域各地情况,对筹划抗匈很有价值,汉武帝颇为满意,封张骞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皇帝的顾问),甘父为奉使君。三年后张骞随军出征,因功又被封为博望侯,意在表彰他广博瞻望。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采纳张骞联合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共击匈奴的建议,再次派他出使西域。张骞率领300人,每人备马2匹,带牛羊万头及价值巨万的金币丝绸,平安通过已由西汉控制的河西走廊,一路顺利到达乌孙国都赤谷城(今伊塞克湖东南),建立起友好关系。张骞并派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和身毒(今印度)进行友好活动,各国也派使者来到长安。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长达十余年,行程数万里,不仅为汉武帝的抗匈战争立下丰功伟绩,其意义还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司马迁称"张骞凿空"[①]。张骞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开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丝绸之路",为沟通中国与中亚及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有千千万万的各国和平使者和商贾沿着丝绸之路,为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和睦团结,繁荣昌盛作着贡献。

第三节　西汉时期西域的屯田

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汉武帝对匈奴由防御转为反击。经过对匈奴的三次战役,匈奴对汉的长期威胁基本解除。丝绸之路畅通。汉武帝派张骞两次使西域,联乌孙,以断匈奴右臂,着手经营西域,组织屯田。先后在肱雷、轮台、渠犁、伊循、赤谷、车师、北胥鞬、焉耆、姑墨、楼兰进行屯田。开始,西域屯田是小规模的。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成立之后,汉之号令班西域,西域纳入祖国版图,便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点星罗棋布,大都分布在战略要地及丝绸之路沿线。

一、中道(轮台、渠犁、车师、北胥鞬、焉耆、姑墨)屯田

轮台和渠犁屯田

该地在今轮台和库尔勒以西。乌孙曾在娶公主时,贡了许多乌孙马,这些马奔驰矫健,汉武帝十分喜欢,称为"天马"。有使者报告说:"大宛有好马,称为汗血

① 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马,藏在贰师城。"武帝想得到汗血马,派名叫车令的使者带着一千斤金子和一匹金马到大宛去,购求好马,国王毋寡说:"贰师马是国宝,不能卖。"车令扬言要当众砸坏金马。大宛王怒。同时认为"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①,指令边境郁城守将杀死车令,夺得了财物。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骑兵6 000名,步兵数万,从南道进发,当道小国,各守其城,不肯给食,攻下者得食,攻不下者数日而去。大军到达郁城时已是强弩之末了,既饥饿又疲惫;进攻郁城,死伤甚众。无奈,只得退回敦煌。士卒只剩十之一二。李广利向汉武帝报告说:"士卒不患战,患饥。"②可见长途远征粮饷供应的重要。

70年之后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追击北匈奴郅支单于到康居,既未另行征调士兵,也没有从内地大量征运粮食,只是调用了城郭诸国的士兵和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分两路进攻郅支城。一路"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另一路"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③,一举攻下郅支城,消灭了北匈奴郅支单于。这次战役之所以很快取得胜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汉朝在天山以南的车师、渠犁、轮台、姑墨,天山以北的金满、赤谷等地进行了屯田,提供了较充足的粮食和物资。公元前102年,汉军第二次伐大宛。鉴于初战失败的教训,这次依靠河西屯田区的供应,携带大批粮草和数以万计的牛羊骆驼,结果大败大宛。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使汉朝国威声震西域。由此可见,军需供应直接关系到统一事业的成败。从河西运粮到西域,困难重重。西域生产力低下,诸国无法满足汉军的供应,西域屯垦便成为西汉王朝的当务之急。

汉武帝从两次攻伐大宛中吸取了教训,总结了经验。于公元前101年,汉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的使者。《汉书·西域传》载,汉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今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④。这是汉在天山以南的第一个屯田点,实际上是西域都护府的雏形,在西域史上且有很突出的意义。从上述记载可知,这时的屯田是小规模的,只有数百人,只能供应来往官员和商旅,远远不能满足大军的供应。公元前89年,汉大臣桑弘羊提出在这一地区屯田5 000顷,建立自给自足军屯基地的宏伟计划,但被汉武帝拒绝。原因是在李广利与匈奴作战失败投降后,他产生一种懊悔心理,丧失了原来的进取雄心。但是要统一西域,以切断匈奴右臂,就不能不经营西域,就不能不搞屯田。汉昭帝于公元

① 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陈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图3 轮台故城

前78年（元凤三年）“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相连也”[1]。赖丹在渠犁、轮台积极进行垦荒种地，兴修水利，为以后郑吉在此屯田奠定了基础。但是龟兹有少数人对此不满。贵人姑翼在龟兹王面前挑拨说：“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龟兹王听了姑翼的谗言，杀害了赖丹，屯田遂止。公元前70年（本始四年），长罗侯常惠发西域诸国兵包围龟兹问罪，龟兹王承认杀害赖丹是错误的，并交出了姑翼。常惠当即斩杀姑翼，为赖丹伸冤。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宣帝鉴于汉匈之间争夺姑师的斗争愈来愈激烈，遂“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2]，宣帝不仅恢复了渠犁屯田，而且将规模扩大，将田卒增为1 500人。他们不仅进行屯田生产，而且是汉朝在西域地区和匈奴斗争的重要军事力量。渠犁屯田是汉在西域建立的一个重要军事、经济要地。现轮台县境内的卓果特沁古城和柯尤克沁古城，仍留有汉代城堡、渠道、田埂的遗迹。考古还发现轮台东南的克孜尔河畔有一座汉代的土城，土城附近红泥滩上仍可见到古代屯垦的渠道和田界，考古学家认为此遗址系汉代轮台屯垦的废址。另外在今沙雅县东境的哈拉哈塘附近发现一条古代水渠，渠道长达100多公里，为红土所筑，附近还出土过汉朝的五铢钱。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大渠亦为汉代轮台屯田的一部分。从现在还保存的这些遗迹来看，汉代轮台屯田的规模是宏大的。

车师屯田

车师，《史记·大宛列传》作姑师。从中原西赴大宛，北去乌孙，均取道于此。匈奴从蒙古高原到天山以南也必经此地，是西域的战略要地，汉、匈反复进行争夺，史称“五争车师”。车师王以地接匈奴，恃其支援，不附于汉。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遣赵破奴攻占车师，因无力控制，车师仍附匈奴。李广利伐大宛后，诸国皆遣子入侍，唯车师不从。此地之得失，关系着汉、匈争夺西域之胜败，故两家兵力在此角逐最烈。第一次是武帝于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遣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地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攻车师。结果，李广利被围，几不得脱，士卒死十之六七。李陵粮尽援绝降匈奴。开陵侯因匈奴右贤王数万援兵到，也不得不引兵去。第二次于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遣李广利将兵7

[1]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班固撰：《汉书·郑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3万余人出河西，马通将4万骑出酒泉，道过车师北至天山，汉恐车师断汉军后路，乃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等六国兵别围车师。车师王降，臣属汉。第三次争车师于昭、宣之际。昭帝末年，匈奴为争车师遣4 000骑“田车师”。车师再附匈奴，并与匈奴联兵西击乌孙(乌孙与汉友好)。乌孙求援，汉于公元前72年，遣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兵十余万，北击匈奴。遣常惠使乌孙，持节护乌孙兵5万，从西击匈奴，大败匈奴。车师境内的匈奴4 000名田卒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复占车师，更立乌贵为车师王太子，并“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①]。

匈奴三次兴兵西域争车师。汉大军来，车师附汉。汉军撤，匈奴兵来，车师则又叛汉附匈。反反复复，数附数叛。汉廷分析了西域的形势，认识到在遥远的西域，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兴兵，不屯田，不就地解决粮食供应，仅靠从关内千里运粮是无法持久的，是不能安邦定边的。于是借鉴轮台和河西屯田的经验，在西域发展屯田，以争车师。屯田与军事行动紧密结合，这就是第四次争车师的特点。据《汉书·西域传》载：“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秋收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从这一段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屯田与军事行动、与争车师的关系。“屯田、积谷，击车师。”“军食尽，且罢兵。”“秋收毕，复发兵攻石城。”粮食的供应，左右着军事行动。同时，汉武帝认识到屯田不仅对争车师关系密切，而且对定西域也关系甚大。“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盖积谷以安西国……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②]“盖积谷”和“安西国”联系起来。可见屯田在经营西域中的地位。

第四次争车师始于公元前68年，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率屯田士卒1 500人并发诸国兵万余人进击车师，破交河城，为了巩固已得的车师，郑吉“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这是汉在车师屯田的开始。匈奴方面：“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③]

第五次争车师于郑吉使三百人屯田车师之后，此举引起匈奴的恐惧。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于是在元康二年(前64年)，匈奴派骑兵进攻汉在车师的田卒。(郑)“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多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④]。汉廷令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兵出车师以北千余里，扬威武于车师旁，匈奴骑兵乃逸

①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车师》，中华书局，1975年版。

去，郑吉率田卒仍返渠犁。车师屯田暂停。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这是公元前62年的事。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发生政变。单于病死，右贤王与单于妻子私通，篡夺了王位，并大力剪除异己。左贤王的儿子先贤掸这时是驻守西域的日逐王，身兼僮仆都尉，按理应继承单于王位，此时不能不深感处境危险。于是表示愿归附汉朝。郑吉大喜，立即率屯田将士，"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①]。对匈奴1.2万人妥善安置后，陪同先贤掸到长安，汉朝封先贤掸为归德侯，郑吉为安远侯。

随着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自然撤销，匈奴不得不放弃西域。郑吉声震西域，原先他护鄯善以西南道，现在又护车师以西北道，汉朝任命他为西域都护。西汉王朝自张骞出使西域后，经过近8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切断匈奴右臂、统一西域的宏伟大业。西域都护取代僮仆都尉，西域36国从此皆在都护管辖之下。都护府设在西域中心的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是新疆列入祖国版图的一个标志。都护代表西汉王朝给地方政权官吏(即西域诸国王侯)颁发印绶，有权征调诸国兵力、管辖驻军及屯垦官兵。《汉书·郑吉传》就此评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都护作为汉中央政府直接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据《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称赞西汉历任都护，"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

西域都护设立后，公元前48年，汉在车师前部设置专理屯垦的戊己校尉，分戊校尉和己校尉，既是屯田长官，又是军事指挥官，受都护辖制，但有很大独立性，兵力调动直属中央，没有朝命，不得调遣，权力仅次于都护。

车师屯田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交河，是车师前王治所，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一带，汉在交河城附近有屯田点，罗布淖尔出土汉简多次记录了"交河壁"这个名称，其中的二枚简上写有：

(缺)交河曲守丞衡移居卢訾仓

"壁"字或写作"辟"，交河壁即为汉在交河城一带进行军垦而居住屯田吏卒的地方。按汉代官制，军事系统的大将军营共五部，部设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西域的屯戍部队，也按这个编制编列。但是我们从罗布泊汉简7号、2号、3号、4号、5号、6号中得知，汉在西域的屯戍部队除了设上述吏士之外，部这一级尚有左右之分，曲这级尚有前曲、后曲、左曲、右曲之别。另外又知道参加屯戍的人员系来自内地的许多地方，屯田士兵有部队的正规兵卒，也有招募的志愿兵"应募士"，还有调发而来的、应当判流放罪的犯人。这些屯戍者除了本人参加屯田，常住垦区之外，他们之中的多数还携家带眷，举家而来，而且自备农具、耕畜、衣物。34号简记录了今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一个叫宋钧的屯戍者(不知

① 班固撰：《汉书·郑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图4 交河故城

其职务），带着他的30岁的妻子，而且还带着私自随他前来的“私从者”。可见当时来交河、罗布泊等地屯垦的人，不但举家而来，而且有不少人还带来了他的同乡、近族等人。王莽时被投向匈奴的屯田官陈良残杀的屯戍军司令官、戊己校尉刁护，曾率领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女儿、侄儿等驻屯车师境内，部下人口多达2 000多人。陈良叛变时，杀了刁护及刁护的眷属，包括刁的儿子，所有的“昆弟子男”只留下了妇女和年幼儿童。从此一事件可知，汉在交河屯田时，从内地志愿前来参加屯垦的人员是相当多的，史书所记的人数只是正规部队人数。

二是高昌壁。高昌壁是西汉屯垦吏卒驻扎的地方，因地势高敞开阔而得名，本车师前王之牧地，地理位置在今高昌古城。郑吉在车师曾开屯田，其驻地当在高昌壁，而其所垦之田，应在今吐鲁番盆地之东部一带。戊己校尉设立之后，戊己校尉的驻地自当不在交河，而应在高昌壁。《汉书·西域传·车师王》条称“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元始年间的戊己校尉徐普曾经提出开辟一条新路，使之便于与内地的交通，因车师后王姑句阻挠而罢，后姑句叛降匈奴，也是道出高昌壁。可见高昌壁一直是西汉屯戍军的驻屯基地。屯田士卒，有事则兵，无警则农，终于把这片绿洲开垦了出来，为后来形成高昌城奠定了基础。《北史·西域传·高昌》称：“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壁，故以为国号。”这一条记载便是我们得出以上结论的证明。不过这条记载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一点是“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根据这一点，就会使人觉得西汉在高昌壁一带的屯田并不是从郑吉派人时开始的，而是汉武帝的西征部队中之羸弱者早就留在这里开垦了。武帝的西征军因缺粮而困疲不堪，沿途留下许多掉队人马之事，唯有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高昌壁最早的开发时代当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而不是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以后的事。李广利首伐大宛时，率骑兵6 000，各郡征来青壮年“数万人”，及至返回敦煌时，所剩士卒只有十分之一二，一部分士卒回不到敦煌而留在高昌地区垦田自立，应当是可能的，《北史》的记载，不能说没有根据。

北胥鞬屯田

《汉书·西域传》记载：“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

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汉代在北胥鞬进行屯田，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北胥鞬究竟在何地，从清代以来，史学家说法不一。

《新疆简史》说：“西域都护设置后，屯田的地域扩大到从莎车分出来的北胥鞬。”新疆大学周轩先生有《北胥鞬新考》，[①]赞同这一论点，认为西域都护既有统辖乌孙等36国的职权，又有督察康居等外国的责任。公元前60年，汉鉴于匈奴势力退出西域，来自东北方面的威胁基本解除，而西北方面的安危就显得重要起来，于是审时度势，将屯田的地域扩大到从莎车划分出来的北胥鞬。莎车在叶尔羌河流域，近康居诸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于耕种，所以临近的依耐（今叶城南）和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都“寄田莎车”。汉在北胥鞬屯田，主要是为了安抚臣属诸国及督察边外，及时掌握情况，讨平反叛势力。

清代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认为：“疑莎车为车师之讹。”学者岑仲勉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主张“莎车”为“车师”之讹，还释“北胥鞬”即“别失八里”。并说“徙田于北胥鞬者，即徙屯田于车师后庭一带”。钱伯泉先生在《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著文《北胥鞬考》中认为“北胥鞬”急读就变为“北鞬”二音，在车师国与此同音的就是“辟展”，即今鄯善县。

笔者认为：公元前60年，郑吉任西域都护，其任务：一是代表西汉中央政府统辖西域车师、龟兹等36国；二是防止匈奴再争西域；三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郑吉于车师举办屯田，显然是为了应付匈奴的，而北胥鞬屯田则是为了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的。北胥鞬在莎车境内，莎车位于西域西部。再往西越葱岭，则是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国，莎车是祖国西部的要冲，所以在北胥鞬驻军屯田是合理的，是一个安定西域的重要部署。这里水土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是屯田的理想之地。经李恺先生长期研究，据考古资料证实，现在巴楚的图木休克一带，不但是唐代的一个大型屯田区，而且也是唐以前的一个屯垦地，从各方面观察，很可能就是汉代北胥鞬屯田的遗址，当然，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图5　汉代戍边屯田遗址

北胥鞬屯田规模，史无记述。但我们根据“屯田校尉始属都护”来分析，据《汉书·郑吉传》载：“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

①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中国历史大辞典·屯田校尉》条记述："武帝时，轮台、渠犁皆有屯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者，后车师、乌孙、焉耆等地皆有屯田，以校尉领之。宣帝神爵二年，置西域都护府后，诸屯田校尉皆属之。"屯田校尉领屯田卒数百人，北胥鞬的屯田校尉，也应领屯田卒数百人，人以二十亩计，其规模当在万亩上下。

焉耆屯田

在今焉耆一带，原匈奴僮仆都尉所在地。公元前53年，汉将辛庆忌"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后常惠向汉宣帝"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①]。焉耆道险易守，泉流交汇，是屯田的理想之地。辛庆忌在元帝初年调为金城(今兰州)长史，可见他在宣帝末年一直专理焉耆屯田。

姑墨屯田

在今阿克苏一带。汉成帝建始年间(前32~前28年)，廉褒任西域都护时，汉兵在此屯田。

乌孙在汉宣帝时分为大、小两部，分属西域都护管辖。建始年间小王乌就屠死，其子拊离继王位，被叔父日贰所杀，西汉又立拊离子安日为王。日贰逃到康居，图谋复辟。鉴于形势严重，"汉徙己校尉屯姑墨，欲候便讨焉"[②]。汉所以派己校尉到赤谷东南的姑墨屯田，是为防止乌孙内部分裂的扩大，屯田姑墨既是一种应急措施，又是和巩固国家统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二、北道(眩雷、赤谷)屯田

眩雷屯田

眩雷地在乌孙北部，伊犁河谷。早在西汉公元前105年就开始在此屯田。据史书记载："汉元封(即前110~前105年)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③]，"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④]。后汉时的学者服虔注释《汉书·匈奴传》时称眩雷在乌孙之北。从地望上观之，这片屯垦区当在今巴尔喀什湖以南，遗憾的是对我国在西域首开先河的这一次屯垦事业，史书记载仅此一笔。所以至今我们只知道有这一回事，至于这次屯垦规模多大，具体方位何在，结局如何，我们就概无所知了。这里有一段故事：

张骞通乌孙以后，匈奴见乌孙与西汉的关系日趋亲密起来，非常恼怒，准备派兵攻打。乌孙王很是恐惧，于是派使者以良马千匹作为聘礼，向汉朝求婚联盟。为了联合乌孙共抗匈奴，汉武帝欣然同意，挑选汉家宗室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亲自召见，晓以大义，封为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细君深知责任重大，受命

① 班固撰：《汉书·辛庆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乌孙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乌孙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司马迁撰：《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前往。这时西汉已经在东边攻取今朝鲜半岛，在半岛上设郡；在西边设立了酒泉郡，且与大月氏、大夏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切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络通道。在这样的形势下，汉对匈奴已由西汉初期的节节退让转变为积极进攻，和亲政策也由屈辱和亲变为平等友好互利进行联盟的积极和亲。所以，细君公主出嫁时，西汉政府的陪嫁财礼丰盛，随从人员数百。为了以强有力的屯田基地卫侍公主，经乌孙王同意，在肱雷筑塞，屯田积谷。这是西汉在西域最早的屯田点。

在肱雷进行屯田，这是学者们的共识，至于是民屯还是军屯，则有不同的看法。据有位学者在《古代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一文认为：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时"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很可能就是这数百人在乌孙开荒造田的情况，因为当时再无别的汉人能深入至此垦殖"。此论述值得商榷。

西汉初，汉匈斗争的形势是：匈奴不时进攻，西汉采取防卫态势。武帝即位后，对匈奴进行了有力的反击。特别是公元前127~前119年，经过三大战役之后，大败匈奴，"幕南无王庭"。汉北部边疆的威胁基本解除。这时汉武帝着手经营西域，"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肱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①]。汉为经营西域，采取四项重大措施。置酒泉等四郡；西和大月氏、大夏通好；细君公主和亲乌孙；北益广田至肱雷为塞。肱雷屯田是作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措施之一来部署的，不仅仅是为了供随行人员吃饭的（当然这也是屯田目的之一）。"益广田"，表示规模不小。据《说文解字》释"塞"，"筑城守道谓之塞"。"边城要害处也"，"备边疆，完要塞"。由此可见，"为塞"，是将肱雷建成一个军事要塞。这里应是一个驻军屯田之地。一方面供给由汉朝派去数百人的粮食；二是以强有力的屯田基地侍卫公主；三是作为警戒匈奴的一个军事要塞。从后边一句"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来看，是对军事要塞而说的。即在肱雷进行军队屯田，匈奴不敢说什么。如果是一般侍御人员屯田，不存在敢不敢言的问题。

至于当时有无汉人再深入此地垦殖?细君公主出塞，远嫁乌孙，数百人马，浩浩荡荡地西出阳关至乌孙，可以看出此路已经畅通。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率数万大军伐大宛，也说明军队到乌孙屯田，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张骞二次使西域与乌孙结好。"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乌孙恐惧，"使使献马，愿得尚公主"。乌孙是因惧匈奴进攻而与汉求亲的。和亲之后，在肱雷筑塞屯田，以防御匈奴，这是很自然的，而匈奴终不敢言，说明起到了威慑作用。

当然，一部分侍御人员也参加了屯田，这是非常可能的。

赤谷屯田

乌孙国都，在今伊塞克湖东南。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猎骄靡年老死后，细君遵照汉武帝"从其国俗"的指示，嫁给猎骄靡的孙子军须靡，生女名少夫。

① 司马迁撰：《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细君不服水土，过了几年去世了。汉朝应乌孙王的请求，又将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封为公主出嫁。解忧勇敢坚强，乐观开朗，入乡随俗，礼贤下士，在西域生活了50多年，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初嫁军须靡的堂兄翁归靡(号肥王)，生三男二女，都有作为。长子元贵靡，后为乌孙王；次子万年被莎车迎去当了国王；少子大乐官至左大将。长女弟史曾赴长安学琴，后被龟兹国王绛宾娶为妻；次女素光为乌孙侯王妻。军须靡的匈奴妻所生子泥靡长大执政(号狂王)，按乌孙风俗，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后母为妻。泥靡又娶解忧为夫人。解忧的侍女冯嫽也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子，她代表解忧，手持汉节访问天山南路，传播友谊，深受各国敬重信任。后嫁乌孙右大将为妻。细君、解忧和冯嫽对促进汉与乌孙的亲密关系，增强祖国内地与西域的友好往来与交流，作出了积极可贵的历史贡献。

汉与乌孙的联盟激怒了匈奴。公元前72年，匈奴联合车师进攻乌孙，解忧和翁归靡联名向汉朝告急求援，说："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①]汉宣帝于公元前72年，派15万大军，分别由大将赵充国、田广明、范明友、韩增和田顺等率领，从云中、五原、西河、张掖、酒泉兵分五路，齐头向北进军，直指匈奴腹部。这时匈奴精兵西击乌孙，本部空虚。听到汉军北指，急忙西兵东调。与此同时，汉武帝派校尉常惠，持节到乌孙，与乌孙王一起，率乌孙精锐骑兵5万，从西攻打匈奴，造成东西夹攻之势。这一仗，汉、乌联军大获全胜，从匈奴右谷蠡王庭俘虏了单于(匈奴最高统治者)的父辈、嫂辈及都尉、千长、骑将等以下3.9万多人，收缴牛羊70万头。这是西汉时期汉匈的最后一次大会战，匈奴从此一蹶不振。乌孙国在伊犁河流域站稳了脚，并逐渐强大起来，汉、乌关系进一步密切。

公元前53年，乌孙国内大乱。肥王翁归靡匈奴妻所生子乌就屠欲做乌孙昆莫(王)，于是袭杀狂王，自立为昆莫。汉宣帝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1.5万人至敦煌，准备讨伐乌就屠。这时已是70多岁的常惠，不顾艰险，再次奉命出使西域"将三校屯赤谷"。时西域都护郑吉使冯嫽夫妻劝说乌就屠，力陈利害使其归降。乌就屠自知难以与汉军抗衡，如汉军征伐"必见灭，不如降"，遂答应做乌孙小昆莫。于是，汉宣帝任命冯嫽为持节正使，诏乌就屠至赤谷城，立元贵靡(翁归靡与解忧公主所生之长男)为大昆莫，乌就屠为小昆莫，"皆赐印绶"[②]，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战争，乌孙臣属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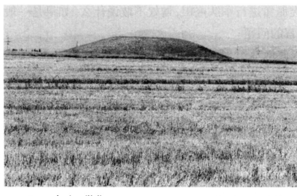


图6　乌孙土墩墓

① 班固撰：《汉书·乌孙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汉。后又在长罗侯常惠主持下“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莫元贵靡辖6万余户，小昆莫乌就屠辖4万余户。常惠将“三校”屯田，既是垦荒种田、发展生产的力量，更重要的还是稳定乌孙局势“分别其人民地界”的一支具有威慑性的力量。“三校”是多少人？按《汉书·赵充国传》载“步兵九校，吏士万人”，一校所部在千人以上。此处“三校”，因西域乌孙遥远，每校以800人计，人数约在2 000人上下。每人种田20亩计，屯田约4万亩左右，这个规模是不小的。这对伊犁河谷的开发及逐步改变乌孙“不田作种植”的习俗，是有深远意义的。

据载，俄·乔坎·瓦利汉诺夫报道：在伊塞克湖东南发现古城遗址。遗址内有汉式建筑、汉代遗物和汉文字题铭。郊外有古代灌溉渠道遗址。瓦利汉诺夫认为：即古乌孙首都赤谷城，是西汉军队屯田之处。

另一种意见认为：赤谷城在特克斯河流域的昭苏。持这种看法的人依据是，《汉书·西域传》载：赤谷“地平莽，多雨寒，山多松樠”。只有昭苏盆地与之相吻合。昭苏海拔是1 848.6米，年降水量600多毫米，比伊犁河谷高一倍。盆地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是草质优良而丰美的牧场。古代的“天马”就出产在这里。南面山上的原始松树林，郁郁葱葱。在境内发掘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乌孙古墓封土中，出土了一件铁铧，重3.1公斤，长35厘米，舌形，中部隆起，尖部及边缘比较钝厚，后部为扁似梭形的銎，銎长15厘米，最宽8厘米，深14厘米。形制明显具有汉代风格，与陕西关中陇县出土的铧相同。敦煌也曾出土过形制、大小与此相同的铜铧，时代均属西汉。据考古学者王炳华先生分析：汉代赤谷曾进行军队屯田，此铧是汉代屯田士卒生产工具的遗存。

这样，伊塞克湖东南有乌孙首都赤谷。昭苏也证明是乌孙首都。这不矛盾吗？据苏北海先生考证：伊塞克湖东南是乌孙的冬都，昭苏是夏都。游牧民族向来都有冬都、夏都之分。如唐时高昌回鹘冬都在高昌，夏都在北庭一样。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的。历史证明，两地都有军队屯田。

三、南道（伊循、楼兰）屯田

伊循屯田

在今若羌县境，临近楼兰国都，地当丝绸之路南北道的要冲。楼兰国在公元前108年前，受匈奴控制。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归汉不久，又游离于汉匈之间，“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此处屯田即西汉政府惩处楼兰背叛者之后所设立的。

自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及商贾东西往来，络绎不绝。由匈奴拥立的楼兰王安归贪婪凶狠，常常拦路抢劫，谋财害命，又受匈奴指使，多次袭杀汉使，严重威胁汉与西域的交通。公元前77年，汉派傅介子前往楼兰诛杀安归以示威。傅介子到了楼兰国都，空手去见安归，安归对他十分冷淡。第二天，傅介子佯装要向西赶路，出示金银财宝对楼兰译长说：“我这次原本是来行赐各国的，你们国王对我很不礼貌，我只好走了。”译长忙去报告，安归匆匆追上傅介子赔礼挽



留。将傅介子请进驿馆，观赏金银财宝，置酒款待。酒酣时，傅介子说皇上有话，要单独相告，安归随傅介子进帐，被两名勇士拔剑交胸刺死。傅介子宣告："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①]他不用动兵就平定了楼兰。安归弟尉屠耆久居长安，与汉亲近，被立为王，并更改楼兰国名为鄯善。他临行前对汉昭帝说："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②]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其后更置都尉。1930年春，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考古时，在罗布泊北岸一座汉代烽燧中发现了71枚汉简，其中第10、11号简上就记载着"伊循都尉左……"、"伊循卒史黄广宗……"等字样，便是汉代在伊循开展军垦的实物证据。

汉代的伊循城经过考古证明在今若羌县境内的米兰附近，马雍在《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一文中称："在若羌县米兰发现过一个汉代灌溉系统，沿着米兰河道，修建了总闸、分水闸、干渠和支渠，有的支渠长达两公里，此处也发现过汉代的文物和墓葬，据推测，应当是汉代在伊循城屯田的遗址。"由此可见汉在伊循的屯田，规模是巨大的，水利设施也是十分先进的。此一屯垦区一直延续至南北朝还在发展。

楼兰屯田

楼兰，西汉初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王治楼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即今罗布泊。楼兰先臣属于大月氏，约在公元前177~前176年，匈奴攻灭大月氏，于是楼兰为匈奴所统治。匈奴单于冒顿在给汉文帝的信中称："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民，并为一家。"[③]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和西域的交往逐渐增多起来。来自贵霜（即大月氏）、安息、大宛、康居等国的使者、士兵、商贾、僧侣东来西往，楼兰成了丝绸之路的孔道。"使者相望于道"。楼兰古城在促进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汉书·西域传》记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楼兰不仅为来往使团、商贾提供食宿，还派人作向导，负水担粮，给予服务，为丝绸之路畅通作出了贡献。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匈奴为了阻止汉朝势力西进，不断派出骑兵拦劫汉朝使团，伤害人员，掠夺财物。楼兰在匈奴的军事压力下不但不为汉朝及西域各国使者、商队提供方便，而且还屡次发生抢劫使臣、商队的事。且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阻截汉使，汉使者王恢曾遭楼兰士兵劫掠。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使团、商队、僧侣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汉武帝欲通大宛诸国，苦于楼兰、姑师当道。为了打击匈奴势力，保障丝绸之

① 班固撰：《汉书·傅介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鄯善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路畅通，于公元前108年，派从票侯赵破奴将兵破楼兰，楼兰从此表示臣服于汉。但是，楼兰是西域门户，扼丝绸之路咽喉，汉匈争夺激烈，楼兰也游离于汉匈之间。汉昭帝元封四年（前77年），汉大将霍光派傅介子刺杀其王，更名鄯善国，立尉屠耆为王。《汉书·西域传》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弥城。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关于扜弥城的方位，说法不一。西域史地学家冯承钧先生考证，在今若羌县城附近。有的文章认为在于田县北100公里的沙漠中。据《汉书·西域传》载："汉定楼兰立尉屠耆为王，王惧力量单弱，恐被杀害，请求汉派将士屯田伊循，""令臣得依其威重"。伊循就是现在若羌东70公里的米兰附近，兵团农二师36团就在此处兴水利、垦荒地、建农场。饶瑞符先生经过多年实地勘探考证，发表了《从伊循灌溉工程的遗址看汉唐时代的屯田建设》一文，论证了此地就是汉代伊循屯田遗址，饶说引起史学家的重视。鄯善王欲依恃屯田武装力量，其所在地当距伊循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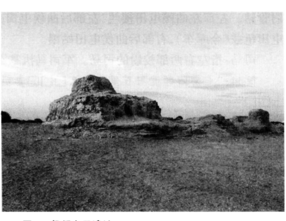


图7　伊循屯田遗址

鄯善迁都扜弥城后，楼兰成为鄯善国的一个城市，因该地是汉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军事要塞，应有驻军屯田。

据黄文弼著《罗布淖尔汉简考释》载，在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中，有不少是记载西域屯田，特别是楼兰屯田情况的。如：

简1："都护军侯张□所假官骍牝马一匹。齿八岁，高五尺八寸"

都护，西域官名，不仅是西域最高的军政长官，也是屯田的最高主管。军侯亦称曲侯，是都护属官。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张□为人名，记其养官马的事。

简2："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七月癸卯朔壬子左部左曲侯"

简3："右部后曲侯丞陈殷十月壬辰为乌孙寇所杀"

简4："二月庚辰朔丙午后曲侯"

简5："□者马君左部后曲侯尊丞商令史利□"

简6："右部右曲侯□□令史□□□"

简7："□□部军守司马"

简8："君使宣告左右部司马衍□□□"

据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考证：西域屯田部队，在西汉元帝时，分为左右两部，每部下有侯曲几人。戊部居车师前部（今吐鲁番境内），在乌垒之左，称左部，属高昌校尉管辖。己部居姑墨（今阿克苏），在乌垒之右，称右部，右部属己校



尉管辖。左部左曲侯屯田楼兰，左部后曲侯屯田交河(今吐鲁番境)，右部右曲侯屯田龟兹(今库车)，右部后曲侯屯田姑墨。

司马：指左右两部校尉的司马。军司马执掌军事。

简34："土南阳郡涅阳石里宋钧亲□□□妻玑年卅□□私从者同县籍同里交上□□"

土即士，士指屯戍卒，"南阳郡涅阳属荆州"，涅阳因水得名。宋钧，人名。记述宋钧带着30岁的妻子和志愿来疆的同籍人员到楼兰屯田。

简35："右六人，其二亡土，四土妻子"

简36："妻□二人，一伯子"

简39："没临中女子二七□为□男子十□"

以上均记载不少屯卒带有家属。

简41："□□□□□家属六人，官驼二匹，食率匹二升"

某屯卒带家属六人到楼兰，政府安排驼二匹驮载物品，并供给粮食。

简30："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

孙尚是应政府招募到楼兰的，陕西长陵(今咸阳附近)仁里人，大夫是爵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共20等爵名位皆秦制。孙尚被赐予五等爵大夫。

简27："里公乘史隆家属畜产衣器物籍"

公乘：爵名。史隆：人名。籍即簿。史隆家属衣物器具登记簿。

简29："霸陵西新里田由"

简32："小巷里王护"

田由、王护是政府招募到楼兰屯田的贫民。霸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小巷里、西新里皆地名。

简16："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

西汉在交河的屯田部队，设有曲一级的仓以积谷。其丞名衡，调楼兰居卢訾仓。

简13："居卢訾仓以邮行"

居卢訾仓除供给屯田官兵口粮外，还负责传递文书。

简17："元延五年(公元前8年)二月甲辰己未□□□土□尉临居卢訾仓以□□"

西汉成帝元延五年，有一校尉到居卢訾仓巡视。

1988年楼兰出土新木简63件，其中11件是反映屯垦戍守的木简，涉及垦种、牧养、作工、戍守等[1]。如：

---

① 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

简11:"右二人牧牛验"

楼兰地区牧养的牛,大约是要经过官验的。

简13:"出麦五十九斛四斗五升拎乞"

支出登记"出麦"数量。

以上汉简证明,西汉在楼兰确曾进行过屯田,根据楼兰的战略地位和当时自然条件也应该有屯田。但何时开始?规模多大?不见史书记载,有待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学家以及对此有兴趣的同仁们进一步探索考证。

有的学者称:楼兰屯田士卒曾达万人以上。这主要是依据《汉书·西域传》载: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汉遣破虏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其实,辛武贤所率部队至敦煌后,乌孙的纠纷得以顺利解决。万五千人,"不出塞还"。少数先遣人员到楼兰灌溉屯田是可能的,但规模不会太大。有的文章称楼兰屯田士卒有一万余人,可能是对上述"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误解为至楼兰了。

尼雅屯田

在尼雅遗址曾出土汉代屯田官"司禾府"印,证明此地曾进行过屯田,尼雅是汉时"丝绸之路"南重镇,当然应有驻兵进行屯田,详情待考。

西汉西域屯田简表

屯田地名		开始时间		屯田人数	备　　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肱雷	伊犁河谷	元封中	前110~105年	开始数百人	这是汉在西域最早的屯田点。
轮台	轮台县境	武帝太初四年	前101年	开始数百人多时达千余人	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大胜。汉置使者校尉领数百人在此屯田,前77年以打弥太子赖丹为屯田校尉,在此屯田。
渠犁	库尔勒西	武帝太初四年	前101年	开始数百人后增至1500人	公元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人数百人,在此屯田积谷。
伊循	若羌县境	昭帝元凤四年	前77年	开始40人后为千余人	前77年汉昭帝在此调司马率40余人在此屯田。后改为都尉率士卒屯田于此。



屯田地名		开始时间		屯田人数	备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交河	吐鲁番境	宣帝地节三年	前67年	开始300人后增至数千人	宣帝时遣郑吉率士卒到此屯田，后匈奴攻击，汉屯田士卒撤。前62年，汉再派屯田军到此，并设戊己校尉。
北胥鞬	莎车附近	宣帝神爵三年	前59年	约数百人	披莎车之地进行屯田。
赤谷	伊塞克湖东南	宣帝甘露元年	前53年	约三千人	常惠将三校屯田于此,为乌孙国大小昆弥分别其人民地界。
焉耆	焉耆	宣帝甘露三年	前51年	约千人	校尉辛庆忌将吏士屯田焉耆。
姑墨	阿克苏	成帝建始年间	前30年	约千余人	为防乌孙一部分反汉势力叛乱，汉政府派已校尉到赤谷东南的姑墨屯田。
高昌	吐鲁番境	元帝初元元年	前48年	约两千余人	汉派军队建高昌城，迁戊已校尉驻高昌城，此后高昌一直是屯田重点地区。
楼兰	罗布泊西北	昭帝元凤四年	前77年	约数千人	大量汉简证明，楼兰是西域重点屯田地区,详情待考。



第二章　东汉时期西域屯田

西汉王朝在西域稳固地统治了近70年，屯田事业的发展贯彻始终。

汉平帝末年，王莽秉政后，对西域采取了民族歧视、残酷镇压的政策，激起了西域的叛乱，匈奴乘虚而入。西域绝，屯田废。

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发现有新道：从车师后国出五船北，达玉门关。这条路很近，这是件好事。便与车师后王姑句商议将此路开通，姑句怕路通后，对来往官员的食宿供应很繁，负担不起，不同意开此路。徐普不是耐心地讲清道理，而是蛮横地将他拘留，姑句惧，"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①]。

与此同时，住在若羌的去胡来王唐兜屡遭邻近的赤水羌侵袭，唐兜向都护但钦求援，但钦不睬。唐兜逃玉门关，不准入关，无奈，"即将妻子人民千余降匈奴"[②]。

王莽知道这两件事后，不但没有责备徐普和但钦，反而派使者向匈奴索人。匈奴答应还人，但请求免罪。王莽不听，"诏下会西域诸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③]。这样不公正的处理，激起了西域各国的不满。

公元9年1月，王莽废孺子婴，西汉亡，王莽称帝，国号新。派人到匈奴向单于通报王莽称帝的消息。同时更换单于的印，汉朝向单于颁发的印文称："匈奴单于玺"，表示单于位在汉诸王之上。王莽改印文为："新匈奴单于章"，单于的地位就和王莽的臣下一样了，单于怨恨。同时对西域诸王一律改称"侯"，遭到西域诸王的激烈反对。

公元10年（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与左右谋曰："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逃入匈奴。戊己校尉刁护闻之，"将置离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被但钦斩杀。置离兄辅国侯将众2 000人逃

①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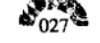






图8　李崇印

匈奴,并与匈奴一起攻车师。

当王莽与匈奴、西域关系日益恶化,匈奴准备大举进攻的前夕,西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兵变。公元10年,戊己校尉刁护病,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尚密议:"西域诸国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将人众降匈奴。"[①]于是杀刁护一家四口,"尽胁吏士男女二千余人降匈奴"[②]。单于封陈良、终带为赍都尉。这一次兵变,沉重地打击了王莽在西域的统治。

公元13年,匈奴单于死,弟乌累单于咸继位,欲和亲,王莽先允而后拒,"和亲遂绝, 匈奴大击北边, 而西域亦瓦解"[③]。焉耆先叛,杀都护但钦。至此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均被杀,西域大乱。

天凤三年(16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击骏等,皆杀之"[④]。唯戊己校尉郭钦将兵后到,引兵返回内地。李崇收余众退到龟兹。自此,匈奴乘虚而入,除莎车等国还在继续反抗匈奴外,西域大部丧失。当然屯田也就停止了。

第一节　东汉初年与西域的关系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36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55国。王莽灭西汉称帝,对西域各国王贬称侯,由是西域各国生怨,焉耆先叛,数国响应,复依附匈奴。匈奴逐步略有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⑤]。

时有莎车王延,抵抗匈奴,不肯附属。延曾在汉元帝时做过侍子,久居长安,与汉友好。常常告诫自己的儿子们说:"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⑥]公元18年延死,其子康立为王,"率傍国拒匈奴"[⑦]如故。并保护了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东汉建立之后,康写信到河西问讯中国动静。并说:"思慕汉家。"建武五年(29年),

①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河西大将军窦融以汉廷名义封康为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以统辖西域55国。

公元33年康死，弟贤立为国王。贤虽仍称忠于汉朝，但野心勃勃，四处扩张，不再率傍国抗匈奴，而是攻灭拘弥及西夜国，并杀其王。公元41年（建武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并请任命他为都护。大司空窦融向东汉光武帝刘秀建议："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即命贤为西域都护，派使者持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赴西域。敦煌太守裴遵上书："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①]汉光武帝又改变主意，收回都护印绶，改发大将军印。由是贤始恨东汉，而犹称大都护，移书诸国，各国均听其号令。

公元45年（建武二十一年），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光武帝刘秀借口："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之。"[②]诸国大为失望。是时贤自恃兵强，知都护不出，欲兼并西域，对各国攻击日甚，送书鄯善王安："会绝汉道。"攻杀龟兹王，并兼其国。鄯善王复上书，愿复遣侍子，更请都护。光武帝不耐烦地回答："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③]鄯善、焉耆不得已，复附匈奴。

贤知汉光武帝无心经营西域，愈加骄横，灭伪塞国，攻大宛。杀于阗、姑墨、拘弥、子合等四国国王，遣将镇守其国。

明帝永平三年（60年），于阗国人鉴于贤派的将军君得，贪婪残暴，攻杀之。贤两次派重兵攻于阗，结果大败而归。公元61年，于阗王广得将兵3万攻莎车，贤被捉杀。

匈奴乘机遣五将发3万人攻于阗，广得乞降。

西域内乱，东汉不问，匈奴坐收渔人之利，重新占有西域。

第二节　东汉统一西域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都洛阳，称东汉光武帝。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刘秀未遑外事，对西域采取放弃的方针，对匈奴采取妥协的政策，希望以此换取边境的安定。公元63年（光武六年）与匈奴通使，遣中郎将归德侯刘飒，大司马护军使匈奴，带了大批礼物，"赂遗金带，以通旧好"。而单于骄横，对使者"辞语悖慢"。公元70年（永平十三年），寇河东，州郡无力抵御，于是迁幽州和并州的人民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其锋。匈奴左部遂跟到长城以内居住。朝廷一再忍让。只是在边郡增兵数千人，大筑亭侯、烽火。匈奴扰掠烧杀，逐步深入内地。公元77年

①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至上党、扶风、天水。公元78年入侵上谷、中山，焚烧城邑，杀略甚众，北边无宁日。与此同时，在西北边境，匈奴胁西域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①]，因匈奴不时烧杀抢掠，白天都不敢打开城门，可见形势紧张之至。

在东汉廷议中，耿秉首先提出对北匈奴应采取反击的方针。他慷慨激昂地陈词："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耿秉认为妥协退让，不能保证边境安宁，应该"以战去战"[②]。他主张先取伊吾卢（今哈密境内）、车师等地，联络乌孙及其他地方，以断匈奴右臂。汉明帝刘庄接受了耿秉的建议，决心遵汉武帝故事，反击匈奴，重新经营西域。



图9　班超像

永平十五年（73年），明帝以窦固为奉车都尉，出屯凉州准备西进。第二年，明帝命窦固率耿忠诸将共万二千骑出酒泉；耿秉、秦彭率万余骑出居延塞；命祭肜、吴棠率1.1万骑出高阙；命来苗、文穆等1.1万骑出平城，五路出击匈奴。窦固、耿忠沿天山北部西进，击北匈奴的呼衍王于巴里坤湖一带，大败北匈奴，留军伊吾卢城，汉明帝置宜禾都尉，后又置都护、戊己校尉[③]。在西域重建统治，以陈睦为都护，驻龟兹。同时，派出戊己校尉驻车师前后部管理军队屯田。"西域自绝六十五载（若从焉耆杀王骏算起，止57年），乃复通焉。"[④]史称"一绝一通"。从这时候开始，东汉王朝再一次揭开了统一西域的序幕。历史上著名的班超，随军参战，后来在西域立下了赫赫的功勋。

班超出生在书香门第、仕宦之家。父亲班彪、兄班固、妹班昭，都是编纂《汉书》的著名史学家。他博览群书，善于辞令，以勇谋著称。随兄到洛阳，为谋职替官府抄写文书，枯燥乏味。一日突然掷笔于地，仰天长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⑤]他毅然投笔从戎。窦固出征天山时，班超在其部下做假司马（代理司马）率兵，在蒲类海及伊吾等战役中立了战功，受到窦固的赏识，派班超与郭恂带着36人出使西域。超很快抵达鄯善（在今罗布泊西岸），初到时受到热情礼遇，可后来就冷淡起来了。经了解是匈奴使者来此策反，鄯善王正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班超当即召36人说：若鄯善王为匈奴使者所屈服，将会缚我们送匈奴，不但我们任务完不成，

①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总叙》，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耿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范晔撰：《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且将死无葬身之地。当今之计，唯有乘夜突袭匈奴使者，则鄯善破胆，定会功成事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众从之。当夜班超率36人往袭匈奴使者营地，时值大风，顺风纵火，班超等36人突入帐中杀匈奴使者及随从30余人。鄯善王大惊，遂臣属汉。

汉廷因功升班超为军司马，率36人到于阗。于阗王广德因匈奴使者监护其国，对班超等一行礼意甚疏。于阗王宠信的一个巫师说：“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者有騧（黄马黑喙），急取以祠我。”班超佯允说：“请巫师亲自来取，以免认错。”巫师一到，勇士手起刀落杀掉巫师。于阗王早已闻知班超在鄯善的壮举，大恐，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继续西进接连使疏勒、龟兹诸国内附。

班超因功被封为定远侯。他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虽然没有到达目的地，却到了安息（今伊朗）西部边界，扩大了东汉王朝的影响。班超晚年请求回朝，上书和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①]公元102年，他以70高龄回到洛阳，一个月后与世长辞，西域人民闻讯悲恸落泪。班超在西域30年，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汉书·西域传》为此赞曰：“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他们的业绩在千百年后的今天，犹令人钦佩。

第三节　东汉在西域屯田

东汉明帝于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派大军北征匈奴、西取伊吾卢，并留吏士屯田，开始着手经营西域。惜后任者未能贯彻始终，经营西域的方针摇摇摆摆，反映在屯田上，时断时续，因而出现了西域三绝三通的现象。自公元16年，五威将王骏在焉耆被杀、戊己校尉郭钦率部退回关内后，西域绝。公元73年，奉车都尉率部大败匈奴，取伊吾卢等地后，东汉和西域首通，先后在伊吾卢、金满城、柳中、楼兰进行屯田。是为一通。公元77年（建初二年），汉章帝以“不欲疲敝中国”为由，撤都护、废屯田，是为二绝。公元91年（永元三年），车骑将军窦宪遣副校尉阎槃率部掩击伊吾，破之。北匈奴大部西迁，东汉再次统一西域，命班超为西域都护，设戊己校尉驻高昌壁，这次先后进行屯田的有高昌壁、且固城、伊吾卢、疏勒等处。是为二通。公元107年，安帝鉴于“西域阻远，数有背叛”。西域“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②]。屯田再废，是为三绝。公元123年（延光二年），班勇将兵五百出屯柳中，重新统一西域，再次组织屯田，是为三通。从此以后，屯田基本稳定下来。东汉经营西域，首先屯田伊吾卢，以后陆续屯田的地方有柳中、楼兰、金满城、疏勒、且固城、

① 范晔撰：《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高昌壁、精绝等地。现按丝绸之路北道、中道、南道分述如下。

一、北道(伊吾卢、金满城、且固城)屯田

伊吾卢屯田

伊吾,秦时称伊吾,汉时改称伊吾卢。在今哈密市西60公里处。伊吾卢为西域门户,与匈奴毗邻,是西域的战略要地。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著名的哈密瓜就出产在这里。《汉书·西域传》载:"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控西域焉。"

东汉与匈奴在伊吾卢反复较量,每次夺得伊吾卢立即组织屯田。由于争夺之频繁,出现了屯田屡办屡停的局面。

汉明帝决心效武帝着力经营西域。派奉车都尉窦固、骑都尉耿忠率士卒1 200人在天山东部,大败匈奴。《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六年春二月……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关于这一战役的经过,《后汉书·窦固传》是这样记述的:"(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在这一战役中,班超以假司马(代理司马)的名义,率士卒与匈奴激战,打得很出色,为窦固所赏识。"奉车都尉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①]

这次伊吾卢屯田,进行了整整四年,到公元77年3月,汉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于建初"二年(77年)三月,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②]。这次屯田的停止,显然是缺乏战略远见的。

公元90年(东汉永元二年),车骑将军窦宪派副尉阎槃率2 000骑掩击伊吾。攻克之后,东汉第二次在伊吾卢进行屯田。

公元92年(永元四年),"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③]。公元93年,已降汉的匈奴於除鞬叛逃,帝遣任尚率屯田士卒与将兵长史王辅所率千余骑追斩於除鞬。

延平元年(106年),西域诸国叛,攻都护任尚于疏勒,会温宿、姑墨皆叛,被副校尉梁慬大败之,西域叛乱被平定,因路远书信迟到,公卿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其费无已。遂于公元107年(永初元年)"罢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④]。西域的叛乱被平定下去后而放弃西域屯田,可见东汉政府腐败之至。

公元119年,长史索班率1 000余人,收复伊吾卢并行屯田,同时招抚西域各

① 范晔撰:《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章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范晔撰:《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范晔撰:《后汉书·梁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国。《后汉书·西域传》载："敦煌太守患其(指匈奴)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仅数月，"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遂击走其前王。曹宗请兵北击匈奴,复欲进取西域,邓太后不许"。其后北匈奴与车师屡寇河西,朝廷不能禁。有的大臣竟提议:"闭玉门关、阳关,以绝其患。"


图10 拉甫却克故城遗址

公元123年(延光二年),复以班勇为长史出西域,再次统一西域。公元131年,伊吾卢再次恢复屯田。为了加强领导,置伊吾司马一人。"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1],此是顺帝永建六年之事。

这次恢复屯田后,由于政治局面较稳定,屯田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建成西域一个大的屯田基地。屯田士卒不仅进行屯田,还参加了保卫边疆的战斗。公元151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士卒3 000余进攻伊吾,伊吾司马毛恺率屯军500人迎战失败,全军覆没。敦煌太守马达率兵4 000救援,匈奴闻讯,引兵西去。伊吾卢屯田虽受到一次挫折,但随即恢复。

金满城屯田

金满城又叫侯城,即今吉木萨尔县北十二公里处护堡子遗址,汉时属车师后部,是丝绸之路的北道重镇,是北疆的战略要地。

永平十六年(74年)春,窦固击败匈奴于天山以后,永平十七年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耿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耿秉攻克车师,其王降。"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置数百人。"[2]这是金满城首次屯田。耿恭到任后,首先致书友邻乌孙王,"大昆弥已下皆喜欢。遣使献名马,愿遣子入侍"[3]。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

公元76年(永平十八年)3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攻车师,耿恭派300人赴援,与匈奴大队骑兵遭遇,经过激战全部壮烈牺牲。匈奴接着攻杀后王安得。围攻金蒲城,耿恭登城指挥,与士兵并肩战斗,抵抗匈奴进攻。他们使用毒箭杀伤敌人,传语匈奴:"此汉家神箭。"中矢者伤口溃烂,匈奴大惊。会天降暴雨,恭与士兵冒

①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总叙》,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耿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范晔撰:《后汉书·耿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雨击敌，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①恭以疏勒城（今吉木萨尔城南泉子街附近）依山有涧水利于固守，乃引兵据之。7月，匈奴又来攻疏勒，耿恭募先登数千人向匈奴冲去，胡骑散走。匈奴兵乃长期围困，断涧水。恭于城中凿井十五丈仍不见水，吏士干渴，笮马粪汁而饮。再深掘井，泉水涌出，众呼万岁。恭令士卒扬水示匈奴，虏以为神，遂引兵去。

时焉耆、龟兹攻殁都护陈睦，围关宠于柳中，救兵不至，车师复叛，并与匈奴联兵攻耿恭。后王夫人是汉裔，常将匈奴情况通知耿恭，并助以粮饷。数月后"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推诚同生死，故皆无二心"②。上下同心，誓与疏勒共存亡。匈奴招降，宣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无一动心。单于大怒，围攻甚急，终不能克。

帝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率士卒7 000余人，会师柳中，攻车师，克交河，斩首3 800余人，匈奴逃。车师惧，复降汉。旋命范羌率兵2 000余人，越北山，迎耿恭。大雪丈余，吏士排除万难，兵趋城下。城中夜闻兵马声，大惊。范羌乃大呼："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涕泣。明日，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出发时有26人，次年3月到玉门，"惟剩13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上书称："耿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恭之节义，古今未有。"时称："节过苏武"③。

公元90年（和帝永元二年），窦宪派阎槃收复伊吾，车师前部和车师后国再次归汉。公元91年恢复金满城屯田。《后汉书·西域传》载：汉和帝永元三年"又置戊部侯，居车师后部侯城"。由戊部侯率士卒在此屯田戍守。公元107年，西域诸国叛，攻都护任尚，虽经平定，但西域屯田士卒均被撤回关内。

公元119年，东汉曾在后部进行短期屯田，据《后汉书·西域传》载："永宁元年（120年），后王军就及母沙麻反叛，杀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后汉书·释语》称："司马即戊校尉所统也，和帝时置戊己校尉镇车师后部。行事谓前行长史索班。"当时索班出塞，率千余人复伊吾，行屯田。车师王、鄯善王来降，未说车师后王来降，所以屯田金满城是值得商榷的，但索班兵屯伊吾卢，一定会派出警戒部队，由司马率领前进与伊吾卢相邻的金满城某地驻屯，则是符合军事部署的。

公元125年（延光四年）秋，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6 000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首虏8 000余人，牛马牲畜5万余头，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殉难处斩之。更立故王子加特奴为王，车师六国悉平，立即恢复车师后都屯田。

且固城屯田

且固城在车师后部国境内，但其具体位置不详。方英楷先生认为金满城即且

① 范晔撰：《后汉书·耿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耿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范晔撰：《后汉书·耿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固城，此说可供参考。

公元153年，东汉在车师后部设有戊部侯，率吏士进行屯田。戊部侯曾与车师后王发生激烈矛盾，激起了一件反叛事件。据《后汉书·西域传》载："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侯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叛，围攻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从这条资料可知：东汉政府到车师后国的戊部侯名严皓，驻屯且固城；率吏士进行屯田；车师后王与戊部侯发生尖锐矛盾，便率部攻打且固城的屯田吏士；由于屯田吏士的英勇抵抗，加之后部侯炭遮反对阿罗多的这种做法，而率部降汉。阿罗多不得已，仅将其母、妻子共百余骑北逃匈奴。

敦煌太守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阿罗多又返后部与卑君争国，戊校尉阎祥更立阿罗多为后部王，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三百帐归其统之。

二、中道（柳中、高昌壁、疏勒）屯田

柳中屯田

柳中在今鄯善县西南的鲁克沁。是西域的军事要冲，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土质优良，气候温和，适于种植。公元74年（永平十七年）11月，窦固引兵击败匈奴，复车师。汉在西域设戊己校尉。《后汉书·耿恭传》载：汉破降车师后，"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至此，柳中城成为东汉在西域的屯田基地。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8月，匈奴大举进攻西域。龟兹、焉耆等国联兵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匈奴攻占车师前国，围关宠于柳中，经过英勇抵抗，关宠战死，全军覆没。公元76年1月，酒泉太守段彭率部出塞援西域，会兵柳中，攻车师，克交河，大败匈奴。但汉章帝却命："迎还戊己校尉。"罢西域屯田。

公元91年（和帝永元三年），东汉政府第二次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重开柳中屯田。公元107年（安帝永初元年），汉廷派部队"迎还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①，屯田又停。

屯军撤出西域，匈奴呼衍王屡屡发兵侵袭河西，四郡人民不胜其苦。公元123年（安帝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令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又如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故孝武愤怒，深为长久之计，命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之北，财币靡于庐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楼空虚，筭至舟车，赀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若弃而不救，则河西四郡危矣。"②汉安帝采纳了张珰的中计，命班勇为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③。延光三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以鄯善归

① 范晔撰：《后汉书·梁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附，特加三绶。勇宣以恩信，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诣勇请降。班勇即发其步骑万余人至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收得车师前部5 000余人。西域遂定，还柳中屯田。

高昌壁屯田

高昌壁在今吐鲁番城东的阿斯塔那附近。由于车师地接匈奴，高昌壁处于军事前沿要塞，西汉曾在高昌置戊己校尉，并行屯田。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①]500人着200人担任警戒任务，300人屯田是可能的。人以种地20亩计，屯田面积约在6 000亩左右。公元107年罢屯田。“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因罢都护。”[②]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

班勇率部500人，出塞屯柳中后，公元124年（安帝延光三年），勇发龟兹等国兵万余人并屯田吏士，大败匈奴于伊和谷，攻克车师，收得前部5 000余人。降车师，重开高昌壁屯田。

公元175年（灵帝熹平四年），于阗王安国擅出兵，攻拘弥，杀其王，死者甚众。为打击于阗的侵略行为，扶助弱小，“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屯田士卒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东汉末年，董卓曾任西域戊己校尉[③]。

疏勒屯田

疏勒，即今喀什市附近的疏勒县。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漠西缘，西域西陲门户，丝绸之路重镇。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宜农宜牧。

公元74年（永平十七年），班超率36人，先后降服楼兰、于阗后，到达疏勒。时龟兹王建，倚恃匈奴攻破疏勒并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超到疏勒，遣吏田虑先到兜题所居槃橐城，乘间缚兜题，超释而遣之，立疏勒故王兄子忠为王。于是，国人大悦。

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府后，疏勒即受汉号令受西域都护府管辖。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1万人，攻破姑墨石城。为了重新统一西域，上疏请兵：“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臣见莎车、疏勒田地广肥、草牧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汉章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公元80年“遂以干（徐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④]。公元91年任命徐干为长史，仍驻疏勒，率兵屯田，不仅在经济上种田积谷，以解决部队的粮食自给，更重要的是与龟兹、高昌在军事上形成互相策应的战略态势。

①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范晔撰：《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接替班超都护职务的是戊己校尉任尚。班超离任时告诫任尚："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蛮夷难养易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1]任尚不听班超叮嘱，行事峻刻，引起西域诸国不满。东汉在河西、青海征兵，准备前去弹压，又引发了羌族人民大起义。有的大臣说："西域路太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费用太大，得不偿失。"公元107年，汉安帝罢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撤伊吾等地屯田，北匈奴又入西域。

公元119年，汉安帝同意敦煌太守曹宗的主张，遣行长吏索班，将千余人屯田伊吾[2]，被北匈奴与车师后王勾结袭杀。为此朝廷又引起辩论，多数大臣主张玉门闭关，放弃西域。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策："失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班超之子班勇"少有父风"，他说："东汉明帝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3]力主收复西域。尚书陈忠也上奏慷慨陈词，其中"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一句，可谓感人之语。公元123年，汉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取代西域都护），经营西域。公元127年，西域重获统一。史称"三绝"、"三通"。

三、南道（楼兰、精绝、于阗）屯田

楼兰屯田

楼兰为西域的城郭诸国之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断断续续的考古材料证明，这个王国的位置在今罗布泊周围，其范围包括孔雀河以南，南抵今若羌县的米兰、墩力克一带，西濒塔克拉玛干沙漠，东与敦煌接壤，其西北可通焉耆、龟兹，西南可至若羌、于阗等南道诸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即从楼兰分为南北两道，通往中亚、印度及欧洲。今罗布泊西北岸边、孔雀河南岸7公里处的楼兰古城，可能就是当年楼兰王国的中心城市。此城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东西方来往之使者、商人、旅客必经之地，也是西域的军事重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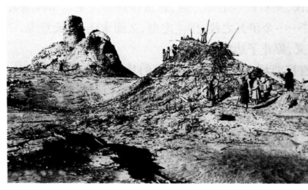


图 11　楼兰古城遗址

秦汉之前，我国内地好像还不知道这个王国的情况，到司马迁撰《史记》时，才知有楼兰国，而消息之来源还是从匈奴人那里得来的。《史记·匈奴列传》称文帝四年（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写信说，"楼兰、乌孙、呼揭及

① 范晔撰：《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范晔撰：《后汉书·班勇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这是我国史书中第一次出现这个王国的名称。从此以后，国内对楼兰的情形逐渐了解，因而给我们保存了许多材料。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后改国名为鄯善)的情况在《汉书》和其他古籍中屡有记载，这些记载便成了我们今天认识楼兰和研究楼兰屯田的重要资料。本世纪以来，外国探险家和我国的考古学家在楼兰王国境内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从调查与发掘中得到了大批文物，这就给我们了解楼兰屯田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物证。

从文献和考古中我们知道，在汉文帝四年以后，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之前，楼兰王国在政治上是隶属匈奴僮仆都尉的。元封三年，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击车师，俘楼兰王，楼兰才降于汉朝。

楼兰降汉后，虽基本上摆脱匈奴控制，但有时也受匈奴的军事压力和反间，经常为难汉朝出使西域各国的使者。汉昭帝时，楼兰王竟又公开叛汉归匈，昭帝派傅介子刺楼兰王，改其国名为鄯善，并劝说新立的楼兰王迁都于罗布泊以南的伊循城，从此楼兰王国便更名为鄯善，《后汉书》记载的和考古证明的有关楼兰的屯田，实际上包括了楼兰王国后期和鄯善王国时期的屯垦情况。

西汉在楼兰的屯田，《汉书》没有明确记载。但1930年在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文书，似乎表明西汉在楼兰进行了屯垦的尝试。例如：宣、元之际，汉在楼兰置军侯、设亭燧、开井渠、置仓库(居卢訾仓便是一个最大者)，如无屯田，似不可想象。

但是，汉在楼兰之屯田，确应以东汉时规模为大。这一时期的卓有成效的屯垦，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楼兰地区的屯田和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基础。

东汉屯田于楼兰应是从汉明帝时开始的。这条史料我们得自于《后汉书·杨终列传》。据此传文，杨为东汉章帝时之校书郎。建初元年(76年)，他在他的上疏中称：“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繁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思土，怨结边域……”杨终此议，实有畏难退缩之意，曾遭班固等力主屯田西域者之反对。于是，杨终又辩曰：“……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于是章帝采纳杨终的妥协主义，停止了边屯。

杨终的主张，应该说是有损西域屯垦事业的，但我们从其两次奏章中看出，楼兰的屯田确从明帝西征北匈奴时开始，屯田劳动力大部是明帝时因冤狱而流放的株连者。

东汉时的楼兰屯田，规模甚大，成效显著。1980年4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楼兰考古队在楼兰古城官署采得标本，此标本经碳14测定，其校正年代为距1950年前之1865±80年，也就是说，古城的官署建筑物应该是东汉初期遗留下来的。与此相联系的是考古队又在同一地点的一堆废木料底下发现了堆积厚达70厘米、宽1米的一批糜子，糜子中夹杂着小麦(经科学鉴定，这里拣到的小麦花是当今世界上最早、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小麦花)。这一发现，正是东汉楼兰屯田的有力证据。

东汉的楼兰屯田，还有另一个垦区，即前汉的伊循。伊循自傅介子惩楼兰王之后即为鄯善国都。考古学家考证结果，伊循即今若羌东北的米兰一带。现在我国的水利工作者已经经过周密调查和测绘，将车尔臣河下游和米兰河流域的汉代灌溉系统复原了出来。这一灌溉系统呈树枝状散开，工程配置相当严密和科学。郦道元《水经注》曾记载："敦煌索励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人，横断注宾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野，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从这一记载观之，今若羌一带及米兰以东地区之开发，索励与毛奕是有功劳的，东汉以后在这一区域内有长史之设，恐与其地的大规模开发不无关系。考古学家黄文弼考证，"注宾河" 即今之车尔臣河，车尔臣河下游，当然亦在楼兰国范围。

精绝屯田

精绝，西汉三十六国之一。位于塔克拉玛干南缘，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今民丰县城北150公里处，今尼雅遗址即古精绝国都。

1956年从民丰的汉代尼雅遗址中，曾出土"司禾府印"一方。边长2厘米，高1.7厘米。据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考证："司禾府是汉晋时期与屯田事务有关的一个机构。"可见精绝曾进行过屯田。但其规模和人数、起止时间，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考证。

于阗屯田

于阗即今和田市。位于西域南部，昆仑山北麓，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南道大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地扼东西交通咽喉，是汉与匈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死，焉耆乘东汉大丧，发兵攻击并杀死西域都护陈睦，班超在西域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次发兵围攻疏勒，超固守槃橐城，与疏勒王忠互相策应，坚守一年多。肃宗初即位，以都护陈睦战死，班超单危不能自立，乃下诏班超还中原。



图12　司禾府印

班超接旨忍痛从疏勒启程，准备沿丝绸南道返回。疏勒人民闻讯震惊，惧复为匈奴、龟兹所灭。都尉黎弇流泪说："汉朝使者扔下我们不管，我们又要被龟兹灭亡了。"说罢当众抽刀自刎。班超含泪挥别，走到于阗，国王大臣环跪在地，抱住马腿，苦苦挽留。班超深受感动，决心为西域各族人民的利益而献身。他拨马返回疏勒，上书呈请留在西域。先后平定疏勒、莎车的叛乱，击退了大月氏的大规模入侵。并派人到乌孙同大昆莫、小昆莫加强了联系，龟兹及姑墨、温宿等地自动臣属于汉。公元88年，汉和帝即



位。东汉与南匈奴联合，连年大败北匈奴。公元91年，北匈奴大部西迁，东汉再次统一西域，正式任命班超为都护，都护府设于龟兹它乾城；任命徐干为长史，驻在疏勒。又重新设立戊己校尉于车师之高昌壁，设置戊部侯于车师后部之侯城。再次恢复屯田，史称“二绝二通”。

章帝元和元年(84年)，汉廷“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诣超。超因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①]。这次出兵因疏勒王忠叛、康居遣精兵救莎车，因而未能获胜。次年，“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②]。和恭将800士卒，驻屯何地？史籍未载。根据疏勒已有徐干所率1 000余名士兵驻屯，当不会再将和恭所率800名士兵驻此。于阗是战略要地，与疏勒在军事行动上可以互相策应，于阗又是水土肥美、宜农宜牧的好地方，从军事部署与屯田需要以及屯田军与于阗军共同参加军事行动等情况来判断，和恭所率士兵似应驻屯于阗，在于阗进行屯田，当然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考证。

① 范晔撰：《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东汉西域屯田简表

屯田地名		开始时间		屯田人数	备　　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伊吾卢	哈密县	明帝永平十六年	73年	后增到千人	公元73年，东汉在此置宜禾都尉。公元119年，长史索班率军千人屯田于此。
金满城	吉木萨尔县	明帝永平十七年	74年	数百	汉军败匈奴，戊校尉耿恭于公元74年，率士卒在此屯田。
柳中城	鄯善县鲁克沁	明帝永平十七年	74年	500	公元74年，已校尉关宠率兵屯田于此。123年西域长史班勇领500人屯田柳中。
高昌壁	吐鲁番哈喇和卓	和帝永元三年	91年	500	公元91年，戊己校尉领兵500人，在此屯田。
且固城	古木萨尔县境	和帝永元三年	91年	不详	汉置戊已校尉屯田高昌壁时，置戊部侯屯田于车师后部且固城。
精绝	民丰县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中发现“司禾府印”。可知东汉在此设司禾府，专理屯田事宜。其规模、人数，待考。
楼兰	若羌县东北	永平十七年	74年	数百	除以上屯田地区外，凡汉军驻屯的地方，水土条件较好，如疏勒、于阗等地，都应有屯田。有待史学者进一步探索考证。



第三章　两汉屯田探讨

第一节　西汉陕甘宁青屯田

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消除边患，在军事上实行了四项变革：一是在战略上改变已往对匈奴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改；二是选拔并重用青年将领——如卫青、霍去病；三是发展骑兵，提高军队进攻速度，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四是兴屯田，改变长途转运军队粮草为就地供应。这几项变革，使汉军面貌一新，生龙活虎。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指挥汉军与匈奴交战共11次，重要的有四次。第一次马邑战役，老将韩安国统帅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北部边境马邑开去，结果无功而返。这是公元前133年的事。第二次河南战役，这次由青年将领卫青仅率精骑数万，采用远程大迂回作战的战术，大败盘踞河南的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终于收复了被匈奴占领了八十余年的河南地。这是公元前127年的事。第三次河西战役。公元前121年，20岁的霍去病，仅率精骑一万，采用长途纵深迂回突袭的战术，大败匈奴，浑邪王降。汉军占有河西走廊。第四次漠北战役。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出塞，痛歼匈奴主力，匈奴单于仅率数百名骑兵突围远遁，“幕南无王庭”。至此，汉北部边境的东段边患基本上解除了，进入了相对安定的时期。

从河南战役到漠北战役，仅用八年时间，拓地数千里。如何巩固并开发建设这大片疆土，汉武帝采取了七项重大措施。

一、设置郡县

主父偃听到卫青收复了河南地，便立即上奏：“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

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将这一建议交公卿议论,多持反对意见。武帝力排众议,“遂置朔方(郡)本偃计也”[①]。并派将军苏建征调10万人修筑朔方城。接着又在朔方郡以东设置了五原郡。

汉军取河西。《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来降,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数万人渡河筑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初置张掖,酒泉郡”[②]。

前111年(元鼎六年),汉遣将军赵破奴出令居,击匈奴,行两千余里不见匈奴踪迹。“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③]

《汉书·地理志》则与前说相异。云“张掖郡与酒泉郡俱为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威郡则是太初四年(前107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置”。司马迁与班固各执一词,似应以前说为是。因为前121年河西归汉,17年后才设郡,太迟了点。当然还要靠以后出土文物为证。但河西四郡均为汉武帝时设则无疑义。

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设县35个[④]。东汉后期,河西四郡有县37个[⑤]。

郡设郡守一人,又称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代表皇帝治理一郡。在一郡之内是郡守专制。其职权相当广泛,凡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以及兵事。郡守又称郡将,握有一郡兵权。如发兵须有皇帝虎符。如军情紧急,事后必须上报。到东汉,郡守有了领兵、发兵之权。[⑥]

郡县的设置,加强了河西四郡开发建设的统一规划与领导,增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为防敌入寇,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丝绸之路畅通,作为经营西域的前进阵地,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驻重兵,屯田戍边

为了边塞安定,汉武帝在西北边郡驻重兵以防边。史载:前119年(元狩四年),“汉度河,自朔以至合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⑦]

“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⑧]

太初三年(前102年),“益发田卒十八万(至)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

① 班固撰:《汉书·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司马迁撰:《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武帝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范晔撰:《后汉书·州郡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中国通史·秦汉时期》上册。
⑦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⑧ 司马迁撰:《史记·平准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酒泉"[①]。

汉宣帝采纳后将军赵充国"罢兵屯田,以待敌敝"之策,"置军屯于湟中,分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②]。获胜后留兵屯河湟,罕幵(今临夏)湟中,金城(今兰州)之间的土地得以开发。

史书载:军屯人数八十四五万人,实际人数当在百万人以上。以30%人戍守,70%人屯田,人均20亩,西北边郡军屯屯田,约在1 500万亩以上下。

历史证明,汉武帝着力开发与发展西北边疆,特别是河西走廊,为以后经营西域"断匈奴右臂",开拓边疆,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西汉边防士卒,担任防守的称"戍卒",以屯田为主的称"田卒"或"戍田卒"。

据一些学者、考古学家,特别是刘光华先生的研究与考证,汉代西北郡县军屯的分布地区如下。

三、朔方郡屯田

包括朔方、北地、五原、西河诸郡屯田。

朔方郡屯田

朔方设有主管屯田的朔方农都尉,这里有屯田。青海出土赵宽碑云:"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太守,子□游都,朔农都尉。"朔方地肥饶,灌溉方便,是西汉在此地最早的屯田点。据刘光华先生考证:屯田人数在万人以上。

据现有资料有两个屯田点。一是北假屯田点。据《汉书·元帝纪》记载:初元五年(前44年)四月,"诏罢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北假有管理屯田的"田官",也有供应"戍田卒"和当地居民所需的铁器和食盐。这里从武帝元狩四年到元帝初五年,共经营了七十余年,有良好的基础,所以到了王莽执政时,又恢复了屯田。"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莽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③]

另一屯田点是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屯田点,位于黄河以西,这里有"引河及川谷以灌田"的便利条件,地处塞外通道口,军事要地,也是最早的屯田点之一。

北地郡屯田

北地郡设有主管屯田的上河农都尉。据《水经注》载:"河水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青山峡。……河水又经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经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薛瓒曰:'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典农都尉所治也。"

"上河峡"即今宁夏之青铜峡,典农城为屯田官所居之城。农都尉、田官所居之上河、典农城均在北地郡黄河以西,为最早屯田点。

①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赵充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王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五原郡屯田

《王莽传》赵并说:"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田官是专管屯田的基层官吏,故知有屯田。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伊盟发现了"西河农令"汉印一方(载《文物》1977年第5期),证明西河郡亦有屯田。详情待考。

四、河西走廊屯田

河西走廊主要指河西四郡及令居,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占有河西之地。元鼎二年(前115年),"始筑令居以西"的边塞。令居的屯田向西推进到河西走廊。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边塞修筑至酒泉,"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①。屯田亦向西推进至酒泉。汉初单于庭"直代,云中"。武帝元封中"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②。匈奴单于庭移于朔方至张掖郡之北。根据形势的变化,汉武帝决定大力经营河西走廊,维护这一通道,将河西建成经营西域的前进基地。

令居屯田

令居在今兰州附近黄河以北,是汉元狩中汉塞的最西端,黄河以西屯田地带的终点。是汉军出击匈奴军事据点之一。令居屯田主要在今兰州市黄河以北地区。

番和屯田

番和县地处今永昌—武威平原的西部。《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番和县本注曰:"农都尉治。"番和农都尉即张掖郡走廊地区的田官。张掖郡的屯田活动,西汉时从未停止,直到新莽之时,今尚保存有"设屏农尉章"之印文③,即治番和的原张掖农都尉。

居延屯田

居延屯田开始于太初中。居延地处弱水(今额济纳河)下游,是北通匈奴龙城,南达酒泉、张掖的唯一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汉武帝决定"置居延"为要塞。居延距酒泉、张掖四百多公里,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居延有两个田管区:"北部的居延屯田区。南部的骍马屯田区。"④其规模在河西屯田区是最大的。所以设置了居延农都尉。其下属有北部的"居延田官"和南部的"骍马田官"。田官的主要官员称"农令",下属为"部农长",部下为"农亭",农亭长所领有田卒、河渠卒和牧士。

敦煌屯田

有的学者认为敦煌屯田与霍去病出击河西获胜后留军屯驻敦煌有关。

---

① 司马迁撰:《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见《汉印文学证》。
④ 《汉简缀述》,第4页。



汉边塞西延至敦煌在武帝元封、太初年间，即公元前104年前后。《汉书·地理志》记：敦煌有效谷县。颜师古注曰："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前105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

又汉简记录："延寿乃太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太初三年（前102年）为武帝再伐大宛之年，或为延寿服役转输于敦煌后役期未满而留于此地从事屯田。

敦煌屯田有三个屯田点：

一在玉门关外大煎都侯官辖境。即今敦煌县榆树泉盆地之东部，这里"由于洪水的侵蚀作用，在戈壁滩上形成了马迷兔、吐火洛、天桥、湾窑等四个小盆地，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宜于种植"。引自徐东尧、余贤杰《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

一在宜禾都尉管辖之境的宜禾，鱼泽侯管区。即今安西、敦煌两县交界一带地区，在"今敦煌县境的西水沟、东水沟和安西县之芦水沟下游形成的绿洲上"。①

一为阳关都尉所辖的渥水洼西岸地区。"渥水洼水系由阿尔金山泉水溢出带的大泉鄂博图泉等泉水汇集而成的湖泊，在湖泊四周形成了宜于垦殖的肥沃绿洲……这一带曾发现汉代的田垄、房基、墓葬等遗迹及石磨、石臼、陶器等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反映了当时戍守和屯田情况。"②


图13　玉门关

敦煌地处通西域的咽喉要道上，因之敦煌屯田从未终止，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

酒泉屯田

《后汉书·梁统列传》载："刘秀建武八年，河西窦融、梁统等率军与光武帝共讨陇右隗嚣。及隗嚣败，光武帝封统为成义侯，（统）同产兄巡，从弟腾并为关内侯，拜腾典农都尉。"东汉之初，农都尉因袭西汉之制，酒泉是河西走廊要隘，有驻军，有屯田。

武威屯田

太初三年，武帝二次伐大宛中，"益发戍卒十八万（至）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休屠即在今甘肃武威县北腾格里沙漠边缘，屯田当在休屠以北的沿石羊河而下，深入于沙漠之中的地带。这里是军事要道，若以1/3在此，则有六万戍卒在此戍守屯田，人均屯田20亩，规模也是很大的。

① 徐东尧、余贤杰：《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
② 徐东尧、余贤杰：《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

五、河湟屯田

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人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似共犯汉边。汉朝于前61年派义渠安国使羌，了解情况。义渠前去，召集先零部落头领三十多人，以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又调兵抢杀先零之民千余人。于是羌人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震恐，犯汉侵边，攻城邑、杀官吏。义渠安国所率三千人，被羌人所攻，损失惨重，退到令居，向皇帝求援。这时朝中大臣多赞成酒泉太守辛武贤的意见，速派大军长驱千里进剿。汉宣帝认为赵充国已七十多岁了，派人问他谁可以为将；赵充国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又问："将军度羌虏如何？当用几人？"赵充国答："我到前线了解情况后，再作进军计划。"

赵充国到了金城（今兰州），率一万骑兵渡过黄河。羌骑来挑战，赵充国坚守不出。赵充国调查到羌人的罕、幵等部落是被胁而叛。于是着人告诉各部落的人说："汉军前来是诛有罪的首恶，区别对待，立功赎罪者，还可论功行赏。"

这时宣帝已批准辛武贤的方策，调集六万多人，决定先击罕、幵两部落。赵充国上书：侵扰者乃先零羌、而不是罕羌。"今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建议："先诛先零已，则罕、幵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帝纳之。

赵充国率部进军到先零羌所在地。先零羌见汉大军突然到来，大惊，仓皇逃跑。抛弃辎重车辆，强渡湟水，且因道路狭险，溺水死者数百人，投降及战死者五百多人，缴获车辆四千多辆，马牛羊十余万头。对罕羌地区则秋毫无犯。罕羌大喜归汉。根据敌我形势，赵充国提出在临羌至浩门一带，罢骑兵，招募民众。"缮乡亭，浚沟渠"进行屯田。只以少数骑兵卫护屯田者，"益积蓄，省大费"。此时，羌众已动摇，前后来降者万余人。赵充国上书"留兵屯田十二便"。

"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清并行，一也。又因排斥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墜，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即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宣帝认为很好，准奏。

河湟屯田于神爵元年开始，屯田地区在临羌至浩门间的湟水沿岸，吏士万人，"田事出，赋人二十亩"。"垦田二千顷以上，并有郡骑及属国胡骑"两千，为"田者游兵"，保护屯田区，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赵充国根据羌众伤亡及投降者甚多，力量已大大削弱，屯田已完成历史使命，请罢屯兵。宣帝得准，于是整旅还朝。



六、冯奉世陇西屯田

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秋，陇西羌乡姐旁种反，元帝派冯奉世等率军万二千步兵骑兵前去平叛，初战失利。元帝增派军队六万余人，"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元帝下诏："罢吏士留屯田，备要害处。"

七、徙民实边军民联防

西汉取得河南、河西两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但因匈奴统治者长期肆意掠夺蹂躏，民不聊生，大批居民外逃，十室九空。土地荒芜，地广人稀。汉武帝为从根本上改变面貌，决定徙民实边。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卫青率精骑，取河南地，在当年"募民十万口"以实边。

前121年(元狩二年)，霍去病大败匈奴，驻河西的匈奴浑邪王降汉，汉廷"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以南新秦中以实之"[①]。

前119年(元狩四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②]。这里的陇西包括河西，移民约20万于河西。

前118年(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前111年(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③]。

前101年(太初五年)，发"谪戍五原"。所实之地，除朔方、五原，西河等地外，还有金城郡及河西地区。

前108年(元封三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④]。

徙民河西一直至东汉末。成帝永始四年(前1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有"平曲丞胡毋(玖)七月七日送徙民敦煌"。平曲为西汉东海郡之辖县[⑤]。

这些移民，由政府组织派官吏送到边郡屯田地区。由郡县将他们编为伍、里、连、邑等行政编制。给他划拨公田，贷与耕牛及生产资料，给他们盖房屋。初到时衣食也由政府供给。经济自立后，向国家交租纳税。垦民农忙时进行生产，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敌人入侵，他们便与驻边戍卒一起，并肩战斗，迎击敌人。这是西汉军事方针上的大变革。以往是军队单独作战，现在是军民联防。以往是从中原长途转运粮食，以供军需，现在是军屯加民屯就地解决驻军品的粮食供应，大大减少了国家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边郡人口增加了，巩固了边防。民屯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历代相沿不废。

---

①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班固撰：《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班固撰：《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班固撰：《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文物》，1996年第8期。

汉代西北边郡民屯的人数，当在百万以上。不仅对西北地区的开发，而且在保卫边疆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节　东汉陕甘宁青屯田

东汉河西屯田，是西汉的延续。新、汉之际，河西地区的实力人物是窦融，刘玄更始二年(24年)，他被任命为张掖郡国都尉到了河西。“及更始败，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均力齐，无复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部，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咸以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大将军事。”[①]融当得知刘秀称帝，虽与中原隔绝，但他遥归刘秀，遣长史刘钧奉书献与于洛阳，光武帝“授融为凉州牧”。

窦融治理河西：“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且重视边防，“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②]。据居延汉简记录，河西地区设有屯田机构。“□月甲午朔乙未行河西大将军凉州牧守张掖郡属国都尉融使告部从事□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太守张掖酒泉农都尉武威太守言官二大奴许岑。”甲午朔为东汉建武七年(31年)三月。农都尉是主管屯田的官员。说明张掖、酒泉有屯田。

在河西走廊地区，南边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不易翻越，是个天然屏障。所以，在汉代防羌人图边，主要是守住祁连山山口，如武威的庄浪河谷口，张掖境民乐县的扁都口(大斗校谷)，敦煌的当金山口等。在此筑塞、驻军防守即可。走廊北边主要是沙漠地带，武威与张掖之间的龙首山以及西边的合黎山、马鬃山，海拔是2 000米，相对高度500米，驼马都可以通过，所以汉武帝决定筑长城。据《汉书·西域传》即有关文献记载：武帝在设立四郡的同时，即筑令居塞。以后又修筑了酒泉与玉门间，敦煌与盐泽间



图14　玉门关汉长城

① 范晔撰：《后汉书·窦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窦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北边的长城。在居延还筑了遮虏障。从金城西到盐泽，凡军事要地，依战争需要分别建筑城、塞、障、亭。而张掖北面的居延，扼南北交通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水土资源丰富，可耕可牧，是屯田的好地方。所以汉武帝决定将居延建成要塞，驻重兵，设防屯垦，向北面伸出触角，以巩固河西走廊这一条带状防线。

黄河沿岸屯田区

汉和帝永元年间，烧当羌扰边，“数为寇盗”。和帝命邓训率军出击，“前后斩首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羌迷唐降。朝廷命邓训：“遂罢屯兵，各会归部，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这是东汉河湟屯田之始。后经金城长史上官鸿建议：“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太守侯霸提议：“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逢留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①]据刘光华先生推论：军队一校千人，屯田一部，按五百人计，三十四部屯田人数将一万六七千人左右。

龙耆屯田区

由于烧当羌远徙，右扶风喻麋侯国之相曹风上书：“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接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帝准之。“于是拜风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②]。

湟中屯区

《后汉书·西羌传》载：永建四年（129年）冬，“右扶风韩皓代贤为校尉……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郡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③]。

阳嘉元年（132年）以湟中地广，更增至屯田五部，并为十部。其规模当在五千人左右，种地十万亩上下。

汉阳屯田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波及河陇，朝中权臣惧，主张放弃凉州。傅燮坚决反对，遭忌。于中平三年被排“出为汉阳太守”。“燮善卹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服，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安置降羌”[④]，深得羌人拥护。

北地、安定郡屯田

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书，建议将因避乱而内迁的安定、北地郡还归旧土，“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侯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⑤]。

---

① 范晔撰：《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西羌传·和帝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范晔撰：《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范晔撰：《后汉书·傅燮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范晔撰：《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三节　两汉西域屯田的管理制度

西域屯田是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屯田的管理系统也是逐步完善的。大体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在西域都护府成立前，多是由汉廷临时指派。公元前101年在轮台进行屯田，是由“使者校尉”负责的。公元前77年，在此屯田的负责人是扜弥太子赖丹以校尉的身份在此管理屯田。公元前68年，在渠犁屯田是由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管理的。在楼兰屯田开始“遣司马一人”，后来又“更置都尉”。从以上可以看出，开始在西域屯田的负责人并不固定，有使者校尉、侍郎、司马校尉、都尉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武官，说明屯田与军事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

第二阶段。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由此罢”，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屯田校尉始属都护”。公元前48年在车师设戊己校尉，管理屯田，管理系统逐步完善。

汉在西域屯田是和军事一体化进行的。屯田长官既是屯田的组织者，又是军事指挥员。“田卒”既是屯田的劳动者，又是汉驻西域持刀戍边的士兵。其管理系统有：

（一）西域都护

都护是汉在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也是西域屯田的最高负责者。《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当为神爵）年初置。……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

（二）校尉、都尉

西域的屯区也称田官区。“都护治乌垒城……与渠犁田官相近”。“渠犁田官”即“屯田校尉”[①]。如车师前部田官为戊己校尉。也有的田官是都尉，如伊循的田官为都尉。校尉、都尉均可设府，有属吏。戊己校尉有“丞、司马各一人”。除“丞”外，还有“史”。王莽时匈奴寇车师，时戊己校尉刁护“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史终带取粮食，司马丞韩玄领诸壁”[②]。除戊己校尉外还有戊校尉和己校尉。公元74年，东汉明帝派耿恭为戊校尉，率士兵到金满屯田；关宠为己校尉，率士卒到柳中屯田。楼兰简中还有“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口守居卢訾仑车师戊校”的记载。

① 《西汉会要·职官二》。
②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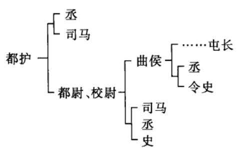


（三）曲侯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戊己校尉下有“侯五人，秩比六百石”。《后汉书·百官志》载：“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曲是都尉、校尉属下一级屯田组织，主管官称侯或曲侯。如楼兰简有：“口者马君在部后曲侯尊丞商会史利”的记载。

戊己校尉有“侯五人”，即五个屯田区之长官。楼兰简称作“曲侯”，而曲侯又分属校尉之别部司马代管。

据以上所述，西域屯田的管理系统大致如下：



东汉后期，废除西域都护，设西域长史和屯田司马，负责屯田事宜。

第四节 两汉西域屯田的特点

两汉在西域的屯田，始于西汉武帝，发展在昭、宣之际，直到东汉桓帝。屯垦基本上都属于军屯性质。但在北方及河西地区的大规模屯田，主要是移民屯垦；而西域由于地理遥远，民族不同，语言各异，更由于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所以主要实行军屯。如《册府元龟·屯田叙》所说：“因戍营田，因田积谷。兼兵民之力，省飞挽之劳。”就地养兵，一可解决军饷，积累粮草，免去从内地远道运粮的人力费用，为统一战争作军需准备；二即亦农亦兵，劳武结合。平时种田种谷，战时冲锋陷阵。屯田长官既管理屯务，又是作战指挥官，随时可率屯兵作战。

两汉的屯田点大多选择在战略要地。大抵是西汉重南道，东汉重北道。这主要是西汉时汉匈争夺多在南道；东汉时匈奴无力南道，汉匈争夺多在北道的缘故。但无论西汉或东汉，屯田点选择的特点，基本上在战略要地。有的处于西域中央，如轮台、渠犁；有的正扼交通要道，如伊循、车师；有的地当西域门户，如伊吾卢。其地大多土壤肥沃、水草丰美、位置优越，而更重要的是军事要地之故。《后汉书·西域传》评说：伊吾卢、高昌壁、金满城，“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屯田中心也随形势而变，如西汉时都护府设在西域中心乌垒城，一是便于全面控制西域；二是距屯田中心渠犁较近，物资供应便利。屯田中心后移至轮台，

又移至车师，主要是着眼于战略的考虑。

两汉西域屯田的作用极其巨大，历史意义极为深远。

1.屯田促进和巩固了西域与祖国内地的统一。

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曾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即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①]这话充分证明了汉代西域屯田的战略价值。

两汉屯田保证了对匈战争的粮食供应，使汉军能在西域立足。自给自足，不加赋于西域人民，与匈奴掠夺形成鲜明对照，因而赢得民心，获得支持，并最终取得胜利。两汉统一西域的过程，是在西域发展屯垦的过程，而屯垦反过来又促进了两汉统一西域的大业得以完成，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②]西域从此纳入祖国版图，这在当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即使在今天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屯田不仅促进和巩固了祖国统一，而且在实边戍边上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边即为开发边疆，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平定内部动乱；戍边即为保卫边疆，防止匈奴侵扰及外来侵略。兴屯垦，西域安定，丝路畅通；而废屯垦，边疆往往陷于混乱，丝路断绝。

2.两汉屯田于西域，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西域，促进了西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铁器和冶铁技术的传人。西域人民早知冶铁，但质量较差，后来受内地先进冶铁技术的影响，技术大为改进。《汉书·陈汤传》记，当时西域生产的兵刃，"颇得汉巧"，就是明证。经过考古，在天山南北发现不少汉代冶铁、炼铜的矿冶遗址。昭苏乌孙古墓中发现铁铧，为汉代遗物。乌孙冶铁技术的提高和发展，与汉在乌孙的屯田有关，也和细君、解忧公主带来的工匠及技术传授有关。两汉冶铁技术的传人对西域生产力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2）农业技术和水利技术的传入。屯田和水利息息相关，随着屯田的扩大，内地来西域屯田的士卒，带来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及水利灌溉技术，在西域推广传播，从而加快了西域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如今从轮台、渠犁、楼兰、焉耆、库车、若羌等地的汉代屯田遗址上，仍可看出当时的田埂和沟渠的痕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以前尚不知造井，通过汉人传授，才得以学会。据《史记·河渠书》等史籍记载，可知今天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就是汉代关中"井渠法"的发展。

铁器和冶铁技术的传入、农业技术和水利技术的传入，促进了西域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西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奠定了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

---

① 陈寿撰：《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3.屯田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两汉在西域的屯田,大多属于军屯性质,除军事作战的职能外,还有保护"丝绸之路"南北道的任务。屯垦使中西交通畅行无阻,使者、商贾络绎载道,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发展,西域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辈,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①。当时汉朝派出的使节,每批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多者十余起,少则五六起;路程远的要往返八九年,路程近的也要三五年。

东汉统一西域之后,"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②。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

4.屯田使丝绸之路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蚕桑、缫丝技术也伴随着兴盛不衰的丝绸贸易传入西域。还有瓷器、漆器、茶叶及桃、杏、梨等工艺品和农产品。各国频繁地送子入汉朝为侍子,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西域的葡萄、西瓜、苜蓿、胡麻、核桃、石榴、大蒜和胡瓜等农产品,在祖国中原安家落户,成为内地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骆驼、名马、毛皮、毛织品等农畜产品,更成为长安、洛阳市场上的名贵商品。至于西域(乃至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杂技,也对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

两汉屯田促进了西域和祖国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高和丰富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保护了丝绸之路,增进了各民族的友谊和团结,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巩固。两汉在西域的屯垦是开创性的,为历代王朝开发新疆,统一祖国,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道。

① 班固撰:《汉书·张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屯田

魏晋南北朝300年，战争连绵，农民流离失所，赤地千里。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往淮水以南、长江下游北岸一带。造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移。人口流失的地区需组织人力进行有效的屯种，以供军需国用。难民大量涌入的地区需要组织屯田，以安置难民，解决吃粮问题。所以，魏、晋、南北朝各朝都比较重视屯垦，把屯田作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国策。

曹操破黄巾后，欲经略四方，统一中国，而苦于军粮缺乏。他接受了羽林监枣祗置屯田的建议，大力进行屯垦。曹操在《置屯田令》中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①]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专责屯田事宜。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②]

西晋令所有军士凡没有值班卫戍京都等重要任务的都参加屯田。北魏曾规定各州郡十分之一的民户屯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不仅在中原大力进行屯田，而且在西域也积极组织军民屯田，以减少西域人民的负担，保障西域屯军的粮饷供应。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西域

公元220年（黄初元年），曹丕称帝，都洛阳。魏承汉制，统有西域。公元221年（黄初二年），曹丕拜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③]，进驻西域。同时，西域设有长史。楼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张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兰木简有："西域长史承移，今初除，月二十三日当上道，从上邽至天水。"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此简是新任长史承移给西域长史及部属的信件。说明二十三日他从上邽出发至天水了。

曹魏时西域设有二十道，受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辖，曹魏还在伊吾地区设置伊吾县，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在西域设县。

西域各国，如汉时一样，岁岁朝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魏兴……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曹魏也派使臣去西域"抚劳之"。同时对当地首领进行册封，如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就曾受魏封为"魏守侍中，号大都尉"，并"受魏印"。大月氏王被授予"亲魏大月氏王"。公元227年（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人侍"[1]。魏大鸿胪卿还命敦煌太守，依汉旧制，迎送西域使者，沿途免费供应食宿等，可见魏中央政府与西域的关系是正常而密切的。

公元252年（嘉平四年），关中饥，曹操欲广田积谷。乃采用邓艾兴水利、举屯田的建议，"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垦荒种植，且屯且守。大兴水利，"上引河流，下通淮颍……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2]。连年大丰，府库充盈，曹魏之所以西征蜀国，称霸一时，粮饷充裕，兵强马壮，兴屯田乃是重要原因。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除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称晋武帝，建立晋朝，都洛阳。西晋与魏同，承汉制，在西域设长史和戊己校尉。西域长史驻楼兰（一说驻海头），戊己校尉驻高昌（今吐鲁番市境），公元265年（曹魏咸熙二年）闰9月，康居、大宛的首领向司马炎献名马。还有焉耆、疏勒、龟兹、于阗等地的首领到西晋朝贡。公元275年、276年（晋咸宁元年、二年），鲜卑首领阿罗多举兵叛乱，被戊己校尉马循平定下去。到277年，西北的少数民族及鲜卑、匈奴的首领率众臣属于晋。

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车师前部王将自己的儿子送晋朝做侍子。接着鄯善王、龟兹王、焉耆王也先后向晋朝送子做侍子。晋中央政府也对西域各地首领进行册封。公元285年（晋太康六年），晋康帝派杨颢为使者，越葱岭，拜大宛蓝庾为大宛王。从民丰县出土的两块晋简中可以看出，鄯善王、焉耆王、龟兹王、疏勒王、于阗王都曾受封为"晋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3]。

---

①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观堂集林·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

第二节　魏晋时期的西域屯田

楼兰屯田

楼兰地处西域交通枢纽、东境门户，又是西域长史府所在，当有屯田。但书阙无考。后来楼兰出土了大量木简及纸文书，证明楼兰曾进行过屯田，解开了这一谜。

关于魏晋在西域是否设长史？

从公元前60年，汉宣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辖西域36国，直到东汉延光二年（123年），以班勇为长史，将500士卒，出屯柳中（今鄯善鲁克沁）。次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至此，不再设都护一职，以西域长史之职，行西域都护之事。东汉末年，朝政式微，西域长史亦予废弃。魏晋是否设长史，不见史载，仅对戊己校尉的设置有记述。《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文帝遣使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但西域长史却不见记述。唯同书《仓慈传》载：仓慈于太和中（227~233年）"迁敦煌太守……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划面，以明血诚"。此"长吏"二字，王国维先生认为："必长史之讹。"他据此推定："恐西域长史一官，自黄初以来，即与戊己校尉同置。"这是有道理的。沙、木725简记有："西域长史承移今初除廿三日当上道从上邽至天水。"据王国维先生在《流沙坠简》中考证："以此简证之，知魏晋已置西域长史矣。"即在曹魏黄初三年，西域通，置戊己校尉的同时也设置了西域长史。侯灿先生在《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中，也赞成这一结论。



图15　楼兰汉晋木简

关于反映楼兰吏士屯垦戍边的木简有十件，据侯灿先生考证，其中涉及屯种的有三件。

简016：……□□十亩

前面字迹不清，"十亩当为十亩。

简038：□下禾□□一□床□……

床是糜字的省写。下禾，说明禾已下种。

简045：……已栽



记载作物业已种植。

木简有四件反映屯田戍卒牧养的。

简021:1右二人牧牛验……

大概楼兰地区屯卒养的牧牛是要经过官验的。

简032:1右二人兵假吏马贞牡驴一头齿八岁□

有屯兵二人,向名马贞的吏,借牡驴一头,齿八岁。

简004:……七匹计前□

以匹计的当为马、骡、驼等大牲畜。

简022:……作□驼它一匹六〔岁〕

登记牲畜的木简。

木简有三件是反映织造作坊和卫戍兵的报告。

简056:……织府吏卒……织府应为织造作坊,吏卒当是做工的戍卒。说明楼兰已有纺织作坊的设置,就地供应屯垦吏士的衣着。

简009:……动静

简031:……动静后白

动静后白,也就是情况后报。此二简可能是戍卫的报告。

简753简面　　大麦二顷已栽
廿亩下床九
十亩溉七十
亩

将张佥部见兵廿一人　　小麦卅亩已
栽廿九亩
禾一顷八十五
亩溉廿亩莇
五十亩

背面　　大麦六十六亩
已栽五十亩
下床八十亩
溉七十亩

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　　小麦六十三亩
溉五十亩
禾一顷七十亩
莇五十亩溉
五十亩

沙简755:□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脂营下受试

据王炳华先生推论,此简与推行牛耕技术有关。(1)晋代在楼兰地区的屯田,

实行以牛为畜力的犁耕;(2)屯田士卒中有的似乎并不熟悉犁田耕地技术,故有训练"受试"之举;(3)考虑到屯田士卒其主体无疑是内地的农民,这些以农民为主的屯田士兵,对牛耕技术,无疑是掌握了的。因此,"究犁与牛脂营下受试",也可能是与推行一种新技术有关。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晋代楼兰地区屯田,已经使用并重视用牛犁地的技术。

马斯伯罗的《汉文文书》227号木简记有:

□□□卒……楼兰耕种

简754:帐下将薛明言谨寄文书前至楼兰□还守堤兵廉□

227简是记述屯田士卒在楼兰屯田耕种。754简是楼兰将军薛明言向长史府报告的文书,说他领军到楼兰后,负责守堤管水的任务。

从以上木简和文书中可以得知:

1)魏晋时期曾在楼兰进行军队屯田,其基层屯区25人左右,种地400~500亩,人均种地20亩上下。

2)屯区种植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糜子和禾(谷子)四种。

3)楼兰屯田是引水灌溉的,而且专人负责灌溉工程和管理水的。

4)已经使用牛犁地,且重视耕作技术。

5)对屯田十分重视,管理是很严格的,播种与灌溉进度是要及时上报的。

6)已设有织造作坊,为屯田吏士供应衣服,可见屯田规模是不小的。

魏晋时楼兰有屯田,大量出土木简及纸文书已经证明。何时开始?学者认识不一。

斯坦因在研究出土文物后认为:中国在楼兰的屯田始于晋泰始年间(265~274年)。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著文《晋对西域的所谓经营》中否定了斯氏的说法。他说:"经过严密验证此地出土的残简的结果,则可认为是从魏代连续经营下来的。魏在楼兰设置屯戍可以认为是黄初三年(222年),大概这一年也设置了西域长史。"[①]长泽和俊先生的论点是可信的。

高昌屯田

高昌是西晋戊已校尉治所。东北通伊吾(今哈密市),北达车师后部,南通楼兰(罗布泊西北岸)、鄯善(今若羌县境),西经交河、焉耆达龟兹、疏勒。地扼西域交通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西域门户也,故戊已校尉更互屯焉。"[②]其地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是屯田的好地方。

高昌是西域戊已校尉驻地,当是西域屯田的中心地区,惜不见史载。孔拉迪的《斯文·赫定在楼兰发掘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一书第114号简记有:"泰始四年(268年)六月,发纥部兵名至兵曹,高昌留屯逃亡物故等事。"这是已给楼

① 《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历史篇》,日本国昭和十五年版。

② 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兰长史府的兵曹报告。其内容是高昌屯戍区的屯田士兵逃跑及死亡的情况。同书104号木简记有："胡支得，失皮铠一领，皮兜鍪一枚，角弓一张，箭卅枚，木桐一枚，高昌物故。"这件文书，记录了高昌屯田士卒胡支得已死亡，他丢失了官府发给的几件武器和装备。

沙畹的《汉文文书》928号文书记有："出禾五斛四斗，禀高昌士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卅日。"这是从高昌调到楼兰的屯田士兵在楼兰领取口粮的账簿。

以上三件文物证明高昌确有屯田，但规模多大，史籍阙如。从西汉以来高昌屯田的情况分析：地节二年（前68年），郑吉进击车师，破交河城。"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东汉永元三年（91年），和帝任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时，"复设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王莽时驻高昌的戊己校尉刁护所部吏士男女多达2 000余人。西汉时高昌驻300人，东汉时500人。西晋时高昌是屯田的中心，屯田士卒的常数当不下500人。"田事出，赋人二十亩。"[①]500人可屯田1万亩上下。"岁收亩一石半"计，可收粮1.5万石。

屯田士卒不仅种植，还参加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咸宁二年（276年）七月，鲜卑首领"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②]。这一战役的规模是不小的，平叛部队除在西域征调各国的部队外，西晋常驻军不应少于2 000人。否则是无法应付这一突发事件的。

尼雅屯田

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北150公里的沙漠中，是古精绝国的首都。东接且末，西近于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斯坦因考察了尼雅遗址并研究了大量出土文物后认为："大量汉文文书记述这样一些非常琐碎的事务，它似乎说明，中国这个时期（指西晋）对该地区（精绝）的控制不止单纯地限于军事占领……根据佉卢文和汉文文书整个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判断，两套行政管理系统同时并存是毫无疑问的。"[③]此文说明尼雅有汉军驻屯，当然有



图16 尼雅汉文木简

① 《汉书·赵充国传》。
② 《晋书·武帝纪》。
③ 斯坦因：《尼雅考古资料》，《尼雅河尽头以外的古迹遗址》。

屯田。古精绝国有两套行政管理系统并存，一套是当地政府，一套是西晋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很可能就是管理屯田军的机构。

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一枚木简记有："泰始五年（269年）十月戊午朔廿五日丁丑敦煌太守……"[①]此简证明尼雅驻军与敦煌太守有联系，很可能是受敦煌太守指挥的。

另一枚木简记有："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奉。"这是西晋中央政府册封西域五国王时把抄写的诏书通知尼雅驻屯军的文书。

魏晋在西域屯田，除楼兰、高昌、尼雅三处外，还可能有屯田，如伊吾、海头、且末等地，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三节　魏晋西域屯田的管理

魏晋时，中央设有大司农，统太仓、籍田、导官三令，襄国都水长，东西南北部护掾曹掌管全国的仓储、农业、水利及屯田。西域屯田除受大司农管辖外，还受敦煌太守的领导。在西域负责组织屯田的是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长史直辖楼兰的屯田，戊己校尉主管高昌的屯田。

从西汉起，主管西域军政事务的是西域都护，从东汉延光二年（123年）起，安帝以班勇为西域长史，不再设都护之职，以长史行都护之权。魏晋依东汉制，不再设西域都护，仅设长史，统辖西域诸国。

西域长史也称都督。设长史府，府治楼兰（一说晋时设海头）。长史府下设有属吏三四十人。

沙畹先生的《汉文文书》728号简记有："功曹史赵伦，主簿梁鸾，录事掾曹，监量掾曹。"第743号木简记有："领功掾曹梁鸾、关主簿，张龟省。"758号木简有："铠曹谨条。"第412号木简有："辞曹。"

孔拉迪的《斯文·赫定在楼兰发掘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一书第49号木简记有："泰始五年（269年）十一月九日仓掾曹李足，监食苏良，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靳仁，从椽位张雅。"同书纸文书18—2记有："医曹。"马斯伯罗的《汉文文书》247号记有："水曹，督田椽鲍湘，张雕言事。泰始三年（267年）二月廿八辛未言。"

从以上木简、文书可知长史府的属吏主要有：主簿管秘书，督邮管监察，录事管书记，督田椽管生产。还有诸曹散吏，如：功曹管纲纪，奏曹管奏议，辞曹管诉讼，法曹管邮驿，尉曹管卒徒转运，贼曹管伐盗贼，决曹管刑法，兵曹管兵卒，铠曹管武器，金曹管货币盐铁，仓曹管仓谷，水曹管水利，医曹管医药等。

① 斯坦因：《古代和阗》。

以上属吏设置说明，长史既要管理军政事务，还要管理生产、水利、仓储等屯田事宜。

西域长史府下还有武将，称督将。各将领兵二三十人，称营部，又称将某部，是屯田生产的基层单位。楼兰出土文书中记载屯田将官有：尹宜、张佥、梁襄、史顺、狄讳、周巽、张禄、张忠、陈颠等十余人。

戊己校尉，西汉时设置，由中央政府任命，东汉、魏、晋相沿，在西域主管屯田戍边。西汉时受西域都护节制，东汉延光二年改设西域长史后，长史和戊己校尉同时受中央和敦煌太守领导。魏晋时的西域戊己校尉驻高昌，负责组织屯田和保卫边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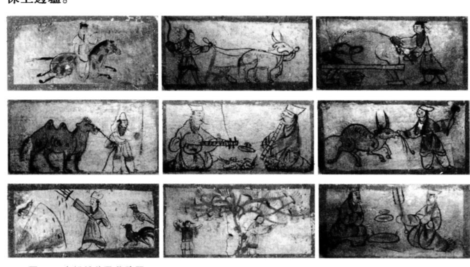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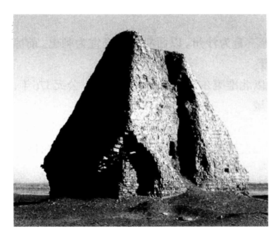
图 17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

魏晋时西域屯田，主要是军屯。按生产者的不同，可区分为戍卒型屯田，田兵型屯田，士家型屯田和罪犯型屯田。

戍卒型屯田，主要是指第一线的边防部队进行屯田。担任边防任务的部队，以戍为主。同时利用余暇时间进行屯田生产。平时屯田，有警出征。高昌屯田主要属于这种性质。

田兵型屯田，这主要是指驻屯比较安定环境的部队。且耕且戍。如有大的军事行动，则参加作战。小的军事行动则由专责戍边的部队去应付。尼雅的屯田属于这种性质。但他们要和第一线的部队定期轮换。

士家型屯田，这是军人家属所进行的屯田。魏晋时，西域驻军不少军人和官吏带有眷属。马斯伯罗的《汉文文书》第290号纸文书记载有楼兰戍卒带家眷的情况。“蒲壕窦成年卅，妻妈申金廿七，息男蒲笼年六□死。蒲壕隃林年卅、妻司文、年廿五，息男皇可笼，年五。蒲壕潩支，年廿五，妻温宜□年廿，息男奴斯，年卅(?)，五□死。□□葛奴、年五十，妻句文，年四十。”将能劳动的家属组进行生产，谓之士家屯田，以解决自己的粮食供给。


图 18　张掖黑水国遗址

罪犯型屯田，是政府发配西域的人犯及其家属在监督下的屯田生产。魏晋时期亦如汉时一样，将重刑罪犯及其家属发配西域屯田。如曹魏灭蜀之战的名将邓艾，公元264年被冤杀后，"徙艾妻子及孙于西域"①。

西晋时，西域屯田使用牛耕地，且重视耕作技术，管理严格，春播及灌溉进度要及时上报，年终依收成丰歉，进行奖惩。

第四节　十六国时期的西域屯田

从公元304年至439年是十六国时期。是时，中原诸侯割据，拥兵称王，战争频仍，政权更替频繁。虽然中原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但与西域的政治关系始终没有中断。继魏晋而统治西域的有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等政权。鲜卑和柔然曾一度统治天山以北的准噶尔地区。

一、前凉统治时期天山南部的屯田

公元317年，凉州刺史汉人张寔建立前凉王朝，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时华北大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唯凉州安定，"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十八九，唯凉州独全"②。大批难民涌入河西，有的到达高昌。"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③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前凉的生产发展，经济繁荣。

公元324年，张骏继位，称凉州牧、凉王。前凉承魏晋制，继续在西域设长史和戊己校尉。张骏注意发展生产，"骏亲耕藉田"。"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④

公元327年，高昌戊己校尉赵贞不附前凉。张骏派兵"击擒之，以其地(指戊己校尉治所——高昌)为高昌郡"(同上书)。公元335年(咸康元年)，张骏"遣将杨宣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诸国，焉耆、于阗之属皆诣姑臧朝贡"⑤。西域定，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品。于贡方物，得玉玺于河，有文曰："执万

①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魏收撰：《魏书·张寔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魏收撰：《魏书·张寔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张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国，建无疆。”

张骏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护等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前凉曾先后臣服于前赵、后赵、前秦和东晋。

前凉统治天山以南地区时，天山以北准噶尔地区为鲜卑所管辖。公元376年，前秦攻灭前凉和代国，征服了整个西域。

楼兰和海头屯田

西域长史治所楼兰，屯田从魏晋一直延续下来。公元327年，长史改为西域都护，继续组织军民在楼兰屯田。

沙畹的《汉文文书》第886号木简记有："建兴十八年（330年）三月廿七日粟口胡楼兰……一万车，钱二百。"西晋于公元316年亡后十四年，楼兰仍奉行西晋建兴年号。这一木简证明：前凉驻楼兰军队，直到公元330年仍在屯田。

公元330年后，由于塔里木河改道，楼兰水源断绝。前凉政府将西域都护府迁至海头。海头位于罗布泊西南，米兰城北100多公里处。当时塔里木南河（今车尔臣河）流经海头。从此，海头成了西域屯田重地，楼兰逐步荒废了。

高昌屯田

高昌是戊己校尉驻地，屯田一直未停。公元327年（东晋咸和二年），戊己校尉赵贞反对前凉政权，但很快被张骏平定下去。同年设高昌郡，下辖高昌、田地、高宁、横截等县。县下设乡里。从此高昌军民分治，高昌郡守主管民政，戊己校尉主管军屯和戍边。史学界把这段历史称为高昌郡时期。

二、前秦和后凉时期西域的屯田

公元351年1月，氐人苻坚建立前秦，都长安。势力迅速壮大，先后统一了华北、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四川、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公元376年8月，前秦王苻坚派兵入河西走廊，攻前凉，占姑臧，前凉王张天锡战败投降，前凉亡。同年在龟兹设西域校尉，统辖西域。命杨翰为高昌太守，领导军民屯田。苻坚把汉江人2万余户，中州人7 000多户，和河西以东的数千户，西迁敦煌屯田。因敦煌人满，一部分人西迁到高昌屯田。前秦在高昌不仅有军屯，有民屯，还有犯人屯田。《晋书·苻坚传》载记第十三载：苻坚侄儿苻阳谋反，"徙阳于高昌"。

公元376年12月，前秦攻灭代国，占有整个西域。公元378年10月，西域十多国到长安朝贡，大宛献汗血马500多匹。"东夷西域二十六国人贡于秦。"[①]

公元383年（东晋孝武太元八年），车师前部王、鄯善王入朝："乞依汉制，复设都护。若王师出关，愿为向导。"苻坚命吕光为持节都护西讨诸军事，统步兵7万，骑兵5 000，令车师、鄯善王为前驱，从长安出发，穿河西，越大碛，以征西域。吕光军至焉耆，焉耆王泥流率旁国请降。次年5月，西征军至龟兹，龟兹王白纯依城抗

①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晋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击,为吕光所败,更立新王。于是威名大震。西域诸国之贡款使节相率于道。诸国又将汉朝所赐符节奉上,吕光奏请易以新符节。

公元385年,吕光率军回师。带着高僧鸠摩罗什,用驼2万余头,载外国珍宝、骏马万余匹而还。入玉门,取凉州。公元386年12月吕光得知苻坚被杀,于是建立后凉,都姑臧,自称中外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后改称三河王,396年自立为大凉天王)。命其子吕覆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西域大都督,镇守高昌,和前秦一样,继续组织军民屯田。焉耆、龟兹诸国,朝贡于后凉。

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仑率军西进,占领了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

三、西凉和北凉王朝西域的屯田

北凉敦煌太守李暠是当地大姓。公元400年12月,李暠据敦煌,建立西凉王朝,自称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和凉公,辖有河西走廊。公元403年,后凉灭亡,西凉占有西域。公元405年(西凉建初元年),李暠把首府从敦煌迁至酒泉,想号召汉人推翻沮渠蒙逊的统治。但又以"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乃任自己的儿子李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以"统摄昆裔,辑宁殊方"。次年,鄯善、车师前王派人到酒泉表示臣属。公元403年西凉代后凉而占有西域。李暠为了广田积谷,统一西域,鼓励屯田,发展生产,使高昌军屯、民屯均有发展。

公元401年,匈奴贵族沮渠蒙逊杀吕光叛将段业,建立了北凉王朝,都张掖。自称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公元421年迁都姑臧,改称河西王。同年3月沮渠蒙逊筑坝堵水,冲淹敦煌城,李恂自杀,西凉亡。蒙逊派兵出西域,占高昌。命隗仁为太守,组织屯田。鄯善王比龙入朝于北凉,西域诸国纷纷向北凉称臣朝贡。

北凉在高昌的屯田,《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了当时军屯的情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载有:《兵曹下八屯符为屯兵值夜守水事》。内容是:"右八幢知中部幢,次幢之日,幢共将校一人,撰(选)兵十五人,夜住守水。残将校一人,将残兵值苟(狗)还守。兵曹椽张豫,史在法疆白,明当引水灌西部。司马閫、录事参军悦,功曹史张,典军主簿嘉、五官洿。"此文书无纪年,但同墓出土纪年文书起于西凉建初四年(408年),止于北凉缘禾五年(437年)。再据《北凉义和三年(433年)兵曹条知治幢壂文书》后面押衔也有"典军主簿嘉"。从以上资料判断,出土文书属于北凉义和年号前后,反映了当时高昌屯田的情况。

"幢"原是指将军驻地的军旗。西晋时大将建有赤幢曲盖。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幢"普遍用作军队编制的一级组织。如北史《蠕蠕传》卷98载:柔然军"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北魏也有幢将。《魏书·莫题传》载:莫题"初为幢将,领禁兵"。北凉屯田也采用幢的编制。百人为幢,八屯即有800名屯兵。

"知中部幢"。即管理中部幢。说明除右八幢有800名屯田士兵外,还有中部



幢，可能还有左八幢。果如是，三处均以800名计，共有屯兵2 400人，人种地20亩，则共屯田4.8万亩，其规模是不小的。

"幢共将校一人，撰(选)兵十五人，夜住守水。"即每幢有校将官一人，每幢百人要选15人在夜间负责灌溉。

"残校将一人，将残兵值苟(狗)还守。"由年岁大的校将一人，带老弱士兵和警犬守护。

公文后面有司马、录事参军签署，说明高昌军屯属军府管理。

高昌不仅有军屯，还有民屯。《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中《都乡啬夫被符征发役作文书》记有："右五家作次迭知，为官种芜荒。""右五家"是指在屯田地区右面的五家农民。"为官种芜荒"，即耕种属于官府的荒地。显然是民屯。

第五节　北魏时期的西域屯田

东晋十六国末期，中国北方的拓跋部族日益强盛，建立了北魏国。从公元388年至448年，经过南征北战，北魏逐步统一了北方。

一、北魏的崛起

拓跋部族属于鲜卑族的一支。最初处于大兴安岭以北，约在今西伯利亚东部，以游牧为主。到公元385年，首领拓跋力微逐步统一了拓跋氏的各部落。东征西讨，与汉夷融合，势力范围扩展到匈奴故地，控弦之士40多万。到公元386年正月，其首领拓跋珪被推为代王。此人雄才大略，勇武刚毅。他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大败、众叛亲离之际，建立魏国，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四月改称魏王。

北魏建国后，拓跋珪采取务农息民政策，在河套地区和盛乐地区建立屯田，兴办水利，发展生产，逐渐使国富兵强。

北魏自立国起，首先对北部高车、柔然连年发起进攻，迭获胜利。先后击降各部族，为其南下、统一中原解除后顾之忧。"若不先灭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良策也。"[1]

在北定高车、柔然后，旋即挥师南下，相继攻灭西燕、北燕及夏国，统一中国北部。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进据河西走廊，到达伊吾。鄯善、车师、乌孙、焉耆、龟兹、疏勒等国都派使者到北魏朝贡，表示归附。

二、北魏经营西域与屯田

北魏的目标，不只是统一华北，而且要统一全中国。所以对西域很注意。公元

①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宋纪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33年开始招抚西域诸国，授焉耆人车伊洛为西平将军，封做车师前部王。公元435年5月“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揭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①]。同年，北魏政府“诏行人王恩生、徐纲等十二人出使”（西域），为柔然所执，未果。436年11月北魏又派散侍郎董琬、高明等六人使西域。他们到达乌孙，受到乌孙王的热情欢迎。并告诉董琬，葱岭以西的破洛那（今费尔干）、者舌（今塔什干）也欲与北魏通好。并派人送使者前往。这次出使，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接着，乌孙、破洛那、者舌、车师、鄯善等十六国“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②]。

正当北魏向西域推进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即柔然。柔然又称蠕蠕、茹茹。原是鲜卑族的一个部落，受拓跋部的统治。后来，力量逐渐强大，势力迅速扩展。到4世纪末的首领社仑称汗时，其占有地域东到朝鲜，西达焉耆以北的地区。社仑的堂兄大檀为可汗时，其疆域西与伊犁河的悦般相接，南面控制了高昌、车师、伊吾、焉耆、龟兹和姑墨等地。5世纪20年代，北魏曾屡破柔然于漠北，但未能触动柔然在西域的统治。当北魏西进时，便在西域与柔然展开了角逐。

已经臣服于北魏的北凉，在柔然的指使下，阻挠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公元439年，北魏出兵伐北凉。北凉王沮渠牧犍（一作沮渠茂虔）战败投降，北凉亡。

公元443年至445年，北魏连胜柔然，为向西域推进创造了条件。

鄯善王原臣属于北魏，但在北凉沮渠氏兄弟在鄯善盘踞一段之后，态度变了，转向柔然。对西域各国前去北魏的使者“颇剽劫之，令不得通”[③]。公元448年北魏世祖派散常侍、成周公万度归统军西征鄯善。度归到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这时鄯善百姓布满田野，正在耕种放牧。万度归严令，秋毫无犯。“边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达面缚出降。”世祖命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留军屯守以镇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④]在留军镇守鄯善后，韩拔立即在当地组织屯田，以供军需。

悦般国在焉耆以西，乌孙以北一带，是北匈奴的后裔。当初，北匈奴西向康居迁徙时，老弱不能长途跋涉的留在此地。到4世纪末已发展到20多万人。其国人爱清洁，一日三餐都要洗手、洗脸和漱口。悦般与柔然结好，一次，其王带数千人入柔然，欲与柔然王大檀相见，入其境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洗衣服、不梳发，饭前不洗手、不洗脸，女人伸长舌头舔碗底。悦般国王对其臣下说：“我怎么跑到狗国来了。”于是掉转马头回国，从此两国为仇。悦般与北魏建立了同盟。

与此同时，焉耆与北魏为敌。焉耆王龙鸠尸卑那是龟兹王的女婿。原与北魏友好，在其岳父的唆使下倒向柔然。“剽劫北魏使者”，阻绝西域交通。世祖怒，令

① 李延寿撰：《北史·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西域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鄯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万度归率军五千征讨，龙鸠尸卑那战败逃龟兹。魏军占领焉耆城，随即在焉耆设镇，派万度归领兵镇守，并组织驻军屯田，以解决军队的食粮。

《资治通鉴·宋纪七》载：公元448年12月“魏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留唐和镇焉耆。柳驴戍主乙直伽谋叛，和击斩之。由是诸胡咸服，西域复平”。“柳驴戍主”说明焉耆镇所属的柳驴，也驻有屯军，且屯且戍。

龙鸠尸卑那到龟兹后，同龟兹王联合起来，以柔然为后盾，东向与北魏及焉耆为敌。公元449年万度归率士卒千余人，大败龟兹。西域大震，当年年底龟兹、疏勒、破洛那等分别派使向北魏朝贡。

北魏攻占伊吾。公元456年8月，北魏平西将军渔洋公尉眷击败柔然军，攻占伊吾。不久，魏兵大掠而回。柔然再占伊吾。公元448年12月，伊吾城主“高羔子率众三千，以城内附”①。伊吾内附后，是否派军队驻屯？不见史载。伊吾地接柔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似应有北魏军队驻守。

三、高昌王国的屯田

高昌在今吐鲁番市高昌古城。昔汉武帝派大军西征大宛时，师旅顿敝，其中一部分老弱不能行走者，留驻于此。高昌是西汉时戊己校尉驻地，屯田的重点地区。东汉及魏晋时的戊己校尉亦驻于此，魏晋时，中原战乱不已，许多农民，越大漠，避居高昌。此地汉人甚多，即“汉魏之遗黎也”。

当北凉亡时，王弟沮渠无讳率部西逃，于公元442年9月，袭取高昌，侵略车师前部地，首建高昌国。沮渠无讳把从敦煌带来的万余家汉族人安置在高昌各地屯田。高昌的屯田事业发展很快。

公元460年，柔然军攻占高昌，扶植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直到公元491年，阚氏王朝保持了各地的军屯和民屯。

公元497~640年，是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王国同样重视屯田，因此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人民生活安定。有五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可以证明。



图19 高昌故城

第一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延昌西岁屯田条列得横截等城葡萄园顷亩数奏行文书》记有：“……横截俗四（亩）半，交河俗二（亩）半六十步，

①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高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安乐俗八亩，洿林俗四亩，始昌俗一（亩）半，高宁僧二（亩）半。都合桃（葡萄园）壹顷究拾叁亩半。谨案条例得桃顷亩列别如左。记识奏诸奉□，门下校郎曲琼，通事令史曲口，通事令史□□……酉岁九月十五日……军肤叠□，吐诺他跋勖输，屯发高昌令尹麹伯雅（602~620年做高昌王），右卫将军绾曹郎中曲绍徽，虎威将军兼屯田事焦□□，屯田参军□□□，屯田参军□□□，屯田吏索善护，屯田吏阴保相。”

第二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義和三年（616年）屯田条列得水谪麦斛斗奏行文书》记有高昌屯田官管理水渠、征收公私水费的情况。

第三件，1973年在高昌遗址阿斯塔那墓区第519号墓葬中出土有：“高昌延寿十七年（640年）屯田下交河郡、南平郡、永安县、安乐县、洿林县、龙泉县、安昌县、□□县、始昌县，郡县司马主者：彼郡县，今遣曲郎文玉、高……青苗去，符到奉行。”

第四件，“运威将军门下校郎曲□□，延寿十七年庚子岁四月九日起，虎贲将军屯田□□高□□，屯田司马司空□□虎贲将军中兵校郎张世隆”。这件《文书》是在公元640年4月9日发出的。说明高昌王国在公元640年8月被唐军攻灭之前，一直在进行屯田。

第五件，吐鲁番哈喇和卓五号墓出土的延昌三十二年（592年）的一份《文书》记有：和婆罗居种官田一亩，纳租税三斛，賫□儿种官田一亩半，纳租税肆斛。和法□种官田一亩，纳租税三斛。毛师奴种官田一亩六十步，纳租税三斛，□孝叙种官田一亩半，纳租税肆斛伍斗，张僧受种官田一亩，纳租税三斛，东仲僧种官田一亩半六十步，纳租税伍斛，左仕祐种官田一亩半六十步，纳租税伍斛。龙贡受种官田一亩，纳租税三斛。王文孝种官田一亩、纳租税三斛等等。

对五件《出土文书》的试析：

1）《文书》记述的是高昌麹氏王朝的事。

第一件《文书》有“延昌酉岁”。延昌是麹乾固为王时的年号，共41年（561~601年）。

第二件《文书》的年号是“义和三年”（616年）。义和是麹伯雅为王时的年号。

第三件《文书》有“延寿十七年”（640年），延寿是麹文泰为王时的年号。

第四件《文书》有“延寿十七年庚子岁四月”。此文书是唐王朝攻灭高昌前四个月发出的。

第五件《文书》有“延昌三十二年”（592年），这是麹乾固为王时的年号。

2）五件《文书》均是记载屯田情况的。分别记述了“屯田条列”（例），葡萄园“壹顷究十叁亩半”，“虎威将军兼屯田事”，“屯田参军”，“屯田司马”，“屯田吏”和“王文孝种官田一亩、纳租税三斛”等屯田事宜和屯田管理人员。

屯田《文书》所涉及的地方有高昌王国的交河郡、南平郡及永安县等7个县，涉及范围广。涉及的人有令尹、将军、司马、参军等重要人物。证明屯田在高昌王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第五件《文书》记载了民屯情况,即农民种官田。所记述参加屯田的有汉族,有少数民族。可知此时高昌是民族杂居地区。种田人共十名,其中僧人二名,占20%,可知高昌是信仰佛教的,且僧人众多。

4)种一亩官地,交租三斛,地租是很重的。

5)关于屯田管理。

方英楷先生看到第一件《文书》有:"屯发高昌令尹麴伯雅"(602~623年做高昌王),判定是麴伯雅为王时的文件,因而在《新疆屯垦史》得出:国王"麴伯雅兼令尹,兼管屯田"的结论。这一结论值得商榷。这件《文书》不是麴伯雅为王时的文件。《文书》年号是"延昌"(561~601年),这是其父麴乾固为王时的年号。此时麴伯雅任令尹,是执掌全国军政大权的长官,当然也管屯田。国王是会关注屯田的,但管理则是由令尹及主管部门负责的。

令尹下设八部长史,祠部管屯田,兵部管军事。民屯由令尹总管,祠部及五威将军领导,侍郎、校郎、通事会史等负责组织,各地由城主、县令负责,屯田吏、田曹、水曹等进行管理。高昌王国设有屯田司马、屯田参军,说明有军屯,军屯也由令尹总管,祠部、兵部、虎威将军领导,屯田司马、屯田参军负责组织,各部队由部队长官负责。

第六节　北魏时期陕甘宁青屯田

魏晋以后,南北分据,北方拓拔魏及北齐、北周政权皆曾于边境屯田。北魏之初,太祖拓跋珪于登国九年(394年)"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①]。后来破中山,徙山东六州民吏三十六万于平城附近"各给耕牛、计口授田"[②],兴民屯。北魏大规模屯田是在孝文帝太和年间。太和十二年(478年),李彪建议:"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徭。"[③]文帝纳之。于是"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④]。

中原十六国大乱之后,地荒人稀,北魏在各州郡实行屯田,特别重视边境屯田。[⑤]载:宣武帝时,北魏攻取义阳。于是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兵五万余人,广开屯田"。"自徐杨内附之后……乃会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余积为边备。"

① 魏收撰:《魏书·太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魏收撰:《魏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魏收撰:《魏书·李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魏收撰:《魏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魏收撰:《魏书·范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关于河西地区,《魏书·食货志》说:"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屯牧大丰收。

北魏分裂,北周,北齐相继,皆行屯田。崔昂向东魏孝静帝建议:在东魏沿边各州实行屯田,为高澄所采纳。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公布屯田令:"沿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50顷,岁考其收入,以论褒贬。"①

李贤为河州刺史,"贤乃大营屯田,以省漕运,多设斥侯,以备寇戎,于是羌浑敛迹,不敢向东"②。

东汉以后,历经三国、晋、十六国、南北朝诸代,甘肃多为牧民所据,土地开发量很小。仅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迁关中豪门7 000户至河西诸郡。③大安元年(385年),迁江汉之人万余户至敦煌④进行屯田,带来了中原先进耕作技术,对开发建设河西走廊是有贡献的。

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屯田的探讨

一、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屯田的管理

前凉延续了魏晋的管理体系,设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楼兰及高昌屯田。

以后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时在西域再未设戊己校尉。屯田都是由当地的军政长官负责。如前秦时期,高昌地区屯田是由驻龟兹的西域校尉和高昌太守管理。后凉在西域设有大都护,掌管西域的军政大权,当然也负责屯田。西凉时,西域高昌屯田属敦煌西夷校尉和高昌郡领导。北凉时,高昌屯田由高昌太守管理。其下设有兵曹史椽、司马和录事参军负责具体事宜。北魏时期,由驻鄯善的西戎校尉领导鄯善及焉耆两个军镇屯田。中央由尚书省的祠部主管,祠部下设有屯田郎中,主管屯田事务。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军队屯田的基层组织是"幢"。"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幢"普遍用作军队编制的一级组织。北魏军队也设幢将。《魏书·莫题传》载:"莫题初为幢将,领禁兵。"北凉军队也采用幢的编制。"幢"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军队屯田的基层组织。有的屯军设有子使、戍主具体负责屯田管理。

① 魏徵等撰:《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李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苻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李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屯田的历史意义

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后近四个世纪，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政权林立、取代频繁的分裂割据局面。虽然对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政治关系一直未中断，保持了对西域的统辖关系。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在进行，西域的屯田一直在坚持。可以认为，从汉朝开始形成的中原和西域不可分离的整体关系，经过数百年的历史锤炼，基础更加巩固，为后来唐王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屯田在促进西域与祖国统一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西域屯田，保证了西域驻军与中原派来的军政人员的粮食供应，减少了长途转运粮糈的开支，减轻了当地农民的负担。密切了中原王朝与西域人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西域，促进了西域生产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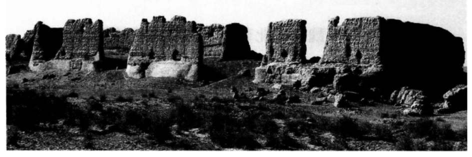


图20　汉敦煌河仓城

第二，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时的南北两道是从敦煌西行出玉门、阳关西行一段后分道。一经罗布泊北边，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称北道；一经罗布泊南边，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行，称南道。至后汉明帝时，奉车都尉窦固率军击败匈奴呼衍王，取得伊吾地，乃开辟新道。出玉门关后西北行，经横坑、辟三龙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魏晋时三道皆通。“从敦煌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①

魏晋及前后相承的政权，都与西域各国保持了贸易关系或贡使关系，古代的贸易，很多是在所谓“聘使”、“朝贡”、“奉献”名义下进行的。曹魏时期，“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②。晋武帝统一三国后，“北通西域，南临海路，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③。

①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陈寿撰：《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四夷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版。

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后，“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1]。商贸之盛，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屯田，一直蓬勃发展，和新道的开辟，商贸的繁荣有很大的关系。其他如楼兰、尼雅、焉耆等地都是丝绸之路重镇，因此也进行过屯田。西域屯田，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保障了过往使者、商贾的食宿供应。

第三，屯田士卒不仅进行生产，一旦有警，则持枪击敌，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保障西域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任务。西晋咸宁元年六月，鲜卑叛乱。“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2]次年，鲜卑首领阿罗多发动更大规模的叛乱，戊己校尉马循率屯田士卒并西域诸国部队征讨之，“斩首四千余级，俘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同上书)。这一战役规模不小，说明西晋时戊己校尉在西域率领的士卒不少，能够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

第四，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征战频仍，岁无宁日。许多农民避乱到西域，其中尤以高昌为多。前秦苻坚把汉江人2万余户，中州人7 000多户和河西以东的数千户迁敦煌。因人满，一部分人迁到高昌屯田。北梁沮渠氏政权灭亡时，其王弟沮渠无讳把敦煌带来的万余家汉族人安置在高昌屯田。高昌之所以能容纳大批汉人，主要因为广开屯田，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由于人口增加，带来了汉族的技术和文化，又促进了高昌经济文化的繁荣。后来几届由汉人为王的高昌王国的建立，和高昌屯田的发展是有内在联系的。

① 《洛阳伽蓝记》。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屯田简表

屯田地名		开始时间		备注
古地名	今地名	年号	公元	
楼兰	罗布泊西北	黄初三年	222年	黄初三年设长史，西域长史驻楼兰，继东汉而在此地进行屯田的有魏、晋和前凉。
高昌	吐鲁番境		继东汉而继续在此屯田	西晋戊己校尉驻所重点屯田地区，魏、晋、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北魏均在此屯田。
尼雅	民丰县北			出土文物证明西晋在此地曾进行屯田，详情待考。
海头	罗布泊西南	前凉建兴十八年	330年	前凉在此屯田。
焉耆	焉耆县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448年	北魏设焉耆镇，派万度归统兵镇守，并组织驻军屯田。
鄯善	若羌境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448年	北魏设鄯善镇，命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鄯善王留军镇守并组织屯田。



第五章　隋代西北屯田

第一节　隋朝的建立

隋文帝杨坚，华阴人（今陕西华阴县），生于公元541年。其父杨忠，曾因辅助宇文泰建立政权有功，受封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官至“柱国大司空”，袭爵隋国公。杨坚的女儿是宣帝宇文赟的皇后。周宣帝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周武帝宇文邕死，其子宇文赞即位为皇帝。此时政局不稳，“内外恐惧，人不自安”[①]。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宣帝死，其子宇文阐年仅8岁，即位称静帝。杨坚依恃自己的政治地位、权威，以及外祖父的身份，入朝执政，号称“假黄钺左大丞相”，独揽北周军政大权。他对敌对势力加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公元580年6月，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起兵反抗，山东、河北起兵响应，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亦相继起兵。面对此严重局势，杨坚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平叛，仅用68天时间，将兴兵者一一平定下去，杨坚的地位更加巩固。

公元581年2月，杨坚迫使静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后迁大兴城），称隋文帝。

一、大力进行改革

杨坚看到了北周社会的尖锐矛盾，政局危机日深，于是大力进行改革。他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官制；县佐须用别郡人，地方长官不得自用僚佐，县佐回避本部；厉行节俭政治，奖励良吏，严惩不法官吏；推行均田法，普通民众一夫受露田80亩，一妇受田40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丁牛（壮牛）一头受田60亩，又每



①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丁受永业田20亩,种桑或种麻。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原因;轻课税;刑律简要,废除孥戮相坐之法;推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平时生产,免本身租庸调,农闲受军训,战时出征,邻居六家供给军需;统一币制,等等。大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缓和了社会和阶级的矛盾。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生产发展,户口日增,仓储充盈。杜佑著《通典·食货典》卷7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库布帛各数千万。"到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①。中原农民踊跃向政府缴纳粮食布帛,"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②。隋王朝的实力大大增强。

二、统一全国

隋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府帑充实、兵源广阔,于是顺应形势,废梁国,灭南朝陈国,结束了东晋以来27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梁国是在江陵立国的一个封建割据小国。公元587年,隋文帝命梁帝萧琮入朝,梁帝率臣下200余人来长安。梁国大臣萧岩驱文武官员及民众10万人投降陈国。于是,隋文帝废梁国。

与隋隔江而对立的陈国,其王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昏暴的国君,亲信小人,任用阉宦,赋税繁重,刑罚苛暴,丧失民心。

公元581年,隋文帝即位,就进行灭陈的准备。命战将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江苏扬州市)。猛将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安徽合肥市)。贺若弼、韩擒虎是隋朝名将,驻长江北岸重镇,为灭陈作了军事上的组织准备。

伐陈之前,命大将杨素于永安(今湖北松滋),督造许多大小战船;同时抄发30万份揭露陈后主罪恶的诏书,散布江南各地。

公元588年(开皇八年)10月,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为主帅,秦王杨浚、清河公杨素为副帅,统帅隋军518 000人伐陈,兵分八路进军,"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③。以韩擒虎、贺若弼、杨素三军为主力,兵锋直指江南。

公元589年正月,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渡江,攻克南陈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从采石过江,进占姑孰(今安徽当涂南),隋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江南父老……南谒军门,昼夜不绝"④。蒋山之战,贺若弼大败陈军主力。贺韩两军,攻占建康。陈后主投降并招降江南各地,隋得陈州30、郡100、县400、户50万、口200万⑤。自

---

① 吴兢撰:《贞观政要·论贡赋》。
② 魏徵等撰:《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陈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隋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⑤ 魏徵等撰:《隋书·高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此，长期分裂的中国又复统一。隋王朝之所以能统一中国，主要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和各族人民群众的愿望。但应当指出，隋文帝杨坚在统一全国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从而加速了统一事业的进程。

三、开凿运河

隋朝的一项巨大工程，就是开凿运河。

运河的开凿，始于隋文帝时代，首先开挖的是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到潼关，长300里，以转运关中地区的物资。

通济渠，自洛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又从坂渚（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入汴水，疏通莨荡故道，向东南经今夏邑、永城、宿县、灵璧、泗县，由盱眙对岸入淮水，再折向今清江市达干邗沟。从公元605年开始，隋炀帝征调河南、淮北一带百万民工进行开挖。同年又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整修扩大春秋时期吴王夫差运河故道。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至扬子入长江，通济渠的开凿，直接沟通了黄河、汴水、淮河、长江四大水系，成为运河的主体部分。"水面宽四十步，通龙舟，两岸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阴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①]

永济渠。公元608年，隋炀帝又征发河北地区民工百万余人开永济渠，引沁水通黄河，自今辉县东北至临清，顺卫河经天津至涿郡，长二千余里。

江南河。公元610年开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市）至余杭（今杭州市），长八百里，宽十余丈，沟通了钱塘江和长江水系。

历经6年，凿通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长达4 800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贯穿陕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五省区，并连结了这一地区的水系。运河两岸，商业都市兴起，"其交、广、益、荆、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②]。杭州、京口、江都、楚州、汴州等城市日益繁荣起来。大运河和古长城一样，享誉世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四、大败突厥的南侵，巩固边防

隋代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突厥。突厥原是匈奴的别支。5世纪中期，突厥脱离柔然而独立，在阿尔泰山西南兴起。其首领土门率部灭高车，败柔然，攻占蒙古高原，建立突厥汗国（552~583年），建牙于鄂尔浑河畔的于都斤山。到公元553年，弟俟斤（燕都）继位称木杆可汗（553~572年），他"西破哌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坚昆），威服塞外"[③]。成为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强国。公元572年，木杆可汗病死，弟佗钵可汗继位。时"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

① 《大业杂记》。
② 《通典·州郡典·河南府》。
③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①]。公元581年佗钵可汗死，沙钵略大汗继位。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决心自强立国，不再给强大的突厥进贡。沙钵略大汗怒，派兵南侵。沙钵略妻千金公主，是前北周赵王招女，要求为北周复仇。"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疑覆字)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②]公元582年5月，沙钵略率40万大军，向隋朝大举侵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来寇，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金城(今兰州市)、上郡(今陕西鄜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六畜咸尽。"[③]面对强敌，杨坚进行积极防御，一面修筑长城，置兵屯田。一面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公元583年，隋军八路出兵，于白道(今呼和浩特北)大败沙钵略军。杨坚又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④]的策略，使东西突厥互相厮杀不已，两败俱伤。各可汗纷纷遣使投降。开皇末年，东突厥内部更加分裂，沙钵略子突利与都兰常起战争。公元599年，突利战败请降，文帝封之为启民可汗。不久都兰又为其部下所杀，启民可汗尽有东突厥领地，东部遂安。隋炀帝时处罗可汗降，西突厥也臣服于隋，西北边境也逐渐趋于稳定。

第二节　西北屯田

隋王朝平定江南，统一中国，反击突厥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国富民殷，海内安平的情况下，于是着手经营西域，组织屯田。

时西域有着许多部落和城郭。天山以北有以游牧为主的突厥和受其统属的铁勒部落。天山以南有以农业为主的高昌、焉耆、疏勒、龟兹、于阗等城郭，他们各自独立，不相统属，但都臣服于突厥，缴纳贡献。

隋朝通往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自敦煌起有三条路：一是"北道"，即天山北路；一是"中道"，即天山南路的北道；一是"南道"，即天山南路的南道[⑤]。炀帝时曾派李昱出使波斯，不久波斯遣使随李昱来中国"贡方物"。公元604年遣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到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得玛瑙杯，到王舍城(恒河旁)得佛经，到史国(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得舞女、狮子皮而还。

其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经商)，隋炀帝命侍郎裴矩"掌其事"。裴矩在河西调查了解西域的情况写了《西域图记》一书呈炀帝，并提出经营西域的方略：以往"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

① 魏徵等撰：《隋书·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魏徵等撰：《隋书·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魏徵等撰：《隋书·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魏徵等撰：《隋书·长孙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魏徵等撰：《隋书·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从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吐谷浑）、厥（西突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①]。帝悦。公元609年6月，隋炀帝西巡，至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大黄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②]据《隋书·西域传》载：“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

一、伊吾屯田

公元608年，隋朝派军取伊吾，大业四年“冬，十月，帝以右翊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联兵击伊吾。师出玉门，启民不至，世雄孤军度碛（指大漠），伊吾初以为隋军不能至，故不设备，闻世雄军已度碛，大惧，请降。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③]。隋代西域伊吾屯田，从此开始。

从史料可以看出，伊吾留军千余人，由光禄大夫王威率领，驻屯伊吾，是否屯田？未载。隋代推行的是兵农合一的府兵制。隋文帝鉴于“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因此定制：“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藉帐，一与民同。”[④]公元610年，隋置伊吾郡和柔远镇（今哈密沁城）。伊吾驻军当然也不能例外，亦兵亦农地进行屯田。如果不进行屯田，远在塞外千余名官兵的粮饷是难以解决的。

屯田规模多大？需进行研究。驻军千余人在西北边陲戍守，全部屯田是不可能的。因为需有一部分兵力常备戍守。以一半屯田则是可能的，这样就是500余人，每人种地多少？隋制：普通民众一夫受露田80亩，一妇40亩。一个士卒应种地80亩。这样500人种地4万亩上下，其规模是可观的。当然，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二、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屯田

鄯善、且末，在隋初原属吐谷浑之地。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居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境）。西晋末年迁至今青海省地区。首领称可汗，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15里），以游牧为主，已有农业，有文字。隋初吐谷浑时常犯边，文帝派兵几度击败吐谷浑。公元591年，吐谷浑酋帅夸吕死，子世伏继位，隋文帝曾以光化公主嫁之。公元597年，世伏被杀，弟伏允继立，隋仍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朝贡岁至”[⑤]。隋炀帝即位，接受裴矩经营西域的建议。公元609年，铁勒兵袭吐谷浑，隋炀帝命宇文述率兵西征吐谷浑，杨广亲临前方指挥，结果吐谷浑大败，伏允

① 魏徵等撰：《隋书·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魏徵等撰：《隋书·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隋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 魏徵等撰：《隋书·高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魏徵等撰：《隋书·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逃于山谷,隋降其众10万余人,得牲畜30万头。于是隋朝在“自西平(今青海乐都县)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1]的吐谷浑故地设置了河源(今青海湖南境)、西海(今青海湖西岸)、鄯善(今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据《隋书·地理志》上载:“鄯善郡,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统县二,显武、济远。”“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统县二,肃宁、伏戎。”隋即在此组织屯田。“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2]《资治通鉴·隋纪》是这样记载的:“癸丑,置西海、河西、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抵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隋书·吐谷浑传》则说:对四郡“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

鄯善、且末等四郡,不仅进行了屯田,而且是“大开屯田”。其领导人是四郡总负责人卫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刘权。其任务是“留镇西境”[3],“抵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其规模多大?是什么性质?留伊吾的王威也是银青光禄大夫,率军千余人,其规模4万亩上下。留驻且末、鄯善四郡的兵力,应数倍于伊吾,其屯田规模亦应大于伊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在谈到鄯善、且末屯田时称:“规模宏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否则,是无法完成“留镇西域”、“抵御吐谷浑”的任务的。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均居丝绸之路南道要冲,驻兵屯田是必然的,所以这里主要是军屯,同时还有附属于军屯的犯屯。“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就可以看出有“罪人”在此屯戍。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均是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宜农宜牧的地方。在此进行屯田是非常适宜的。还有一个史料证明有犯屯,据《隋书·薛道衡传》载:大业五年,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时年七十,天下冤之”。鄯善、且末确有犯屯,但其人数及规模有待进一步考证。



图21　且末古城遗址

隋开皇三年(583年)命令河西立堡屯田,以实塞下,大业四年(608年)谪天下罪人为戍卒,大兴屯田于河凉。大业五年(609年)大赦天下流民于西北边塞筑堡屯田。

① 李延寿撰:《北史·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魏徵等撰:《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魏徵等撰:《隋书·刘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三节　隋代西北屯田初探

一、隋代屯田管理情况

隋代，在中央尚书省内设有工部。工部尚书下统屯田侍郎二，专管屯田事宜。据《隋书·百官》载："尚书省，无事不总。"下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工部尚书"掌管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侍郎则负责全国屯田的具体组织管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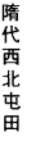
边境地区屯田，隋政府设有都使、子使的官员负责管理。"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①]西域屯田的管理，伊吾驻军屯田直属当地驻军长官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管辖。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屯田则归当地驻军长官银青光禄大夫刘权管辖。其下设有都使、子使以管理。犯屯隶属于军屯，隋政府把大批"犯人"谪徙西域，年轻的编为戍卒，老弱家属随军屯田。收入除留食用者外，上缴国家。有无什么专门机构管理，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隋代屯田的历史意义

隋王朝从公元581年开始，到公元618年亡国。短短的30多年时间，统一了中国，有力地推行了改革。短期内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仓储充盈，开凿了著名的运河工程。但隋炀帝即位后，横征暴敛，荒淫无度。对内残酷镇压，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广大人民群众奋起起义，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

隋代西域屯田从开始到结束，不到十年。时间短暂，规模很小，但其意义却是深远的。首先，鄯善四郡屯田，对防止吐谷浑卷土重来，进行反扑，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次，伊吾屯田，为防止西突厥的进犯，保卫边防、巩固边境安宁有重要贡献。第三，屯田保障了边境驻军的粮饷供应。第四，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保障了过往使者、商贾及行人的安全和食宿。隋代西域屯田，功不可没。

① 魏徵等撰：《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六章　唐代西域屯田的兴盛

第一节　唐王朝的建立

隋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隋王朝摇摇欲坠。公元617年5月，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在农民起义战争的烽火中起兵，南下跨黄河，取关中，11月攻占大兴城（长安），立隋代王侑为帝（称恭帝）。公元618年5月，迫杨侑让出帝位，隋王朝灭。李渊称帝建国，创建唐王朝，谥号唐高祖，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

唐高祖李渊的家庭为世代官僚贵族，从祖上三代以来，一直是西魏、北周、隋的豪门世家。祖父李虎是北周宇文氏集团的中坚分子"八柱国"之一，死后追爵为"唐公"。父李炳是隋朝柱国大将军，母独孤氏和隋文帝皇后是姊妹，李渊7岁时袭爵为唐国公。历任刺史、郡守、卫尉少卿等职。隋末社会动乱，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公元616年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势力逐渐壮大起来。一般史书都称他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而且暮气沉沉，胸无大志。主要是由于他的次子李世民的建议才起兵。由于李世民有魄力，英明果断，才取得攻克长安称帝建唐的功绩。《中国通史》更明确地说：李渊"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得为太原留守。他率军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李世民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城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此论值得商榷，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天资英明，有赫赫战功，是一个卓越的君主，这是世所公认的。但说李渊碌碌无为则是欠公允的。

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资料所说：正是李渊本人策划了太原起兵，也正是他的英明统率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

山西太原府人，是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史料当是可信的。温大雅的笔下，李渊是一个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从以下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情况。

1)在太原起兵的前一年，即公元616年，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时，他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国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①当时有一民谣《桃李章》预言李氏将代隋称帝，李渊听后说："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可见李渊不是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勉强起事的，而是"反隋意念由来已久"②。

2)公元616年，李渊命长子建成往河东一带"潜结英俊"，命次子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二人"倾财施赈，卑身下士，逮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③。早在616年即进行起事的准备工作，二子"结英俊，招豪友"，正是在李渊指挥下进行的。

3)起兵前，处斩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副留守王俊、高君雅，决策者是李渊。

4)为了消除后顾之忧，起事前，决定"北联突厥，东和李密"的方针。当时突厥雄踞北方，虎视眈眈。李渊为了化敌为友，对东突厥采取屈辱妥协的政策，派刘文静使突厥，进行结盟。答应"征伐时所得子女玉帛皆归可汗有之"④。始毕可汗资助马数千匹，兵士500名。东方起义农民领袖李密已控制河南大部，河北一部，势力强大，李密来信要求结盟，李渊回信说："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司牧，非子而谁。"⑤李密得信，昏昏然。因此李渊进兵长安，"不加阻拦"。李渊对东突厥和李密的战略决策，大大减轻了进兵关中的阻力。

5)李渊立大将军府，统帅三军，命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率领左三统军；命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率领右三统军；四子元吉领中军留守太原。6月，兵发太原，沿汾水南下，在霍邑(今山西霍县)大败隋军。9月，抵黄河，留一部兵力围蒲州，大军由临晋(今陕西韩城)渡河而进，直指关中。一面派建成进攻华阴，夺取永丰仓，占潼关；一面亲率大军沿渭河两岸向隋都前进。这一军事部署是英明的，其统帅正是李渊。

6)对农民起义军采取联合的政策。李渊起兵时仅3万人，到达关中，各地义军纷纷响应，迅速发展为20万人。公元617年阴历十一月九日，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的部队攻破城墙，夺取大兴城，李渊不急于称帝，而在适当时间，废隋立唐。

7)唐立国后，全国尚有许多实力雄厚，称霸一方的军事武装集团，使全国陷入了混乱的军事割据的战争状态，为了消灭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全国，李渊制定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
② 《隋唐五代史》。
③ 《大唐创业起居注》。
④ 《大唐创业起居注》。
⑤ 《剑桥中国隋唐史》。



图22　唐太宗像

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然后进攻中原，最后收复江南”的军事部署。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战略计划。

唐王朝虽然统一了中原，但东西突厥不断犯边。在西南吐谷浑不断侵边，特别是吐蕃崛起，吞并吐谷浑与唐争锋近二百年，国内因大规模的战争破坏，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社会异常凋敝。“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①]。“伊洛以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海断绝，鸡犬不闻”[②]。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唐政府实行与民休养、发展生产的政策。实行均田；更定税法、轻徭薄赋；奖励婚配，释放僧尼，检察户籍，增加社会劳动力；强化中央集权；兴科举，选贤才；积极推行府兵制。由于这些政策的推行，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以隋的兴亡为鉴，虚心纳谏，知人善任。由于政治开明，民富国强。公元629年，唐太宗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就是前线总指挥），率士卒十余万人，在漠北诸部特别是铁勒部的配合下，大破东突厥，颉利被俘。唐太宗声威大震，四方各邦纷纷来附。公元630年，各民族首领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域的伊吾城主率七城来降。两年后，游牧于热海（伊塞克湖）附近的契苾部，在首领契苾何力率领下，臣属于唐朝。公元635年，阿史那社尔率众东迁归唐。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康、安、石等邦国首领，先后派使或亲自到唐，表示臣属。此时西突厥和唐友好。西突厥肆叶护大可汗死后，其部属泥熟被拥立为可汗，他曾到过长安，与李世民结为兄弟。他派人到唐请求册封，唐太宗派人封泥熟为吞阿娄拔利邲咄陆可汗。他死后其弟同娥设立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他与唐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可是不久，又另立了一个乙毗咄陆可汗，他与咥利失可汗为敌，积极反唐。乙毗咄陆可汗欲割据西域称雄，抵制祖国统一。天山以南的高昌等地在其控制之下，先后煽动和挟持高昌王、焉耆王和龟兹王发动叛乱。

唐政府于公元640年至647年出兵平定叛乱，并先后开始在高昌、焉耆、龟兹大兴屯田，南疆定，驻北疆的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于公元651年又在千泉建牙，攻庭州，陷金岭，杀数千人，举兵叛唐，于是唐太宗决心平定西突厥，三次动员10万人，选名将率领，经过五年征战，于公元657年灭西突厥。西域重新统一于祖国版图。

① 刘煦等撰：《旧唐书·陈君宾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吴兢撰：《贞观政要·直谏》。

第二节　唐代西域屯田的兴盛

唐太宗以伊州为基地，经过多年经营，大兴屯田，逐步统一西域，成为继汉之后，第二个经营西域卓有成效的王朝。

盛唐时期的疆域，东到东海，西达里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达南海，皆属唐的版图，形成一个空前统一的繁荣昌盛的国家。为了保卫边疆，必须在边塞屯重兵以防守，若军粮都从中原运去，则实难持久。于是，唐太宗决定屯垦戍边。"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大兴屯田。"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①。这时西域的屯垦戍边也大大发展起来，"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②。唐朝开拓西域是由东向西，先南后北地发展，屯田基地建设也是依着这个规律进行的。据《旧唐书》记载：随着唐在西域势力的一步步推进，特别是设立"安西四镇"之后，"岁调山东（指陕西华山以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根据《唐六典·河西道》的大略统计，唐在西域的屯田点，安西都护府驻地龟兹（今库车）有20屯；疏勒（今喀什）有7屯；焉耆有7屯；北庭都护府驻地（今吉木萨尔）有20屯；伊州（今哈密地区）有1屯；西州（今吐鲁番地区）有1屯。共有56屯。一屯是多少?唐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曾命令诸屯说："西州镇诸军者，每50顷为1屯。"③1顷折合100亩，50顷为1屯即5 000亩。所开56屯，即耕地2 800顷（28万亩）。由于灌溉农业的需要，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立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构"掏拓所"。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时期，西域平时驻军4.4万人、马7 700匹，需军粮16.7万石，兵数多的时候达到10万以上。这么多人马的粮饷供应，主要靠屯田来解决。

唐时西域丝绸之路有北道、中道、南道三条，唐政府的屯田点即部署在这三条道上，现分述如下。

一、北道（伊州、庭州、轮台、清海、碎叶）屯田

伊州屯田

伊州即今哈密地区，哈密古称伊吾。伊吾是西域的东大门，丝绸之路的东西要道。在公元630年，伊吾城主率部归唐后，唐太宗于是年在伊吾（今哈密）置西伊州，两年后改为伊州，下辖伊吾、纳职、柔远三县。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伊吾郡"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有伊吾军，景龙四年（710年）置"。而《旧唐书·地理志》云："伊吾军，开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甘露川管镇兵三千人，马三百匹，在北庭

① 欧阳修撰：《新唐书·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欧阳修撰：《新唐书·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杜佑撰：《通典·屯田》，中华书局，197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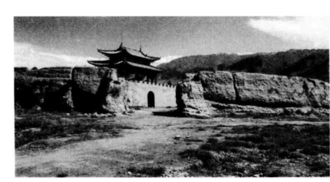


图23　巴里坤古城

东南七百里。”在伊州的甘露川地方，驻有伊吾军，这是无疑的，但何年置?一说景龙四年，一说开元中，究竟是哪一年置？据《西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载:“伊吾军，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奉敕置，至开元六年(718年)移就甘露镇，兵士三千人，马一千四十匹。”这样就把疑问说清了。只是马较300匹多了740匹，这个数目是合理的，在边疆荒漠用兵，3 000名士兵300匹马是太少了。甘露在伊州所属的蒲类海东北即今巴里坤县城东北约20公里的大河古城遗址一带。巴里坤地处天山山脉东段和阿尔泰山余脉之间，形成与山体走向一致的地堑盆地，即巴里坤高山草原盆地。盆地土壤肥沃，地势平坦，水草丰盛。北缘是低山丘陵，东南是雄伟的天山，四周群山环抱，“周匝如环”。是屯田屯牧的好地方。《唐六典》所载:“伊州一屯”，即种地5 000亩。在大河乡、干渠村，有一个唐代伊吾军屯田的古城。城为长方形，大部分虽已倒塌，但仍能显示出当年的规模。在古城中出土有莲花铺地砖、铜镜、铜佛、古币(开元通宝)及石磨、碳化的小麦粒等。1972年，吐鲁番出土了唐代的《伊吾军纳粮牒》，刻有伊吾军之印，记载伊吾军每年要向北庭军仓纳粮4 000石，向伊州粮仓缴粮197石。可见屯田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据《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钟兴麒先生《唐伊吾军驻所甘露川考》一文中称，甘露川不在巴里坤，据《西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载:“庭州瀚海军，西州天山军交河县、伊州伊吾军柔远县。”县东有柔远故镇，兼置守捉。柔远县即今哈密市城东98公里的沁城乡，其北三百里有下马崖，“气候温暖，冬夏季饮用泉水及灌溉农田，为利非鲜”。“在伊吾县城至下马崖一带，设置伊吾军，以当时军事态势而言，可谓居生击死，十分有利。”

在高昌哈喇和卓，曾出土《伊吾军屯田残籍》，内有:“五亩种豆，二十一亩……检校健儿焦思顺。”又有“三亩种豆，二十亩种麦，检校健儿成公福”。“用水渠灌溉”。还有“苜蓿烽地五亩，近屯”。“□□，都罗二烽，共五亩”。这些文书上盖有“伊吾军之印”。这些“屯田残籍文书”反映了伊吾军屯田的一个侧面。

伊吾军所属各烽戍，还举办烽铺屯田。烽铺是唐政府在边防要地屯戍的基层组织烽燧放烽铺事传牒，各司其职，唐《烽式》规定，一烽六人，五人烽子一人烽帅。实际上有多有少。《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中，有在阿斯塔那226号墓出土的《唐开元某年伊吾军典王元宗牒为申报当军诸烽铺已剧田亩数事》记有:“合当诸军烽铺，今年砍田总壹顷陆拾□□亩。”其中“泥熟烽种豆壹□□”,“速独烽种豆陆亩，共下子□□；故亭烽种床陆亩共别下子□□；青山烽种豆五亩共别下子□

□”。“柽槌烽捌亩、花泉烽陆亩”。“开元□□日，典王元琮牒如。”这文书盖有“伊吾军之印”。从以上文书研究得知，这是记载唐代开元年间，在伊吾军属下一部分烽铺进行屯田的事宜。这说明烽铺不仅要进行警戒，而且还要屯田。种植情况，还要认真地上报，可见要求是很严的。

庭州屯田

庭州即今吉木萨尔县一带。因地处天山以北，又称北庭。唐灭高昌国后，居于此地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也臣服于唐。公元640年，唐在突厥人的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城北12公里的北庭乡护堡子古城遗址）设置了庭州。下辖金满（以州治为中心）、蒲类（今奇台县城北唐朝墩古城遗址）、西海（今阜康一带）和轮台（今乌鲁木齐一带）四县。并在庭州设立瑶池都督府，任命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招抚西突厥。具有野心的阿史那贺鲁趁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之机，于公元651年建牙帐于双河（今博尔塔拉境）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公开叛唐。率部攻打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命其子咥运入寇庭州，陷金岭及蒲类，杀掠数千人。唐高宗李治派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西征收复失地。公元653年又派大将程知节（程咬金）西征，在焉耆以西打了一个胜仗。公元657年唐大将苏定方在伊犁河上游大败阿史那贺鲁，阿逃亡石国（今塔什干），被石国缚献唐朝。至此，西突厥汗国亡，唐朝设昆陵、濛池两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地区，完全统一了西域。

庭州东通伊州，南接西州，西抵碎叶，北达漠北，是东天山北麓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唐朝在庭州建立之初，不仅派军队驻扎在这里屯田，而且迁移西州的汉族农民来此耕种。公元651年后因阿史那贺鲁的叛乱而荒废7年，公元658年再置屯田。到公元702年唐在庭州设立大都护府，统辖特伽、鸡洛二州，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和匐延等23个都督府，掌握天山以北，东起蒲类海（今巴里坤）、西达西海（今咸海）的军政大权，庭州已发展成为天山北路的政治、军事和贸易中心了。大都护郭虔瓘进驻北庭后，将所率军队编为田卒，开荒种田，屯垦戍边，建成了北疆最大的屯垦基地。《唐六典》说：“北庭二十屯”，即种地1 000顷，合计10万亩。唐玄宗为确保这条东西交通大道的安全和边疆稳定，又置北庭节度使，统率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共有镇兵2万人。其中瀚海军就有1.2万人，驻屯北庭附近。平时“操耒务农，战时执戟击敌”。公元714年，郭虔瓘率屯兵在北庭打了一次漂亮的保卫战。

公元710~711年，后突厥可汗默啜，出兵攻灭在西域称雄一时的娑葛部落，势力大振，东西万余里，拥有骑兵40万。默啜踌躇满志，欲并吞天山南北，于公元714年，命其子同俄特勤及妹夫火拨颉利发石阿失毕率大军进攻北庭都护府，形势十分危急。郭虔瓘接到警报后，进行周密部署，组织屯田将士和群众进行自卫抗击。同俄自恃兵多将广，且刚刚打败了娑葛，于是趾高气扬地轻骑直逼城下。郭虔瓘预先埋伏在附近的勇士，突然跃起将同俄杀掉。突厥士兵见主将不见了，大惧。要求以全部军中物资和粮食赎同俄。闻其已死，恸哭而去。共妹夫阿失毕既失同俄惧不敢归，与其夫人一同降唐。自此，默啜部属，众叛亲离，突厥势力开始衰落，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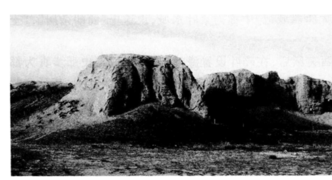
见，此次战役影响深远。唐玄宗越级升任郭虔瓘为冠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并下制进封为太原郡公。

庭州所属的烽铺也进行屯田。《吐鲁番出土文物》第八册，有《唐北庭诸烽剧田亩数文书》载："那勒守捉界耶勒烽口口"，"乾坑烽床伍亩"，"白粟叁亩共刈得贰□□"，"柽林烽床伍亩，共□□"。这些文书证实了庭州烽铺进行了屯田。

公元663年，唐政府任命裴行俭为金山副都护兼庭州刺史，率军收复庭州后，除组织军人屯田，从西州迁移大批汉族农民到庭州屯田，还从关内接受"罪人"到庭州屯田。《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庭州》载：庭州"汉户，皆龙朔(611~663年)以后，迁徙人屯"。《资治通鉴》卷40记载："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庭州是西域的屯田重地。

轮台屯田

这里的轮台不是天山以南的汉轮台(今新疆轮台县)，而是天山以北唐代所设庭州下辖的轮台县。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后，西突厥驻可汗浮图(今吉木萨尔县)的叶护阿史那贺鲁率部归唐。唐太宗在天山以北设庭州，下属金满、蒲类和轮台三县。究竟唐代轮台在什么地方?众说纷纭。《后汉书·西域传》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耶律楚材《西游录》别失八里城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道里证之，适相符合，轮台县当在今迪化、昌吉之间，这是第一种说法。《新疆图志》说："轮台在北庭都护府西或曰四百里，或曰三百里，或曰二百里。"《辞海》轮台条中注：轮台，古县名，唐贞观中置，治所当在今新疆米泉县境。这是第二种说法。《新疆简史》称："庭州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北，古遗址尚存……州治以西四百多里外有轮台县，其地当在乌鲁木齐附近不远。"这是第三种说法。清代徐松著《西域水道记》称：轮台在乌鲁木齐稍东。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认为轮台在乌鲁木齐以东70里的地方。新疆社会科学院钱伯泉先生在1982年《新疆社会科学》第1期《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一文中认为：首先，轮台一名的来源与"於赖"有关，"於赖"即是今日的"乌拉泊"地方。那么设立轮台县治，决不会远到乌拉泊以外的地方去。其次，轮台既是唐朝的军事重镇，必然设在形势险要的地方。现在的达坂城天山山谷为乌鲁木齐通往吐鲁番的孔道，上古称"于娄谷"，乌拉泊紧扼这条山谷的谷口，处于咽喉重地。唐朝西域的威胁，是牙帐设在塔拉斯草原碎叶城附近的突厥，突厥东侵北庭都护府，或者南侵安西都护府(始治高昌，后移龟兹)，都须路过乌拉泊及其附近。所以轮台县治一定设在天山谷口的乌拉泊无疑。再看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它显然是在轮台写的。诗曰："……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如果像有的学者所说那样，唐朝的轮台设在阜康县，则天山城南无"路"可通西州(今吐鲁番)，若走北庭都护府，大路又是一马平川，不可能出现"山回路转不见君"的情景。米泉远在乌鲁木齐市北，昌吉也在乌鲁木齐西北30多公里，南离天山很远。只有乌拉泊一地，一出东门，就见重重叠叠的天山，大路也是向东偏南而去的，冬天送客东归，才会出现诗中所描写的情景。


图24 乌拉泊故城

乌拉泊故城遗址，坐落在乌鲁木齐市区南郊10公里处，其南背倚天山，东扼吐鲁番和南疆的咽喉。古城略呈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80米，周长2公里，城墙为土夯筑，现残留高达4米，最高处7米多。四个城角处尚存方形角楼遗迹，每面城墙都分布有凸出墙身的马面，城墙中部则有瓮城门，表明了这座古城当年所具有的军事地位。古城内散布着唐、宋时期的陶片，也曾拾到清代圆形方孔铜钱。钱伯泉先生认定此古城遗址即唐代轮台县治所在。林必成先生在《新疆大学学报》著文《唐代轮台初探》中也认定此处即唐代轮台所在。笔者也同意这一结论。

轮台县下设四个乡，当唐政府迁移西州的汉族农民到庭州屯田时，部分汉族农民也来到轮台垦荒种地。公元702年在乌鲁木齐西部的九家湾地区移民屯田。所遗引水渠道，建国初期尚清晰可辨。

长安二年(702年)，唐政府在庭州置北庭都护府。设烛龙军，次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静塞军、清海军、金牙军等。静塞军驻轮台，有士卒千余人。按唐政府规定："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1]唐军屯田1万余亩。这里有军屯，有民屯。《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屯田丰收的情况："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唐代诗人岑参写道："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军屯在轮台北。"如实地记载了唐代屯田士卒在边疆屯垦戍边的情况。

清海屯田

唐代清海在今乌鲁木齐以西的石河子市附近。《新唐书·地理志四》载：庭州"西北七百里有清海军，天宝中为军"。清海是庭州通往弓月、碎叶的要冲，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镇。《元和志·陇右道·庭州》记载："清海军，在(庭)州西七百里，旧名镇城镇，天宝中(749年)改为清海军。"这里水草丰美，土壤肥沃，适宜耕种，是理想的屯田之地。唐在西域的军事编制是："大军万人，小军千人。"[2]这里可能驻的是小军，一千余人。"人给十亩"，屯田数目当在万亩左右。可以认为，现在兵团农八师驻地石河子市最早的屯田，是从唐代开始的。

碎叶屯田

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中亚托克马克一带)位于碎叶川(今楚河)南岸，地处古代中亚中西交通的要道。唐统一西域前，碎叶是西突厥可汗的王庭。玄奘

① 欧阳修撰：《新唐书·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刘煦等撰：《旧唐书·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西行取经路过这里，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为素叶水城，说这里"商胡杂居"，"土宜糜麦"。

公元658年，唐军灭西突厥后，在碎叶设置濛池都护府，以阿史那步真为都护，管辖今中亚北部地区。步真死，其部将李遮匐叛唐。公元679年7月，唐廷命裴行俭率军万余人，平定叛乱，收复碎叶，留王方翼筑碎叶城。"调露元年(679年)九月，安西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作屈曲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①]唐设安西大都护府后，碎叶为"安西四镇"之一，以后划归北庭大都护府管辖。碎叶作为唐朝西部边陲的军事重镇，设"保大军，屯碎叶城"[②]，1万多人共屯田10万多亩，地域从碎叶城扩大到塔拉斯河流域。1219年契丹人耶律楚材奉命扈从成吉思汗西征，留居西域6年之久，在唐碎叶城遗址以西300里塔拉斯河见到唐代屯田遗址。他写道："数百里皆平川，冈岭回护"，"川北头有巨丽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时凿通南山，夹为石闸以行水，闸脊跨坚岸。有唐节度使、参谋检校、刑部员外郎，假绯鱼袋太原王济之碑"[③]。从这个宏伟的永久性灌溉水利工程，可知当时唐在碎叶的屯田是进行了认真的建设的。

二、中道(西州、焉耆、龟兹、乌垒、疏勒)屯田

西州屯田

西州(即今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张骏的前凉政权在此置高昌郡，设田地县，这是祖国内地的郡县制第一次在西域推行。以后北方历代少数民族政权如后凉、北凉，一直在此派驻太守。高昌的汉人很多，是汉朝屯田将士的后裔和汉代以后因避战乱而陆续至此的难民子孙，在这里耕种几百年，世代相传。自公元460年柔然攻下高昌，先后挟持阚、张、马、麴四姓在此立国。7世纪中叶，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为抗拒唐朝统一西域，勾结高昌王麴文泰发动叛乱，不断劫掠汉使者，切断了丝绸之路，同时兴兵侵扰伊州，攻焉耆，并挑拨薛延陀与唐的关系。唐告诫无效，太宗于公元640年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前线总指挥)和铁勒族名将契苾何力率军数万攻灭高昌。西突厥派驻在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境)支援高昌的军队，也臣属于唐，献地千里。唐在高昌王城(今吐鲁番县城东50里阿斯塔那及哈喇和卓二村庄之南)设置西昌州，不久改为西州，下辖高昌(以今高昌古城为中心)、柳中(今鄯善鲁克沁一带)、交河、天山(今托克逊)、蒲昌(今鄯善)五县。同年在西州设置了统辖西州以西，西达波斯的安西都护府。同时开始屯田。据《新唐书·西域传·高昌》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年)九月，唐朝"改西昌州为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由此可见西州不

① 王溥著：《唐会要·安西都护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欧阳修撰：《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仅实行军屯，而且还有发配的犯人在军队的监督下垦田屯种。公元642年，唐名将安西都护郭孝恪到任不久，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就发兵侵扰伊州（今哈密一带），郭孝恪立即率2 000名屯军，轻骑突袭，击退了西突厥军。安西都护府后迁至龟兹，西州的都护府驻地遂改为西州都督府，屯田规模未能扩大。《唐六典》说西州有“天山一屯”。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西州设有天山军，“管镇兵五千人，马五百匹”。种有一屯，即5 000亩耕地。天山军的屯田地点在哪里？唐开元十九年（737年），西州天山县营田使牒，为天山屯领取车牛（即牛挽车）和农具（日本大谷文书3473号）。这说明天山军的屯田地点在西州天山县，即今托克逊县城以北，从天山博格达峰下冰川融化的雪水流过达坂城，汇成白杨河，正可以灌溉这片土地。当时的土地由政府划拨，牛车和农具由政府配给，收获的粮食当然也要缴入国库。大谷文书3787号中除有“天山屯营田五十顷”的字样外，还写有“柳中屯营田三十顷”[①]。可知当时西州柳中（即鲁克沁）有军队屯田30顷，即3000亩。

唐在西域的驻军进行了屯田。镇戍一级的戍边者是否屯田，未见史载。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72TAM226:51）解决了这一问题。

西州都护府　牒上　[ ]

合当州诸镇戍营田壹拾□顷陆拾[ ]

赤亭镇兵肆拾贰人营□□顷　　维磨戍[ ]

柳谷镇肆拾人□□□肆顷　酸枣 戍 [ ]

白水镇兵叁拾[ ]营田陆顷　　昌　畔戍兵[ ]

银山戍兵□□营田柒拾伍[ ]

右被□度营田使牒当州 镇　戍 □田顷亩[ ]

戍　兵 [ ] 及 营田顷亩[ ]

方亭戍 [ ] 谷戍　狼井[ ]



图25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壁画

此件是西州都督府向支度营田使呈报该州诸镇、戍营田亩数的文书。从上述文书可以看出：(1) 西州所属镇戍既戍边又屯田，诸镇戍营种地1 000多亩。(2)每镇人数三四十人不等，种地亩数也不同，柳谷镇40人种400亩，而白水镇30多人就种600多亩，这是依据当地水土

① 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



条件而定。条件充裕，人均20亩左右，反之就少些。(3)银山戍种地仅70亩，可见戍的人数比镇少。(4)镇戍种地亩数要上报，可见是统一部署的。

在西州也有烽铺屯田。阿斯塔那78号墓出土的《唐西州蒲昌县下赤亭烽帖工》记述："帖赤亭烽，□□陆合，□□队正赵□□分付，□□尉杨瓒。"上盖"蒲昌县之印"。同墓出土的《唐西州蒲昌县下赤亭烽帖为镇兵粮事》记有："帖赤亭烽□□㪷(斗)，□□赤亭镇兵十，□□依数给讫上。"上盖有"蒲昌县之印"。同墓出土的《唐贞观某年二月府史张道龛领受马䭹料抄一》记有："赤亭烽帅冯怀守，□□承使马料䭹草头数□□条，二月二十一日，府使张道龛。"从以上出土文书中可以得知，西州蒲昌县下有个赤亭烽，烽帅叫冯怀守。这个烽进行了屯田，收成还不错，不仅供应自己，还有多余的粮食可供给别人食粮和粗料。出土文书还记载有关水利的机构和人员："掏拓所"、"知水官"、"水子"等。

焉耆屯田

唐初，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为争夺西域，在勾结高昌王麴文泰叛唐分裂失败后，又煽动挟持焉耆王反唐。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命安西都护郭孝恪为银山道大总管，率兵平定焉耆。于公元648年设立焉耆都督府，驻重兵，兴屯田。这个地方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唐六典》说："焉耆七屯。"即开垦耕地350顷(3.5万亩)。屯田规模，远远超过伊州和西州。解放以后，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曾考察了唐代屯田遗址——焉耆唐王城，"位于锡科沁西北约2.5公里，城作方形，墙为夯土所筑，断断续续间有存者，高约5米，周约450米，在发掘中清理出房屋地基及粮食等遗址"。这座遗址中出土的有屯田军士使用的铁犁、铁镰、铁斧、刀鞘及陶器等用具，还有很大的石碾数方。与陶器同地层出土的谷物，有小麦、谷子、高粱、胡麻和极细的麦粉。①这些都是唐在焉耆屯田的历史物证。



图26 新和玉奇喀特故城遗址

龟兹屯田

龟兹(即今库车一带)居西域之中，扼中西交通孔道。水土充裕，宜农宜牧，汉唐经营西域，无不以龟兹为重要基地。公元647年，唐太宗任命突厥名将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郭孝恪、契苾何力等五将军发铁勒13部及突厥骑10万平定了和西突厥相勾结与唐为敌的龟兹王诃黎布失毕的叛乱。这一战役，在阿史

① 《新疆考古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2期。



图 27　龟兹故城

那社尔指挥下，大获全胜，擒龟兹王，并下五大城，招降70余城。于阗王献马300匹犒军，各族人民争相欢迎唐军。至此，西域又重获统一。阿史那社尔功勋卓著。郭孝恪在攻取龟兹后，就贪图起享受来了，并将一个饰有黄金白玉的床送给阿史那社尔，但阿仍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拒绝接受这张床。唐太宗得知这个情况后赞叹说："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龟兹平，唐太宗在此设置龟兹都督府，辖姑墨、乌垒等9州。并从西州迁安西都护府于此，两年后撤回西州。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再次将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府治设在龟兹首都伊罗卢城内（今库车城东郊皮朗古城遗址）。都护府既是唐在西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又是行政首脑机关。安西大都护府下统著名的"安西四镇"（即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16都督府、80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自波斯（今伊朗）以东，阳关、玉门关以西，皆置于大都护府统辖之下，唐统一了西域。

公元689年，吐蕃攻占龟兹。"长寿元年（692年），威武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①唐军在此积极进行屯田，以满足粮糈供应。到宣宗时，"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②，其中龟兹驻军1.1万人。

龟兹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唐朝在此驻重兵，大兴屯田。《唐六典》说："安西二十屯。"即种地1000顷，合计10万亩，建成唐在西域最大的屯田基地。新、旧《唐书》都记载将军张孝嵩在任安西大都护时，"务农重战，劝田训士，府库盈实"。他十分重视农业，亲自组织屯兵学习耕作技术，动员大家努力耕种，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因而连年丰收。军有粮，库充实，兵强马壮，训练有素，这样的军队哪能不打胜仗呢？"务农重战"就是这个意思。在遥远的西域征战戍守，要站稳脚跟，不务农是不行的。这就是安西大都护府大兴屯田的根本原因。到唐玄宗李隆基时，还在龟兹设有专管屯田的营田使。《旧唐书》记载："天宝年间，唐派安西副大都护封常清专治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

① 欧阳修撰：《新唐书·西域传·龟兹》，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刘煦等撰：《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唐在西域屯田事业的兴旺发达，其影响是深远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四川。他的儿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县），急召各地平乱，边塞精兵猛将相继内调。这时，吐蕃崛起，趁中原内乱，出兵攻占河西陇右，切断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吐蕃集重兵，加紧进攻西域。孤悬塞外的四镇留后郭昕，伊西北庭节度使曹令忠率领将士及西域各地少数民族首领和人民，团结抗战长达近30年之久，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兴屯田、仓库盈，保证了长期抗战的胜利。如果饿着肚子，要想坚持30多年，那是不可能的。

乌垒屯田

乌垒（今轮台县策大雅乡）是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所属乌垒州的治所。公元658年平定龟兹后，唐军在乌垒一带屯田戍守，成为安西大都护府的东方屏障。

公元656年，龟兹大将羯猎颠叛乱，公元658年1月，唐将杨胄率部平定叛乱后，唐派军在乌垒屯田戍边。玄宗时驻军增加到千人以上，种地万余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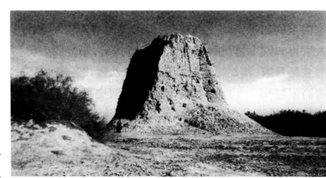


图28　轮台拉依苏烽燧

轮台西南拉伊苏附近有一个唐代屯田区遗址。有戍楼，高约20米。这里曾出土了“开元通宝”和两个铜扣环，从这里东西远望，戍楼相继。诗人曾有“边屯连云”之说，可见其规模的宏大。

库车西南渭干河两岸以及新和、沙雅两县境内的夏克吐尔、玉其吐尔和库木吐尔遗址，都是唐军屯田时的城堡。在今轮台县城附近，有一座唐代屯田城，当地维吾尔人称为“黑达依乌尔都”，意思就是汉人的古城堡，城内出土了唐代的钱币、陶片和丝履等物。离城不远处，有一座炼铁炉遗址，是唐代屯军打制兵器和农具的冶铁房。

疏勒屯田

疏勒（今喀什东北28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公元648至685年，唐朝两度在此设佉沙都督府。虽然唐军公元648年势力及于此地时便开始了屯田，但由于西突厥勾结疏勒王的反叛，使屯田停止。公元673年唐军平定疏勒，公元675年改原设的佉沙都督府为疏勒都督府，府下设15州，疏勒又是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随着疏勒局势的稳定，唐军再次屯田，得到迅速发展。屯田反过来又巩固了唐的统治。《新唐书》记载安西大都护郭元振率军“屯疏勒水上”，即在疏勒附近喀什噶尔河两岸屯田。《唐六典》说：“疏勒七屯”，即种地350顷（3.5万亩），这个数字与焉耆屯田亩数是相同的。按每人10亩计算，疏勒驻兵是3 500人左右。

《唐六典》记载的“疏勒七屯”，显然是在今喀什周围。但七屯究竟在何处?未见文献记载。从古代遗址的情形来看，我们大体上可以判断出这七处屯田的地理方位。

据李恺同志考察研究，喀什周围的古代屯田遗址共有四处。第一处是今日罕诺伊古城的四周，可以叫作罕诺依垦区。《新唐书·地理志》称：“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查核地理和地望，这里所说的“汉城”，当在此地。罕诺依古城周围有大面积的古代屯田遗址，遗迹中属于唐代前后的陶器残片极多。恰克玛克河的古道从遗址中心穿过。第二处是从罕诺依古城往东约十多公里处。这里有阿卡什梯木，东经76°19′，北纬39°35′。其北又有苦木沙克，东经76°20′，北纬39°36′。前者为一小城，有烽燧一座。后者为一台地，地上陶器密布。这两者的位置及所保存的文物特征都证明是唐朝时期的屯戍之地。周围有大面积的可耕之地。今英吾斯坦、阿卡什等地的居民，也曾经发现过一些文物。可以认为，此处也是唐代的屯垦地区之一。第三处是今疏勒县的羊达曼一带。这一垦区与阿克什隔“红河”而相望。直到清道光时还保存着古代的许多沟渠遗址。当时的官吏如长龄等曾把这些遗址误认为是准噶尔时代的遗迹。但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这一带应是唐代龟兹(今库车)到疏勒的大道上的一座城镇达曼城所在地，是唐代的屯田遗址。清道光年间曾在此利用这些遗址办起了新的屯田区。第四处是今日伽师县的英阿瓦提“黑达依沁儿”。在唐代是叫作葭芦馆的小镇。周围有纵横交错的古代灌溉系统和拓垦者们居住的遗址。遗存的陶片以唐代的居多。

唐代在疏勒区域的另一个重要垦区是在巴尔楚克。唐在巴楚一带的屯田遗址，主要分布在今日的图木舒克山东面和西面。古河道遗址证明：这一带曾经是古代喀什噶尔河灌溉区。叶尔羌河也有支流从这里通过。两条河互相交汇，给这一带提供了良好的土地和水利条件。图木舒克山西面的屯田遗址，到本世纪上半叶还存在，我国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和英国的斯坦因等都曾经见到过。现在这一带已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50团所开垦，遗址难于辨认，但还经常出土一些古文物。图木舒克山以东的垦区，除了一部分被当地群众和51、50团开垦外，其余的部分尚可看到明显遗迹。这些遗迹大体上分布在今日托库孜萨拉依古城和柯坪县阿恰镇南老齐郎古城之间的广大地区。遗址中保存着现在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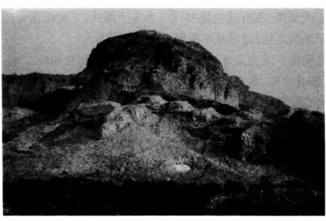


图29　喀什唐王城



“肖梯木”，“科什梯木”，“云姆拉梯木”，“琼梯木”，“麻将勒克” 的一连串古烽燧、古城堡。在城堡周围有许多古代渠道、田畦的痕迹。遗址的文物以唐代居多。托库孜萨拉依又名唐王城，是唐代蔚头州所在地(汉代属尉头国)，这一带的屯田遗址，应是唐代的屯垦区之一。



图 30 记载唐朝管理西域的唐朝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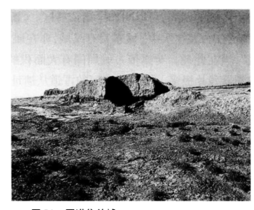


图 31 罕诺依故城

三、南道(于阗)屯田

于阗屯田

于阗(今和田附近)在隋末唐初为突厥统治。龟兹平定后，公元635年于阗王归附唐朝。唐先后在此地设立毗沙都督府，公元648年设于阗镇，驻军屯戍。当时唐朝命令：“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①]于阗作为“安西四镇”之一，地处边远，转运困难，只有屯田来解决军粮。该处的屯田人数和亩数，尚未见到史书记载。

安西大都护府驻地及辖区内的屯戍遗址，今天仍存。黄文弼在考察库车东郊皮朗古城时，发掘出的莲纹铺地花砖，纹饰形制与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的铺地砖大致相同。同出的还有大量唐代货币[②]。在库车县西北的苏巴什古城中，发掘出铜、铁、木、陶器及壁画、泥塑等，还有残纸墨书：“一十人于阗兵。”此纸很可能写在唐设安西大都护府于龟兹之后，记录从于阗调来士兵的数目[③]。

以上是唐在西域的屯田区。天山以北以庭州为中心，还有伊州和碎叶二地；天山以南以龟兹为中心，还有西州、焉耆、疏勒三处，上述数字是个大略统计。应当看到，唐在西域各地大至城镇守军，成千上万，小至烽台驿站十几人，无论多少，有军就有屯。如米兰就有屯田戍堡，有敌征战，无警屯田。这就使西域的屯田范围东起巴里坤草原，西达楚河之畔，南抵昆仑山麓，北到准噶尔盆地，遍布天山南北，分布空前广泛。

① 刘煦等撰：《旧唐书·职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文物》，1962年第7~8期。
③ 《考古》，1959年第2期。

第三节　唐代陕甘宁青屯田

唐太宗即位后，吐谷浑不断兴兵掠夺松、岷、洮、鄯、廓、兰等州。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命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率唐军分道进击，大败吐谷浑，首领伏允遭惨败，于大碛自缢而死。此时，吐蕃兴起。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唐蕃友好，成了历史佳话。唐蕃关系正常。到公元663年，吐蕃大伦禄东赞率军灭吐谷浑，唐高宗命卫威右大将军薛仁贵出兵征讨，被吐蕃大败于大非川。于是“连岁寇边”[①]。678年唐再派大将刘审礼进军青海讨伐，结果又被吐蕃打得大败。吐蕃进而与西突厥勾结，出兵西域，攻陷龟兹、疏勒、于阗等安西四镇，直到武则天执政，派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率唐军大破吐蕃，安西四镇方得恢复。此后，唐蕃虽书使往来，互通婚姻，但战争不断。特别到睿宗时期，吐蕃得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共和县一带），于是“屯兵畜牧”，更增强了实力，连年犯边。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选名将郭知运，王君㚟、盖嘉运、肖嵩、崔希逸、杜希旺、哥舒翰等驻守河西陇右，用以对抗吐蕃。并在这一带大兴屯田。至“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陇右大片土地，直逼长安。吐蕃与唐王朝争锋，前后180余年。

河西屯田

河西是指兰州以西走廊地带。唐开元年间，屯田共98屯。一屯为5 000亩，98屯就是49万亩。河西走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唐书·兵志》载：河西统八军，三守捉，驻军73 000人。于是兴屯田，以就地解决大军粮食供应。具体情况是：

赤水屯田36屯。赤水即赤水军，《通鉴》卷215胡三省注：“赤水军在凉州城内，兵三万三千人。”除执行警戒卫戍任务外，屯田18万亩。

建康军屯田15屯。“置在甘、肃二州界，证圣元年（695年），王孝杰开四镇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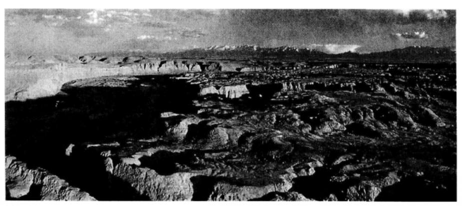


图32　玉门骟马城

① 刘煦等撰：《旧唐书·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以两州界迥远，置此军焉。”[①]经考证，应在甘肃高台境内的骆驼城。种地7.5万亩。

大斗军屯田16屯。《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大斗军在凉州西200里，本是赤水军守捉。开元十六年(728年)，改为大斗军。“因大斗拔谷为名也。”即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种地8万亩。

玉门军屯田5屯。《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开元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因于县城置玉门军。”“肃州西二百余里，武德中杨恭仁置。”在今甘肃玉门市内，种地2.5万亩。

甘州即今张掖市，屯田19屯，种地9.5万亩。

肃州即今酒泉市。屯田7屯，种地3.5万亩。

除以上屯田区外，还发现敦煌、瓜州也有屯田，详情待进一步考证。

武则天时，陈子昂在论及甘州屯田时说：“甘州土地肥沃，四十余屯每年收获不下二十余万。”[②]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开垦，“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天宝八年(749年)唐王朝河西收购了37.1万余石，占全国和籴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强，由此可见河西屯田的成效。

河湟地区屯田

河湟地区是指唐王朝所辖鄯州、廓州、河州、洮州等郡。唐太宗平定吐谷浑，后吐蕃崛起，灭吐谷浑。唐为同吐蕃争夺河湟地区，唐政府在这一地区驻重兵。《通鉴》卷215载：“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武、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有兵7.5万人，以防吐蕃。大办屯田，共125屯。种地62.5万亩。”可见规模是很大的。

据《唐六典》载：鄯州境内：鄯州六屯；白水军10屯；安人军1屯；绥和守捉3屯；威戎军1屯；河源军28屯；临洮军30屯。共89屯。

廓州境内：廓州4屯；积石军12屯。共16屯。

河州境内：莫门军6屯。屯田积谷，军粮充裕，有力地保障了边疆的稳定。《新唐书·吐蕃传》载：“黑齿常之为河源经略大使，乃严烽逻，开屯田，虏谋稍折。”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七月，吐蕃噶尔钦陵率军再次向河源(今西宁一带)进攻，被黑齿常之率唐军将其击败。黑齿常之因功被擢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任职后，认为河源地区为唐蕃力争要冲之地，但地处边远运输困难，遂于该地置烽燧70余所，开屯田5 000余顷，每年收粮500余万石。于是军粮充足，有力地保障了唐军的供给，在黑齿常之的有力经营下，唐朝在河源的防线更加牢固，成为抗御吐蕃的中坚力量。

《旧唐书·哥舒翰传》还记述了唐军痛击吐蕃的故事：“天宝六载，擢授(翰)为右武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湟军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呼其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

① 《唐会要》卷87。
② 《陈子昂集》卷八。

勇驰击，杀之略尽。余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

“积石军在州西南150里，仪凤二年（677年）置。西临大涧，北枕黄河，即隋浇河郡所理。”①

丰胜、灵盐和泾源屯田

为防突厥南下犯边，玄宗时于灵州设节度使，统一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之境。开元中，此地共有64 700人，在此屯田戍边。《唐六典》载：在这条防线上有单于东城、西城、中城、胜州等，共有屯田136屯，由节度使管理经营。显然是军屯。

临盐、泾源地区，是抵御突厥的第二道防线。《唐六典》载：这里有牧监、会州、原州、盐池、夏州等地屯田22屯和定远军的40屯，丰安军27屯，共89屯。

“安史之乱”后，这里变成了第一线，吐蕃、回纥、党项内逼。《新唐书·吐蕃传》载：大历“十三年（779年）虏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冦灵州”。德宗八年（792年）吐蕃出兵“冦灵州、陷水口，塞营田区”。丰州一带，屯田荒废。

“安史之乱”起，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陇右十几个州的大片土地。代宗时一度攻入长安。后虽吐蕃被迫退出长安，但泾源、邠宁等地已成了唐、蕃争夺的地带了。代宗大历时，选名将郭子仪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马磷屯原州；李忠臣屯泾州，并大开屯田以供军需，部署了一条防御吐蕃的重要防线。直到宣宗时的近百年时间，泾原、邠宁都驻有大量的军队。

据天宝时统计，唐在西北之营田，河西道赤水至天山间共156屯。陇右道渭州至西使间共172屯。

西夏虽为游牧民族，因在战争中饱尝军粮不继之苦，建国后，设立田司，实行亦兵亦农之策。平时务农，战时为伍，人人能斗计，“无复兵农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在河西大兴屯田。②

宋朝为抵抗西夏内侵，努力恢复唐时的屯田，建努扎城开垦定西，建陇干城（今静宁）屯垦陇干川，建安西城和西连城垦靖远和会宁，并在南迁时于陇南屯田抗金。③

第四节　唐代西北屯田的探讨

一、唐代屯田管理系统

自唐太宗执政后，大兴屯田，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39。
① 《甘肃省志·农垦志》，第3页。
② 《甘肃省志·农垦志》，第3页。



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30顷（3 000亩），州镇诸军每屯50顷（5 000亩），可见规模之大；全国屯田“收谷百九十余万斛”[①]，可见效益之显著。有军屯，有民屯，还有犯屯，为了加强领导，在中央尚书省下由六部之一的工部统一管理屯田工作，工部设“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②]。凡屯田的“水陆腴瘠，播殖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③]。尚书省下属有工部、屯田、虞部和水部。

工部有屯田主事二人。屯田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职田，诸司公廨田的具体事务。“掌天下屯田之政令。”[④]下设有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二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

为了屯田政令的落实，定期检查，严格奖惩。“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⑤]

每屯设屯官、屯副，选善农者担任，每年春播期间，屯官要深入屯地检查“谪作不时者”（同上书），批评或责罚那些不按农时耕作的人。

军屯、犯屯每年的生产计划，要上报兵部批准执行。“岁以仲春藉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⑥]

州镇诸军的屯田管理者，高宗时期称知营田使、营田大使、检校营田使、营田游击将军等，到玄宗时，统一称营田使，是州镇诸军主管屯田的官员。营田使下属州郡的屯田，由州田曹主管，兵曹协助。属诸军的屯田由营田副使、营田判官、营田巡官管理，再下设屯，由屯官、屯副负责。“司农寺每屯三十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⑦]

唐时西域驻军，平时4万余人，战时达10万以上，河西驻军7.3万人，河湟地区驻军7.5万人，这么多士卒的粮糈供应，如靠中原长途转输，则难以为继。主要是靠就地进行屯田来解决。若粮饷供应问题不解决，唐王朝的军队在西北就站不住脚。所以历任节度使、大都护都非常重视屯田。屯田使一职多数是大都护或副大都护、刺史兼任的。吐鲁番出土文书（72TAM226：58）载有“副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北庭都护口口营田使上柱国杨楚客”。开元年间，杨楚客曾任北庭都护，据出土文书记载，他同时兼任支度营田使的职务。武周年间的支度营田使是由检校庭州刺史张任楚兼任的[⑧]。景龙年间副都护和守阳兼营田使，“始终十年，储蓄巨亿”[⑨]。可见唐政府对屯田的重视。各军、镇屯田，由各军政长官负责，营田副使、营

① 欧阳修撰：《新唐书·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欧阳修撰：《新唐书·百官》，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欧阳修撰：《新唐书·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刘煦等撰：《旧唐书·职官》，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欧阳修撰：《新唐书·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欧阳修撰：《新唐书·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 欧阳修撰：《新唐书·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⑧ 《千唐志·岷州刺史张任楚墓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⑨ 《千唐志·唐中大夫江华郡太守和守阳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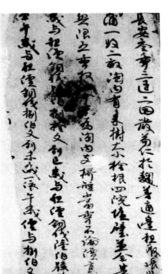


图 33　唐代汉字公文文书，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

田巡官协助组织管理屯田。各屯均设有屯官、屯副，同时配备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每屯5 000亩左右，屯田士兵约500人上下。生产工具由政府供给，生产的粮食等产品，除自用外，上缴国家。

西北军屯人员的来源有四：

一是唐政府调到西北的唐军，其士卒多是中原的青壮年。“每岁调内地更发千余人镇遏焉”①。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械戍逻，万里相望”②。这是西域屯田的骨干力量。

二是各地发配来的“犯人”。这些“犯人”编在唐军中，一块进行屯田生产。《新唐书》卷二载：“贞观十六年（642年）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不仅西州有犯人进行屯田，其他屯区也有类似情况。

三是当地人民参加屯戍。西北边塞烽子，时有缺额。于是雇用当地农民参加烽铺屯戍。吐鲁番出土文物记载这类事的文书多达17件（程喜霖《试析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唐代雇用契卷的性质》，载《中国文史论丛》1992年第3集）。例如：

□银钱八分雇同乡人解知德，柳当中□

□壹拾伍日其钱即日交相 付 □

若烽上有逋留官罪壹仰解知德

此件出自阿斯塔那326号墓，纪年残缺。

文书明确地记载着受雇人姓名、金额以及时间等。

四是健儿及随军家属。唐制，边防戍卒，番役期一般三年或二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下令招长期戍守的职业兵称健儿，其家属愿同去的，各给田地房宅。西域的健儿为数不少。

五是民屯。属各州郡管辖。由田曹负责组织管理，兵曹协助，下有屯官屯副，每屯3 000亩左右。

二、唐代西域屯田的评价

唐在西域屯田，始于公元630年，到公元791年吐蕃攻占西域时停止，历经161

① 杜佑撰：《通典·高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唐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年，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中国历史上经营西域卓有成效的是汉、唐、清三朝。唐借鉴汉代的经验，经营西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先是唐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域、河西及丝绸之路的直接管辖。随着唐对西域统一步伐的加快，把西域划分成三个军政管辖系统：一是伊、西、庭三州与河西、陇右，均归陇右道管辖；二是天山以南直至中亚，归设于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管辖；三是天山以北及伊犁河流域归设于庭州的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唐在西域广大地区设立完整的军政机构，在丝路沿途设立驿站，为管理西域和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其次是屯田与戍边紧密结合。唐在西北兴办的屯田区，多是西北的战略要地。屯田不仅保障了军队的粮饷供应，而且与戍边紧密结合起来。

1.屯田是安边定国之策。

西域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唐时期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的分裂势力。如能经营好西域，巩固边疆，即可解除边患，中原就安宁。自西汉设立都护府后，西域就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与内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西域沦陷或丢失，就危及祖国内地，唇亡齿寒。中原战乱动荡，西域孤悬塞外，中央政府在此的统治，一般来说难于持久。可见汉武帝、唐太宗之所以重视经营西域，主要是从安边定国的高度着眼的。

2.屯田在维护祖国统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西域各地各族爱国首领和人民，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分裂势力也不时发难，先有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挟持焉耆王龙突骑支和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的反叛活动，后有瑶池都督、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贺鲁等人的叛乱。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安西四镇”的数次易手就是证明。西域土地辽阔，唐朝平时常驻西域兵力四五万人，战时兵力多达十几万，这么多人马的粮草供应，如果依靠从遥远的中原运来，其困难是难以设想的，主要靠西域进行屯田来解决。这就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十分重视在西域组织屯田的原因。除营田使组织管理屯田生产外，身为大都护的张孝嵩也亲自过问和领导这件事。如果军队少粮缺食，怎么能够顺利地进行平叛战争，制止分裂活动，巩固边防呢?更不要说像郭昕、曹令忠率领军民抗击吐蕃能坚持近30年了。从阅读史书可得出一个结论：从西汉起，历经东汉、魏、晋、隋、唐，凡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在西域进行屯垦戍边。

3.在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兄弟民族将领和西域各族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起了特殊的作用。

西域作为多民族繁衍生息、汇合交融之舞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通道，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开发，并肩斗争，抵御外来侵略，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正是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由此产生并不断加强了政治上的统一；

正是各民族人民生死与共，亲密团结的友谊，极大地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得到充分的体现，尤其是西域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动人心魄。如突厥族名将阿史那社尔在公元647年被任命为昆山道大总管，率大军“平龟兹、破五城、谕降小城七十余”，“南疆定、复四镇”，功勋卓著；铁勒族名将契苾何力、回纥将军婆闰等在唐统一西域的平叛战斗中，都立下了卓越功勋，起了特殊的作用。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河西被吐蕃占领，西域与中央政府联系隔绝的情况下，汉族将士依靠西域各族人民和爱国首领，共同抗击吐蕃入侵，坚持斗争近30年。这些少数民族爱国首领主要有：于阗王尉迟曜、疏勒王裴冷冷、龟兹王白怀、焉耆王龙如林等人。他们为保卫祖国边疆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楷模，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受到后人百代传颂，长思久仰。



唐代西域屯田简表

屯田地名		开始时间		屯田人数	屯田亩数	备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伊州	哈密地区	贞观四年	630年	3 000	5 000	公元630年，唐伊吾军屯田于此。“伊州一屯”即5 000亩。
西州	吐鲁番	贞观十四年	640年	5 000	5 000	公元640年,唐天山军屯田于此。“西州一屯”即5000亩。
焉耆	焉耆	贞观二十二年	648年	4 000	3.5万	公元648年置焉耆都督府，始屯田，高宗时种地35万亩。
龟兹	库车	贞观二十二年	648年	1.1万	10万	公元648年置都督府，始屯田,后大都护府驻此，宣宗时屯田10万亩。
疏勒	喀什噶尔	贞观二十二年	648年	约3500	3.5万	公元648年置都督府，始屯田,后罢。公元675年再设都督府。“疏勒七屯”,即3.5万亩。
庭州	吉木萨尔	贞观十四年	640年	1.2万	10万	公元640年初置,后罢。658年派军屯田。702年有瀚海军在此屯田10万亩。
碎叶	前苏联托克马克一带	调露元年	679年	万余人	约10万	公元679年,裴行俭率军万余人平定叛乱后,安西都护王方翼在此筑城并进行屯田。
清海	石河子一带	长安二年	702年	千人	约万余	“清海军在(庭)州西七百里,旧名镇城镇,天宝中改为清海军”。唐制小军千人。
						除以上屯田点外,凡唐军驻屯且条件较好的地方,如于阗、轮台等地,均应有屯田。有待史学家进一步考证。



第七章　五代和宋西域屯田的中断

第一节　唐王朝灭亡,五代继起

唐朝末年,政治腐败,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苛征暴敛,强霸民田,人民生灵涂炭,激起了广大农民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各封建割据集团互相争战不已,中原大乱。公元907年,朱全忠废掉唐哀帝,自立为帝,建立后梁,称梁太祖,自此唐亡,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代。

继后梁而建立政权的先后有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和北方的山西,先后立国的有前蜀、后蜀、吴越、南平、南汉、北汉、南唐、闽、越、吴等十个封建割据的政权,史称十国,和五代大体同时存在。这就是中原大动乱、大分裂的五代十国时代。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而称帝,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史称北宋(906~1127年)。逐渐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诸国而基本统一中原。但势力也未及西域。公元1127年,北方的金国攻灭北宋,赵构南逃,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都,史称南宋(1127~1279年),偏安一隅。

五代十国及两宋的王朝,都忙于互相争伐,无暇西顾,其疆域均未能达于西域。

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小国家：契丹建立的辽国(916~1125年)、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1038~1227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1115~1234年),白蛮族为主体的大理国(937~1253年),藏族建立的吐蕃地方政权。



第二节　西辽统治西域

公元791年，吐蕃攻占西域，统治长达半个世纪，屯田遭受严重破坏。

唐王朝灭亡之后，中原呈大分裂之势，十数国并存，这时西域也出现了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其中主要的有：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和于阗王国。

一、高昌回鹘

高昌回鹘又称西州回鹘、和州回鹘。

回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民族。秦汉时称丁零，游牧于贝加尔湖到巴尔喀什湖的广袤草原上。以后逐步向南迁徙到蒙古草原中部的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自称铁勒，北魏人称高车。公元605年，铁勒族人民起义，反对西突厥的残暴统治。公元646年，回鹘首领吐迷度率部配合唐军攻灭薛延陀，占领整个漠北，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强大部落。公元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率军攻杀后突厥乌苏来施可汗，占领突厥故地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南部，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徙牙庭于乌鞬山（今蒙古杭爱山）之东北，建立了回鹘汗国。和唐王朝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安史之乱"时，回鹘汗国作为唐的属国主动派兵参与平叛，并发挥了重大作用。公元839年，回鹘统治者内部矛盾激化，互相残杀，加上"方岁饥，遂疫，又大雪，羊马多死"[①]。当此内外交困之际，早就对回鹘统治者不满的黠戛斯族乘机起兵10万，大败回鹘军，攻破回鹘都城，杀死匾驱可汗，回鹘汗国亡。

回鹘被黠戛斯攻破之后，宰相驱职保护庞特勤率领15个部落西撤到葛逻禄游牧处。后来联合葛逻禄、样磨等族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另一部西迁到河西走廊各地，后称"甘州回鹘"，现在裕固族的祖先；第三支南迁到幽州附近；第四支西迁到北庭（今吉木萨尔）和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在首领仆固俊的率领下，在西州地区与吐蕃展开斗争。公元866年，仆固俊自北庭出击，大败吐蕃大将尚恐热，夺取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要地。吐蕃大将尚恐热被擒杀，回鹘控制了北庭、高昌、龟兹的大片土地，建立了高昌回鹘国。首都设在高昌，最高统治者称亦都护，其意为幸福之主。其疆域东起哈密，北至伊犁河，西至冰大坂（今阿克苏北），南临吐蕃（今和田敦煌间）。

二、喀喇汗王朝

9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在塔里木盆地西缘和帕米尔以北，出现了一个操突厥语系各部落建立的政权，就是喀喇汗王朝。

① 欧阳修撰：《新唐书·回鹘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喀喇汗王朝境内有回鹘、葛逻禄、样磨、处月、处密、奥格拉克、恰如克、乌古斯、粟特人等。其中,回鹘人在王朝的建立、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该王国信仰伊斯兰教。

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包括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河中地区及今新疆的西部。中心有两个,一是楚河附近的八拉沙衮,即唐朝的裴罗将军城;一是喀什噶尔。

喀喇汗朝的首领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头衔往往冠以"桃花石汗"这一称号,如桃花石汗·伊不拉欣、桃花石汗·胡赛音、桃花石汗·纳斯尔等。桃花石汗就是中国汗的意思。《突厥语大词典》作者马赫木德·喀什噶尔说:"桃花石——此乃摩秦的名称,秦距离契丹有四个月的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桃花石;中秦契丹;下秦为八儿罕。"八儿罕就是喀什噶尔。

三、于阗王国

于阗在两汉时候,就是西域的大国,9世纪时,仍是一个独立的王朝。

据公元872年于阗王给沙州节度使张议潮之侄的信件称自己是 "大于阗汉天子"来看,当时的于阗也是一个独立政权,曾经称过"金国",10世纪初称"大宝于阗国"。公元938年,大宝于阗国的国王是李圣天,在本族称尉迟娑缚婆。是年,李圣天派马继荣到后晋朝进贡,后晋派张匡邺、高居诲使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国王,后来曾派使臣到宋朝进贡。

回鹘于公元840年前后西迁的时候, 有一支到了于阗的新复州, 在此居住下来。于阗国信仰佛教。喀喇汗王朝信仰伊斯兰教。为强迫于阗也改信伊斯兰教,双方进行了数十年的战争。于阗得到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和吐蕃的支持,喀喇汗王朝得到萨曼王朝的支援。双方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战争,伤亡惨重。佛教军队曾一度攻占喀什噶尔。后来战争的主动权又转移到喀喇汗王朝手上。到1001年(宋咸平四年),于阗才被波格拉汗·哈仑的儿子喀的尔汗·玉素甫所攻占。从此,于阗成了喀喇汗王朝的一部分,并且改宗了伊斯兰教。

公元1134年,西辽耶律大石派军西征,以肖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率7万骑兵东征,首先进攻喀喇汗王朝首都喀什噶尔,喀喇军不战而降,东喀喇汗国亡。接着西辽军南下攻占于阗。又回军占领高昌回鹘。公元1134年,西辽军攻灭西喀喇汗国。至此,西辽占有西域,三国亡。

从西域多国并立到西辽占领期间,西域屯田中断,前后共370多年。





第八章　元代西域屯田

第一节　蒙古的兴起与统一西域

蒙古唐时称“蒙兀室韦”，两宋、辽、金时史籍上名“萌古”、“朦骨”、“蒙古里”等，游牧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南一带，以后西迁到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与蒙古族同时分布在漠北的有：塔塔儿部、汪古部、乃蛮部、克烈部、蔑尔乞部、弘吉剌部、斡亦剌惕部（明代称瓦剌）。蒙古与各部大都过着游牧的生活，一些与汉人接壤的如汪古部，学会了种植。

辽朝统治时期，鞑靼成为草原上的强大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威胁辽朝，蒙古部落也受其压迫。金朝统治时期，蒙古各部落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成吉思汗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1162~1227年），是蒙古部落集团内孛儿只斤部首领也速该的儿子。9岁时，其父死，也速该家族败落，遭泰赤乌部袭击，将铁木真捕去，带枷在部众中游行。及长，在克烈部的支持下，先后击败了蔑儿乞、扎答阑、泰赤乌以及塔塔儿部，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铁木真在战争中英勇善战，屡立奇功，因而在蒙古草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此时，铁木真遭到克烈部王罕的疑忌，受到了袭击，从此联盟决裂。铁木真经过认真准备，突袭克烈部，大胜，王罕死。1204年4月，在杭爱山以少胜多大败乃蛮部，太阳汗战死，其子屈出律逃西辽。其他各部



图34　成吉思汗像

慑于铁木真的威力纷纷归降。至此，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1206年各部落的贵族在鄂嫩河畔举行大会，公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正式建立军事奴隶制的蒙古汗国，其疆域迅速扩展，横跨欧亚。

建国后，成吉思汗在蒙古建立了分封制度。他将开国功臣95人授为千户长，木华黎、博尔术、纳牙阿、豁尔赤四人授为万户长，给予封地，贵族世袭。其封地不按原来血缘关系的部落、氏族划分，而按地域划分。区内牧民被编为十、百、千、万户，由千户长、万户长率领，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凡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皆为士兵。设左、中、右三军。为了加强成吉思汗的地位和权力，组织了一支万人的“怯薛”军，即护卫军。这是一支主要从贵族子弟中选拔的身强力壮、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由大汗直接掌握。平时保卫大汗，战时随大汗出征。

蒙古汗国相继颁布了《大札撒》，即法令和法典，设断事官，创立了蒙古文字。

1207年，成吉思汗派其子术赤去征服“林中百姓”，即北方部落。斡亦剌惕部的首领忽都合别乞向蒙古投降，并协助术赤先后征服和招降了斡亦剌、秃马惕、不里牙惕、巴尔浑、秃巴思(今土瓦，即唐努乌梁海)等十余个部落。编为4 000户，仍任忽古合别乞为首领，并以叶尼塞河上游的谦州为中心，驻兵屯守。

一、畏兀儿的归附

畏兀儿亦称西州回鹘，宋时称为高昌。其疆域北兼北庭，南临大漠，东邻甘肃，西至库车，都于高昌(火州)。当时称臣于西辽，西辽派驻高昌的官吏称“少监”，其人“恣睢自擅”。征收赋税，搜刮财物，凌辱高昌官员，畏兀儿人不能堪。亦都护(高昌国主)巴尔术阿而忒的斤闻成吉思汗灭乃蛮，降“林中百姓”，称雄大漠南北，及与大臣商议，杀西辽少监，于1209年遣使上书成吉思汗：“愿率部众为臣仆。”表示归附。帝喜，赐大红衣金带以宠之。其后二年入朝，太祖使“尚公主，且得序于诸子”[①]。“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后率部万人从征，“纪律严明，所向皆捷”[②]。

1211年，葛逻禄部海立押与阿力麻里的首领也先后降蒙古，这就为征服西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二、灭西辽

被成吉思汗打垮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逃到西辽。其时西辽统治者直鲁古是一个昏聩荒淫的人，屈出律趁机篡夺了西辽的王位，并出兵征服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诸地。这些地方的人民，信仰伊斯兰教，屈出律强令人民宣誓，舍伊斯兰教而改奉景教或佛教。兵下和田时，人民不从，则杀教长以震慑。加上横征暴敛，激起人民反对。成吉思汗得知屈出律夺取西辽王位，因宗教问题而失民心，加

① 宋濂撰：《元史·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松雪斋文集》。



之畏兀儿、葛逻禄部的归附,于是决定灭西辽。

1218年派大将哲别领兵2万向西辽进军,传檄各地,宣布信仰自由。各地人民纷纷杀死屈出律的守卒,投附蒙古。屈出律自知已失民心,不敢恋战。哲别兵未至,便弃喀什噶尔而逃,从者仅三人,在撒里黑忽纳的地方被捉获处死。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诸城望风归附,西辽灭。蒙古军占领西域,开始闻名于世的西征。

三、三次西征

(一)第一次西征

花剌子模是中亚强国,其疆域:东北跨锡尔河,东南抵印度河,北至里海,西邻根达(今伊拉克巴格达),东限帕米尔高原。苏丹为穆罕默德,都于撒马尔罕,拥兵40万,称霸一方。1218年有花剌子模三名商人运绢来蒙古,太祖厚待之。临归,修书与花剌子模国王,愿结友好。并命令由亲贵组成450人的商队,带着大批财物,随中亚商人去经商。到讹答剌城(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东北),城主哈只儿只兰秃是王母之弟,贪婪商队财物,便诬指商队为奸细,国王命杀之。逃者只一人,归报成吉思汗,太祖震怒,决心征讨花剌子模。

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军20万西征。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和大将速不台、哲别等随行,派兵修好阿尔泰山的道路,在天山西部的果子沟劈山、筑路、架好桥,蒙古西征大军直指中亚,分四路进攻花剌子模。蒙军所至,迭下名城,大肆杀戮。经过三年的征战,先后攻克讹答剌城、不花剌、玉龙杰赤、马鲁及首都撒马尔罕,花剌子模国亡。成吉思汗征服了中亚,在各城设置达鲁花赤(断事官),管理中亚各地。

哲别率军绕里海,逾太和山(即高加索山),入钦察。1223年5月,在铁儿山会战,大败斡罗斯各国联军8万多人。率军东归,收降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康里国。

(二)第二次西征

1235年,窝阔台大汗派术赤之子拔都为统帅,率蒙军15万人进行西征。从征者有窝阔台之子贵由,拖雷之子蒙哥,察合台之孙不里,以及诸王、驸马、将军,万户各以长子从行,史称"长子出征"。选名将速不台为先锋。大军西征,连战皆捷。先后攻克也烈赞(梁赞城)、莫斯科、乞瓦(今基辅)等数十名城,征服了钦察(今里海北),占领了俄罗斯,并进入孛烈儿(今波兰),大败德、波联军,南破匈牙利、奥地利,直抵意大利,兵临亚得里亚海。此时突然传来窝阔台大汗死讯,拔都决定回师。1243年初,到达伏尔加河的萨莱(今阿斯特拉罕城附近)。拔都在此建立了金帐汗国,扩大了钦察汗国的疆域。

(三)第三次西征

1253年,蒙哥大汗派三弟旭烈兀统军西征。征战四年,先后攻灭了木剌夷(里海南,今伊朗境内)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攻陷巴格达,黑衣大食亡。还进入了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地。在三次西征的基础上，建立了伊儿汗国。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结束了草原上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使复杂众多的部落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建立了蒙古贵族政权，制定军事、政治、法律等制度，开始使用文字，从而加强了经济、文化的联系，对蒙古的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蒙军三次西征，使蒙古汗国东起太平洋，西迄地中海、波罗的海、多瑙河，北至北冰洋，南临印度洋。驿站遍于全国，使中西通达，促进了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

第二节　蒙元对西域的统辖

蒙元疆域，横跨欧亚，成吉思汗西征，西域是蒙军的前进基地。以后诸王为争夺大汗位而发动的叛乱，西域又是主要战场，对西域的战略地位，都异常重视。从成吉思汗到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对西域进行管辖的主要措施有：

一、分封汗国

成吉思汗晚年，西征回到和林后，于1225年春，将其征服的土地形成的蒙古汗国，分封给四个儿子。

钦察汗国，封给长子术赤，于里海之北，辖有原康里及钦察诸国旧壤。后来，其子拔都西征，被征服的俄罗斯诸国亦属于钦察汗管辖。建汗帐于萨莱，又称金帐汗国。

察合台汗国，封给二子察合台。即原西辽之故壤，位于阿姆河以北，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葱岭内外，焉耆以西的塔里木盆地皆属之。汗帐建立于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

窝阔台汗国，封给三子窝阔台。原乃蛮之故地，辖有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东南，阿尔泰山区域，包括塔城及阿勒泰地区和蒙古的西部，汗帐设在叶密立城（今额敏县东南）。

伊儿汗国，宪宗蒙哥命其弟旭烈兀西征后，以其所征之地建立伊儿汗国。辖阿姆河以西南至于阿拉伯、小亚细亚之地，包括原波斯、大食等国。建都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

四子拖雷，依蒙古风俗，称幼子为“斡赤斤”，意为“守灶”，即承袭家产之意，故封于蒙古本土，都于和林。

高昌回鹘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由于及早降附蒙古，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优待，让“仍领其地及部民”。

在封地中，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征收赋税。地方军政则由蒙古本部的大汗委派官员去治理。



先后分封的汗国中，察合台和窝阔台汗国的大部，畏兀儿地的全部，均在西域。

二、设置达鲁花赤

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和中亚之后，就在这些地方设置达鲁花赤(断事官)，意即总辖长官，位居当地官员之上。由蒙古人(少数色目人)担任，以建立蒙古帝国的统治。

据《元史》卷1记载："太祖十八年(1223年)夏，避暑八鲁弯川。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剌之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和田、喀什噶尔、叶尔羌、古先答邻勒(今库车)等城，设有蒙古人担任的达鲁花赤。最早归附成吉思汗的畏兀儿地，亦于太祖六年(1211年)"置达鲁花赤监之"[①]。

元朝建立之后，汉人不能任正官。多数行政机关及各路、府、县，均设有蒙古人充任的达鲁花赤，以掌印办事，握有实权。

三、设置军政机构

蒙哥汗即位后，为了巩固帝国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于1251年，设置别失八里行省，执掌西域的军政事务。"宪宗元年六月，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②]

行中书省是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简称行省，《元史·百官志七》称："行中书省，凡十，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省都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至元二十四年，改行尚书省。"行省的主要官员有丞相一，平章二，左、右丞各一，参知政事二员。

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为了对付海都的叛乱，设立了阿力麻里行省。

设置宣慰司。"至元十八年(1281年)，立别失八里宣慰司都元帅府，兼领哈剌火者。适公直入观，进辅国上将军，即拜别失八里都元帅。"[③]"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④]可知宣慰司是行省和郡县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以后分别在和州(今吐鲁番)、斡端(今和田)设置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各地的军政事务。

在畏兀儿地还设立提刑按察司、交钞提举司等司法、财赋机构，计亩征税，发行交钞，一如内地。

① 柯劭忞撰：《新元史·地理志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宪宗纪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綦公直传》。
④ 宋濂撰：《元史·百官志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四、建立驿站

为了加强西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及军政上的需要，元朝在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古丝绸之路南北两线，设置了新的驿站。北路以别失八里和彰八里（今昌吉）为枢纽之地，由当地官员负责管理。“至元十八年（1281年）立自太和岭（今山西省雁门以北）至别失八里三十处新站。”[①]“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立别失八里驿传。”[②]同年“置畏兀儿驿六所”[③]。

南路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一直到沙州，与河西走廊的驿站相连，设置了13个水站和一些驿站。“至元十一年（1274年）立于阗、鸦儿看（莎车）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站二”[④]。“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立罗不（若羌）、怯台（且末西南），阇鄽（且末县）、斡端（和田）等驿。”[⑤]马可·波罗就是从中亚经过这条路到达大都的。

五、组织屯田

是元朝政府在西域进行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供应和恢复生产。

第三节　元代西域屯田

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屯田，大力倡导：“古者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有国者善用其法，则亦养兵息民之要道也……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⑥]由于中央政府将屯田当作“养兵、息民、守边”的重要任务来推行，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

元代西域的屯田，是在平叛战争中进行的。屯田是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服务的。时间虽短暂，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1260年即大汗位后，积极主张改革。

蒙古军队在攻金的战争中，每占一城，即进行残酷的屠杀。如在攻陷保州（河北保定）、密州（山东诸城）、卫州（河南汲县）时，除工匠留下，其余一律进行屠杀。还大量掠夺“驱口”，即奴隶，“掠者私其主”。蒙军所过，人被杀，城被毁，财物一

① 宋濂撰：《元史·世祖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世祖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宋濂撰：《元史·兵三·屯田》，中华书局，1975年版。



空，禾苗践踏，耕畜抢走，改农田为牧场。甚至有人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经耶律楚材反对而未行[①]。忽必烈称帝前，曾受命管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延揽汉族知识分子作幕僚、谋士，逐渐认识到"杀人夷城，毁农为牧"的办法是野蛮落后的。主张"改汉制、用汉法"。即大汗位后，下令停止毁农改牧，把许多牧场重新还作农田。用租佃的方式招募农民耕种，有些土地则退给了农民。还下令停止掠人为奴，把一些掠夺来的"驱口"，释放为良民。提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此设立了司农司和营田司等机构。这些改革的主张，显然是进步的，是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但是却遭到了守旧派贵族的强烈反对，他弟弟阿里不哥主张要"坚守祖宗之法"，逐水草而居。1260年5月，起兵进攻忽必烈。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

1268年窝阔台汗海都发动叛乱。海都是窝阔台的孙子。1269年在塔拉斯召开的西北部蒙古诸王大会上，宣称"以汉化为异"，决定"要保持传统的蒙古生产方式，继续游牧在草原上"。并举海都为盟主，与察合台汗都哇（察合台之孙）相勾结，发动叛乱。叛军所至，大肆劫掠，滥杀无辜，毁农为牧。元军平叛，每克一城，则兴水利、举屯田、恢复生产。平叛战争长达40余年，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战役。最后大败叛军，实现统一。元代西域的屯田，就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是为平叛战争服务的。其分布地区分述如下：

亦里黑屯田区

亦里黑，元代又称亦力八里、益离城，在伊犁河谷，阿力麻里附近。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后，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是察合台汗国的首都。地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腹地。海都叛乱后，这里变成了元军与叛军交战的前线。

有关伊犁河谷阿力麻里附近的亦里黑屯田，史籍仅发现一条记载：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徙成甘州新附军千人屯田中兴（今宁夏银川），千人屯田亦里黑"[②]。

从史料本身研究，亦里黑屯田属于军屯性质。"徙成甘州新附军千人屯田"，这是很清楚的。其规模，若以每人种田50亩计，共屯田5万亩。伊犁是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元政府在此兴屯田，当然是非常适宜的。但值得提出的疑问是：阿力麻里原是察合台汗国的首都，怎么变成了元军的屯田基地？其次，至元十四年昔里吉叛，对亦里黑屯田有多大影响？其三是至元二十三年元军是否可以在此屯田？

关于第一个问题：阿力麻里何以由察合台汗国的首都变成了元军的屯田基地呢？这和海都与察合台汗结成联盟，对元军发动突然袭击，在漠北进行的"和林战役"有关。

1260年4月，忽必烈即大汗位。5月，其弟阿里不哥发动叛乱，窝阔台汗海都曾

① 宋濂撰：《元史·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世祖纪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给予支持。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海都退回到其在叶密河畔的封地，做再度举事的准备。

海都是窝阔台嫡孙，善用兵，“非常机智且有策谋”①。他对没有西部诸王参加的库勒尔台大会上当了大汗的忽必烈，非常不满，认为自己应该继承大汗。于是与察合台汗八剌（其后是都哇），结成联盟，在术赤系钦察汗诸王的支持下，公开发动叛乱。

海都叛乱后对元世祖忽必烈的首次大规模进攻，是至元五年（1268年）对哈喇和林的突然袭击，即“和林战役”。当时在哈喇和林镇守的是忽必烈的皇子、北平王南木合，他率领强大的骑兵团驻守在大蒙古汗国的古都。海都亲率慓悍的叛军与北平王南木合所统元军展开了激战。《元史·地理志六》对这一战役有简要的记述：“至元五年，海都叛，举兵南（实际是东）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哈喇和林），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对这一战役，马可·波罗的传记较为详细：“如果用一句话说，这是鞑靼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最残酷的战争……就仅仅在这一天里，不知有多少妇人成了寡妇，多少儿女成了孤儿。”战斗异常激烈。“当海都听到敌方可能有强大的援军到来的情报后，认为不宜恋战而公开地收兵退却。但南木合的军队也疲惫到了无力追讨的程度。对其（指海都）实际上进行追击的，是由于其后得到了新的生力军的缘故。”②这一战役，海都大败，狼狈西逃，连他设置行营的阿力麻里也失陷了，又远遁2 000余里。元军追到阿力麻里的时候，忽必烈下令停止追击。于是元军驻守于此，以防海都再犯。为了加强平叛前线的领导，至元八年（1271年），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自北边，“建幕廷于和林北（实际是西）野（阿）力麻里之地，留七年”③，防止海都进犯。于是察合台汗国的首都变成了元军的屯戍基地。

按元制，“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军进占阿力麻里，当即组织屯田。否则，在大漠横亘，遥远的边疆驻屯重兵，其粮饷供应是难以解决的。亦里黑屯田开始的时间，不是至元二十三年，而应是至元六年（1269年）前后。从现有史料看，阿力麻里附近的亦里黑，很可能是元军在新疆最早的屯田基地。

关于第二个问题：至元十四年昔里吉叛，对亦里黑屯田有多大影响？

北平王南木合于至元八年（1271年）在阿力麻里建立前线司令部后，威震边陲。至元十年，“十二月，诸王孛兀儿出率所部兵与皇子北平王合军，讨叛臣聂古伯，平之，赏立功将士有差”④。察合台汗八剌死后，汗位一分为二，一面给了支持忽必烈的聂古伯，一面为海都所扶持的都哇所据，这是至元七年发生的事，到了至元九年，聂古伯又倒向了海都。元廷大惊，派兵征讨，取得胜利。可见元军在此

① 《多桑蒙古史》第二卷。
② 《西回鹘国史的研究》。
③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世祖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驻有强大的兵力，并有效地控制着边疆的局面。但时过四年，一件重大的事件发生了。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击右丞相安童，诱胁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纳，东道诸王亦弗从，遂率西道诸王至和林城北。诏右丞相伯颜帅军往御之”①。

这一事件对元政府西部前线影响甚大，这是无疑的了。但昔里吉劫北平王，诱胁西部诸王发动叛乱后，驻阿力麻里的元军怎么样了？亦里黑的屯田命运如何?阿力麻里是否放弃？日本安部健夫先生所著《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一书中认定：元军前线司令部解体了，后撤了，自然阿力麻里被叛军占领，亦里黑的屯田当然也就停止了。笔者认为：元军前线司令北平王南木合被劫，司令部解体，一部分元军随着诸王昔里吉叛变而去，另一部分仍在原地坚守，阿力麻里并未放弃。其根据是：(1)诸王昔里吉叛乱后，并未占据阿力麻里，而是“率西道诸王至和林城北”。(2)海都对昔里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不热情，“海都弗纳”。看来诸王昔里吉在叛乱前并未与海都协商，以联兵反对忽必烈。事后也未见海都率军占领阿力麻里的记载，同时也未见有可信的元军放弃阿力麻里的史料。(3)根据《新疆图志·军制一》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置阿力麻里元帅府，领天山北路(驻伊犁)。”时隔五年，元政府在阿力麻里组建了一个权力很大的、统帅天山北路元军的元帅府。看来，至元十四年到至元十九年，虽然发生了昔里吉叛乱事件，但元军与海都叛军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基本变化，这里仍有部分元军驻屯。据此，可以认为亦里黑屯田，受到重大挫折，但还在坚持，到至元十九年又有了很大发展。

关于第三个问题是至元二十三年元军是否可以在亦里黑屯田?

《新疆屯垦史》提出了这一疑问：至元二十三年在亦里黑屯田“是使人怀疑的，其时海都和都哇叛军正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亦里黑在察合台汗国首都阿力麻里门口，属于叛军基地，元军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屯田”。

这主要是指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海都叛军大败元军于洪水山(今玛纳斯县境)，元军损失巨大，这是事实。在战争中，一城一地的得失，一个战役的胜负，乃兵家常事，特别在元代，元军和叛军均以骑兵为主，行动迅速，突发性强，洪水山战役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发生，而元军“援兵不至”而造成的。这时的战场，呈现着犬牙交错的情况。例如至元十二年都哇叛军围攻哈喇火州六个月，而阿力麻里的前线司令部仍驻西部伊犁河谷一样。

元政府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后，腾出手来经营西域，不断调兵遣将，加强西部军事力量，至元十七年(1280年)，命都元帅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前一年命诸王阿只吉镇别失八里，统帅西域元军。十九年设阿力麻里元帅府(驻伊犁)。元政府在这段时间，不断增兵西域，选派名将进驻。至元二十年

① 宋濂撰：《元史·世祖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三月"遣阿塔海戍曲先,汉都鲁迷失帅甘州新附军往斡端"①。二十一年元军大将土土哈击败海都于漠北。从以上形势分析,二十三年(1286年)元军在亦里黑进行屯田是可能的。

别失八里屯田区

别失八里,突厥语,"五城之意"。元代又译为别石八里、别失把、鳖思马等名。唐时名庭州,北庭大都护府就设在这里,是唐代重要的屯田地区。元时是畏兀儿首府(夏庭),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统辖全疆军政事务的行尚书省就设于此。现在吉木萨尔县城北,仍有古城遗址。

诸王海都叛乱后,别失八里成了抵御叛军进攻的军事要地。元政府在此驻屯大军,进行屯田。史籍有关屯田的记载有: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命阿只吉建牙别失八里镇之。辖天山南北路畏兀儿,哈喇火者及哈密力等处屯戍军事"②。

1280年元政府派辅国上将军綦公直率军戍别失八里。《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七年,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綦公直因领汉军南征,累立战功。十八年"升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宣慰使、镇别失八里"③。万户是什么?据《元史·百官志七》称:元袭金制,为世袭军职,驻于各路者,则分别属于行省,设万户府以统领千户所。"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正三品……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之上。"别失八里为平叛前线,綦公直任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兼万户,管军当在七千之上。

至元十八年(1281年)"秋七月甲午朔,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失八里"④。

至元十九年(1282年)"赐(李进)虎符,复进怀远大将军,命屯田西域别石八里"⑤。

至元十九年二月,元政府"给别失八里元帅綦公直军需"⑥。



图35 车师古道

① 宋濂撰:《元史·世祖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阿只吉传》。
③ 宋濂撰:《元史·綦公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世祖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宋濂撰:《元史·李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宋濂撰:《元史·世祖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至元十九年五月"元帅綦公直言：'乞黥逃军，仍使从军，及设立冶场于别失八里，鼓铸农器'，从之"[①]。

至元二十年(1283年)二月，元政府"给别失八里屯田军战袄"[②]。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冬十月，"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十一月又"遣蒙古千户曲出等，总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失八里"[③]。1289年因海都叛军再次兴兵侵袭，元政府被迫暂撤别失八里屯田。"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罢蒙古侍卫军从人之屯田者，别以斡端、别失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两翼新附军，与前后二卫迤东还戍士卒合并屯田，设左右翼屯田万户府以领之，遂于大都路、霸州及河间等处立屯开耕。"[④]

从以上史料研究：

1.别失八里屯田规模。

元制，上万户府管军7 000之上，别失八里是元时防止海都、都哇叛乱的军事重镇，所以命诸王阿只吉坐镇，辅国上将军、都元帅綦公直驻统，加上不断出兵的记载看，驻军当在万人以上。在平时，若以一半戍守，一半屯田，则达5 000人。别失八里每人种地多少?史无记载。但据《元史·兵三》对大都(北京)附近各侍卫亲军屯田记载，每士卒屯田数为：左卫、右卫屯军各2 000人，屯于东安州永清县、益津等地，各种地1 301顷。每顷百亩，人均种地65亩。

中卫屯田于武清、香河等县，屯军2 000人，种地1 037顷，人均种地52亩。

后卫屯田于昌平县，2 000人种地1 428顷，人均种地71亩。

别失八里土地广阔，每人屯田当在50亩以上，若以5 000人计，其规模在25万亩以上。

《元史·世祖九》载：至元十九年五月，据綦公直反映："别失八里城东三百余里蝗害麦。"可见奇台、木垒一带均有屯田。

2.关于屯田时间。

上述史料记述别失八里屯田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共七年时间，实际上要更长。

屯田开始时间应是至元十六年 (1279年)，"诸王阿只吉建牙别失八里镇之，辖天山北路……等处屯戍军事"。元军西线总司令都设于别失八里，当有大军驻屯，并行屯田。

从1279年开始到战争结束祖国统一的1306年(大德十年)共27年时间，屯田受到了一次重大挫折。这就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诸王海都率强大的叛军对元军发动突然袭击。元军统帅伯颜命都元帅綦公直率军迎战于别失八里以西的

① 宋濂撰：《元史·世祖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世祖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兵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洪水山地方，战斗异常激烈，这就是洪水山战役。战役开始，元军胜，“败之（打败海都叛军），追击浸远”。但是后来战斗发生了变化，由于元军“援兵不至，（綦公直）第五子瑗力战而死，公直与妻及忙古台（元军将领）俱陷焉”[①]。怀远大将军李进也参加了这一战役，“海都及笃哇等领军至洪水山，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被擒，从至掺八里，遁还。至和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②]。这一役，元军大败，一个都元帅战死，一个怀远大将军，一个定远大将军被俘，可见元军损失之大。

西部元军还未恢复元气，东部宗王乃颜联合东部诸王起兵10万，发动叛乱。忽必烈不得已，集中兵力东征平叛。在辽河的失剌斡耳朵地方，两军鏖战。马可·波罗记述这次战役写道：“双方发矢蔽天，有如暴雨，骑卒坠马而死，陈尸满地。”乃颜兵败被擒。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才将参与叛乱的诸王彻底歼灭。海都与都哇趁元军主力集中于东部之时，对西域的元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这一段时间，关于别失八里的命运，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元政府在北方坚守别失八里，在南方控制塔里木盆地南边各地。”一种意见认为：“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海都叛军攻占了别失八里、斡端等地。”

有关这一段时间，史书有如下记述：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罢蒙古侍卫军从人之屯田者，别以斡端、别失八里回还汉军……合并屯田……遂于大都路、霸州及河间等处立屯开耕”[③]。

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孛罗带上别失八里招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④]。

至元二十六年九月，“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⑤]。

至元二十六年看不到元军在西域征战、屯田的记载。而是有别失八里、斡端回还汉军到大都附近的霸州、河间屯田；别失八里的招集户到甘肃求救济；罢斡端宣慰使。根据当时元军主力东调平叛的情况和史籍资料分析，别失八里可能是失守了。

从至元二十八年平定乃颜叛乱后，迅速西调元军主力于西域，与海都进行争夺。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定远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明安，“战于别失八里秃儿古阁，有功，贼军再合四千人于忽兰兀孙，明安设方略与战，大败之”[⑥]。这是明安将军于1292年在别失八里附近打了一个胜仗，说明此时元军已收复了别失八里。1293年元龙虎卫上将军土土哈略地金山，败海都，复乞里吉思，师次欠

① 宋濂撰：《元史·綦公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李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宋濂撰：《元史·兵志三·屯田》，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宋濂撰：《元史·明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河，冰行数日，尽收五部之众，屯兵守之。1295年(元贞元年)，立北庭都元帅府及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以统天山南北路的元军。以后元军主力，源源西调西域，直至1301年(大德五年)，海山率元军大败叛军，海都死。1303年都哇求和："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成宗许和。1306年窝阔台汗国并于察合台，都哇死。元成宗命其子宽都袭汗位，全国重新统一。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起，元军在别失八里的屯田逐步恢复和发展，直至祖国统一。

关于屯田的性质，主要是军队屯田，但也有民屯。《元史》记述：至元二十六年"孛罗带上别失八里招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这是指叛军占别失八里后，对逃到甘肃的招集户民进行救济。招集户民是什么?历代政府都在关内或西域招募农民在西域屯田，我认为这里的招集户民，是指进行民屯的农民。

为了供应屯田所使用的农具，还在别失八里设立冶场，以"鼓铸农器"。说明屯田规模很大，且作了长远打算。

滕竭儿屯田区

滕竭儿又称特纳格尔，是回鹘五城之一。清统一西域后乾隆帝钦定城名为阜康，即现在的阜康市。汉代属卑陆国，后为车师后国，唐代是庭州俱六城守捉所在地，元代称滕竭儿，位于准噶尔盆地的南缘。这里既是交通要冲，又是土壤肥沃、水草丰茂，进行屯田的理想之地。

关于元代在此屯田，《元史·世祖十三》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正月，"给滕竭儿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

从这一条记载中我们可知：

1)1290年元军已击退海都叛军并收复了滕竭儿等地。否则，元政府无法在此组织屯田，给屯田者发放牛、种。从这一条资料看，别失八里很可能在至元二十七年就收复了。

2)在此屯田的是回回，共有3 000户，若以每户种地50亩计，屯田面积当在15万亩以上，其规模是不小的。但回回是军屯，还是民屯?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从7世纪中叶，就开始有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到中国来，历五代至宋末，大多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在西域的很少，进行屯田的就更少了。

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1258年旭烈兀西征大食，攻陷巴格达，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大批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及阿拉伯人迁徙到东方来。其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被俘的妇孺，也有一些社会上层分子和学术界人士，还有来华经商的商人，这些人在元代都被称作"回回"，列为"色目"人的一种，其地位在汉人以上。

到中国的回回军士及一部分青壮年，被编入"探马赤军"。他们参加了忽必烈统一中国的许多重大战役，"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忽必烈在平定海都叛乱的战争中，由回回组成的"探马赤军"也参加了。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此后，一部分在社的组织下，进行屯田。

另一部分“探马赤军”则边守戍、边屯田，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即所谓“屯戍”人户。滕竭儿的回回屯田户，显然是后者。元代滕竭儿屯田，属于军屯性质。

1)“回回屯田三千户”，是整整的三千，显然带有军队特征。元制有“千户”军职，辖“百户”人员。若是从关内招募来的回回，或是中亚自动来此的回回，不可能是整整的3 000户。且西域当时正处于元军和叛军反复争夺的第一线，外地回回是不会冒险来此屯田的。

2)“给滕竭儿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这件事载于《元史·世祖十三》，是与“屯垦戍边”平定叛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是件有关边疆安全的大事，若仅仅是从生产的意义上讲，这一记载不一定会出现在《元史·世祖纪》中。

哈喇火州屯田区

哈喇火州，元代又名和州、火拙、和绰、霍州等名。都是一名异译，今吐鲁番市，古车师前国。公元前48年，西汉元帝在高昌壁设戊己校尉，率数百名士兵在此屯田。唐太宗曾于公元640年在此设安西大都护府。蒙哥汗继位后，在别失八里设立行尚书省，置达鲁花赤（即断事官），统辖西域及邻近地区的军政事务，由蒙古汗国直接控制。畏兀儿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渐转移到哈喇火州。这里是畏兀儿的首府，是反对叛军进犯的军事重镇，故有重兵驻守，并兴办屯田。史籍有关此地驻军的记载：

“蒙古军的第七队驻扎在火州附近”①。第七队有多少人，未说。

“新疆南北两路，去叛王最近，防守犹不容稍疏，至元十二年遣兵千人戍畏兀儿境。”②

除以上驻军外，尚有亦都护直接率领的部队。

据《元史·巴而述阿而忒的斤传》记载：畏兀儿亦都护“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附成吉思汗后，“得序予诸子，与者必（即哲别）、那演（即诺颜）、征罕勉力锁潭（即花剌子模王），回回诸国，将部曲万人以先，纪律严明，所向克捷”。

其孙马木剌的斤嗣亦都护后，“将探马军万人，从宪宗伐宋合州，攻钓鱼山有功，还火州卒……”③

从上述可知，畏兀儿亦都护率军万人，参加了统一中国的战争，且纪律严明，所向皆克，其军队素质是不错的。战时出征，平时应是一面进行战备，一面进行屯田。若以50%计，应有5 000以上的士兵进行屯田。此地水缺，主要靠坎儿井引水种植，每人耕种面积不会太大，若以每人10亩计，屯田面积当在5万亩以上。

哈喇火州屯田也遭受了一次重大摧残，这就是著名的哈喇火州保卫战。

至元十二年（1275年），都哇及其弟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声言曰：‘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尔敢以孤城当吾锋乎’？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简史》第六章，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军制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军制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亦都护曰：'吾闻忠臣不事二主，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也。'凡受围六月不解"。在12万大军围困下能坚守半年，一方面说明亦都护率领军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乡的英勇顽强精神；另一方面也看出屯田有成效，粮食充裕。否则，是难以长期坚持的。久围不下，海都以书击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诸孙，何以不附我？……尔能以女与我，我则休兵。"亦都护为了全城的生命，将自己的女儿"厚载以茵，引绳縋城下而与之"[①]。围始解。英勇的哈喇火州保卫战，谱写了畏兀儿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壮丽史诗。

哈密力屯田区

哈密素称"嘉关锁钥，西域襟喉"。元代称哈密力、哈迷里、渴密里等名。

1209年，高昌畏兀儿降成吉思汗，太祖"命其仍居故地并合密之地以封之"[②]。自此哈密力成为蒙古汗国的一部分。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命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建牙别失八里，节制在西域的元军，"兼辖哈喇火州及哈密力等处屯田事务"[③]。这是元代哈密力最早关于屯田的记载。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哈密城主"的斤帖林以己赀充屯田之费，诸王阿只吉以闻，敕酬其直"[④]。哈密城主自愿捐款资助驻军屯田，说明屯田受到了哈密城主及人民的支持。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为了加强哈密力驻防兵力和屯田的力量，元政府于十一月"以别失八里汉军及新附军五百人屯田合迷玉速曲之地"[⑤]。每人种地以50亩计，屯田面积约在2.5万亩左右。如果加上原有屯田面积，数字还要大。

由于海都叛军的袭扰和破坏，加上连年干旱，哈密力"种不入土"，人民食不果腹。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命河西总管爱牙赤从哈密"屯田余粮给之"[⑥]。说明屯田除自给外尚有余粮，效果是不错的。

哈密力的屯田曾受到海都叛军的袭扰，严重的一次是，"北方军(指海都军)猝至，兵力尚寡，(亦都护火赤哈儿)大战力尽，遂死之"[⑦]。海都叛军突袭哈密力，亦都护(即率领军民坚守火州六个月的畏兀儿亦都护)"矢尽众歼，执节死之"。当然屯田也遭到严重破坏。这一事件发生在哪一年？有多种说法，有的学者称是发生在至元二十三年，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是"至元十九年或二十年初"[⑧]，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① 宋濂撰：《元史·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王树枏等著：《新疆图志·军制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阿只吉传》。
④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 《高昌王世勋之碑》。
⑧ 〔日〕安部健夫著：《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曲先屯田区

曲先，元代又称苦先、曲鲜、苦叉。今库车。汉、唐名龟兹，是古丝绸之路名城，军事重镇，重点屯田基地。海都叛乱后，曲先是防止叛军进犯的前哨阵地，元政府派重兵驻此，并行屯田。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一月"分元帅綦公直军戍曲先"①。元帅、万户綦公直原驻别失八里，1282年底调曲先镇之。

至元二十年（1283年）三月"遣阿塔海戍曲先"②。阿塔海是征宋名将，功授镇国上将军、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可见元政府对曲先的防务十分重视。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置火州、曲先元帅府，领吐鲁番、哈密至玉门、阳关以东，划地分防"③。曲先、火州设立了统帅西域东部元军的司令部。

元贞元年（1295年）正月"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以蚌都察为都元帅，佩虎符"④。

本来曲先于1286年已设元帅府，过了九年（1295年）又设元帅府，这是因为曲先曾经被海都占领过，元帅府被迫撤销。屯田当然遭受一次摧残，其时间约在至元二十六年前后。其后元军反攻，重占曲先，再立元帅府。

大德元年（1297年）七月"罢蒙古军万户府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⑤。

从以上记述看，曲先设有元帅府，重兵驻守，派名将在此统帅。有士卒多少？《元史》未载，但曲先有"万户府"。元制，万户府分上、中、下三级，分别统兵7 000人、5 000人、3 000人以上。根据曲先的战略地位与驻军统帅的资历，此地最少应有元军5 000人以上。在平时若以二分之一士卒进行屯田，每人种地50亩，屯田面积约在7.5万亩左右。

可失哈儿屯田区

可失哈儿，元时又称可失哈尔、合思合、乞思哈儿等名。今喀什。汉时疏勒国，唐时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镇，就在境内。是丝绸之路的名城，南疆的军事重镇。元朝军队在此与叛军进行争战，可失哈儿两次易手。元军在此屯兵防守，并行屯田。

《元史·世祖十二》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元政府"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

至元二十三年，海都叛军大举进犯别失八里，在玛纳斯一带击败元军，猖狂一时，但元军并未撤出西域。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仍在可失哈儿进行屯田。户以种地50亩计，屯田面积约在5万亩左右，可失哈儿以50%计（另50%在斡端），其面积约在2.5万亩上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可失哈儿的屯田，一度遭受叛军的进攻而遭受损失。

① 宋濂撰：《元史·世祖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世祖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军制》，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成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宋濂撰：《元史·成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由于忽必烈亲征，海都西逃，1292年元军收复可失哈儿，立即恢复屯田。并于1293年（至元三十年）七月，元政府"以只儿合忽所汰乞儿吉思户七百，屯田合思合之地"①。乞儿吉思即现在的柯尔克孜族，合思合即可失哈儿。调700户到此屯田，是因叛军侵袭，人民逃亡，田园荒芜，故元政府加强了此地的民屯力量，以恢复生产。每户种地以50亩计，屯田面积约在3.5万亩以上。可失哈儿是南疆军事重镇，应有驻军屯田，可惜不见史载。

斡端屯田区

斡端，在元代又称兀丹、忽炭、忽丹、五端、阔端等名。即今和田。位于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大漠南缘。古于阗国。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名城。东通中原，西达葱岭以西诸国，扼中西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蒙元统一西域，特别是灭宋之后，对斡端大力经营，建成南疆的军事基地。设置军政机构，通驿站驻重兵，大兴屯田。

1.建立军政机构。

至元十九年（1282年）"受诸王合班阿只吉节度，仍置别失八里，哈喇火州、兀丹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②以统辖南疆军政事务。至元十九年是"仍置"，说明在此以前曾设置过宣慰司都元帅府。究竟是哪一年？《新元史·地理志六》记述："忽炭，城名……在倭赤之西，可失哈儿之东南，本兀丹部，又曰斡端。至元中，置宣慰司都元帅府。""至元中"，没有明确哪一年，从字面上看，"至元"共31年。所谓"中"，似指15、16或17年吧。史籍有两条记述可供参考，第一条记载是：至元十六年，"会海都党侵袭天山南路。明年（刘恩）改副都元帅，命偕都元帅也罕的斤帅蒙、汉军征兀丹，在道进都元帅，仍兼宣慰使"③。第二条记载是：至元十六年二月"又发探马赤军一万人，及夔府招讨张万之新附军，俾四川西道宣慰使也罕的斤将之，戍斡端"④。也罕的斤是主帅，至元十六年抵斡端，随即建立都元帅府宣慰司府，是合乎逻辑的。十八年海都叛军进攻，元军退出斡端，都元帅府、宣慰司自然撤销。至元十九年，元军击败叛军，复斡端，重设都元帅府宣慰司，所以称"仍置"。

2.元政府在此驻重兵，与海都叛军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双方兵力之大，时间之长，说明战争是异常激烈的。

成吉思汗于1218年统一西域后，直到1260年，斡端相对稳定了40余年。从蒙古诸王为争夺汗位发动叛乱以来，漠北和西域成了主要战场。特别是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叛乱后，当时元政府正集中兵力灭宋，无力西顾，海都叛军，不时骚扰。

①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昔里吉传》。
③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刘恩传》。
④ 宋濂撰：《元史·兵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元灭宋后，政府不断增兵西域，与叛军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战争。斡端是西域南线的军事重镇，元军不断增兵于此，海都也势在必夺，于是导致了1281~1282年之间的“斡端之役”。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月：“命别速颏、忽别列八都儿二人为都元帅，领蒙古军二千人，河西军一千人，守斡端城。”[①]

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阿老瓦丁将兵戍斡端，给米三千石，钞三十锭”[②]。阿老瓦丁因制炮有功被授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副万户。

至元十六年，调元名将兀浑察“从大军征斡端”[③]。

至元十六年八月，“又发探马赤军一万人，及夔府招讨张万之新附军，俾四川西道宣慰使也罕的斤将之，戍斡端”[④]。增兵1万至斡端。

至元十六年，刘恩入朝，“赏赉有加，授四川西道宣慰使，改副都元帅，帅蒙古、汉军万人，征斡端……师次甘州，奉诏留屯田，得粟二万余石”[⑤]。

至元十八年(1281年)，由于海都军进犯斡端，元军进行保卫，双方调集重兵，展开了“斡端之役”。《元史》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十八年，“命(刘)恩进兵斡端，海都将玉伦亦撒率兵万人迎战，游骑先至，恩设伏以待，大败之。海都又遣八把率众三万来侵，恩以寡不敌众，成师而还”[⑥]。元军撤兵，叛军占领斡端。

元军经过准备，调集大军，对叛军进行了反攻。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将“旦只儿从诸王合班，元帅忙古带军至斡端，与叛王兀卢等战，胜之”[⑦]。从这位将军的传记中，得知组织元军进行反击的司令是诸王合班，元帅忙古带辅之。将军旦只儿参加了这一战役，当然还有许多将军参战，最后取得胜利，收复斡端。这一战役规模很大，叛军出动兵力开始1万，后又增兵3万，共4万。元军出动的兵力，也罕的斤率兵1万(还有新附军，其人数未载)，刘恩将兵万人，别速台、忽别列八都儿二人率兵3 000，阿老瓦丁带兵多少进戍斡端，未载。见于文字的共2.3万人。实际上，元军兵力必超过5万，否则是不可能打败4万海都叛军的。双方投入的兵力，约在9万以上。可见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元军在史书上出现的诸王、名将就有八人之多，可以看出忽必烈对这一战役的重视。海都对斡端之役也势在必胜，开始1万人被元军击败后，迅速增兵3万人，选诸王兀卢指挥，遣骁将八把将兵迎战，占领斡端。次年，元军大举反攻，击败海都，复斡端。随即“设置宣慰司都元帅府”[⑧]，以加强西域南线的军事力量。但海都并不甘心，仍驻兵可失哈儿一带，相机进袭

① 宋濂撰：《元史·兵制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世祖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宋濂撰：《元史·拜延八都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兵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宋濂撰：《元史·刘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宋濂撰：《元史·刘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 宋濂撰：《元史·旦只儿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⑧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普里吉传》。

斡端。据《元史·拜延八都鲁传》载：元军名将兀浑察从征斡端，“诸王术伯命兀浑察往乞失哈里之地为游击军，时敌千余，兀浑察以勇士五十人与战，擒其将也班胡火者以献”。这一战斗证明海都叛军仍在窥视斡端。

3.元政府在斡端兴屯田。

《元史·世祖十二》载：至元二十五年七月“命斡端戍兵三百一十人屯田”。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州、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

从以上两条资料研究：

屯田性质：戍兵300人屯田是军队屯田，1 500户工匠屯田属于民屯。

时间：两条史料均是至元二十五年，仅短短一年。

规模：300军人，每人种地50亩，共1.5万亩。1 500户工匠屯田，一半算在斡端，一半算在可失哈儿，仍以每人种地50亩计，500人种地2.5万亩。军屯、民屯合计，共屯田4万亩上下。

实际上，时间要长，规模要大得多。

从时间上看，速别台、忽别列八都儿二人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月率兵3 600人进戍斡端后，除担任守戍者外，经过准备，于十四年就应开始屯田。直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经叛军侵犯，耽误一二年外，都应有军队屯田。刘恩率部万人征斡端，于至元十六年路过甘州暂停仅一年，就立即组织“屯田，得粟二万余石”。斡端从至元十三年到叛军进攻，中隔四年。再从至元十九年击退叛军，收复斡端，到至元二十五年，中经六年时间，元军是会组织屯田的。否则，这么多军队的粮饷供应如何解决?遭战火洗劫的斡端人民负担不起，靠辽远的河西长途转运，更是无法解决的。

关于屯田规模。由于在战争前线，大部分兵力要备战戍守，就以四分之一的兵力进行屯田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斡端驻军多时在4万以上。以1万人屯田，其耕地面积可达50万亩左右。大军云集斡端，屯田规模小了是无法满足军队需要的。

元将阿老瓦丁于至元十五年正月进兵斡端，为解决部队粮饷供应，元政府给米3 000石。这米是如何从河西走廊运到斡端的?书籍未说。在古代交通不便，运距遥远，途经寸草不生的千里戈壁，其困难情况是可以想见的。阿老瓦丁进驻斡端，立即组织屯田，到第二年“斡端境内蒙古军耗乏”，元政府赐给牛、马、羊及衣服、弓、矢之类，就没有给粮食，说明粮食供应已经解决，屯田取得效果。

阇鄘屯田区

阇鄘，元代又称车尔臣，在今且末县城南。位于昆仑山北麓，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扼中原经斡端到中亚的咽喉。元政府从关内增兵到斡端，就是从这条道上走的。所以元政府十分重视对阇鄘的经营，立驿站、举屯田。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立罗卜（今若羌县）、怯台（且末县西南）、阇

鄜、斡端等驿”[①]。这是政府派大军进入斡端前的准备。立驿站以保证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七月“立阇鄜屯田”[②]。

十二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鄜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③]。

从以上两条史料可以得知,阇鄜屯田,有军屯、有民屯。民屯千人,从河西等处来,从事屯田生产,与汉军、新附军杂居。可见主要是汉族农民。人以50亩计,约在5万亩左右。阇鄜位于古代屯田基地伊循以西,水土充裕,气候适宜,是理想的屯田之地。

关于军队屯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说明军队与屯民一块屯田,可以看出,此地的民屯依附于军屯。军屯规模多大?不详。

除以上九个屯田区外,在天山南北两条驿站中,水土及气候条件适宜于耕种的地方也似应有屯田。《元史·兵志三》载: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月儿鲁官人言……‘臣等议,可于旧驿所设立屯田’,从之”。如南线驿站的罗卜、鸦儿看(今莎车),北线驿站的彰八里(今昌吉)、仰吉八里(今玛纳斯县)等驿站,都适于耕种,如不进行屯田,不但无法满足使者及来往人员的供应,驿站本身人员的粮饷供应也会发生困难。

第四节　哈喇火州与斡端屯田的探讨

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屯田,军屯、民屯遍布全国,其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政府也在西域大兴屯田,但史料则记载甚少,所以留下了不少疑问。例如哈喇火州、斡端屯田终于何时?就是一个谜。这和这两地究竟何时失陷有关。史学界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哈喇火州何时失陷?

《高昌王世勋之碑》记述:“至治中(1321~1323年)与哺达失王同领甘州诸军,且治其部。泰定中(1324~1328年)召还,与宽彻不花威顺王、买奴宣靖王、阔不花靖安王分镇襄阳。”柯劭忞所著《新元史》据此断言:“自此畏兀儿之地入于察合台后王。”[④]屠寄也说:“泰定中召还,自此畏兀儿之地长入于察阿歹(察合台)后王矣。”[⑤]

《完者都史》记述:“到1304年前后,畏兀儿地区的中心要地别失八里及哈喇

①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柯劭忞撰:《新元史·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传》。



和卓都已被察合台汗国所并。"(哈沙尼《完者都史》,德黑兰波斯文刊本,1969年)

《元朝的边疆政策》一文认为:"大德以后,元朝西北方边疆实际上是在火州以东的哈密力一带。"①

《西回鹘国史的研究》则认定:"至元十七年(1280年)前后,首都(指哈喇和卓)被放弃而不顾了。""至元二十年(1283年)前后,哈密力行营也失陷了。"

以上四种说法,四个时间。

第一种说法是"泰定中"。泰定是元泰定帝的年号,共4年。时间是1324~1328年。《新元史》说是"自此",没有明确指哪一年,最迟是1328年,倒是可以明确的。

第二种说法是《完者都史》的结论,"1304年前后"。比第一种论点提早了20余年。

第三种说法是"大德以后"。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共10年,从1297年到1307年。"以后"是哪年?未明确,最早是1308年吧。

第四种说法就更早了,日本的安部健夫先生说是至元十七年(1280年)前后,又比第三种说法提早了20多年。

新疆的史学工作者,有的也接受了其中的观点,如《维吾尔简史新编》接受第一种观点。《新疆屯垦史》则称是1298年(大德二年)。

以上诸多论点,值得商榷。哈喇火州处于战争第一线,元军与叛军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至元十二年(1275年),都哇率叛军12万围火州,亦都护率领军民坚守半年。十七年(1280年)前后,海都叛军曾一度攻陷火州,人民惨遭屠杀,有的流往他乡,焚毁高昌古城,亦都护率领军民到哈密力建行营进行坚持。后来,元军又收复了哈喇火州。从元代中期到末期,哈喇火州一直在元政府管辖之下。亦都护被召还,说明他不能直接管辖畏兀儿地区,这与该地的归属不是一回事,更不能认为被察合台汗国占领了。

据史籍载:"至大四年(1311年),宣徽院准奏……哈喇火拙根底葡萄酒,这几年交站搬运有。为军情勾当的上头立下的站有,交站运呵不中,交骆驼每搬运。又,火根底西番地面做官的每,民户每献到葡萄酒,交自己气力的他每识者,休教铺马里来。"②

泰定元年(1234年)二月"高昌王亦都护帖木儿补化遣使进葡萄酒"③。

同年,元政府"赐北庭的撒儿兀鲁军羊马"。六月"遣诸王阔阔出镇畏兀"④。

至顺元年(1330年)三月"西番哈喇火州来贡葡萄酒"。九月"复立总管府于哈喇火州"⑤。

①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
② 《永乐大典·成宪纲要·驿站》。
③ 宋濂撰:《元史·泰定帝纪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泰定帝纪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宋濂撰:《元史·文宗纪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从以上资料研究看，元政府直到1330年，仍管辖着这一地区，所以才可能“复立总管府于哈喇火州”。才可能“派遣诸王阔阔出镇畏兀”。同时，从三次向元廷进贡葡萄酒来看，道路是畅通的。结论说哈喇火州此时已“入于察合台后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新疆图志·军制一》载：元朝“末季，天山北路为瓦剌部所统，天山南路为别失八里所据。于是创垂所遗，仅有威武王喃忽里镇守哈密等处畏兀儿地，分为柳城、火州、吐鲁番三万户，以万户府统之”。

至正七年（1347年）十月“西蕃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喇火州，劫供御葡萄酒，杀使臣”①。

从上述两条史料得知，直至元朝末季，仍在火州等地设万户府以统之。到1347年，西蕃陷火州，此时元政府政治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布大江南北，元政府忙于镇压起义者，无力收复火州，终于放弃。很可能这是最后放弃。

关于斡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由于海都进占斡端，元政府于九月“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②。有的文章认为，斡端从此失陷了。事实不是这样。战争中，一个城镇的暂时失陷是常事，特别是元军与海都叛军的拉锯战中，双方均以骑兵为主，来去迅速，不少城镇，得而复失，数次易手。斡端失陷后，元政府军又组织力量进行反攻，于1292年重新收复。直到1319年，元政府还管辖着这一地方。据《元史·仁宗纪三》记述：延祐六年（1319年）三月“斡端地有叛者入寇，遣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率兵讨之”。有叛兵入寇斡端，元政府立即做出反应，派兵征讨，可见元政府还是有效地控制着这一地区的。

元政府在全国兴屯田，除有军屯、民屯外，还有乡兵。其任务是出征、戍守和屯田。据《中国民族史》第六编载：“乡兵从事军屯的地区，遍及东北、西北、西南和东南。民族有高丽、女真、畏兀儿、畲、苗等。有的乡兵出戍他方后，即在当地从事军屯活动，如畏兀儿、女真、高丽军就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可以认为哈喇火州在1341年前，斡端在1319年前，是应有屯田的。至少守卫本土的乡兵会进行屯田的。

斡端的民屯，在击退叛军后，也应继续进行下去。

第五节　西域屯田的组织管理

西域屯田有军屯，有民屯，元代西域屯田，主要是在平叛战争中进行的。民屯亦依附于军屯，其管理是以军屯系统为主。随着战争的发展、双方力量的消长，屯田管理也有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 宋濂撰：《元史·顺帝纪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世祖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一阶段：屯田初期。

其管理机构是阿力麻里行尚书省。至元五年（1268年），元军大败海都，追击叛军至阿力麻里，随即开始屯田。这时元军一面戍守防止海都进犯，一面屯田，由军队统一管理。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政府任命安童以右丞相“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出镇北圉”[1]。行尚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分任军民之事，“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2]。这时新疆的屯田，统一由阿力麻里行尚书省管辖。其下则设有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置万户、千户、百户以领之。屯田的基础生产单位是百户所。十人为一牌，设牌头。

第二阶段：屯田兴盛时期。

从至元十七年（1280年）开始，元政府于灭宋之后，腾出手来经营西域，不断增兵于西域，同时加强军政机构的设置。“忽必烈命阿只吉建牙别失八里以镇之，兼辖天山南路畏兀儿哈喇火者及哈密等处屯戍军事。”[3]。先后在九处进行屯田，这是元代屯田的兴盛时期。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政府又“置阿力麻里元帅府，领天山北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置别失八里元帅府（驻乌鲁木齐），领天山南路，又置火州、曲先元帅府，领吐鲁番、哈密至玉门、阳关以东”[4]。进一步加强了对西部元军及屯田的领导。以后根据需要又设置别失八里、斡端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几经变动，但屯田一直坚持到后期。

第三阶段：屯田后期。

元朝末季，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人民起义如火如荼，遍及中华大地，国势倾微，无力西顾。天山北路逐渐为瓦剌所统，天山南路为别失八里所据。“于是创垂所遗，仅有威武王喃忽里镇守哈密等处畏兀儿地，分为柳城、火州、吐鲁番三万户，以万户府统之。”[5]这是在万户府管辖下的军屯，但已近尾声矣。

西域的民屯大多依附于军屯，在阇鄽、斡端、可失哈儿、亦里黑、别失八里等地曾进行民屯。元政府曾征调柯尔克孜人到可失哈儿屯田，招募汉族农民到阇鄽屯田，组织工匠到斡端、可失哈儿屯田，蒙古贵族在征伐华北的战争中，俘获了许多汉族农民，其中一部分被迁到准噶尔盆地的南缘适于耕种的地区进行屯田，如孛罗（博乐）、彰八里（昌吉）等地种植小麦、黍、谷、稻等。特别是昌吉“广种稻麦，盛产瓜果”。从蒙元时期起，虽经战乱，但仍一代一代延续下来。

民屯的基层组织是社。元制，“凡五十家立一社，择年高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督促农民开垦耕作，修理田渠，经营副业。“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

① 宋濂撰：《元史·安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百官志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阿只吉传》。至元十四年，昔里吉劫北平王南木合，西北军中无主，元政府命阿只吉为西北诸军统帅，时间应在至元十四年以后。《哈密志》称是十六年。
④ 王树枏等著：《新疆图志·军制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⑤ 王树枏等著：《新疆图志·军制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十年，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① 可见“社”不仅是农民种田的基层组织，而且是民屯，以及探马赤军屯田的基层组织。

元政府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立奖惩制度，（大德）十一年“申扰农之禁，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②。

西域军队屯田属元中央政府枢密院管辖，《元史·百官二》载：“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军队屯田，由枢密院直辖的有：左、右、中、前、后、武卫屯田，左、右翼屯田万户府，忠翊侍卫屯田，左、右钦察卫屯田，左、右率府屯田，仁忠卫和宣忠扈卫屯田。“内立五卫，以总宿卫诸军，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立枢密院以总之。”③

西域的民屯，属中央政府大司农管辖。《元史·百官三》载：“大司农，秩正二品。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至元七年始立。”发展新疆民屯除恢复生产、解决军民用粮之外，通过民屯，使大量漏籍人口得到清理，统编为屯户，稳定了边疆地区的居住人口。

第六节　元代陕甘宁青屯田

蒙古军队在进兵北方地区时，野蛮掠夺，疯狂杀戮，使中原地区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片良田变为牧场。1213年到1214年，成吉思汗率兵南下，使得“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大批汉人被掠北去。河北地区“田野久荒”，民无耕牛。河东地区也几乎“杀掠殆尽”。窝阔台率军进攻中原，在考县、汝南、凤翔亦发生大批屠杀的现象。近臣别达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为牧地。”耶律楚材对窝阔台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冶铁，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④窝阔台认为有理，从之。另外，蒙古贵族把人民“强抑为奴”，也是户口大减的重要原因。蒙将阿里海牙，竟把南宋两湖地区的降民3 800户“没入为家奴”⑤。到忽必烈即位时，“诸色占役者”，竟达五十余万户，占到民户总数的一半以上。⑥

忽必烈即位后，认识到为了巩固其统治，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滥杀人民，强抑

① 宋濂撰：《元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宋濂撰：《元史·兵制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宋濂撰：《元史·张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王磐：《史天泽补道碑·元文类》卷58。



为奴，变耕地为牧场，破坏生产的做法。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①]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主要措施有：

第一，设立"司农司"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

早在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上台不久，就设了十路宣抚司。命挑选通晓农事的人为劝农官。接着又多次发布官吏升降的条例，其中规定："户口增"，"田野辟"作为主要的标准。

第二，禁止毁农田为牧地，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驱口"（即贵族抢民为奴婢）。

为了保证政府的军饷供给，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他下令禁止以民田为牧地，派官员清理被改为牧地的农田，一律恢复农业耕作。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颁布了《户口条例》，对户口进行一次大整顿。将诸王贵族、权豪世家非法占为"驱口"的人追查出来，编籍为民。这一措施阻力很大，虽不彻底，但还是释放了大量"驱口"，编为民户。

第三，招集流亡，鼓励开荒。

中统二年，忽必烈下诏："凡逃户复业者，将原抛事产不以是何人种佃者，即便吩咐本主户下，合着差税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依例验等地科征。"[②]又规定："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验地科差。"栽种桑树限八年，杂果限十五年后科差。中统三年，忽必烈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碍农时"[③]。大批流亡农民逐渐回乡生产，或到有荒地的地方认垦。

第四，大力发展屯田。

忽必烈在即位之前，即用姚枢"布屯田，以实戍边"的建议，在唐、邓、亳、颍诸州及四川利州，陕西凤翔等地，开展屯田。在邓州专门设立了屯田万户府。效果非常显著，处处丰收，不仅收获了大量粟谷，而且解决了军队就地供应粮糈，减少了运输之费。他总结了此次屯田经验后说："古者，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则亦养兵息民之道也。"于是在他即皇帝位之后，大力倡导屯田，并作出严厉规定："海内统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他特别重视西北屯田，因为西北是元初边防重点。元世祖忽必烈刚刚即位，就受到了阿里不哥挑战。阿里不哥请漠北各地的诸王举行大会，推举阿里不哥为大汗。参加大会的有西部诸王察合台、窝阔台、术赤、蒙哥等部的代表，势力强大。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态度对忽必烈极为不利。

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东路军直指燕京，被忽必烈击溃。西路军由大将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退屯该地的蒙哥主力。该部掌握在忠于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手里，他牵动着川蜀关陕，形势骤然

① 宋濂撰：《元史·食货志》一《农桑》，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
③ 宋濂撰：《元史·世祖纪》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紧张起来。“河右大震。”但阿兰答儿和浑都海中了忽必烈谋士廉希宪之计，犯了战役上的错误，被忽必烈迅速调兵，“合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①。

海都、都哇自拥戴阿里不哥失败后，对忽必烈甚为不满，耿耿于怀，直至发生叛乱，与忽必烈多次争锋交兵。忽必烈胜时，疆域曾达到阿力麻里(现在伊犁霍城附近)。海都势盛时，元军曾退到哈密。双方争战相持近40年。所以河西走廊的瓜、沙、肃州，就是元初重要的边防。

蒙古“六征西夏”。成吉思汗在1205年夏，在大败乃蛮、蔑儿乞后，乘胜进兵攻西夏，以后连续五次攻夏。终因西夏人顽强抵抗而未果。直到1225~1227年，调动大军，全力进行第六次征讨，夏主投降，西夏国覆灭。这23年间，成吉思汗先后降灭40余国，所向披靡。而对西夏的作战，直到他死在前线后的三天才获全胜。西夏人的顽强坚韧对蒙古军队，特别是忽必烈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由于以上三件事，元世祖忽必烈将西北地区作为国防重点，当然也是屯垦戍边的重点了。其主要屯田地区有：

可以控制川陕甘的战略要地六盘山。经常驻有可随时出征的机动军队，平时屯田，一旦有警，随时出征。

甘肃的瓜、沙、肃州，是边防重地。一方面，徙民实边，同时重军防守。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立河西屯田，给耕具，遣官领之。调归附军于甘州屯田。十七年畏吾户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十八年六月以太原新附军5 000屯田甘州，以保障驻西域大军的粮糈供应。平时进行屯田，并保持随时增援前线的态势。

一支能征善战，所向无敌，纵横欧亚的蒙古大军，在一个小国西夏面前，数攻不下，成吉思汗盛怒。在攻下肃州后，野蛮杀戮，幸免者仅106户②。蒙古军围攻中兴长达半年，久攻不克，中兴军民坚壁拒守。这时，忽必烈已病笃，临死前吩咐：秘不发丧，以免被敌人获息，待西夏国主和居民在指定时刻出城时，立即把他们全部消灭③。将中兴视为屯田重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亦集乃古居延故城，汉屯田要地，扼和林通河西走廊的咽喉，故重兵屯田。

凤翔屯田是元世祖忽必烈首创，也是安西王阿难答所在西安附近的屯田点，对关中地区影响很大，是屯军点之一，故元政府十分重视。

有元一代，幅员辽阔，远过汉唐。元廷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行中书省，在西北有陕西行中书省和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和青海分属两行中书省。元代陕、甘、宁、青屯田的情况如下：

据《元史·兵志·屯田》载：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

陕西屯田总管府：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月，以安西王府所管编民2 000户，立栎阳、泾阳、终南、渭南屯田。十八年，立屯田所。十九年，以军站屯户拘收为怯怜口

① 宋濂撰：《元史·廉希宪传》、《商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昔里钤部传》卷122，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233页。





图 36 额济纳旗黑城子

户计，放还而无所归者，籍为屯户。立安西、平凉屯田。设提领所以领之。二十九年，立凤翔、镇原、彭原屯田。放罢至元十年所签接应成都、延安军人，置立民屯。设立屯田所。寻改为军屯，令千户所管领。三十年，复更为民屯。为户凤翔1 127户；镇原913户；栎阳786户，后存650户；泾阳696户，后存655户；彭原1 238户；安西724户，后存262户；平凉288户；终南771户，后存713户；渭南811户，后存766户。为田凤翔90顷12亩，镇原426顷85亩，栎阳1 020顷99亩，泾阳110顷99亩，彭原545顷68亩，安西467顷78亩，平凉115顷20亩，终南943顷76亩，渭南1 222顷31亩。

陕西等处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以周至南系官荒地，发归附军，立孝子林、张马村军屯。二十年，以南山把口子巡哨军人800户，于周至之杏园庄、宁州之大昌原屯田。二十一年，发文州镇戍新附军900人，立亚柏镇军屯，复以燕京戍守新附军463户，于德顺州之威戎立屯开耕。为户孝子林屯301户，张马村屯313户，杏园庄屯233户，大昌原屯474户，亚柏镇屯900户，威戎屯463户。为田孝子林23顷80亩，张马村73顷80亩，杏园庄118顷30亩，大昌原158顷79亩，亚柏镇268顷59亩，威戎164顷80亩。

贵赤延安总管府屯：世祖至元十九年，以招收赎身、放良、不兰奚及漏籍户计，于延安路探马赤军地屯田，万户2 027户，为田486顷。

陕西凤翔屯田，是忽必烈在称帝前亲手举办起来的屯田区。有元一代十分重视。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得到蒙哥汗所赏赐的村邑，其地在京兆（今陕西西安），忽必烈于该地设置京兆从宜府，负责在凤翔开辟屯田，招募百姓为屯户，因地腴水丰，连年丰收。于是用所收之粮，去河东解州换取食盐，军民两便。然后开辟嘉陵江之漕运，以运粮供军队之需。忽必烈还在京兆设立宣抚司，以负责日常之政务，关中大治。中统二年（1261年）十月诏“凤翔屯田户隶平阳兵籍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1]

忽必烈皇子安西王镇关中，奏以李德辉为相以辅之。李德辉到任视察，发现“瀕泾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浍，假牛、种，田具与贫民二千家，屯田其中，岁得粟麦刍藁万计”。[2]

据《元史·兵志·屯田》载，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宁夏等处新附军

① 宋濂撰：《元史·世祖纪》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濂撰：《元史·李德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万户府屯田有：

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发迤南新附军1 382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958户屯田，为田1 498顷33亩。

管军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先是遣都元帅刘恩往肃州诸郡，视地之所宜，恩还言宜立屯田，遂从之。发军于甘州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为户2 290户，为田1 166顷64亩。

宁夏营田司屯田：世祖至元八年正月，签发己未年随州鄂州投降人民1 107户，往中兴居住。十一年，编为屯田户，凡2 400丁。二十三年，续签屯户，得300人，为田1 800顷。

宁夏路放良官屯田：世祖至元十一年，从安抚司请，以招收放良人民904户，编聚屯田，为田446顷50亩。


图37　宁夏西夏王陵

亦集乃屯田：世祖至元十六年，调归附军人于甘州，十八年，以充屯田军。二十二年，迁甘州新附军200人，往屯亦集乃合即渠开种，为田91顷50亩。

元时称为唐兀（原西夏人聚居区）的甘肃行省，蒙元曾六征西夏，西夏军民伤亡惨重，“横尸遍野，十室九空”。特别是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之后“郡县废于兵”。忽必烈即位后，在那里进行水利建设，移民垦殖，军民屯田。《元史》卷五《世祖纪》载：忽必烈曾命郭守敬与唆脱颜行视西夏河渠，由于郭守敬的谋划，“渠皆通利”。董文用又奉忽必烈命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器。同时造舟黄河之中，接引少数民族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①]。结果“夏境遂安”。忽必烈在西夏中兴等路安排军民屯田，先后建五个屯田机构。在亦集乃（今内蒙额济纳旗）等地屯田区，参加生产者有蒙、汉、维吾尔及当地少数民族广大军民。忽必烈对西夏中兴等路的土地兼并也进行适当限制。如至元七年下令那里的提刑按察使与民管民官，严禁僧徒冒占民田[②]。至元十七年（1280年5月），又括沙州户口，定常赋，其富户余田，令所戍汉军耕种[③]。十月，以汉军屯田沙州。

关于亦集乃屯田：亦集乃路在甘州北1 500里，城东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元太祖二十一年内附，二十三年立总管府。总管忽都鲁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
② 宋濂撰：《元史》卷七《世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宋濂撰：《元史》卷十一《世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言:"所部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并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帝从之。

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分拣蒙古军五千人复屯田青海"①。

元朝将全国划分为14个牧道(群牧场),青海是其中之一,由于蒙古民族受长期游牧生产方式的影响,对发展农业缺乏经验与措施,致使河湟地区的农业遭受破坏,畜牧业亦波动不前。13世纪上半叶,蒙古军西征东还后,派"西域亲军"(在中西亚地区征召的伊斯兰民军),带入了果树、蔬菜栽培技术,带动了果树、蔬菜的发展。其中多是军队屯田种植。

据《元史·兵志》所载:元代屯田人户达二十二万余,屯田总面积达十七万五千顷,分布于中书省和十一个行省的七十二个司路府州。②

元代的屯田,主要分军屯与民屯两种。

从西北元代军队屯田来分类:一是镇戍边疆的军队,其任务是防止外敌入侵,保卫祖国边疆安全。如海都叛乱时,河西的瓜州、肃州就是边疆第一线,元廷派军来此镇守,这是主要任务。同时,择地屯田,"以资军饷"。二是分驻战略要地的军队。元蒙军队东征西讨,疆域迅速扩大,元军于新扩地区的军事要地驻屯军队,防止动乱或"叛乱",以维护元朝统治的稳定。同时,进行屯田。如甘肃的六盘,元廷驻屯重兵,其任务在灭宋前,是防宋驻四川军队的前线。灭宋后是稳定川陕局面的战略要地。至元十三年(1276年)三月南宋亡。至元十五年,元廷派武略将军李进率部屯戍六盘山。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派总帅汪惟和"分所部戍四川军五千人屯田六盘"③。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五月命"陕西省督巩昌兵五千人屯田六盘山"④。成宗元贞二年(1296),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其任务是:"有警出征,无警屯田。"其实六盘山区屯田条件并不优越,但因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民族防范的心理根深蒂固,元代统治者担心事变,故而重兵屯守。三是主要担负屯田生产任务的军队。由新附军和汉军来承担,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屯田军,其任务是屯田生产,以资军饷,有时也参加修筑水利工程或其他杂役。

民屯,即组织民户进行屯田,其组织形式带有浓厚的军事性质。从事民屯的人户另立户籍,称为"屯田户",边境屯田户,主要为了实边。由于战争破坏或其他原因,边境居民或被杀戮或逃亡,人口极稀。元政府为了开发边疆,积极移民实边。由政府组织,给予优惠政策,发展民屯,也有招募来的内地无田农民。民户除屯田生产外,还要协助军队守边。另一种是内地屯田户。蒙元军队南下攻宋,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大批居民,有的被残杀,有的被掠为奴仆,也有的逃亡,因而大片农田荒芜,就是素称富庶的关中,也是"千里无烟"。忽必烈称帝后,为了改变这种

① 《甘肃通志稿·军政四·屯田》。
② 王廷:《元代屯田考》。
③ 宋濂撰:《元史·世祖纪》卷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宋濂撰:《元史·世祖纪》卷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情况，决定招抚流民，垦荒生产。屯户有的是招募来的，有的是强制签充来的，也有的是逃亡农民返乡耕种的。屯田户的生产资料，如耕牛、籽种、农具主要由政府供给或农民自备。土地来源，主要是荒地。

屯田的管理：分属枢密院和中枢省两大系统。军屯总隶枢密院，分隶各卫、万户府和宣慰司。各卫和万户府下设立专门的屯田千户所和百户所以管屯种。民屯总隶中书省，分隶司农司、宣徽院及各行省。具体管理或由所在地的路、府、州、县，或由专门设立的屯田总管府、屯田署等。

元代屯田，在元世祖忽必烈大力倡导和支持下，迅猛发展。其规模之大，盛况空前。屯田走过一段辉煌的路程，对元代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片荒地的开辟，流民的安置，财赋的增加，军队粮糈的供应，社会的稳定，边防的巩固，发挥了巨大作用。忽必烈在位34年，屯田蓬勃发展。后由其孙铁木耳继位，是为成宗。他承元世祖之制，遵元世祖之法，屯田继续发展。成宗在位仅13年就逝世了，由武宗即位，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元朝由兴盛而逐渐转衰微，屯田也江河日下，随着元王朝的没落而消失。

第七节　元代屯田的历史地位

1.元代西域的屯田，虽然时间不算长，但规模却很大，为保证元军的粮饷供应，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统一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政府与海都、都哇叛军的战争，表面上看是争夺汗位的内讧，实质上是维护祖国统一与坚持分裂的斗争；是学习中原的先进科学文化、发展农业、推动社会发展与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以汉化为异”，毁农返牧，“继续生活在草原上”的斗争；是进步与倒退的斗争。经过40余年的较量，1301年，怀宁王海山统帅元军在和林北迭怯里吉之地，大败叛军。海都死，都哇中箭瘫痪，不得已而遣使请和，战争告一段落。1306年（大德十年），都哇与察八儿（海都子）内讧，海山出兵击溃察八儿，察八儿穷蹙无归，降附都哇。自是窝阔台领地归于察合台。同年都哇死，元成宗命其子宽阇袭汗位。1310年（武宗至大三年）察八儿与窝阔台系诸王去大都觐武宗，归附元朝中央政府。自此，实现了全国统一。元中央政府的权力直达包括河中在内的察合台全境。有的著作称，元政府当时只能管辖到西域的哈密地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308年（至大元年）9月8日，察合台后王宽阇（都哇子）派遣万户也列门合散从撒麻耳干来到北京，把成吉思汗时所编的撒麻耳干、塔拉斯、塔什干等地的户口清册上缴元朝，元政府允许察合台后王自留二年之贡赋，以一年之贡赋上交元朝中央政府[1]。此事充分证明元政府继承了成吉思汗以

[1] 宋濂撰：《元史·武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来的大部疆域，西域和中亚都是元朝的领土。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辽远的西域用兵，尤是如此。元军的粮饷如何解决?元政府在畏兀儿地及元军所控制的地区积极兴水利、办屯田。虽然累遭叛军的进攻和破坏，但元政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坚持进行屯田，一直到战争的胜利，保证了元军的粮饷供应。

2.屯田对医治战争创伤，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西域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尤以北疆为甚。14世纪前半期的奥玛里记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自战乱以来，居民流散，庐舍成墟，远远望去，似乎见到一个建筑得很美好的村庄，周围一片葱翠。可是当你走近前去，希望见到一些居民的时候，却只有绝无人烟的败壁颓垣……除牧草外，几乎一无所有。"战争给西域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

元政府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在西域建立屯田基地九个，有军屯，有民屯，垦殖面积约117万余亩，主要是军队屯田。不仅解决了驻西域军队粮糈供应的需要，减轻了各族人民负担，而且对复苏西域的农牧业生产，繁荣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元政府曾招募一部分汉族农民到准噶尔盆地的南缘进行屯田，促进了这里的农业发展。

3.屯田保障了丝绸之路畅通。

西域的丝绸之路，自辽、宋、夏对峙以来，长期受阻。蒙古统一西域建立了四个汗国后，丝绸之路复通。元代从中原到西亚的陆路交通主要有三条道路。一条是从中原经敦煌、哈密力、别失八里、阿力麻里，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撒莱，由此通东欧各国;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第二条道路是从中原到达罗卜，经阇鄽、斡端越帕米尔高原抵阿富汗，入伊朗，再达罗马等地。第三条道路是由蒙古草原和林经别失八里、阿力麻里入河中，过撒麻耳干、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抵小亚细亚。丝绸之路的通达，促进了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使者、商贾、僧侣、学者往来于这条道上。当时，大都、运河沿岸及长安、洛阳古都居住着不少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也有许多中国人到达中亚和欧洲经商。后来由于西北诸王发动叛乱，丝绸之路不时受阻。元政府出兵平定叛乱之后，丝绸之路又畅通起来。

元政府在全国广设驿站，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1276年朝廷设通政院，统领各地驿站事务。各站设有馆舍，供使臣及来往人员居住。驿站所在地，签发蒙汉人民为"站户"，进行屯田，供应驿站所需的饮食和交通工具，与民户分居，不纳赋税。在西域由于地广人稀，大漠横亘，驿站不仅接待来往使者，凡过往商客，也都是依站而行宿。

元代西域屯田简表

屯田地名		开始年代		军屯		民屯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屯田人数	屯田亩数	屯田人屯	屯田亩数
亦里黑	伊宁市附近	至元六年	1269年	1 000	约5万		
别失八里	吉木萨尔	至元十六年	1279年	5 000	约25万	有民屯	不详
滕竭儿	阜康	至元二十七年	1290年	3 000户	约15万		
哈喇火州	吐鲁番	至元十二年	1275年	5 000	约5万	有民屯	不详
哈密力	哈密	至元十六年	1279年	500	约2.5万	有民屯	不详
曲先	库车	至元十九年	1282年	2 500	约7.5万		
可失哈儿	喀什	至元二十五年	1288年	有军屯	不详	1 225	约6万
斡端	和田	至元十四年	1277年	1万	约50万	525户	2.5万
阇鄽	且末	至元二十四年	1287年	有军屯	不详	1 000	5万
计		至元六年	1269年	2.7万	110万	2 750	13.5万



第九章　明代西域屯田

由于元朝统治阶级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激起农民起义。元末，群雄竞起，遍布大江南北，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推翻了元朝在长江南北的统治。同时依次剪灭群雄，以劲旅组成北伐大军，直指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建立明朝，建元洪武，定都应天府（南京）。

第一节　明太祖统一中国

朱元璋奠定中原以后，为了实现全国的统一，指挥大军向边疆进发。北征北元大汗；东北迫降元故丞相纳哈出；南讨云南的梁王；西北平定扩廓帖木儿；取甘肃、西宁，进至哈密，收降当地蒙古、撒里畏兀儿（今裕固族）各部首领。同时招谕甘、青、藏及西域诸部，各部首领统统内附。

随即朱元璋着手统一西域。从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明政府相继在撒里畏兀儿地区设立了七个卫，即安定卫（青海柴达木西，北的昔儿丁）、端卫（今甘肃酒泉南山）、罕东卫（敦煌市西南）、沙州卫（今张掖）、曲先卫（青海柴达木盆地药王堆）、赤斤卫（玉门县赤金堡）、东左卫（今敦煌市）。这七个卫的设置，为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洪武十三年（1380年）四月，明凉州都督濮英率军西征哈密，哈密首领兀纳失里遣使请降。次年，哈密派使贡马，以示友好。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西域回纥来贡者，多为哈梅里（即哈密）所遏。有从他道来者，又遣兵邀杀之”[1]，与西域的交通断绝，河西七卫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命都督佥事刘真偕宋成督兵讨之。真等由凉州（今武威）西出，乘夜直

[1] 张廷玉等撰：《明史·西域传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抵城下，四面围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兀纳失里驱马三百余匹，突围而出。官军争取其马，兀纳失里率家属随马后遁去。真等破其城，斩幽王别儿怯帖木儿，国公省阿朵阿只等一千四百人，获王子别列怯部属一千七百三十人，金银印各一，马六百三十匹”[①]。哈密从此纳入明朝版图。次年，兀纳失里贡骡马请罪，太祖准其复国为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兀纳失里死，其弟安克帖木儿继王位，贡马4 740匹。永乐二年（1404年）诏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次年安克帖木儿卒，诏封其侄脱脱为忠顺王。永乐四年置哈密卫，设指挥、千户、百户等。

第二节 明代陕甘宁青屯田

一、元末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全国反元大起义爆发。一时间，群雄并起，拥兵据地，争夺天下，干戈不息。除朱元璋的南京政权，尚有兵力强大、割据江西与湖广等地“大汉国”的陈友谅；经济实力强大、立都苏州的“大周国”的张士诚；此外还有称雄浙江东海上的方国珍；建国四川重庆的“夏”政权明玉珍等。群雄割据的局面，很快演变成一场群雄和元王朝及群雄之间复杂、激烈、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从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起兵海上开始，到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建国为止，历时整整20年。朱元璋即位之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与元朝残存势力进行了20多年的南征北战。前后近50年的连年征战，造成许多地方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史称：“自兴兵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②]耕桑之地变为草莽，“人烟断绝”[③]，所在萧条。江淮之地，不少地方是“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山东、河南原是北方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人民大量逃亡，竟然成为“多是无人之地”。就连一向文化比较发达的汉中地区，也是荒草灌木茫茫，虎豹出入其中。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其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二是稳定社会秩序，加强边防建设，巩固皇权统治。

二、明代屯田方略

朱元璋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上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家贫，念不起书，只好给地主牧牛放羊。后又入寺为僧。因此他深知人民的疾苦。25岁（1352年），他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反元义军，他智勇双全，英勇善战，历经四年的南征北战，

① 张廷玉等撰：《明史·西域传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三。



到1356年，攻克集庆，改为应天府（今南京）。他先后攻克了婺州、诸暨、衢州、处州。这时，他已是称雄一方的元帅了。他曾说："若士兵坐食于农、农必受蔽，非常治久安之术。"①他于1358年11月，建立民兵万户府，专管屯田地等事务，令军士在南京龙江（今下关一带）屯田。这是他在称帝前十年的事。对于屯田这件事，他的部下将军们，有的很重视，有的就不那么认真了。1363年他发现康茂才将军十分重视屯田，且取得了明显效益。于是他下嘉奖令曰："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兴兵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今各大小将帅，已有分定城镇。然随处地利，未能尽垦，数年以来，未见功绪。惟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以此较彼，地力均而人有多寡，其故何哉？盖人有勤惰故耳。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②自此之后，军屯便在朱元璋所辖区域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朱元璋之所以能推翻元王朝的统治，剪灭群雄。大兴屯田，部队粮饷供应充足，兵强马壮，减轻人民负担，取得人民拥戴，是一个重要原因。

1368年正月，在徐达率军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朱元璋在应天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朱元璋依靠军队，夺取天下，所以对军队建设十分重视。他与刘基商议，认为历代征兵制和募兵制各有长短。经过琢磨，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创立了一种卫所兵制。

卫所军队的来源有四：一是从征，即跟随朱元璋起事的部队；二是归附；三是谪发；四是垛集，即从老百姓家中按人口比例征调的。军人列入军籍，世代沿袭，儿孙代代当兵。军籍归都督府掌管，不受地方行政管辖。军队耕战结合，平时既要屯种，也要进行军事训练，担任保卫边疆和镇守地方的任务。明王朝将军队全部编入卫所之中。全国有493个卫所，还有359个独立的千户所。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并规定："边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耕种；内地军士，二分守城，八分耕种。每个军士拨给五十亩为一分。"③

洪武元年，明太祖命诸将分屯各地，凡开立屯所，各设都指挥一员统领。此后他反复告谕全军："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④他下令军队，走出营房，到边远人烟稀少的地方垦荒种地，务求实效，力争军粮自给，减少百姓负担。同时，一再遣将四出到屯田第一线，严加督促。他先后让两个儿子率河南、山西的卫军到内蒙筑城屯田，一个儿子去辽宁，一个儿子去甘肃领导军屯。⑤于是从东到西、由

① 《明太祖实录》，转引自王毓铨著《明代的军屯》。
②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③ 张廷玉等撰：《明史·食货一》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明太祖实录》，转引自王毓铨著《明代的军屯》。
⑤ 《皇明经世文编》，转引自《我国自汉迄清历代屯田概况》。

南而北兴屯种田。洪武二十一年(1388)岁得粮五百余万石。[1]明太祖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洪武十八年(1385)二月,国子祭酒宋讷上边策曰："今海内既安,蛮夷奉贡,惟沙漠胡虏,尚烦圣虑,若置不治,则恐久为患。……备边在于实边,实边在乎屯田。汉本始中,匈奴十万骑而南,赵充国将四万骑分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今陛下宜于诸将中选谋勇数人,每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如充国兵数斟酌损益,五百里屯一将,布列边地,远近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策也。"[2]上纳之。

永乐帝朱棣即位后,继续大兴军屯,开垦土地,发展生产。1402年9月令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命令各卫所遵洪武旧制。卫由指挥一人,所由千户一人,专职提调,由都指挥负责督察,年终报奏屯田所之人数,以稽勤怠。从而使军屯在永乐朝得以坚持发展。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命军官各种样田,以其数收之数相较。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年余粮二十三石,帝命重赏之。宁夏总兵何福积谷尤多,赐敕褒奖。使屯田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

明学者叶春及在研究了明代军屯后写道："以军计之,约三百十万余,天下屯田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分丽三百十余万之军人,得田二十九亩。三百十余万之军,岁食粮三千七百二十二万余石,……除正粮外,纳余粮六石。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得余粮二千七百万担,则是军之食、军自给之。边储所之运,军需之所征,供于民者无几也。军多为农,故虽额设数百万而不见其冗,食出于军,故虽岁费数十万而不见其匮。"[3]

三、明代西北屯田情况

(一)边防重镇屯田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明代军屯,九边为多,而九边又以西北为最。"洪武初年开始,太祖就着意经营北方。他说："重兵之镇,惟在北方。"(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地区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此九塞王"莫不傅险狭,控要害"[4],沿长城一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防线,捍御蒙古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民生"[5]。后到明成祖"于边备甚谨,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6]。到弘治时

① 蔡美彪等撰:《中国通史》56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谈迁著:《国榷》卷八。
③ 《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三。
④ 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
⑥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兵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88)，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长城一线，逐渐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成化七年后移至榆林)和稍后建立起来的宁夏、甘州及三关、固原，号称“九边”。其中四个边防重镇在西北地区。每个军事重镇都设立卫所，派名将镇守，驻重兵，筑要塞，兴屯田，精心经营。

河西走廊，汉唐以来就是西北边防的战略要地。明得河西，划嘉峪关而守。洪武末年及永乐时期，在关外曾设了七个卫所，即“关西七卫”。到英宗正统(1436~1449)以后，这些卫所在吐鲁番的进逼下，全部迁入关内。在嘉峪关以东的走廊内部，明代则设有凉州卫、永昌卫、肃州卫、山丹卫、甘州卫等五卫。各卫皆重兵防守，大兴屯田。有学者考证：从洪武末年到弘治年间，凉州十一卫共有旗军(正规军)7万余，下屯旗军近4万人[①]。每军人种田50亩，共计屯田200万亩，规模是很大的。不仅就地解决了驻军的粮糈供应，而且为开发建设河西走廊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军在河西走廊以北的亦集乃打了一个大胜仗。洪武十三年(1382)二月明军侦知“故□国公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率五万余众屯和林”。准备大举进攻河西。明太祖接报，命平西侯沐英“以陕西兵击之”。三月，“沐英率大军至灵州，遣骑侦知脱火赤兵次亦集乃路，遂逾贺兰，跡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夜去穹庐四十里，衔枚四分其军，自当前围”。对敌发起突然袭击，经过激战敌溃，“俘其全部以归”。干脆利落地打了一个歼灭战。这次明军出兵在10万以上，都是陕西各卫出的士卒(陕西都司辖陕甘宁青各卫)。[②]

洪武三十年正月“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总兵官，武定侯郭英副之，选精锐步骑于陕西、甘肃以备胡”。

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太祖敕肃王楧曰：“古者兵出于农，有寇则战，无事则耕，春气方和，宜及时督军屯种，遇有征战，亲率精兵，与长兴侯耿炳文进讨。”[③]

(二)内地军事要地的屯田

洪武十二年(1379)春，洮州十八族叛，烧杀抢掠，气焰嚣张。正月，帝命“征西将军沐英移兵征十八族叛蛮”。二月，太祖“敕曹国公李文忠督理河、岷、临、巩军事”。上谕曰：“二月十五日知大军人西番，胜负必决矣。符至，尔即从洮州铁城取道而出，朕尝有密谕，当遵而行，事需速成。山西之军还卫洮州，择人守焉。”[④]沐英率大军至洮州，连战皆捷，敌受重创，明军乘胜追击十八族酋长，“吐蕃川藏皆降”。“遂置洮州卫，指挥聂纬、陈晖等守之。”[⑤]洮州虽不是边防重镇，但它却是境内军事要地。在此筑城设卫，镇守一方，军士二分守城，八分屯田，有警出征，无事种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①唐景绅：《明代的河西军屯》，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2月。
② 谈迁著：《国榷》卷七《太祖洪武十三年》。
③ 谈迁著：《国榷》卷九《洪武三十年》。
④ 谈迁著：《国榷》卷六《太祖洪武十二年》。
⑤ 谈迁著：《国榷》卷六《太祖洪武十二年》。

九月，西番三副使叛，告急文书连至。征西将军率军进讨，大败叛兵，“擒三副使瘦嚓等，杀获数万人，获马二万，羊十余万”[①]。

西安屯田位于渭河之南，秦岭以北，渭河平原中部。西汉、前秦、隋唐均在此建都，是丝绸之路东部起点。明时是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明廷在此重点屯田。《明史》载：“西安四个卫所原有屯军二万四千人，田二万余顷。”[②]在西安附近屯田200余万亩，每个屯军平均80余亩。为保障陕西驻军军粮供应做出了很大贡献。

鉴于西北屯田发展不甚如意，朱元璋遣“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于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屯田陕西”[③]。遣名将到陕西督察屯田，显然是为了加强各卫所的军队屯田。在此之前，明太祖曾派“卫国公邓愈、河南侯陸聚往陕西重兵屯田，开卫戍守”[④]。可以看出明廷对西北屯田是十分重视的。

蒙古在塞外的军事力量，发展很快，对边境不断人侵，对北部边疆，特别是西北构成巨大威胁。于是明太祖于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命宋国公冯胜理西安、平凉诸卫。颖国公付友德理山西诸卫，曹国公李景隆理巩昌、洮、岷、河州，凉国公兰玉理兰、凉、庄浪、西宁，甘肃长兴侯耿炳文理庆阳、延安、绥德、宁夏”。“各缮城堡阅武”[⑤]。四公一侯五名将齐聚西北地区，这是罕见的。这说明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次是为了加强西北边防建设以备边；其三是为加强边防，主要有：缮城堡，阅武，屯田。

由于洪武、永乐年间，十分重视屯田，特别是军屯，故取得了显著成效。“凡各镇兵饷，有屯粮，有民运……屯粮者，明初，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民运者，屯粮不足，加以民粮。”[⑥]

洪武二十六年(1393)西北各镇情况是：

延绥：主兵，屯粮5.6万余石，民运粮9.7万石。

宁夏：主兵，屯粮料14.8万余石，民运本色粮千余石。

甘肃：屯粮料23.2万余石，草434万余束，民运粮布折银29.4万余两，京运银5.1万余两。

固原：屯粮料31.9万余石，民运本色粮料4.1万余石，京运银6.3万余两。[⑦]

宁夏军粮自给率达99%以上。除自然条件好、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外，主要是宁夏卫所长官十分重视屯田。

甘肃、延绥军粮自给率不到50%，除甘肃与延绥地瘠民贫、干旱少雨外，主要

① 谈迁著：《国榷》卷六《太祖洪武十二年》。
② 转引自《我国自汉迄清历代屯田概况》，国家农垦总局政策研究室。
③ 张廷玉等撰：《明史·太祖纪三》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谈迁著：《国榷》卷六《太祖洪武八年》。
⑤ 谈迁著：《国榷》卷九《太祖洪武二十五年》。
⑥ 张廷玉等撰：《明史·食货六》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 张廷玉等撰：《明史·食货六》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是两卫所领导对屯田意义认识不足，对屯政诸措施贯彻不力。这就是朱元璋再三督促，并选派名将加强西北地区军事领导的主要原因。

至于甘肃用费巨大，主要是因甘肃边防线长，需筑要塞、修城堡，建设巩固的边线所致。

（三）民屯

明初，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地多荒芜、遗骸遍野”[①]，人民大量逃亡，许多地方竟成“无人之地”。明太祖为改变“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为“田野辟、户口增”的局面，在全国开展了军队屯田和移民垦荒。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多，则为历代所罕有。

1367年10月，朱元璋命大将徐达挥师北伐中原，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拉开了移民运动。

移民就是由人多地少的“狭乡”，迁移到地多人少或无人之地的“宽乡”。洪武朝移出居民最多的有：山西、山东移出人50万以上，江南松、苏诸府20万，塞北移出47万。移入最多的山东西部、河南等地移入100万人，北京移入30万人左右。[②]洪武、永乐二朝有数可查的为200万左右，实际在400万上下。近代学者曹树基在《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述，仅长江流域就达700万以上。在西北地区，洪武初，曾自北平、山西、山东寻地适移数十万居民于甘肃、宁夏、河西一带，屯田生产，充实边防。永乐万历年间，京畿连年荒歉，曾移民至甘凉二州就食。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又自内地移民靖远、会宁一带进行屯田以戍边（因鞑靼多次入侵甘肃中部）。

对徙民屯田的无地农民，由政府组织，发给路费、耕牛、种子、车具和一定数量的粮食，三年不征税赋。到达垦区后，分别编屯，派官提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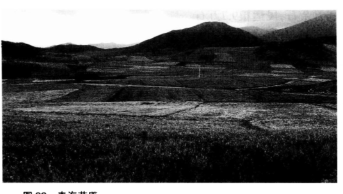


图38　青海草原

甘肃河西走廊，自汉代以来就是边防重地。唐代后期为吐蕃和西夏先后占领。元在征服西夏时，由于当地人民的顽强抵抗，使所向无敌的蒙军，五次败于西夏的坚城之下，直到第六次大军进攻，才将西夏灭亡。蒙军大肆烧杀抢掠，使河西也惨遭杀戮。战后“人烟稀少、田园荒芜”。但由于河西走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政府大批移民河西以实边。据《元志》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② 蔡美彪等撰：《中国通史·明时期·户口制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载：元代甘州仅有1 550户，23 978人。到了明代嘉靖年间，《甘州府志》卷六载：甘州有民户14 444户、口30 883人。另有屯户12 567户，口17 961人。从以上数字可看出：一是户口猛增。明代甘州共有27 011户，较元代的1 500多户，增加了16.8倍。二是屯户12 567户是由政府组织移民开荒而来。三是民户的大量增加则多是逃亡在外而回乡生产的，当然也有自愿而来或召募而来的人。四是明代较元代增25 461户，按明制，每户给田45亩，另加2亩菜地，则可增加种地面积1 196 667亩。其中49万亩是民屯的田地，占总面积40%，比重是很大的，这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甘州经济，作出了历史贡献。河西地区的肃州、凉州、敦煌等地，大约也不相上下。

（四）青海民屯的情况

明初，青海地方官吏根据明太祖提倡发展农业，要把屯田当作"大务"的指示，积极"劝课农务"，鼓励开垦荒原。同时发展军屯、民屯、"移民屯田"。洪武三年（1370），明军进入河湟地区后，曾数次从南京地区征调数以万计的士兵、居民及"罪犯"移居河湟地屯田。使河湟地区的大量荒地得以开发，粮食产量增加。

明成祖朱棣的军队攻占南京，登上帝位后，即于永乐元年（1403），将忠于建文帝反对永乐皇帝的大批军民充军到西宁等地屯田。由于他们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推动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据《西镇志》记载：正统三年（1438）规定屯田定额，西宁卫"屯科两千七百五十四顷四十六亩，屯粮两万五千一十二石六斗"。崔永红在《青海经济史》中说：永乐时期，西宁卫屯田面积超过20万亩……正统时期，西宁登记在册的屯、科（民）田总面积2 756.46公顷，到明末发展到6 690.79公顷，增长142.7%。[1]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水利建设，河湟地区积极发展灌溉农业。到明末在西宁地区已修建伯颜川、东卜鲁川、那孩川和沙塘川四大主干渠，拥有近30条支渠的农田灌溉系统，灌溉农田15万亩。在民和、巴州、三川一带，修建有巴州渠、暖州渠、蹇占渠以及剳都渠等，农田水利比较发达，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五）宁夏屯田

宁正，寿州人，元末归朱元璋，英勇善战，积功授凤翔卫指挥副使。曾入元都招降八千余人。上嘉奖之。曾从大军取陕西，冯胜克临洮，留正守之。从邓愈破定西，克河州。洪武三年（1370）授河州卫指挥使。上谕曰："西民转粟饷军甚劳，而茶布可易粟，请以茶布给军，令自相贸易，省輓劳之苦。"诏从之。正初至河州卫，城邑空虚，市井萧条，城乡贫困。宁正即率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不数年，民有食、库粮充，经济繁荣。"遂为乐土"[2]。玺书嘉劳。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上从之。朱元璋选派治理河州甚佳的宁正，命他"兼顾宁夏卫事"。宁正到宁夏视察，听取各方意见后，决心改变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经济衰落的现象。他组

①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转引自高志伟著《青海地区古代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② 张廷玉等撰：《明史·列传》二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织军队和民众，修筑淤塞、毁坏已久的汉渠和唐渠，引水灌溉荒田，“开垦数万顷，兵食饶足”[①]。数万顷就是数百万亩，除一部分进行军屯外，大部招集流亡，徙民屯田，募民屯田，宁正是明代在宁夏发展民屯的功臣。

（六）商屯

《明史·食货一》称：“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就是令商人运粮至边境入仓，政府按其道路远近和运粮数量的多少发给盐引，商人持盐引到内地取盐贩卖。后来，盐商索性雇人在边疆屯垦，就地缴粮，换取盐引。这个办法叫“开中”。它不仅使政府节省军粮运输费用，而且使边疆的荒地得以开垦。明法：“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②]时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和盐井，洪武时，岁办盐1253.76万余斤。盐行陕西之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岁解宁夏、延绥，固原银饷3.6万余两[③]。据此情况，陕西似应有商屯，详情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证了。

四、明代屯田衰败的主要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倡导的屯田，洪武永乐年是鼎盛时期。可是“自正统（1436~1449）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分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1465~1470）颇议釐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1488~1505）间，屯粮愈轻”[④]。为什么屯田事业日见衰落，江河日下呢？直接原因主要是贪官污吏强夺屯田。但根本原因是明代出了两个典型的昏君——明英宗和武宗。“远小人、近君子”，这是诸葛亮劝蜀帝刘禅的名言。其实小人代代有之，关键是小人若遇明君，明君可辨忠奸，抑其势，无伤大局。若小人遇到昏君，就会产生昏君喜小人，小人爱昏君，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忠臣遭难，奸臣横行。如武宗和太监刘瑾。刘瑾为武宗创造条件，使武宗荒淫无度。武宗则放纵刘瑾揽权敛财。当刘瑾罪行暴露，被捕下狱后抄其家，共抄出黄金24万锭又57 800两，元宝500万锭又1 583 600两，宝石两斗，金甲两副，金钩3 000，玉带4 000多束，此外，还搜出私制玉玺一方，衮胞八件，盔甲无数，还发现他平日常用的扇子里藏有锋利匕首两把。这些都是违禁物。就连昏君武宗也大吃一惊。对刘瑾行磔刑之日，许多受害者争吃他的肉，以泄心头之恨。上行下效，在刘瑾的影响下，各地的贪官污吏，也大行其道，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将黑手伸向国家财产，伸向人民，甚至军队卫所的屯田，也不能幸免。据史料载：一个“镇守甘肃的太监就占种军屯田一百余顷（即一万多亩），私役屯军九百多人。以至一个小小的百户官，竟占屯地一千二百余顷”[⑤]。明代的屯田，就在这批贪官污吏的侵蚀下，逐渐削弱以致湮灭。

---

① 张廷玉等撰：《明史·列传》二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张廷玉等撰：《明史·食货志》卷八十《盐法》，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张廷玉等撰：《明史·食货志》卷八十《盐法》，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张廷玉等撰：《明史·食货一》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国家农垦总局政策研究室：《我国自汉迄清历代屯垦概况》。

第三节 置哈密卫

明政府统辖西域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册封各部首领为王、为都督。除哈密王外，别失八里王、亦力把里王、吐鲁番王和瓦剌王等，都是明朝中央政府册封的，并颁发印信。

据《国榷》卷13载："永乐三年(1405年)四月庚辰，赐别失八里王沙迷查干。初，哈密安克帖木儿为鬼力赤毒死，沙迷查干问其罪，上义之。"永乐六年"遣祭别失八里国王沙迷查干。时，弟马哈麻嗣"。马哈麻者，元之余裔，袭封居此。"永乐十四年(1416年)三月壬寅，马哈麻卒，仍封其子纳黑失只罕为王。"从此记述证明，别失八里数代王位，都是明中央政府册封的。

天山北路之瓦剌，《元史》称为干亦剌，又作外剌。《语解》改作卫拉特。成祖时，尝封其首领马木哈等三人为王。永乐七年(1409年)夏，"封(瓦剌部首领)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赐印诰"①。

明廷对吐鲁番首领的册封。永乐二十年(1422年)吐鲁番"酋尹吉儿察为别失八里酋歪思所逐，走归京师，天子悯之，命为都督佥事，遣还故土"②。宣德三年(1428年)十二月甲午，"土(吐)鲁番城都督锁恪弟猛哥帖木儿来朝贡马，命为指挥佥事"③。

此外，明朝中央政府还任命西域各地的头目为本地的都指挥、督佥事、指挥、千户、百户等官，管理本地的军政事务。地方官后代可以继承，但要经过明廷的任命才有效。

明时，西域境内的哈密、吐鲁番、柳城、别失八里、亦力把里、于阗、哈什哈尔以及瓦剌，都经常派人向明廷进贡，有马、驼、玉石、皮货等。明政府则赠给丝绸、金银等财物，每年使团有十次到数十次，人数最多时竟达1 800余人。

西域诸国与明保持着从属的关系。明太祖对西域各部主张："怀之以恩、待之以礼。"④他在讲到与边境各民族的关系时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⑤"华夷之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⑥明中央政府对边疆各民族，可谓礼义备至了。

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民间疾苦，他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后提

① 张廷玉等撰：《明史·外国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张廷玉等撰：《明史·西域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明宣宗实录》。
④《明太宗实录》。
⑤ 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明太祖史录》。



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若使士兵坐食于农，农必受敝，非长治久安之术"[①]。他在统一中国后，与刘基认真研究了历代军事制度以后，决定实行一种"兵农合一"，"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卫所兵制"。在京师和各地皆设卫所。数府划一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百户所。大抵6 000人称卫，1 120人称千户所，120人称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二（每总旗辖50人），小旗10人（每小旗辖10人）。军士有军籍，世袭为军。以大部屯田，小部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支给。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各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都司），统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分别管辖。"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②]卫所制也推行到边疆各地，其编制与人数，与内地卫所基本相同，但屯田尤为重要，否则靠内地运粮，难以为继。边地卫所分为一般卫所和羁縻卫所两种。与内地卫所不同之处是兼有管军、领土、治民之权。而内地卫所只管军事和屯田，不许参与民政。在边地卫所中，一般要委任少数民族头领提任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史称"土官"。边地卫所军队主要用于反对外来侵略，保卫领土，平定叛乱，维护社会秩序安定。遇有小的战事，卫所自己应付，重大战争，则由中央派将挂印，率军征讨。

永乐四年（1406年），明廷正式设立哈密卫。"永乐四年三月丁巳，设哈密卫，给印章，以其头目马哈麻木火者等为指挥、千户、百户、镇抚；辜思诚哈只马哈麻为疆历。"[③]为了使明政府的政令在哈密实施，卫所制得以推行，特命明廷官员"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以辅脱脱"。永乐三年，哈密忠顺王安克帖木儿为鬼力赤毒死，明廷命礼部遣官赐祭，"诏以脱脱袭封忠顺王，送还哈密"主政。脱脱系安克帖木儿兄子，"自幼俘入中国，上即位，求得之，抚养甚至。及闻安克帖木儿死，无嗣，欲以脱脱往嗣其爵，恐其众不从，尝遣回回可察吉儿等访其祖母速可失里及其头目。至是哈密告丧且请脱脱还抚其众。乃命脱脱袭封忠顺王，赐印诰、玉带、文绮。并赐其祖母及母文绮表里"[④]。

设立哈密卫，是明廷统一西域的一项重大决策。"中国立哈密卫有三要焉，断北夷右臂而破散西域交党，一也；联络夷狄而控之，二也；设险于边，保边无患，三也。"[⑤]哈密卫的设立，对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巩固祖国边疆，维护祖国统一，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① 《明太祖实录》。
② 《续文献通考》卷 122。
③ 《明太祖实录》。
④ 《明太祖实录》。
⑤ 《纪录汇编·兴复哈密王国记》。

第四节　哈密卫屯田的探讨

关于哈密卫是否有屯田?《明史》未见记载,唐启宇先生著《历代屯垦研究》及张君约先生著《历代屯田考》均未述哈密卫是否有屯田。《新疆屯垦史》457页中说:"明朝政府对西域实行消极政策,除统治哈密外,没有完成统一新疆的历史任务,没有在新疆组织屯垦。"此论值得进一步探讨。

1.明朝中央政府所推行的卫所制是兵农合一的组织,"小部守防,大部屯田"。战时出征,平时屯田生产。据《辞海·卫所》条称:"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支给。"明廷下令:"边境和内地军队一律屯种。"①哈密既设卫所,其任务当与全国一致,征战、屯田和防守。明廷命令"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②。哈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适于屯田,是历代屯田的重要垦区。如哈密军队不进行屯田,就不成为卫所制了,而是脱离生产的军队了。果如此,哈密官兵的粮糈如何解决?由中央政府供给吗?运距甚远,不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由当地群众供应吗?那就不能称作"哈密卫"了。

2.从永乐四年(1406年)设哈密卫时起,到正德八年(1513年)哈密卫失止,长达107年。中间虽经"三立三绝",多次动乱二十余年,但绝大部分时间是相对安定的。特别是建卫初期的十五年,社会秩序安定,卫所制在全国正大力推行。此时哈密先后主政的是脱脱及其弟兔力帖木儿。脱脱久居中原,明帝对其"抚养甚至",由明朝中央政府封其为王送回哈密主政,他是会积极推行明廷政令的。特别是明政府专门派遣大臣周安为长史,刘行为纪善到哈密辅政脱脱,明太祖朱元璋所亲自创立的卫所制,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条件,应在哈密推行的。杨绍猷先生在《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一文中说:"明朝北疆的防御体系……首先是建立军事卫所,羁縻卫所并辅之以屯田,由临边诸都司,行都司管辖。"③我认为这一论述也适于西北边疆的哈密卫。

3.史书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哈密卫是否有屯田虽无记载,但对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卫所屯田,确有详细的记述。

明初,明军平定南方各省后,在要冲地区设立军事卫所,隶属各省的都司或行都司。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司下,设都司土官,并将诸土司的士兵也纳入都司的管辖之下。土官可以世袭,但卫所的官员均由中央任命。未建立州县地区的卫所,兼管军事和民政。如云南澜沧军民卫,腾冲军民卫,贵州的赤水卫、毕节卫等。

云贵地区,山高路险,靠内地运粮,无法满足卫所官兵的供应。因此,"屯田在

① 国家农垦总局:《我国自汉迄清历代屯田概况》。
② 张廷玉等撰:《明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马大正等著:《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南疆，势在必行”。明代南方的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军队以卫所为单位，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立屯堡。开垦耕种，由官方购买农具耕牛等。耕种所获，作为军饷、储备和卫所官员的薪俸[①]。云贵和哈密同样是边疆，一个在西南，一个在西北；同样是少数民族地区；同样运粮困难，一是高山峻岭，道路艰险，一是大漠横亘，千里戈壁，渺无人烟。为了解决卫所的粮饷供应，云贵卫所大兴屯田。哈密卫所官兵粮饷如何解决？理应屯田。

4.据《明太祖实录》卷57载：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丁卯，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请给屯军农具及授忠顺王部下头目官。上……命工部如所奏给屯军农具，兵部量授忠顺王头目官”。由中央政府命工部制造屯军农具，授给哈密忠顺王部下头目官，即哈密卫所的军官，显然是为了进行屯田。此时的哈密王，正是“自幼俘入中国，上即位，抚养甚至”的脱脱。永乐四年三月设哈密卫，闰七月授给屯军农具，当然是进行屯田了。

据《明史》记载：“成化十三年十月，复立哈密卫于苦峪谷，给土田牛种。”这是1477年的事，据《皇舆图》卷12载：哈密疆域“南沙州，西火州，北瓦剌，东南肃州”。

据《国榷·嘉靖八年四月》卷54载：明世宗嘉靖三年（1529年），明廷就哈密卫的弃守问题进行了廷议。甘肃都御史唐泽主张：哈密宜弃。他在论述当时的形势时称：“吐鲁番占据哈密有已然之迹，有当然之理，有必然之势”，“军额空虚，屯田多荒，一也；我久戍而疲，彼长驱而锐，二也；我失瓦剌之援，彼合瓜州之力，三也；河东，临洮伤夷未苏，赤斤诸卫零落殆尽，四也；西南防海上之虏，东北梗山后之戎，五也”。唐泽弃城失地的论调，显然是无益于国家的，是不可取的。但从他的这段话中可以得知，哈密有军队戍守，而且进行了屯田。不过屯田组织得很不好，大多荒芜了。

据此，本文认为哈密卫进行过屯田，至于其规模、屯田时间等，有待进一步考证、探索了。

① 马大正等著：《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十章　清代前期新疆屯垦

有清一代的新疆屯田，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这是和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统一新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此，我们不能不对清代初期的历史做一番回顾。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清摄政王多尔衮统兵入关。十月一日清世祖福临定鼎北京，宣告清王朝取代明王朝。次年四月，多尔衮下令对"西域三十八国部落之长，投诚归顺者，抚按官察实具奏，以便照例封赏"①。但是时天下未定，清朝尚无力西顾。到康熙帝玄烨亲政，先后铲除鳌拜，平三藩，定陇蜀，收复台湾，抗击沙俄，我们多民族的国家，又逐步走上统一与发展的道路。唯西北一隅，由于沙俄不断蚕食、掠夺和积极支持准噶尔少数反动贵族的割据叛乱，严重威胁着祖国边疆的安全。

准噶尔(蒙古语"左翼"之意)是厄鲁特蒙古的游牧部落之一。厄鲁特在元代称斡亦剌，1270年归附成吉思汗。明代称瓦剌，势力由叶尼塞河上游扩展到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上游及准噶尔盆地一带，并一度统一蒙古各部，发动过俘获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役"。以后与明朝修好，恢复通贡与互市。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时散时聚，有时互相征伐。明代后期，瓦剌分为四大部：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游牧于伊犁河流域)、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城地区)，号四卫拉特，统称厄鲁特。清崇德二年(1637年)作为四卫拉特之首的和硕特部顾实汗就遣使向清朝奉表入贡，其他各部附名以达。17世纪中叶，准噶尔部在其部长巴图尔浑台吉统率下崛起于西北，统辖了北至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中、上游，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区。长期以来，准噶尔部众，跃马挥戈，驰骋疆场，外御强敌，内勤放牧，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为开拓和保卫西北边疆，立下了功勋。涌现了

① 《清世祖实录》。

像巴图尔浑台吉、僧格等为维护祖国统一,对沙俄的侵略和蚕食进行勇敢斗争,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杰出人物。

俄罗斯本是一个欧洲国家,地处乌拉尔以西,建都于莫斯科。沙俄不断向外扩张,1581年沙皇派军队越过乌拉尔,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就同中国的准噶尔部接触。1604年沙俄侵略军强占了鄂毕河中游厄鲁特的领地,建立了托博尔斯克。1606年沙皇从托博尔斯克、秋明、图林斯克等地征集了一支军队进攻准噶尔人,受到准噶尔部的强烈抵抗,阴谋未能得逞。1607年初及1609年3月沙俄塔拉将军加加林,两次派代表团到离塔拉城不远的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王公那里,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们加人俄国国籍,以把他们管辖的地方变成沙俄的领土。命令他们缴纳马匹、骆驼和其他东西的实物税,遭到厄鲁特人的坚决反对。厄鲁特首领阿拜和戈奇舍夫回答说:"我们从来不向任何人缴纳实物税,而且往后也不想给任何人缴纳。"吓得俄国使者目瞪口呆。

在僧格任准噶尔首领时,沙俄进一步强迫原属于准噶尔管辖的中国传统的游牧地区巴拉宾、库兹涅茨克、托木斯克等地的属民缴纳实物税,准噶尔坚决不予承认。僧格一再向沙俄严正指出:这些地区的居民,早就属于准噶尔管辖,表示一定要保护自己的疆域,甚至不惜一战。并以攻打已被沙俄侵占的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等三城相警告。沙俄当局惊恐万状,不断增兵镇守已侵占的地方。1667年5月僧格还率领4 000人的军队,包围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给沙俄侵略者以坚决的打击。由于厄鲁特人的抵抗,遏制了沙俄侵略者的南进。

第一节　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

清顺治十年(1653年)巴图尔浑台吉去世,子僧格继位。康熙十年(1671年),僧格在内讧中被杀,噶尔丹自立为汗,野心勃勃地积极扩张。对外勾结沙俄;对内"兼并四部,蚕食邻封,其势日张"[①]。欲吞并青海之和硕特部,"旋取青海和硕特车臣汗女",以示和好。1677年,噶尔丹袭击拥护统一的和硕特部,杀其岳父车臣汗,"而占有其地"[②]。1676年,攻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兼有四厄鲁特。1678年进兵天山以南,将察合台后王伊斯玛叶勒汗及其家族掳去,扶立阿帕克和卓为南疆的傀儡王。1679年又领兵三万,侵占了哈密和吐鲁番,称雄西域。又思北吞喀尔喀(外蒙古),噶尔丹借故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夏,"领劲骑三万,逾杭爱山,突袭其帐"。这时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军民,因不堪以戈洛文为首的沙俄殖民军抢劫、搜捕和侵略,奋起反击。围攻被他们侵占的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戈洛文一伙被打得抱头鼠窜,龟缩孤城。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噶

① 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
②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尔丹突然袭击喀尔喀，使土谢图汗部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在噶尔丹和沙俄的夹击下，遭到惨败，倾国东逃。这一军事行动，是噶尔丹与沙俄密谋策划的。侵略军头子戈洛文在日记中供认："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指噶尔丹）是根据陛下（指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争的，有大批的俄国军队，并有大批火器、大炮协同他们作战。"[①]噶尔丹与沙俄勾结，由来已久，自1671年到战争前夕，"双方遣使书，往来不绝"。1690年初，噶尔丹遣使要求沙俄到克鲁伦河同他一起进攻清朝，噶尔丹对俄国人表示，"只要他们给他两千或三千哥萨克精兵和一些大炮，他就能够破坏中国在长城外的全部边境"[②]。

噶尔丹既统厄鲁特四部，兼有天山以南的回部、青海、漠北，据喀尔喀王庭，"控弦之士数十万，则益骄蹇"，不奉命。1690年以追喀尔喀为名，选精锐东犯，五月兵抵乌尔会河。清政府派兵抵御，为厄鲁特所败。噶尔丹乘胜东趋内扎萨克蒙古地方，兵锋直指长城。

康熙以"此人力强志大，必将窥视中原，至殒命不止，岂容泛视，置之度外"。明确提出："断宜速灭，除恶务尽。"否则"烈焰费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③]。决心对噶尔丹进击。

公元1690年，康熙亲统左右两路军出塞迎敌，破其"驼阵"，噶尔丹大败，得还科布多者，仅数千人。

噶尔丹经过6年准备，自恃有俄国支持，于1696年率精骑三万，进至克鲁伦河。康熙统东、西、中三路进击，会战于昭莫多。噶尔丹精锐尽失，仅以数十骑逃遁。

1697年，康熙三次亲征。此时，噶尔丹的腹地伊犁已为策妄阿拉布坦所据，南疆四部及青海先后离去，自阿尔泰以西，皆属他人。所属部落从者仅千人，皆老弱。其子赴哈密征粮被擒。左右亲信台吉，闻大兵将至，先后望风降清，密向导大军进剿。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遂仰药死"[④]。

平定噶尔丹叛乱，清军以分兵裹带粮食长驱进击，运粮大队跟随，三战皆捷。但在条件恶劣的朔漠征途中，已充分暴露出"千里运粮"的困难。1696年昭莫多会战时，清廷三路出兵深入朔漠3 000余里，中路和西路"兵士各赍八十日粮，给四马乘骑裹带。中路运输，先备车四千辆，后以车负过重，又增制一千五百辆车分载"。"络绎前进，长约百余里。"选派干练的左都御史于成龙、侍郎王国昌等督运粮食，天津镇总兵岳升龙等率兵护送。西路军途中遇雨雪后，"马既疲惫，粮多遗弃，兵士道中偃仆相继"[⑤]，渐有溃逃，"虽追斩之弗止"。西路军运输粮车与驼队载50日行粮尾大军行进。由于戈壁乏水草，牲口疲瘦，不得已将15日军粮留于途中。余35日粮以小车、骆驼继续转进。"于土地坚硬处，一日止可行三十余里地，沙碛

① 苏联科学院：《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② 穆勒：《俄国历史资料集》卷1。
③ 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④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 殷化行：《西征纪略》。



岗阜处,一日止可行二十里,若遇大风冲击,不能逆风而行,随其所止。"①"虽再三严令按期将粮石转输军前,但终未能如愿。"西路大将军费扬古只得仰请中路转输军粮以接济,否则昭莫多会战是难以预期实现的。事后,康熙曾深有体会地说:"朕亲历行间,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而雨水之际,樵炊颇难,区画不周,岂可妄动。"②可见塞外朔漠用兵,军粮供应之难。康熙三次亲征塞外,深深体会到长途运粮之艰难,这对以后的西域屯田有重大影响。

第二节　康熙的屯垦政策

噶尔丹杀僧格次子而自立为汗时,其长子策妄阿拉布坦与僧格时的旧臣7人,率部5 000人逃居吐鲁番,遣使先降,清廷允之。策妄阿拉布坦乘噶尔丹南侵失败之际,迂回伊犁,游牧于博尔塔拉河。用其七友收集旧部,杜尔伯特台吉给予支持,势力渐振,辟地至额尔齐斯河,遂有准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歼灭噶尔丹时,策妄阿拉布坦献噶尔丹尸,康熙以策妄阿拉布坦似"外驯昵",遂划阿尔泰山以西至伊犁供策部统辖,于是成为西域大部落。

策妄阿拉布坦既统准部,野心勃勃,欲思吞并四部。"先娶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女,乃离间阿玉奇子携众万五千户而没入之。""复娶和硕特拉藏之姊,而赘其子丹衷于伊犁。乃率师入藏,袭杀拉藏汗,并掩杀其次子之在青海者"③。致使两部为其所并,杜尔伯特部久为所属,遂自立为汗。康熙以其"左右吞噬,驰突奔逸,将不可制"。公元1715年,准部骑兵2 000南掠哈密,清驻军200合回兵奋勇抵抗,准骑退去,清廷得报准噶尔部还要来侵扰。康熙怒,于是谕各大臣:"哈密编旗队无异内地,安可置之不问。"他紧急派员向哈密运送粮、米、牛、羊和银两,以资救济。随即遣大军屯巴里坤以防之。康熙五十八年,命皇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亲师青海;由两将军率军由川、青两路入藏,拥立达赖,破厄鲁特众,绝其南牧。遣两将军分屯巴里坤和阿尔泰,以震其西。但是要进兵新疆,彻底解决策妄阿拉布坦,关键是兵和粮,主要是粮。康熙说:"今欲用兵,兵非不敷,但虑路远,运饷殊难。"④京师距伊犁1.6万里之遥,是远征昭莫多行程3倍以上,沿途沙碛戈壁,赤地千里,条件更加恶劣,若贸然进军,"米粮焉能接济"⑤。他把解决军粮的办法从长途运输转向屯田。

① 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② 《清圣祖实录》。
③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清圣祖实录》。
⑤ 《清圣祖实录》。

康熙54年初，下令勘察可耕地亩，以备屯田。他谕大臣说："今岁停止进兵，俟种地及一应事务预备完毕……再行定夺。""若种地得收，则诸事甚易。"[1]屯田分为两路：北路屯田和西路屯田。

一、北路屯田

北路屯田创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该年春，策妄阿拉布坦进犯哈密并"侵略五寨"，清廷西北两路出兵征讨。七月，右卫将军费扬古率军进驻扎布罕河、特斯河一带。"以屯田事询喀尔喀土谢图汗，据称：苏勒图、哈拉乌苏、拜达拉克河、明爱、察罕格尔、库尔奇勒、扎布罕河、察罕瘦尔、布拉罕口、乌阑固木等处，俱可种地"[2]。经过勘察，相继在科布多—乌兰固木屯垦区、鄂尔斋图杲尔屯垦区、莫岱察罕瘦尔屯垦区；鄂尔昆—图拉屯垦区、额尔齐斯屯垦区，兴水利，驻军屯田。

科布多—乌兰固木屯垦区

该垦区在今蒙古国境内。见于记载的有乌兰固木、科布多、阿尔滚固哲、西巴里鄂希、那马尔济虎、勒尔察汗郭尔、特里、阿尔泰。这里地方辽阔，开垦之处颇多，原系厄鲁特等耕种好地[3]。康熙五十五年初（1716年），清廷"令付尔丹率善种地之土默特兵一千人携种子、农具前往耕种"[4]。以后增派绿营兵丁，开渠引水。乌兰固木之特里河畔"每种麦一斗，收麦二石有余"。收获粮食，"以骆驼运至乌巴萨池，再以渡水小船运过特思河至营，不至劳费，而于兵饷大有裨益"[5]。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总理屯田事务苏永祖呈称："……在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处开垦耕种，因土沃水裕，今年所得麦子，一倍收有六倍，爰清明年添种千石。"[6]千石种子，可种万亩。这仅是屯地一处，可见科布多—乌兰固木屯垦区规模是不小的。

鄂尔斋图杲尔屯垦区

这一屯垦区，"居喀尔喀游牧地方之中"[7]，距杀虎口36站。"田地沃饶，四时寒暑与内地相同"[8]，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振武将军付尔丹奏请筑城驻兵屯田。至此，屯田迅速发展。六十一年（1722年），付尔丹奏报："鄂尔斋图杲尔等处地方，屯田收获糜子、青稞、麦子共一万二千石有奇。"[9]屯田面积当在万亩以上（以亩收一石计）。

莫岱察罕瘦尔屯垦区

位于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南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将军付尔丹奏称：

---

① 傅恒等著：《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② 《清圣祖实录》。
③ 《清圣祖实录》。
④ 傅恒等著：《平定准噶尔方略》，台湾商务印书馆。
⑤ 《清圣祖实录》。
⑥ 《清圣祖实录》。
⑦ 《清圣祖实录》。
⑧ 《清圣祖实录》。
⑨ 《清世宗实录》。



"莫岱察罕瘦尔与鄂尔斋图呆尔二处,各筑一城,每城宜盖房两千间。自鄂尔斋图呆尔至莫岱察罕瘦尔,宜设立十一站。"[①]康熙六十一年因该区歉收,清政府决定将屯卒、农具"移至科布多、乌兰固木地方耕种"。原屯垦区交由发遣罪犯耕种[②]。雍正十年(1732年)上谕云:"察罕瘦尔城甚小,止可屯积粮石,是以顺承亲王,又修木城",因该城是为囤积军粮而建,故又称粮城[③]。

鄂尔昆—图拉屯垦区

垦区位于今蒙古国杭爱省相邻处,地处河谷地带,宜于农业。雍正三年(1725年),振武将军穆克登奏呈:"鄂尔昆一带尚有昔人耕种及灌水沟渠旧迹,图拉等处,现有大麦、小麦,并非不可开垦之所。"[④]四年(1726年)试种麦糜、青稞,俱可成熟。五年(1727年)屯区产瑞麦,"有一茎至十五穗之多"[⑤]。由大同总兵官马觌伯进献。七年(1729年)"鄂尔昆、集尔麻泰、图拉三处屯田,收获大麦、小麦、糜子共七千五百五十石有奇"[⑥]。十三年(1735年)鄂尔昆修筑大城,"周长一千八十丈,四面开三门……南门设银库,米仓"[⑦],囤积粮饷,鄂尔昆屯垦区年收粮高约达二万石[⑧]。以亩产石粮计,面积在2万亩左右。

额尔齐斯屯垦区

屯田于伊苏图、铿格尔地方。

二、西路屯田

西路屯田,开始于康熙五十五年初(1716年)。康熙五十四年,清准战事再起,清军进抵哈密。右卫将军费扬古奏称:"哈密地方,亦可耕种,应行文将军席柱、尚书富宁安,将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处勘明具奏。"[⑨]五十五年初,户部尚书富宁安查勘后认为"巴里坤以东,肃州以西,俱有可耕地亩"。奏准开屯耕种,从此时起自巴里坤至河西凉州陆续广开屯田,输粮供西路军需。

西路屯田有军屯、民屯两部分。

军屯在新疆境内的有巴里坤、吐鲁番、哈密三处。

巴里坤屯垦区

巴里坤是新疆的东大门,"险扼全疆,路达南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西路军屯兵要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春,清廷派绿营兵500名专事耕种[⑩],"尚有

① 《清圣祖实录》。
② 《清圣祖实录》。
③ 《蒙古游牧记》卷10,札萨克图汗部。
④ 《清世宗实录》。
⑤ 《清世宗实录》。
⑥ 《清世宗实录》。
⑦ 《清高宗实录》。
⑧ 《清世宗实录》。
⑨ 《清圣祖实录》。
⑩ 傅恒等著:《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满洲绿旗兵丁750名，尽可足用”[1]。当年所种的青稞、大麦均获丰收。秋末玄烨派员亲赴巴里坤军前“阅视满汉官兵，共立二十三营，周围二百余里，军势雄壮，首尾相应”[2]。巴里坤屯田主要在杜尔博尔金、哈喇乌苏。康熙五十七年，在杜尔博尔金等地所种之青稞，运至军营500余石，“杜尔博尔金因离营近，是以将历年所收之谷，派令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以己力运至营中，并未动用钱粮雇运”[3]。康熙六十一年，巴里坤屯田收获的青稞达到15 070石。



图39　巴里坤古城遗址

雍正元年（1723年）收获青稞21 060石，连年屯种得收。雍正四年（1726年）清准（即准噶尔部）议和，巴里坤屯田一度放弃。雍正七年（1729年），清、准关系再度紧张，清军再次进驻巴里坤。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率军8 000人二次进疆，驻巴里坤，于当地筑城兴屯，边屯田边戍边。八年，“巴尔库尔、图呼鲁克等处屯田收获青稞三万六百八十石有奇”[4]。九年，岳钟琪奏呈云：“至于各营屯田，亦俱在军营以东，联络不远，现在播种，共拨兵丁5 000余名。”[5]十一年（1733年）青稞收获多达46 100石。若以每丁20亩计，屯地约在10万亩左右。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准议和，巴里坤屯田再次中断。

哈密屯垦区

哈密是汉唐屯田基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哈密伯克额贝都拉归附清朝，次年被清廷封为哈密王。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上谕：“哈密所属布鲁尔、图呼鲁克接壤之处……俱可耕种，应各令派人耕种，给予口粮、牛、种。”[6]随即命副都统苏尔德领军在哈密、巴里坤等地募兵屯田。这年十月“图呼鲁克、哈喇乌苏等处，所种之地，俱已收获”。康熙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等年，官种所收之谷俱用官驼轮流运至营中。康熙五十八年十月，图呼鲁克所种青稞，原想雇运至营，但图呼鲁克处于旷野之地，难以觅雇夫骡车辆。考虑到兵丁急需，用官驼将3 100余石青稞运至营中[7]。雍正二年（1724年），哈密屯区收粮1 746石。雍正三年（1725年）清

① 《清圣祖实录》。
② 《清圣祖实录》。
③ 《清圣祖实录》。
④ 《清世宗实录》。
⑤ 《清军机处副录奏折》。
⑥ 《清圣祖实录》。
⑦ 《清圣祖实录》。



准议和，清军撤走吐鲁番和巴里坤的屯军。在哈密留军一千余人，屯田戍边，以观察准部动向，防止其侵犯。当年塔勒纳沁、图呼鲁克等处屯田收获青稞8 932石，雍正四年高达11 353石。

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二次进驻新疆东部巴里坤，清军在哈密东200里的塔勒纳沁(今哈密沁城乡)开始屯田，当年收粮4 000石。雍正七年(1729年)"议垦哈密及塔勒纳沁地。八年，获麦、青稞6 400石"[①]。

雍正十二年(1734年)，副将军张广泗奏明："于哈密蔡把什湖地方，勘得荒地，由榆树沟水口开渠引灌，可垦荒五万亩，建议派军屯垦。"[②]十三年(1735年)哈密屯军开始在蔡把什湖屯田。当年，宁远大将军查郎阿等奏："留哈密兵二千，以屯田则不敷"，"应以留驻巴里坤兵二千，再增一千，悉驻哈密，合兵五千，则兵力不分巡防、屯牧，咸可办理"[③]。5 000屯军，分驻四处屯田，即哈密西的三堡、沙枣泉、哈密东的塔勒纳沁，各驻军1 000屯田，哈密东南的蔡把什湖，驻军2 000人，开垦荒地1万亩，熟地3 000亩，每年收获小麦、糜子、粟谷共8 000石。

塔勒纳沁在哈密城东北200余里。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哈密额敏伯克命维吾尔农民在此耕种，称为回屯(清代称伊斯兰教为回教，称维吾尔人为回民)。但规模很小，次年才收了608石。哈密至巴里坤中隔天山库舍图岭，因清兵运粮，往来人马车辆增多，驻军便在沿途安设台站。

吐鲁番屯垦区

吐鲁番位于乌鲁木齐以东，"服属于准噶尔，岁有纳输"[④]。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将军席柱在进军乌鲁木齐战役计划中提出："吐鲁番与哈密接壤，且系策妄阿拉布坦咽喉要地，不可不先取。"[⑤]康熙六十年(1721年)七月，散秩大臣阿喇衲率军进驻吐鲁番，十二月，康熙帝谕："吐鲁番现驻官兵，其可种之地甚多，总督鄂海、按察使永泰，在大将军处无甚事务，着前往吐鲁番地方，种地效力。"[⑥]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清廷从巴里坤调绿营兵五千赴吐鲁番"筑城、种地、驻防"[⑦]。雍正元年收粮9 330余石[⑧]。雍正二年(1724年)收粮5 540石[⑨]。雍正三年(1725年)清、准议和，清军主力东撤，但"将种地兵一千名，暂留彼处，交于副都统克什图管辖"[⑩]。当年收糜麦6 090石，不久便放弃了。

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再次进驻吐鲁番，在当地维吾尔人的支持下，屯田

① 《新疆识略·哈密屯务》。
② 《新疆识略·哈密屯务》。
③ 《清世宗实录》。
④ 常钧：《敦煌随笔》卷上，回民五堡。
⑤ 《清圣祖实录》。
⑥ 《清圣祖实录》卷295。
⑦ 《清圣祖实录》。
⑧ 《清世宗实录》。
⑨ 《新疆识略·吐鲁番屯务》。
⑩ 《清世宗实录》。

戍边。九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称："吐鲁番地方饶沃，宜广为屯种……屯种之农具、种子，宜预为办运。"[①]噶尔丹策零不断派军袭击围攻吐鲁番各城，巴里坤数次驰援。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清廷将吐鲁番人迁往瓜州。清军撤，吐鲁番屯田放弃。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噶尔丹策零黩武好胜，图谋向喀尔喀扩展，胤禛决定西北两路大军从科布多(今外蒙古科布多省会布扬图河畔)和巴里坤出兵合击伊犁。噶尔丹策零表示愿与清朝修好，缓兵期间，准噶尔出兵2万突袭西路清军，清与准部关系进一步恶化。

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准噶尔派人到科布多清军北路大营诈降，说噶尔丹策零先遣部队不过1 000，现在科布多以西的博克托，不堪一击。清将贸然遣兵4 000奔袭，途中被早已埋伏在山中的准噶尔军队包围。清军的援军大部被紧紧包围在科布多以西200里的和通泊。这一役，北路清军损失惨重，1万多清兵，逃回科布多者仅2 000人。噶尔丹策零乘胜挥军突袭喀尔喀。喀尔喀亲王额附策零英勇善战，率蒙古兵2万夜半间道，黎明时分突自山上大呼压下，两军相遇于鄂尔浑河畔的额尔德尔尼昭(即光显寺)。激战3日，准噶尔大败而逃。光显寺一战，准噶尔部损失惨重，元气大伤，遣使请和。遂划定牧区界限，准噶尔部在阿尔泰山以西放牧，不得越过界东，而喀尔喀部在阿尔泰山以东放牧，不得越过界西。局势暂时得到缓和，以后维持了将近20年的和局。

清代初期西域的屯田，主要是出于平定准噶尔战争的需要。康熙帝玄烨三次出塞亲征噶尔丹，深切感受到长途转饷的困难。如魏源所说："军事莫重于转饷，而转饷莫难于塞外。"[②]为此，玄烨采用汉唐屯田办法。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军进驻喀尔喀西部和西域(今新疆)东部后，清军与准噶尔的战局长期处于对峙局面，为了解决塞外军队的粮饷供应，玄烨命令两路大军屯田备边。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统计出屯田的总收获粮食数，仅就《清实录》中不完全的记载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基本上解决了塞外驻军的粮食供应，"裕军需于绝域"，又大大节省了转输费用。这一时期屯田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其意义是深远的。

首先，屯田的设置，巩固和加强了清军前线的防守阵地，有效地制止了准噶尔部的内犯。准噶尔部在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执政时期，势力达到全盛。向西征服了哈萨克大、中帐，控制中亚塔什干、撒麻耳干等城；南越昆仑，入侵西藏，据拉萨，锐不可当。然而同一时期，准噶尔曾屡次进攻哈密和喀尔喀地区，双方虽互有胜负，但战事基本局限于清军的前线阵地附近，使准部无法前进，充分显示了军事防守和屯田生产相结合的战略方针的正确。

其次，为乾隆后来平定准部叛乱，统一新疆，进行了准备。康熙朝在西路屯田，在西域开军府于巴里坤城；雍正朝北路屯田，在喀尔喀设军府于乌里雅苏台

① 《清世宗实录》。
②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城(今外蒙古扎布汗省会孔布哈朗特),使之成为西部、北部的军事中心。乾隆帝弘历两次出兵伊犁,平定准部叛乱,统一新疆,都是以巴里坤和乌里雅苏台为进兵基地和供应基地的。魏源在讲到清朝经营新疆时说:"圣祖(玄烨)垦之,世宗(胤禛)耨之,高宗(弘历)获之。"[①]道出了康、雍、乾三代经营西域的相互关系。

再次,屯田对所在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喀尔喀蒙古和哈密维吾尔族在康熙朝先后归附清廷,并参与平定噶尔丹叛乱。以后一直首当其冲,直接受到准噶尔兵锋的威胁。清廷在前防阵地长期设屯驻防,保护了新附诸部免受准噶尔欺凌,使他们与清朝的关系得到加强。巴里坤大营辖哈密、吐鲁番等地,乌里雅苏台大营辖阿尔泰山以东,并建筑了科布多城,使这些地区人民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进行生产,这是喀尔喀地区、哈密、吐鲁番乃至以后整个新疆长期统一于祖国的原因之一。屯田使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迅速传入西域,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为清代统一新疆之后的大规模屯田,积累了经验。

但是,从康熙到雍正时期,新疆的屯田规模不大,局限在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和额尔齐斯河一带。且时屯时撤,发展是不快的。这和康熙玄烨对待策妄阿拉布坦的态度有关。

玄烨对策妄阿拉布坦,开始是友好的。当康熙十年(1671年),噶尔丹杀僧格次子而自立为汗时,策妄阿拉布坦深感危殆,向清乞降,"圣祖卵而翼之,使协力擒仇"[②],态度是友好的。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穷途末路中的噶尔丹"仰药死"(一说暴病而死)。策妄阿拉布坦献噶尔丹之尸于清,且在清军征讨噶尔丹时,策妄阿拉布坦率劲旅伏阿尔泰山以策应,占领伊犁及额尔齐斯河一带,使噶尔丹回不了老巢。策妄阿拉布坦在平定准部叛乱中是有功的,给玄烨的印象是"外驯昵"。于是"划阿尔泰山以西到伊犁,俾捐游牧"。此时,清廷对策妄阿拉布坦是扶持的。以后,"复成西部大部落"。

过了三年,策妄阿拉布坦欲征第巴(顾实汗及其子孙所委执掌西藏事务的官员),玄烨开始意识到策妄阿拉布坦"潜怀不靖",引起警惕。遂嘱大臣"因举汉赵充国所奏屯田事,敕所司留意"。这是因为要出兵解决万里之遥的策妄阿拉布坦,靠运粮不行,于是着眼于屯田。但只是说了一下,并未组织实施。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准噶尔部兵2 000侵哈密,这才引起了清廷重视。立即组织北路和西路屯田,并加强了第一线的兵力。就在这时,也未下决心"犁其庭"。所以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在清军胜利进军乌鲁木齐的情况下,策妄阿拉布坦看见形势不利,就找了"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代为请罪"。清廷就同意撤军了。说明玄烨并未决心用武力征服准噶尔部。基于这个态度,清廷对准部的方针

①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是，服则舍，叛则伐，“来勿纵，去勿追”[①]的遏制方针。反映在军事行动上，当与准部矛盾尖锐时便进兵，缓和时便撤军，“旋罢旋调”；反映在屯田上是时屯时撤，规模不大，发展很慢。雍正时期，也基本是遵循了这一方针的。玄烨曾对胤禛密谕：“贼巢遂远，我师往则我劳，贼师来则贼困。唯有严兵诱致邀击为万全策。”[②]所以当噶尔丹策零于雍正九年、十年两次东犯喀尔喀，遭惨败，元气大伤。十一年侵哈密，又受重创，不得已而向清求和。清军亦未乘胜追击，北路筑城于鄂尔昆河，留戍兵屯田防秋，西路则戍哈密、巴里坤，仅备边防守而已。

第三节　关于屯田与屯垦的探讨

屯田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中渠犁条，载桑弘羊等征和中上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各使以时益种五谷。”在“校尉”领导下的“屯田卒”进行“通利沟渠”、“种五谷”的屯田种植，是谓军屯。军队屯田，自汉代以来，历代相沿，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认为这是“养兵而不病于农”的良策；是军队就地解决粮食供应，巩固边防的战略措施。史书中对军队屯田有大量的记录和赞誉。

关于民屯一事，始于《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元年（196年）武帝“用枣祗、韩浩等议，始于屯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灭群贼，克平天下。”“募民屯田”，说明这是民屯，且在“征伐四方、克平天下”中，因“所在积谷、无运粮之劳”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屯田。《汉语大辞典》是这样记释的：“利用戍卒或农民，商人垦殖种地，汉以后历代政府沿用此措施取得军饷和税粮，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分。”举例：“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

《汉语大字典》对屯田的定义是：“军队在驻地垦荒耕种。”另有学者述：“屯田就是屯守，屯戍，屯驻之士卒，从事田耕。”这两种说法意思是一致的，结合史料研究，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更合理，更完整。是应把军屯、民屯、商屯都包括在屯田内。

关于屯垦。《清文献通考·田赋·屯田》称屯垦即“屯兵边境，开垦荒地”。举例：“雍正三年，会安西兵丁，试行屯垦。”[③]《汉语大辞典》关于屯垦条释：“屯田垦殖。”《明史·费瓛传》：“以凉州多闲田，请给军屯垦。”《清史稿·食货志一》：“罪徙当遣者，限年屯垦，已事释还。”从字义上看，垦即“开垦，开辟荒地：垦荒、垦殖、垦区”。

①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辞源·寅》，第146页。



屯田、屯垦有相同内容，汉唐时期多用屯田一词，记述军屯、民屯。但是仔细分析，屯田与屯垦还是有区别的，屯垦主要是指“屯兵边境，开垦荒地”。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军队集体转业，开赴边疆，开荒种地，多用屯垦，如黑龙江屯垦区、内蒙古屯垦区、云南屯垦区、海南屯垦区，驻疆部队11个师、10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肩负起屯垦戍边的使命。中央成立了农垦部，有关省成立了农垦厅，各垦区成立农垦管理局，专司屯垦事业。“屯垦”一词在全国广泛传播与使用。



第十一章　乾隆嘉庆时期新疆屯垦

第一节　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

1755年(乾隆二十年)2月,两路出师平准部。北部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副之,出乌里雅苏台;西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副,出巴里坤。两路各率军2.5万名,马7万匹,携带两个月粮饷,相约会师于博罗塔拉河。

两副将均擎其旧旗先进,大军所至,群众"携酮酪,献牛羊",络绎于道。清军长驱千里,无有敢抵抗者。沿途也纷纷内附。4月底,会师于博罗塔拉,5月2日抵达伊犁。弘历接奏报,在《西师抵定伊犁捷音至诗以述事》诗中自注:"据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等奏称:大兵至伊犁,部众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自出师以来,无血刃遗镞之劳,敉边扫穴,实古所未有。"

达瓦齐未备,闻讯,大惊。率兵万人退至伊犁西南180里的格登山进行抵抗。清军士气倍增,争渡伊犁河,速进军。将接敌,夜遣原准部将军阿玉锡率20余骑去侦察,阿玉锡乘敌无备,突捣其营,横冲直撞,挚旗大呼,犹如千军万马,敌大惧,溃不成军。清军仅20余人,降其众7 000余人。达瓦齐仅率百余骑越冰岭投乌什城,为城主霍集斯所执。为纪念这次胜利,弘历亲撰四言碑文诗,令在格登山树起《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此碑今天仍在。准部初步平定,清廷撤军。命班第率士卒500人留在伊犁善后戍边。

初,厄鲁特四部,各自独立,不相统属。自噶尔丹兴起,统四部,与中原抗衡者数世。至是,乾隆欲以杜尔伯特、和硕特之旧,以辉特补土尔扈特,以绰罗斯代准噶尔,仍为四厄鲁特。分封阿睦尔撒纳等四降者为汗,"众建而分其力",以实现统一。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再形成割据一方,与中央抗衡的局面。唯阿睦尔撒纳野心勃勃,



欲为四部总台吉，以专制西域。在伊犁，隐隐"以总汗自处，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服赐以翎顶，不用副将军印，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讳言其降，言统领满、汉兵平此地。并阴使哈萨克、布鲁特流言：'非己总四部，边不得安'。"[①]与其党人日夜聚谋，诡秘莫测。班第将此情密奏，乾隆令班第除之。但大军已撤，未敢动手，只是催阿入觐。阿睦尔撒纳行至乌伦古河，乘机逃回，四处煽动。伊犁诸喇嘛、宰桑，纷纷响应。班第和鄂容安率兵士奋力抵抗，奈寡不敌众，退走200余里至乌兰库图勒（今尼勒克西）被贼围攻，力战不敌，班第并鄂容安，俱疆场自刎，所部或战死或被俘。时永常驻乌鲁木齐，闻变甚惧，退军至巴里坤，移军粮于哈密，敌愈加猖獗。

1755年9月，乾隆封噶尔藏为绰罗斯汗、沙克都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车棱为杜尔伯特汗。公元1756年1月，清军两路兵三四万，并力进剿，长驱直入抵特克斯河，2月进入伊犁。阿睦尔撒纳仓皇逃至哈萨克。因清廷所遣主帅策楞、达尔党阿等人，均非任事之材，或顿兵不进或见欺。诸从征降将、桑宰见两将军无能，皆轻之。不久，皆变。绰罗斯、辉特二部及哈萨克先叛。阿睦尔撒纳闻讯，速自哈萨克归，会诸叛首于博罗塔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又大乱。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1 500兵驻防伊犁河，闻变，率部抗击。自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自十一月启行，战于鄂垒，战于库图齐，战于达勒奇，前后杀贼数千。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至乌鲁木齐，诸贼皆会，连日数十百战，我兵无不以一当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袜不完，食瘦驼、疲马，且将尽。二十二日至特纳勒，不复能冲击，乃结营自固。时天大风雪……"[②]新疆阴历十一月，正是朔风怒号，千里冰封的严寒季节，兆惠率1 500名士兵，在敌重兵攻击下，从伊犁千里转战到乌鲁木齐，历经艰险，这件事对乾隆的印象是很深的。

3月，命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大举进剿阿睦尔撒纳。7月，阿睦尔撒纳败逃俄罗斯，后患天花而死。至是，历经康、雍、乾三朝，历时68年的平准战争以清廷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节　乾隆的屯垦政策

清廷统一新疆后，边疆如何巩固？对准部如何统辖？都成为首要之事，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政府对边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清初期，新疆屯田主要是为了"裕军需，省转输"，服务于军事行动，是作为保障军粮供应的一个临时性措施。表现在当清与准噶尔矛盾尖锐了，就进军征伐，就组织屯田；待关系一缓和，就撤军，逐渐裁撤屯田。

这个时期，对准部是采取"叛则伐，服则舍"的方针。叛乱平定后，除在西路

①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巴里坤，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屯兵以监督外，在准部腹地伊犁只留少量军队。主要靠封准部首领为王、为汗、为台吉而统驭诸部。乾隆帝最初的想法是："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同时，"每年自京遣派大臣一员，前往巡查该处情形"[①]。但两路大军刚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即不满清廷的分封，"必欲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起兵反叛，各部上层喇嘛、宰桑蜂起应之"。定北将军班第所率500人在伊犁全军覆没。1755年冬阿再叛，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1 500名士卒，从伊犁苦战到乌鲁木齐的特纳格（阜康），伤亡惨重，几乎覆没。两次惨痛教训，使乾隆痛感："准部诸酋，甫受封赏，归辄叛。"[②]体会到这个办法不能安邦定边。于是，平定准部后，决定变间接统驭为直接统辖，对新疆实行军府制。建军府于伊犁，设将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节制南北两路驻防官兵，抚绥属部，监督外藩，为统治新疆之最高长官。此外，乌鲁木齐设都统，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设一参赞大臣；其他诸城，各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或领队大臣，分管各地的军政事务。自都统、参赞以下皆节制于伊犁将军。各地的伯克、扎萨克、州县长官及驻防官兵，都必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服从伊犁将军的管辖。同时在新疆驻屯大军，这一时期，全疆各地的军队经常保持在1.9万人至2.3万人之间。驻兵重点是天山北路，驻军多且为携眷永驻之驻防军。为了巩固边防，稳定新疆，采取"边防与屯政相维"[③]的方针。于是大兴屯田，屯垦戍边。清政府多次命令统军将领："无分进剿、屯田兵丁，随到即令开垦地亩"，"以省兵粮运费"[④]。把屯田作为长治久安的安边定国之策。随着平准战争的进展，每平定一处，随即屯田一处，巩固一处，从巴里坤起，逐步向乌鲁木齐，向伊犁发展。屯随兵兴，兵依屯饷，形成了一条屯垦区组成的边防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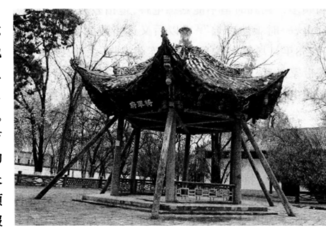


图 40　惠远伊犁将军府

乾嘉时期是清代在新疆屯垦的兴盛时期，屯田发展很快。主要以军屯为主，以后陆续兴办旗屯、遣屯和民屯、回屯。

① 《清高宗实录》。
②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清高宗实录》。

军屯(兵屯)

即以汉族士兵组成的绿营兵丁屯田,这是新疆清代屯田的主要力量。绿营虽是清代的正规军,但其地位远在八旗之下。因此,屯田、运输等庞杂艰苦的军事任务,主要由绿营兵丁承担。军屯是清代屯田的主要力量。每卒一般授田20亩,每屯士兵百名,种田2 000亩上下。《清史稿·食货志一》卷120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定章百兵一屯,地亩人二十,分小麦十一,谷七,青稞豌豆各一"。乾隆三十二年(1766年)木垒"额定屯兵五百名,种地一万亩"[①]。实际上有的超过20亩。由官给种子、耕牛、农具。每卒纳粮12~18石,视地肥瘠有差。屯田士兵,开始三年一轮,以后改为五年。"新疆各处屯防兵,均由陕甘两省绿营兵派往,向例三年更换,嗣改五年一换。"[②]每人每月发饷银一两,而内地所发粮饷,家属支请如故。实际上,换班屯兵支领双份粮饷。所以许多士卒"故多乐往"[③]。换班兵屯田弊病颇多,"初到时俱不能熟悉屯种,迨指教方熟,又届换班之期。其新换班之官兵到屯,一时不能有效"[④]。以后又逐步改为携眷永驻,屯田成边。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连获丰收,余粮甚多。清廷谕令:"此项屯田,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行准其带往,伊等即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其业。"[⑤]为了鼓励驻防屯兵携眷,清政府规定:凡屯兵搬眷到屯,费用官给,"每口每百里给盘费一钱二分,小口减半,每三名给车一辆"[⑥]。于是携眷驻防屯兵就迅速增加,从乌鲁木齐逐渐扩展到巴里坤、木垒、古城、精河、伊犁、哈密等地。据《钦定新疆识略》等书载,道光年间各屯区携眷兵已达6 100余名。为了加强对军屯的组织领导,"调派武职以专其成,特置重臣以董其事"[⑦]。新疆设有屯田总兵,负责屯田的管理;还有管屯副将、管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各员等,并有严格的奖惩制度。据《新疆图志》所载,到乾隆四十二年新疆屯兵达13 904人,种地283 108亩,岁获粮14.3万余石,成为新疆军粮的主要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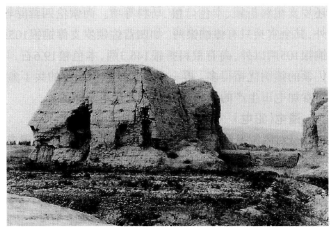
旗屯

即伊犁惠远、惠宁两城驻防之满、蒙、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八旗兵所垦种之田。

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统一中原,定鼎北京,为满清政府立下了赫赫功勋。顺治帝设置"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又派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与边疆重镇,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称"驻防八旗"。

---

① 《清高宗实录》。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④ 《乌鲁木齐政略》。
⑤ 《清高宗实录》。
⑥ 《清高宗实录》。
⑦ 《西域图志》。


图 41　察布查尔西部锡伯营驻守的卡伦遗址

新疆驻防八旗是平定准噶尔之后，从陕甘及热河调来的。

清政府对八旗官兵十分宠信，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大抵八旗皆以国力豢养之”[①]。八旗兵丁以其优厚的粮饷及其他优待收入，生活富裕，养活一家数口而有余。由于政治地位的变化，生活的优裕，八旗兵丁，骄横奢侈，日益腐化起来。“以致兵丁怠惰偷安，俱归无用”[②]。乾隆帝弘历对此深感忧虑，他对伊犁将军明瑞说：“满洲八旗从来敦尚本业，以技勇为务。原无奢侈靡费之事，近来各处驻防，渐染汉人习气，是以令其远移，俾习于劳苦，庶还淳朴之旧。”[③]特别是由于八旗兵丁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于是八旗的生计日益困难起来。为了解决八旗兵丁的生计问题，除增加兵额，设立满营官铺等措施外，便是举办屯田。旗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办起来的。八旗军队屯田和绿营兵屯田，虽同属军屯，但因八旗与绿营地位不同，所以，屯田的各项制度及待遇，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绿营屯田的劳动者是士卒。而旗屯的劳动者不是八旗士卒，而是八旗闲散余丁。清政府要求兴办旗屯“即使旗人有田可耕，而与新疆重镇设兵防守事宜无少窒碍方为尽善”。故规定旗屯地亩“只可交闲散余丁代为耕种，不当令官兵亲身力作，有妨操练”[④]。

其次，耕畜由官牧厂赏借，实际是无偿授给。与绿营军屯不同之处是：军屯有一定比例的消耗，损耗额由官牧厂补拨。旗屯耕畜倒毙“均着落各旗自行买补”。军屯的农具、种子由官方无偿拨给。旗屯农具则从八旗组织的“公设官铺息银”中贷款购置，种子从“仓存余粮中赏借”。这是因为军屯收获粮食，上缴国家，而旗屯收获是用于补贴本旗人口的生活。因此出现国家在拨给生产资料时出现了差别。

再次，一般学者，将驻新疆伊犁的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四营也列为八旗。但他们与满蒙八旗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待遇不同，满蒙八旗官兵除俸饷银外，

① 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还岁支粮料折银、本色口粮、马料等项。而索伦四营除轮驻卡伦空蓝翎支本色粮外，其余官兵只有俸饷银两。如四营佐领岁支俸饷银105两。满蒙八旗佐领岁支俸饷银105两以外，尚有粮料折银146.3两，本色粮19.6石，马料12.3石。比索伦四营佐领的俸饷优裕得多。再一个区别是索伦四营的兵丁参加屯田生产，这和满蒙八旗参加屯田生产的仅是"闲散余丁"是不一样的。

遣屯（犯屯）

是对囚犯发配新疆进行强制生产的一种形式。遣屯依附于军屯。

将罪犯发配边塞，最早可追溯到秦代。秦并六国之后，派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占河南地，徙民实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图42 塔城达斡尔戍边纪念碑

西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考虑到戍边士卒，轮番更换，难收北御匈奴，巩固边防之效。建议："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①]。这是最早利用罪犯充实边地，进行屯田的文献。自西汉以来，历代相传，直到清朝，都用大批"弛刑士"、"免刑罪人"、"罪人"、"死罪囚"、"犯流死亡匿者"、"杂犯死罪"，及清代按律应拟"死、军、流"的罪犯，定为遣罪。发遣西北边地，进行屯田。乾隆帝弘历谕旨："此等发遣人犯，本属去死一间，投畀远方，既不至渐染（内地）民俗，而新疆屯垦方兴，又可力耕自给，实为一举两得。"[②]在谈到对遣犯的政策时说："将应遣人犯，悉令携眷遣发该处。其能改过者，拟定年限，给予地亩，准入民籍。"[③]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陆续向新疆发配犯人进行屯田，主要分布在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伊犁等八处。每人拨田12亩，官给种子、耕畜和农具，每年交细粮6石。

遣犯屯田后的出路有三。一是充当绿营兵丁，这是在战时有特殊贡献者。乾隆三十年（1765年），乌什维吾尔人起义反清，"乌什贼众，负固死守"，清军围城，

① 班固撰：《汉书·晁错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傅恒等著：《平定准噶尔方略》，台湾商务印书馆。
③《清高宗实录》。

久攻不克。将军明瑞“调伊犁遣犯12人,携云梯前列。冒死登城,进占城垣”。乾隆帝下令加恩“即令充补绿营兵丁”[①]。又如镶蓝旗蒙古兵丁绰勒瑞等191名“出旗为民后,复钻营入旗食粮”,被遣发乌鲁木齐屯田。在屯田期间“各奋勉耕种,甚属安分”[②]。乾隆二十八年获准“补充绿营兵丁”[③]屯田。第二条出路是返籍为民。这也必须是对清廷有特殊贡献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伊犁“遣犯史二、莫绍仁在崆郭尔鄂博山后,拿获逃犯除四”,乾隆帝弘历得知后,下令史、莫二人“如愿回原籍,即各遣回原籍。再有似此者,即著为例”[④]。道光七年(1827年),阿克苏遣犯68名“随同官兵防堵出力……释回遣犯二千户”[⑤]。第三条出路是落户边地。大多数遣犯到新疆屯田后,落户边疆为民。清政府举办犯屯的目的是:“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而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军机大臣等议定:乌鲁木齐遣犯能改过者,准入民籍。“当视其原犯情罪轻重,将原拟死罪者,作为五年军流罪,轻者作为三年。年满无过犯者,陆续编入民册。”后经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此规定适用于伊犁遣犯。一些罪情重大的为奴遣犯“定为十年期限”[⑦]。遣犯为民后,官费佥送遣犯眷口到屯区,由政府拨贷生产生活资料。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准:“遣犯为民,每户拨地三十亩,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房价银一两,每六人给农具一副、马二匹,每匹作银八两,拨地之次年升科,房价、马价分作三年带征。”[⑧]

民屯(户屯)

主要是招募关内的农民来疆耕种。也有一部分是商民承屯,还有的是绿营兵丁的子弟、眷属。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天山以北原是准噶尔部牧地,经过长期掠夺和战争的破坏,田园荒芜。人口流失,牲畜死亡殆尽。为了开发边疆,巩固统一的局面,清政府在大兴军队屯田的同时,着力发展民屯。招募关内农民来疆,屯田实边。乾隆帝弘历谕旨:“新疆底定以来,缘边一带如安西、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地多膏沃,屯政中兴,原议招募内地人民前往耕种,既可实边储,并令腹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⑨]其好处是“则腹地资生既广,而边隅旷土日开,实为一举两得”[⑩]。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关内人民,特别是甘肃、陕西的农民,争先恐后来疆屯田耕种。民屯发展很快。从哈密、巴里坤起,西向木垒、乌鲁木齐、乌苏、精河发展;还有一路是西向鄯善、焉耆、阿克苏等地,民屯蓬勃地发展起来。

① 《清高宗实录》。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乌鲁木齐政略》。
④ 《清高宗实录》。
⑤ 《清宣宗实录》。
⑥ 《清高宗实录》。
⑦ 《清高宗实录》。
⑧ 《乌鲁木齐政略·遣犯》。
⑨ 《清高宗实录》。
⑩ 《清高宗实录》。



到1775年（乾隆四十年），垦地已达70余万亩。致使大片荒漠之地得以开发，"沙碛之区，绝无弃地，潟卤之土，尽变膏腴"。

民屯户的构成主要有五种：乾隆年间学士纪昀谪戍乌鲁木齐时写道："户籍题名五种分，虽然同位不同群。"注释中云："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行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发往种地为奴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①

民户，分内地招募和当地认垦两种。

从内地招募的主要是清政府在甘肃等地组织招募的贫苦农民。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四十五年（1780年）应募到天山北路的有8 000户，他们分别来自甘肃的安西、高台、肃州、敦煌、张掖、武威、镇番、平番、中卫、静宁及内地。对于招募民户，乾隆帝谕：要地方官员"悉心体察，随民情所愿，设法开导，善为经理"②。使应募户"自知新疆一带有自然美丽，到彼耕作，即可共享丰饶"③。凡应募赴疆屯田民户，官给路费、车辆。据《地丁题本》甘肃四节231~235页记载：应募户上路。十岁以上为大口，九岁以下为小口。大口每百里给银1钱2分，小口给银6分，各按路程远近发给。车费每三人给车一辆，进疆前，每百里给车价银4钱5分，入疆后每百里给车价银1两6钱。御寒皮衣每大口一件，折银9钱6分。每户给铁锅一口，折银4钱5分。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政府"办供招往乌鲁木齐、木垒等处垦田户民"的路费，共用银281 700余两。

对原在新疆屯田的单身民户，愿接眷属进疆者"其眷口在内地者，一体官为咨送"④。

后因应募赴疆者日众，清廷将资送费用"酌给一半"；稍后又令"向给一半之数，再减一半赏给"；后因"闻风愿往户民日多，即此等再行减半之数，亦毋庸发给，不过官为查照存案，听其自行前往而已"⑤。

民户到屯区后，由政府授予官地，一般每户三十亩，据记载："每户给地三十亩，愿多者听。"⑥

民户使用农具和种子，由政府赏给；耕畜、建房银和收获前的口粮，由政府借给；三年偿还。《乌鲁木齐政略》记载：民户到屯，官府"赏给农具一副、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外，借给房银二两、马一匹作价银八两"。"自开垦之次年，分作三年，每亩带征借项银五分，每年每户征银一两五钱，三年共征银四两五钱，

①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乌鲁木齐政略》。
⑤ 《清高宗实录》。
⑥ 《清朝通志·食货十二》卷29。

作为偿还费。”[①]

商户。在清军进军新疆，平定准部叛乱后，内地商贾源源出关经商。不少人搬迁家眷，招引乡亲子弟到垦区应募认垦。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鲁木齐就有“搬眷到屯商户一千一百三十六户，分别在迪化、阜康、济木萨、昌吉、玛纳斯、呼图壁认垦”[②]。《新疆识略·伊犁屯垦》卷6记载：“商民张子仪等三十二户，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共报垦麦地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亩六分。”平均每户承垦土地1 280亩。

商民认垦，一般每户拨土地30亩，但鼓励多种。“凡商贾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取结给照，永远营业。”[③]

商民在新疆屯田，每亩纳银5分到1钱，各地不同[④]。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地区“商民认垦菜园地”，“每亩每年额征银一钱”[⑤]。辟展、吐鲁番商民种菜地征3钱5分，喀喇沙尔征1钱6分。

兵户。即绿营兵脱离军籍的子弟屯田。军屯实行携眷制以后，屯兵子弟随父兄迁居新疆屯区。清制，绿营兵缺额从兵丁子弟中挑补。因兵额有限，有的绿营子弟，按民屯例认垦地亩。乾隆四十二三年间乌鲁木齐所属玛纳斯屯区有眷兵分户子弟380户。古城有46户[⑥]。乾隆四十五年伊犁有眷兵分户子弟“任世才等十四户人民屯承种地亩”[⑦]。

遣户。即发遣新疆屯田的罪犯，屯田期满落户于边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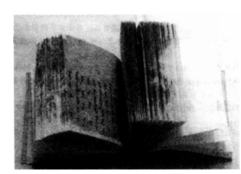
遣犯为民后，由政府拨贷生产、生活资料。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准，“遣犯为民，每户拨地三十亩、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房价银一两，每六人给农具一副，马二匹，每匹作银八两，拨地之次年升科，房价、马价分作三年带征”[⑧]。

清政府为了使遣户安心边疆屯田，鼓励带眷进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对发遣乌鲁木齐等处遣犯规定：“不分例应携眷与否，凡携眷者，一并给予口粮、车辆。”对已赴疆而未带眷者，清政府又补充规定：“有请愿在彼入籍者，即行文该省督抚，将伊等家属，照送遣例，办给口粮、车辆送往。”[⑨]后伊犁亦照此办理。

由于清政府鼓励遣犯期满在疆落户屯田的政策，许多遣犯后来就地为民。据《乌鲁木齐政略》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鲁木齐遣户有1 243户。纪昀在

① 《西域图志·贡赋》。
② 《乌鲁木齐政略》。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伊犁屯垦》，道光元年刊本。
⑤ 《西域图志》。
⑥ 《乌鲁木齐政略》。
⑦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⑧ 《乌鲁木齐政略》。
⑨ 《清高宗实录》。




图43 锡伯营西迁伊犁簿册

《乌鲁木齐杂诗》中写道："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戍边处处聚流人，百艺争妍各自陈"。此诗记述了流人在疆者众，百工略备。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不仅在农业生产上，而且在"百艺"上也是作出了贡献的。

安插户。法律中，遣罪内有边外为民例。安插户就是被清政府定为边外为民者，由政府强行起解徙边屯田。其来源有：

1)因地方发案被株连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甘肃固原州徐帽儿庄发生窃案，经查明："该庄回民五十八户，为匪犯案者三十八户，所剩户口……实未伙同行窃"，"均系赤贫"。但清政府仍决定，将未伙同行窃的二十户贫苦农民，"分作三起，遴员护解"，安置在巴里坤、木垒、乌鲁木齐三处照民屯例"酌给房地、籽种、牛具，以裨耕屯"①。

2)地方豪强大族。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地方有吴姓大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悛……久为地方之害"。"该族三十余户，男妇大小近百人，其鼠窃狗偷，习惯已成自然"②。政府为使其"败类析居，羽党四散"，"以绝根株"。分三批递发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收管……于近水荒地内酌给房地牛种，令其垦种升科"③。

3)西南各省赴安南开矿的民人在安南境内发生械斗，后回国者达二千余人。清廷认为"大都皆游手无赖，不安本分之人，若使仍留本地，日久必潜越夷境，仍滋事端"。令地方官员将"滋事悍黠者六十三名"，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迹涉犷悍者九百余名，发往乌鲁木齐、阜康、济木萨、呼图壁、芦草沟、塔西河、宜禾、奇台等处拨地屯种"④。

回屯(就是维吾尔族农民的屯田)

清政府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命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组织迁移阿克苏等地500户农民到伊犁垦荒种地，这是最早的回屯。后不断从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地迁移维吾尔人到伊犁屯田。

① 《清高宗实录》。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清高宗实录》。

第三节　乾嘉时期屯垦区分布

随着平准战争的进展和胜利，从东疆的巴里坤屯垦区起，向西屯垦区呈扇形展开。依次建成乌鲁木齐屯垦区、塔城屯垦区、伊犁屯垦区和南疆屯垦区。

一、巴里坤屯垦区

它包括巴里坤、哈密、木垒和奇台四垦区。

巴里坤和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扼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咽喉，汉唐时期就是屯田基地。清代康熙年间平定准噶尔反动贵族的叛乱之后，巴里坤成为"西域襟喉，中华拱卫"的要地。康熙五十五年，"清军在哈密、巴里坤等处屯田设防"①。清代名将岳钟琪于雍正七年(1729年)领兵驻防于此，开始修筑巴里坤城。九年，岳钟琪奏准拨兵丁5 000余名屯戍，人以20亩计，屯田面积约10万亩。

十三年(1735年)与准部相对峙的驻巴里坤大军撤退后，清政府于"哈密之三堡及沙枣泉、东北之塔纳勒沁各派兵一千进行屯田。另有官兵二千在蔡把什湖择地耕种公田一万亩"②，将五千名兵丁部署在相互照应的点上。到乾隆七年(1742年)清准关系缓和，除"蔡把什湖一处留少量由防兵耕种的屯地"外，有的停屯，有的交当地维吾尔族耕种。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出兵伊犁，平定准部，在"武定功成，农政宜举"的思想指导下，在天山南北大兴屯田，首先恢复和建设巴里坤屯垦区。据《新疆图志·赋税一》记载："乾隆二十年……荡平准部……若哈密以西，"则"自塔勒纳沁拨黄墩营兵、哈密卡伦兵各200试垦，著效……自是北疆则自辟展、而五堡、而昌吉、而罗克伦、而朴城子、而奎苏、而伊犁、而晶河、而库尔喀喇乌苏、而玛纳斯、而蔡把什湖、而塔尔巴哈台、而木垒、奇台、而吉木萨、而牛毛湖、而吉布库、而古城凡十七区。南疆则哈喇沙尔、而托克逊、而哈喇和卓、而阿克苏、而乌什凡五区。不出十年，兵屯、旗屯、遣屯、回屯、户屯遍及南北。"③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叛乱，清军再次西征。九月，将军兆惠在伊犁奏报："前奉旨令于伊犁附近地方，酌量派遣绿营兵丁屯种。查巴里坤至济尔玛台、济木萨、乌鲁木齐、罗克伦、玛纳斯、安济海、晶河等处，俱有地亩可种。伊犁附近地方，约有万人耕种地亩，崆吉斯、珠勒都斯等地，可种之地亦多。……请敕巴里坤办事大臣及甘肃抚臣，派出绿营兵一百名，委员酌带籽种、农具、耕牛，于明年正月前来，臣等按地分给耕种，俟试看一年，再行办理。"④

① 《清朝文献通考》。
② 《哈密志》。
③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赋税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④ 《清高宗实录》。



据《清史稿·食货志一》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巴里坤亦置屯，遣甘、凉、肃屯地兵五百往种，秋收后入城。三年更迭"。

关于乾隆时期巴里坤何时开始屯田，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的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甘、凉、肃三镇兵丁试垦哈密、巴里坤，揭开了新疆屯田的序幕。"也有的说："公元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第三次派军到巴里坤屯田。"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

1）《新疆图志·赋税一》记载："乾隆二十年荡平准部……若哈密以西则自塔勒纳沁拨黄墩营兵，哈密卡伦兵各二百试垦著效，遂为屯田开端……"

2）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兆惠奏呈中有："前奉旨令予伊犁附近地方，酌量派遣绿营兵丁屯种。"这年1月，清军再次出兵，平定准部叛乱，2月大军进入伊犁。据奏呈分析，清军二次出兵伊犁前乾隆帝弘历就将屯田和军事行动统一部署了，曾谕旨要兆惠在伊犁地方屯田。

3）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两路出兵，各率军2.5万名，马7万匹。西路军是以巴里坤为大本营的，在出征同时，在大本营所在地派400名绿营兵试垦是合理的。

据此笔者认为，乾隆时期巴里坤屯田开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筹办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屯田"①。陕甘总督奏请从甘肃甘、凉、肃三州先派种地官兵1 000名，前往巴里坤种地。他们原是驻在甘肃从事屯田的绿营兵，现在成为恢复新疆屯田的先行队伍。1758年巴里坤驻满兵3 000名、绿营兵1 500名进行屯田。巴里坤屯垦区，有以下几个屯区。

巴里坤屯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总兵丑达督兵在朴城子屯田。次年，甘、凉、肃等七提、镇千名官兵修渠垦荒，进行屯种。后额设屯兵500名，以游击领之，种地约2万亩，分为天时庄、大有庄、地利庄、人和庄四屯②。翌年，甘、凉、肃等七提、镇官兵于当地设屯。三十六年（1771年）十月，裁屯撤兵。

新疆经过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的残暴统治和蹂躏之后，"人烟减少，户口凋残，以致土地荒芜，回众穷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边防，仅仅依靠军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大力提倡民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募民开垦巴里坤等地。1765年"户民承种土地为两万六千亩"。次年即达到44 000余亩。可见民屯的发展是很快的。

三十一年（1766年）巴里坤总兵马德昌奏："木垒迤西一带，水泽有大有小，兹就水泽易周处，自吉尔玛泰（木垒县西吉尔乡一带）至特纳格尔，计可垦田8万余亩，安插民人2 700户。"③同年，清政府制订了《木垒安户章程》规定："新安户口，编

① 《清文献通考》。
② 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③ 《清史稿·食货志》。

立里甲。三千户编为十里,酌定里名,选立里长,以分界限”,户授地30亩。此后,关内户民接踵而至,纷纷迁来。1768年“巴里坤所属奇台、东吉尔玛泰等地民屯报垦9 120亩”。据《三州辑略》记载,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止,从甘肃张掖应拨户民500余户,男妇大小共2 189口,分赴木垒、吉尔玛泰和奇台等处。1770年又从甘肃“招募250户,分三起尾随赴屯……分置木垒、奇台、东格根等处”。1775年,“宜禾县续招冯天贵等垦地三千亩”。“乾隆末年,奇台、宜禾屯地259 892亩”[①]。规模已很大了。

哈密屯区

乾隆七年(1742年),哈密军屯压缩,5 000屯军裁撤3 000,留2 000名耕种。因人力不足,清廷决定:塔勒纳沁营屯停种;将蔡把什湖万亩屯田交给维吾尔族农民耕种;其余3 000亩由留下的2 000名驻防军耕种。由军屯转为回屯。

乾隆十八年,由于“收成歉薄,回民苦累,不愿承种”。清政府决定,此地仍由维吾尔人耕种,“每年耕种所获谷石不必交官,全行赏给”[②]。实际上,蔡把什湖的回屯至此停办。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准部台吉达瓦齐叛乱后,陕甘总督黄廷桂派兵200人,到塔勒纳沁屯田。《清史稿·食货志一》记载:“二十年(1755年),塔勒纳沁开田三千余亩。”

二十二年(1757年)春,屯田官兵先后设置三屯:一为塔勒纳沁,屯田5 000余亩,屯兵200人,以屯田都司督领;二为蔡把什湖,开有屯地4 000亩,屯兵百名,以管屯把总领之;三为牛毛湖,有地200余亩,原为蔡把什湖管屯把总姚成仁私垦成熟地,查出入官,拨兵屯种。到嘉庆年间,三处共有24个屯田点,分种11 260亩地[③]。除官兵口粮外,年交哈密厅仓收贮京斗小麦2 459石以上。营中所用谷子934石,供支办事大臣、主事、十二军台官兵食用,并散给过往遣犯口粮。还要上缴豌豆320多石,并10斤重谷草11 070束,供支营马及军台营塘马并差马喂养。

哈密维吾尔人参加屯田在清代最早记载见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侍郎海寿疏言,臣与将军富安宁,新旧开垦都尔伯尔津、图呼鲁克地方,以及回子扎萨克额敏所种之塔勒纳沁地方,种过籽粒所余青稞,各令本处修理旧仓,加谨收贮看守,已行文巡府噶什图、绰奇,令充兵粮。”[④]

从此疏中可知,早在康熙五十七年以前,额敏已率维吾尔人屯田于塔勒纳沁,并设有粮仓,以收回屯缴纳的青稞,以供清军。五十八年回屯交青稞608石[⑤]。以后规模逐渐扩大,雍正八年(1730年)“获青稞6 400石,嗣岁给谷种500石,秋纳粮4 000石”[⑥],成为定制。

① 《清朝文献通考》。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钟方撰:《哈密志》,禹贡学会1937年《边疆丛书》本。
④ 《清圣祖实录》。
⑤ 《清圣祖实录》。
⑥ 《回疆通志》。

额敏率部勤于屯垦，受到清廷封赏。雍正五年（1727年），上谕："额敏自军兴以来，输诚效力，率所队等屯垦助军，甚属可嘉，着晋封镇国公。"[①]并"赏银一千两，其下种地回民四百人，各赏银两布匹"[②]。七年又晋封额敏为固山贝子。

还有依附于军屯的遣屯。在塔勒纳沁、蔡把什湖和朴城子，共有犯人350名进行屯田。哈密有遣犯"定额二百七十名"[③]。巴里坤屯垦区逐步建成了强大的屯田基地，又是清兵的军事要塞。乾隆以此地为依托，三次出兵新疆，平定准部和回部，完成统一新疆的大业。

木垒屯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垦区向西发展，开始在木垒的东济尔玛台（今木垒县西吉尔乡一带）进行屯田。由巴尔库勒（巴里坤）镇标派管屯守备、千总、把总管理。第一年派兵200名。垦地2 440亩。次年。西进到奇台（老奇台）西海尔玛台，屯兵增到500人，种地1万亩，种植小麦和青稞。第三年，再向西到吉布库，屯务由古城营游击管理。第四年，再到东格根。吉布库和东格根官兵屯田万余亩。

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东疆军屯共种地89 286亩。仅"巴里坤就有屯兵八处，种地2 822亩"[④]。

奇台屯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屯田，屯兵500名，以游击督领，屯田12 100亩，分为丰盛、太平、安乐三屯[⑤]。

二、乌鲁木齐屯垦区

主要包括乌鲁木齐都统所管辖的迪化、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阜康和吉木萨尔。这一带原是厄鲁特部的牧地，是准噶尔部活动的场所。

军屯

乌鲁木齐是新疆的军事重镇，扼南北疆的要冲，是从中原到西域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平叛大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至乌鲁木齐后，随即在乌鲁木齐、辟展、托克逊、哈喇沙尔、迪化、昌吉、玛纳斯分布绿营屯兵三四千名。1758年乾隆"用雅尔哈善、永贵等言，于辟展、鲁克察克、吐鲁番、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规度官垦。是时馈馕犹亟，诚巴里坤至伊犁，循序增屯。……置新旧屯兵万七千，出帑三百万，备籽种诸用。而特纳格、昌吉、罗克伦均益兵广屯"[⑥]。

① 《回疆通志》。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西域图志·屯政》。
④ 《乌鲁木齐事宜》。
⑤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谕令陕甘总督黄廷桂："于绿营旗兵内，多选善于耕种之人，发往乌鲁木齐，明春即令试种地亩。量力授田，愈多愈善。"[1]黄积极办理，据统计，到该年10月，清政府派往乌鲁木齐等地的绿营屯田兵达一万数千人。仅"特纳格尔、昌吉、罗克伦三地，已达五千名"。1759年"在乌鲁木齐五堡地方兴堡的八百名绿营兵，获得丰收"[2]。

清政府在统一新疆过程中，开始在乌鲁木齐建筑城垣和屯田营堡。乾隆二十五年，营屯规模进一步扩大，又先后建成迪化、巩宁二城。同时兴建惠徕、屡丰、宣仁、怀义、乐全、宝昌等营屯屯堡，平战结合。在乌鲁木齐都统所辖的境内，均建筑了大量的城堡和屯田堡垒，各屯区内陆续出现了集市和城镇。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七月，乾隆帝诏谕："现在派往乌鲁木齐等地屯田兵丁，已至一万数千，所耕地亩亦必广阔……如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往准其带往。伊等既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其业。"[3]

是年，乌鲁木齐军屯丰收，获小麦6 100多石。11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奏准：把乌鲁木齐屯兵增至13 400人，增拨籽种2 400石，农具7 000副，并动员商民造车3 800辆，以扩大屯田生产。

1762年，乌鲁木齐已有营屯五处。该年秋，"乌鲁木齐屯田兵四千名，挈眷前来者，一千八百有奇"[4]。

军屯开始，屯田绿营兵由陕甘诸提镇轮流派往乌鲁木齐，屯田期满，屯兵返回原派提镇。陕甘诸提镇距乌鲁木齐，近者千里，远者数千里，屯兵往返，耗资甚巨。同时，"初到时俱不能熟悉耕种，迨指教方熟，又届换班之期"。特别是乌鲁木齐一带，由于多次兵燹和瘟疫大流行，千里沃野，有地无人。为了开发边疆和屯田实边的需要，清廷提倡和鼓励屯兵搬眷到屯。约在1768年，兵屯全部改为携眷屯兵[5]。携眷兵在建制上已完全脱离了原派出的提镇系统，正式纳入乌鲁木齐驻军的建制。乌鲁木齐驻军中，绿营兵丁分为两部：一部为驻防军，一部为屯田兵。绿营的基本组织是营，屯田兵也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下设屯，屯是兵农合一的基层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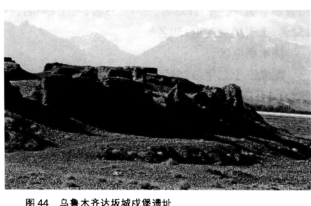


图44　乌鲁木齐达坂城戍堡遗址

① 《清高宗实录》。
② 《西域图志》。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清高宗实录》。
⑤ 《清高宗实录》。

单位，每屯士兵百名左右。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乌鲁木齐地区有中营七屯、左营六屯、右营八屯、吉木萨尔五屯、玛纳斯四屯、库尔喀喇乌苏二屯、精河二屯，屯区人数共5 700人。一兵所获粮食，多者逾18石，少者亦十三四石以上。

乌鲁木齐垦区34屯，5 700名屯兵，按每人种地20亩计，共垦田11.4万亩。到乾隆末年，虽然几经裁撤，仍有62 118亩，到嘉庆中期为59 467亩[①]。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乌鲁木齐屯垦区共有屯田士兵6 013人。其分布情况如下：

乌鲁木齐中营屯区。

乾隆二十三年兴屯，据《乌鲁木齐政略》记载：四十二年设屯兵1 066名，屯田2.2万余亩，以参将督领。其中：辑怀城133名，土墩子133名，怀义堡133名，屡丰堡133名，宣仁堡133名，惠徕堡133名，阜康城88名，头道湾头工90名，头道湾二工90名。

乌鲁木齐左营屯区(在今昌吉市一带)。

乾隆二十三年兴屯。二十五年(1760年)有屯兵500名，屯田10 300亩。其中，宝昌堡屯田2 200亩，乐全堡屯田2 200亩，皆在头屯河东。二工屯田3 200亩，三工屯田3 200亩，皆在三屯河东。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兵屯地扩大到65 348亩[②]。四十二年置屯兵1 066名，屯田22 000余亩，以游击督领。其中：头工148名，二工148名，三工148名，四工148名，甘标头屯90名，二屯90名，宝昌堡147名，乐全堡147名[③]。

乌鲁木齐右营屯区。

乾隆二十三年兴屯，四十二年(1777年)设屯兵1 066名，屯田2.2万余亩，以都司督领。其中：头工153名，二工153名，三工153名，四工153名，五工152名，六工152名，土古里克差屯150名[④]。

济木萨屯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兴屯，开始有屯地2万亩。四十二年设屯兵875人，种地约1.5万亩，由参将督领。分为吉木萨、双岔河、柳树河、三台、特纳格等五屯，每屯155名至230名不等[⑤]。

玛纳斯屯区。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屯田1 700亩，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增加到4 000亩。四十二年(1777年)发展为2.8万余亩，设屯兵1 400名。分为左右二营。左营有禾丰工、稼茂工、广裕工、瑞成工、亨有工、源兴工、松盛工七屯。右营有丰盈头工、

①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② 《西域图志·屯政1》。
③ 《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④ 《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⑤ 《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恒裕工、庆稔工、广润工、大有工、千仓工、万储工七屯。每屯均有屯兵100名，以游击都司督领[1]。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屯田面积增加到93 595亩[2]。

库尔喀喇乌苏屯区。

乾隆二十七年屯田5 400亩，设有屯兵270名。三十年裁减，有屯地3 636亩，屯兵180名，以都司督领。

晶河屯区。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有屯兵270名，屯田4 050亩。三十年以后裁减，屯地3 360亩，有屯兵168名，以都司督领。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月，乌鲁木齐总兵移驻巴里坤，巴里坤提督驻迪化，改称乌鲁木齐提督，负责管辖乌鲁木齐、喀喇巴尔噶逊、阜康、奇台、巴里坤、昌吉、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和晶河等地绿营官兵的驻防和屯田事务。是年乌鲁木齐军屯获得丰收，2 900名屯田士兵，收粮5.7万多石，人均收粮19石。以亩产一石计，当时军屯面积达5.7万余亩，乾隆六十年(1795年)乌鲁木齐提督所属各营，共有屯军3 190人，屯田62 118亩。

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乌鲁木齐绿营兵新开芦草沟和头屯河两处屯田。

乾隆年间，贬到新疆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目睹当年的屯田盛况写下了著名的诗句："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三十四屯如绣错，何愁转粟上青天。"以往塞外万古荒漠，当时已变为千里翠绿了。

民屯

乾隆帝弘历在大力发展军屯的同时，积极倡导举办民屯。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谕旨："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西陲平定，疆宇式廓，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又说："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檐土锉，各城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汙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朕规划此事，更有深意。"[3]8月，谕令陕甘总督杨应琚将甘肃无业贫民移往乌鲁木齐屯垦，"酌量官为料理前往"。该年"乌鲁木齐设同知，命在乌鲁木齐屯田"。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杨应琚在"甘州、肃州、安西等处招得贫民426户，1 500余名口，于次年送赴乌鲁木齐认垦"[4]。以后，由政府陆续招募关内农民，特别是甘肃一带的贫苦农民进疆屯田。从乾隆二十七年到四十五年，应募赴北路屯田的农民络绎不绝，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的统计，列表见310页：

① 《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②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乌鲁木齐政略·户民》，《清高宗实录》。



"二十六至三十一年,在乌鲁木齐招民承种户屯田103 088亩。"[①]

公元1762后,从关内来屯户426户,分别派往迪化和宁边(昌吉)屯田。1755年民屯亩数达62 370亩。[②]

1764年有102户在阜康屯田。

1772年从关内来400户,分往吉木萨尔进行屯田。

1765年,呼图壁兴办民屯。到1802年(嘉庆七年)屯民1 318户,屯田51 477亩。

1777年从关内募民428户在玛纳斯进行屯田。

1778年在头屯、芦草沟、塔西河举办屯田。

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也先后举办民屯,到嘉庆年间,安阜城(在精河新城西)城关一带就有民屯1 260亩。精河的八家户、大河沿、永集湖及博乐的大、小营盘均是屯田地区。

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开始,清政府在甘肃各州县,招募流民、佃农等"穷民",用官费运至乌鲁木齐屯田。关内人民,特别是陕、甘一带的贫苦农民,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争先恐后来疆。据《乌鲁木齐纪略》的资料:"从乾隆二十七年到四十四年到乌鲁木齐的屯户达12 487户,分赴迪化、宁边、头屯、芦草沟、呼图壁、玛纳斯、塔西河、阜康、济木萨等地屯田。"乾隆四十四年(1776年),由兰州、凉州、甘州等处转移玛纳斯种地户民1 255户,现在的凉州户乡,就是凉州来新屯田的后裔。另一批由镇番等县送往乌鲁木齐迪化以西种地户民1 936户。芳草湖农场原名镇番户,就是镇番县来边疆屯田的后裔。还有不少在新疆的商民也承种土地。如乌鲁木齐的商民陈善魁等170户,认地屯田,"所搬父兄子弟共八百余口"。人口日增,屯田面积不断扩大,乌鲁木齐通往南疆的重要交通要冲喀喇巴尔噶逊(今达坂城),也是民屯集中地,乾隆五十七年种地7 384亩。据史书资料,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乌鲁木齐都统所辖各地屯田共280 253亩。呈现了"荒野日辟,户口日昌"的景象。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耕地猛增到68 1013亩,短短的33年时间,耕地成倍地增长。仅以迪化、绥来、昌吉、阜康四县为例:迪化1775年耕地42 210亩,到1808年为181 866亩;昌吉1775年耕地62 376亩,到1808年为165 567亩;绥来1775年耕地7 320亩,到1808年为93 595亩;阜康1775年耕地39 940亩,到1808年为63 678亩。成倍甚至十倍地增长[③]。

清政府在新疆设军台(即兵站)167个,每个军台驻满洲、察哈尔绿营兵15名,还有营塘63座,驿站39个,在全疆星罗棋布,凡有条件生产的地方都进行屯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陕甘总督勒保奏称:五十四年巴里坤、乌鲁木齐所属各地认垦人数为110 537口[④]。嘉庆八年(1803年)增为15万余口[⑤]。再加上晶河、

① 《清朝文献通考》。
② 《西域图志》。
③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地方志总编室,1988年印。
④ 《清高宗实录》。
⑤ 《三州辑略·赋税门》。

库尔喀喇乌苏、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北路认垦人数约为15.5万余人。嘉庆末年，约在20万左右①。

乾隆末年，乌鲁木齐、巴里坤所属各地民屯面积为1 014 879亩②。

犯屯

清代最早提出向新疆发遣罪犯进行屯田的是御史刘宗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平定准部叛乱，正向大小和卓盘踞的南疆进军，新疆统一已成定局。在新疆东部的军屯连年丰收而新疆劳力又极度缺乏的形势下，二十三年刘宗魏奏请："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及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扎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行圈卡，令其耕种。共前已配到各处军流等犯，除年久安静有业者照常安插外，无业少壮，曾有过犯者，一并改发种地，交驻防将军管辖，应如所请，并将此外情罪重大军流各犯一体办理。"③此议获准后，二十三、二十四年因新疆战争未结束，各省只是少量的遣犯送往新疆。乾隆二十五年，平叛战争结束，新疆统一，兵屯连年丰收，开始成批将"桀骜难驯、屡惩屡犯"，"渐染甚易、驯化又难"者发遣。二十三年乌鲁木齐定为发遣地。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明德奏称："巴里坤、哈密、安西三处，遣犯甚多，难以安顿，奏请酌发辟展、乌鲁木齐屯所。"④12月清政府决定把内地大批罪犯送往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除本屯外，原有昌吉、罗克伦二屯，且明年于乌鲁木齐以西等处又设三屯，地宽兵多，易于防范。"⑤三十二年因乌鲁木齐遣犯过多，经陕甘总督议定："每遣犯四名，以三名发伊犁，一名发乌鲁木齐。"⑥经过调整，当地五堡、昌吉、罗克伦等处兵屯中承种分地的遣犯尚有1 747名，玛纳斯有200余名。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后的四年中，昌吉五堡等地每年参加屯田的遣犯均在千人以上。据⑦记载：1766年为1 219人，1767年为1 646人，1768年为1 747人，1769年为1 387人，1770年为1 240人。

库尔喀喇乌苏，乾隆三十一年安置遣犯。三十三年（1768年）当地兵屯中有承种分地遣犯100余名。

晶河，乾隆三十一年开始安置遣犯，三十二年当地兵屯中有承种分地遣犯百余名。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乌鲁木齐都统尚安奏称：流放乌鲁木齐的各种遣犯共3 200多人，参加屯田生产⑧。

① 王希隆：《清代实边新疆略述》，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② 《乌鲁木齐事宜·户口》。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清高宗实录》。
⑤ 《清高宗实录》。
⑥ 《乌鲁木齐政略·遣犯》。
⑦ 《西域图志·屯政》。
⑧ 《三州辑略·赋税门》。



遣犯的反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秋之夜,驻昌吉的管屯官员借酒"醉逼流妇使讴"①,激怒犯人杀死通判赫尔喜、把总马继国,夺取武器库,占据昌吉城。次日,200余人乘马进攻乌鲁木齐,被清军镇压下去。此事证明屯官对遣犯的压迫是很残酷的,遣犯们早已积怨在心,"逼流妇讴"仅是个导火线而已。其次,可以看出,昌吉遣犯屯田,是相对集中的,只派为数不多的人进行管理。

由于大兴军、民以及犯人屯田,人口剧增,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使唐代诗人岑参笔下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乌鲁木齐一带荒凉景象,变成了诗人笔下的"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的繁荣景象了。

三、伊犁屯垦区



图45 伊犁河雅玛图古渡口

伊犁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原为准部腹地,与沙俄毗邻,是祖国的西陲要塞。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后,为了边防的巩固和新疆的安定,在伊犁设将军,驻重兵,大兴屯垦。"时西域初定,地方万余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上诏统兵诸大臣议,咸谓沙漠辽远,牧畜凋耗,难驻守。阿桂疏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宜屯田。'"② 据《圣武记》记载:新疆统一后,满洲八旗驻防兵共18 800名,进驻伊犁河谷的就达13 340名,占70%以上。还有换防兵2 300名,绿营屯田兵3 000名,在此戍边屯田。同时还有民屯、回屯和遣屯。

军屯

还在平叛过程中,清廷就筹划"将来回部全定,伊犁驻防应以需兵若干,与屯兵粮饷合算,量籽种以定兵数,就收获以济军食。既可省内地挽运之烦,亦不患兵多冗食"③。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陕甘总督杨应琚疏奏:"伊犁底定,宜先屯田。"清政府很重视这一建议。在平叛后的第二年,即1760年伊犁设办事大臣,兴办屯田。当年三月,清廷"命阿桂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绿营兵百,回人二百(实三百)至伊犁搜捕马哈沁,招抚厄鲁特,并筑城屯垦"④。阿桂从阿克苏率部到达伊犁后,"二十五年(1760年),伊犁屯议起,于河南之海努克(今察布查尔县境)立回

①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阿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兵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屯，察罕乌苏(今霍城县西)立兵屯”[1]。是时，屯田士卒每人种地10亩。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绿营兵陆续增加，“已足二千名”，“屯田八千亩，收获大小麦、黍、粟、青稞等共二万七千一百石有奇”[2]。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岁入三万五千余石，除给该处官兵外，尚有盈余”[3]。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军屯面积增加到3万亩。三十三年达到36 212亩，产粮68 079石。乾隆“三十四年，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田”[4]。三十五年又从肃州调屯军300名到伊犁。伊犁军屯面积42 356亩，产粮79 782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伊犁换防兵改为携眷兵，将军伊勒图奏准“改为携眷，定额三千”[5]。是年屯田官兵增至3 098名，官98名，兵3 000名。500名操练，2 500名屯种。共分25屯，每屯百名士兵，每人种地20亩，共种地50 588亩，产粮84 988石。设屯镇总兵进行管理。乾隆四十七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因仓内存粮50余万石，恐太多发霉，请将2 500名屯兵中撤回1 000人，裁汰10屯。以1 500名屯种，1 500名操练[6]。到乾隆五十四年，新任伊犁将军宁保考虑到伊犁地处极边，万一歉收，恐难维持。奏请将1 500名操练兵中调700人屯田，添设7屯，兵屯增至22屯，共种地4.4万亩，直到嘉庆初年未变。

嘉庆时期，伊犁有绿营兵屯点30处。主要分布在熙眷、绥定、广仁、瞻德、拱震、塔勒奇六城近郊。

旗屯

八旗是清政府统治的重要支柱。在平定准部与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后，八旗军大批地奉调移驻新疆，扼守边陲要地。如新疆当时的首府伊犁、军事重镇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他们主要担负着巡逻边防、守卡缉查、保护屯田、维持治安的任务。平时操练、战时出征、定期换防。满营兵丁因有粮有银，所以不屯田。而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四营兵丁则有银无粮，所有口粮，规定自耕自食。察哈尔官兵1 837名，皆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屯田；厄鲁特官兵1 200名，在伊宁县、特克斯至昭苏一带屯田；锡伯营官兵1 018名，在伊犁河南一带屯田；索伦营官兵1 018名，在霍尔果斯一带屯田。旗屯之初，每人种地8亩，政府供给籽种、牲畜、农具。自耕自食、不纳粮租。

旗屯搞得最好的是锡伯营。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四月，从盛京抽调锡伯营官兵1 020人(家属3 275人)到伊犁驻防。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南渡伊犁河在察布查尔屯垦戍边。按“军政合一”的八旗牛录建制屯居(牛录：八旗组织的基本单位，努尔哈赤定300人为一牛录)。他们不领国家口粮，进行屯田生产，

①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伊犁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⑤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伊犁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⑥ 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嘉庆十四年刊本。



首先疏浚一条180里长的绰豁尔大渠，引水种地1万亩。很快实现军有粮、民有食，安居乐业。后来人口繁衍，原有的耕地就不够了。在锡伯族杰出的领袖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的领导下，从1802年开始，经过6年的辛勤劳动，修建成深一丈，宽一丈二尺，长200多里的察布查尔大渠，可灌溉7.8万亩地。锡伯营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驻防伊犁的诸兵营中，最为富裕，每年陈粮储库1千万斤之多。在乌孙山下，"阡陌相连，村落相望"，成为屯垦戍边的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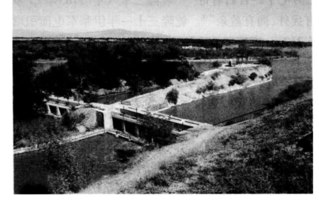


图46 伊犁察布查尔大渠龙口

满营兵丁最初不屯田，弘历年间虽曾有兴办旗屯的打算，但一直未办，灌溉缺水是一个原因，害怕兴屯后裁减粮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伊犁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多，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廷正式宣布伊犁驻防八旗不得再议增加兵额之后，八旗生计，日益艰难。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应"按锡伯营屯种例，分界旗兵地亩，各使自耕"[1]，"永为世业，自耕自食，不纳粮租"[2]。嘉庆七年(1802年)，松筠从满营中抽调360名闲散余丁屯田，效果良好。"乃于伊犁河北开渠，逶迤数十里。又于城西北导水泉，惠远、惠宁有水之地皆开渠。"[3]到十四年(1809年)，满营已屯田6.4万亩。

满洲旗营屯地，自嘉庆七年(1802年)兴办之后，分为两种。一种是"已分之田"，被分授各旗，每旗3 000亩，作为"自行管业"，由各协领、佐领派人进行耕种，每年所得之粮"由各旗分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由将军衙门查核办理"。另一种"未分之田"，共4万亩。每年专派"协领职衔之佐领苏勒芳阿乌勒登布，督率八旗闲散，通力合作"进行耕种。"所得之粮总储一处，年终分给八旗，添补养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4]后因"未分之田"被视为公田，不愿精心耕作，收成较少。于是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将灌溉有保证的2万余亩(其余地亩灌溉无保证)，"分为八份，添入八旗已分田亩项下，均令各旗自督闲散耕种，以专责成"。清廷为保证旗民的生计，严禁旗地租佃或买卖。但后来这一制度被破坏。据《伊江集载》一书记载："惠远城、巴燕岱(惠宁城)两处所开旗地七万余亩，赏给八旗耕种。后因不谙耕作，(准)其招佃纳税，每年收小麦六千石，抵放兵丁赡养……又巴燕岱收地租

①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太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新疆图志·赋税》。
③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松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银1 300余两。”自此，租佃关系正式确立，闲散余丁不再屯田，大量旗地租佃给农民。

回屯

清军平定叛乱，统一新疆后，在伊犁大办屯田。除军屯、旗屯、民屯、遣屯外，还成功地举办了回屯。早在17世纪早期，准噶尔贵族就强迫南疆维吾尔族农民迁往伊犁种田纳粮，称为塔兰奇人，意即种地的人。由于连年兵祸，伊犁农民逃亡殆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兆惠率军进入伊犁时，仅见到维吾尔人三十余名[①]。为了尽快恢复伊犁屯田生产，乾隆二十三年谕旨："伊犁驻兵屯田，关系甚重，亦宜预为筹划。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城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掺杂。"[②]随即着陕甘总督杨应琚与兆惠赴伊犁、阿克苏等地勘察，筹划屯田，经商定，"派兵四五千人，回人一千户"[③]，到伊犁屯田。

《新疆识略·伊犁屯务》卷6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春，阿桂"自带回子三百名，于伊犁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拨耕种"。这第一批到达伊犁的维吾尔人，是从阿克苏、乌什、赛里木（拜城县境）等地招募的。他们携带种子、耕畜、农具和粮食在500名官兵护送下，三月到达伊犁，随即整修渠道，开荒播种，这年播种虽晚，

清代伊犁旗屯简表

旗营名称	开屯时间		屯兵数	屯田亩数	屯点数	分布地区
满洲旗营	1802年 嘉庆七年	已分之田 未分之田	闲散余丁耕种	2.4万亩 4万亩	11 3	惠远、惠宁惠远城东、惠宁西北
锡伯旗营	1766年 乾隆三十一年		锡伯营官兵1 018人	1808年达到7.8万亩	7	伊犁河南察布查尔
索伦营	1764年 乾隆二十九年		1 018人	2 600亩	4	霍尔果斯一带（以牧业为主）
察哈尔营	1764年 乾隆二十九年		1 018人	3 200亩		博尔塔拉河流域（以牧业为主）
厄鲁特营	1765年 乾隆三十年		1 018人	3 200亩	20	伊宁、特克斯、昭苏（以牧业为主）

① 《清高宗实录》。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阿文成公年谱》。



但仍获丰收,秋季收粮2 222石。"以播种计之,上地所获二十倍中地所获十倍。"[①]当年,家眷也送到伊犁。

二十六年(1761年)第二批维吾尔农民共500户,其中阿克苏160户、乌什120户、赛里木13户、拜城13户、库车30户、沙雅30户、多伦150户,于二月到达伊犁。第三批200户,于六月到达伊犁。这时伊犁共有1 000户维吾尔农民进行屯田耕种。屯田的地方仍是以前维吾尔族为准噶尔部种田的地方,即伊犁河北的固尔扎、察罕乌苏、霍尔果斯河南岸的霍集尔、海努克、寄特木等地。由于土地肥沃,收成很好,南疆的维吾尔族群众,不少自愿前往屯田。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伊犁回屯人数达到6 383户[②]。各屯户数不一,均按地方大小而定,共九屯。海努克600户、喀什500户、博罗布尔噶苏1 100户、济尔格朗900户、塔什鄂斯坦400户、鄂罗斯坦600户、巴尔图海600户、霍诺海800户、达尔木图500户。在固尔扎建宁远城(今伊宁市),设三品至六品阿奇木伯克16人管理回屯。计户不计丁、计种不计亩,户给麦种一石、黍谷五斗二升。按当时每亩下种一斗,回屯6 000户计,种地约9万亩。每户岁纳租16石,共计9 600石。到1794年,主管回屯的保宁"以回子生齿日繁,增垦地面,情愿增加4 000石,以足一万石之数"[③]。到嘉庆时,已发展到3.6万人。

民屯

伊犁民屯,主要是商屯,即由关内前往伊犁经商者认垦土地。他们发现经营土地利润颇丰,因而利用其经济力量较大,出资雇工,开始由经商转而经营或兼营土地。据《新疆识略·屯务》记载,伊犁商贾"张子仪等三十二户,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共报垦麦地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亩六分。每亩征税银五分,每岁共征银一千九百八十两九钱三分"。户均1 200余亩,显示雇工性质。清政府对商民认垦土地,给予鼓励,除按民户认垦例分授土地、牛具、籽种外,又规定:"如力能多垦,取结给照,永远营业。"[④]另一"商民张尚义等二百户,自乾隆二十八年起,共报垦蔬地、稻田一万六百六十八亩六分"。种植蔬菜、水稻,显然是从经济效益着眼的。

除商民认垦土地屯田外,也有农民到伊犁屯田。清政府规定:"每户给地三十亩,官给牛力、籽种、口粮,俾资耕作。"[⑤]伊犁将军舒赫德奏称:"户民庄世福等四十八户,乾隆三十七年入屯田户籍,共种地一千四百四十亩,每亩征银五分。"[⑥]乾隆三十九年,户民张成印等23户,入屯田户籍,共屯耕地达60 097亩。

犯屯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伊犁开始安置遣犯。三十二年,因乌鲁木齐遣犯过

---

① 《清高宗实录》。
② 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嘉庆十四年刊本。
③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④ 《清高宗实录》。
⑤ 《清高宗实录》。
⑥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伊犁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多，经陕甘总督议定："每遣犯四名，以三名发伊犁。"于是伊犁遣犯人数迅速增长。最多时达3 000余人，《清高宗实录》卷1195载：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刑部议覆，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类多顽硬不安分之徒，最易滋事"。此后，为安全计，发配伊犁罪犯有所减少。伊犁遣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罪行较轻的依附于军屯进行屯田，据《皇舆西域图志》卷32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伊犁兵屯有"屯兵二千五百名……遣犯……四十九名"。这即是指隶属于伊犁绿营军屯承种份地的遣犯，他们是"补屯耕缺额"的。至嘉庆十四年（1814年），伊犁地区"节年以来，于西安、凉州、庄浪之驻防满兵，陆续携眷移驻者三千八百名，协领等官一百二十八员，均住城市，发遣内地犯人二千余名应役"。仅"乌哈尔里克之城（今霍城县），屯田所也，绿旗兵二千六百，流犯千余，屯田二十六工"[①]。伊犁遣屯，每名种地十二亩，"一部分遣屯在塔勒奇，称为西地。另一部分在喇嘛寺沟，称为东梁"[②]。另一种是罪行较重的"给兵丁为奴"，"令服耕作之役"[③]。这部分遣犯在伊犁是为数不少的。

遣犯携眷者拨给土地，鼓励生产自给，"为奴人犯，有携眷者，每人先拨给土地十二亩，令其耕种。果于伊等有益，次年拨地十五亩，每亩纳细粮八升，按岁征收"[④]。

伊犁遣犯，除参加屯田外，还参加了兴修水利工程，拉船运输劳役等劳动。均隶属于军屯，期满改过者，给具为民，每户给地30亩，令其耕种，交伊犁同知管辖。

到1777年，伊犁有各类屯田点八九十处之多[⑤]。由于屯田的兴起，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军粮充裕，各族人民因丰收而安居乐业。嘉庆年间，被流放于伊犁的学者洪亮吉写诗描绘伊犁的盛况："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惠远城外，大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市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誉"。

四、塔尔巴哈台（塔城）屯垦区

塔尔巴哈台屯垦区，中国与俄罗斯卡伦相望，是我国西陲屏藩，军事要塞。在讨平准部叛乱后，"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塔尔巴哈台筹设营屯"。由参赞大臣绰勒多率绿营兵600名由乌鲁木齐去雅尔地方屯田。次年开垦种地，并在该地修建肇丰城，作为塔尔巴哈台的首府，后该地被沙俄侵占。1766年参赞大臣阿桂将城移于楚呼楚建绥靖城（就是现在的塔城），种地1.8万亩，距故城200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巴尔品奏准："楚呼楚地广田多，请于乌鲁木齐拨绿营兵四百名，前往耕种。"是年屯田丰收，人均收粮18石，受

① 《西域闻见录》。
② 《新疆赋》。
③ 《清高宗实录》。
④ 《伊江汇览·屯政》。
⑤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到清廷嘉奖[1]。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有屯地1.7万亩,屯兵850人,以游击督领。五十九年(1794年)屯兵减为400名,分为五屯,头工在城西四里,二工在城南二里,三工在城东南八里,四工在城东十二里,五工在城东三里,共种地8 000亩,以副将督领。到乾隆末年,"塔尔巴哈台营屯共七处"。"乾嘉时期,察哈尔、厄鲁特七佐领携眷兵丁也有四处屯田垦区。"



图47　塔尔巴哈台绥靖城遗址

后来由于粮库存粮霉烂,各地裁屯,而塔尔巴哈台垦区还在扩大,"嘉庆十三年(1808年)调乌鲁木齐200名于十四年派往,十五年种地交粮"[2]。这是因为沙俄在中国边境不断扩张,故采取措施,加强屯田力量。同时边防兵力量也在增强,该地原有驻防兵900名,屯田兵600名,后改驻防兵为轮换兵,并将屯田兵增加为2 110名。

塔尔巴哈台的民屯规模不大,乾隆六十年(1795年),有100余户认垦,种田3 000余亩。[3]

乾隆四十年(1775年)参赞大臣奏准把原给伊犁厄鲁特营为奴的100名遣犯,调塔尔巴哈台挖煤,1777年到达后,除挖煤外,派31人屯田种粮,人给地12亩,其中在锡伯图有"遣犯十一名,种地一百二十亩"[4]。

五、阿勒泰(额尔齐斯)屯垦区

阿勒泰地区,从清朝开始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争起,就是屯兵要地。1731年(雍正九年)筑科布多城,又于1733年筑乌里雅苏台城。这两处成为控制和管辖西北的重镇,清军两次出兵伊犁的北道,都是从这里进军的。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乌梁海库木降清,清廷命乌梁海桑宰库克新在额尔齐斯屯田。同年,阿睦尔撒纳和玛木特向乾隆进言速伐准部达瓦齐时讲:"准部东境额尔齐斯河……本杜尔伯特原屯地,近接阿尔泰山,可屯田备饷,宜先遣兵万人据形势,而大兵二

①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塔城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② 祁韵士编撰:《西陲总统事略》,嘉庆十四年刊本。
③ 永保著:《塔尔巴哈台事宜》,边疆丛书续编本。。
④ 永保著:《塔尔巴哈台事宜》,边疆丛书续编本。。

万继进。”得到弘历批准。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分两路进兵伊犁。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乌里雅苏台。定北将军班第奏准:“屯田兵亦相继前往,并筹办额尔齐斯屯田。”二十年四月成衮扎布屯田兵由额尔齐斯河移驻伊苏图铿格尔“以所得谷粮,备来往兵丁之用”①。

六、吐鲁番(吐、鄯、托)屯垦区

平定准噶尔部的西路清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从巴里坤出兵之后,随即在西进大道上的辟展、吐鲁番、托克逊、哈喇沙尔调绿营兵进驻,屯田戍边。既保障了社会安定,使丝绸之路畅通,又可为军队提供粮饷。

吐鲁番在康熙年间,曾开始屯垦,后来撤屯,一度中断。1757年,就是清军再次西进的当年在吐鲁番设军屯,这一年“种植已有成效”。从事屯垦戍边的绿营兵,随即向西转移到哈喇沙尔。吐鲁番的屯田耕种则由刚返回的本地人担任。原来吐鲁番人曾被准噶尔部所逼,于雍正三年(1732年)九月吐鲁番维吾尔族在额敏和卓率领下移住河西甘肃瓜州(今甘肃安西一带)。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迁回吐鲁番,实行回屯,自耕自食。额敏和卓及其子苏来满为感谢皇恩,在城郊修一座报恩塔(今称额敏塔或苏公塔)。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辟展驻绿营兵800名,屯田13 633亩。哈喇和卓屯兵300名,种地6 000亩。托克逊有绿营兵1 000名,屯田14 253亩。各以都司、游击、参将督领。乾隆二十六、二十七年屯兵移设乌鲁木齐、伊犁等处②。军屯撤销,将托克逊、哈喇和卓屯地18 582亩,辟展、连木沁屯地15 650亩,赏给当地维吾尔族农民耕种,“自是吐鲁番无屯务”。

四十四年(1779年),吐鲁番郡王苏来满获罪,“藉其私产地亩”,作为军屯。置屯兵700名,托克逊100名,安展250名,哈喇和卓100名,阿斯塔那100名,和色尔图喇100名,胜金50名,辟展50名。共种地14 700亩,交粮9 000石。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肃巡抚明德奏请:“嗣后各省遣犯……酌发乌鲁木齐、辟展屯所。”③辟展曾有遣犯参加过屯田。

吐鲁番的民屯不多,见于记载的:乾隆四十年吐鲁番有28户,种地710亩,四十四年以来,吐鲁番、辟展“有商户一百六十户,种园地二百三十亩”,呵呵雅尔等处“认种沙地园户一十二户,共种沙地四百八十亩”④,为什么民屯这样少?这和乾隆帝弘历在屯垦实边中,重视北疆的乌鲁木齐和伊犁是有关的。

吐鲁番、辟展、鲁克察克除军屯外,均有回屯。1792年喀喇巴尔克逊户屯种地7 384亩。⑤

① 刘锦藻著:《清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发行本。
②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吐鲁番》,道光元年刊本。
③《清高宗实录》。
④《三州辑略·田赋》。
⑤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第四节　乌什人民起义和乌什屯垦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实行伯克制，通过伯克实行统治。阿奇木伯克有很大的权力，不少伯克对人民作威作福，横征暴敛，矛盾日趋尖锐。乌什的阿奇木伯克为哈密郡王玉素甫之弟阿卜都拉。他对乌什群众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随意鞭打群众，且贪婪至极。他带的一批哈密亲信爪牙，横行乡里，四出敲诈。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尤其暴虐，乌什人民怨声载道，恨之入骨。

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小伯克赖黑木图拉由于其妻曾被素诚留衙遭辱，因此积怨在心，于十四日晚，组织维吾尔族群众起义，向清军发动进攻。素诚父子被杀，阿卜都拉被生擒，一举占领乌什城。起义历时半年，虽被清军镇压下去，但对清廷的统治是一个警告。

清廷为了缓和矛盾，巩固其统治，下令公布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的罪状，将欺压群众的纳世通等人斩首示众。并颁布了一些切中时弊的措施：如"阿奇木伯克之权宜分；都官伯克之补宜公"等项。

由于乌什人民起义的影响，加之乌什地处中俄边界，为了加强清廷的统治，把驻喀什的办事大臣移驻乌什，调兵于此屯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屯田2.1万亩。乾隆四十二年，屯地减为8 000亩，屯兵400名，分为宝兴工、充裕工、丰盈工等屯[①]，以副将督领。到嘉庆四年（1799年）又减为5 000亩，岁交大小麦共5 100石[②]。

乌什也有犯人参加生产，据《清朝文献通考·刑七》记载：乾隆三十六年，"内地民人，于新疆地方犯至军流之罪，如在乌鲁木齐一带者，即发往乌什、叶尔羌等处。而在乌什各城者，亦发往伊犁等处。并视其情罪，量为酌定，较轻者发各处安插编管，重者给厄鲁特人及回人为奴"。从此记述我们知道乌什犯人参加劳动，不是内地"遣犯"，而是"内地人民在新疆犯罪者"。有的南疆回人犯罪也有发往乌什的。

乌什曾举办回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乾隆帝谕旨："查乌什地亩，足供六千户人耕种，除从前分给回众外……余地尚多。请派阿克苏无力回人二百户，赛里木、拜城贫困回人二三十户，借给耕具、牲只、籽种，迁往乌什屯田。"[③]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乌什回屯增加到810户，年征粮赋2 010石。

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统计，吐鲁番、哈喇沙尔和乌什三城当地人户每年缴纳赋粮总数仅6 415石，而三处兵屯的年产量至少在2万石以上，有时也超过2.4万石，即使扣除屯兵口粮，也应交1万数千石，是当地纳粮数的3倍左右，兵屯的作用可见一斑。

①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乌什》，道光元年刊本。
② 《回疆通志》。
③ 《清高宗实录》。

第五节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及南疆西四城屯垦

清军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还未完全结束，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大小和卓在南疆又叛乱抗清。

当准部盛时，征服南疆各城，执伊斯兰教首领玛罕木特囚于伊犁，羁其长子波罗尼都、次子霍集占（即大、小和卓。和卓——圣裔的意思），使率维吾尔族农民为其耕种。1755年夏，清军平定达瓦齐叛乱，释大和卓波罗尼都，以兵护送南疆，使统辖旧部。留小和卓霍集占于伊犁掌管维吾尔族事务。后阿睦尔撒纳叛，小和卓曾助之。当1757年清军再定伊犁时，小和卓惧，率部逃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以此为根据地，集其伯克、阿訇等公开叛清，自立为巴图尔汗。各城响应，维吾尔族数十万从之。惟库车、拜城、阿克苏三城之阿奇木伯克鄂对等不附逆，逃伊犁，其族被杀。清政府派副都统阿敏道率百余人去招抚，皆被杀害。

清廷于1758年5月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满汉兵万余，由吐鲁番进攻库车，未果，命兆惠取代雅尔哈善平叛，相继攻克库车、沙雅、阿克苏、乌什等城。群众欢迎清军入城。10月间，定边将军兆惠率军4 000名直指叶尔羌，三战三捷。因兵少，乃结营于城东隔河有水草处，这就是有名的黑水营，敌以数万人轮番攻击，兆惠以三千余人坚守3个月。掘壕筑垒，又排水防淹，伐木为薪，得铅弹数万。更重要的是竟挖到一个大粮窖，保障了军需供应，使黑水营岿然不动。次年初，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援兵赶到，与兆惠一起兵分两路进攻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大、小和卓大惊，疯狂抢劫人民的牲畜和财物，向西逃去。清军穷追不舍，在霍斯库鲁克山、阿尔楚尔和伊西洱库尔附近三次大捷，降敌万余。大、小和卓率残部三四百人退到巴达克山，被擒获处死。至是，延续数年之久的维吾尔族农奴主贵族、宗教反动头目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分裂祖国的叛乱，始告平息。南疆再次统一于祖国。当清军到达喀什噶尔时，当地百姓扶老携幼，牵牛赶羊，犒劳清军。他们说："我们被准噶尔虐待了几十年，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大、小和卓忘恩负义，举兵反叛，使我们不能耕种和放牧。如今大军一来，我们总算得救了。"

在平叛中，得到了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当大和卓波罗尼都从喀什噶尔前往叶尔羌支援小和卓时，柯族人就袭击他的后方，使大和卓不敢前进。就在平叛过程中，柯尔克孜族归附清廷。其首领阿济比致书于兆惠说："率诸部，自布哈尔迤东二十万人众，皆作臣仆。"[①]清政府在统一天山南北之际，一些边外部落、小国纷纷臣服，求为属国。其中有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浩罕（乌兹别克人在费尔干纳盆地所建立的小国）、布哈拉、塔什干、巴达克山、爱乌罕（今阿富汗境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内)、乾竺特(今克什米尔坎巨提)等,幅员之广,远过明朝,盛于汉唐,是清朝极盛大的统一时期。

在大、小和卓平定后,清政府为了社会安定,首先是减免赋税,使人民休养生息。对游牧为主的土尔扈特、和硕特人民,免纳牲畜税。哈密和吐鲁番的农民,免税粮赋。对南疆各城,税赋减轻"十存其四"。维吾尔族人到外藩贸易,原十分抽一,现降为二十分抽一,"回户休息更始,无不欢腾"。

其次对伯克们削权力,封高爵。乾隆反对在维吾尔族设置"总管"。各城伯克们互不统属,直接由清政府派驻的伊犁将军和大臣管辖。这样,阿奇木伯克不但没有一个人能"总管"全族事务,而且在一个地方的伯克也很难独揽大权,横行无忌了。

与此同时,对伯克们也给以高官厚禄而笼络。对归附清较早的哈密、吐鲁番首领,以及在平叛战争中有功的伯克们,封给郡王、贝子、公、台吉等爵位。如额敏和卓被封为郡王,被列入平定准噶尔部及四部五十功臣,名居第十二位,图像悬挂于紫光阁。就是对一般伯克们所定的等级亦大大高于内地。如清廷惯例:知府为从四品、知州正五品、知县正七品。而沙雅尔、库尔勒、布古尔等三城,在嘉庆年间各有700户农民,相当于关内一个镇,而这三地的阿奇木伯克的爵位是三品。"州县官阶,尚居其下。"

其三,于重镇设大臣,驻军防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总理南疆八城事务。另设办事大臣,专理喀什及英吉沙尔事务。于1762年建徕宁城,驻军1 147人;叶尔羌设办事大臣,驻军886人;英吉沙尔280人;阿克苏设办事大臣,驻军758人。

清政府以为这样就可长治久安了,实际上后来南疆动乱迭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天山以北行之有效的屯田,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未能很好推行。

一、哈喇沙尔屯垦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平定准部叛乱的西路军,为了保证清军侧翼的安全,派一部分绿营兵进驻哈喇沙尔屯田。从"吐鲁番屯田绿营旗兵"内,调一部分绿营兵"带种子,于来春在哈喇沙尔或伊拉里克等处种地"①。次年,"用雅尔哈善、永贵等言,于辟展……哈喇沙尔规度官垦"②。可知二十年清军进驻哈喇沙尔,二十三年开始屯田。二十四年有屯地9 675亩。四十二年(1777年)有屯兵362名,置屯地7 440亩,以参将督领。嘉庆末年:"屯工三处。头工在城东北六十里,屯兵七十一名,种地一千四百二十亩,由西北引开都河灌溉。二工在城东七十里,屯兵一百零一名,种地二千二十亩,由正西引开都河灌溉。三工乌沙克塔尔,在城正东

① 《清高宗实录》。

②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二百二十里，屯兵一百三十名，种地二千六百亩，由东北察罕通格山沟内，引雪水灌溉。每年各屯共交粮五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七升。”哈喇沙尔田官有：“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经制外委三员。”[①]

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在哈喇沙尔举办回屯，分布在库尔勒和布古尔两地。屯户1 200余户，每户种土地二十六亩九分，共种地3.5万亩，年征粮赋1 400石[②]。后因一部分屯民拨赴伊犁，屯田减少，粮赋也减为982石。

哈喇沙尔的民屯。嘉庆年间曲惠城（焉耆东135里）有户民报垦1 930亩。原厄鲁特部的土尔扈特和硕部屯田分布在开都河沿岸。

哈喇沙尔也有发遣的犯人参加劳动，但为数不多。

二、阿克苏屯垦区

阿克苏有少量的军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军派绿营兵15名在阿克苏种稻，“稻屯在阿克苏东南，共一百五十亩，每年籽种二十九石，缴纳稻谷五百零二石三斗五升”[③]。

回屯创办于乾隆二十六年，后又陆续扩屯。由于“伊犁垦戍，又资接续，更移喀什噶尔等回众二千五百户屯阿克苏”[④]。由兆惠主持，每户拨地25亩，共垦种62 500亩。阿克苏所属库车也有回屯：“库车……归存官地，于入版图后。一体归民垦耕种者二百五十石种子地亩。”[⑤]10亩籽种一石计，种地2 500亩。

三、喀什噶尔屯垦区

喀什噶尔，南疆重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平定叛乱，统一新疆后，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总管南疆八城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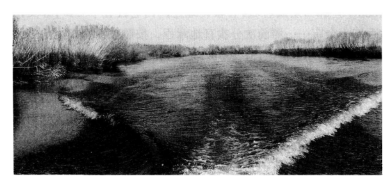


图 48　博斯腾湖

①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哈喇沙尔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② 《西域图志·贡赋》，《那文毅公奏稿》卷76。
③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阿克苏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④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西域图志·贡赋》。



乾嘉时期，喀什噶尔没有军屯，没有民屯，只兴办了几处回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举办回屯。“喀什噶尔……归存官地，于入版图后，一体归民垦种植者，八百一石四斗有奇籽种地亩，内兼一易地亩，计征岁入十分之五，定额三千九百九十三石五升三合一勺。”[①]新疆有的地方计种不计亩，以每石种地10亩计，共种地8 010亩。当年，清廷决定在“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增回屯，减兵额”[②]。参赞大臣招维吾尔族农民300户，在伯什克勒木(今疏附县城东四十里)屯田，垦荒种地10.8万亩。

嘉庆十七年(1812年)六月“拨给喀什噶尔阿尔达什闲地四千亩，给道兰回子垦种，从参赞大臣范建丰请也”[③]。从以上资料看出，在乾嘉时期喀什噶尔的回屯规模约在10万亩上下。

在喀什噶尔举办回屯的同时，叶尔羌也于乾隆二十六年办回屯，种地“一千二百八十三石六斗六升籽种地亩”[④]。以后回屯面积迅速扩大，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叶尔羌荒地，经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三等，开垦一千二百九十余顷”[⑤]。

为了加强对回屯的管理，乾隆四十一年“令叶尔羌成丁余回，特畀耕地编户，凡千五百户为一所，三千户为一卫”[⑥]。

四、和田屯垦区

和田位于昆仑山北麓，古丝绸之路南路重镇。清代前期，主要军事行动在北疆，因此，兵力部署、屯田的兴办也主要在北疆，和田所以没有军屯和民屯，只有回屯。屯田兴办于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据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田……旧存官地，于入版图后，一律归民垦种者，除沙碛地段不能耕作外，实可耕一万三千六十二石有奇，征税入十分之五，定额二千一百八十一石六斗”[⑦]。以每石种子可种10亩计，合130 600亩。规模是不小的。

嘉庆五年(1800年)“和田所属各城，有粮无地之回民七百五十二户，并丈出官荒地二万零六百四十余亩……照前次分拨官地章程，按数拨给有粮无地之回户，均匀开垦”[⑧]。和田共有回屯垦地151 260亩，是南疆的一个大型垦区。

总之，乾嘉时期，南疆仅举办了一些回屯。军屯在阿克苏只有15人，微不足道。焉耆屯兵只有362人，规模不大。民屯也只在焉耆有一点。乾嘉时期，清廷不允许驻南疆西四城官兵携眷永驻，不积极兴办军屯和民屯。而且对汉族人到南疆

① 《西域图志·贡赋》。
②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清仁宗实录》。
④ 《西域图志·贡赋》。
⑤ 《清仁宗实录》。
⑥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 《西域图志·贡赋》卷34。
⑧ 《清仁宗实录》。

限制很严，只准汉族人民去有军队驻扎的地方，这样便于监视和镇压。即使有商人前去贸易，也只准驻于汉城附近，要领有准许经商的官票，时间也有限制，绝不允许在维吾尔族地区定居，以防止各族群众互相接近。这是乾嘉时期清政府的一个错误政策，后来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第六节　兴办牧场

清代牧场，除属中央太仆寺、上驷院管辖者外，八旗、绿营也有专设牧场，以补充军营及屯田牛马之缺额。

清廷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的平定准部战争中，西北两路军各二万五千人，“共兵五万……计每兵需马三匹，共马十五万”[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又调集数万匹马补充西征清军，总计四年出征用马不下二十万匹。除一部由马场调拨外，大部从陕、甘、晋、川等省征购，困难重重。新疆因连年兵燹，牲畜损失惨重，根本无法满足清军的需要。在战后边防和屯田，需大量的马、牛、羊供应。依靠内地运输，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设立牧场，孳生牧只，方为久远之计”[②]。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兴办伊犁牧场。伊犁将军属下设驼马处，专司其事。下分孳生牧场和备差牧场。孳生牧场专司放牧、繁殖牲畜。马3年3匹，取孳1匹；牛4年10头，取孳8头；驼5年10峰，取孳4峰；羊每年10只，取孳3只。备差场专牧由孳生场调拨备用牲畜。

牧地分布在博罗塔拉、哈布塔海、赛里木诺尔、特克斯、察林塔玛哈、霍诺海、哈什、崆吉斯一带。据《新疆识略》卷10厂务载：“马场每三年孳生一至三岁马驹九千五百二十四匹。”道光六年（1826年）“马场存有孳生马五万余匹”[③]，规模很大。

孳生马场：建于1760年，到1793年，共有马28 569匹；孳生牛场：建于1762年，到1793年时，有牛11 845头；孳生驼场：建于1761年，到1802年时，共有驼4 176峰；孳生羊场：建于1761年到1772年时，已有羊140 695只。以上各场，由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营分别放牧。

第二个牧场是巴里坤牧场。下有：孳生马场，在巴里坤设有“东场”，1761年建。在奇台有“古城西场”。在木垒有“木垒场”，1775年建。每场有5群马，每群1 000多匹，每群派千总、把总为牧长，外委为牧副。每24匹马派一牧丁，兵丁三年轮换一次；孳生驼场，1773年秋建，到1791年共有驼749峰。巴里坤牧场均由绿营兵丁放牧。

同期兴办的还有哈密牧场、喀什噶尔牧场、英吉沙尔牧场、库车牧场、哈喇沙尔牧场、塔尔巴哈台牧场以及乌什牧场等。主要供当地驻军使用。

---

①《清高宗实录》。
②《清高宗实录》。
③《清宣宗实录》。



以上各牧场，每年可收孳生马3 000匹左右，牛2 000余头，羊4万只。基本可满足边防、军台和屯田的需要。

清政府还派遣绿营兵丁及遣犯在北疆开采铁、铜、硝、硫磺等矿兴办工矿业。

第七节　北疆屯垦探讨

清朝统一新疆后，清廷依据当时的形势，将主要军事力量和屯田地区部署在北疆。重点是伊犁、乌鲁木齐和塔城。面对不断扩张的沙俄，这无疑是一个有远见的战略部署。

1.屯田对保证军需供给，强兵足食，巩固边防，发挥了巨大作用。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户部奏称："查此数年间(伊犁)俱属丰收。现贮粮五十四万余石，足敷支放三年。每年绿营兵、民、回等缴纳米粮约十八万余石，除年支放外，尚余二万余石。"[①]在乌鲁木齐屯区，乾隆四十九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言："今即以乌鲁木齐、玛纳斯、济木萨三处而论，每岁屯兵口粮需三万余石，就去岁屯田收获九万石有余，是一年所收已有屯兵三年之食。况乌鲁木齐所属现存食贮，截至四十八年底有京斗粮八十余万石。"[②]屯田充分保证了驻军的粮饷供应，使遥远的塞外，减少运粮，节约开支，起到了强兵足食，巩固边防的作用。而且仓库充裕，粮多民安，社会安定。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军屯起了重要作用。

2.屯田开发了新疆，改变了农牧业比重。

在北疆，原为逐水草而居，生产力低下的牧业为主的经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前，北疆耕地很少。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耕地迅速增加到70余万亩，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耕地猛增到144.1万亩。由于农业比重的迅速增长，使天山以北成为农牧结合的区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3.屯田推动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改变着因战乱频繁、兵革不息而造成的生产破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

经过大兴屯田，新疆出现了"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局面。由于粮食丰收，国家仓库盈溢。人民收入增加，商贾也发展起来了。如乌鲁木齐、惠远等有名的城镇"字号店铺，鳞次栉比"，甚至西方的商人也来了，"以所有易所鲜，恒多奇羡，民用繁富"。在新疆经济繁荣中，各屯垦区的中心，新兴城镇一个个地出现。如伊犁九城、乌鲁木齐、晶河、乌苏、玛纳斯、昌吉、奇台、巴里坤、塔城和吐鲁番等城镇，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它使边疆城镇布局初具规模，为近代城市的形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0。
② 《皇朝政典类纂》卷20。

4.屯田起到了巩固祖国统一的作用。

准部的叛乱被平定后，兵农合一的屯垦区在新疆星罗棋布，有效地防止了沙俄的蚕食和准部封建割据政权的再起。同时，由于屯田的兴旺，土地日辟，汉族和锡伯、索伦、满等民族约有20万左右移居新疆，大大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顺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各民族在共同劳动中，增强了友谊，互相学习，团结战斗，有利于共同抵御沙俄的侵略，保卫祖国边疆；有利于开发新疆，繁荣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有利于社会安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对巩固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屯垦人数越来越多，清政府即在乌鲁木齐和巴里坤地区设置府、厅、州、县，这也是屯田的一个成就。

但是清廷忽略了南疆兴办屯田，并严禁汉族人民到南疆西四城，不但使许多膏腴之地弃置不用，而且后来动乱迭起，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影响了南疆的生产发展，影响了社会安定，也影响了边防的巩固，这是后来张格尔、阿古柏等乘虚而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乾隆年间西域屯田简表(一)

屯田地名		开始年代		屯田兵数1777年数	遣犯数	屯田亩数1777年数	备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塔纳勒沁	哈密县属沁城乡	康熙五十一年办回屯，五十五年办军屯	1712年 1716年	170	130	7 030	1716年，命副都统苏尔德率兵 在哈密巴里坤屯田。
蔡巴什湖	哈密县属东南	雍正十二年	1734年	100	50	4 065	1734年，副将张广泗于该处查勘，得荒地5万亩。1777年种地4 065亩。
牛毛湖	哈密县属东北	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10		209	
辟展	鄯善县	康熙五十五年	1716年	800		13 633	1716年，命总督鄂海等率兵于此屯田，后撤。1757年乾隆帝令清军在此屯田。
哈喇和卓	吐鲁番市境	康熙六十年	1722年	300		6 000	1722年，清政府命总督鄂海副都统克代图管理屯田事宜。
托克逊	托克逊	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	1 000		14 253	1758年，乾隆帝"用雅尔哈善、永贵等言于辟展，吐鲁番、乌鲁木齐、托克逊、喀喇沙尔，规度官垦"。开始屯田。



续上表

屯田地名		开始年代		屯田兵数1777年数	遣犯数	屯田亩数1777年数	备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哈喇沙尔	焉耆	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	362		7 440	与托克逊同时开始屯田。
乌什	乌什	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800		8 000	1766年，喀什办事大臣移驻乌什，调兵屯田。
阿克苏	阿克苏	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	15		150	
朴城子	巴里坤境	康熙五十五年	1716年	500	350	18 700	1716年，清军在巴里坤、哈密等处屯田设防。

清代乾隆年间西域屯田简表(二)

屯田地名		开始年代		屯田兵数1777年数	遣犯数	屯田亩数1777年数	备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古城	奇台县	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	550		12 100	1767年，清军500人在古城的西海尔玛台屯田。
木垒	木垒县	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500		1万	1766年，清军在木垒的东济尔玛台(今西吉尔乡)屯田。
吉布库	奇台县境	乾隆三十三年	1768年	150		3 300	1768年，清军进到吉布库屯田，由古城营游击管理。
五堡、昌吉罗克伦	乌鲁木齐、昌吉县境	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	3 195	81	65 348	1758年清军在乌鲁木齐及昌吉进行屯田。
玛纳斯	玛纳斯	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	1 400	23	28 200	1761年，在“玛纳斯、库尔哈喇乌苏和精河设营屯”。
库尔喀喇乌苏	乌苏	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	180	3	3 636	
晶河	精河	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	168		3 360	
济木萨	吉木萨尔县	乾隆三十三年	1768年	755		15 100	

续上表

屯田地名		开始年代		屯田兵数1777年数	遣犯数	屯田亩数1777年数	备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塔尔巴哈台	塔城	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	850		1.7万	1764年，由参赞大臣绰勒多率绿营兵600名,由乌鲁木齐到此屯田。
伊犁	伊犁	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	2 500	49	50 588	1760年伊犁设办事大臣，兴办屯田。
合计				13 905	1 046	288 108	

注：屯田兵数亩数及总计均引自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

清代乾隆年间西域民屯简表

屯田地名		开始年代		屯田兵数1777年数	遣犯数	屯田亩数1777年数	备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宜禾县	哈密	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	697	2 596	50 521	1761年，募民开垦巴里坤等地。
奇台	奇台县	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	1 994	6 824	73 495	1767年，清政府从张掖招募民户300户共千余人，往木垒、奇台屯田。
迪化州	乌鲁木齐	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	3 496	16 631	42 216	1760年乌鲁木齐设同知,命在乌鲁木齐屯田。
昌吉县	昌吉县	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	4 332	19 734	62 370	1762年从关内来屯户426户，分别派往迪化和宁边（昌吉）屯田。
绥来县	玛纳斯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	2 252	7 624	7 320	引自《中国经营西域史》。
阜康	阜康县	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	4 350	18 405	39 940	1764年有102户在阜康屯田
伊犁	伊犁	乾隆二十八年	1763年	71	209	4 391	1763年商民张子仪等32户共要耕地39 618亩。



清代嘉庆年间西域民屯简表

屯田地名		开始年代		屯田亩数1808年数	备注
古地名	现地名	年号	公元		
迪化州	乌鲁木齐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181 866	1775年迪化州在辖境内之民屯种地102 800亩。到1808年，经过32年，就猛增为681 013亩，增长5倍多。可见北疆民屯发展异常迅速。
昌吉	昌吉县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165 567	
绥来县	玛纳斯县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93 595	
呼图壁	呼图壁县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51 841	
济木萨	吉木萨尔县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93 217	
喀喇巴尔噶逊	乌鲁木齐县属达坂城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7 384	
头屯	乌鲁木齐县境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8 023	
芦草沟	乌鲁木齐县境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5 313	
塔西河	玛纳斯县境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10 529	
阜康县	阜康县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63 678	
合计				681 013	



第十二章　道光咸丰时期新疆屯垦

第一节　清廷平定张格尔叛乱

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生逢盛世,凭借着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所积蓄的国力,使清代达到鼎盛时期。特别在统一新疆、巩固多民族的祖国统一方面,更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乾隆至嘉庆时期的新疆屯田,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到乾隆中期以前,清朝的全盛局面开始衰落。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虚耗,民怨渐起。清仁宗嘉庆皇帝颙琰亲政后,虽诛杀了第一大贪官和珅,但官场积习已深。一切积累下来的病症,到嘉庆时期开始溃发,与内忧外患相始终。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颙琰去世,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继位。承嘉庆衰落之际,国势不振,他在位30年,政局剧变。在新疆发生了大规模的"张格尔之乱"。特别是1840年中英鸦片之战,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使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嘉庆时,政治形势由盛而衰;道光时,则由衰而乱。直至咸丰一朝,国家遭逢空前厄运。道光咸丰时期的新疆屯田,在内外忧患中艰难地维持着。

乾隆朝平定大、小和卓(波罗尼都、霍集占)之际,和卓后裔大多逃往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国,浩罕国在清朝势力衰落时期,乘机发展强大起来。它一方面四处征伐扩张;一方面支持和卓后裔窜回新疆,谋叛复辟,从中渔利。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利用当时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朝官员和伯克地主不满情绪,依靠浩罕支持,四次窜回新疆作乱。

第一次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张格尔利用嘉庆帝去世之机,率300人由浩罕人卡烧杀抢掠,被清军击溃。道光帝闻变即派伊犁将军庆祥亲往视察,



查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虐民,革职逮京。

第二次是道光四年(1824年)八月,张格尔纠集200多人入卡,到柯尔克孜部落中流窜。参赞大臣永芹派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率兵300追剿,此讨彼窜,久而无功。于是滥杀柯尔克孜族百人而还,被柯尔克孜族2 000人会同张格尔200人包围,全部被杀死。张格尔由此聚众三四千人。道光帝闻讯震怒,撤换永芹,以庆祥为参赞大臣。

第三次是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张格尔率500人进卡,裹胁万余人进攻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又求助于浩罕,许以割让喀什噶尔及财物平分。浩罕出兵万余助战,9月26日攻陷喀什噶尔汉城和维吾尔城。来自全国各地的1 000多名汉族商民参加了保卫汉城的战斗。城陷,全部被杀,庆祥自缢殉国。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三城也相继陷落,南疆大乱。道光帝命伊犁将军长龄率北疆驻兵增援,又派陕甘总督杨遇春等率各省官兵3.6万名,集于阿克苏,分三路进击。次年春,经过几场激战,先后收复四城,平息了叛乱,张格尔率少数残匪逃遁。

第四次是道光八年(1828年)初,张格尔乘春节年关清军疏于防范之际,纠集500人窜入卡内。维吾尔人民予以抵抗,清将领杨芳率兵6 000追击。在喀尔铁盖山,总兵胡超及锡伯族战士生擒张格尔,解京处死。

在讨平张格尔之乱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或冲锋陷阵,勇敢杀敌;或探敌侦察,充当向导。喀喇沙尔(今焉耆)的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族人民自备马匹军器,组成千人队伍,英勇作战。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人民支持清军,搜捕残匪。各族人民承担了军需运输任务,从伊犁和乌鲁木齐翻山越岭,车拉人背,保证了阿克苏3万清军的军粮供应。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次平叛,内地只供应了军械火药,而军粮则全部是乌鲁木齐所积的屯粮和伊犁采买之粮。这样大大节省了内地运粮的困难,保证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屯垦戍边的成效,在此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第二节　清廷加强对南疆的屯垦

平叛之后,清军对派驻新疆的大臣官员实行考核制度,裁革南疆的陋规,对伯克的侵贪勒派严加禁止;同时整顿边防。清朝统一新疆后,为防止汉人会同维吾尔族人造反,在南疆一直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不准南疆驻军官兵携眷,不准内地汉民及遣犯在南疆屯垦。通过这次平叛,使道光帝深刻认识到"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为此,他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下旨:"先将西四城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有愿携眷者听之。……其防兵在戍既久,有自愿携眷安家者,亦听其便。数年之后,可成一半眷兵,一半换防之局,节费自属不少。"这是清廷在南疆屯田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屯田的先决条件，道光帝指出："此时招开民屯，必须无碍于回众（维吾尔群众）生计；将来因屯募兵，必须无碍于边地操防。"[①]道光帝委派长龄、壁昌、玉龄等人在喀什地区大规模地开展屯田。

道光时期的喀什屯田，主要在喀什噶尔和巴楚两县境内，另在莎车也有一块专门安置维吾尔族农民的屯田区。

大河拐屯区

御史钱仪吉和长龄在道光七年、十一年的奏议中提出："试垦大河拐屯田。"大河拐一带有"空地一百余里"。准备来春先令原回民试种，如有成效，就陆续添设屯田，用其岁获粮食供军饷。钱仪吉在奏折中称："南路兴办善后，非增兵不足以壮军威。而官兵既多，难尽取给于回部，自应仿照北路，开设屯田。喀什噶尔之东大河拐一带、傍乌兰乌苏河岸……可否于所调各兵内择其曾在伊犁、乌鲁木齐屯工种地者，酌留数百名，于大河拐一带筑数堡，使之居住。俟交春令，逐渐开垦。"[②]道光八年春天，清政府派出"五百名回兵及回子（维吾尔族农民）五百名"[③]，在大河拐屯田生产。当年所种杂粮"已经成熟"。大河拐位于今疏勒县东北伽师县西面，包括今日的羊达曼区、夏甫桃区和英吾斯坦区。纵横六七十平方公里。

在大河拐试垦成功的鼓励下，道光政府"准招募无业穷回及情愿试垦之人，陆续认垦纳粮"[④]。道光十一年九月（1831年），长龄进一步提出："欲令守边兵丁实心出力，莫如屯田之法。……此时先将西四域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有愿携眷者听之。其回子地亩，亦不禁其租给民人耕种。"[⑤]清廷批准执行。按此意见，屯田是为了驻防兵实心出力。政府应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的闲地都招民开垦，带家眷志愿承垦的非当地居民（如汉、回）也可批准认垦。甚至维吾尔族农民的私有土地还可出租给民人（包括汉、回等）耕种。这与清政府前期严禁汉人到南疆西四城屯田，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长龄还提出，带家属耕种的人，有愿人伍者，"即准其充实名粮"（称之为"眷兵"）。防兵之中，驻防时间久，愿带家属参加屯垦的人"亦听其便"，道光帝均于赞许，认为是"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从此，清政府便在喀拉赫依（今疏勒县城的前身）、巴衣托海、阿奇克亚尔等地区，大规模地进行开垦。

喀拉赫依屯区

喀拉赫依约在道光八年至十一年（1828~1831年）开垦，屯民为汉、回族。巴依托海处克孜勒河东，有地67 200亩。因与"回庄毗连"，所以交给当地维吾尔族农民耕种，不准汉、回民人去开垦。河西的阿齐克亚尔，因距回庄较远，有地16 098

① 《清宣宗实录》。
②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宣宗》，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③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宣宗》，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④ 《同治户部则例》。
⑤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宣宗》，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亩，道光帝准"招民户（即汉、回）承种"[①]。"自应设法迅速招徕"。道光十五年（1835年）喀什噶尔新城周围一带之喀拉赫依"换回地二百二十顷六十二亩零，招集民户五百六十户开佃，上年属升科之岁，该屯民已将道光十四年分应征小麦六百七石零全数交仓"[②]。据此测算：每户种地40亩。道光十一年开垦，三年升科，十四年起科征粮。每亩征小麦三升，比北路"征细粮八升少五升"。此垦区是汉族户民承垦，据王希隆先生考证，"喀拉赫依认垦的五百零六户应主要是商民"[③]，这是有道理的。总之，自平定张格尔之乱后，克孜勒河大拐弯处的屯垦迅速发展起来。

巴尔楚克屯区

巴尔楚克位于阿克苏和喀什噶尔之间，扼"回疆要道……叶尔羌、喀什噶尔两河横贯东西，两岸多沃壤，可耕植"。清廷在平定浩罕支持下的张格尔叛乱之后，驻兵于此，并举办屯田，由于道光帝的重视，巴尔楚克的屯田迅速发展起来。

1832年（道光十二年）叶尔羌参赞大臣壁昌与他的副将唐奉率1 000名士兵进驻巴尔楚克，壁昌"令唐副将带兵在此扎营，发给银1万两，纠工筑城，开渠引水，招民种地……不数月而成街市。近又搬眷民，生聚已成，所产麦谷，瓜菜，无一不佳"[④]。巴尔楚克的屯田，主要分布在毛拉巴什、赛克三、沙湖尔等地。即今巴楚县城周围及西南的良种繁育场一带，兵团农三师的51团等也在其境内。

道光帝谕令："添兵全在加意操防，屯田亦宜广为开垦，总需实力奉行，多一兵得一兵之力，垦一顷收一顷之粮。"[⑤]清政府除着力进行军屯外，还注意发展民屯。清廷谕："巴尔楚克等处，旷土本多，应广招眷民，尽力开垦。"[⑥]这里所说的眷民，主要是指招募关内的汉族带家眷的农民。由于这一政策的执行，两三年间"认垦之民，源源踵至"。

巴尔楚克屯田有军屯，有民屯。关于军屯，我们仅知在道光十二年，壁昌和唐奉率士卒千名在此垦荒种地，开渠引水并筑城修路，军队是屯田的创业者，后来驻军增至3 000人之多。1838年（道光十八年）金和曾上奏："巴尔楚克屯田，引用大河拐浑水，曲折有八百里之遥。"[⑦]这项巨大的引水工程，没有军队参加施工是不可能完成的。从以上看，军队参加了屯田，但耕地面积多大?收获多少?有待进一步考证。据王希隆先生称："喀什噶尔、巴尔楚克都曾派兵设屯，但这两个屯区以后都招民认垦。"[⑧]这是可能的，但不会全部"招民认垦"，军队还应有自己的屯田。

①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宣宗》，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② 《清宣宗实录》。
③ 《清代西北屯垦研究》。
④ 壁昌：《叶尔羌守城纪略》。
⑤ 《清宣宗实录》。
⑥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宣宗》，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⑦ 《清宣宗实录》。
⑧ 《清代西北屯田研究》。

关于民屯,1834年(道光十四年)巴尔楚克已"开田二万四千余亩,共招种地民人三百六十名(户)"①。"每亩征收小麦三升","已于本年升科纳粮"②,年收赋粮700余石。随后又有屯民子弟200余名陆续参加营伍。

1835年(道光十五年)清廷又从关内"招来眷民二十八户,已供给牛具、种子,拨地耕种"③。

由于屯田发展很快,收获颇丰,1838年(道光十八年)10月,道光帝谕:"巴尔楚克兴办屯田,该城土地广沃,历年开垦,卓有成效。"④对屯田进行了称赞。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这里有熟地四万余亩,垦民200多户,人口近千。昔日荒漠之地,经过屯垦开发,一变而为"田畴弥望,城市喧闹"的富庶繁华之乡了。清廷称赞说:"回疆堪以招民之地,莫过于巴尔楚克。"

1856年(咸丰六年)叶尔羌参赞大臣常清奏称:"巴尔楚克新垦荒地十一顷四十亩有奇。"⑤屯田面积已经很大了。

为了促进巴尔楚克屯田的迅速扩大,清廷照伊犁、乌鲁木齐废员效力之例,"准该废员等捐资报效,招致眷民……如办及百户,由该大臣等奏请鼓励"⑥。据《回疆开垦事务奏稿》载:"查巴尔楚克前此办理招民……十余年来,惟谈春台一员招至一百户,奏蒙恩旨,赏给六品顶戴释回。"可见在南疆招致眷民兴办屯田之难。

总之,巴尔楚克垦区在道光咸丰年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土地日辟,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人口剧增,市场繁荣,屯垦范围从乾隆时期的巴尔楚克一地扩大到沙湖尔、毛拉巴什、赛克三等多处。巴尔楚克已成为南疆的一个大型屯垦区了。在1865年(同治四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当进攻巴尔楚克时,这里的屯民和军队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写下了誓死保卫祖国的可歌可泣的一页。

可惜,巴尔楚克屯田的成功经验,一直未能在南疆推广。

第三节　林则徐遣戍新疆期间对屯垦的贡献

自道光继位以来,英帝国主义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倾销鸦片,白银大量外流。在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禁烟的压力下,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鸦片237万多斤。次年五月,英国军队为保护鸦片贸易,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在

① 《清宣宗实录》。
② 《清宣宗实录》。
③ 《清宣宗实录》。
④ 代西北屯田《光绪朝东华录·宣宗》,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⑤ 《清文宗实录》。
⑥ 《清宣宗实录》。





图 49　伊犁林则徐塑像

广东福建被击退，转而北上，攻陷浙江、定海，逼近天津。英军凭借着船坚炮利，先后陷广州、厦门、镇海、宁波、镇江、南京。清廷大惧。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清与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割让香港，赔款2 100万银元，开放五口通商等，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林则徐被革职，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日（1841年6月28日），“从重发遣伊犁，效力赎罪”[①]。

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九日到达伊犁惠远城(今霍城县惠远乡)。他关心时事，忧国忧民，带病研讨新疆史地，潜心探索筹边之策。早在他禁烟抗英斗争的时候，即曾组织翻译《四洲志》一书，记述了沙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并指出，新疆毗邻沙俄，千万不可放松警惕。到戍所后，在为伊犁领队大臣开明阿的送行诗中，指出伊犁驻军的职责是：“静以绥中原，动以御外侮。”必须居安思危，严防沙俄侵略，“厝薪火难测，亡羊牢必补”。

林则徐被伊犁将军布彦泰委派掌管粮饷处事务，得以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了解了清代在新疆的屯田情况。鸦片战争后，清朝向英国赔款，国库财政拮据，对新疆驻兵的军饷，也就日趋减少。新疆大兴屯田，已刻不容缓。

布彦泰在边疆任职时，对屯田亦较重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他在伊犁发动垦荒，就多得于林则徐的帮助。经过一年的努力，在惠远城附近三棵树、红柳湾开垦土地33 350亩，安置汉民570户。在阿勒卜斯开垦土地16.1万亩，安置维吾尔农民500余户。道光帝在布彦泰的垦荒奏折上高兴地批示：“日久储蓄充盈，自宜预筹抵拨，即可于兵饷之需，渐次减调。”[②]

伊犁垦荒的奏效，对战后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道光帝，启示不小。他在道光二十四年春的一道谕旨中说：“西陲地面辽阔，隙地必多。果能将开垦事宜实心筹办，当可以岁入之数，供兵食之需，实为经久有益。”随后强调：“伊犁地处极边，兵粮民食，必当计及久远，当以开垦为第一要务。”[③]表彰布彦泰“督率有方，忠诚为国”，并奖励提拔了一批垦荒有功人员。这极大地鼓舞了布彦泰和林则徐。林则徐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② 《清宣宗实录》。
③ 《清宣宗实录》。

把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倾注到边疆的屯垦事业上。《清史稿》评论说："布彦泰新疆开垦，胥赖林则徐之擘画。"

惠远城东有阿齐乌苏废地10万余亩。前任伊犁将军松筠曾经调拨八旗兵丁屯种，因为乏水而废置。重新开垦必须首先解决水利问题。从伊犁河支流喀什河开渠引水灌溉，才能使废地复苏。林则徐为了效力屯垦戍边，经过考虑，抱病向布彦泰呈请捐资承办水利工程中最艰巨的龙口工程。他为此投入了全部身心，亲自设计督修，带病操劳。率领民工北岸挖石，南岸筑堤。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终于使龙口新办6里工程如期完成。全部工程完工之后，10万余亩土地得到灌溉。是年秋，道光帝称赞："所办甚属可嘉。"[1]布彦泰为此上奏反映林则徐到戍两年的表现："留心察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窃谓人才难得。"[2]



图50 伊犁惠远古城

伊犁垦荒的成就，使天山以南各城也相继奏请开垦。道光帝认为需要派人亲往各城查勘垦地。经过斟酌，他于年底通过布彦泰向林则徐传旨，派林则徐前往南疆，勘查地亩，兴办水利，招户安民，考核工费。这是林则徐梦想不到的。虽然事务繁重，道路遥远，自己又体弱多病，但林则徐为了能为开发和保卫边疆贡献余力，为了报国安民，还是欣然前往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二月十七日，林则徐离开了生活两年的伊犁惠远城，赶往乌鲁木齐，再经吐鲁番折赴天山以南，会同喀喇沙尔（今焉耆）办事大臣全庆结伴西行。在二十五年（1845年）上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勘查了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今和田）、叶尔羌（今莎车）、喀什噶尔、喀喇沙尔（今焉耆）七城垦地。途经英吉沙，遍历南疆八城。据林则徐记载南疆勘地的《乙巳日记》来看，情况如下：

1）库车。关于库车垦地。二十四年，库车办事大臣常清上奏说查出库车可垦荒地，已动员捐资兴工，请求拨给无业的维吾尔人承种。

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十五日抵库车。十九日，全庆随后赶来，在官署商讨履勘地亩之事。晚间，林则徐整理丈绳备用。次日，林则徐西南行

① 《清宣宗实录》。
② 《史料旬刊》，《布彦泰》。

70里，到托依伯尔底之地。周历四至，逐丈计量，勘地6.8万余亩。当晚宿托克苏托玛村。二十一日返城，与全庆商计，并发文向布彦泰汇报。

五月九日，道光帝就布彦泰库车开垦地亩一折批复，说南疆垦荒，本意是招致内地人民承种，“原非为该处回户另筹生计”，“现在库车地亩，既据全庆等往勘，请给回子承种纳粮，复经布彦泰核奏，自系因地制宜。惟事当创始，不可不预防流弊”①。

六月十四日，林则徐与全庆接布彦泰抄寄的这道谕令。林则徐看到道光皇帝虽然准予将地亩拨给维吾尔人耕种，但语意甚为勉强，便与全庆商量后，再次致函布彦泰。

2）乌什。关于乌什垦地，二十四年，乌什办事大臣维禄奏请裁撤兵屯，续开地亩，拨给维吾尔人耕种。

林则徐于二月三十日抵乌什。三月一日与全庆出城各勘地亩。统计共有地10.3万余亩，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镇压乌什维吾尔族起义之后所设屯田数。分布为宝兴、充裕、丰盛三屯。原设兵屯千名，现存340名，土地荒废者甚多。林则徐勘地回署后与全庆商办，整理公牍至四更就寝。之后又为乌什地亩事，向布彦泰致函。

3）阿克苏。二十四年，阿克苏办事大臣辑瑞查有可耕地10万亩。开渠引水，足资灌溉。于是未经具奏就招徕维吾尔人兴工。道光帝下令停工，候旨办理。他考虑的是“阿克苏等城，民回杂处。现在开垦荒地，若令民户认种，究竟能否相安?及酌给回户承种，日后有无流弊?”②于是传谕林则徐亲往履勘。

林则徐于三月五日，由乌什至阿克苏，次日上路南行，8日到朗哈里克新垦田地处。与全庆分东西两边丈量，各自引绳而行，每十丈为一标记，从早忙到晚。



图51　叶尔羌河

4）和阗（今和田）。关于和阗垦地，二十四年，和阗办事大臣奕山奏请，查出可耕荒地，并招集维吾尔人挖渠兴工。道光帝也令停办。原因是此项荒地是否可以开垦，招集维吾尔人承种，日后有无流弊?该处现在有无汉民可以招垦?

林则徐于三月二十八日至和阗，几天后，出城勘地，行200里到达达瓦克新渠龙口。在两河之间的滩地上设毡庐宿营，勘量了达瓦克、鸡克坦、爱海里等处

① 《清宣宗实录》。
② 《清宣宗实录》。

地亩。又移住于鸡克坦、苏尔坦之间的河滩上，赴阿堤巴什勘量。夜晚风大，夜不成眠。

布彦泰将全庆与林则徐的汇报上奏后，清廷回答，达瓦克既已筑坝开渠，修立龙口，引水灌溉，此项荒地实有可垦之处，准其开垦。和阗地处偏僻，汉民难以招徕，应如所奏，地亩可分给情愿承种的维吾尔人。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3记载：是年和田共有新垦地100 100亩，其中达瓦克有7.2万亩。招募回户承种9.6万亩。

5)叶尔羌(今莎车)。林则徐在行过巴尔楚克(今巴楚)之后，接叶尔羌参赞大臣奕经等人公文，知该处已新垦地亩，请顺道查勘。四月十五日，林则徐由和阗返回叶尔羌。十八日出城西行65里，至和尔罕新垦之地。先查看水渠，当天夜宿毡庐中。次日勘地，西至玛咱尔沙梁。下午东行35里至龙口查看水势，宿克罗巴特村。勘地后向布彦泰呈报："和尔罕地膏腴，哈拉木扎什水渠可资灌溉。"[①]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批复："据伊犁将军奏称，叶尔羌所属之霍尔罕地方，新垦田九万八千余亩，现已开挑渠道，足资灌溉。但地处偏隅，与回庄杂错，招民承种既多未便，不若分给回户，转可相安。自系实在情形，应如所奏办理。"[②]

6)喀什噶尔。二十四年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奏请，查出喀什噶尔闲荒地亩，已捐资开工。林则徐于四月二十四日由叶尔羌经英吉沙到喀什噶尔，出北门70里至新开地亩龙口。河西地名阿奇克雅黑，河东地名巴依托海。是日先勘水势，夜宿毡庐。次日丈量地亩，行35里到玛杂丁勘量地亩。林则徐与全庆向布彦泰呈报：喀什噶尔新开地亩，"分河东河西两处。河东之巴依托海，计地六万七千二百亩。河西之阿奇克雅黑，计地一万六千九十八亩"。八月四日清廷批复："查河东毗连回庄，无民可招，不得不酌给回子耕种。……河西地亩，既称可招民户承种，自应设法速为招徕。"[③]

7)喀喇沙尔(今焉耆)。全庆任办事大臣时曾奏请开垦喀喇沙尔环城周围及库尔勒北山根垦地。后交新任办事大臣常清办理。奏称有可垦地1万数千余亩。六月八日，林则徐南疆勘地后东返途中奉旨勘查喀喇沙尔垦地，与全庆赴库尔勒东70里北山根丈量地亩。十四日又在开都河北岸，喀喇沙尔城周东南一带丈量垦地，并查看了水利情况。建议开渠引水，展宽龙口，分挖支渠。

林则徐在南疆勘地中，认真从事。"到一城，查一城，将实情呈报将军核奏，绝不敢稍有成见，亦绝不能粉饰迎合。"[④]七城勘地后，六城由伊犁将军布彦泰具奏，喀喇沙尔由全庆具奏。但实际工作及上奏折稿也多由林则徐草拟。

七城勘地的统计，对照《清史稿》中布彦泰和全庆的传记，都记载林则徐共履勘

①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全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清宣宗实录》。
③ 《清宣宗实录》。
④ 《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五年十月致李石梧书》。

垦田60余万亩。而《清史稿·林则徐传》记其:“计辟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七城之前,林则徐在伊犁捐办屯田,七城之后,林则徐在吐鲁番、哈密勘地。几处相加,远不及60万亩之数,更何况3.7万余顷(370多万亩),显有扩大,似应以60万亩为宜。

关于七城垦地的分配,林则徐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合理安排。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采取回屯或民屯。针对清廷态度,他与全庆商议后,致函推动布彦泰奏请,使道光帝尊重实际情况,合理地进行分配。招募汉民承种困难的地方,维吾尔人大都就近拨地耕种。而喀喇沙尔垦地,喀什噶尔河西垦地则招徕汉民承种。这样符合当时南疆的实际情况。照顾到维吾尔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相处和共同开发新疆的目的,促进了南疆的生产发展。

林则徐在履勘中,把乌什、喀喇沙尔的兵屯裁撤,分别拨给维吾尔人和汉人耕种。把屯兵改为操防,以加强边防。《清史稿·林则徐传》就记载他“请酌给回子耕种,并请改屯兵为操防,均如议行”。

南疆勘地,林则徐历尽艰辛。据《乙巳日记》记载,车过托克逊翻越天山苏巴什沟(今干沟),“两傍石山,黝然深黑,车行峡中,轮碾沙石,隆隆作声”,经策大雅“多沙窝,殊费马力”,抵图木舒克时遇大风,“黄尘迷目,几不见人”。循叶尔羌河畔而行,“枯苇犹高于人,沿途皆野兽出没之所”。在叶尔羌城南坡斯坎木竟然翻车,幸未伤人。野外宿营,不是“飞蚊、跳蚤纷扰异常”,就是“风力之狂,毡庐欲拔,殊难成寐”。

林则徐在履勘中,不仅受到各地官员的支持,更多的是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大力帮助,担任向导、翻译和马车夫。在布古尔(今轮台)以西尽是翻浆泥沼,维吾尔群众争相用草土填路。在阿克苏过河水深处几乎淹没车马,幸有群众前来护送。南疆之行,使林则徐接近体察了下层维吾尔族人民的疾苦。在和阗勘地时,有千人递呈控诉伯克“借端科派”。此事虽不属勘地范围,但林则徐还是收下呈辞,会同当地官府迅速结案。

履勘七城后,林则徐在喀喇沙尔与全庆作别,赴哈密听候谕旨。他寄诗《柬全小汀(全庆)》两首。其一说:

> 蓬山俦侣赋西征,累月边庭并辔行。
> 荒碛长驱回纥马,惊沙乱扑曼胡缨。
> 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
> 丈室维摩虽示疾,御风仍喜往来轻。

诗中回忆了他们共同勘地的往事,对荒凉的边疆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期绣陇成千顷”,一片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两个月后,林则徐接布彦泰传旨续勘伊拉里克(今伊拉湖乡)垦地。便由哈密折回,九月一日至托克逊。吐鲁番领队大臣海枚曾奏报说:伊拉里克一带有可垦地十余万亩,请令就近维吾尔人耕种,待有成效后,例行升科征粮。被清廷列入新疆开垦的议事日程。由于林则徐是废员流放,身在戊籍,无权上奏。这项工程由乌鲁木齐都统维勤挂名,但维勤不来工地,林则徐只有与他“往返札商”。

伊拉里克地平土阔，当地人称“板土戈壁”，其西又是“沙石戈壁”。200里之外有阿拉沟之水，引水工程自西而东。建龙口石坝，地段甚长。于沙石戈壁凿大渠，又于板土戈壁挖支渠。林则徐采用建议，用旧毡铺垫沙石渠底，胜利完工。勘地为11.1万亩。南疆七城勘地，绝大多数拨给维吾尔人耕种了。而伊拉里克垦地，考虑到吐鲁番、托克逊是南北疆交通枢纽，又临近乌鲁木齐，决定安置内地民户认种。订立制度，将可种之地，按地形区势，以人、寿、年、丰四字编号。每号设正、副户长各1名，乡约4名，由公众推选。承种户民发给执照，不得转让买卖。



图 52　吐鲁番坎儿井

除修水渠外，林则徐还注意因地制宜推广和扩建坎儿井。他曾在吐鲁番看到坎儿井，细心观察，赞叹为“不可思议之事！”这次在伊拉里克建议挖掏坎儿井以灌溉垦地。年底林则徐获释入关，清廷充分肯定了伊拉里克开垦，也同意了挖掏坎儿井的建议。30年后，左宗棠在写给部下刘锦棠的信中，说林则徐曾与他谈及西域时务“颇以未竟其事为憾”。继任伊犁将军萨迎阿将林则徐挖掏坎儿井的计划继续下来，予以完成。据《清史稿·萨迎阿传》记载：“吐鲁番掘井取泉，由地中连环导引，浇灌高田，以备引水所不及，名曰坎井。旧有三十余处。现因伊拉里克户民无力，饬属捐钱筹办，可得六十余处，共成百处。”至此，林则徐的夙愿得以实现。30年后，诗人施补华来此，但见家家垂柳，处处回流，白发老人流着泪怀念林则徐的功德。他作诗《伊拉里克河水利，林文忠公遣戍时所开，所谓四十八坎儿也，贤者所至，有益于民如此》：

海族群吹浪，疆臣远负戈。
田功相与劝，水利至今多。
垂柳家家树，回流处处科。
白头遗老在，怀德涕滂沱！[①]

伊拉里克即今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伊拉湖乡，是维、汉、回杂居区。当地群众至今津津乐道地流传着当年林则徐来此倡导挖掏坎儿井的故事。新疆各族人民至今仍在怀念林公。

继勘伊拉里克垦地及水利工程后，林则徐赶往哈密。哈密帮办大臣恒毓先前上奏：哈密以东“塔尔纳沁地方有官荒地八千余亩，堪可开垦”。道光帝传谕林则徐详细履勘，“是否可以开垦，并能否招来户民承种纳粮”[②]。

① 《泽雅堂诗集》卷2。
② 《清宣宗实录》。



塔尔纳沁(即今沁城)在哈密以东200里。康熙末年,清朝与准噶尔部争夺哈密时,清军驻扎于此。为解决军粮供应,在此屯田,垦地3 000亩。乾隆七年(1742年),清廷因地寒土薄,收获无几,下令停止耕种。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出师平定天山南北之际,再次在此兵屯,疏渠并种地一千五六百亩,种植青稞、豌豆,很快将兵屯恢复到原有规模并逐年扩大。但由于水土的原因,80多年间,未有很大发展。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月二十四日(11月23日),林则徐从哈密赴塔尔纳沁,用几天时间勘明了荒地情形。29日回城途中,遇军民绅商百余人拦舆环跪递呈,控告七世哈密王伯锡尔的不法行径。哈密绿洲之地,除三地官屯之外,全被伯锡尔霸占,民田竟没有半亩。未经他的允准,任何人不得随便垦种。不但要全部田租交给他,而且凡有居民之处,他都要收取地租,还把山林占为己有。驻军修房,连一车土也要交纳几十文钱。更有甚者,他竟将城郊坟地吞占,必须交纳银两,才可埋尸。他肆无忌惮,强取豪夺,成了谁也管不了的"土皇帝"。不仅民众被勒索,而且驻军也受欺压,军民怨声载道。林则徐虽是无权的谪臣,所告之事又不在他勘地范围,但看到群众受到的欺压,伸张正义之心,使他毅然接受了这桩控案。道光八年(1828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后,道光帝曾下旨颁布裁革南疆陋规条款,以期安定民众,保卫边疆。据此,林则徐等于十一月一日传讯伯锡尔,将状纸所控之事当面讯问,并晓以大义。伯锡尔情知不妙,又见民怨沸腾,不得不表示愿将东新庄的万亩土地呈献充公。至于勒租索费之事,伯锡尔推说不知,林则徐指出应严行查禁,伯锡尔点头称是。

随即,林则徐会同哈密官员、伯锡尔赴东新庄勘丈。连未垦之地共有一万余亩,全部收归公有。其中熟田5 720亩,生地4 832亩。"每十户设渠长一名,给地六十亩;每百户设总渠长一名,给地九十亩;专司其事。其余招集耕种户民,每户给地三十亩,应共招户二百七十二户。"①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六日(1845年12月4日),林则徐接旨获释,饬令回京,以四品京堂候补。他请求"容将哈密地亩查勘事竣,遵旨起身回京"②。

哈密控案处理完毕,临行前,他和奉召即将进京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全庆,以内阁部堂、候补京堂的名义发布告示,将接受军民控告的详情及查办结果公之于众,严厉斥责伯锡尔的不法行径。布告一出,哈密军民奔走相告,扬眉吐气。为防日后有人嫁祸影射而蒙不白之冤,林则徐和全庆又给伊犁将军布彦泰写信,报告塔尔纳沁勘地情况,详细陈述哈密控案的缘由和处理经过。布彦泰据实上奏,说塔尔纳沁"本有官田一万四千余亩,因土性瘠薄,轮流耕歇,每年实种地七千三十亩"。因水源不足,"若分水招民,官屯转致荒歉"。鉴于此,清廷下令:"所有请垦官荒之处,应无庸议。"③关于奏折中反映的伯锡尔的情况,在新疆带有普

①《清宣宗实录》。
②《林则徐集·公牍七》。
③《清宣宗实录》。

遍性，为了安定，道光帝下令要求新疆各城大臣力守清操，严行约束伯克。为此下达谕令，将道光八年的裁革南疆陋规条款颁发各城，宣读晓谕，责令着力奉行，按季奏报，认真查核。

道光年间的新疆屯田，是由林则徐遣戍新疆而推向高潮。他以花甲之年，多病之躯，不怕路远艰难，遍历八城，为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而贡献余力。他没有任何头衔，也没有上奏之权，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的筹边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和主张，以及他的光辉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第四节　咸丰时期新疆屯垦

道光三十年(1850年)初，道光帝去世，清文宗咸丰皇帝奕subscribe继位，在位十一年。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始于道光三十年，终于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14年，整整经历了咸丰一朝。外有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等。沙俄趁火打劫，先后逼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我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接着又在同治三年(1864年)利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我国西部包括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克塞湖在内的44万平方公里土地霸占。英、法、美等国的侵略势力则由沿海地区进一步深入我国内河心脏地区。清廷割地赔款，内外交困，新疆的屯田也遭到极大的削弱。

咸丰帝即位之初，乌鲁木齐都统毓书就上奏说乌鲁木齐所属迪化州，每年兵粮不够，请求采买。是冬，乌什亏短仓粮案发。前任乌什粮饷章京煜堃派金泳德管仓，未及时晒晾，使仓粮霉变1 500多石。煜堃又派王德接管，查出所亏麦石上报。煜堃并不认真查办，仅令金泳德买补退款了事。煜堃借向阿克苏运粮之机，私自挪用1 000石，纵容属下贪污粮款。事发后按私移库款例治罪。据咸丰二年(1852年)底统计，因乌鲁木齐屯田管理混乱，兵屯所管辖的遣犯逃脱者竟有678人。

时值清廷急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大量对外赔款，因而财政匮乏，军费日绌。而新疆驻兵4万余名，每年需经费一百四五十万两。朝中一些官员不断上奏，提出酌量变通新疆兵饷。其主张：一是为节军费，停止从内地调入驻防兵，而从新疆本地区酌情调拨，各地适当裁撤兵力；二是广垦屯田，屯兵有愿耕种者，拨给地亩，不便屯兵处，可募维吾尔人和汉人耕种。招募内地汉民，应准其携带眷属，南疆驻军也可携带眷属。总的原则是：“节省饷需，而仍于边防无损。”但伊犁将军奕山对屯田不热心，竟奏称：“伊犁土性寒薄，难以开垦。”廷议认为：“伊犁开垦之案，阿桂辟之于前，松筠成之于后，事在必行。以期地利无遗。”[1]尽管这样申令，但屯田仍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

① 《清文宗实录》。



关于裁兵节饷。咸丰四年(1855年)塔尔巴哈台(今塔城)有换防兵1 029名(其中耕种兵丁700余名,操防兵300余名)。参赞大臣英秀奏请裁撤500名,这样每年可节省盐、菜银7 000余两。该处官场放牧羊只不下数万。以时价折银售给蒙古官兵,可得银2.4万两。即可在蒙古官兵每年的俸饷银内扣留1.2万两,两年扣清。这样还可裁撤牧羊兵200名,连同满汉官兵共裁撤700名。共计每年可节银9 600两。与此同时,奕山也奏请将伊犁现存牲畜折价银52 678两,售给蒙古兵作为军饷,分作三年扣清。尽管当时边防吃紧,但由于军费困难,清廷只得同意裁兵和变卖牲畜筹饷的请求。清代新疆的财政一直不能自给,主要靠内地各省协济维持,史称"协饷"。待到咸丰末年,各省财政更难以为继,导致新疆财政更加困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乱外患,新疆局势已岌岌可危。



第十三章　清代后期新疆屯垦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军舰和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腐败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怨沸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在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很快席卷全国。中原地区捻军起义、陕甘回民暴动等等风起云涌，这股革命洪流，不久便波及新疆。

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和串联下，1863年3月27日，惠远城附近的绥定200多名回民，在杨三星、飞刀马二的率领下举义，惠远城回民也积极响应。

1864年，库车人民起义，在渭干河水利工地上，一些贫苦农民在冬季被强迫挖河修堤，不少人或因冻饿，或因不堪鞭挞而死。监工的满、汉官吏和维吾尔伯克们却在舒适的帐篷中花天酒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托乎提尼亚孜哈里等人组织了起义。杀死了两个满、汉官吏和15个伯克，向库车城进发，维、汉、回族贫民纷纷响应。杀死办事大臣萨灵阿、库车郡王阿合买提、阿奇木伯克库尔班等人，封建统治被推翻了。这场起义很快波及到阿克苏、乌什和焉耆一带。

消息传到乌鲁木齐，城关回民趁乌鲁木齐空虚，于1864年7月15日起义占据汉城（迪化）。同一天，昌吉回民起义。至9月份，昌吉、呼图壁、乌苏、阜康、吉木萨尔、木垒先后被义军占领。

10月13日在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伊犁的宁远城，回、维族人民起义攻占宁远城。11月9日，惠远城的绿营兵1 000多人也举旗响应，各城的回、维族人民也纷纷起来向清政权冲击，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3万多人。1866年3月8日攻陷惠远城，伊犁将军明绪自尽（前任将军常清被俘）。到年底，伊犁全境被义军占领。起义烈火遍及全疆，势如破竹。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机构大部被摧毁。

当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起义取得胜利之时，一小撮反动封建领主趁机夺取了领导权，建立起一个个封建割据的小王朝，使运动变质转向。

库车人民起义取得初步胜利时，阿訇热西丁和卓利用他在宗教界的权势，骗取信任，篡夺了领导权，自称"汗和卓"（圣裔王），他阴险地把斗争引入歧途。把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说成是"异教徒"统治所造成的。煽动说："伊斯兰的宝剑已经砍到异教徒的头上。"鼓吹"圣战""乃是真主仆人的伟大天职"[①]。1864年7月在攻占阿克苏和乌什后，大杀"异教徒"和"叛教者"。攻入喀喇沙尔后，大杀城内外的汉族、回族农民和商人。

在伊犁建立的小王朝先后有肖开特和迈孜木杂特等人，他们篡权后，自称"苏丹"（王）。在"圣战"的旗帜下，肖开特竟下令要杀尽锡伯族人并要把他们的心都挖出来。[②]攻克惠远城后，屠城一天，死者数万人。攻占惠宁城后，滥杀无辜，死者2万余人。迈孜木杂特是因贪污塔兰奇人民粮赋而被监禁的大伯克，他被释放后，摇身一变，打起"官逼民反"的旗帜，混入起义队伍。

妥得磷亦名妥明，他篡夺起义的领导权后，在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他宣扬"圣战"，煽起民族仇杀，攻占迪化汉城后，杀汉满军民1.3万人，10月3日攻占乌鲁木齐满城巩宁城，乌鲁木齐都统平瑞自焚，死者2万余人。[③]

这些封建宗教头目所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恢复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统治机构，利用宗教特权，对各族人民进行残暴统治。热西丁横征暴敛；妥得磷强迫百姓为他修筑富丽堂皇的"王城"；迈孜木杂特和哈比布拉过着极端淫逸奢华的生活。他们转移斗争方向，浑水摸鱼，鼓吹宗教狂热，制造民族仇杀。在少数宗教头目、封建势力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的日子里，受害的都是各族劳动人民。这些割据政权之间也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不断火并。一场正义的农民起义斗争，被这伙败类葬送得干干净净，农民的反清起义蜕变为民族仇杀和分裂割据势力的混战。

为了反抗封建割据势力的民族屠杀，汉、满、蒙等族人民纷纷逃亡，远的逃往阿尔泰、科布多、安西、敦煌等地，近者亦远避山区和戈壁边缘。有的投入清军，一部分人自动结伙自卫，组织民团，分布于天山山麓和准噶尔沙漠南缘。如乌鲁木齐南山，沙漠边的新渠城子（位于现在昌吉县的生产建设兵团一〇三团场境内）、沙枣园子（一〇五团场境内）、上下马桥（位于呼图壁县的一〇六团场境内）、沙山子（莫索湾垦区境内）、东湖、西营等地。他们开荒种田，筑城自卫。这些民团较著名的有：迪化之徐学功；吉木萨尔之孔才；沈秀廷起于昌吉；赵兴体起于绥来；邓玉生、张和、张兴、张著、马进福等起于奇台。各民团数百人或数千人不等，非伊斯兰民族群众往依者甚众。其中，徐学功功绩显赫一时。

徐学功，乌鲁木齐农家子。世田南山，好击技，结健儿数十。妥得磷围攻乌鲁木齐时，学功率弟7人，屡突围入城送粮，学明、学孝、学忠皆战死。学功据南山、筑碉堡、结栅寨，"附者日众，集五千人"。他"精练马队，每战突阵，骤若风雨"。1868

① 《伊米德史》。
② 《在中国的圣战》。
③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年2月，妥得磷命元帅马泰犯哈密，学功趁乌鲁木齐空虚，率师袭之，一战而克满城，杀敌数千。"学攻先后阵斩元帅马泰、阿奇木马仲等。"

沙俄以"代收"之名占伊犁后，复倡言"代收乌鲁木齐"。1872年11月18日"俄人将袭乌垣，声赴绥来易市，驱驼马数千，载货钞至石河(子)，去绥来八十里，学功以骑旅截之，戮数十人……自此，俄人不敢东窥"[①]。乌鲁木齐没有像伊犁一样为沙俄占领，徐学功是有功劳的。

第一节　阿古柏入侵与沙俄强占伊犁

封建主和少数宗教头目煽起的民族仇杀和相互厮杀，使新疆处在内讧、战乱、分裂和动荡之中。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和沙俄于是乘虚而入。

浩罕是中亚的一个封建的伊斯兰教国家，以和卓家族为首的宗教上层，操纵了这个国家的权力。野心勃勃，向外扩张，不断支持和卓后裔到新疆煽动叛乱。1756年的大、小和卓叛乱、1820~1828年张格尔的四次叛乱、1830年玉素甫之人寇、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1857年的倭里罕和卓之乱，都是在浩罕的支持下发动的。

1864年9月，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思的克利用人民起义之机占喀什噶尔旧城后，对新城(疏勒)久攻不下，竟卖国通敌，向浩罕求援。浩罕统治者视为天赐良机，于1865年1月封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为喀什噶尔汗，派其军官阿古柏率军入寇新疆，驱逐思的克据喀什噶尔城。阿古柏利用新疆动乱局面，使用狡诈残酷手段，先后侵占了南北疆的大部地区。阿古柏匪徒每占一地即大肆杀戮和抢劫。4月11日占英吉沙后，军民2 000余人惨遭杀害。9月1日占疏勒，纵兵大掠七天[②]，1866年12月12日阿古柏致书和田帕夏，要求朝拜"圣人的陵墓"，哈比布拉出城相迎，即遭逮捕。阿匪诈取和田后，人民奋起反抗，阿古柏纵兵屠城五天五夜。1870年11月21日阿古柏入侵乌鲁木齐，见中国人便杀，声称"把被征服者屠杀净尽"。连妥得磷去"感化"阿古柏的数百名手持《可兰经》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阿克苏大杀回族人民，在焉耆疯狂屠杀信仰佛教的土尔扈特部。此外他还下令回、汉人皆剃发易服、光顶圆领，效安集延人之服饰。

到1870年底，阿古柏已占领南疆八城和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等地，把各个封建王朝，除伊犁外，扫荡殆尽。他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洪福之王)，建立哲得沙尔汗国。公然提出"杀卡甫尔"(异教徒)的口号。据目睹惨状的英国人沙敖说："仅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二城，被杀的汉族人和满人就有四万人。"[③]

①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文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
③ 《通俗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阿古柏统治区，人民负担十分沉重，赋税繁多且无定额，想收什么就收什么，连麦草都有“撒满普尔”捐，谁家死了人还要收“念经费”。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逐渐加入奴隶的行列。阿古柏本人就拥有3 000名奴隶。在喀什噶尔，一个奴隶售40个银币，有的儿童被贩卖到浩罕、费尔干纳等地去。

阿古柏一伙横征暴敛，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的行宫遍布喀什噶尔、吐鲁番、托克逊等地。阿克苏的王宫是照费尔干纳的式样建造的，穷极奢华。阿古柏从各地抢掠的少女600余名，充当后宫，行军时还要带姬妾十余人。

阿古柏与土耳其勾结，请来了一批军事教官。与英国订《英阿条约》，得到一批洋枪。又与沙俄订《俄阿通商条约》，得到了沙俄的承认。

正当阿古柏向天山以北进犯的时候，沙俄出兵强行占领伊犁，并妄图囊括全疆。

伊犁是我国西部富饶而美丽的地方，也是清代后期屯垦戍边的重点地区之一。伊犁河向西流入巴尔喀什湖，两岸村落相望。霍尔果斯以西至图尔根河是索伦营屯守。著名的伊犁九城，由满营和绿营屯垦戍守。与九城隔河相望便是锡伯营屯垦戍守地区。维吾尔族屯田的村庄遍布各地。在山区由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驻牧。由于“苏丹”们煽起的民族仇杀，伊犁人口减少一半。霍尔果斯河以西基本荒芜，伊犁九城大半毁于战火。满、绿营兵丁不是被杀就是逃往他乡，两营蒙古兵逃亡者亦多。维吾尔族农村，失去驻防兵的保护而暴露于侵略者面前。

1871年4月，俄国借口追捕哈萨克族起义首领塔扎别克，于5月15日派兵侵入河南岸的克特缅山。3 000多塔兰其民军与俄军浴血奋战，牺牲达500余名。18日俄兵侵入霍尔果斯，4 000塔兰其民军筑堡固守，激战十天十夜，打退了敌人。6月6日俄军再次侵入克特缅山，伊犁军民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用棍棒、长矛、石头打死俄军官2名、士卒36名。28日俄军2 000多人向霍尔果斯进犯，4 000余维、汉、蒙、回族人民在清水河英勇抗击。就在这腥风血雨中，伊犁苏丹艾拉汗投降了敌人，缚送了哈萨克族抗俄战士塔扎别克。伊犁人民英勇抗俄历时50天，但伊犁地区仍因艾拉汗屈膝投降而被沙俄侵占。

沙俄强占伊犁后，为了掩盖其卑鄙目的，声称是替清政府“代收、代守”，“一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①]，即可交还。但当清政府派人前去谈判要求交还时，他们却强词夺理，拒不交还。侵略军头子郭尔帕夫斯基进入宁远城后宣称：“俄国所占领的地区，永远不归还给中国。”[②]并将伊犁隶属于沙俄突厥斯坦总督管辖，妄图永远霸占。

① 王树枏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②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

第二节 左宗棠率军出塞，收复新疆

腐败的清政府在一段时期竟不知道阿古柏的入侵，甚至弄不清阿古柏是不是外国人。直到1871年5月沙俄出兵吞噬伊犁，通知清政府俄军已“克服伊犁城池”，清政府才大吃一惊。又得到“俄人尚欲带兵前往收复乌鲁木齐”的消息，才感到问题严重。沙俄声称是“代收、代守”，并催促清政府“迅速派员前往接受”。但当伊犁将军荣全1872年通知俄国准备去伊犁谈判收回伊犁时，沙俄不但拒不交还伊犁，竟蛮横地提出“塔城是伊犁兼辖，也是俄国‘暂管’的地方”。认为荣全的行辕暂驻塔城“尚属不合”。荣全给清廷的报告中说：“俄人欺我，以至于此，欲忍不能，欲战不可。事已至此，非口舌所能争，唯盼大军迅速前进。”左宗棠上书清廷“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指平定阿古柏），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清政府到此时才认识到：“断非空言所能有济，必须中国兵力足以震慑。”[①]决心收复新疆，令左宗棠督办进军新疆的军务。

适值此时，日本军国主义于1847年5月出兵侵占台湾，东南海防吃紧。年底投降派李鸿章上书清帝，建议放弃新疆：他认为乾隆统一新疆是“徒收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南近英属之印度，即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因此主张“暂弃关外”。“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②]要清政府命令西征军停止前进，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作海防之饷，这就是所谓“海防论”。左宗棠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至于节饷，他认为只有坚决进兵早日收复新疆，才能真正地节饷。若此时停止进军，“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甚虞，且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③]。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改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帅西征。



图53 左宗棠塑像

1876年4月左宗棠进抵肃州（今甘肃酒泉），督饬刘锦棠所率湘军二十余营西进，6月抵吉木萨尔。至此，西征军连同在疆清军将及百营，达五六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万人。

左宗棠的进军方针是"缓进,速战"。步骤是先北后南。缓进就是战前进行认真准备,塞外用兵,粮饷供给是件大事。他经过调查发现,从河西走廊运粮是在新疆当地购粮费用的20多倍。于是积极组织屯田。他说:边疆用兵"非力行屯田不可"[①]。饬令部队,边进军,边屯田,就地解决军食。

当时阿古柏控制着南疆并北疆乌鲁木齐至玛纳斯大片土地,沙俄占据伊犁。西征军由北至南,进行了三个战役。

乌鲁木齐战役

1876年7月28日,清军奇袭,克阜康,随即西指古牧地(今米泉)。到古牧地有两条路,一条大道,但有50里的戈壁无水;另一条是小道,水源充足,但叛军已据黄田堡。8月9日清军在大道的甘泉堡、西树头子挖井筑垒,虚张声势。10日夜刘锦棠、金顺率清军突袭黄田堡,11日克黄田,12日清军围古牧地,经五天激战,歼敌五六千人。刘锦棠得悉乌鲁木齐空虚,当机立断,兵锋直指乌鲁木齐。18日一举攻克乌鲁木齐满城、汉城和王城。短短5天,席卷昌吉、呼图壁。此后经三个月强攻克玛纳斯城。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势力被肃清。

打开南疆大门

第二战役的任务是夺取天山险隘达坂城,收复吐鲁番盆地,打开进军南疆大门。

阿古柏为阻清军南下,在天山要隘达坂城筑新城,派大哈通(大总管)爱衣达尔呼里率重兵驻守。又在托克逊筑两城,由他的儿子海古拉坚守,派白彦虎、马得人据守吐鲁番,构成互相策应的三角防御区。阿古柏坐镇喀喇沙尔(焉耆)指挥,总兵力约3万余人。

1877年4月16日,刘锦棠率1.5万人衔枚疾进,于17日晨突然包围了达坂城。维吾尔人民冒险潜出城外向清军报告:"安夷(指阿古柏匪徒)盼援不到,官军封锁日逼,群议突围而走。"[②]刘锦棠乘敌动摇,下令猛攻。歼敌2 000多名,生俘1 200余名,无一漏网,大哈通也被活捉。清军于22日攻占辟展(鄯善),25日克胜金口,26日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守敌马得人降。同一天亦克托克



图54　乌鲁木齐一炮成功遗址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逊，守敌海古拉焚粮草后逃到喀喇沙尔。仅用半个月时间，第二战役胜利结束，歼敌万余人。至此，阿古柏众叛亲离，走投无路，5月28日与司库斗殴致死。海古拉携尸西窜。

第三战役：全部收复南疆

8月25日，刘锦棠率部从吐鲁番出发西征，白彦虎自知不敌，乃决开都河以阻，清军师行泽国。直至10月7日才进到喀喇沙尔，9日抵库尔勒，皆是人去城空。清军粮食已罄，幸得当地人民"掘得窖粮数十万斤"，救了燃眉之急。清军疾进，所向披靡，10月18日克库车，毙敌千余人，数万被裹胁的群众被解救。至26日连克拜城、阿克苏和乌什。

刘锦棠乘胜追击，12月18日攻克南疆重镇喀什噶尔。次年1月2日复和田，活捉引狼入室的叛首金相印，处以极刑。

历时一年半，讨伐阿古柏的新疆之役，于1878年1月胜利结束。除伊犁尚为沙俄所据以外，新疆全部收复。"戎机顺迅，近罕其比。"[①]此役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鲸吞新疆的阴谋，为保卫祖国西陲边疆，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三节　清代后期新疆屯垦

清代后期新疆的屯垦戍边是在政局动荡、外敌入侵、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恢复和发展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东部和北部的屯田

新疆经过十多年的战乱、屠杀之后，人口大批死亡逃散，野皆暴骨，田园荒芜，残破凋零，屯田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乌鲁木齐原是塞外重镇，城市繁华，东西袤延八里，市井迤逦，商贾往来不绝。由于"清真王"妥得磷和阿古柏匪徒的肆意破坏，清军收复时，"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满汉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乌鲁木齐在乾嘉时期是屯田的重点地区，在劫后，"城郊并就荒芜，即间有二三客民力事耕作，亦不过垦数十亩，食三五人而已"[②]。为屯田区引水灌溉的长胜渠，坝口被河水冲毁。纵横数十里中膏腴之地，尽化芜莱。向称富庶的阜康，其城荒毁已久，"榛莽丛杂，不便行走"，不复有城镇面貌。原是南疆重镇的吐鲁番，乱后一片荒凉，"靡有孑遗"。喀喇沙尔是南疆名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汉唐及乾嘉时期重点屯田之地，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农牧业繁盛兴旺。阿古柏匪徒白彦虎西逃时，疯狂地进行破坏，为阻清军追击，决河淹城，清军到达时，"城中水深数尺，房舍荡然"。自喀喇沙尔

①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② 《平定陕甘新方略》。



到库尔勒，"沿途民舍，均已烧毁"。白彦虎强迫农民随从，以致喀喇沙尔和库尔勒都是"空无一人"。连该地区的蒙古族牧民，也是"荡然离居，存者无几"[①]。有一个历史学家论述当时的情况是"户口凋残，田渠荒废，荆棘丛生，狐狸啸聚"。这就是阿古柏统治下的新疆情况。

素称富饶而美丽的伊犁，被沙俄践踏得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当1882年2月清军到达新疆首府惠远城时，该城"西南两面城垣均已被水冲破，城内仓库、官廨、兵房荡然无存"。附近的惠宁、拱宸二城"坍塌尤甚"。熙春、广仁二城"城垣柚橹坍塌不堪"。伊犁到处是断墙颓壁，一片瓦砾。阿齐乌苏大渠，嘉庆年间修建，七年始成，灌溉着伊犁河北数十万亩屯田区和群众的土地。沙俄殖民统治后，"湮没之处共120余里"[②]。其他各渠都是"渠畔被水冲刷，半成沟洞"。伊犁原有军屯、民屯、回屯、旗屯，"收获甚富。兵乱之后，旧设屯田，现皆荒芜"。"尤以兵屯、旗屯最坏"。贪婪成性的沙俄，在伊犁11年的殖民统治中，不仅大量的财物被肆意掠夺，还胁迫中国居民迁往俄国，哀号痛哭的声音响遍村庄和田野，计有维吾尔族4.5万人、哈萨克族2万多人、回族4 600人，合计7万多人，占当地人口十分之六七，加上被杀和逃亡，"地亩荒芜，耕者不及十分之二"。

在阿古柏和沙俄的殖民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屯田事业遭受严重破坏。

在新疆东部和北部第一线坚守的清军约有31个营。这些人因与内地联系严重阻隔，粮食供应长期中断，生计亦复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粮问题，在反对阿古柏和沙俄的侵略战争中求生存，并长期坚持下去，所以只有与民团一道大兴屯田，生产自给。巴里坤、哈密、古城子、塔城一线，是清军坚守的第一线，也是清军的屯田地区。

哈密屯田

哈密屯田，由于动乱，曾一度被迫停止。1868年清军大败妥得磷入侵哈密的回军后，驻敦煌的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立即派守备魏忠义带二营清军，从敦煌到哈密驻防戍守。魏收集"溃散屯兵一百余名，派往塔勒纳沁"，恢复屯田。同时命李生元在二堡恢复屯田。他们"筹耕种，葺庐舍，训练军士，且战且屯"[③]。"冬十月……文麟抵哈密，谕兴办蔡把什湖等处屯田。"

公元1874年初，陕甘总督左宗棠会张曜率嵩武军马步十四营共6 000余人进驻哈密，大兴屯田。张曜了解到引水灌田的石城子渠，是道光年间杨遇春将军西征时修建的，虽年久失修，但基址犹存，稍加修理，即可使用。唯渠底之砂土，渗水严重，需用条毡铺垫，请求左宗棠支援6 000条条毡。左宗棠认为引水屯田，是解决军粮的好办法，给张曜回信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须，文到之日，即檄宁夏、河湟各郡并加购造。续接尊函，以六千为足。然鄙意与其功亏

①《平定陕甘新方略》。
②《平定陕甘新方略》。
③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文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一篑，不若多备于先，仍令购造万条。”[①]1875年垦田种植1.9万余亩，1876年收粮5 160余石，嵩武军粮草充足，后该部调赴前线，驻哈密之防营总兵黄木富、易玉林等率领驻军继续屯田，兴修水利，他们从天山下拔木登挖渠至黄罗岗东北的小杨下，渠长达60多里。西征军“次第出关，收复北路，多藉哈密屯粮”[②]。

巴里坤屯田

巴里坤屯田，由于清军在游击何琯率领下，与民团一起，坚守巴里坤，多次击退妥得磷军的进犯，屯田一直坚持了下来。公元1868年，清政府命巴里坤帮办大臣“伊勒屯等筹办巴里坤屯田”[③]。实际上，巴里坤屯田一直未停，清军的粮食供应，主要靠生产自给。1871年，阿古柏军在乌鲁木齐一带疯狂屠杀“异教徒”，汉族群众大批逃往巴里坤。景廉和何琯挑选年富力强的参军，其余组织屯田。军民粮食不仅自给，且有盈余。1874年左宗棠派人视察巴里坤屯田，了解到一年余粮达1万多石。

奇台屯田

奇台屯田，公元1840年奇台有军屯500人，种地1万余亩，民屯5 000多户，种地15万多亩。1864年7月22日，奇台回民起事，杀汉民千余人。1865年3月6日，回民攻占古城满城，清军600人战死，城内满汉群众“死者七千余人”[④]。屯垦军民死伤惨重，外逃者众，屯田事业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反抗阿古柏、妥得璘的民族仇杀，屯民张和、邓生玉、张兴、马进福组织民团，边战斗，边屯田，生产自救，保护群众。1867年文麟“招哈密团首孔才至，以其练勇200，编入伍籍，遣往古城（奇台）兴屯修堡。后收徐学功散勇2 000余任耕战，于是古田（城）、济木萨屯政大举”[⑤]。

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于1873年率清军马步六营，从巴里坤进驻古城。“疏请三路进兵，并于古城、奇台、济木萨、木垒河一带，广兴屯田，且耕且防，先裕后食，而后次第削平诸匪。”[⑥]此时古城、木垒、济木萨一线屯田的有军屯、民团屯田以及从甘肃等地招募的贫苦农民屯田，在奇台邓生玉等人率领的民团“数百人开屯耕种”[⑦]，一直坚持数年。左宗棠派人了解，奇台屯田收粮，除本地军民供食外，尚有余粮年约五六千石。

民团屯田

在这一时期，活跃在济木萨—昌吉—绥来一线的是民团屯田。他们为了反抗阿古柏和妥得磷的民族仇杀，在沙漠深处筑城自卫，边战斗，边生产，保护了大批汉族和非伊斯兰民族的难民。

孔才民团屯戍在济木萨。1840年济木萨有民屯3 100多户，种地9.3万余亩，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②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武功三》，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穆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⑤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文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名宦》，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⑦ 《平定陕甘新方略》。



1864年济木萨回民起义，在妥得磷的"圣战"、"消灭卡甫尔（异教徒）"民族仇杀政策影响下，几经征战，清军官兵伤亡殆尽，汉族屯民惨遭杀戮。该县所属的阜康，汉族人民"死难不知姓名者约四五万人"①。孔才率领下的济木萨民团，多次打击妥得磷军。1873年景麟命孔才民团在济木萨屯田生产，保卫家乡，次年粮食丰收，除自给外，尚有余粮七八千石。

沈廷秀民团屯田在昌吉城北60公里的新渠城子（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〇三团境），引用头屯河的水，屯田生产。他们多次与妥得磷军交锋。在攻击乌鲁木齐战斗中，沈廷秀不幸牺牲，民团由其弟沈廷辉率领，继续战斗。1875年，民团被清政府整编为振武右营，仍驻新渠城子。

赵体学民团屯驻在玛纳斯县北的沙山子，活动于东起马桥城子（今呼图壁县北的兵团一〇六团境）、西营城（今玛纳斯县北的兵团一四八团境）、东湖城（今兵团一四九团境）等地。公元1840年前，玛纳斯军屯士卒千余人，种地2.8万余亩。民屯有民户3 800多户，种地11万余亩。1864年7月，绥来回民起义，攻占县城，杀死知县，焚毁塔西河屯所，屯田遭受严重破坏。赵体学为了反抗妥得磷的民族仇杀，进行自卫，组织民团屯田生产，保护难民，有"练勇一千名，自备军粮"②。1873年景廉整编玛纳斯民团为振武左营，仍驻沙山子。东与驻马桥城子的高四民团互相配合，在西边同河西（今石河子）乡约"刘姓民团四百余名"③，互相支援，不断打击阿古柏和妥得磷军。

清光绪四年北疆募民屯田简表

地　名	原额户数或亩数	招募户数或亩数	百分比
迪化州	4 200 户	3 600 户	86%
昌吉县	3 900 户	450 户	12%
阜康县	3 090 户	210 户	7%
绥来县	3 700 户	850 户	23%
奇台县	4 360 户	570 户	13%
济木萨	2 800 户	350 户	13%
呼图壁	1 730 户	280 户	16%
库尔喀喇乌苏	80 户	数十户	
精　河	40 户	100 户	250%
镇西厅	6 万亩	3.6 万亩	60%

注：《新疆图志》卷 96 奏议 6 左宗棠"夏陈新疆情形折"。表中"原额户数或亩数"系指新疆战乱，阿古柏入侵前的数字，"招募户数或亩数"系指 1878 年（光绪四年）清军收复新疆后的数字。

① 《阜康县乡土志》。
② 《平定陕甘新方略》。
③ 《平定陕甘新方略》。

徐学功民团于1871年被清政府命名为“定西营”，屯驻于乌鲁木齐南山。“分派营官专办营务”，“办理屯田，用雇军食”[①]。该部先后转战于西湖(今乌苏县)、布伦托海(今福海县)、昌吉、呼图壁、石河(今石河子)、玛纳斯，有力地打击了阿古柏侵略军。1873年，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将徐学功民团编为振武中营，屯驻于沙枣园(今昌吉县北80里的兵团一〇五团)，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屯田的好地方。当年的城堡和屯田的遗迹，仍清晰可辨。1875年，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新疆军务兼乌鲁木齐都统。金顺把振武各营整编为马步四营，共2 000余人，由徐学功统领。屯驻在玛纳斯、昌吉以北一线“广开屯田”，保护粮道。当年粮食丰收，“所屯水田可有稻四五十万斤”。1876年西征军入疆，徐学功把这些稻谷全部作价给湘军为军粮[②]，支援了西征大军。

塔尔巴哈台屯田区

1840年前，塔尔巴哈台有屯兵400名，种地8 000亩；民屯有100多户，种地3 000余亩。塔尔巴哈台在与内地严重阻隔、粮饷断绝的情况下，为保卫祖国领土，与沙俄侵略者进行着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不进行屯田是难以想象的。

1865年塔城回民起义，攻破塔城，在阿訇石金斗的煽动下，汉族屯民惨遭屠杀。参赞大臣武隆额战死，千总甘涌被俘，手足被钉于门上惨死。所余七八十户，逃到布伦托海(今福海县)。

1871年，清廷命荣全任伊犁将军，在徐学功民团护送下到塔城暂住(伊犁被沙俄侵占)。他积极组织军民屯田，调逃往俄境的索伦营军民和在伊犁的锡伯族军民安置在塔城苇塘湖等地屯垦生产，开荒种地，兴修水利。荣全积极“督饬耕作”，“每年约得粮七八千石”[③]，保证了军队粮食供应。1873年底，清政府命察哈尔骑兵和宣化、大同两镇士卒千余人到塔尔巴哈台屯田戍守，仅仅二三年便“人烟辐辏”[④]，可见屯田的效果异常显著。

参赞大臣锡纶于1878年，将所部“马步十营，分为十屯”[⑤]，到塔城北山边隘和巴尔鲁克山等边境地带，以屯代防。每屯均拨给牛具籽种，屯垦戍边，较好地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不断蚕食。荣全还积极招募关内农民来新耕种。1884年屯田军民收粮1.1万多石，这对孤悬塞外的清军，能保证粮食供应，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布伦托海屯田区

清朝乾嘉时期，阿勒泰有清军数千人屯田，1867年清政府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将因逃避民族仇杀而到此的大批汉族人民，选拔精壮者为兵勇，老弱者垦荒种地，兴修水利。共有“官屯四，民屯一”[⑥]，一面作战自卫，一面屯田生产。并设屯

①《平定陕甘新方略》。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③《平定陕甘新方略》。
④《平定陕甘新方略》。
⑤《平定陕甘新方略》。
⑥《清史稿·食货志》。



田守备一人专理此事。

清军所坚守的巴里坤、哈密、古城子、济木萨、布伦托海、塔城一线，虽然面积不大且很僻远，但它是清军收复新疆的前进基地。屯田生产对于清军的长期坚守和收复新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没有屯田，就不可能有清军及民团在边疆长达10年之久的坚守。哈密办事大臣在向清廷报告中谈到军队和民团之所以能长期坚守，"全赖屯田"供应粮糈[1]。没有新疆军民的屯田，就不可能有中国军民反侵略战争的迅速胜利。



图 55　新疆建省文书

二、第二阶段，屯田的恢复和发展

1876年8月的乌鲁木齐之役，揭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清军每当收复一地，随即招集流亡，修复水利，恢复屯田。

左宗棠进军新疆，遇到一个难题，就是粮饷供应问题。它关系到清军能否长驱进军，克敌制胜，收复新疆。左宗棠进行了周密的筹划，除从关内长途转运部分粮食外，主要靠新疆军民屯田来解决。他分析了经过战乱的新疆"地方凋敝，军粮军食在在艰难"的情况，认为"屯垦诚为第一要务"。在战争期间，屯田"总期多种多收，不能拘以成法"[2]。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古边塞战争，屯田最要。"[3]这时新疆屯田发生了巨大变化。乾嘉时期，清廷是以军屯为主，同时大力发展民屯。光绪年间，在清军收复新疆后，则以民屯为主了。而军屯则日趋衰落，这是和左宗棠的主张有关。

左宗棠认为："要筹军粮，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4]

其次，左氏主张分别兵农。兵专战，农任耕，各司其责。"亘兵农为二，择其精壮有胆之兵，宜马者马，宜步者步，束以营制，一如内地军营。弱不能战者，散之为农，按照

① 《平定陕甘新方略》。
② 《左文襄公全集·批札》。
③ 《左宗棠年谱》。
④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户口，指余荒地亩，令其承垦。"他认为这样的好处是："分别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否则"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①。

其三，有一个左宗棠不便说的深刻原因是：乾嘉时期的八旗兵，绿营经制兵是清廷直接统帅的国家武装力量，而光绪年间的西征军中的湘军、淮军、甘军等都已是兵为将有的武装力量。要他们在远离自己的地域进行屯垦戍边，当然是很难行通了。

民屯

这一时期，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倡导与扶植民屯，因而发展迅速，主要有：

1.招集流亡。西征中，每克一城，立即招集流亡，募民屯田，恢复生产。

1876年，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该年11月，金顺对流亡沙山子一带的农民"谕令归业，以期明春耕种"②，由绥来县安置。1877年4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城之后，"把从南疆阿古柏统治下逃回的三百余名回族农民，给以牛、种，令就达坂城水地耕垦栽植，俾复故业"③。同年6月，刘锦棠、张曜攻克吐鲁番、托克逊后，把逃亡农民"送归乌鲁木齐者二千七八百名口，送归哈密者二千五六百名口，皆给以牛、种赈粮，俾得各安生业"（同前书）。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领土后，清军立即将被强行裹胁随敌西行的农民数十万人，遣回原籍，"发赈给种（籽），并指给地亩"，扶持其恢复生产。金运昌在乌鲁木齐"招练土著（农民）开垦"，黄长周在喀喇沙尔招集逃亡农民"三百余户"屯田等④，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伊犁将军金顺率部进驻伊犁后，面对残垣颓壁，人口只剩十之二三的情况，将不愿迁入俄境的各族群众"暂于广仁、绥定、瞻德、熙春、巴彦岱、固勒扎各城乡地方安插，并给牛具、籽种、地亩，饬令试垦，以期安居乐业"⑤，积极举办屯田，恢复生产。

阿古柏入侵新疆，南疆受害最烈，生产破坏极为严重。新疆收复后，左宗棠、刘锦棠十分重视南疆的善后工作，责令道、府、州、县各级长官兼管"水利、屯田"⑥。为了加强领导，于1878年后，在南疆各地区先后成立善后局，负责善后事宜。善后局招集流亡，修筑河渠，恢复屯田，清丈地亩，修治道路。"南路屯田，皆由各大臣等分委各路善后局查办。"⑦1878年吐鲁番善后局委派道员雷声远和防营提都罗瑞秋负责招集流亡，招募内地农民到吐鲁番开荒种地，修复水利，整修坎儿井，使吐鲁番屯垦较快恢复，当年征粮1.4万石。"粮石租税已逾旧额之半。"⑧

在喀喇沙尔，善后局组织当地人民兴修官渠十道。在城西180里开上户，新开渠一道，长30里。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② 《平定陕甘新方略》。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④ 《左文襄公全集·批札》。
⑤ 《平定陕甘新方略》。
⑥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职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 《平定陕甘新方略》。
⑧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库车"善后局转饬各回目,纠集民佚民匠……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发给食粮,唯所雇民匠,除日给食粮外,仍按日酌发工食银两"[①]。在城南65里,兴修阿柯寺塘渠,还修塞巴里柯渠,长50里,以灌溉农田。阿克苏、乌什的善后局,也积极招集流亡难民,兴水利,垦荒种植,恢复生产。

巴楚由于阿古柏侵略军的破坏,叶尔羌河和喀什噶尔河泛滥,从阿克萨克台到玛拉尔巴什台几百里地区,被水淹没,交通断绝,田园荒芜。刘锦棠派得力官员招集流亡,招募内地农民,安置退伍军人,发给籽种、牛具,恢复屯田。首先堵筑挑浚,将洪水纳入故道,挖渠引水,灌溉农田。在红波戈子庄导源大海,开凿大连、小连、莺拉合齐和老南四渠,共长160里,使大片土地得到灌溉。1886年提督陈建厚率领军民在巴楚修建水库。1890年通判谭传科组织屯民修建了第二座水库。既防止了洪水为害,又保证了农田灌溉。

战后,巴楚除恢复了老垦区外,在城周围又分设了四个屯庄,全用汉名,曰东成、西就、南阡、北陌。这些屯庄,分别分布在巴楚县城的东、西、南、北[②]。

刘锦棠收复南疆后,率军驻守喀什噶尔,他认为:"最为切要之务,莫急于兴水利以除民患,通驿路以便行旅,固城防以资守御。"[③]刘锦棠派汤彦和率领喀什噶尔军民治水,疏渠道,开支河,使龙口桥以上的牌素巴特(今伽师县)、英阿瓦提等渠先后修浚。牌素巴特渠在喀什噶尔城东90里,长120里。刘锦棠"招徕流亡,散发牛籽农具",招募内地汉民,安置退伍军人,使生产"渐有起色"[④]。在疏勒垦区又新建了八大汉屯,分别环列疏勒县(即汉城英先尔)的四周。其中:(1)广济屯,在疏勒城北,克孜勒河南岸,今称色格斯塔什(八磐磨);(2)平广屯,在疏勒县城西;(3)得意屯,在城东;(4)太平城屯,在城东,得意屯之东;(5)安边屯,在城东,太平屯之南;(6)永定屯,在城东南;(7)永丰屯,在永定屯的东面;(8)镇远屯,在城东、永丰屯的东北。这些汉屯也有维、回族群众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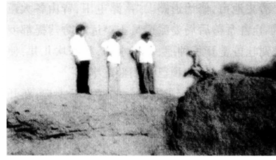


图56 清代屯田遗址新渠城子

董福祥在和田设立善后局,招集流亡,开垦荒地,修复水利,使生产得到初步恢复。1878年和田征粮36 879石,征折色银5 049两。公元1900年和田垦荒45 296亩[⑤]。叶尔羌(今莎车)在善后局组织下,生产逐步恢复。

① 《刘襄勤公奏稿》。
② 《清朝新疆省舆图》。
③ 《刘襄勤公奏稿》。
④ 《刘襄勤公奏稿》。
⑤ 《和田直隶州乡土志》。

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发展民屯，清政府鼓励从关内招募贫苦农民来新屯田。1887年刘锦棠、魏光焘报奏《新疆屯垦章程》，经清廷批准，在全疆大力推行。章程规定："每户给地六十亩，由公中借给籽种粮三石，制办农具银六两，修盖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头合并银二十四两。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按二人为一户，并且给盐菜银一两八钱，口粮面九十斛，自春耕起，按八个月计算，通计每户银粮牵算，约需借给成本银七十三两一钱。定限年初还半，次年全缴。设遇歉收，查明酌减。缴本之后，按亩升科，启征额粮，自第三年始征半，次年全缴。仍仿营田之制，十户派一屯长，如营中什长之制。五十户派一屯正，如营中百长之制。每屯正五名派一委员管理。凡请领成本督察农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责之委员，委员责之屯正，屯正责之屯长。仍十户出具连环保结，互相纠察，层层钤束，以免领本潜逃，耗费旷工及滋事不法诸弊。其屯正、屯长，每人仍领地六十亩，借给成本，一如户民之例。惟每月另给屯正银四两，屯长银二两，仍按八个月计算，俱免扣还，以示奖励。"①在清廷政策鼓励下，农民屯田积极性很高。据1878年10月左宗棠向清廷报告，清军1876年8月到达乌鲁木齐时仅"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现已达3 600余户；昌吉县有400余户；阜康县210户；绥来县850户；精河100余户；库尔喀喇乌苏数十户。虽不及战乱前同治初年的五分之一，但在新疆绝大部分城乡及屯田地区被摧毁的情况下，得到初步恢复，是可喜的一步。

巴里坤原有垦地6万余亩，到1878年报垦约4万亩，1880年已报垦5万数千亩②，已接近原来的耕地面积。此后，甘肃、陕西等地以及直隶、山东的"逃难百姓"来到新疆，"几于盈千累万"③，多安置在镇迪道及伊塔道屯田生产。1887年哈密和北疆的奇台、迪化、昌吉、精河等9县，共招屯户1 090户。据年近80的汉族老人马德云讲：他的祖父就是在光绪年间和许多汉族农民一块从山西来到昌吉县三工进行屯田的。建省以后，从内地迁来的汉、回农民日益增多，屯垦范围不断扩大。

2.裁军为民，发展民屯。

战争结束后，为了节省军费，减少开支，清政府决定大规模裁军。全疆原有官兵6万余人，1886年刘锦棠将部队整编只剩3.1万人。除部分回原籍外，大批裁汰兵勇就地落户，分给土地，参加民屯，以后历经潘效苏、联魁数



图 57　清代民团马桥屯田遗址

① 王树枏等著：《新疆图志·奏议十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③ 瑞洵：《散木居奏稿》。





图58 左宗棠像

次裁撤,新疆驻防兵只有8 780人。这个时期新疆的军屯大量减少,民屯迅速发展。除裁兵节饷是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屯兵生产积极性不高,战争结束后,“屯丁各怀故土之思,暂耕于此,虽任耰锄之役,不期收获之丰”,“只图塞责”。结果,“耗资颇多”,收获无几。在军屯的重点地区乌鲁木齐和伊犁,都有这种现象。乌鲁木齐“旗兵各屯,折抵均无所获”。伊犁防营屯田,“通算迄无利益”。刘锦棠上折建议改变屯田办法,将各旗营勇汰弱留强,所裁兵勇“就各兵驻防之所,如有荒地可拨,为之酌数拨给,即同已业”。并规定“甲年无息取偿,乙岁抵扣,复从其轻,且必乐此不疲”①。仿民屯的办法,将土地分给退伍士兵,向政府缴纳赋税,这对刺激士卒生产的积极性,无疑是有好处的。西征士兵不少留在新疆。仅乌鲁木齐地区就有3 000余名,政府拨给上地60亩,或中地90亩,或下地120亩,其他待遇同新招屯户一样。据《新疆图志》记载:“三个泉子(即今米泉县)皆良田,湘人之从征者,屯聚开垦。省城谷米,半仰给焉。”米泉县的湖南庄子、协标工、陕西工多是西征军的后裔。

刘锦棠和徐占彪率领的湘军、蜀军,一部分留在焉耆屯田生产。所以解放前这里的汉族人,多系湖南和四川省籍。

西征军中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战士,后来也留在新疆。如“旌善五旗”就是由陕西调来的回族团队。古牧地之战,就有这个部队参加。他们英勇善战,一直进军到喀什噶尔,在捣毁阿古柏的最后巢穴后,方解甲归田。现在喀什、沙雅一带,仍有“旌善五旗”的后裔。“湖湘子弟遍天山”的诗句,形象地记述了左宗棠统率的西征军,在新疆平定后,大部分士卒解甲屯田于天山南北的情况。

军队所办的屯田,如果军队开拔,即把土地无偿交给农民耕种。“官军开荒,于军食有裨”,而农民复业,“得免开荒之劳”②。1874年左宗棠指示张曜屯军,“此事定后,地已开荒成熟,仍还之民”③。

3.安插户。

乾隆年间的安插户是被清廷定为“边外为民者”,由官府强行起解赴疆,主要是指“地方豪强大族”、“因地方发案而被株连者”等。此时主要是招抚的起义军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军镇压了青海回民起义,刘同春余部被安置在若

①《刘襄勤公奏稿》。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羌和尉犁一带屯田，仅英气盖一地即达2 000人。

还有一部分是遣犯为民户。

军屯

左宗棠所率西征军边进军边生产。1874年张曜所率嵩武军进到哈密，立即进行屯田生产。金顺等人所率部队，也在巴里坤、古城进行屯田。为了鼓励部队生产，他改变了过去士兵生产的粮食无偿上交的办法，实行由政府作价收购，粮款归种田士兵。他论述这样做的好处是："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事，于正饷外又可得粮价，利一；官省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①]在这一政策鼓励下，驻新各军积极筹买牛具，兴办屯田。迄三台、滋泥泉、九运街、七道湾，凡该军防所，均仿操七耕三之例，躬率士兵耕耨田间。秋收麦粮数千斛，兵食以裕。[②]各驻军"择地屯垦"，"踊跃就屯，禁之不止"[③]，为解决西征军的粮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1874年，左宗棠经过调查，认为在原屯田基础较好的地方购买粮食，比从关内运粮的费用要节省得多。在古城（今奇台）购买一石粮食需3两银子，从河西运粮到奇台，每石运费高达白银57两左右。[④]经查明：巴里坤可购一万多石，古城可采粮五六千石，南山可买七八千石，济木萨可买七八千石，乌鲁木齐北路可购八九千石。[⑤]以济西征军的粮食供应，大大节省了开支。

1882年镇西营防提督徐占彪任巴里坤总兵，他率当地军民在巴里坤、木垒大兴屯田，经勘察，在巴里坤城东南35里兴修大泉干渠，长20里，灌田数千亩。

西征军在反击阿古柏战争中，一面打仗，一面组织部队利用余暇进行屯田生产，"官军讨贼于师行地方，且战且耕"[⑥]。

北疆战役甫经结束，1877~1880年，左宗棠为了以新疆屯粮取代从遥远的关内运粮，决定加强北疆一线振武营（原民团整编）的屯田生产，决定以"玛（纳斯）城西路屯田，责成学功督垦"。"许给农器、籽种、牛只"[⑦]，拨给屯田费用万两，民勇纷纷认垦，连年获得好收成。1878年消灭阿古柏侵略军以后，孔才所率民团仍在济木萨、阜康一带屯田。

1872年，清政府任荣全为伊犁将军，先驻塔尔巴哈台，他认识到边境军民粮食供应的重要，积极组织屯田。

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不堪沙俄压迫，从伊犁逃往塔城，荣全命他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到博尔塔拉组织屯垦戍边。在伊犁的锡伯族数百人，闻讯赶到大营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
②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名宦》，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札》。
④ 《左文襄公在西北》。
⑤ 《左宗棠与新疆》。
⑥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⑦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盘(在今博乐市)参加屯田生产。他们自备种子,牛马耕具,开荒种地,兴修水利,还修建了长达50多里的喀尔博户大渠。还有部分锡伯族人,荣全安置在车排子屯田(乌苏县境)。

1882年清军收复伊犁后,伊犁将军金顺恢复了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等五营制。同年10月清政府命在塔城屯垦的索伦营军民于1883年初调回伊犁原营地屯守,命在塔城的锡伯营官兵除留131人在塔城驻守外,其余全部撤回伊犁,驻霍尔果斯河东地区防守。在博尔塔拉的军民,也奉命撤到伊犁原营地屯守。

流散在各地的原伊犁满族军民,也陆续返回伊犁,金顺分给他们土地,进行屯田,到1885年,伊犁五营八旗官兵共有7 000人。据《清史稿·兵志一》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行省制成。伊犁旗营实存勇七千。留其精壮,改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以提督、总兵分领之,伊犁开屯由此始,而旗屯居其一角"。

1891年,伊犁旗屯耕地六万多亩,1895年伊犁将军长庚,以减兵增饷之法,改设练军八旗,轮换派遣"满营二旗240名官兵,到老满营地特古斯塔柳(今特克斯县)屯田,种地4 800亩,后来全部改为携眷屯垦,不再更换,永为世业,逐渐成为当地的居民"[①]。他们对开发特克斯河流域作出了贡献。

刘锦棠还把流散各地的八旗官兵组织起来,原巴里坤满营官兵近800名,收集流散各地的近300名。乌鲁木齐都统和属下的各领队大臣裁撤,也有不少官兵。1887年旗营迁于古城,官兵共1 040人,按六旗分设,为了解决军粮,刘锦棠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向清政府建议:"……吉布库地亩,现已归绿营耕种。其头、二、三等屯向为绿营屯地,自遭变乱,地亩尽荒。光绪三年(1877年)经前陕甘总督臣左宗棠招集流亡,给资承垦。迄今陆续增添,已安插百数十户,共男妇一千数百口。耕稼婚娶,渐成土著……古城东湾、中渠,地属上中,接引山水浇灌,得地一万余亩。如归各满营耕种不敷,由附近之大坂河、西岔拨给。查大坂河约有地三四千亩,西岔约有地四五千亩,各该处曾有户民垦种,为数甚少,迁移较易。毋庸将头、二、三屯地拨归满营,如此办理,似民兵两便。"[②]这样,在古城的东湾、中渠、大坂河、西岔一带,拨地"二万余亩"[③],以屯田生产,自耕自食。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新疆尤为重要。为了尽快恢复屯田生产,左宗棠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修复。他在1878年给刘锦棠的信中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④]清军师行所至,相度形势,大兴屯田。战事余暇,即令士卒开渠引水,从事耕种,以济军食,且积极助民治水。吐鲁番经过战乱,渠道和坎儿井大部淤废。防营提督罗瑞秋等率部修复渠道外,并和群众一起,疏浚坎儿井180多

① 《伊犁将军马广奏议》。
②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③ 王树枏等著:《新疆图志·奏议十五》,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④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处。在迪化整修了永丰、太平二渠。“安宁渠为安宁、三十五户各渠源总汇之处，承平时灌田160余户。兵燹后渠道就湮。……光绪十四年(1888年)署知县陈希洛复议兴修……于是旧日芜莱，顿成腴壤矣。”[1]绥来、奇台、昌吉、呼图壁等地都大力整修渠道，或由驻防军整修，或“官借银两督饬户民修理”[2]，以引水屯田耕种。1882年，迪化城西南的公胜渠被山洪冲垮，提督金运昌率军抢修，加筑堤坝，堵住了决口，重新修好了渠道。

库尔勒的渠道破坏极为严重，防营都司邹文炳率部修复官民二渠。库尔楚河道长40里，库车之阿柯寺塘渠长10里，都是清军组织农民修复的。

叶尔羌河溃决泛滥，由巴楚径达乌兰乌苏，数百里间，田庐湮没，城堡倾颓。巴楚为南疆要地，竟为泽国。刘锦棠收复南疆后，令余虎恩率营勇益以民夫，“堵筑决口，挑挖沙洲，并将老岸及长堤加高加厚”[3]，河复故道后，复整修引水渠道，招集流民，赈给种子牛具，恢复生产。

玛喇尔巴什人民，还利用当地湖泊，筑坝贮水，以灌溉农田。

1886年署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奏言：“查伊犁河北，渠道纵横，全资阿齐乌苏大渠之水灌输，大渠绵延三百余里……现在堙废之处，长短牵算百二十里之遥。……自宁远城西经熙春、惠宁各城，或堙没已久，或坍废过甚。……派护理巴彦岱领队大臣德克津布等督率营勇逐段疏浚。”[4]

1887年(光绪十三年)，户部奏略称：“现在营勇，新疆尚有四万余人，不裁则终年无战事，遽裁又恐疏虞，长此不已，坐耗资粮，其患安所废止?唯有于新疆南北两路急为大兴屯田，为当今紧要切务。借人以尽地利，即借地以养人。是有五利焉：新疆军粮，向由内地运至哈密，分运各城，或于各城采买运军局分运各处。山谷阻深，道路辽远，核计运脚，所费不赀。若兴屯政，就地收耕获之利，内地无转输之劳，其利一。各路请饷太多，垫款难按期拨解。若兴屯政，口粮无忧缺乏，且该处所收粮食即可画抵该处饷需，每年当节省银数十万两，足以纾饷力，固军心，其利二。新疆现收民粮每年约有三千余万石，[5]皆以供支各营扣抵兵饷。若兴屯政，寓农于兵，所收民粮，即可改征折色，用备度支，其利三。兵燹之后，户鲜蓄藏。若兴屯政，数年之内，必有余资。粮价因之而平，边储亦因之而实，其利四。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各军无事坐食，筋骨懈弛，窃恐师老财殚，缓急俱不足恃。若兴屯政，劳其筋骨，将来驱赴战场，必更健勇，其利五。……新疆地广，北路……地皆肥润，南路八城，素称饶沃，各营驻扎处所，即不能一律，大抵可耕之地居多，不难择地开垦。……相应请旨饬下新疆各路统兵大臣速议章程，克期一律兴办屯政，并

① 王树枏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③ 《刘襄勤公奏稿》。
④ 《平定陕甘新方略》。
⑤ 三千余万石，疑是三十余万石之误，据《中国经营西域史》资料，建省初年征粮203 029石，宣统三年(1911年)为302 407石。



需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嗣后该管营官，以本营收获之多寡为殿最，各统兵大臣即以各营收获之多寡为殿最。"①

自此，进一步加强了屯政的领导，促进了驻疆四万余名兵勇屯田的发展。西征军的官兵，不仅对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对恢复生产，开发建设新疆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遣屯的演变

清军收复新疆后，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湘军将领刘锦棠被命为新疆首届巡抚。此后，新疆的遣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1886年，陕西、甘肃、山西、四川、直隶（现河北）、山东、河南七省的1 500名犯人解赴新疆，这是新疆建省后的首批犯人。巡抚刘锦棠分别将他们安置在镇迪道所属县区垦荒种地，"迪化县安插三百六户，奇台县安插一百户，昌吉县安插一百四户，阜康县安插五十三户，绥来县安插三百二十户，济木萨县安插六十六户，呼图壁巡检安插七十四户，哈密通判安插四十五户，精河巡检安插二十二户，总计安插土客一千九十户"②。刘锦棠分析了过去在新疆遣屯的利弊，根据新疆的形势，提出应把这批犯人以"助垦人犯"对待，不应再看成是"实犯外遣"③。乾隆时期犯人屯垦，是在屯兵监督下强制劳动，每个犯人拨地12亩，每年交粮6石，由政府拨给种子牛具，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都很低，积极性不高。刘锦棠不顾刑部的反对，坚持按照《新疆屯垦章程》中的规定，把遣屯和民屯一样进行安置。他认为"非照民屯难收成效"④。刘锦棠命令"俟各犯到配，择其年力精壮，有家室者，由地方官酌量多少，随处安插，交乡约领保，分拨荒地，与平民栉户错壤，犬牙相接，出入守望，同兹休息……其只身人犯及不能种地之人，即交配所衙门役使，或配令小贸，届时察看办理，俾兹钤束。农具、牛、籽、房屋、粮食等项，应请照新疆垦地民户例，从优借给，分年缴还"⑤。和民屯一样进行安置，大大刺激了人犯屯田的积极性。并要求各地解押犯人时，把家眷一块送新疆。请求政府"凡发遣新疆人犯，有家室者，务必佥同起解"⑥。事实证明，效果甚佳。"有家之犯，悉安耕作。"还规定："原犯为奴罪名，定期五年；原犯当差罪名，定期三年，果能安分出力，即编入本地名册，给地耕种纳粮。"⑦公元1887年奏准："概照新疆现办民屯章程办理，均于钱粮全完之年，即准人籍为民。"不仅大大缩短了人犯为民的期限，而且还准刑重的为奴遣犯，也可以通过屯田生产而为民，大大鼓励了人犯屯田生产、争取早日为民的积极性。现在位于昌吉县的军户农场，有李家庄、毛家庄、冶家村诸村落，这

① 《清朝文献通考》。
②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奏议》，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 《刘襄勤公奏稿》。
④ 《刘襄勤公奏稿》。
⑤ 《刘襄勤公奏稿》。
⑥ 《刘襄勤公奏稿》。
⑦ 《刘襄勤公奏稿》。

些村落中的马、张、李、苏等姓中的回族老户,以及汉族万、赵、王、李、金、魏等姓氏中的老户,都是从甘肃、宁夏来的"屯犯后裔"。

乾嘉时期发遣新疆的罪犯,或屯田,或为奴,均是依附于军屯,在绿营官兵管辖下,强制性的"督课取力"。现在则完全按照民屯办法:"十户举一屯长,五十户派一屯正,每屯正五名,复派一委员管理。"对遣犯不再实行劳役租制,在政府帮助下进行屯田,立业自给,从第三年起承担国家粮赋,成为自耕农。遣屯由依附于军屯演变为民屯了。

遣屯演变的原因有二:一是军屯衰落,乾嘉时期的军屯遭到彻底破坏,同治朝爆发的反清起义,屯兵或逃亡或被杀,"土地荒芜,旧制荡然无存"[①]。且新疆收复伊始,"诸务创始,提臣移防未定,抚标兵制未设,兵屯考察刻难就绪"[②]。加之,此时的西征军与清廷直接掌握下的八旗、绿营制兵大不相同,湘、淮、甘军都已是兵属将有的地方武装势力,要他们远在塞外长期屯田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战争一结束,部队就出现了"各怀故土之思,暂耕于此,不期收获之丰"[③]。结果往往是"收获无几",军屯逐渐衰落下来。其次,"非业民屯,难收成效"[④],罪犯在绿营兵丁强制下进行生产,积极性不高,往往发生逃亡、反抗,甚至暴动。而按民屯进行管理,罪犯屯田生产的积极性较高,效果甚佳,"悉安耕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三、第三阶段,以节饷为目的的屯田时期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大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除割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与日外,还赔款白银二千万两。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西逃。次年订立《辛丑条约》。此约除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款外,还规定中国向侵略者赔款白银400 005 000两,分39年还清,年利4厘,本息折合900 008 000多两。连同《马关条约》的赔款,每个中国人平均负担白银近3两。再加上其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割地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濒于破产的边缘。清政府一面加紧对人民的盘剥压榨,一面紧缩开支。财政危机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新疆。新疆财政本不能自给,每年靠各省"协饷"白银240万两左右过日子。[⑤]各省为了支付巨额赔款,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新疆。由于"协饷"断绝,欠发官兵的俸饷越来越多。怎么办?裁军吗?新疆巡抚陶模在给清政府的报告中说:"新疆幅员辽阔,额定旗绿兵丁共三万一千名,实不为多。伊犁与塔尔巴哈台三面邻俄,南路

① 《清代西北屯田研究》。
② 《刘襄勤公奏稿》。
③ 《刘襄勤公奏稿》。
④ 《刘襄勤公奏稿》。
⑤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统计数字为三百数十万两,新疆地方志总编室,1988年印。



各城在当冲,碍难淘汰。"①在裁军无望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开支,渡过难关,潘效苏提出了"以屯牧养之"的方案,在向清廷所奏《请遣散客勇改练土著世袭兵摺》中提出:"本省无源可开,不能自立,亦当少糜帑项,共济时艰。查北路草山甚多,均极丰茂,荒地亦复不少。南路亦有草湖官地。若将内地客勇徐为遣散,改练土著之兵,以官带兵,以兵带勇,仍与客军营制无殊,即以屯牧养之。毋庸另筹饷项,实为筹边上策。办理之法:择户民三丁以上者,拨给上地十亩,免其租赋。并给孳生牛马各二十五只,羊五十只,共计百只。令其家属自行耕牧。数口之家,足资养赡。内挑壮丁一人入伍充兵,即不发给口粮银两。定以十年为期,大约自二十内外入伍,三十内外出伍。又择其子弟中之年力精壮者接换充当,名之曰世袭兵。"②由于政府一时拿不出这样多的牲畜,就先给士兵一部分,另由政府补贴少量盐菜银维持生活。五六年以后,士兵完全自立,公家不再补贴。潘效苏说:"穷则思变,其法无逾此者。"认为这是一个筹边上策。这是寓兵于农,屯田戍边的另一种形式。

这一阶段新疆财政困难,每况愈下,各项措施,步履维艰,但屯田事业仍在坚持和发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饶应祺向清廷报告关内农民踊跃来疆的情况时写道:"关内汉、回携眷前来就食、承垦、经商者,络绎不绝。"特别是"回民扶老携幼,不远千里,接续自来",在新疆各城乡,"随地谋食者"竟达"数万人。尚有许多农民,源源前来"。据哈密营卡所报,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络绎不绝于途。③

对于来新的农民,清政府积极组织屯田,兴办民屯。"酌拨荒地,责成开垦,暂缓升科。第应筹牛具、种子等费"。虽然财政异常困难,还尽量从每年"所拨善后款内,酌量匀给。饬令各厅、州、县,尽心筹办,妥为安置"④。可见对民屯的重视。米泉县的红雁湖,就是从青海大通县红丫峪村来的十多户回族农民,为了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就把他们的屯田点命名为红雁湖(谐音)。经过数代人辛勤经营,现在已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了。

1896年清政府在罗布淖尔(包括今尉犁和若羌县)设抚辑招徕局,先后"招业农缠回(维族)共一千二百户"进行屯田。⑤接着在卡克里克(今若羌县)设屯防局。1896年西宁回民刘同春起义失败,失败的起义者数千被徙于罗布淖尔(今尉犁县)、卡克里克(今若羌)。仅英气盖(今尉犁县南)一地,即达2 000多人⑥,清政府也组织这批农民,组织屯田耕种,发展生产自给自足。

为了发展生产,各州、县大兴水利。"阿克苏道江遇璞、知府刘嘉德设法开通渠沟,招民屯垦,业已水利畅行,足荫数十万亩"⑦。

① 《陶勤肃公奏议遗稿》。
② 王树枬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 王树枬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④ 王树枬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⑤ 王树枬等著:《新疆图志》卷103。
⑥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⑦ 王树枬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1900年巡抚饶应祺向清廷报告中谈到南疆发展屯田的情况时说："莎车直隶州，地广而腴，近年新垦三十余万亩。"

据《新疆图志》和《中国经营西域史》的资料，新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报升科地亩共10 126 371亩，到1911年（宣统二年），全疆实种地面积已增加到16 330 251亩，增长60%，特别是北疆迪化、奇台、济木萨、阜康、昌吉、呼图壁、绥来等七县区，1905年报升科地亩为788 529亩，到1911年实种地亩为1 670 228亩，增长一倍以上。伊犁的绥定县，也由23万亩增长到46万亩。

清代后期，由于大兴屯田，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新疆图志》记述："本期盖扩张屯垦之政，以赡军食，中兴以来，改设郡县，改变屯田旧法，垦地至一千余万亩。"大大超过了乾嘉时期的规模，可以看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快的。

由于屯田的发展，出现了"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屡丰"的繁荣景象。在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新疆能在大乱之后有这样一个好的形势，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但屯田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第四节　清代新疆屯垦的探讨

一、在边疆危急之秋所显示的特殊作用

在英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匪徒和沙俄强占了新疆大片土地的情况下，清军退守在东部和北部一线。时中原动乱，关内粮饷供应长期中断，清军处境异常困难。如果不实行屯田来满足粮草需求，清军是不可能坚持长达十年之久的。应该说：屯田保证了军民的长期坚守。

左宗棠统军在荒凉的塞外，长驱千里西征，最大困难是粮饷供应。他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事，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除从关内运进一部分粮食外，主要的就是从清军坚守的屯田地区筹粮，同时边作战，边屯田，比较好地解决了西征军的粮饷供应。可以认为：屯田保证了西征军的胜利进军。同时屯田对新疆经济的迅速恢复，也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清末，朝政腐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在新疆，一再挫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巩固了西北边防，且为现代新疆的规模和疆界奠定了基础。屯垦戍边实边，是发挥了其特殊作用的。清代后期屯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影响却很深远。



二、组织管理

有清一代新疆屯田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开始,直到清末,长达190余年,先后有军屯、民屯、回屯、旗屯和遣屯。其组织管理日趋完善。

(一)军屯

主要是指绿营兵丁的屯田。其管理系统有:

1)伊犁将军。他既是清代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也是新疆屯田的最高长官,总理军屯、民屯一切事务。如松筠、布彦泰等,都是在新疆创导、组织屯田卓有成效的伊犁将军。

2)屯田大臣。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起,平定准部的西征军于巴里坤、哈密开始屯田,议政王大臣会议具奏:"图呼鲁克、杜尔博尔金、哈喇乌苏等处耕种之事,派大臣一员管理。"得旨:"著副都统苏尔德前往管理。"[①]这是新疆最早的屯田大臣。各屯区设屯田大臣,或称屯田大员,管理屯务。从各提、镇抽调的绿营屯田兵丁,在屯田期间受其管理。担任过屯田大臣的还有总督鄂海,按察使永泰在吐鲁番负责屯田。原任"江西巡抚王企靖回籍,以正红旗蒙古副都统雅图总理巴尔库尔屯田事务"[②]。还有苏永祖、副都统克什图、西安巡抚永贵,以及书山等均任过这一职务。屯田大臣一职非定制,而是根据需要,择员委任。总理屯田事务,如开垦地亩,分授种子、农具、耕畜、农事,收缴屯粮等,都由其负专责。在新疆,不论战时、平时,屯田纳粮至关重要。因此,屯田大臣多择干练者充任。

3)总理屯田提督、屯镇总兵。乾隆弘历统一新疆后,设提督一人,专管绿营官兵的驻防和屯田事务。"新疆提督一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移安西提督驻巴里坤,更名巴里坤提督。二十三年(应是二十九年),徙乌鲁木齐。光绪十一年(1885年)徙喀什噶尔,更名喀什噶尔提督。""提督,军务总兵管、从一品。掌巩护疆陲,典领甲卒,节制镇、协、营凡,课第殿最,以听于总督。"[③]

乾嘉时期,新疆绿营士卒屯田分为两类:一类是轮换兵屯田。在塔尔巴哈台、乌什、阿克苏、哈喇沙尔、吐鲁番以及科布多等屯垦区的绿营屯田兵丁,系从陕、甘、晋三省提镇标营中抽调。屯田3~5年期间,由当地屯田大臣统辖。[④]屯田结束,即返原提、镇标营归伍。

一类是长期驻疆屯田,其中包括携眷兵屯田。全疆分属两个系统,即由乌鲁木齐提督和伊犁镇总兵分别统辖。

乌鲁木齐提督移驻迪化后,统辖巴里坤镇总兵暨本标中、左、右,守城四营,巩宁城守营、哈密协、玛纳斯协、库尔喀喇乌苏营、晶河营、喀喇巴尔噶逊营、济木

---

① 《清圣祖实录》。
② 《清世宗实录》。
③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官职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塔尔巴哈台事宜》、《清高宗实录》。

萨营等处弁兵操防,总理屯田、马政、台站事务。[1]

在管理屯田事务中,乌鲁木齐提督和屯田大臣的关系是:"乌鲁木齐提标四营(惟屯田差遣并兵丁搬眷请领盘费银两由驻扎大臣经管,其余升迁事故俱由提督自行办理),提督一员。乾隆二十七年原设副将一员,管理左、右二营屯田等事,属驻扎大臣管辖。……三十八年奉旨俞金鳌补授乌鲁木齐提督,专办屯田,自此提督专管绿营屯田事务。"[2]

督之下设有总兵(正二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经制外委(正九品),等级森严,上下相制。其营制: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所属称标;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守备、都司所属称作营。乌鲁木齐的绿营官兵,除一部分差操守备外,主要任务是屯田。乾隆四十二年有中营九屯,屯兵1 066名,以参将督领。左营八屯,屯兵1 066名,以游击督领。右营七屯,屯兵1 066名,以都司督领。此外尚有济木萨、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晶河、库尔喀喇乌苏是乾隆二十七年数)、巴里坤、哈密、古城、木垒等屯区28个,屯兵4 615人,分别以参将、游击、都司、把总督领。

伊犁镇总兵又称屯镇总兵。其任务是专理屯田。

伊犁紧邻沙俄,是清军边防要塞,屯兵重地。全疆满洲八旗驻防军1.8万余人,驻屯伊犁的达1.3万余名,八旗兵的粮糈供应,主要靠兵丁屯田解决。伊犁镇标专为供给当地驻防八旗官兵的粮饷而设。《新疆图志》卷24记述:"伊犁镇标,屯镇总兵一员,归伊犁将军管辖。"该镇的绿营部队有"兵丁三千名,设立二十五屯,每屯额兵一百名,计兵二千五百名,其余五百名,系于水碾磨、铅厂、教种图尔扈特以及仓廒、牧厂各差拨用"[3]。从上可以看出,3 000名绿营士兵,主要是进行屯田,以及粮油加工、后勤供应有关的事务。故该镇官兵直接由伊犁将军节制,"遇有升拨降黜之事,皆由镇员禀白将军验核,仍于陕甘督臣咨办"[4]。伊犁绿营兵屯田,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不受乌鲁木齐提督节制。

4)屯。屯亦称工,是兵农合一的组织,是绿营兵丁屯田生产的基层组织单位。

绿营兵制的基本战斗组织是营,携眷屯兵也以营为基本组织,为了适应屯田戍边的需要,营下设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请在巴里坤筑屯屯田时称:"各营屯田,亦俱在军营以东,联络不远,现在播种,共拨兵丁五千余名,每于分屯之处已筑土堡一座,旦则出作,夜则入息,无事可耕,有事可战,且与各厂牧放官兵相为表里,牲畜田禾俱可防护无虞。"[5]在屯田区筑有屯堡,屯田兵丁居于屯堡之内,耕

① 《三州辑略·官制》。
② 《乌鲁木齐政略·武职》。
③ 《伊江汇览·兵额营伍》。
④ 《伊江汇览·兵额营伍》。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蒙古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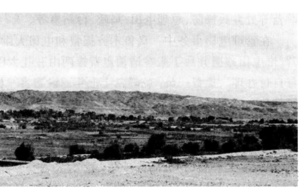


图 59　清代额尔齐斯河锡伯渡

作区即在屯堡周围，白天出堡耕作，晚上回堡休息，有警则依堡拒敌，无事屯田生产，平战结合。一屯兵丁，大体百人左右，依各地情况的不同，最大的屯有250名，最小的是阿克苏仅有屯兵15名。如乌鲁木齐中营区分为九屯，设屯兵1 066名，种地2.2万余亩。各屯分布是：辑怀城、土墩子、怀义堡、屡丰堡、宣仁堡、惠徕堡各驻屯卒133名，阜康城88名，头道湾头工90名，头道湾二工90名。

屯堡有屯官衙署，士卒宿舍、家属宿舍、兵器库、农具库、仓廪等建筑。如乌鲁木齐屯区惠徕堡的情况是："惠徕堡，乾隆四十二年建筑，周一里六分，高一丈二尺，堡门四……千总衙署一所，外委住房二所，仓房一所，军器库一所，公馆一所，堆房二所，兵丁住房四百四间。"[①]这些屯堡，以后逐渐发展为村镇。如现在乌鲁木齐和昌吉的头工、二工、三工、四工、下四工、五工、六工、二六工、宣仁墩……都还保留着清代屯田的屯名。

（二）旗屯

伊犁旗屯的屯官，由各镇营的军官兼任。新旧满营各分左右两翼，每翼设协领一员领之；锡、索、察、厄四营，每营设一领队大臣以统之。其下各设总管、副总管驻本营。再下设八旗，设有佐领、防御、骁骑校尉等军官，管理本旗戍守和屯田事务。如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察布查尔屯田，兴修水利，就是由锡伯营总管图伯特领导和组织军民实施的。

（三）遣屯

遣屯隶属于军屯，遣犯被编入军屯组织中进行劳动。一种是罪行情节重者，拨给兵丁为奴，受屯兵管辖，由该屯兵"督课取力"[②]。另一种是罪行较轻的，承种份地，单独纳粮，分散在各军屯中进行屯田。如乌鲁木齐左营中：

头工屯兵148名，遣犯3名。

二工屯兵148名，遣犯3名。

三工屯兵148名，遣犯3名。

四工屯兵148名，遣犯2名。

甘标头屯屯兵90名。

①《三州辑略·建置门》。

②《清高宗实录》。

甘标二屯屯兵90名。

宝昌堡屯兵147名，遣犯2名。

乐昌堡屯兵147名，遣犯3名。[①]

（四）民屯

民屯属地方行政机关管理。清代前期陕甘总督和甘肃布政使，直接管辖天山北麓晶河以东的民屯事务。所辖镇西府，管辖宜禾（今巴里坤）、奇台两县的民屯。迪化直隶州管辖乌鲁木齐地区、阜康（包括济木萨）、绥来（今玛纳斯）、昌吉（包括呼图壁）三县的民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乌鲁木齐设同知，命在乌鲁木齐屯田。”吐鲁番巡检，管理当地的民屯。

屯民实行里甲制，乾隆三十一年制定的《木垒安户章程》规定：“新安户口，宜编立里甲，请按每年招徕户民，编为一里，一里之中，分为十甲，将来户口丁粮册籍，悉照里顺庄开造。至编造里甲，约可按三千户之数，编为十里，酌定里名，以分界限。”“每里应选里长、渠长、保约。请按每里设里长一名，每百户设渠长一名。”“现在咨送二百户移驻，尚属无多，仍照原例，令守备暂受外，至戊子年（1768年）三百户之时，酌设文员，专管户民。”“现在守备暂管户民，审理狱讼，应酌立科条。”[②]以上《章程》可知，民屯实行里甲制，每里300户，每甲30户。设里之前，由部队派守备管理，不仅管屯田生产事务，而且审理狱讼民事工作。待招至三百户，成立里，选出里长之后，正式派文官，专管民屯。有的地方实行卫所制。《清史稿·食货志一》载：“令叶尔羌成丁余回，特界耕地编户，凡千五百户为一所，三千户为一卫。”

（五）回屯

伊犁回屯实行伯克制管理。清廷统一新疆后，沿袭维吾尔人旧制，即伯克管理制。伊犁回屯亦用此制。

伯克不得世袭，由清廷任命，从“回人中从戎效力，及输诚内附者，量材以授”[③]。

首任伊犁回屯阿奇木伯克是吐鲁番额敏和卓次子茂萨。以后历任阿奇木伯克皆从其子孙中选调。《西陲总统事略》卷七十回屯载：“（茂萨）于乾隆二十五年授伊犁阿奇木伯克……三十一年额敏和卓三子鄂罗木杂布赴伊犁……三品阿奇木伯克……嘉庆十年鄂罗木杂布卒……以其子密里克杂布袭一等台吉，署阿奇木伯克事务。”

阿奇木伯克，三品，下设阿奇木伯克衙署。驻宁远城，总理回屯一切事务，设伊什罕伯克一员，协助阿奇木伯克总理回屯事务。以下设噶杂纳奇伯克、商伯克等共85员，分管地亩粮赋、税务、刑名、水利、治安、工商等事务，其品级为四至七品。

伊犁回屯共6 000余户，分九屯。每百户设一玉子伯克统领，每15员玉子伯克设一明伯克统领，“分领回众头目，职如千总”。

---

① 《乌鲁木齐政略》。
② 《清高宗实录》。
③ 《西域图志》。



第五节 清代陕甘宁青屯垦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成千上万的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庐舍成墟，四处逃散。田园荒芜，生产下降。“田亩之荒者，十有一二，军民之存活者，十无一二。”①“庐舍已空，有土无人。”②

清廷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如何解决?诸大臣纷纷献策。给事中刘余谟于顺治九年奏言：“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即使天时无惊，正供不亏，西军食已急，民力已竭……舍屯田而外，别无奇策也。”③康熙五年肖震奏：“驻一郡之兵，即耕其地……养兵之费既省，荒田亦可渐辟。”④康熙七年徐旭龄上书：“臣查各省饥荒，而陕西尤甚，西北地广人稀，耕种最难，唯有集流民而耕屯田，为第一大计。”⑤

清廷决定：兴屯田。“凡州县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如力不能垦，官给牛具籽种，或量假屯资。”⑥决定“改编凉州戍军为屯军，免除军名，令种屯地”⑦。并将甘肃明代藩王土地改归民户经营。至是军屯民屯逐渐兴起，西北尤重。清代边患，当清军大败噶尔丹之后，主要以游牧为生的北方准噶尔部，西边的阿睦尔撒纳、策妄阿拉布坦先后崛起。清代边防重点，便向西移了。据此清廷加强西北边防建设，特别是河西走廊就成为重点。

一、兴办军屯

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进犯哈密，“侵略五寨”。康熙决定派大军征讨。右卫将军费扬古任北路军统帅，在行进中考虑如何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决定在喀尔喀蒙古西部科布多、乌兰图木等地屯田。

在北路兵屯的同时，清廷在嘉峪关以西兴办了西路兵屯，即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安西四大屯区。

巴里坤屯区：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设大营于巴里坤，派500名绿营兵专事耕种⑧，满汉官兵共立23营，周围200余里，首尾相应。⑨屯田面积7万亩。

吐鲁番屯区：康熙五十四年(1715)，将军席柱在进军中提出：“吐鲁番与哈密接壤，且系策妄阿拉布坦咽喉要地，不可不先取。”六十一年(1722)正月，调绿营

① 《甘州通志稿》卷40。
② 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34。
③ 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34。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10。
⑤ 《徐清献奏疏》。
⑥ 《大清会典事例》卷141。
⑦ 《甘宁青史略·正编》。
⑧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
⑨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五年九月。

兵五千名赴吐鲁番"筑城、种地、驻防"[①]。雍正三年(1725)春,清廷令:"将种地兵一千名,暂留彼处。"[②]

哈密屯区:分塔勒纳沁和蔡八湖两地。雍正二年(1724)收屯粮1 700余石。[③]

安西屯田:即今安西敦煌地区。清初,这里是青海和硕特蒙古左翼牧地。康熙五十四年(1715),西路大军进驻巴里坤,安西成为大军后方和转输通道。雍正二年(1724),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准在布隆吉尔设立总兵,统辖五千携眷兵镇守。当时"安西屯垦未备,兵丁家口乏食,令将驻防兵之不愿久住者,招募顶换,择水土宜苗稼之处给之,使之屯垦,俟资粮渐裕之后搬移家口,永远驻防"[④]。雍正十三年(1735)因安西民屯衰落,清廷令:"各卫所官屯地亩应全交安西镇标营兵丁承领屯种,为伊等恒产,即以收获籽粒供应兵丁口粮,如尚不敷,照例折给银两。"[⑤]据《重修肃州新志》载:实给兵丁地亩1 685石4斗,以亩下一斗籽种计,有地16 854亩。安西兵屯制度与其他屯区不同,实行分成纳粮制。


图60 安西桥湾城

"屯"是兵农合一的组织。为屯田基层单位。一般一屯100人左右(有的可大些,也有的人数少一些,依客观条件而定)。都住在"屯堡"内。屯堡中有兵房、库房(放武器),粮仓、衙署、公馆等。无警出人耕作,有警击敌。屯之上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管理屯务。屯由千总、把总、经济外委等下级军官管理。

每屯兵百名,由官方拨给马20匹、牛60只或每屯兵给一马或一牛。

"开国之初,每佐领拨十名壮丁,四头牛,于旷土屯田"[⑥],佐领率兵300名,10名壮丁可种地三四百亩,收粮千石上下。但八旗兵鄙视劳动,不愿参加屯田,故屯田多由绿营兵担任。清王朝实行"计亩抵饷"的办法[⑦],并实行奖惩制:"种地兵丁收粮分数总管算所管地亩,八分以上议叙,四分以下议处。"[⑧]以鼓励生产积极性。

① 《清圣祖实录》六十一年正月。
② 《清世宗实录》雍正三年五月。
③ 《清世宗实录》雍正二年九月。
④ 《清朝文献通考·屯田》卷10。
⑤ 《清世宗实录》卷157。
⑥ 《清朝文献通考》卷16。
⑦ 《畿辅通志》卷20。
⑧ 《大清会典事例》卷151。



康熙十年(1671),清廷下令再订《劝垦章程》规定:贡监生员组织垦荒20顷以上的授予县丞、百总之官;垦荒1000顷以上的授予知县、守备之官。云南总督赵廷臣,督垦了6000顷以上,即被加了一级,调京升为尚书,加封少保。清廷并规定:荒地只要百姓开垦了,原主不得再要,政府发给垦荒者印信,永为己业。[①]

余丁屯田:余丁即编外余额兵丁。清政府对八旗采取以"国力豢养"的政策。旗兵子弟长大成丁后,在军内给养的叫"余丁"。只领银饷,不给口粮,在军费开支上是一个负担。所以清政府号召他们参加屯田生产。雍正元年,平定青海叛乱之后,在西宁布隆吉尔清军驻地附近赤金卫、柳沟等处,由各营派出余丁垦种荒地。开始时由政府供给籽种、耕牛和口粮。三年以后停止供给。垦田为耕者所有。每丁向国家交粮三石作为兵饷[②]。由于旗丁不愿劳动,效果不佳。

雍正十三年(1735)因安西镇标粮饷不敷,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准:"将各卫所民屯地亩交付镇标营兵丁承领屯种。"[③]甘肃巡抚元展成奏疏中提到:"安西镇属下之卜隆吉、柳沟、双塔、赤金、靖逆、惠回等处屯田,向拨屯兵耕种,秋收,除农具、籽种外,粮石平分,给作口粮,统于原估折粮饷内扣除。"[④]因效益不佳,乾隆四年(1739)清廷下令:"以庚申年(乾隆五年)为始,招募民人及兵丁子弟承种,将原派屯兵撤回差操,以实营伍。"[⑤]

安西遣屯:雍正初年开始将直隶等五省遣犯佥妻发配该地。乾隆二十三年,刘宗魏奏准将遣犯至安西之瓜州屯垦。"交驻防将军等管辖。"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明德奏云:"(安西)遣犯甚多,难以安顿",请"改发乌鲁木齐等处屯所"[⑥]。二十八年(1763),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岑地方有吴姓大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悛",清廷将其起递解,"其第三起六户交安西府属渊泉县收管"[⑦]。

清代刑律分笞、杖、徙、流、死五等是为正律。"遣罪则发于边外极苦之地"[⑧],如黑龙江、河西西部、新疆等处。

清王朝在各次"平定"之后,随即留一部军队就地屯田。一方面节省国家开支,同时也可开拓边疆,保卫国防。有敌则战,无警生产。从康熙末至乾隆初,在宁夏的插汉拖辉地区,甘肃的安西和肃州北部地区,以及南部巩昌地区,青海布隆吉尔地区等,在军屯及民屯建设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成绩。

据雍正二年(1724)统计,各省屯田共39.4万余顷。甘肃巩昌、甘州等处屯田99 900顷。陕西屯田48 000余顷。山西屯田64 700余顷。三省合计212 000余顷,

① 《清朝史话》77页。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51。
③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三年一月乙丑。
④ 《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年五月。
⑤ 《敦煌随笔》下卷,《屯田》。
⑥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六年四月。
⑦ 《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丁巳。
⑧ 《清朝文献通考》卷250。

占全国屯田54%，历史证明，西北屯田成绩是很大的。如果再把宁夏、青海、新疆三地屯田数字加上，这个比例一定会更高。[①]

二、民屯

王希隆先生认为："清代西北屯田是在清廷对准噶尔部用兵过程中兴起的。"因此，"清代西北民屯主要实施于河西和新疆地区"。一句话讲清了西北民屯的特点与平准战争的关系。因为和平定准噶尔部战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除新疆外，屯田重点在河西地区。河西地区民屯，兴办于雍正十年（1732），这时准噶尔部正处于全盛时期，不断向清王朝边境的清军和州县发动攻击。清廷决定进行反击，派名将率北、西两路大军进驻出击基地，西路大军三十二个营进驻巴里坤，这样河西就成了西路大军的战略后方，"军需总汇"。

清廷决定大力加强河西建设，使之成为西路军巩固的后勤供应基地。随即派出名将鄂尔泰赴河西考察、部署。《重修肃州新志》载："……惟自雍正十年以来，因西方用兵，军需繁重，大学士西林鄂公（尔泰）巡边，考汉唐故事，总以屯田为第一义。于是，总督武进刘公（于义）与协军需侍郎蒋公（泂）在嘉峪关以东屯田，大将军查公（郎阿）与御史孔公（毓璞）在嘉峪关以西屯田，在关西者，今已分授营兵耕种；在关东者，则募百姓充当屯户，现在设官督种，分粮以为驻防军糈之用；以省河东輓运之烦。"[②]

这里所说的嘉峪关以东屯田，即分成制民屯，屯田分布于嘉峪关以东的肃、甘、凉三州，共有九个屯区。此外，在嘉峪关以西的安西屯区，也有两个屯区曾兴办成分成制民屯，详情如下：

九家窑屯区：在肃州南山之麓，离州城150里，有地一二万亩，皆平原沃土。但地高于河十余丈，必须凿山开洞，引水于15里之外，升高20丈，方能灌溉地亩。因"工险而费巨，莫有任其事者"。雍正十年，肃州分巡道童华，受命兴屯，他"鸠集夫匠，凿通大山五座，穿洞千余丈，洞高七尺，阔五尺，开渠五百丈，其悬崖断岸，水不能过者，架槽桥四座。……堤善崩，成而复溃者数"[③]。历时二年，前后费帑三万两，始垦成地万余亩，招民认种。

三清湾屯区：在高台县东南15里，雍正十一年开设。其渠道自张掖鸭子渠自屯地，共长90里，内分仁、义、礼、智、信五号，每号二、三、四千亩不等，共有屯地16 200余亩。

柔远堡屯区：在高台县城西南十里，雍正十一年开设。其渠道自抚夷堡西渠起至屯地，共长79余里，内分元、亨、利、正四号，每号一千百十亩不等，共有屯地5 100余亩。

① 上述数字引自彭雨新《清初的垦荒与财政》，转引《大清会典事例》卷151。

② 《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屯田》。

③ 《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屯田》。



平川堡屯区：在张掖县北八里，雍正三十一年开设。其地原有十废弛旧渠四处，接通疏浚，新开渠道1 350丈，溉屯田1 169亩。“斯地极饶，每年收成辄过十余分，并几及二十分，而开垦之费，又极为廉俭。”

毛目城屯区：在镇夷口外160里，双树墩屯区以北80里，为昔人屯耕战守之处。雍正十一年开设。其渠道引黑河之水，有大常丰渠一道，长68.9里；小常丰渠一道，长27.3里；中长丰渠一道，长17.2里。内编列天、地、元、黄等三十号，每号五、六、七百余亩不等，共有屯地18 025亩。

双树墩屯区：在镇夷口外80里，为前代屯田旧址。“旧渠土埂，古迹犹存。”雍正十一年，开渠引黑河水至屯地，渠长16.6里，内分大、有、年三字号，每号屯地520余亩，共有屯地1 562.5亩。

九坝屯区：在高台县西北二十里边墙外，前代屯田旧址。雍正十一年，开挖新渠，疏通旧渠，共长9.6里，灌溉屯田1 216亩①。

昌宁湖屯区：在永昌县西北100里，去宁远堡40里，系当地贡生王建国等自备工本开设。可屯种籽种300余石，以亩下一斗计之，当有屯地3 000余亩。

柳林湖屯区：为河西清代民屯中规模最大者。其地在凉州镇番县城东160里处，即汉代休屠县故地。《尚书》所谓“潴野泽”。这里幅员广大，周围数百里皆可耕地。雍正十一年，开渠引水，“用镇番大河之水，堵筑西河，俾全归柳林……有总渠一道，然后分东、中、西三渠，复开岔渠数十道，各长数十里不等。地亩俱在渠身左右，编列字号，每号约以千亩为率”。东渠编列天、元、调、阳、万、丰、辰等二十八号。中渠编列万、民、乐、业、共、享、升、平等三十七号。西渠编列坐、朝、问、道、周、发、商、汤等三十七号，共有屯地12万余亩，屯户2 670户。②

安西镇口外屯区：屯地分布于安西、柳沟、靖逆、赤金等处。原为当地员弁、客民私垦成熟地。雍正十年被收归官府，兴办募民屯田。十三年又改办兵屯。乾隆四年(1739)改军屯为民屯。“招募民人及兵丁子弟承种，将原派屯兵撤回，差操以实营伍”③，共有屯地26 209亩。

瓜州屯区：屯地分布于瓜州五堡，原为移居瓜州的近万名吐鲁番维吾尔人耕种的熟地。乾隆二十一年，维吾尔人返回故乡吐鲁番，瓜州遗有大量的垦熟地亩。经陕甘总督黄廷桂奏准，招民垦种，分成“纳粮”④。

在雍正十三年九月，总督刘于义奏准在嘉峪关内添设地方流管，专管屯务。在平准战争这一历史背景下，在河西实行州县制度地区建立的民屯，其组织管理系统有相对的独立性。河西嘉峪关外地区在兴办民屯期间，未设州县，当地的民屯由安西兵备道所属的厅卫文武官员管理。

---

① 《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屯田》。
② 《重修肃州新志》，《肃州附载》。
③ 《敦煌随笔》卷下，《屯田》。
④ 《甘肃通志稿》，《军政4屯田》。

光绪三十四年(1908)招募四川人到陕西清化、巴安等地屯田。民屯地亩大多是官府出帑银开成。所需籽种由官府借贷,"秋成后,先行扣还"[①]。

租制:嘉峪关外安西镇口外和瓜州屯区,秋收扣除籽种等借项外,所余屯粮,"民得六分,官得四分,按数缴纳,经备兵粮"[②]。嘉峪关内柳林湖等九屯区,秋收后,扣除籽种等借项,"然后将余粮官民各半平分"[③]。屯民负担是很重的。

关西地区,汉唐时即为战略要地。明初,占有河西,划嘉峪关而守,设"河西七卫"。成化之后,吐鲁番占据哈密,侵扰关西,七卫残破,不能自保,不得已,人众相继迁往关内。其后,关西沦为蒙古游牧草场,"千里沃壤,鞠为茂草,无复田畴井里之遗"[④]。

清初,关西为青海和硕特蒙古阿拉布特等部所占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西路大军进驻巴里坤,清廷于嘉峪关以西开台设站,转输军粮。与此同时,吏部尚书富安宁奉命率军在关西勘垦,获得成功。次年富安宁奏请,招民认垦勘垦地亩,"于边疆大有裨益"[⑤],获准实行。五十六年(1717),甘肃巡抚绰奇奉命招募无业贫民,官费送赴关西安置。于"西吉木地方安插民人二百七十户;达里图安插民人五百三十户;锡拉谷尔安插民人一百六十户"[⑥]。这是清代关西地区的第一次徙民。

关西第二次徙民是在雍正四年(1726),川陕总督岳钟琪建议加强对关西的建设,"招甘省无业穷民二千四百户开垦屯种"[⑦]。准奏。加强沙州民屯。屯户来源于甘肃平凉、庆阳、临洮、巩昌、甘州、凉州、西宁、肃州等八处。两次徙民共3 300余户,每户以五口计,当在16 000人以上。

除了徙民之外,还有部分余丁和遣犯参加。关西屯户实行卫所管理组织制度。康熙五十六年,第一批徙民到达关西后,清廷设立赤金、靖逆二卫,柳沟一所于当地。

赤金卫,地名西吉木,明赤金卫故地,西去嘉峪关180里。康熙五十六年建城,驻兵,开设屯田。有屯户270户。次年设卫。雍正五年改守御千户所,乾隆七年复设卫。

靖逆卫,地名达里图,又名达尔兔。明赤斤卫、苦峪卫故地。西去嘉峪关290里。康熙五十七年筑城设卫。因靖逆大将军富安宁曾统兵驻此,故名靖逆。有屯户530户。

柳沟所,地名锡拉古尔。明苦峪卫故地。西去嘉峪关310里。康熙五十六年筑城驻兵,开设屯田。有屯户160户,设守御千户所,治所在四道沟。

---

① 《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屯田》。
② 《敦煌随笔》卷下,《屯田》,《甘肃通志稿》,《军政4》。
③ 《重修肃州新志》,《肃州高台屯田》。
④ 《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
⑤ 《清圣祖实录》卷269。
⑥ 《清圣祖实录》卷277。
⑦ 《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



二卫一所设置之后，清廷委派理藩院员外郎巴福寿赴关西，与青海和硕特左翼阿拉布坦，车臣属下划分地界。在屯田地亩与蒙古游牧地之间，"立号后界，不令逾越"①。并于柳沟以西的布隆吉尔筑城驻兵，捍御二卫一所屯田，控扼当金山口。自此，改变了和硕特蒙古独占关西的局面。不久，青海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不满清廷分封，聚众反清。这次叛乱中，和硕特军队曾劫夺关西台站，围攻布隆吉尔。清参将孙继宗，游击孙超节领兵往迎，遇敌3 000余人。正激战之时，副将潘之善引兵继至，并力奋击，杀敌甚众。叛乱平定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了对关西的控制和建设。于布隆吉尔设总兵官，统镇标营兵五千镇守，并于关西再设安西、沙州二卫。

安西卫，明赤金、沙州卫故地。雍正元年设卫于布隆吉尔。西去嘉峪关500余里。

沙州卫，明沙州卫故地。雍正元年初，设守御千户所，次年改卫。②有屯户2 400户。该卫所在关西极西边，但"富庶情形甲于诸卫"。随着关西人口的不断增加，雍正五年，清廷于布隆吉尔以西的大湾重建安西新城，将安西卫从布隆吉尔移治于新城。同时，升柳沟所为卫，从四道沟移治于布隆吉尔。至此，关西建成赤金、靖逆、柳沟、安西、沙州五卫。

关西五卫，每卫各设守备、千总一员，管理本卫屯户和屯田事务。

《嘉庆重修大清统一志》记述：甘州府，原额民丁共5 850人。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共282 496人。屯丁男妇大小531 119人。

凉州府原额民丁共24 335人，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共284 131人。屯丁男妇大小共12 203 67人。

肃州直隶州，原额民丁共6 908人，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共319 768人。屯丁男妇大小132 295人。

安西直隶州，民丁原额缺载，今滋生民丁男女大小共77 873人。

嘉庆年间甘、凉、肃、安四州府共有2 848 049人，与原额民丁相比，增长了七八十倍。

从甘肃甘、凉、肃、安四州府人口统计可以看出：

一是人口增长迅猛，除人口迁徙与军队改卫丁为屯丁外，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发展，大批商贾通过嘉峪关支流物资，经济繁荣是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是屯田户的人口在甘、凉、肃、安四州府占的比重大。说明雍正、乾隆年间河西走廊的屯田事业发展很快，取得巨大成绩。

三是清廷加强河西走廊建设的决定，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不仅增强了河西四州府的实力，而且为清廷经营西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功莫大焉。

① 《清圣祖实录》卷284。

② 《开设沙州志》载为三年。

三、青海屯田

清朝，对青海行政区划调整后，农业区和牧业区划分日臻明确。唯因历史变化无常，农垦事业时兴时衰。清雍正、乾隆后，政局较为稳定，劝导农耕，开垦荒地，耕地面积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雍正元年(1723)平定青海叛乱后，清政府在西宁市布隆吉尔清军驻地附近的赤金卫、柳沟等处，由各营派出余丁耕种荒地。开始官给牛、籽种和口粮。三年以后停止供给，其耕地作为耕者所有。每丁交粮三石，作为兵饷。[①]

雍正二年(1724)和雍正十年(1732)分别在大通卫和额色尔津(今诺木洪)试办农垦，均未见效。雍正十一年至十二年(1733)又在哈尔海图试垦，种地千余亩，收获仅三成。效果不佳，故停办。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青海政局基本稳定，政府"劝垦"，"招垦"，清廷决定："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军流人犯连家口遣发之人能耕种地者，令其前往。地方官拨给地亩，动支钱粮，采购籽种耕牛给予。"赴西宁布隆吉尔屯田。这些人犯领地耕种以后，按照规定，缴纳田租，可以留居当地，成为编户。这次大批人犯屯田，成效显著。据《西宁府新志》和《循化志》的记载资料折算，乾隆年间河湟地区约有耕地468万亩。农业生产发展较快。

乾隆十一年(1746年)，青海西宁府大通卫地方进行屯垦，共安插土著及客民79户，兵丁子弟69户，原驻回民38户。[②]兵、民、土、客混合屯种，是一个创造，是一种试办成功的良好模式。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水利工程。据《西宁府志》及《西宁府续志》记载：西宁有西川、北川、南川、东川四大渠系，有各种渠道136处，341条，下籽量6 996 247石。在碾伯、贵德有各种渠道72处、206条，下籽量3 184 567石；巴燕厅、丹噶尔厅等地有各种渠道50条，下籽量2 045.62石。以上总计下籽量13 742.468石，折合水浇地54.3万亩。水利工程的建设，保障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四、屯田带动了水利建设

西北少雨，兴屯田，必须进行水利建设。宁夏地区原有汉渠、唐渠及大清渠，每年疏浚整修，后来闸门及渠道逐渐损坏。雍正年间，扩大开垦屯田，"特遣大臣督率官员，开浚农惠、昌润二渠，又命整修汉、唐、大清三渠，以溥民利"[③]。

乾隆十年(1745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宁夏府属农惠一渠，上引黄流，下通六墩、昌润二渠，昌渠下梢即系埂外闲田……尚未垦荒土二十七八万亩……当即委员分工办理，上下修濬，使渠水流通到梢，处处均敷引灌。废地得此水流，招垦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1。
② 甘肃巡抚黄廷桂乾隆十四年奏稿。经济研究所：《地丁·甘肃》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六。



更易。”[①]

雍正十年(1732),甘肃瓜州为了垦种,“将疏勒河上游筑坝开渠,引水入河;又于安家窝铺对岸导渠,疏浚深通,引水溉田”[②]。

雍正十一年,“陕西之柔远堡、镇夷堡、口外、双树墩等地开垦,令开渠灌田”。

雍正十二年,“甘肃口外柳林湖地屯垦,令筑坝、建堤、开渠”。又“陕西之中卫县白马寺滩,地广可耕,令开渠建槽以资浃溉”[③]。

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保证了屯田的灌溉,而且对开发西北也起了很大作用。

① 《清高宗实录》卷243。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六。
③ 以上均引自《清朝文献通考》卷六。



第十四章　杨增新时期新疆屯垦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震撼全国，纷纷响应，14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革命洪流席卷中华大地，1912年1月1日，17省代表齐集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建都南京。至此，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

辛亥革命也波及新疆。"风声紧急，人心浮动"，大有"一夫攘臂，应者四起"的形势。[①]刘先俊等革命党人，于1911年12月8日，在迪化组织起义，被新疆巡抚袁大化进行残酷镇压，处死数十人，起义失败。

伊犁的革命党人，在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等人的严密组织下，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各族人民，于1922年1月8日起义成功，建立"伊犁临时革命政府"，"军士商民，齐呼万岁"。

袁大化派兵镇压，被伊犁革命军打得节节败退，清军撤至乌苏。杨缵绪派人联络各地哥老会，在天山南北积极活动，戕杀反动官吏，迪化官吏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第一节　统一新疆军政管理

杨增新（1860~1928年），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88年考中举人，次年考取进士，当年即任甘肃知县，1896年任知州。中日战争时，追随宁夏将军钟泰练兵管理全军营务，并兼管带（营长），从此取得了治军经验。1901年任道员，1907年经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向联魁推荐来疆。曾任阿克苏兵道，1911年4月任镇迪道尹兼提法

① 钟广生:《辛亥新疆定变纪略》。



使(一省最高司法长官)。时值辛亥革命时期,当袁大化与伊犁革命军兴兵征战,袁兵不利时,杨增新乘机向袁大化建议建立新军,“招募回军助战”,并自告奋勇带兵赴前线助战。袁大化甚为赞赏,经批准在迪化24坊中,招募回队五营,自兼统带,成了新疆官僚中实力最强的人物。嗣袁令其带队赴前线时,而杨却按兵不动,拥兵自重。待袁大化卸任东走,杨增新主政新疆。1912年5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当时,新疆正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时期。外有强邻沙俄屯兵边境,虎视眈眈,在沙俄支持下的外蒙古,对阿尔泰不断兴兵侵犯;内有哈密等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哥老会戕杀官吏,层出不穷;与伊犁革命政府谈判,正陷于僵局;加上协饷中断,财政异常困难,稍一不慎,将招至全疆糜烂。

杨增新执政后,先以高官厚禄瓦解了伊犁革命政权,又以武力扑灭了哥老会,镇压了哈密农民起义,逐渐统一了新疆。

清帝退位,袁世凯命各省总督、巡抚一律改为都督。伊犁革命后,公举广福为都督,新疆出现两都督并峙局面。袁世凯为弭争端,改任广福为伊犁镇边使,其职权仍循伊犁将军之旧。待杨增新取消伊犁革命政权后,1914年2月广福病死,杨增新借机报请中央批准改伊犁镇边使为在新疆都督统辖下的伊犁镇守使,专管伊犁军队,包括满营事务。派其参谋长杨飞霞任伊犁镇守使。从此,伊犁统辖于新疆都督。

1916年11月9日,杨增新电请中央将塔城参赞大臣改为塔城道尹,属新疆管辖,塔城亦统一于新疆。

阿尔泰在1907年设办事大臣,驻丞化寺(今阿勒泰市),作为特别区,直属中央管辖。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改办事大臣为办事长官,与新疆都督互不统辖。

1915年7月阿尔泰办事长官刘长炳鉴于沙俄强行在布尔津一线驻兵一团,实行移民,强租田地,阿尔泰形势危殆,北京鞭长莫及,呈请中央将阿山并于新疆。1918年11月阿尔泰所属蒙古三部王公贝勒等联名上书新疆,请将该三部改隶新疆。杨增新电呈中央:“阿山应以新疆为根本,新疆应将阿山为屏蔽”,力主阿尔泰划归新疆。

1919年3月,阿山发生兵变,阿尔泰办事长官张庆桐对前任所发阿币,不予兑现,张又大肆倒卖阿币,中饱私囊,扣发驻阿官兵五个月薪饷,官兵大哗,军民怨声载道,被革职之卫队管带冯继冉煽动士兵暴动,枪杀外交局长和财政局长等人,囚禁张庆桐,宣布独立。杨增新闻讯,电呈中央保荐候补道尹周务学为代理长官,率马、步炮兵数营,新募蒙旗一营两连,轻骑简装,突然进兵丞化寺,枪毙冯继冉,安抚军民,阿山遂定,经中央批准,改阿山区为道,命周务学为道尹,至是阿尔泰归属新疆管辖。

伊犁、塔城、阿尔泰统一于新疆管辖,对防止外强入侵,保卫祖国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二节　击退外蒙古军对阿尔泰的侵犯

清末，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自顾不暇，沙俄乘机于1911年10月派兵800人，进驻库伦（今乌兰巴托），策动一些王公、活佛及亲俄分子组成“临时政府”，建立“大蒙古帝国”，举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宣布“独立”。1912年8月在沙俄支持下，蒙古军攻占了科布多。

沙俄攫取了外蒙古、科布多还不满足，妄图进占阿尔泰，进一步鲸吞新疆。于是唆使外蒙古大举进犯阿尔泰。

阿尔泰当时是直归中央管辖的，总统袁世凯正值拔剑张弩两路兴师，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之时，无功夫西顾阿尔泰。杨增新自知事关大局，积极调兵遣将，选派善战的团长张健率部赴前线迎战。进驻北至科布多、西通阿尔泰、南达新疆的咽喉要隘——察罕通古。

1913年6月17日，由外蒙古军指挥官率士兵8 000余名，携带俄式枪炮，三路进犯阿尔泰。适因包庆墩河水暴涨，蒙军前锋千余人难以渡河，只得暂时撤军。派人给我军下战书称：“限中国军队十日内退出察罕通古，否则枪弹对待。”[①]张健团长复书：此地是中国领土，“如你来攻，则中国官兵不能不采取正当防卫手段”[②]，严阵以待。

7月4日，外蒙军4 000余骑兵，由萨克扎杜布指挥，夜袭我军阵地。事先被我军侦悉，张团长指挥步队三营、马队一营，以逸待劳，以步御马，依托战壕，沉着应战。当蒙军冲至阵前，我军突然猛烈射击，并有大炮助战，经我军迎头痛击，敌军不支，即行退走。是役毙敌200余名，生俘2人，战马300余匹，枪械数十支。我军亦阵亡官兵62名，驮夫2名，负伤101人，失枪32支，死战马45匹。

外蒙军第一次攻击未取胜，经过七天准备，于7月11日黎明，3 000余人进攻察罕通古大营，另有七八百人，据南面之高山，攻击我第四营阵地，并有大批军随后接应，中国军奋起抗击，激战四小时，毙敌100余人，外蒙军纷纷溃退，是役我军阵亡5名，负伤7名，营长马得贵亦为祖国捐躯。

经过两次交战，外蒙军败退，中国军亦无力反攻追击，于是双方议和，订立《中蒙停战协定》。察罕通古之役，粉碎了沙俄支持下的外蒙古侵占阿尔泰的阴谋，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

①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三》，北京刻版。
②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二》，北京刻版。



第三节 处理哈、布难民涌入新疆事件

伊犁、塔城外之哈萨克部落，喀什、蒲犁（今塔什库尔干）边境外之布鲁特部落，清盛时皆为我国藩属，后为沙俄逐步蚕食。同治光绪年间中俄两次划界，划走我国大片领土，将哈、布两部落，一分为二，大部划归俄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穷兵黩武，在哈拉湖一带（热海附近村庄），强征哈萨克族青年入伍，哈族人民不从，沙俄即行镇压，捕杀头目，以致激起事变。哈、布、维、回族人民于1916年8月举行起义，杀官吏、焚街市、掳妇孺、掠牲畜。沙俄立即派大军镇压，大肆围攻，枪杀起义者。人民不敌，大批涌入我国。杨增新严令卡伦堵截，但难民在俄军枪炮轰击下，死亡枕藉，填塞道路，惨不忍睹。[①]哈、布民死里逃生，于10月中逃入我卡伦。守卡官兵欲堵，难民哀告："与其返回终死俄人之手，不如死在华界尚能瞑目。"守卡官兵不忍，大批难民涌入新疆。先后逃入塔城的六七万人，伊犁地区16万人，皆为哈萨克族。进入喀什和蒲犁地区的五六万人多是维吾尔族和布鲁特人。共30余万人。

难民来到新疆，多数饥寒交加，少数人则劫掠牲畜，滋生事端。杨增新派官员首先进行安抚救济。继则派军队前去维护社会治安，严防滋事。再则向俄方交涉，赦免其罪，招抚回国，有布、哈族人回俄者，多有被杀戮者，经反复交涉并对难民劝慰，直到1918年冬，大部难民陆续回国，有部分坚决不回者，发给护照，准予入我国籍。

第四节 处理大批白俄败兵入窜事件

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红军节节胜利。中亚方面白俄军在红军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1920年3月，白俄将军巴齐赤带1 200名军官和7 000余名士卒逃到塔城。前后败退到塔城的白卫军残部约1.1万余人，战马9 000余匹，枪械数千，难民5 000余人。退入伊犁的有原沙皇女婿阿连阔夫残部4 000余人，连同难民1万余人。阿连阔夫本人于1920年5月率败兵1 400余人，马700余匹，牛140余头，车210余辆，自博尔塔拉卡伦入境，窜入伊犁。

当时新疆军队号称3万，实际只有1万余人，武器窳劣，且不少是老弱，军纪废弛，战斗力很差。新疆顿时涌入近两万久经疆场、强悍、纪律极差且有勃勃野心的沙俄将军率领的白卫军，对新构成巨大的威胁，"抵抗苏联红军虽不足，扰乱新疆

①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地方志总编室，1988年印。



图61　塔城俄领事馆旧址

则有余”。新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处理稍一不当，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如何对待白俄败兵问题上，当时的中央政府与新疆持着对立的观点。

北京政府认为，新党必败。中国是协约国之一，理应援助白俄败兵。杨增新则认为：“新党必胜，古今中外，各国皆然。”[①]新疆应严守中立。

1918年11月18日，俄领事库达摄夫致函北京外交部：“兹有西伯利亚义勇编成之师团，拟路经塔城属前赴俄属七河省南部之扎尔肯特。甚望贵政府久已入协约战国内，必然尽其义务，准该军队经过华境。”后又照会外交部称，该过境军队有白俄“军5 000人，另有华人一营约千余人”。11月20日外交部电杨增新称：“现协商国已获最后胜利，我国既在协商（约）方面，遇事当有协助义务，希转饬准令该项军队通过为妥。”“对于旧党应尽力援助，现俄新党因德已降服，势力溃败，自不愿侵犯我境。”[②]

杨氏对北京政府指示，再三致电抗争：“俄军假道，碍难允许，中国为允该俄兵假道塔城以达伊犁进攻萨马尔，新旧两党不特以伊犁为战场，新党势必由塔什干、安集延分兵以攻喀什，由哈拉湖以北进攻乌什。则新疆全局不糜烂于欧战未停之先，而糜烂于欧战已停之后，前功尽废。”“但为邻人兄弟互斗，我助其兄而罪其弟可也，若令邻人之兄弟直入我家相斗，势非因协助邻人而自破其家不可也。”[③]北京政府不得已，放弃了援助白俄败军的方针。

杨增新坚持中立的外交方针，采取不干涉主义，严守中立，拒绝白俄军假道，对败兵入疆，如阻止无效，则遵国际公法，先行缴械，然后予以安置，供给粮食。

当时英、日等帝国主义与帝俄驻新领事，以协约国为词，一再拉拢、胁迫杨增新派兵赴俄以援助白俄，被杨“宛然谢绝”，日本派到新疆的成田哲夯等九名调查员，要求准许日本派一师团军队，进驻伊、塔，被杨增新断然拒绝。

阿连阔夫所部，将大部武器埋在边境，向伊犁当局只交了极少数陈旧武器。1920年9月，杨增新劝阿连阔夫带军官500人，士兵200人，战马800匹，进驻迪化。阿不断滋事，要求中国当局代索巴奇赤提取塔城领事馆巨款，否则，部下将举行暴动，“抢劫银行，占领省城”。人心惶惶，一夕数惊。杨增新一面加强防范，一面以

①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癸集七》，北京刻版。
②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省城缺粮为词,劝阿部到奇台就食。阿连阔夫到奇台后,积极备战,派人经小路将埋在边境的机枪25挺,步枪300支,山炮一门,炸弹千余枚,秘密运入奇台。1921年1月6日突然袭击奇台县东门,被驻军迎头痛击,杨增新迅速调重兵包围奇台,阿不得已,同意交出武器,并将白俄兵分四批送入关内,后将阿连阔夫拘留,事始息。

留在伊犁的杜托夫残部于1920年1月9日发动叛乱,在惠远城大肆抢劫,占领军装局,被迅速扑灭,杜托夫被击毙。

驻在塔城的帝俄将军巴奇赤部尚有5 000余人。1920年10月,白俄军官胜系克,率残部千余人,带步枪300余支,机枪4挺,闯入塔城,将武器埋藏山中,拟于1921年1月暴乱,被塔城道尹张健侦知,派人将埋在山中的武器挖走,暴乱被挫败。

1921年5月,白俄军官诺维科夫率败兵2 000余人,携步枪1 900余支,机枪6挺,车300余辆,拒绝缴械,强行进入塔城,与额敏露营的白军汇合。此时,白俄军在塔城的总兵力达8 000余人,远远超过我塔城3 000名驻军的实力。是时巴奇赤活动频繁,“互相联络,伺机待动”,“塔城祸机危迫”。杨增新深知仅靠新疆的兵力已无法解决,于是决定与苏联红军联合,歼灭巴奇赤军。

根据双方协议,苏联红军于5月24日,分三路进军,猛攻额敏巴奇赤军,白军败退东逃,监视露营之马队营官兵被白俄军胁迫而去。红军追击,在额敏河南大败白军,巴奇赤军向北退至和什托洛盖,向红军反扑,红军不利,退回本国。巴奇赤部在和什托洛盖抢劫官商财产,烧房屋,掠牲畜,于13日渡额尔齐斯河,防守该河之马队一营,炮队一连不敢抵抗,亦被裹胁而去。道尹周务学自杀。巴奇赤军北取丞化寺,南占布伦托海县,派人与外蒙古联络,强令阿山蒙古王公勒派战马1 200匹,养精蓄锐,负隅之势已成。9月1日,红军4 000余人,两路出兵,向巴部进击,四战四胜,大败白俄军,生俘2 300余名,死伤甚众,巴奇赤率一部逃科布多。至是阿山收复,白俄之乱方告平息。

从1920年到1921年,白俄败兵及难民不下三四万人,不断滋事抢劫,数次组织暴乱,险象环生。终因杨增新判断准确,严守中立,处置得当,将暴乱一一平息,使新疆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第五节　粉碎马福兴的割据势力

马福兴,回族,云南蒙自县人。清末,因罪被流放新疆。利用同乡关系,与杨增新结识,助杨增新招募回队5营(后扩大为15营),在镇压哥老会与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领袖中,回队营充当了刽子手,因而得到杨增新的信任。1914年杨命马福兴率军20余营进驻喀什,杨缵绪出走,马福兴被任命为提督,其子马继武任协台。杨增新任其弟杨增炳为喀什道尹,带兵10营以牵制马,不到一年,被马挤走。1924

年初，马福兴除拥有回兵30余营外，私自下令在疏勒、疏附征兵3 000人。[1]马福兴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称"帕夏"(王)。他在喀什大肆敲诈勒索，恣意妄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妻妾就有17个，民怨沸腾。英俄驻喀领事，策划建立南疆回教国，唆使马福兴派兵15营援助白俄，被杨增新严令制止。马并秘密与北洋军阀勾结，进行倒杨活动，被杨侦知。

1924年，杨增新派与马福兴对立的马绍武(回族)率军12营，远途奔袭喀什，捉杀马福兴并其子马继武，平定了割据势力。

第六节　组织军民屯垦与兴修水利

在清代，对新疆的"协饷"，每年为白银200~300万两之巨。杨增新主政新疆，"协饷"中断，财政异常困难。杨氏研究了新疆的处境后，认为必须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首先是大兴屯田。"饷银断绝，舍开垦别无办法"，"垦田为富国裕民之策"[2]。于是组织军民，大开官荒。派军开屯，安置游民，发展民屯。组织得力的水利委员会，在全疆大兴水利，先北疆，后南疆，开渠挖井，进展甚速。他要求各县"自民国五年(1916年)始，各该县每年至少须招六十户，以定知事考成。能招垦有效者，准其留任，否则，随时撤换"[3]。奖励垦荒有功官吏。生产成效显著。

1911年新疆耕地为1 055.4万亩，到1918年达到1 202.6万亩，净增147.2万亩，每年以21万亩的速度增长。粮食总产1913年为1 320万石（包括青稞大麦)，到1918年就增加到1 453万石，四年增加133万石。棉花总产1914年为693万斤，到1918年就达到2 093万斤[4]，增长了两倍，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由于新疆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清末新疆人口为216.2万人，到1920年就增加到251.95万人，1925年达到268.83万人，14年人口增长52.63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4%。[5]这是近代新疆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

杨增新认为："屯垦为当今要政。"大力创导，积极组织军民兴修水利，屯垦生产。先北疆，后南疆。有军屯，有民屯，主要是民屯。在天山南北迅速发展起来。

一、北疆

迪化(今乌鲁木齐)

迪化是新疆首府，丝绸之路重镇。杨增新主政新疆后，大兴屯垦，先从北疆人

①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⑤ 陈延琪：《1840~1949年新疆人口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初探》，《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



手，对迪化办水利，举屯政，尤为重视。

迪化北郊60里的青格达湖，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有泉水数处，自地涌出。1915年4月，派新队官马瑞珍及治安右营连长边永靖等带队前往，一面开渠，一面垦荒。对士兵于饷外日加津贴银1.2钱，面粉1.5斤，不交粮价。由于官兵努力，于11月竣工。大渠长2 000余丈，面宽5丈，底深4.5尺不等。又开支渠两道，长2 400丈。渠成后，派兵屯田。

迪化县北沙山子地方，土地膏腴，原有居民数十户，自战乱之后，逃亡殆尽，渠淤地荒。1918年派新兵步兵营长李寿福及定远营步队营长陕有才各率队兵250名，在头屯河下游挖渠400余丈（宽1.2丈、深1.8~1.9丈不等）。在老龙河下游挖渠2 300余丈（宽2~3丈，深4~5尺）。引水灌溉，屯田生产。这项工程，仅用四个月即完成，用银1.46万两，由杨增新捐助。[①]

1916年派兵前往迪化南90里的柴窝堡地方，修复渠道，垦荒1.5万亩，招民屯田。

镇西、哈密

镇西即今之巴里坤，和哈密皆为新疆之要隘，东部门户，丝绸之路北道的重镇。1916年知事陈汝彬组织军民修筑乔家沟渠道，垦荒2000亩，作为官地，招民屯垦，三年还清修渠费用后，作为该户私业。并规定此官地尽先由贫穷无业之人垦荒佃种。

1915年整修城西苏吉之乔家龙口、蒋家龙口，以引水灌溉。该处土地肥沃，安置旗民屯田。

1918年知事李树荣督民修复旧渠，开垦地7 030亩，招民262户认垦，八年征半，九年全征，共应征正粮490石。

同年，察哈泉亦仿用坎儿井，颇有成效。

哈密属于哈密王沙木胡特封地，杨增新欲派兵屯垦，因哈密王反对而作罢。

奇台

奇台东北通乌里雅苏台，北与科布多、阿尔泰接壤。粮食岁多输出，粮价日涨。清代有地36万余亩，自遭兵燹，渠道淤塞，荒地14万余亩。1915年奇台知事郑有叙督民整修董子旧渠于八月完工，用银903两。又修中渠、西渠、吉布库、永丰各渠。开垦荒地，任民承垦。修渠费用主要由受益田亩按户酌量归还。

孚远（今吉木萨尔）

县属北乡四厂湖、五厂湖，水草肥美，土质良好，有可耕地万余亩。因渠道未修，积水为害，致土地荒芜。1916年知事陈宗器组织农民修渠，参将杜发荣带兵200名参加。干、支渠总长共100里，用工2 880个，花银2 177两，垦荒8 100亩，招民90户承垦。计亩升科，自1920年起全征，年科粮243石。

1918年知事段永恩饬民在城北10里之小霜湖地方修渠一道，引水屯田，招民

①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认垦，按亩升科。

阜康

该县知事王度对垦荒不积极，认为该县“高则乏水，低则卤潟，加之土著少而游兵多，未可遽言垦复”。杨增新严厉批评王知事：“深居衙署，不肯下乡，畏难自阻。”并警告说：“各县每年至少需招垦新地60户，以定知事考成，能招垦有效者，准其留任，否则，随时撤换。”之后，该县在六营湖之西渠地方修渠40余里，垦地四五千亩，招民50余户屯田。该工程共用银4 800余两，先由公家垫发，后酌收地价以弥补。①

昌吉

三屯河之十三户地方，荒地甚多。1915年知事匡时，招维吾尔族农民60名，将旧有渠道整修，渠长130~140里，荒地近2万亩，可安置垦民二三百户。并能将三十户海子（水库）开拓，以储余水灌下游之地。共用银2 069两。

1916年知事张馨派警备队一营修筑沙山子十三户渠一条，长一百数十里，当年引水开荒种田，试种小麦。俟军队将地种熟后，再招承无业穷民租种。

又重新整修被壅塞的北乡二十二户蓄山海子引水渠，东西干渠共长4 400余丈。海子堤长360丈，高及底宽各1.5丈。上游引水渠疏通3 600丈。垦地3 660亩，招30户农民认垦。支银3 749两，由垦民按户分期归还。一俟还清，从1924年起按亩升科。

呼图壁

该县呼图壁河，水量充足，由天山直泻西北之芳草湖，因渠道被毁，河水漫野，纵横百里，膏腴之地，大都荒芜。1916年杨增新令昌吉营游击侯锦、县佐李继鸿组织军民，修渠垦荒，招民承垦。

绥来（今玛纳斯县）

1915年知事杨茂春招民整修新顺渠，在上游水势平缓之地压坝，修引水渠长20多里，垦田种植，招垦民100余户（按每户60亩计，共垦荒6 000余亩）。因龙骨河水流即在冬季犹湍急，春夏水势浩大，知事请改用水轮木槽法，仿内地之水车，此是北疆用水车的开始。

沙湾

沙湾原属玛纳斯县辖，为了发展屯垦，于1915年由省报请中央设县治。杨增新在给沙湾驻军营长杨修政、知事刘希曾的指令中说：“已呈中央设立县治，此缺之设专为办理垦务，将来应派队伍办理屯垦。”可见对发展屯垦的重视。

县属大、小拐地方，原种地20余万亩，户民600余家。战乱后，渠道破坏，田园荒芜，户民逃亡殆尽。1915年派陆军三营营长杨修政率所部，新军哨马金元带新军一哨，并民夫四五十人赴小拐修移户渠，4月开工，8月竣工。渠长30余里，渠宽

①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1.8丈,底深1丈。坝的质量坚实,经洪水冲刷无恙。开荒种田,招民承垦,70亩一户,并准酌量加给隙地。不论本籍客籍一人只准承领垦地两户,不得多领。除前修渠帮工之民夫四十人,按人授地半户,不收地价外,其余不论上、中、下地,均每亩地价银三钱五分,三年分收,第四年按中地赋额升科。

1919年8月,杨增新训令奇台知事称:"古城满营旗民,自改革以来,生计艰窘,有卖儿卖女,露宿丐食者,闻之恻然。着由该知事调查旗民中无吸食鸦片嗜好,能勤力稼穑者,招募40人。每十人放一能耐劳之人作为排长。俟招齐,由该知事点验成军,以新军章程支饷。并将年岁、姓名、斗箕造具成册呈报,以便到沙湾地方开垦。将来地亩成熟,即归该旗兵作为己业。不唯地边足捍卫,尤为该旗兵筹一永久立业之基。"

乌苏

县北之六十户、东三十户、西三十户,以及车排子、苏兴滩等地,土地肥沃,均有居民,后因奎屯河坝失修,河水泛滥,渠道淤塞,以致土地荒芜,户民逃亡。原该县知事崇本垫款3 012两,游击李福兴垫款2 111两,于1915年雇工整修河坝,并修筑车排子干渠一条,3月7日开工,4月竣工。河水入槽,垦荒6 880亩,招民334户认垦。每亩收地价银30两,按所招各户,计亩分摊,逐年催收,以还清垫款。从1919年开始升科,粮额275石。

伊犁

伊犁气候温和,土地肥美,水量充裕,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原是新疆首府,清代伊犁将军所在地。后因沙俄侵占大片土地,伊犁成为边城,首府迁至乌鲁木齐。1912年伊犁革命后,北京政府任命广福为伊犁镇边使。1914年2月杨增新统一伊犁地区后,改镇边使为镇守使,命杨飞霞署理。辖一旅(步、骑、炮兵各一团),又兼辖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索伦四大领队,皆旧时之携眷驻防兵。锡伯营驻伊犁河南,索伦营驻霍尔果斯,以农为主,屯垦戍边,厄鲁特营驻特克斯,察哈尔营驻博尔塔拉,以牧为主,边放牧,边守卡伦。与清代不同的是,此是以屯垦为主了。

1914年7月,县属喀什河山洪暴涨,冲垮阿齐乌苏大渠40丈,并冲走渠口压坝木笼24个,沿渠农田无法灌溉。伊犁道尹许国祯派正农官额鸦斯、副农官色包克等负责组织户民抢修。共支用京斗小麦232石2头2升,支盐、茶、脚运等银336.36两,迅速将渠修竣。

塔城

塔城是西北重镇,但军民粮食甚缺,每年必由他处采运。1917年知事张景南督饬在南乡石厂地方的大河上游筑坝开渠,由驻军派兵兴建,月余竣工。引水开荒,招户民20余户认垦,计亩升科。

二、南疆

南疆是维吾尔民族较集中的地方,是新疆古代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为古丝绸

之路的南道和北道(北道后称中道)。经过长期动乱,渠道淤塞、田园荒芜,广大群众饥寒交迫,挣扎在贫困线上。杨增新执政时期,着力倡导兴修水利,在东部主要是挖坎儿井,西部修渠筑坝,开垦荒地,发展屯垦。

鄯善

县属连木沁地方,土地肥沃,但因无水灌溉而大片撂荒。1915年鄯善知事张衔跃组织农民开官坎二道,包与维吾尔族坎工塔哈尔承包,用银3 100两。井成后,流水甚旺,灌地3 700亩,招民61户承垦,每户丈给土地60亩。

在苏鲁图地方,开官坎二道,承包与维吾尔族坎工统孜买提,用银4 600两,垦荒2 310亩,招民承垦。

两处官坎共用银7 700两,先由本县收存义仓本息银两项下提用,后以坎儿井所灌垦荒租价内归还。

鲁克沁南北渠麦湖以西,有官荒2 400余亩,由该县绅民自愿集资8 000两,由连二工挖坎儿井两道,引水灌溉,纳粮升科。

1916年在七角井挖坎儿井二道,垦地420亩,安置7户农民承垦。

由于知事张衔跃饬民挖井开荒,办理屯垦甚有成效,杨增新于1916年给记大功一次。[①]

吐鲁番

1915年知事陈继善督饬整修坎儿井。雅尔湖有官坎五道已淤,经查,迤东二道可修。考察后确定由东坎挖水道一条,将西坎水引入,能灌地200亩。由维吾尔族坎工艾肯木乃木尔等承挖,共支银3 670两,由财政厅垫支,后用历年所得租银归还。

1915年9月,修复义学废坎一道,包与坎工阿吉,用银800两。

1916年整修东坎尔庄两条废坎儿井,该地距城较近,土地膏腴,但因井淤地荒,该年3月开工整修。东头官坎包与维吾尔族坎工那四尔等,西一条坎儿井承包与坎工沙五可,同年11月完工,共用银6 245两,可灌地5 000亩,招民承垦。

1916年,布尔简庄农民自愿集资挖坎儿井,不领公款。坎成后,发给地上垦种,计亩升科,同年还挖成西门官坎一道。

县属南乡洋沙尔庄地方,有旧淤无主井一道,由县署包给坎匠买买提铁里等三人。张馨继任知事,督促竣工,支银3 467两,可灌地300亩。后将该井租给户民承垦,年收租银550余两。[②]

又牙尔巴什有旧废坎儿井两道,包给坎工阿尔祖等,共用银2 726两,灌地300余亩,招民承垦,年收租银500两。

县属干沟地方有泉流,顺流而下,该处地势平坦,可耕地2 000余亩,全属官地。1915年派600人修渠,招民垦荒,按水分地。已灌三四百亩。

①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焉耆

县属六十户地方，原由开都河引水灌溉，唯渠少，水不足，荒地尚多。1917年知事刘希曾商准蒙部于北大渠之北，开一新渠，分享水利。新渠以北，归蒙古族放牧；渠南归县招民认垦。得官荒二万余亩，招民承垦，计亩升科。

尉犁

尉犁县引水大渠（即蛤蚂沟）长160里，因淤塞坍塌，难以灌溉。1915年9月，知事张锡寿雇工挖掘整修，用工7 000余个，支银2 600两，可灌地3万余亩，招民垦种。

并议决库尔勒农民另修支渠引水，不准私挖尉犁渠以偷水。5月库尔勒另修一渠。

轮台

轮台是古丝绸之路重镇，动乱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民国以后，在省倡导修水利兴屯垦的形势下，该县知事郑璜督户民开挖新丰大渠一道，长8里有奇，深1.9丈，宽5尺；支渠8道，长三四十里不等，宽四五尺，深五六尺不等。共开荒地7 285亩，招294户承垦，额粮草在1919年开始全征。

库车

1915年托克苏英瓦特西庄户民自行筹款捐工修渠，由渭干河至托克苏渠开挖渠道，并分修支渠至英瓦特庄，垦荒2万余亩。

该县游击哈得尔，吐鲁番人，经省批准，由哈游击负责在沙哈湖地方，开坎儿井两道，东西水旱洞共160个，东西两渠共长680丈，每井深四五丈不等。坎成垦荒，招民屯种，这是库车县首次推广坎儿井。

沙雅

1916年知事李溶、鲁效祖相继组织羊塔协尔庄及波浪庄农民，由渭干河开干渠一道，长59里，宽1.5丈，深1丈。支渠4道，各长七八里不等。共垦地12 394亩，招民垦种，计亩升科。

1918年在县属北乡沙衣里克庄，增修干渠，把旧渠加宽加深，并开支渠4道，引水灌溉，垦荒地65 600亩，招民656户垦种，每户授田百亩。按下地升科，共应科粮656石，草131 200斤。垦民8年免征，9年征半，10年全征。

阿克苏

1917年知事金树仁组织农民自筹修阿瓦提渠，工效甚高，1月竣工。该渠水流充足，共开荒地10.1万亩，招民1 275户种植，凡参加修渠之农民，一概准予领地。金树仁因垦荒有功，受到奖励。

乌什

该县英阿瓦特维吾尔族户民乌勺，热心垦务，自筹经费9 000余两，在苦屈庄下游湖玛拉河上筑坝堵水，开渠引水灌田，从1916年开始至1917年告竣。水源充裕，可灌溉1.4万余亩。除自耕2 000亩以外，其余荒地由县署招户承垦。其地价按

年分缴，或照实垦之数收价。

巴楚

巴楚地处喀什河下游，清朝末年因上游沿途六七百里分段引水，到巴楚已甚小，至七八台数十村庄遭旱，1915年知事卢殿魁组织农民于胡热木地方引水，筑堤一道，长60丈。又于玉河开新渠一条，长5里有奇，支渠3条，各长1里，修水坝一道长30丈，冲堤一道长30丈，解除了巴楚的旱情。又在夏和尔地方，开挖南北渠各一条，南渠长七八里、宽1.2丈，深6尺。北渠长20余里，宽1.5丈，深9尺，并于渠坝植柳树以护堤，于1916年8月竣工，灌溉荒地13 084亩，招农民210户承垦。

英吉沙尔

1915年杨增新指令该县知事李义开，县属夏渠黑孜尔庄地方荒地甚多，若由莎车克立品庄上游开一新渠引水，可灌地15万亩，令其勘察规划后上报。

莎车

1915年知事刘人俄组织农民开挖大渠一条，长260余里，支渠19条，泄水渠2条，退潮碱水渠4条，长者70里，短者15里以上。设计合理，宽窄浅深，悉如各渠水量。渠边植杨柳5万余株，于1917年6月完工。丈放荒地16.6万余亩，招民4 220户屯种，水足土沃，收获丰盈，于1918年开始计亩升科。其成绩为全疆之冠，省府为刘人俄记大功三次，并于1919年报国务院请奖。曾问吾称赞："在新疆水利史上，堪与松筠、林则徐齐名。"

洛浦

1918年知事桂芬督饬户民自筹资金在巷沟牙庄开新渠引水入旧渠，以增水量，于旧渠尾开新渠引至荒地，招民承垦土地2.3万余亩。

又于塔瓦克明庄旧渠加宽1弓，长6里有奇。新开渠一条，长9里有奇，宽3弓，可灌荒地5 238.5亩。

在科科买提加挖旧渠，丈分荒地800亩，以上各渠，均是农民自筹，未支公款。[1]

此外，在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杨增新时期在这一带也兴修水利，垦荒屯田。

若羌

位于古楼兰西南，昆仑山北麓，古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

1917年知事廖振鸿督率户民开渠引水、垦荒种地、计亩升科。并在县东密远庄修盖粮仓，储运种子，以备兴垦。

且末

在若羌以西，和田以东，塔克拉玛干大漠南缘。1914年维吾尔族户民买买提敏在城西20里的英尔斯塘地方，于百里以外开渠引水，已通30余里。知事龙协麟饬民续开140余里，使荒地得以灌溉，招民承垦。又于傍卡墙河开新渠两道，长16

①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里，引水灌溉荒地2.5万余亩，招民400余户垦种。公家借银2 000两，以资耕种，三年还清。

三、"七七政变"，杨增新时代结束

1928年7月7日，新疆外交署长樊耀南与一些反对杨增新的人士共谋，借俄文法政学校举行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的机会，邀杨增新及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出席宴会中，刺杀了杨增新，史称"七七政变"。杨增新时代结束。旋由金树仁秉政，从此新疆逐步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

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史家评述纷纭，毁誉皆有，大相径庭，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周东郊先生在评述杨增新时称："新疆是中国塞外一省……自从1871年俄人一度占取伊犁，1895年英俄私分帕米尔以来……新疆成为中、英、俄三国角逐的场所。英俄两国企图运用地方民族把中国势力逐出新疆之外。"杨氏主政新疆"十七年来，民安其生，政得其和，而且内平寇患，安置白俄，不以兵车之力使领土主权无丧，纵然不能说他是国家良吏，但比起那国内军阀混战的局势，还可以说是新疆的好官"①。

蒋君章先生在论杨增新时说："是时，新疆混乱，杨氏一一平之，外蒙独立后，派兵陷科布多，旋攻阿尔泰，杨筹防北路，卒将阿尔泰特别区收归新疆版图改为阿山道，新疆统一告成，实杨之功。民国九、十年间（1920~1921年），两股白俄窜新，数在万人以上。新省力不能敌，亦不能收容，杨一面缴其一部枪械，一面安置以监视，并约苏联军队共攻阿山道一带之白俄部队。当时局势虽紧张，而卒安定，新疆未有蒙古之续者，杨之力也。"②

洪涤尘在《新疆史地大纲》中论述："杨氏主新后，协饷断绝，其财用并不加赋而粗足。又抚驭边氓，一视同仁，吏安而民不扰。至其所经之艰险，所遇之忧患，更为常人所不能应付。如哈密之缠乱，伊犁独立，哥老会起事，外蒙进犯，俄哈窜乱，白俄侵占阿山等，处置苟一不慎，即可使全疆糜烂，疆土沦亡。然杨竟能于危急中，竭其心智，绥辑地方，保全疆土。不特使全疆人民得以安居乐土，即对于中央政府亦能使无西顾之忧。""杨氏负斯责任，不特有以爱新疆，抑且有以爱国家。"③

陈延琪先生著文《谈应实事求是地肯定杨增新的历史地位》称杨增新"是近代新疆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又是代表封建文化、封建道法和封建传统的最后一个典型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非议，而他的主要业绩却是应予肯定的"④。

方英楷先生在评论杨增新时称赞杨氏"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当时他在新疆

① 周东郊：《新疆内幕》，台湾创垦社，1952年版。
② 蒋君章：《新疆经营论》，正中书局，1936年版。
③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④ 《西域研究》1993年1期。

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从不和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没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他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粉碎了沙俄吞并新疆的阴谋，打退了外蒙古对新疆的侵犯”[①]。

笔者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封疆大吏的评述，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凡是维护祖国统一、捍卫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人物，我们就应加以肯定。相反，就应予以否定。杨增新受命于危难之秋，时值清帝逊位，中原战乱不已，无力西援新疆。当时新疆外有强邻虎视，内部困难重重，稍一不慎即会导致全疆糜烂。但杨氏能独立支持危局，统一新疆。抵御了外来势力的入侵，保障了祖国领土完整，没有订立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坚持自力更生，振兴实业，大兴屯垦，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相对稳定，是难能可贵的，功在祖国，历史是应该予以称赞的。另一方面杨增新镇压哈吐人民起义；取消了伊犁临时政府，分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独裁；愚民等，是反动的，我们全面地观察杨氏秉政新疆17年，功过相衡，看其主流，杨增新仍不失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是一个坚定的爱国将军。

杨增新时期新疆屯田统计简表

地　区	开始时间	屯田亩数	性质	备　　考
迪　化	1915	3.5 万	军屯	沙山子、柴窝堡（青圪垯湖约万亩）
	1916	4 000	民屯	三道坝
奇　台	1915	14 万	民屯	
孚　远	1916	8 100	民屯	四厂湖、五厂湖
阜　康	1916	5 000	民屯	六营湖
昌　吉	1915	23 660	民屯	十三户及二十二户地方
	1916		军屯转民屯	沙山子，亩数不详
呼图壁	1916	约 1 万	民屯	芳草湖
绥　来	1915	6 000	民屯	修新顺渠引水
鄯　善	1915	8 830	民屯	连木沁、鲁克沁、七角井等地
吐鲁番	1915	7 800	民屯	东坎儿庄、干沟等地
沙　湾	1915	20 万	民屯	大小拐

① 方英楷著：《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



续上表

地区	开始时间	屯田亩数	性质	备　考
乌　苏	1915	6 880	民屯	修车排子渠引水
塔　城	1917	约 1 200	民屯	修石厂渠、招屯民20户，户以60亩计
伊　犁	1914		民屯	整修皇渠，增加耕地亩数不详
镇　西	1916	9 030	民屯	修乔家沟渠引水
焉　耆	1917	2 万余	民屯	六十户地方
尉　犁	1915	3 万余	民屯	
若　羌	1917	不详	民屯	西乡凹石峡地方
且　末	1914	2.5 万	民屯	英尔斯塘
轮　台	1916	7 285	民屯	修新丰渠引水
库　车	1915	2 万余	民屯	修托克苏渠引水
阿克苏	1917	10.1 万	民屯	修阿瓦提渠引水
乌　什	1916	1.4 万	民屯	
英吉沙尔	1916	15 万	民屯	
巴　楚	1915	13 084	民屯	
莎　车	1915	166 000	民屯	
洛　浦	1918	39 038.5	民屯	修巷沟牙庄渠引水



第十五章　盛世才时期新疆屯垦

1928年“七七政变”后，金树仁因平叛有功，主政新疆。金树仁执政五年，“施行诸政，乖谬百出，民怨沸腾”[①]。以致兵祸几遍全疆，引起民族仇杀，土地荒芜，人口急剧下降，1925年新疆人口为268.83万，1935年减少到257.7万，人口减少11.13万。由于战乱，人民流离失所，耕地荒芜600万亩。粮食由1918年的1 453万石，下降为463万石。当然这个时期的屯垦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更谈不上什么建树了。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省开原县人。1917年留学日本大学，1919年回国后，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时军阀混战，南北对峙，盛弃文就武，考入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结识了教员郭松龄。后来郭在奉军当旅长，盛投郭任上尉参谋，1922年被郭保送日本陆军大学。1927年回国，曾任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

1929年被鲁效祖招聘入疆，遭金树仁排斥，不得志，曾任参谋、参谋主任。当哈密农民起义，马仲英入疆，金树仁的军队连遭惨败，金树仁才被迫起用盛世才，由参谋长而任东路剿匪总指挥，连战皆捷，威望日增。当“四一二政变”时，他统重兵逼近迪化，占领制高点“一炮成功”（地名。在迪化城北），金树仁被迫西逃下野，盛世才被举为督办，刘文龙为主席，从此新疆开始了盛世才时代。

第一节　平定内乱，统一新疆

盛世才上台于1933年夏，新疆的局势是：回族将领马仲英率强悍的36师万余人占领哈密镇西、木垒、奇台、吐鲁番、鄯善、托克逊；马仲英部下马黑鹰北陷阿尔泰、塔城；马全禄兵围迪化；西有张培元统兵6 000相抗衡；在南疆有铁木尔起义，



①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地方志总编室，1988年印。



联合马仲英的部将马世明，占领焉耆、库尔勒、轮台、拜城、库车、沙雅；和田被穆罕默德·伊敏占领；喀什的疏勒为马绍武所盘踞；其余疏附、莎车、伽师等地为萨比提大毛拉和乌斯满所控制。盛世才所统驭的有省军8 000人，东北军5 000人，归化军2 000人，共1.5万人。盛世才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论兵力，敌强我弱，且在态势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马仲英大兵压境，全疆烽火四起，马全禄兵围迪化，粮食只能够两三个月之需。

盛决定首先解除迪化之围，他派人收买马德祥（马全禄部下），贿重金，许高官，于1933年5月杀掉了马全禄。盛将原部驻南山柴窝铺一带的两千人马编为暂编第一师，任马德祥为师长，迪化之围遂解。

第二步，迪化之围解除后，首要的任务是反击奇台、孚远一带的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联军。盛用"联和打马"的策略瓦解了马和联盟，使马仲英失掉维吾尔族首领的支持，成了孤军，这是马仲英失败的开始。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联兵反盛，但和加尼亚孜因对马之势力日增，已存忌马之心。特别是奇台一战，马仲英将缴获的8 000支枪支、弹药无数全部独吞，和加尼牙孜大为不满。盛世才侦知，速派人与和加尼牙孜密议，许以南路警备司令之职，南疆军事行政概由和负责。和遂率部叛马而去，占领吐鲁番。1933年6月14日马仲英率步骑7 000由古城西进，盛世才率兵6 200余人东进迎击，会战于滋泥泉（阜康之东）。激战数小时，马军胜，盛几被俘，适天气突变，大雨滂沱，天气奇寒，马部衣着单薄，冻死者甚多，盛军乘势猛攻，马部大败，战死600人，降者500，逃散2 000多人，马仲英率3 000余人败退到吐鲁番。盛军收复奇台，盛率部凯旋回迪，受到盛大欢迎。

第三步，联苏反张。早在1933年5月，盛世才就派外交署长陈立德去拜会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之后盛又在家宴请孜拉肯和副领事甘宁，饭后在书房中交谈，盛将《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共产党宣言》等书展示，并说，早在学生时代就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金树仁统治下，他也秘密研究马列主义。苏联领事信以为真，将会见情况向本国政府作了汇报。其实这些书是枪杀陈中后没收来的。

6月，马世明计杀马德祥，迪化南山又为马仲英所控制，马世明出达坂城进攻迪化。7月9日，水西沟一仗，省军骁将刘快腿战死，迪化顿时又紧张起来，马仲英也招兵买马准备大举进攻迪化。这时马仲英与张培元联盟反盛正在酝酿，相约推翻盛世才后，马治南疆，张治北疆。盛鉴于形势危殆，10月，派外交署长陈立德赴莫斯科求援，11月苏派中国通布列索夫出任公使衔的总领事，10月11日盛世才率东北军攻打达坂城，大败，死伤惨重，马仲英再将迪化团团围住。

马仲英令马黑鹰由塔城南下攻乌苏、绥来一线，结果于11月在呼图壁的石梯子被省军击败，马黑鹰本人被击毙，残部被全歼。

张培元配合马仲英，率部由伊犁东进合击迪化，12月14日张培元命杨正中由精河进军乌苏，截留盛世才从苏联购买的大批武器，并向绥来进军，张培元发表

反盛通电，亲到前线督战。盛世才背腹受敌。

1933年12月苏联红军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逮捕各级官员，摧毁了张培元的大本营，前线杨正中亦吃败仗，张培元绝望，自杀身死。死前留一遗书："一误于罗部长，一误于杨正中。"1934年1月20日，省军开进伊犁，红军撤回。

第四步，全力反击马仲英，统一新疆。西线张培元失败，马仲英不知，以为省军西调，迪化空虚，亲率步骑7 000于1934年1月12日开始猛攻迪化，攻占飞机场和无线电台，省城危急，城内组织民团、商团3 000余人，手持长矛大刀，协助守城。盛世才紧急求援，正值危急之际，1月20日苏联红军2 000多人，从苇子塘进入塔城，急速南下，称"阿尔泰军"。2月3日，携大炮、装甲车进入迪化西郊的头屯河，前锋被马狙击，伤亡甚众。主力部队到达，依靠装甲车、大炮和飞机的优势，一场恶战，马仲英部死3 000余人，2月11日马仲英全线撤退。迪化之围遂解。

1934年2月20日省军和红军8 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追击马仲英残部，6日占达坂城，俘马部200余人。8日占吐鲁番、托克逊。3月13日占焉耆。马仲英在库车合并了杨正中的兵力继续西撤，一路遭受飞机轰炸，损失很大，主力留于巴楚，自己率少数部队撤回喀什。4月上旬，省军进攻巴楚，苏军毛兰诺夫骑兵团从伊尔克什塘进入喀什，与伊斯哈克别克骑兵团一起协助省军作战，马部总指挥率2 000余人投降。7月10日，马仲英从伊尔克什塘进入苏联，所遗36师由其姐夫马虎山统率进入和田地区，划和田、叶城、巴楚、于田、若羌、且末等九县为防区。盛世才给和加尼牙孜以省副主席职务，其部属由麻木提指挥留喀什，盛命刘斌为喀什司令，以监视麻木提。盛世才在消灭马仲英部之时，1933年新疆南疆还出现了两个分裂政权，一个是和田伊斯兰王国，一个是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在马仲英部和盛世才军队的打击下，这两个分裂政权仅仅昙花一现就土崩瓦解了。

8月1日迪化举行庆祝大会，宣布新疆战乱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

第二节　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盛世才统一新疆后，因长年战乱，田园荒芜，人口流失，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财源枯竭，通货膨胀，物价比战乱前上涨二三百倍。[①]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困难重重。

为了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生产，巩固政权，盛世才再次请求苏联支援，一方面借苏联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另一方面也作为对抗南京的资本，保持其独裁统治。这时苏联正在忙于国内建设，需要东部有一个和平安定的

① 《新疆之危机与解决的途径》，《上海时报》1933年12月1日。



环境,友好的近邻。盛世才标榜自己信仰马列主义,与苏友好,派人去苏联求援,斯大林欣然应允,从物力、财力、技术各方面给予支援。先后贷款750万卢布,并派熟悉新疆情况的阿不列索夫到迪化任总领事,全面负责对新疆的援助工作。派技术人员和专家来疆帮助建设,派专家斯瓦尼滋子等一批苏联共产党员来疆帮助制定"三年建设计划"。

1934年4月12日,在纪念"四一二政变"一周年时,盛世才提出了施政方略:即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仰自由;实施农村救济;整理财政;澄清吏治;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改良司法。这就是名震一时的"八大宣言"。同时提出了三大政策,即反帝、和平、建设。1935年4月12日,盛世才又提出了九项任务,除"八大宣言"内容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保持新疆为永久的中国领土;反帝反法西斯和永久维持中苏亲善政策;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很明显,"九项任务"是"八大宣言"的发展。在新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亲苏的方针。

1936年概括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作为完整的纲领和路线。以六大政策为号召,在新疆动员各族人员恢复生产,振兴经济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反帝会的章程中规定,本会的任务是:"领导全疆民众,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决意与离间新疆各族之间之和平而企图乘机攫为殖民地之帝国主义相抵抗。"是受到人民拥护的。

在苏联专家参与下,制订了新疆第一期三年计划,从1937年开始实行,集中力量进行和平建设。在阿山办金矿;拜城办铜矿;开采石油;发展交通运输;兴修水利;提倡农业,开垦荒地;整顿财政;改革税制;整顿银行;严惩贪官污吏;"贪赃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发展教育事业等等"。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较快,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从1933年到1944年耕地从463万亩,增加到1 680万亩,净增1 216万亩。1933~1942年粮食总产由463万石,增加到1 173万石,净增710万石。这是近代新疆农业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由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1935年新疆人口为257.7万,到1942年增加到373万,七年净增115.3万,也是近代新疆增长最快的时期。



图62 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

第三节　大兴水利，举办屯田

1943年"四一二政变"前，因战乱，农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到处"残垣断壁，尸骸狼藉"，耕地荒芜70%~75%，牲畜死亡300万头以上，所余不足400万头。财政的唯一来源就是发行省票，原四两省票一元，猛涨到2 000两省票才值一元。当时生产力低下，大部分是"无垄"式的农业，"把种子抛在地下，用牛羊践踏一遍，然后凭它自生自长，农民多半是用古老式的木犁来耕地"①。

盛世才面对当时的现实，经过专家们研究的结果，提出了新疆经济建设的方针："农业和牧业是新疆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第一要开发水利；第二要使用农业拖拉机，逐渐走向农业机械化的道路；第三要改良籽种和使用肥料；第四要改善耕作方法和预防虫害；第五要开辟荒田和提倡选林；第六要禁止高利贷。"②

一、号召"全省总动员，努力春耕"

为了渡过困难，恢复生产，1934年初发动政府机关人员、各团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组成春耕宣传队，下乡动员农民修整渠道开垦荒地，搞好春耕播种。要求县政工作以督促扩大春耕，招抚安插难民为首要任务。战后农民进行生产有困难，政府"实施农村救济"。1934年度政府贷籽种约4万石，耕牛1 400头，耕马2 000匹，发放补助费48万元。1935年到1939年连续贷款贷种贷耕畜，六年共计贷款3 259 000元，籽种223 000石，耕牛2 600头，耕马46 00匹。③和田地区因马虎山盘踞时间长，受害甚大，政府豁免1937年田赋，1938年无代价发给农民棉籽和蚕籽。由于采取了"农村救济政策"，生产恢复很快，1936年耕地增加216 500亩，1937年增加421 600亩，1938年增加602 801亩，1939年增加715 855亩。粮食总产由1933年的4 634 000石，到1939年增加到6 591 323石，六年增长50%以上。

二、组织军队屯田

1934年冬，盛世才将新疆2.5万人的军队，裁减1.3万人，其中部分军官到政府部门任职，绝大部分官兵进行屯田生产。

省政府于1943年冬组织屯垦委员会，其任务是：领导现役和退伍军人参加屯垦，组织屯垦军民发展农业生产，筹办屯垦所需要的物资和工具，帮助购买和使用农业机器，改良农牧业生产技术。盛世才督办和李溶省主席先后任命中将盛雨

① 李溥霖：《十年来新疆的经济建设》，《新新疆》1943年4月12日。
② 格兰纳：《高的亚洲》第三部。
③ 《新新疆》卷一。



田、王勇为屯垦委员会的委员长,少将郭锡候、袁辅三和吴义成、张希良等为副委员长。委员会下设有总务部、设计部和调查部。1935年3月,新疆屯垦委员会颁布《现役军人种地办法》。规定:(1)新疆各部队现役军人,从1935年起,都应自行种田、种菜和割草,以省公家经费,增加部队给养。(2)各部队应挑选一部分官兵,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起,按时轮流换班耕种。(3)各部队如因二十四年筹办耕作已晚,到民国二十五年,各部队必须按照十分之三的人数,到指定耕种地区,从事农作,不得间断。(4)每50人编一组,各组使用种子、牛马、农具和补助费银,由本会会同财政厅协办。(5)每10人定为一股,设股长1人;五股一组,设组长1人,组长由能干官长担任。官兵薪饷照旧发给。(6)秋收以后,应把所领籽种归还公家,其中牛马农具由各队保存,作为公物,若有遗失或损坏,责令赔偿。用久废弃不在此例。(7)各组应有收成账一本,秋收以后,各组长可以从总收入中提取25%,分赏各股士兵,再提5%,作各组长、股长奖金,其中工作组长应得5%中的三成。(8)各带队官长(旅、团、营、连长)和经营人员,对于提倡农垦确有成绩的人,应从总收入中提取5%,以作鼓励。在屯垦委员会统一指挥下,新疆驻军在各地按照规定参加了屯田生产。

同年3月,新疆屯垦委员会还颁布了《预备编余军民屯垦办法》。规定:(1)安置这部分官兵应充分供给生产资料。如愿开矿,可送阿山开金矿;如愿筑路、开渠,公家也应给相应的代价;如愿从事农垦,由本会分给土地,从事种植。(2)编余官兵,由公家拨给各人土地60亩。按20人编一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组长由原有长官担任,率兵到指定地点屯垦。屯垦三年后,官属土地拨给官兵,作为私有财产。(3)屯垦所需籽种、牛马、犁铧、车辆、农具等辅助银,由本会会同财政厅协办。公家发给带队官15万元垫款。如果各队官兵不能勤劳耕作,秋后收回所领土地和交拨各种款项,并给以相应的处罚。各队各组所领籽种,本年秋收后从所收获粮食中扣还。若遇荒灾,可以延长到第二年秋后。农具、牛马购置款,分三年偿还。(4)各队官兵给养,照旧章每天发给大小米或面粉一斤半,至新粮收获后的9月底停发。如遇荒年,可再发一年,到第二年9月底。此后停发,不再延长。(5)政府酌量发给薪饷。(6)免费发给旧军服装。(7)要求各区、县长协助,乡民支持。各屯垦官兵不能扰乱地方,刁难乡民。

1935年,省城的编余退伍官兵500人,进驻南山水溪沟一带屯田。由刘世凯任大队长,下设五个分队,第一分队97人,当年收获小麦113石。第二分队87人,当年收获小麦203石。第三分队90人,当年收获小麦135.13石。第四分队60人,当年收获170石。第五分队91人,成绩最好,收获小麦273.9石,且农具无损坏,牛马膘肥体壮,队员潜逃最少,分队长崔振统记大功一次。而一分队收成不好,分队长被撤换,南山屯田官兵当年收获小麦共895石。

第二屯垦大队到迪化北郊青圪垯湖一带进行屯田,共有退伍官兵3 005人,其中有中校1人,少校1人,尉官841人,士兵2 162人。1935年春,他们从乾德县借稻

种30石，保安局借5石，主要种植水稻，后来，他们全部归还给迪化县粮仓。[1]后来局势紧张，有的官兵被抽赴前线去了。

在组织军队屯田的同时，还组织了官警屯田生产。

1943年4月，新疆警务处官警合作社在迪化创办农场一处，耕种土地十垧，并增设缝纫部，吸收官警眷属参加工作，农场及缝纫部所得进益，均用以补助官警及其眷属之生活。

1944年，警务处与警校共种地八垧，每区局种地四垧，各县局二垧，各分所及派出所种地一垧。种植谷物和蔬菜，全疆警察机关共种地365垧。[2]

1934年冬，伊犁警备司令兼屯垦使邱宗浚组织白俄军参加屯垦生产。

1937年4月，屯垦委员会还组织省城公务员参加屯垦。以古城为第一区，绥来为第二区。在屯地设有公务员屯垦区公所，在各区设有正副区长1人，由该区耕作的公务员推选。除发原有薪金外，每月津贴80元作为正副区长办公费。

三、创办农场，示范农民

为了提高农业耕作技术，盛世才首次在新疆创办农场。

晋庸农场：在迪化北部的青圪垯湖区域，到1942年已耕种土地4 000公顷（即6万亩），要求当年生产谷物（主要是稻谷）2 000石，压种冬麦1 000公顷（1.5万亩）。该场从1938年开始，已有现代化农具。农场是引用红雁池水库的水进行灌溉，生产有保证。是新疆的重点农场。该场场长曾参加1941年11月22日召开的关于确定1942年农牧业中心工作会议，故该场以盛世才的字晋庸命名。

反帝军农场：这是一个军垦农场，位于迪化南水溪沟一带。引用乌鲁木齐河水灌溉，水源充足，土地肥沃，1938年已开始使用现代农机具，1942年种地1 000公顷（1.5万亩），要求当年生产粮食（主要是小麦）3 000石，压种冬麦500公顷（7 500亩）。

阜康农场：位于阜康县六营湖一带。土地肥沃，引用天池水灌溉，1942年已耕种土地5 000公顷（7.5万亩），主要是种植粮食作物。

吐鲁番农场：耕地面积4 000公顷（即6万亩）。吐鲁番是宜粮、宜棉，亦宜葡萄的地方，既引地面水灌溉，亦用坎儿井引用地下水灌溉。

阿山农场：1942年耕地3 000公顷（即4.5万亩）。阿尔泰地区无霜期短，宜于小麦生长，从1938年开始已使用现代化农机具。

独山子农场：位于乌苏县境，引用奎屯河水灌溉，1942年种地500公顷（7 500亩），要求当年生产小麦1 000石。

伊宁农场：1942年已耕种400公顷（即6 000亩）。伊犁河谷气候温和，雨量为全疆之冠，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1942年计划生产小麦2 000石，棉花30吨，蓖麻籽

① 方英楷著：《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50吨。[1]

此处还在塔城、特克斯、库尔勒、焉耆等地创办农牧场。

从1936年起，新疆政府开始从苏联购买现代农业机械，主要是农场和农试场使用，以提高耕作效率，向农民示范，也为农民代购一部分。1936年购进农机具2 500多架，1938年增加到20 891架，到1942年底，共购进农机具15.5万架，同时引进各种农业仪器7种，药品9种，总共用款743 500元。

这些农业机械共有48种，主要有拖拉机、单体犁、双体犁、之字耙、圆片耙、播种机、中耕机、除草机、收割机、选种机、播棉机、打粮机、粉碎机、玉米脱粒机、喷药器、铡草机、马扒等。一台拖拉机工作，可代替240个劳力。这是新疆现代化耕作的开始。要求1942年全疆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6%。

除积极创办农牧场外，还在昌吉办了农试场。在吐鲁番创办棉作物试验场和模范养蚕室。在伊犁、塔城和吐鲁番建立果树园艺苗圃。

为使全区逐渐良种化，1942年确定，由吐鲁番、喀什两地供应全疆1943年棉花良种。由和田、吐鲁番供应全疆蚕籽。伊犁、塔城、迪化供应全疆1943年乌克兰冬麦良种。

第一个三年计划期间，在全疆建立气象测候所10处，农业技术指导站27处，在第二个三年计划（1940~1942年）期间，又增加农技站17处。[2]

四、招募关内农民进疆，举办民屯

金树仁时期，新疆大乱，由于战乱和民族互相残杀，人口锐减，劳力奇缺。城市雇一工人，“其工价之高，超过机关首领薪俸金额，还找不到工人”[3]，农村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为了迅速恢复生产，除动员新疆农民兴水利，开荒种地，恢复生产外，还从关内大量招募农民进疆，兴办民屯。

1942年春，农林部长沈鸿烈到迪化与盛世才商定招募河南农民入疆。利用从苏联运进大批军援物资的回程车，由西北公路局负责运输。从西安运出92车，共4 064人，平凉运出2车共73人。到哈密73车共3 118人，其余运至乌鲁木齐。

据《现代西北》七卷二期1944年8月15日报告数字，这次进疆农民分配给迪化县2 000人，孚远县500人，木垒河300人，七角井50人，乾德600人，绥来县450人，昌吉县400人，阜康县1 100人，奇台县1 200人，呼图壁400人，合计7 000人。

1944年统计，招募进疆之垦民共38批，1 091户，4 666人。其中男2 673人，女1 993人。12~17岁827人。河南来的3 869人，山东350人。

安置难民407户，988人，其中甘肃610人，河北123人。

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行政年鉴载：“尚有垦民共10 110人，儿童500人。共

①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拨可耕熟地3.2万亩有奇。垦民住房三年共完成1 100间，其移运费用自开垦开始至三十三年（1944年）九月止，计共支付法币58 107 154元，至安垦贷款以及房屋建修贷粮等项尚未计算在内。"[①]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为了招募农民进疆，发展民屯，政府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从运输进疆，沿途接待，发放衣物，供给粮食，到了垦区后，划拨土地，修建房屋，生产贷款、贷粮，一一妥善安排，十分重视发展民屯。

1943年，政府又招募6 300人进疆，由政府拨给木材，建筑房舍，拨给土地，贷给种子、农具、耕畜。为了鼓励生产，三年之内，不征粮赋。[②]

1943年，由战时救济协会所属洛阳、济源、平陆、西安等四地的教养院征选难童474名（途中遇匪死亡2名）运往新疆，安置在哈密和吐鲁番两地。[③]

1942年，国民政府提倡开发大西北，颁布《赴新工作人员登记办法》和《待迁办法》。青年响应者甚众，仅重庆一地登记者即达5 000余人。[④]

五、兴修水利

新疆是灌溉农业，降水量极少。没有水利，就没有绿洲，没有农业。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动员全疆军民，一方面对旧渠进行疏浚，同时积极修水渠，筑水库，挖坎儿井，成效显著。据青海正闻社于1939年12月报道，第一个三年计划结束，1939年已成渠道干渠944条，可灌农田10 758 526亩，较1933年的460万亩，增加615万亩，第二个三年计划完成，1943年共有渠道1 477条，渠长32 720.5公里，可灌溉农田14 943 726亩，较1939年增加灌溉面积418.5万亩。到1944年9月，全疆共有渠道1 578条，渠长36 099.5公里，灌溉面积16 800 912亩，较上年新增灌溉面积186万亩。与1933年相比，十年共增加1 200万亩，每年以120万亩的幅度增长。其恢复之快，增长速度之高，是大兴水利的结果。各地区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1）迪化区：1939年有灌溉面积813 245亩，到1944年共有渠道193条，灌溉面积达到1 556 345亩，增长74.3万亩。五年增长90%以上。

迪化县：红雁池水库工程，引用乌鲁木齐河水，水库原有周长3公里，蓄水量为1 500万立方米，政府于1939年开始测量，1941年开始加修，由苏联工程师设计，水库完成后，蓄水量达1 900万立方公尺，可灌溉农田4.5万亩。引水渠1941年9月开工，渠长6公里，挖土石方7.5万立方公尺，流量3.5立方米/秒。放水渠及晋庸渠于1932年动工，渠长26公里，灌溉迪化北郊晋庸农场及附近农民土地，渠道流量4立方米/秒，挖土石方3.5万立方公尺。水库出水隧道长160公尺，木制水洞90公

①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方英楷著：《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社会部：《流落新疆难童急救及安置办法》，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④ 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简史》第三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尺，砖和水泥砌成70公尺，高1.25公尺，宽1.2公尺，铁制闸门，以钢丝绳连系坝顶之绞车，由绞车司其启闭。工程费用，新疆币115万元。

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在南郊柴窝堡及达坂城，修水渠7公里，可灌溉地7 500亩。

在迪化西河坝修筑河堤，长1 900公尺，保证了乌鲁木齐河下游农田的安全与发展。

阜康县：天池水库，天池又名瑶池，位于阜康县正南之天山博格达山峰之间。南北长2公里多，东西宽1公里许，面积约3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50米，蓄水1.5亿立方米。1942年，政府请苏联工程师勘测设计，于东缺口筑坝建闸，年放水量700~1 200万立方公尺，闸门由生铁铸成，绞车启闭，工程费用100万元，可增灌农田2万亩。1943年5月竣工放水，经阜康渠道，六营湖渠道灌溉阜康农田及六营湖农场耕地。

呼图壁：1939年修建了梧桐窝子渠道，引用呼图壁河水，灌溉农田。

绥来：1940年开工修建清水河子渠，于1941年完工，引用清水河子水，灌农田7 500亩，工程费用2.5万元，由农民集资修建。

吐鲁番县：1938年修建大河沿渠道，灌地4 000余亩。

2）伊犁区：1939年有灌溉面积62 507亩，经过大兴水利工程，到1944年9月，共有渠道216条，长3 917公里，可灌农田2 007 388亩，增灌面积高达190万亩。成效异常显著。

大裕农渠：1938年开工，流量32立方米/秒，灌溉农田32万亩，其中伊宁县29万亩，绥定3.2万亩，渠道土方由农民挖掘，工程费用18万元，由政府拨款修建，1940年完工。组建裕农渠保养委员会，管理渠道用水及养护事宜。

小裕农渠：水源为喀什河水，灌溉面积126 400亩，工程费用新币50万元，由政府拨款，1940年开工，1942年完工。

巩哈县：该县铁木里克地方，有荒地8万亩，1943年动员该县人民开渠17.5公里，至1944年完工。

昭苏县：农民艾孜木江自费于阿克苏河下游挖一条支渠，长15公里，灌地5 000余亩。

河南县：察布查尔大渠，多年淤塞，水量甚少，1944年发动农民整修，3月开工，5月1日完工。

伊犁区还整修了博尔博逊等11条渠道，长289公里，灌地632 185亩。

3）塔城区：1939年有干渠32条，支渠44条，灌溉面积仅55 212亩。经过五年兴修水利，有渠道140条，渠长3 673.5公里，灌溉面积增至224 338亩，增加169 126亩，增长三倍多。

沙湾县：1944年7月，成立沙湾县水利工程处，张立沛任处长，扩建该县新盛渠，干渠长34公里，引玛纳斯河水灌溉，可灌农田8万亩。后因民族军西进，工程暂

停，1946年继续施工，完工后，灌溉面积增至15万亩。

乌苏县：1949年动工修建独山子水渠，引用奎屯河水，可灌地1.5万亩，灌溉奎屯农场及农民土地，工程费用5万元，由政府拨款修建。

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还修建了谢家渠，引用四棵树河水灌溉，渠长6.8公里。

额敏县：1944年将引自额敏河水的哈萨克渠加宽并修建龙口，增灌农田1万亩。

在额敏河上开凿新渠，增灌农田3万亩。

裕民县：该县牛县长于1944年7月，发动农民在且克尔及建于寺一带挖泉眼，修建小型沟渠3 760尺，宽1丈，深5尺，引水灌溉，7月29日竣工。

4）阿山区：1944年全区有渠道86条，长3 673.5公里，灌溉面积110 323亩。

承化县：1942年开工，修建阿苇滩渠，引开拉普河水，灌地12 350亩。

巴里巴盖渠：灌地1 050亩。

沙尔哈斯渠：灌地1 000亩。

红墩渠：灌地1 100亩。

木拐图渠：灌地400亩。

克凌河渠：灌地1 356亩。

可克苏渠：灌地5 500亩。

塔尔郎渠：灌地150亩。

盐地渠：灌地600亩。

开木齐渠：灌地12 650亩。

合计，共可灌地31 306亩。

布尔津县：修渠三条，灌地6 750亩。

修建冲户河东渠：灌地6 500亩。

冲户河西渠：灌地2 050亩。

树窝子渠：灌地200亩。

吉木乃县：修渠引水，共增加灌地22 025亩。

于县城附近修渠四道：灌地4 600亩。

克克沁等渠：灌地11 400亩。

二道水渠：灌地100亩。

乌拉斯台渠：灌地3 800亩。

尚有其他各渠：灌地1 825亩。

哈巴河县：修渠增加灌溉面积共24 100亩。

于县城附近修三道渠：灌地17 800亩。

铁列子渠：灌地1 000亩。

其他各渠：灌地5 000亩。

福海县：修渠引水共增灌面积5 800亩。



上龙口渠:灌地3 750亩。

中龙口渠:灌地300亩。

其他各渠:灌地1 800亩。

富蕴县:修渠引水,增灌农田共5 750亩。

于县城附近修渠:灌地4 250亩。

哈拉春柯渠:灌地1 200亩。

二台渠:灌地200亩。

青河县:修建渠道,共增灌农田4 521亩。

于县城附近修渠:灌地1 200亩。

察汗河渠:灌地3 321亩。

于县城附近修渠:灌地3 000亩。

5）哈密区:1939年灌溉面积为60 385亩。大兴水利5年，到1944年有水渠46条,长666公里,灌溉面积达174 806亩,增灌114 421亩。

哈密县:修建石城子渠,引用石城子河水,引水量3立方米/秒,灌溉面积3万亩。政府拨款修建,农民亦筹集一部分,工程费用3万元,于1941年5月竣工。

哈密县地下水丰富,打井抽水灌溉,可增灌农田13.4万亩。开凿五道沟引水渠,增加灌地11.4万亩。

6)焉耆区:1944年共有渠道101条,长度3 244公里,灌地面积679 744亩。

焉耆县:1942年2月开工修建吐尔曼渠,次年竣工,可灌地7.5万亩。民款修建,工程费用4万元,水源引自吐尔曼坡河。

乌拉斯台工程:渠长30余公里,宽深均在1~3米,可灌田4.5万亩,1940年动工修建。

据1944年调查,全县有水渠27条,渠长1 215公里,引水10立方米/秒,灌溉面积103 607亩。

和靖县:有渠7条,渠长129公里,引水2立方米/秒,灌地19 050亩。

和硕县:到1944年共有渠3条,渠长95公里,引水1立方米/秒,灌地11 155亩。

库尔勒县:有主要水渠14条,渠长386公里,总引水量18立方米/秒,水源大半来自孔雀河,可灌农田149 426亩。计有:

大墩子渠:灌农田11 500亩。

都日必里渠:灌地17 200亩。

克藏其渠:灌地7 800亩。

沙衣里克渠:灌地2 500亩。

波斯塘渠:灌地3 500亩。

英奇克托海渠:灌地500亩。

布托立奇渠:灌地60 430亩。

其郎巴克渠:灌地4 240亩。

铁克其渠:灌地5 000亩。

哈拉苏渠:灌地2 840亩。

水磨渠:灌地4 913亩。

恰其渠:灌地475亩。

尉犁渠:灌地528亩。

以上水渠均引孔雀河水。

库尔楚渠:灌地2 000亩,水源为山水。

尉犁县:新平水渠,长124公里,引水1.5立方米/秒,灌地14 706亩,源于库尔勒河。

阿哈苏南渠:渠长34公里,引水0.15立方米/秒,灌地1 745亩,水源于孔雀河。

穷克尔河:水源于渭干河,灌地983亩。

特卡渠:引塔里木河水,灌地1 667亩。

库孜渠:引塔里木河水,灌地674亩。

英可渠:引塔里木河水,灌地555亩。

库荒渠有2条:一条渠长10公里,引水0.3立方米/秒,灌地3 286亩。

另一条长13公里,引水0.7立方米/秒,灌地7 986亩。

铁卡拉渭渠:灌地6 460亩。

以上8条渠总长227公里,引水3.68立方米/秒,灌溉面积38 062亩。

7)阿克苏区:1939年有干渠138条,灌溉面积2 961 747亩。到1944年,共有渠277条,灌溉面积3 989 622亩,五年增加灌溉面积1 027 875亩,平均每年增加20万亩。

阿克苏县:1939年开始修建由柯柯巴什村之多浪渠引水,经多思纺村通往沙雅小路共124里长,渠宽6尺,深6尺,此渠对阿克苏人民生活影响很大。

加宽扬基寒功渠道,长62公里,增灌农田1.6万亩,1944年竣工。

温宿县:1944年加宽扬基斯坦渠道,修复蒙古渠道,增灌农田1.6万亩。

阿瓦提县:1944年整修渠道,增灌农田1.6万亩。

沙雅县:1939年修卡牙河支渠,并修建龙口,增灌农田1万亩。发动农民49人参加,于1943年5月完工。

8)喀什区:1944年共有渠道136条,长3 125.5公里,灌溉面积2 250 431亩。

巴楚县:1941年3月开工修筑红海蓄水库,库容2 000万立方米,1942年4月完工,工程费用80万元新币,受益面积33万亩,可增灌地6万亩。1944年修建了引水渠,增灌农田16 000亩。

巴楚、伽师两县,利用叶尔羌河水源,开凿引水道,增灌农田8万亩。

麦盖提县:修建晋庸渠,引自莎车河水。1940年3月开工,1941年10月完工,灌溉面积10.5万亩。工程费用35万元,公款、民款合修。

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修建了引用玉河水的大渠,渠宽14米,深1.7米,灌溉农



1939年新疆水渠灌溉表

项目 区别	干渠数	支渠数	灌田亩数	地区各县
迪化区	259	518	795 245	昌吉、呼图壁、奇台、阜康、绥来、吐鲁番、鄯善、迪化
哈密区	55	47	60 385	镇西、哈密
塔城区	32	44	55 212	乌苏、塔城
伊犁区	35	44	62 507	精河、绥定、宁远
焉耆区	55	25	822 869	焉耆、新平、轮台
阿克苏区	145	439	2 989 893	库车、沙雅、拜城、温宿、乌什、柯平、若羌
和田区	124	152	1 150 818	于田、洛浦、和田、皮山
喀什区	247	985	4 803 557	巴楚、叶城、莎车、伽师、英吉沙、疏勒、疏附、蒲犁
合　计	925	2 254	10 758 526	

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5册3878~3881页资料制。

1944年新疆水渠灌溉面积、人口统计表

项　目	长渠数	长度(公里)	灌溉面积(亩)	人口数	人均亩数
迪化区	193	4 362.0	1 556 345	410 734	3.8
哈密区	46	666.0	174 806	57 928	3.0
塔城区	140	3 673.5	224 338	172 116	1.3
伊犁区	216	3 917.0	2 007 388	472 506	4.3
焉耆区	101	3 244.0	679 774.0	117 991	5.7
阿克苏	277	7 888.5	3 989 622	600 044	6.6
和田区	158	3 198.5	2 299 337	523 661	4.4
喀什区	136	3 125.5	2 250 431	957 412	2.4
莎车区	225	3 654.0	3 508 548	558 815	6.2
阿山区	86	2 370.5	110 323	82 197	1.3
合　计	1 578	36 099.5	16 800 912	3 953 404	4.3

田30万亩。

疏附县:修筑阿尔吐什河分水闸,1941年开工,1942年完工,灌地面积13.5万亩。在库尔干河修了分水闸,1940年开工,1942年4月完工,灌地面积33万亩。以上两项水利工程,均是农民集资修建,共用新币87万元。

9)莎车区:1939年有干渠63条,灌溉面积1 206 922亩,到1944年有渠道225条,长3 654公里,灌溉面积3 508 548亩,较1939年增加灌溉面积2 301 626亩。平均每年增加灌溉面积46万亩。

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修渠一条由叶尔羌引水以资灌溉塔得尔及色格地特二村的农田,可增加灌地7.5万亩。

在苏古卡克湖上修筑蓄水池,以开发卡什里克之乌斯坦渠旁农田3万亩。

10)和田区:1939年有干渠124条,灌农田1 250 818亩。到1944年共有渠道158条,长3 189.5公里,灌溉面积2 299 337亩。五年增加灌溉面积1 048 519亩。

墨玉县:1939年修建哈哈卡力渠,为解决农民灌水困难,发动农民修建水闸一处,1943年10月开工,1944年1月竣工,农民自筹资金。于1944年2月10日动工,在墨玉河上游修大堤一道,长770丈,高丈余,宽2丈,公资合资修建。

于阗县:1939年完成大渠六条:①第一区恰六等八庄大渠;②木哈拉庄大渠;③卡井庄大渠;④英阿瓦提庄大渠;⑤第二区哈提牙克庄大渠;⑥第三区亚里庄大渠。

附表1:据青海正闻社于1939年12月间报道,新疆全省已有水渠,干渠944条,支渠2 343条,共灌田11 189 420亩。其中旧渠疏浚及其灌溉面积见上页两表。

第四节 盛世才的垮台

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与苏联亲善,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对内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盛世才邀请,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来新疆工作。

1938年10月以后,先后任命周彬代理财政厅厅长,孟一鸣代理教育厅厅长,萨空了为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杜重远为新疆学院代理院长,有的共产党人还担任了行政区的警备司令、行政长等重要职务,这时共产党人为支持抗日战争,为发展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出色的工作,在群众中赢得了信任,威望日高,盛世才认为这样下去,自己的独裁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于是开始对共产党人加以排挤、限制。

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于1941年底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损失惨重。善于观察风向的盛世才,感到苏联靠不住了,这时八路军在敌后也处于困难时期,于是盛世才一反常态,由联共而反共,投向国民党。正如《祸新记》所述:



"正值苏德战争节节失利,莫斯科岌岌可危的时机,盛世才开始转变,由亲苏而反苏。这一转变是为了保持其地盘的投机行为","此时中央(指国民党中央)每来一批要人,新疆则逮捕一批案犯,以表现转变之真诚,并加强中央对彼之信任"[①]。1942年的阴谋暴动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笼的。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派人枪杀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盛世骐是他的四弟,原任督署卫队团团长,被盛世才送到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回新疆后任机械化旅旅长。他主张应与苏联友好,和中共合作,对盛世才政治态度的突然转变不满,时有规劝,盛世才甚为忌恨而枪杀。随即逮捕了机械化旅的一些军官及财政厅厅长臧谷峰、教育厅厅长李一欧、土产公司副经理肖作鑫,盛世骐之妻陈秀英,邱宗浚之妾姚执中,经过酷刑,臧谷峰等人又供出一个"阴谋暴动组织"来。据称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推翻执行六大政策的现政权,建立脱离中国的伪政权,时间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二十日的革命纪念大会上,先刺杀盛世骐,并刺杀盛世才及其他军政要人。主谋人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军事总顾问托拉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徐杰(即陈潭秋)、民政厅厅长周彬(即毛泽民)。参加的人有各地区行政长潘伯南、卢毓麟、陈方伯、于德一、赵剑峰、刘西屏,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孟一鸣,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团长赵景棠等。

1942年6月,把各地共产党员调回迪化,9月17日盛世才下令软禁全体共产党员和家属,9月27日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等被秘密杀害。这次"阴谋暴动案"涉及565人,有131名共产党员和家属被关押,判处死刑者88人。

1943年11月23日, 苏军包围并全歼了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精锐师团33万余名,苏德战场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此后,苏军展开了一系列凌厉的攻势,到1944年把德军全部赶出苏联领土,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对日寇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余人,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而华中华南战场在日军进攻下,中央军遭受重大损失。豫、湘、桂、粤、闽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相继失陷。"陪都人心震荡",善于观察形势,看风使舵的盛世才,原是想依靠国民党势力,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现在看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力量强大,盛世才便又想投靠苏联。1943年9月盛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经过观察认为"中央内部意志庞杂基础不固"[②]。"国民党所派人员源源进疆,威胁了自己的独裁统治,特别是国军移驻边防,力量雄厚,盛无权指挥,如芒刺在背,大感不安"[③]。于是故伎重演,炮制了"八·一一阴谋暴动案",亦称"黄林案"。

1944年4月17日,盛世才下令逮捕省教育厅厅长程东白,省党部委员何耿光,

---

① 《祸新记》之二,转引自《新疆风暴七十年》。

②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刘效藜:《十年边政之剖视》。

省政府秘书长刘效藜，新疆日报社社长宋会慈、副社长郎道衡等十余人，施用毒刑，迫使他们承认是受苏联和中共使命，程、何、宋三人在渝受训时，周恩来授命他们回新疆，与国民党来新疆的人员建立反盛组织，进行暴动，推翻现政权，并接受中共在新人员名单。事实上，程等在渝受训毕业是在1943年7月11日，而周恩来早已于6月28日离渝返陕。完全是捏造。

6月26日又逮捕教师、学生150余人，说他们参加了程东白的"阴谋暴动"，其中有的中学生仅十四五岁。逮捕名单有一名新疆学院学生叫高维镕，是于1943年5月游泳溺水而死，说他也参加了1944年的"暴动案"①。

8月11日，盛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逮捕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省党部委员童世荃和张志智、新疆特派公署苏联科科长丁慰慈等共百余人。以后又捕了一二八师师长柳正欣、三师师长汤执权、骑十一师师长吴熙志、骑一师师长崔颖春等人。原还准备逮捕预七师师长李禹祥，以打击国民党在新疆的武装力量。李早有准备，盛约李谈话，李称有病不去，并加强了戒备。

经过严刑逼供后，所定的罪名是，黄如今、林继庸等都是混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借派遣入新的机会潜入新疆，组织暴动。首领是梁寒操，梁在迪期间与苏总领事协议，暴动由苏联领事馆领导，由外交部特派员公署苏联科科长丁慰慈负责联络，由黄如今、林继庸负责指挥，由张志智、林伯雅等负责组织，由程东白负责联络学生，一二八师师长柳正欣负责联络驻疆部队，印刷厂厂长祁化成供给经费（印纸币）。以国民党在新人员（凡被捕者全打成共产党）为骨干，组织各方面力量，推翻盛世才政权。

国民党人员初到新疆时，对盛世才制造的历次"阴谋暴动案"都深信不疑。及至大肆逮捕学生时，大家提出了疑问。等到"林、黄阴谋暴动案"发生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历次"阴谋暴动案"就是这样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制造"出来的。

盛世才在炮制"暴动案"的同时，上书斯大林，表示要痛改前非，把请求苏军援救的密件交给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称"林、黄阴谋暴动案"中的人是日本间谍、蓝衣社成员、反苏分子，企图再次政治投机，转向苏联。斯大林这次没有上当，识破了盛世才的阴谋，将信转给重庆政府。

盛世才在给重庆政府的报告中，称"阴谋暴动案"的黄如今、林继庸等人是打进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蒋介石看穿了盛世才的阴谋，知道是借制造假案将国民党赶出新疆。于是决定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解决新疆问题。一方面令中央军源源进疆，并集中若干架飞机于酒泉；一方面于1944年8月16日命朱绍良飞迪化通知盛世才调出新疆去重庆任农林部长。这时盛世才看到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不得已，黯然离新。

① 《祸新记》之二记载。



盛世才时期的新疆民屯统计简表

年代	来自何地	人数	安置何地	屯田亩数	备　注
1942年	西安、西凉	4 137	哈密、乌鲁木齐	82 740	人种地20亩计
1943年	山西、洛阳、西安	6 774		135 480	内难童474人
1944年	晋豫鲁甘	12 656	乌鲁木齐、哈密	253 120	人种地20亩
1946年	豫甘	10 610		3.2万	
合计		34 177		403 340	

盛世才时期的新疆军屯统计简表

队别	人数	屯田亩数	屯田地点	开始时间	备　注
一大队	500	30 000	迪化南水溪沟	1935	收麦782石，人种60亩
二大队	2162	43 240	迪化青圪湖	1935	种稻，人种20亩
官警		365库	全疆各地	1944	还办缝纫部等副业

盛世才时期所办的农场统计简表

场名	年代	种地面积(亩)	收粮	备　注
晋庸农场	1942	6万	稻2 000石	在青圪垯湖地区
反帝军农场	1942	1.5万	麦3 000石	迪化南水溪沟
阜康农场	1942	7.5万		
吐鲁番农场	1942	6万		
阿山农场	1942	4.5万		
独山子农场	1942	7 500	麦 1 000	
			麦 2 000石	
伊犁农场	1942	6 000		
			棉花30吨	



第十六章　吴忠信和张治中时期新疆屯垦

第一节　吴忠信入疆主政

盛世才离新飞渝，新疆由吴忠信主政，吴未赴任前，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暂代月余。

吴忠信(1884~1959)，字礼卿，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和陈其美一道策动镇江起义，曾任贵州省主席，1936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长期主持边政。1944年由重庆飞迪，次日上任视事。当天召集各厅委处职员训话，针对盛世才的暴政，宣称："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为办事准则，以"互谅、互让、互助"三者为处世之道。并提出治新的三项措施：(1)释放盛世才统治时期被关押的人士；(2)宣抚地方；(3)敦睦邦交。于1944年10月6日决定开释270余人，其中有各民族中的著名人士，如维吾尔族的包尔汉，汉族中的刘文龙(原省主席)，蒙古族的汗王满楚克扎布，回族中的宗教界名人马良骏，以后又释放100余人，以安定民心。对赵剑峰(原行政长)、胡延伟(原督办公署中将秘书长)、杜重远之夫人侯御之等人，均予释放，并委以重任。还释放了思想进步被盛世才关押的数十名青年，并任其中十名少数民族青年为各县的副县长，他们对吴甚为感激。

迅速处理了一批积案，释放了被关押的大批国民党员，唯对关押的130多名共产党员及其家属，一个未放。

成立了以民政厅长邓翔海为首的宣抚委员会，分赴伊宁、阿山、塔城、焉耆、昌吉，以及南疆等地进行宣抚。

关于敦睦邦交，主要是指苏联。在十月革命节，朱绍良、吴忠信也亲去使馆祝贺，并恢复了中苏文化协会。



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扭转不了当时的局面。

当时新疆的主要问题是，由于盛世才的暴政与反苏，激起了伊宁人民起义。

盛世才借“阴谋暴动案”大肆逮捕少数民族的首领，使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关押了各区行政长官及一些重要官员，使政府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之中，有利于起义的酝酿与发展。盛世才原是亲苏的，所以苏军帮助盛世才打败了政敌张培元和马仲英而主政新疆，后又是靠苏联的支持发展生产并巩固统治的。1942年正值苏联困难时，盛由亲苏而反苏、反共，强令苏联专家顾问撤走，红八团回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鉴于此，苏联也由支持盛而反盛。伊宁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三区革命爆发

1943年，盛世才要求人民捐献军马1万匹，在各地成立献马委员会，指定各县应献数目，如无力献马，则需缴纳高于市价二分之一的马价。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的贫苦牧民身上，牧民们的反抗情绪迅速增长。伊宁“解放组织”决定反对献马，领导人民暴动。

1944年10月7日，巩哈县650多人的游击队包围并攻占了县城。11月7日，5 000多名游击队，向伊宁发起进攻，14日占领伊宁，15日占二台。17日巩留、新源、特克斯的官兵向焉耆逃跑。18日昭苏官兵逃跑。20日，游击队攻占霍城。12月18日占惠远。25日又占绥定。1945年1月占温泉。2月23日占博乐。至此伊犁区11个县，除精河县尚在中央军手中外，其余全被游击队占领。

如何解决伊宁人民暴动问题，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新疆省主席吴忠信两人都是主战的，积极部署军队进剿。1945年2月，吴说：“剿匪地方将士固须用命，后方一切党政设施亦须以剿匪为中心，以军事为第一，其他在所不计。”

11月9日，朱、吴决定：(1)派师长李禹祥前往伊宁主持军事；(2)派邓翔海前去宣抚，因伊宁形势严重，飞机降落无把握而作罢。11日决定以司令长官名义宣布伊宁戒严。朱绍良下令由迪抽一营开往精河，以期打通伊宁交通，相机收复博乐。

11月中，朱绍良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五路进兵伊宁：(1)五个加强连，沿迪化到霍城公路，与二台两个营会合，进攻伊宁；(2)一个加强骑兵营，从乌苏、精河南阿恰尔达坂会合原驻该处部队，从北面进攻伊宁；(3)两个骑兵加强连，从焉耆经达尕特达坂往西北过巩留攻伊宁；(4)一个骑兵加强营从阿克苏出兵，翻过冰达坂，占昭苏，从南往北攻伊宁；(5)一个加强营，沿温泉和三台海子，经阿克苏达坂，二台达坂北进，与大西沟、霍城部队汇合，从西南攻伊宁。

当时，朱、吴满有信心，朱绍良说：“伊患不平，将无面目入玉门关。”吴忠信说：“余亦无以对江东父老。”实际上，除第一、二路外，其他三路均因大雪封山，其军事

计划根本无法实行。第一路援军到了果子沟后，被游击队阻击。有的被歼，有的逃回精河；第二路有一个团的兵力，翻越达坂时，打死冻死大半，于1945年1月17日进入伊宁东30里的吉里圩子、潘津圩子一带，经过五昼夜战斗，全军覆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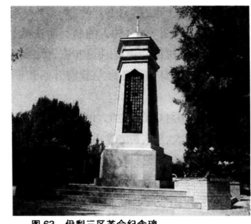


图 63　伊犁三区革命纪念碑

1945年1月28日晨，游击队对中央军的据点发起总攻，29日朱始命副师长杜德孚率部突围，在伊宁西北35公里的皮利清沟，杜德孚战死，全军覆没。是役共打死驻军1 532人，俘3 776名。缴获步枪2 000多支，轻重机枪98挺，迫击炮5门，飞机54架。

1944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伊宁成立，泛突厥主义者艾力汗吐烈任主席。临时革命委员会于1945年1月9日通过了宣言，共九条：其中有"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解放独立的共和国"。很显然宣布脱离中国是违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后来，经过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人的斗争，改组了临时政府，撤销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

1945年4月8日，三区民族军成立，波里诺夫任总指挥，部署三路出击。

北路

1945年7月中旬，由民族军总指挥波里诺夫率领一支队伍，从三台出发，经博乐向额敏进军，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7月29日攻克额敏。7月30日，民族军抵塔城南郊，全城惊恐，驻军官兵缴械进入苏境，随行群众1.4万余人，随即塔城、裕民相继为民族军占领。民族军于8月21日出兵占和丰，继续北上，8月31日克哈巴河。9月2日克布尔津。9月5日与达里力汗游击队会合，猛攻丞化。专员高伯玉、师长宛凌云无力抵抗，于6日晨2时，向外蒙方向撤退。在行至丞化以东之乌尔美盖达坂时，遭伏击，被迫缴械投降，共有军官152名，士兵1 684人，9月13日阿山全部被占领。

阿山战役后，波里诺夫率绥定步一团、塔城骑六团、蒙古骑兵营和警卫营共4 000余人南下。9月5日对乌苏发起猛攻，8日攻克，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俘驻军1 000余人。9月12日占安集海，16日占沙湾。

9月初，民族军在攻打乌苏的同时，出兵攻精河，在精河驻守的是由四十五师师长郭岐指挥的部队7 000余人。8月民族军发起总攻，中央军东撤，19日在奎屯、安集海之间全军覆没。精河战役，民族军俘驻军3 000多人，少将师长郭岐亦同时被俘，缴大炮21门，机枪38挺，及大批枪支弹药，至此民族军进至玛纳斯河岸以西。

南线

1945年4月9日，民族军官突袭了巴音和硕，以后又进攻哈尔尕图达坂，袭击乌



瓦门,激战数十次,后退去。

由阿巴索夫率领150人的骑兵游击队,8月15日占拜城。8月26日攻占要隘库尔干,缴获轻重机枪17挺,步枪170支,俘115人。6日攻克温宿。9月7日攻阿克苏,久攻未下。10月12日鉴于三区与政府开始和平谈判,遂从南疆撤退。

蒲犁

1944年6月中旬,120人的游击队阻击政府军的运输队,夺取130峰骆驼的粮食,俘士兵4人,8月下旬攻占蒲犁县,成立了革命政府。1946年1月2日占领叶城,4日占泽普。16日攻莎车不利,退回蒲犁。

到1945年9月,三区民族军已取得数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部占领连成一片,部队推进到玛纳斯河以西,与政府军隔河对峙,距迪化仅140余公里。在南疆解放了蒲犁,正向喀什、英吉沙尔方向发展,解放了拜城、温宿,包围了阿克苏。烽火几及全疆,在精河战役中,四十五师全军覆没。师长被俘,大批难民东逃,迪化情势危急,人心恐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急电蒋介石:"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唯有一死殉职。"1945年1月7日,吴忠信致电中央谓:"新疆军事已到严重阶段,其成败在于后方勤务与对苏外交。"吴此时认识到,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再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靠战争的办法行不通,需改用和谈和外交的手段。1945年夏,吴去重庆时,曾向蒋介石建议由张治中主持西北。

第三节　张治中入新,联合政府成立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扬州起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37年任第九集团军司令,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1940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

1945年8月下旬,中央政府任命郭寄峤为第八战区参谋长兼副长官,拟将朱绍良调离新疆。8月26日,蒋介石命张治中去新疆,研究解决事变问题,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考察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

1945年9月13日下午,张治中一行九人,到达迪化。当晚即与朱绍良、吴忠信、郭寄峤、李铁军、马呈祥、刘泽荣等人会晤,对新疆的军事、政治、外交等问题进行商讨。结果认为,从目前情况看,用军事解决问题毫无希望,因为守备迪化之兵力不足,只有六个营(包括中央第九分校的一营学生在内),且官兵士气低落;军粮储备仅足敷一二日之需,民粮紧张,运输力不足,万一交通被阻,即有断炊的危险;市井纷扰,人心恐慌;后方防线过长;防务空虚;只有用政治方式解决。

9月14日张治中会见了苏驻迪总领事,希望苏联能出面调停。15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德洛夫向中国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有自称新疆暴动之人民代表向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回民在新疆占多数之地区如

伊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之目的。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于是在苏联的斡旋下，政府与三区开始了谈判。

1946年3月28日，《国民政府公报》命令：“特派张治中为军事委员长西北行辕主任。”3月29日《国民政府公报》命令“新疆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吴忠信另有任用，吴忠信应免本兼各职，所遗新疆省主席职务派张治中兼理”。4月4日张治中抵迪化，4月8日就任，4月10日陶峙岳任新疆警备司令，开始了张治中治新时期。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由战争转入和平。张治中对伊塔阿三区，主张和平解决，反对用战争的办法。提出“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八字治新方针，必须戒除贪污、赌博、鸦片三件事，加强中苏友善。与三区经商定双方部队后撤，停止敌对行动，撤除玛纳斯河警戒线，恢复迪化和伊犁之间的交通和贸易。三区释放战俘3 420余人，师长郭歧、宛凌云同时放回。

2)释放一切政治犯共519人，其中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131人，张治中派人护送回延安。三区释放被押国民党工作人员130人。

3)撤销警务处，清还以前没收被害者的财产。

4)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按照和平条款，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名额为25名，其中10名由中央直接派定，6名由三区保荐，9名由七区保荐，中央任命。1946年6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新疆省主席，由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兼任；副主席：阿合买提江，维吾尔族，三区代表；副主席：包尔汉，维吾尔族。1946年7月1日，省政府正式成立，新任政府委员宣誓就职，颁布了施政纲领。

对于“和平、统一”，政府和三区的代表均表赞同，但对“统一”的贯彻，则各不相同，张治中欲通过统一，逐步取消三区。而三区则图通过统一，派干部进入七区发动群众，壮大三区力量。在联合政府中，有联合，有斗争，且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有时隐蔽，有时公开，有时缓和，有时激烈，后来省主席由张治中(兼)，换为麦斯武德，又换为包尔汉，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才真正实现了和平、统一。

第四节　不景气的屯垦和水利

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新疆烽火四起，农民流离失所，土地大批荒芜，农垦萎缩，农场解体，现代农业机械大部废弛，生产大幅度下降。1942年新疆粮食总产11 735 380石，到1949年下降为5 651 616石(每石300斤计，合16.95亿斤)，七年减产6 083 764石。为了解决粮食紧张，这一时期也修了一些水利，办了一些屯垦。

一、焉耆军队屯田

1944年11月27日，焉耆专员纪凤楼转发《新疆省驻军屯田办法》15条中规定：



"凡在本省境内驻军或地方团队,在不妨害作战及战事准备之范围内,又无机动任务时,均可就地实施屯垦,屯垦之土地分两种:①官有荒地;②无主耕种之土地。土地由政府分拨。垦荒所需农具由省政府拨款购置,种子由政府借给,秋后归还。屯垦之官荒地在一二年内免收田赋,于三年起照章升科。收获粮食,20%拨给农垦官兵,其余转作军粮。"驻焉耆一二八旅所属三八三团在和靖,三八四团在宝浪苏木,骑兵团在焉耆城北等地。开垦官荒和无主土地近万亩。收获20%补贴部队口粮,对改善部队生活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余转作军粮。

二、成立新疆军垦处

1945年初开始,迪化粮食供应异常紧张。1947年1月1日,张治中命成立军垦处,称西北行辕军垦处。处长王信文(少将)、副处长刘臻(少将)、涂治(农业专家)。下属垦务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中队屯垦于迪化西北黄水槽子一带;二、三中队屯垦于迪化北青圪垯湖一带;四中队位于乾德县长山子一带;共有屯垦人员千余人,其中军政官员百余名。垦员多系招募而来,多是汉族。生产费用及工具由军政部拨发,主要生产工具有盛世才买苏联的拖拉机2台,马拉收割机、洋犁等,还有马110匹,牛100头。

1947年开荒1.2万亩,播种6 000亩,收粮5 000石。1948年屯田人数增至1 500余人,播种7 000多亩,收粮7 000多石。1949年屯田人数减为700余人,播种7 000亩,收粮9 000多石。从1948年起,用拖拉机开荒10万亩,大部租给农民耕种,所收粮食除自用外全部上缴。

三、兴修水利工程情况

这一时期,水利工程废弃的多,兴修的少。主要有:

1)继续加修红雁池水库。1946年蓄水1 600万立方米,可增灌面积5万亩。

2)吐鲁番:由于历年大修坎儿井,年增40余道,水量大增。1946年高粱丰收,增产3万余石。

3)焉耆:农民开渠引包头湖水,可增灌农田4.5万亩。

4)伽师县农民用工2 500个,挖渠一条。长250米,宽2米,1945年1月完工。

民国后期的新疆屯田统计简表

地区	年代	屯田人数	屯田亩数	收粮	性 质	备 注
迪化	1947	1 000余	6 000	5 000石	军屯	青圪垯湖地区 乾德一带
	1948	1 500	7 000	7 000石	军屯	
	1949	700多	7 000	9 000	军屯	
焉耆	1945	一二八旅 3个团	1万余	不详	军屯	



第十七章　新中国屯垦事业的建立

当代新疆屯垦，主要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此之前，新疆和平解放。共和国宣布诞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胜利进驻新疆各个地区，新疆各族人民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新疆屯垦也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在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认真分析了新疆的形势，借鉴历代屯田戍边的经验，为了祖国西陲的长治久安，决定在新疆大兴屯垦戍边事业。从那个时候起，百万军垦战士便数十年如一日，战斗在天山南北，忠实地执行着这一方针。在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军垦战士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以大无畏的精神，忍受和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2007年底，已开垦土地1 044.48千公顷，大型垦区13个，国营农牧企业179个，还拥有2 909个工矿企业，商业机构1 156个和大批科研机构，总人口258.47万，职工90余万，现已形成党、政、军、企一体，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联合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仅是发展新疆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新疆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巩固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更是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其规模和发展速度，数十倍于汉、唐、清时代的屯田戍边。到现在为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历了六个阶段，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生产建设兵团事业开始奠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建设正规化的国营农场；兵团事业大发展；文化大革命，兵团各项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兵团撤销；恢复兵团体制，兵团的事业进入新的阶段。概括地说，可以分为：艰苦创业，奠定军垦事业的基础时期；大发展时期；遭受挫折，兵团解体时期；兵团恢复，振兴军垦事业的时期。



第一节　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疆

1949年3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中央领导人，已将进军新疆的任务交给了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鼓励他以“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将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新疆问题如何解决?党中央作了两手准备，即用战争的办法与和平的办法。积极做工作，力争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至于何时进军新疆，原安排在1950年初。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党内指示，其中关于1949年的任务时讲到：“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则是全部”[①]。同年5月，中央军委在部署进军任务时说：“一野（四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②]很明显，中央将进军新疆的时间安排在1950年初。

毛泽东朱德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复电

这份档案是1949年9月28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回答新疆军政当局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等9月25日及26日起义通电的复电

图64　毛泽东、朱德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复电

1949年6月，以刘少奇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会谈时，斯大林提出，据可靠情报，美英帝国主义企图拉拢西北“五马”（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马鸿宾、马呈祥）的主力，退到新疆与当地的反动势力结合，搞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宣布与中国脱离关系。据此，斯大林建议我军“加速进军新疆，并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338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338页。



图65 甘新交界星星峡

可利用三区这支力量，要我们派人联络”①。于是中央决策将“五马”主力于甘、青、宁间就地歼灭，提前解决新疆问题。

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将军指挥下，于5月下旬占领西安，大军神速西进，与马步芳主力决战于兰州城下。一野二兵团、十九兵团，经过鏖战，反复拼搏，于8月26日攻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兰州，歼灭马步芳主力4万余人。一兵团9月5日克西宁，随即翻越常年积雪的祁连山，直插河西走廊。二兵团沿兰新公路向西北追击，越乌鞘岭，经山丹，17天前进700公里，于9月21日与一兵团会师于河西走廊重镇——张掖。退集酒泉地区的西北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九十一军、一二零军等共4万余人，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击溃。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云集河西走廊，直叩新疆大门。1949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召见张治中将军，告诉张：“一野彭德怀司令员已指挥二兵团由兰新路向河西走廊追击。一兵团由青海翻越祁连山，直插张掖，以解决河西问题，然后会师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将军能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最好。”张治中将军欣然应允，于9月10日致电给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9月17日，陶、包复电：“……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②当时，新疆情况复杂，有的主和，也有的主战，迅速分为两派。主战的有骑一师（原骑五军）师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及阿尔泰专员乌斯满（哈萨克族）等人。主和的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副司令兼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总部政工处处长梁客浔以及省主席包尔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人。两派就和与战的问题，进行着隐蔽的、公开的、激烈而尖锐的斗争。

主战派主张将部队拉到新、甘交界处的星星峡一线设防，阻止解放军进疆。如此计不成，就平毁新疆东部公路沿线的城镇和乡村，把此地变成“无人区”，然后退据南疆，依托天山、昆仑山进行长期周旋。③

① 《新疆革命史参考资料·访问材料汇编·邓力群同志谈三区和新疆和平解放》。
② 以上见《张治中回忆录》。
③ 王震：《英勇奋战，进军新疆》，载《战旗映天山》。



8月下旬，陶峙岳将军找叶成将军、马呈祥将军和罗恕人将军恳谈："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能干涉他人的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不赞成和平，那就是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券，后勤供应有保障，方能应战。我们新疆部队号称十万(实际只7.1万多)。但只能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新疆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需要和平方式，也就是用政治方式解决。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们不采取主动，求得和平解决，将使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到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叶、马、罗觉得有理，低头无言，没有争辩。

9月19日胡宗南将军致电叶成："将新疆部队移到南疆待命。如陶不走或阻止撤离，可作断然处置。"叶、马、罗接报后，密商决定于20日子夜开拔，行动前先将刘孟纯、屈武、陶晋初等主和人物逮捕，胁迫陶峙岳随部队转移。陶得悉后，连夜召叶、马、罗来谈，语极恳切，陶问："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况特殊，一声枪响，能保住地方不乱?这样对你们有什么便宜?""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是非，是非常危险的。目前整个局势，你们是清楚的，部队开拔要钱要油，现在是一无所有。"[①]又说："新疆连军政人员在内，总数不下十万，我怎能把他们扔在戈壁上不管。你们是不能这样干的，今天不是你们和我几个人的事，是十万人的生死问题，如处置不当，对十万人如何交待?"[②]叶、马、罗听到陶的分析，确是实情。东有解放军大军压境，西有"三区"民族军，北是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有常年积雪的昆仑山，如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部队没有开拔，人也未捕，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后经多次商谈，陶提出："如愿离开部队出走，可给予重金，并保证其安全。"不久，叶成接到他父亲来电，说家属已安抵香港，解除了后顾之忧，表示愿交出部队，随后叶、罗也表示同意。遂于24日、25日三人带黄金千两离迪由南疆出国。

9月25日，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签名的还有：副总司令兼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旅长钟祖荫、李祖唐、田子梅、郭全梁、韩荣福、朱鸣刚、罗汝正、刘抡元、杨廷英，马平林。26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也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9月27日，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向全疆发布了《新疆警备司令部、新疆临时人民政府布告》，约法八章，要求全省军民，同心协力，防止破坏，稳定新疆局势。但由于新疆幅员辽阔，交通不便，驻军分散，关系复杂，加之通讯落后，军政当

① 陶峙岳著:《新疆和平解放纪实》,载《兵团史志通讯》,1989年第2期。
② 《张治中回忆录》。

局难以控制。9月27日夜，原驻哈密的一七八旅五三三团部分官兵发生叛乱，抢劫哈密银行，一些商号和居民也惨遭洗劫。同日，原驻景化(现呼图壁县)的一七九旅六团一连长反对起义，枪杀营长李明海。相继鄯善、轮台、吐鲁番、库车、绥来(现玛纳斯县)、迪化(现乌鲁木齐)亦相继发生杀人、抢劫、放火、奸淫妇女等事件。是时，一些部队不稳，社会秩序混乱，群众一日数惊。包尔汉紧急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希转饬西北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望。"

据此，中央和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决定从速进军新疆。酒泉武威距迪化1 200多公里，路途遥远，地广人稀，有荒漠戈壁阻隔，加之，水源奇缺，大部队行军困难重重。特别是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边境线长，情况复杂，必须进行认真准备。

中央军委于9月24日，命令原二兵团六军转隶一兵团建制，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徐立清，率二、六两军进军新疆。

8月中旬，中共中央命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携带电台，从苏联赴伊宁，与"三区"革命领导人接头，建立"三区"同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以配合进军新疆的部署。

部队深入进行民族政策的学习。教育部队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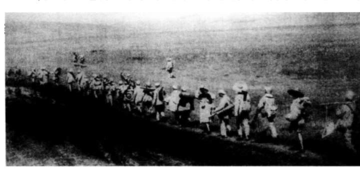


图 66 1949 年 10月二军向南疆进军

绍了新疆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情况，要求每一个指战员都要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

在陕甘地区，广泛招收各类技术人才，为开发建设新疆进行准备，仅在武功农学院、兰州大学等学校就招收了200余名学生参军进疆，后来都成了兵团生产建设的骨干。

当时，塞外已近寒冬，在各族人民大力支援下，迅速筹集了粮食3.3万吨，饲料380吨，牛肉35吨，棉衣、布鞋、褥子、挂包、水壶、风镜、皮帽各10万件，皮衣5万件，帐篷1 000顶。军委从华东调来两个汽车团，华北调来一个汽车团，共500余辆，负责物资运输。二军及战车团10月20日前，六军于11月1日前，全部准备完毕。

10月5日，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到酒泉，向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将军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商讨了人民解放军进疆及起义部队的整编问题。陶峙岳应邀向一



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和师团领导干部作了关于新疆情况的报告。

10月1日，在酒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向二、六军指战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关于向新疆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同志要求一兵团进新疆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团结与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自己幸福的生活，使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团结的大家庭里"。王震司令员号召全体指战员："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向帕米尔高原。"命令下达后，部队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向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10月10日，这支劲旅经过短暂的准备之后，即离开古城酒泉，踏上了进军新疆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征途。

按照当时中央军委的部署，二军在郭鹏、王恩茂将军率领下进驻天山以南各地(即南疆)，直至帕米尔高原；六军在罗元发、张贤约将军的率领下，进驻北疆各地。大进军除了由斯大林支援的40架飞机空运一部分部队进驻乌鲁木齐以外，其余大部分部队要由汽车运送；还有一部分要徒步跋涉，直奔目的地。根据这一部署，各路大军齐头并发。天上飞的、地下走的，一齐向祖国的边陲宝地新疆进发。对这一气势磅礴的大进军，王震同志有诗曰："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这首诗无疑是鼓舞了西进大军的将士们。

整个进军过程，历时三个月，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季节，进疆部队一面长途跋涉，一面沿途平息叛乱。



图67　人民解放军进疆

一兵团指战员向新疆各地进军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少数顽固分子在一些县镇发动了叛乱。进疆人民解放军边行进、边平叛，迅速稳定了局势，保卫了和平起义的成果，粉碎了美国和国民党残余妄图阻挠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的阴谋。

哈密叛乱：1949年9月27日深夜，驻哈密的原国民党一七八旅五三三团部分官兵，在国民党特务及反动军官煽动下叛乱。抢走哈密银行金库库存金银12箱，以及由兰州运来的黄金16 000两。一些商号和居民也遭洗劫，当时全城大火，通往外地的电线被切断。进疆部队二军的炮兵团、五师十四团闻讯后火速赶到哈密，包围作乱部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严惩了祸首，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鄯善事件：10月16日，二军四师十二团抵达鄯善时，原国民党六十五旅一九四团团长丁少斋、副营长陈华率部分士兵发动叛乱，枪杀欢迎解放军的县长司马

义。叛乱分子在城内大肆焚烧、抢劫。四师十二团将其包围缴械，首要分子押送迪化，叛乱始平。

七角井事件：11月18日，原国民党驻该地之一七八旅两个营，劫去二军东返运兵汽车40辆，将车和人扣留，经多次交涉无效，其旅长也不能节制其部队，19日解放军发现该部昼夜作工事，有叛变企图。24日晚，人民解放军以五个营兵力突然将其包围，令其旅长亲领人民解放军入营，将人和车释放，并将这两个营全部缴械，主犯予以处治。

轮台事件：10月5日至28日，原国民党驻轮台一二八旅三八二团一营3个连，团直3个连，连续对各族人民大肆烧杀，抢劫财物，强奸妇女，23天之中共烧死、活埋群众23人，打伤、烧伤群众150多人，抢劫群众元宝200多个，羊5 000多只，牛500多头，马580多匹。解放军四师赶到后，立即解除叛乱部队武装，追回其抢劫财物，归还群众，并对死难群众家属进行安抚，严惩首恶分子。

除了这些之外，吐鲁番、焉耆、库车、呼图壁、绥来及迪化等地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叛乱，这些叛乱均在人民解放军的声威威慑及起义部队的配合下，一一被平息。

五师十五团从吐鲁番下车后，即徒步行军，于11月28日到达阿克苏。这时，一小撮反动分子在和田策划叛乱。为制止反革命暴乱，维护社会安定，12月5日，政委黄诚奉命率十五团南下，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他们冒着严寒，战胜干旱、缺水和风暴的袭击，经过18天强行军，跋涉1 550里，于12月22日解放了西北最后一个重镇——和田，粉碎了敌人的暴乱计划。二军进至哈密后，看到部分维吾尔族群众遭劫后缺衣少食，生活困难。指战员便节约自己的口粮、衣物，救济受难群众。由于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部队每到一地，都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称人民的军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

起义部队骑七师中的少数敌视社会主义、敌视共产党的军官。这些人与乌斯满、尧乐博斯相勾结，利用部队中的宗教关系在一些城镇发动叛乱。如1950年3月以来，骑七师驻昌吉、阜康、木垒河的特务营、二十团、二十一团、十九团先后叛乱十余起，参加叛变的共12个连1个排，1 930余人。他们杀害解放军派来的政工干部，公开打出反革命旗帜，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并扬言：“只要乌斯满配合，就能拿下迪化。”对于这些叛乱，均在新疆军区的统一部署下，委派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师的政委袁学凯率部平息，叛军大部被歼，匪首冶生林被击毙，马占林被活捉，粉碎了叛军与乌斯满联合作战的计划，一些被裹胁的士兵，又重新回到人民部队中来。

在国民党骑七师部分反动军官发动叛乱的同时，政治匪帮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也发动了暴乱。这一股匪帮因受美国支持，流动性大，所以对各族人民和驻疆人民解放军的威胁更大。人民解放军为平定这些人的叛乱而付出的





图 68　十七师剿匪部队露营，在石板上烙大饼

代价亦大。

乌斯满（哈萨克族）是北疆有名的惯匪。三区革命时，曾窃居阿勒泰专员职务，暗中和国民党勾结，对抗三区革命。1947年曾在阿山地区抢劫82天，近2万人的青河县几乎被掳掠一空。1949年9月20日，新疆起义前夕，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潜入奇台，和乌斯满秘密勾结，策划乌斯满匪帮联合骑七师少数反动军官组成反革命武装，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建立封建宗教政权。

1950年3月，台湾蒋介石委任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勾结贾尼木汗（哈萨克族，原新疆财政厅长，反对起义）、尧乐博斯（维吾尔族，是乌斯满的结拜兄弟，国务党特务，任哈密专员），疯狂地掀起了反革命叛乱。他们在哈萨克群众中造谣说："汉族人要消灭宗教，捕杀头目，财产充公，没收牛羊，要强征哈族姑娘给解放军战士当老婆，强征哈族青年到苏联去做工。"匪势盛时，曾胁迫群众达3万余人。从3月到12月，他们先后抢劫、残害群众230多次，残杀各族人民群众1 175人，抢劫各种牲畜34万多头。7月，景化（呼图壁）原国民党县长乌拉孜拜也在迪化南山响应乌斯满，发动叛乱。乌斯满匪帮的这些叛乱活动使新疆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纷纷要求解放军为民除患。

为了平息反革命叛乱，保卫祖国边疆安宁，中共新疆分局以王震同志为平叛的总指挥，动员全疆军民，协同行动，以人民解放军六军的部队为主，配属战车团和第五军（民族军）40团，与驻疆各部队相配合。六军军长罗元发任前线指挥；十七师师长程悦长负责西线；十六师师长吴宗先负责东线。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剿匪部队历尽千辛万苦，首战甘河子，围歼红柳峡，奇袭北塔山，激战冰达坂，先后五次横穿人迹罕至、荒漠无水的500里将军戈壁，作战百余次，对匪徒穷追猛打，直到1951年2月，终于彻底消灭了这股政治土匪。匪首除尧乐博斯逃往台湾、乌拉孜拜投降外，乌斯满、贾尼木汗等先后被解放军活捉。这次平息叛乱中共解放牧民23 000余人，为群众夺回牲畜17万多头。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在剿匪中牺牲，十七师四十九团教导队队长武志春率七连战士百余人在奇台以北沙漠中的旱沟进行战斗，因中敌伏击，武和战士大部壮烈牺牲，幸存者仅十数人。匪徒们对解放军战士有的挖眼睛、割舌头、割生殖器，有的剖腹将肠子拉出来，惨不忍睹。

3月29日，尧乐博斯纠集匪徒700余人，包围了伊吾城。人民解放军十六师四



图69 六军十七师剿匪中餐风卧雪

十六团二连在战斗英雄胡青山的指挥下，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40天。先后打退匪徒的八次大规模进攻，终于战胜敌人，保卫了伊吾县城。西北军区和一野授予该连“钢铁二连”的光荣称号，授予胡青山光荣的“战斗英雄”称号。

12月7日，第一兵团部队与三区民族军及新疆和平起义部队，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胜利会师。1950年1月中旬前，大部进入指定驻防地区。

1950年1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命令：原民族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共1.5万人。军长列斯肯，政治委员顿星云、副军长马尔果夫，副政治委员曹达诺夫，军部驻伊宁，下辖十三师和十四师。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1949年12月29日，举行了二十二兵团成立大会。中央军委任命：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震(兼)，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下辖第九军的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以及兵团直属的骑七师、骑八师。

第二节　驻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电报指示，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11月，新疆分局组成，王震任书记，徐立清任副书记。11月28日至12月3日，彭德怀、张治中、王震在迪化邀请各族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协商组织省人民政府。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及中央人民政府11次政务院会议通过，新疆省人民政府于12月7日宣布成立，包尔汉任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西北野战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后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张希钦任第一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边境线长5 400多公里，在国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重兵驻屯。但当时新疆经济凋敝，生产落后，1949年全疆工农业总



产值仅7.2亿元(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农村平均3户农户只有1头耕畜,9户农户只有1辆木轮车,2户农民只有1把坎土曼。由于耕作粗放,产量很低,1949年粮食总产16.96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95.7公斤。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证近20万部队所需的10万吨粮食,保证城镇居民的供应,并把旧政府的4.5万多人员包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若从关内运粮,从兰州到哈密,运价等于粮价的7倍;从苏联进口,如每吨粮以300卢布计,需3 000万卢布,所以,经济问题是当时新疆存在的首要问题。

粮食问题不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就站不住脚。新疆分局分析了这一形势,决定在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除调部分兵力守卫边防、剿匪平叛、维护社会治安,另派8 000余名官兵协助地方建党建政外,以主要力量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艰苦创业,屯垦戍边。

第三节　艰苦创业的三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还是一支生产军,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1950年1月21日,王震将军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全新疆部队19.3万人,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服卫戍勤务者外,必须发动11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要求当年开荒种地60万亩。于是,这支久经征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曾经参加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英雄部队,征尘未拂,汗渍未除,就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王震将军的命令,分别开进了亘古荒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当时,二军战士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六军和二十二兵团战士向准噶尔大戈壁进军;五军在伊犁河谷屯田。他们一手持枪、一手拿坎土曼,在亘古荒原上,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因为是茫茫的荒原,民房极少,帐篷不够,所以战士们就在冰天雪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搭上柴草,覆上泥土,以避风寒。另外由于军费紧张,连队几个月没有经费,有的部队有50天以上用盐水和辣椒面下饭;因为没有碾子和石磨,有些单位只好煮麦粒和玉米充饥。战士们凭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饥饿寒冷和恶劣的条件下,努力克服困难解决农具奇缺的问题。例如:各军、师都搜集报废的汽车和破铜烂铁,抽调会打铁的战士,自己锻造坎土曼和其他农具。自己制作扁担、筐子,用芨芨草搓绳子。开荒时干部、战士一齐上阵,并肩战斗。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亲自开荒种棉花。政治部主任左齐,战争时期失去了右

臂，无法劳动，但他经常深入部队，鼓动战士发扬南泥湾的精神，艰苦创业。六师师长张仲瀚背上粪筐拾粪。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的行动，鼓舞了战士的劳动热情。沉睡千年的处女地上，第一次荡漾着人民战士愉快嘹亮的劳动歌声："八人拉犁气死牛，芨芨搓绳不发愁。不怕苦，不畏难，戈壁滩上盖花园。"新的明天在召唤着建设者。六军战士王生荣，干什么活都是"一顶俩"。挖水渠时，地还冻得坚硬，他每天挖渠50米，成为六军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特等模范、五师十四团班长何泽第，每天开荒2亩多，还组织全班互相帮助，创造了全班每人平均开荒1.2亩的纪录。战士们编了快板歌唱他们的班长："何泽第，火车头。你在前面猛加油，我们紧紧跟着走。"

新疆军区宣传部部长、诗人马寒冰创作的歌词《戈壁滩上盖花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部队艰苦创业的情景，热情地歌颂了战士们的英雄气概：

劳动的歌声漫山遍野，
劳动的热情高又高，
生产劳动猛烈地展开；
困难把咱们吓不倒。
没有工具自己造，
没有土地咱们开荒。
没有房屋搭起帐篷，
没有菜蔬打野羊。
修水渠，打田坎，
三天三夜不合眼。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
戈壁滩上盖花园。
好瓜好果大家尝，
好米好粮快入仓。
人民向我们欢呼，
祖国给我们勋章。
这是无比的奖赏，
这是不朽的荣光。

大生产的第一年已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全军区共开垦农田83万多亩，超额完成40%的计划。收获粮食3 427万公斤，棉花37.5万公斤，油料186公斤，瓜菜2 254.5万公斤，造林1 065亩，年终牲畜存栏18万头。生产的粮食足够自给7个月，油料蔬菜全部自给。六军五十一团一连粮食可自给三年，二军十八团粮食可自给一年半。二军十八团班长宋献银全年开地85.3亩，收获粮食可自给11年。维吾尔族群众



竖起大拇指说："胡达(伊斯兰教义中的上帝)跑到解放军地里去了。"

1951年全军区播种面积89万亩，收获粮食4 450多万公斤，比上年增长了37%。共收皮棉55万多公斤，比上年增长了62%。

1952年全军区生产又有更大的发展，播种面积扩大到162万亩，比1950年增加近1倍。其中民族部队第五军播种35万亩。十八团的战士，为了突击春播，每天劳动11小时，星期天也不休息。这一年驻疆部队共收获粮食9 500多万公斤，比1950年增加6 000万公斤；棉花总产334.5万公斤，比1950年增加300万公斤，增长9倍；油料总产近500万公斤，达到全部主、副食自给。巩乃斯河畔的十五师骑兵团四连，粮食可自给13年，开都河北岸的二十七师八十一团马得如小组10亩冬小麦丰产田，亩产达688.85公斤。另外，驻疆部队还有牛3万头，羊55万只，猪3.5万头，禽5.2万余只，保证了部队的肉食供应。



图70　二军工作队在南疆农村

玛纳斯河流域棉花丰收

1953年春节期间，王震将军专程到石河子与陶峙岳、张仲瀚、陶晋初、刘振世、罗汝正及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研究玛纳斯河流域棉花丰产问题，商量并签订了棉花生产合同。合同规定：王震负责组织领导，陶峙岳、陶晋初负责物资保障，迪托夫负责技术指导，刘、罗二师长负责保证技术措施的贯彻执行。要求在2万亩棉花田上，亩产籽棉达到200公斤，迪托夫制定了丰产措施，要求深翻土地、密植，每亩保苗7 000~10 000株，以沟灌代漫灌，使用颗粒肥料和化肥，及时进行中耕、追肥、整枝、打顶等一套新技术。认真地进行技术培训、典型示范，要求干部和党员带头贯彻新技术。陶峙岳、张仲瀚、迪托夫专家经常深入垦区进行检查督促。经过广大军垦战士的辛勤劳动，2万亩棉花总产402万公斤，亩产达到籽棉201公斤。玛纳斯河流域2万亩棉花丰收，不仅在北疆是空前的，冲破了"植棉禁区"，即使在全国也是先进的。实践雄辩地证明，解放军不仅会打仗，在生产战线上也是一面旗帜。

寒冬拉石修水渠

进行农业生产，必须水利先行。王震同志和军、师领导同志都十分注意兴建军民两利的水利工程。在水利建设中，迪化驻军十七师为了解决垦荒的引水问题，决定整修和平渠。修渠没有水泥，就用片石砌渠。其所需7 000立方米片石，要

从30多公里外的三甬碑运到工地。没有汽车，没有马车，怎么办？师首长决定用人拉。这一号召，得到了指战员们的支持。1950年春节刚过，老红军程悦长师长、袁学凯政委即率领全师指战员，每人拉着一个爬犁，利用冰冻路滑，拉运片石。旋即从三甬碑到安宁渠，有5 800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拉着爬犁，形成了一条长龙，浩浩荡荡，滚滚向前。王震司令员，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也都亲自拉着爬犁参加了运片石的劳动，此举轰动了迪化全城。历经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何时见过这样的军队？何曾见过这样奇特的场面？于是市民们倾城而出，夹道欢迎这支劳动大军。地方上机关、学校里的大批干部、教职员工、学生和市民群众也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牛车参加到劳动行列中来。这次“拉石头”劳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后给新疆各族人民的见面礼。它向各族人民宣布：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军队。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积极参加劳动的行动，给社会以深刻影响，形成了“劳动光荣”的大好风气，鄙视和厌恶劳动的人销声匿迹了，游手好闲的人少了。据统计，1949年年底莎车有“二流子”4.6万人，但一年之内，其中的3.2万人参加了劳动生产，这便是风气转变的一个有力例证。


图 71　军垦第一犁

二军在南疆的水利建设成绩同样是显著的。他们先后兴建了焉耆解放一渠、二渠、库尔勒十八团渠。总干渠长达60公里。另外，还完成第一期工程灌溉能力即达22万亩的阿克苏胜利渠、前进渠。六军兴建了长达30公里、全部用石头代水泥砌成的哈密红星一渠、二渠，还修筑了猛进水库、八一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第五军十四师和六军五十团整修了伊犁湟渠；十五师十三团和骑兵团修建了卡普克东西干渠，二十二兵团整修了玛纳斯河军民两利渠和筹建了车排子、大海子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大多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施工的，生活极其艰难。没有施工机械，工具简陋，全靠人力用十字镐、铁锹开挖，用抬把、挑筐运土。我们的战士吃了大苦，征服了一个个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三年水利工程建设，增加灌溉面积200多万亩，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节衣缩食办工业

部队除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同时还节衣缩食，兴建了新疆第一批现代化工业。



解放前，新疆的工业异常落后，一斤铁、一斤钢，都生产不出来。铸锅的生铁和打马掌用的熟铁，甚至圆钉、火柴，都得从区外运进。吃的糖也是苏联的方块糖。乌鲁木齐只有一家容量380千瓦的电灯公司，灯光昏暗，事故频繁，并且经常停电。轻工业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个手工业作坊和民间手工业外，现代工业基本上是空白的。因而这里的工业品奇缺，价格昂贵。一块砖茶可换回一只绵羊；一盒火柴可值一公斤羊毛。为了改变工业落后面貌，驻疆人民解放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国家支付的一部分军费作为建设资金投入。就这还差的很多，于是，王震将军动员全体指战员节衣缩食，积累资金，以支援新疆建设。

王震的号召，干部战士热烈响应：一年两套单军装，节约一套；两件衬衣，节约一件；一年一套棉军装，变为两年一套；鞋子、袜子、帽子，甚至连衬衣领子上的翻领也去掉了；口袋由四个变成两个。粮食、菜金、杂支、办公费等都拿出一部分来支援新疆的建设。累计每人每年节约91.2元投入新疆的现代化工业建设。有的部队提出："宁愿自己吃点苦，也要节省资金支援新疆的工业建设。"据统计：到1951年底参加集资的指战员占90%以上，用指战员集资的金额占两年工业建设投资的80%以上。1951年先后开工的项目有：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新疆水泥厂、七一棉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配厂（后改为十月拖拉机厂）、新疆机器厂、八一面粉厂、木工厂等工矿企业。同时为了部队农副产品加工和建筑工程的需要，在各师团驻地还兴办了小型发电、轧花、碾米、磨面、榨油、修造、皮革、被服、锯木、砖瓦、陶瓷、印刷等厂坊共76个。筹建八一钢铁厂是从上海买来轧钢机、从天津买来炼铁设备，其他设备从苏联进口。当时新疆没有铁路，许多笨重的设备是用汽车从关内、从苏联运进新疆的。从1951年9月开始筹建，在指战员日夜奋战下，到1952年5月就投产了。这批工厂，为新疆的现代化工业奠定了基础。省工业厅厅长卡尤木拜克著文称赞说："三年来，在现代工业建设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是驻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努力的结果。是他们自觉地忍受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节约了大量资金投入工业建设，是他们以劳动的双手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起成批的现代工业，为我们开辟了繁荣、幸福生活的远大前途。"



图 72　1952 年二军六师指战员踏勘荒地

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目睹了解放军战士的忘我劳动，生产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听了王震司令员关于新疆军区部队生产建设的规划，激动不已，于是在1952年1月的军区生产代表会议上赋诗曰：

瞻望远景，无限美丽：田连阡陌，渠道纵横，屋宇星罗，绿树成荫，这就是我们的农庄。

青青草原，一望无垠。风吹草低，牛羊成群，这就是我们的牧场。

巍峨大厦，轧轧机声，烟囱林立，货堆如云，这就是我们的工厂。

通衢四达，载驱载驰，关山万里，纵其所之，这就是我们的交通。

陶峙岳将军对未来充满信心，广大指战员对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也充满信心。军垦战士们忘我劳动，排除万难，用双手去建设美好的未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此令

主席　毛泽东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下达转业命令。

图73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万事开头难。"艰苦创业的三年，困难确实很多，生活确实很苦，但取得的成绩确实很大，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很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减轻各族人民负担和促进新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受到各族人民的真诚拥护，他们以实际行动在新疆站稳了脚跟，为军垦事业奠定了基础。

1952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抚今追昔，各族人民是不会忘记解放军艰苦创业的功绩的。

1952年2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整编命令。命令说："……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部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为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将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国防部队整编为一个二级军区、两个三级军区、十个军分区、一个国防师。二军四师编为国防四师(其中一个团由十七师组建)。

生产部队包括二、六军大部，五军一部和二十二兵团全部。另外，军区成立了生产管理部，原六军军长程悦长任部长。生产部队的军政工作和后勤供应，分别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负责，生产任务由军区生产管理部管理。生产部队各师的领导人及驻地如下：

一兵团二军五师编为农一师，驻阿克苏。师长任晨，政委贺劲南；

一兵团二军六师编为农二师，驻焉耆。师长刘克明，政委阳焕生；

五军十四师编为农三师，驻伊犁。师长尼基金，政委伊敏诺夫；

五军十五师编为农四师，驻新源境内。师长冯祖武，政委胡天勋；

一兵团六军十六师编为农五师，驻哈密。师长任书田，政委陈晓岚；

一兵团六军十七师编为农六师，驻昌吉五家渠。师长郑云彪，政委苟成富；

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编为农七师，驻炮台。师长刘振世，代政委史骥；

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编为农八师，驻石河子。师长罗汝正，政委鱼正东；

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七师编为农九师，驻焉耆。师长傅志华；

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编为农十师，驻绥来县小李庄。师长林海清；

二十二兵团骑兵第八师编为工一师，驻石河子。师长王季龙。

此外还有军区建筑工程处和运输处。整编后，生产部队共15万余人。

后来，为了支援地方建设，除将一部分土地赠给群众外，并把部队节衣缩食

兴办起来的一批骨干工业包括人员和设备，全部无偿地移交地方。总计有：七一棉纺厂、苇湖梁火力发电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配厂（现十月拖拉机制造厂）、六道湾露天煤矿、八一面粉厂、乌拉泊水电站、肠衣厂、陶瓷厂、被服厂、毛巾厂、水磨沟发电厂、肥皂厂、水泥厂等。这些厂矿后来都成为新疆现代化工业的骨干。乌鲁木齐红雁池水库也移交地方，将600辆汽车连同驾驶员管理人员移交给地方国营运输公司和企、事业单位。并把市镇中军人合作社干部战士2 000人，商品2 000万元，移交给地方商业部门。这次支援地方干部战士共达10 797人。解放军战士用双手开垦的土地、建设的工厂，无私支援给地方，证明他们是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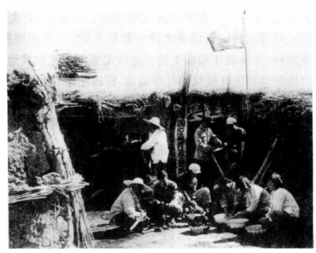


图 74　创业时期的农场职工宿舍

第四节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1954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军队也即将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了加强对驻疆人民解放军生产部队的领导，使生产计划纳入国家计划，让干部战士真正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中央军委总参1954年8月6日复电："同意二十二兵团与军区生产部队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同年10月7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兵团司令员为陶峙岳；政治委员为王恩茂（兼）；副司令员为程悦长、赵锡光；副政治委员为张仲瀚；司令部参谋长为陶晋初；政治部主任为王季龙。

11月16日，中共新疆分局批准了兵团党委名单（由27人组成）。其中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兼）；第二书记：张仲瀚；第三书记：程悦长；副书记：王季龙；常委：陈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于1956年调兵团任副参谋长）、杨贯之、刘一村、杨南桂、杨润贵。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恩茂同志在兵团成立大会上说：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对新疆生产部队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军区必须加强对生产部队的领导。因而有必要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新疆生产部队的领导机构。……兵团的基本任



务就是：领导生产部队加速完成国营农场建设，更大地发展农业生产，以适应兰新铁路修通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供应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粮食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并能逐年增加支援内地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同时，兵团要有力地帮助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促进新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下辖十个农业师、南疆及石河子两个生产管理处、一个工程建筑师。另外尚有建筑工程处、运输处等单位，共17.5万人（其中官兵10.5万人）。

兵团保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和政治工作制度，连队有连长和政治指导员。



第十八章　新疆屯垦事业的发展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加强了对生产建设部队的领导，标志着新疆的军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大发展时期，生产以惊人的速度在前进。1954年耕地面积为115万亩，到1966年底达到1 212万亩，12年的时间增长了10倍。工农业总产值也由1954年的9 195.5万元猛增到12.15亿元；人口由17.5万人增加到148.5万人；粮食总产1952年是10万吨，到1966年增加到72万吨，当年上缴粮食22.5万吨，对解决新疆的城市粮食供应，特别是为克服"南粮北调"的困难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向万古荒原大进军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四面远离海洋，周围高山环绕，年降水量极少，具有典型的干旱气候特征。新疆的农业是灌溉农业，靠高山融雪水进行灌溉，绿洲多分布在河流两侧，盆地边缘，这些地带早已聚集着历代在此耕耘的各族人民。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后，广大战士与各级干部即遵照毛泽东主席"不与民争利"、"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教导，以坚强的意志，排除万难，向杳无人烟的荒漠进军，变戈壁为新的绿洲，造福边疆各族人民。

兵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进行了前期工作，对天山南北的荒原进行了勘察设计，拟定了开发方案，做好了人力、物力和技术上的准备。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兵团作出开荒300万亩的号召，立即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响应，各师对兴修水利、开荒造田作了部署。一个气势磅礴向戈壁大进军的高潮，在天山南北兴起。经过三年艰苦奋战，实际开荒造田858万亩，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建成场外独立引水渠58条，引水能力359立方米/秒，建成水库14座，增加库容6.5亿立方米，使兵团的耕地面积猛增到1 000万亩以上，基本上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战略格局。



（一）开发塔里木

塔里木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之一，南北宽约500公里，东西长1 000多公里，中有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风起时黄沙滚滚，晴天时浩瀚无垠，人称“死亡之海”。塔里木河西起阿克苏与叶尔羌河的交汇点，沿盆地北缘，东抵罗布泊，全长1 000多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内陆河，河床频繁改道，素称“无缰之马”。这里有大片万古荒原可开发，有充足的水源可以利用，但由于荒原中心干旱酷热，狂沙暴频频出现，盐碱重，人又称“恐怖之地”，加上交通不便，历代农民无力开垦。

20世纪50年代，生产建设兵团在塔里木河两岸摆开了战场，兵分两路向塔里木大进军。

农业生产建设第一师负责塔里木河上游的开发，这支部队的前身是著名的三五九旅，曾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为了开发塔里木，自治区和兵团联合组成的一支勘察队，在1957年深入塔河上游实地全面踏勘，取得了水土资料。塔里木河上、中游稍加改良就可利用的荒地有600万亩。塔河水源除上游地方群众利用一部分外，尚有40多亿立方米水可供利用。这个地区，光照资源丰富，适宜种植棉花，特别是长绒棉等经济作物。



图75 塔里木河大桥

1957年国庆前夕，师长林海清向农垦部部长王震汇报了开发塔里木的方案后，王震十分高兴，大力支持。10月下旬，兵团决定从各师抽调2万余人，支援开发塔里木，从此便拉开了开发塔里木的序幕。经过1958年一年苦战，在塔里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新建了胜利十场、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九场、野麻农场等8个国营农场，开荒造田45万亩。在塔河北岸的阿拉尔地区，盖起了楼房，新建了拖拉机修配厂、加工厂、农业红专大学（塔里木农垦大学前身）、医院、商店、书店、邮电局、银行、招待所等，塔里木深处第一个城市初现雏形。

1958年秋，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视察塔里木时，看到塔里木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兴赋诗一首：

塔河岸边有高楼，
今日登临一览收。
面目全非曾几日，
无边漠野尽田畴。

1959年塔里木垦区又垦荒44 618亩，新成立了三个农场。1960年，修建了上游水库，保证了枯水期的灌溉。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农一师在塔里木河上游两岸共垦荒667 907亩，建成大型农场10个。修建渠道3条，长156.5公里。成功地开发了神秘的亘古荒漠塔里木。

开发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的是农二师。在尉犁县东南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库鲁克库姆沙漠之间，有可垦荒地约300万亩。1956年，农二师开垦了塔里木河下游的门户即塔里木一场。1957年又新建塔里木二场，此时，兵团和农二师组成联合勘测队，对塔里木河下游进行了全面勘测，摸清了这个地区的水土资源。1958年在塔里木河下游全面布点，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由副师长谢高忠率领万人大军进入塔里木。当时条件极为艰苦，荒原上没有房屋，住的都是地窝子，没有蔬菜用盐水下饭，不论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季，指战员们每天苦战十几个小时。经过三年苦战，共垦荒60万亩，建成农场7个。修建铁干里干渠、卡拉干渠、普米干渠等水渠173公里，建成建筑物631座，建成大西海子水库一、二库，爱沙米尔一库，水库的库容达1.56亿立方米，保证了灌溉用水。

三年中，农一师和农二师在塔里木盆地北沿共开荒造田120万亩，建成大型国营农场17个。在塔里木河上、下游形成了两个新垦区，亘古荒原上出现了两个新的绿洲。

（二）向准噶尔大漠进军

准噶尔盆地面积约30多万平方公里，北有阿尔泰山，西有萨吾尔、塔尔巴哈台、阿拉山，东面有北塔山，南有天山。盆地中部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部署在这个盆地边缘的生产建设部队，在兵团党委统一领导下，分路向准噶尔戈壁大进军。

（三）开发莫索湾

莫索湾位于准噶尔盆地中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属玛纳斯河中游，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土、光热资源丰富，适于农牧业发展。早在清代同治年间，玛纳斯、呼图壁县附近的汉族人民就为反抗阿古柏和“清真王”妥得璘的民族仇杀而逃避至此。他们组织民团，筑城自卫，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建设了西营、野马、东湖、马桥等城镇。50年代，这些城镇的断壁残垣，被泥沙淤塞的渠道和荒芜的田埂还清晰可见。根据王震将军的设想和兵团的部署，1956年在详细的土壤调查和地形勘测的基础上，拟定了开发莫索湾的方案。农八师于次年冬派出4 500人的水利建设大军，进驻莫索湾，抢修了26公里长的总干渠和南干渠，一、二支干渠，解决了70万亩土地的输水灌溉问题。到1960年，仅3年的时间，共修干、支、斗、农渠1 012公里，桥涵等建筑物3 120座，大型水库1座，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灌溉网。

与此同时，开荒造田，农场规划也同时展开，早在1957年11月，农八师派肖凤



瑞同志率领先遣组进驻莫索湾，随即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垦荒大军。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水、无菜、没有房子住，道路也不通。水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只能保证吃饭和喝水。洗脸水一盆要洗三四次，然后才用来洗脚，洗脚也要洗上三四次后才倒掉；新鲜蔬菜是吃不上的，只能吃咸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开垦了36万亩土地，种植了18万亩作物。新开垦的莫索湾二场，当年收获粮食200万公斤，棉花25万公斤，上缴利润2.9万元，实现当年生产当年有利上缴。经过三年努力，农八师在莫索湾共开荒造田90万亩，播种80万亩，造林3.3万亩，种植果树4 400余亩。三年为国家生产粮食5 347万公斤，皮棉262.95万公斤，上缴利润305.12万元。还建成了年修理400台拖拉机的修配厂，200张床位的职工医院，11所中、小学校，房屋面积2万多平方米，使茫茫荒原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绿洲。莫索湾的迅速开发，受到了王震、王恩茂等同志的赞扬。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视察莫索湾时，曾赋诗称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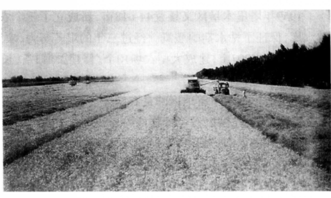


图76 小麦丰收

红旗插遍莫索湾，
大地茫茫一手翻。
唤起千年沉睡梦，
永葆青春在人间。

此外，农八师在安集海原二十二团的基础上，扩建了安集海一场、四场、五场和七场；农七师在下野地垦区原十九团农场、二十一团农场、小拐农场、下野地三场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下野地一场、四场、五场和沙门子农场；在车排子垦区原二十团农场、车排子二场的基础上，新建了车排子四场、五场、五五农场和共青团农场。

（四）准噶尔西部和西北边缘的开发

驻在祖国西陲伊犁的农四师，在三年大发展中，开垦了昭苏和察布查尔两个垦区，建立了察布查尔一场、二场、三场、红旗一场和清水河农场，增垦面积40万亩。

精河、博乐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西缘，过去由于交通闭塞，是待开发地区。自治区和博尔塔拉自治州，希望兵团去建场，1958年至1960年，农七师派干部职工去开垦，建立了精、博总场、沙山子农场、托托分场。在兵团统一部署下，1960年农

五师组织垦荒队伍在此开荒布点，于当年建立了红星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六场；工二师建立了艾比湖农场；兵团运输处建立了幸福农场；兵团商业处建立了红旗农场。精、博地区共垦荒地40万亩。

塔城垦区位于盆地的西北部，农七师三管处和工二师在此开垦十几万亩，为以后农九师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盆地北缘的阿勒泰垦区，在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之间，以原来的二十八团为基地，三年中新建了二十九团农场、三十三团农场、三十五团农场和福海渔场，共开荒造田25万亩。

五家渠垦区位于盆地的东南，农六师在原十六团农场、八一农场、猛进农场的基础上，在昌吉、呼图壁建立了马桥农场、枣园农场、天山十九和二十场。在奇台农场的基础上，扩大新建了天山一场、二场、共青团农场和下兴湖农场。

其他垦区也扩大和新建了一些农场。

从1958年到1960年，全兵团共新建农场90个，牧场8个，在万古荒原上的13个农场群，就是13个新的绿洲，一齐出现在天山南北。

第二节　工业迅速发展

1958年，根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兵团根据中央“全党动手，兴办工业”的号召，决定因地制宜地积极兴办工业。其方针是：全面贯彻为农牧业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和为出口服务的原则；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结合，因陋就简，勤俭办厂。当年就积极筹建八一制糖厂、八一棉纺织厂、八一造纸厂等现代工业。到该年年底，全生产建设兵团已增加各类企业110个，其中，现代化工业15个。各企业中机械制造业、建材业、轻工业发展很快，化工工业也开始起步。整个工业总产值达到13 183万元，比上年增长27.28%。

到了1959年，兵团的新建企业已达到132个，其中现代工业37个，限额以上大型骨干工业开工的有：八一毛纺厂、红山嘴水电站、铁门关水电站、跃进钢铁厂、通用机械厂、合成氨厂、十三户拖拉机制造厂、天然碱加工厂、奎屯卷烟厂；限额以下中型企业28个，全年完成总投资5 500万元。1960年工业总投资7 846.56万元，除续建工程外，又新建企业39个，年底拥有企业348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基本建成投产。如石河子的棉纺厂、毛纺厂、制糖厂、造纸厂、红山嘴水电站；奎屯的卷烟厂、针织厂；农六师的煤矿厂、机械厂；乌鲁木齐市的通用机械厂等。当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 113.19万元，比1957年增长2.5倍，利润15 552万元。

兵团的工业，大多是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项目。它们全凭着兵团人因陋就简、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办起来的。如石河子八一糖厂，是借用军垦战士的转业费兴建的，设计生产规模为日处理甜菜1 000吨，年产砂糖2万吨，酒精1 800吨。



1958年7月动工兴建，1959年12月建成投产，仅17个月时间。批准投资1 608万元，实际投资1 475万元，节省133万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项目。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兵团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吃在炉边，睡在炉边，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重重困难，炼出了一定数量的钢铁，但由于盲目性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1959年吸取教训，办起了巴仑台跃进钢铁厂，拥有28立方高炉12座，日产生铁100吨，兵团机运处和工一师分别修建了炼钢和轧钢车间，1960年已能生产生铁94 482吨，钢11 998吨。在此期间，各垦区、各农场也本着自力更生，勤俭办场的精神，兴起大办小煤窑、小水泥、小化工、小水电、小糖厂及加工副业。三年中，共兴办场办工业263个，总产值20 890.8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7.84%。

在"大跃进"时期，兵团领导者果断地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强大力量向荒漠进军，兴办了工矿业，因而，农业和工业都得到了高速发展，基本上奠定了各垦区的规模和布局，成绩是巨大的，这是主流，是应当肯定的历史功绩。但由于"左"的影响，也产生了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例如：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三年投资高达6.029 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只占14.8%，而自筹资金高达5.137 4亿元。三年中，兵团综合盈利只有4.738 9亿元，将综合盈利总额全部用于基本建设尚且不够。到1961年，这种盲目性还有发展。当年基建投资又高达2亿元。这一年国家只能拨给75万元，其余的仍然要靠自筹，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赤字，造成财政异常困难，出现了欠发职工工资，拖欠税金和银行贷款等现象。农业生产方面因为面积迅速扩大，所以便出现了广种薄收，产量下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职工生活，在口粮供应上不得不进行"低标准，瓜菜代"。有的单位发生了浮肿病，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对于这些违背经济规律，盲目追求指标，高速度的做法，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头脑过热的环境下，这些正确的意见不是没有受到重视，就是作为错误观点来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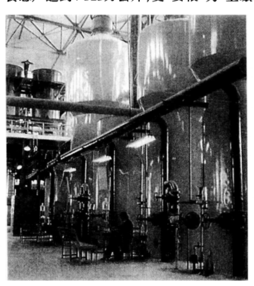


图77　八一棉纺织厂

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指出了党在那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在王震和王恩茂的帮助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瀚于当年2月份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坚决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实行"农业第一，粮食第一"，工交各业

都要为农业让路的方针；并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调整了兵团各行各业的关系，压缩了基本建设战线投资，纠正了高指标；精简机关，下放干部，撤销了9所学校，对质次价高的39个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当时在农业上贯彻的是“以水定地，因地种植，精耕细作”的方针，并从建立稳产高产田的长远目标着眼，进行了平地、治碱、拉沙改土、渠道防渗、改建条田，实行草田轮作，农牧结合，营造防风林和培植林区，组织机械化全能生产队，建立样板农场，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等。这一系列措施的执行，使主要作物单产得到显著提高，总产也稳步上升。1966年粮食单产达到137.65公斤，比1962年的72公斤提高91.6%；总产也由1962年的3.09亿公斤，增长到1966年的7.2亿公斤，达到233%。由于粮食过关，经济作物面积逐年扩大，棉花面积1966年达到65万亩，比1962年的30万亩增长了一倍，总产达到2 494万公斤，比1962年的601万公斤增长319.9%。甜菜、油料产量也大幅度上升，农场畜牧业和加工副业也都有了发展。变化较大的如农六师，在“大跃进”期间，这个师的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17.9万亩，猛增到1960年的66.6万亩。由于增长过快，耕作粗放，甚至搞带雪犁地，浅耕播种，不少地因无水灌溉而被迫放弃，粮食总产、单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亩产粮食仅65斤，总产1 350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由1957年的696.5公斤下降到1961年的254.5公斤。粮食不够吃，不得已吃糠、吃菜、吃玉米秆做成的淀粉。不少单位发生了浮肿病，财务紧张，内外债高筑，工资发不下，职工生活发生严重困难。1961年7月，调整了领导班子。他们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紧缩开支，大力开发地下水，以水定地，提倡精耕细作，号召全体干部和群众，“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在这样的方针下，这个师的经济迅速回升，到1966年，粮食总产达到4 525万公斤，变“要粮”为“上缴粮”，变“亏损”为“盈利”。


图 78　农二师湖光糖厂

兵团的工业、交通运输业经过调整和提高，到1966年年底，拥有企业297个，工业总产值达到55 092万元，利润8 359万元。全兵团的载重汽车为4 139辆，比1962年增加19%，而货运量增长一倍，达465万吨，产值由1962年的6 916万元，增长到1.58亿元，利润由1 494万元增加到2 972万元，增长了近一倍。

此外，建筑业和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起，到1966年止，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高速发展时期，在此期



间，虽然出现过“大跃进”时期的那些错误，但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也有显著提高。1966年兵团给国家上缴粮食2.25亿公斤，本身的盈利达到1.12亿元。这两个数据代表了发展时期兵团经济的规模，生产建设兵团在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节　战备防边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利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大肆掠夺。在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的浪潮中，沙皇俄国乘机侵占了我国西北的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60年，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在这一逆流中，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局势非常紧张。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企图用武力压服中国人民，苏方还发表声明说什么：“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更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

新疆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大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严格组织纪律性的部队。他们虽然转了业，以经济建设为主，但仍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执行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三重任务，所以在当时形势下，这支劳武结合的部队对于防止外来侵略、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宁和保障祖国统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它的1.4万人的武装部队担负着警卫、维护治安的任务。

1961年兵团党委决定组建13个武装基干民兵营，外加5个武装基干民兵连。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要求，建设一支“一旦有事，能够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民兵武装部队”。兵团的武装建设，因此而进一步加强。到1965年底，兵团共组建值班民兵连466个，其中：炮兵团、坦克团各1个，步兵连405个，骑兵连11个，机炮连24个，共5.1万人；基干民兵连189个，共3.5万余人。各农场都组建了值班民兵连和基干民兵连。当时生产建设兵团的8万多武装民兵和78万军垦战士遍布天山南北，“一手持枪，一手拿镐”，成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稳定新疆局势的重要力量。

兵团驾驶兵，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踊跃支援前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中国和印度是相互毗邻的两个古老的国家，中、印边界线长约2 000公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两国之间按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两国人民长期和平共处中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英帝国主义占领印度时，于1913年制造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企图划走我国大片领土归英属印度，中国历届政府均拒绝承认。1950年以后，印度政府先后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9万平方公里，1954年又侵占了中段2 000平方公里的巴里加斯，1959年西藏农奴主发生叛乱，印度政府企图乘机占领西段3.3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

从1961年开始，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越过中印实际控制线，蚕食我国领土，建立据点，挑起冲突。中国政府多次建议通过和谈解决边界问题，均遭印度政府拒绝。1962年9月，印军悍然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向北推进，10月20日，印军以十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发动向中国大规模的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我驻疆边防部队，在600公里的西段边境线上，给入侵印军以沉重打击，全部扫除了印军自1955年以来在我国境内建立的43个侵略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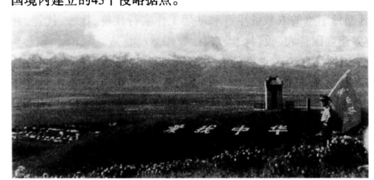


图 79　格登山上的边防哨所

在这一战役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力支援前线，提出："前线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一切为了前线。"特别是兵团驾驶兵，踊跃支前，全兵团共抽调汽车401辆，驾驶人员1 105名，组成运输队，先后共运输军用物资6 308吨。独立汽车三营有9辆汽车配属战斗部队，他们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兵团机运处张林孝，在爱人分娩的第二天就带队上山，哪个车抛锚，他就跟哪个车走，受到部队和驾驶员的称赞。

边民外逃事件与"三代"工作。

1960年以前，中苏边境中方一侧，基本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

1962年4月，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发生了伊犁、塔城边境地区6万余居民，赶着牲畜，带着财物越境逃往苏联的边民外逃事件。其中裕民、塔城、霍城三县受害最重。塔城县外逃人口达该县人口的68%；霍城县边境三个公社原有人口1.6万多人，外逃后只剩3 000余人，其中前进公社的社员只剩下9户。这些地区的农村组织遭到破坏，有的公社机关陷入瘫痪之中，各项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据裕民县当时的统计：牲畜损失31%，车辆损失70%，耕畜损失80%。

1962年5月5日，中央和自治区指示生产建设兵团派出部队赶往边境地区维持社会秩序，配合国防部队保卫边境各县人民政权，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当时兵团共派出5个独立营和21个值班民兵连，赶往出事的各县，胜利完成了中央和自治区交给的艰巨任务。

5月29日，伊宁市客运站因买车票问题，少数坏人煽动一些群众捣毁客运站大门和办公室门窗及电话，打伤维持秩序的干部和战士共15人。当时少数坏人叫



嚣:“现在是打倒共产党,消灭汉族人的问题。”与此同时,约有2 000多人包围了伊犁州人民委员会,夺走门卫枪支,占据了州人民委员会大楼,捣毁门窗,殴打干部,抢走文件、公章,特别是抢走十多年的外事档案资料。另有数百名群众在伊犁区党委门前,企图冲击区党委办公大楼,情况十分严重。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兵团农四师奉命迅速派民兵增援区党委,打击了暴徒的嚣张气焰,控制了局势,并夺回了人民委员会的大楼,保卫了伊犁区党委,稳定了社会秩序。

为了在“伊塔事件”发生地区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周恩来总理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亲自召见了兵团副政委张仲瀚,他要求兵团承担维护社会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牧、林)场带。

根据这个原则和中央、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指示,兵团从农四、五、六、七、八师、工一师、兵直等单位派出干部810名,工人16 750名,汽车39辆,拖拉机和康拜因45台,前往裕民、塔城、霍城、额敏四个县的12个公社、6个牧场执行“三代”工作。工作队进入指定地区后,首先恢复了各级党政机构。其中,代理公社职务的干部有54名,占公社干部总数的79%;代理大队职务的干部有199名,占大队干部总数的93%;代理生产队领导职务的干部有499名。另外工作队迅速投入抢洪灌溉小麦,发动群众漫山遍野地寻找失散的牧畜的工作。据统计当时共代管庄稼78万多亩,代耕土地42万多亩,收拢失散代牧的牲畜32.7万多头。他们在当地党政和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8月间,将代耕的土地、代牧的牲畜、代管的财物,全部移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兵团在执行“三代”任务及边防值班民兵支出的各项费用,共计935万余元。

为了加强边防建设,开发和建设边境地区,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指示,兵团由执行“三代”任务转变为筹划建立边境农场的工作。区党委先后发出〔1962〕456号、561号、704号文件,指示在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等地、州边境纵深10~30公里左右,划出作为兵团建设边境农场,另由兵团划出14万亩土地安置边境内迁群众。

从1962年到1966年五年时间,共建立边境农场53个,基本上形成了一条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起了一条“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它既发展了经济,又加强了边防建设,成为中国国境线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四节　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

在新疆,民族团结是大局,是一切事业胜利的保证;民族团结搞好了,事业就发展,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兵团农垦事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团结的历史。远在部队进疆初期,

新疆各族人民就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支援部队生产。维吾尔、哈萨克族的许多牧民还志愿做部队的向导，支援剿匪肃特。1951年春进驻炮台垦区从事农业生产的部队，因大路泛碱翻浆，断粮40天。在那些日子里，乌苏县车排子乡的农牧民用骆驼把粮食运到部队驻地，帮助部队渡过了难关。这些行为充分说明各族人民热爱人民的子弟兵，早在50年代初军民之间就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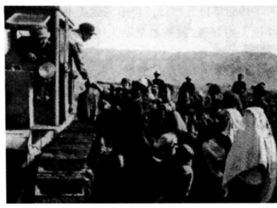


图80　农场机耕队支农到地方

兵团的干部战士，也严格遵照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发扬解放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从1954年兵团成立以来就坚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例如：兵团所兴建的水利工程，大多是"两利"工程，其中玛纳斯河的治理，不仅使农八师受益，也使玛纳斯县农民的200多万亩土地灌溉得到了保证。兵团的工程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新疆各族人民修筑了长达1.2万多公里的公路和铁路，还参加了自治区许多重点厂矿的建设和城镇建设。此外，兵团还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直接支援各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1958年，新疆和全国一样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兵团全力支持各族人民公社化，派出驻社干部帮助公社培训各类技术干部4 647人，支援劳力65.56万个工日，无偿为社会代耕、代播面积21.63万亩，赠送良种196.9万公斤，帮助修理农机具8 900多件，免费为社员治病6.9万多人次，支援生铁136吨，焦炭110吨，电动机、鼓风机480个。1958年8月库车人民遭受水灾时，兵团职工捐献现金20万元，粮食101.47万公斤，衣服6万余件。

在兵团事业大发展的过程中，兵团农场和群众之间曾发生了一些争地、争水、争草场的纠纷，为了及时消除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兵团政治部于1959年5月颁发了《关于拥政爱民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纲要20条》（草案）。当时的兵团副政委张仲瀚曾著文说："生产兵团数十万指战员切身体验到，无论是过去战争时期和现在的建设年月里，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事业的有力支柱。因此，在新疆生产建设部队要把坚决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视为我们事业的生命。"

据统计，兵团为了正确处理场、社关系，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到1961年底为止，全兵团共给地方人民让出土地70.493万亩，草场47处，果园1处，房屋311间，树木5 347株，粮食7.5万余公斤，牲畜263头，其他物资3 930件，现金173.85万元。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



1963年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兵团政委王恩茂说："现在需要办的一件最大的好事，就是要帮助人民公社规划、建设和生产，并且要把公社规划建设得像兵团的农场一样。"区党委向全疆发出号召："兵团方向，公社特点，长远规划，逐步实现。"为此，兵团党委决定：自1964年起，每年从自筹资金中拿出800万元，有计划、有重点地帮助人民公社规划建设"五好农村"，即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到1966年底，这一决定实行的情况是良好的，计兵团共帮助58个县（市）的87个公社进行了规划建设，投资2 393.95万元，完成99个项目，勘测土地852万亩，建设条田1 745万亩，修建水泥和卵石渠道91公里。水利建筑物2 066座，公路296公里，修建民房26 340平方米，修建小电站1座。无偿代耕土地100万亩，收割脱粒54.4万亩，支援人力畜力277 982个工日，化肥75吨，农药24吨，修理机车1 342台（次），农机具76 941件，赠送农机具802件，良畜3 691头，良种353.18万公斤，免费治病51万多人次。派出长年驻社干部752人，培训公社技术人员2 097名。二十团农场帮助的乌苏县车排子大队，粮食总产由1963年的39万公斤，增长到1964年的137.5万公斤，棉花由总产2 000公斤增长到5.6万公斤，粮食征购任务27.5万公斤，实际完成163万公斤，均是成倍地增长。社员的平均工分也由上年的7角5分，提高到1元8角，成为全县著名的丰产大队和"五好"新农村。


图81　农三师医务人员为少数民族群众看病

第五节　生产建设兵团经验的传播

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认真考察后，认为大规模地征服荒漠，兴修水利，创办国营农牧场，采用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于是作出了《关于加速发展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64年底，甘肃省委作出决定，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师序列，在河西走廊建立农业建设第十一师。由兵团抽调干部178名，组成师团及各级领导班子，先后建立起十多个国营农场。开始建场时，由兵团支援种子和粮食1 000多万斤和部分农机具。1965年8月，宁夏建立农业建设第十二师；青海省建立农业建设第

十三师；陕西省建立农业建设第十四师。同时成立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设兵团。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先后调出师级干部14名，团级干部43名，营级干部53名，连队及业务干部456名，支援水土保持兵团和各省农业师进行组建。根据农垦部指示，又先后调出干部69名（其中团级干部8人），帮助贵州省和四川省西昌地区建设国营农场。

1966年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优秀干部和职工赴西藏参加建设，为西藏发展国营农场作示范。据此，兵团党委作出了《关于支援西藏发展农垦生产的决定》，抽调干部和职工2 055人，组成一个农场（团），下辖8个机农合一的连队，一个基本建设连队，还有一个保养间，于5月中旬到达西藏波密地区。

5月，奉中央军委和西北局指示：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成一个现役建筑工程师，支援甘肃省酒泉钢铁厂建设。共选调干部167名（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27人），于8月开赴酒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在西北地区的推广，在全国引起了重视，广为传播。先后成立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农业生产建设师，西藏生产建设师、广西生产建设师。这些生产建设部队的成立，适逢“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各省稳定混乱局势和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文革”造成的破坏，纪律松弛、经营不善、生产下降以及诸多原因，生产建设兵团又先后被撤销。只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才又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

第六节　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兵团是一个革命大学校，它用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了忠于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代新人，不仅推动了兵团事业发展，而且也使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10.5万解放军战士集体转业后，便在万古荒原上兴修水利、开荒造田办农场，依靠自己的双手，依靠战士们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不为名、不为利、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的精神，使亘古荒漠出现了一片片新的绿洲，一个个新兴的城镇。“荒漠变绿洲”，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联合国治沙专家因全世界不少地区面临沙化的威胁，曾专程来到准噶尔沙漠深处的一五〇团进行考察。他们在这个团场见到无边无际的沙丘，带着气吞万里席卷一切的气势逼向条田、村庄，而这里的军垦战士们与沙鏖战，数十年如一日，到1988年底共造林4.61万亩，植树1 500

万株，遏制了黄沙的吞噬，使这里林带成网，渠道纵横，条田平整，粮丰收、畜成群，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位秘鲁的专家说："沙漠化在许多国家存在，问题很大，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看了你们的防沙措施，找到了解决的途径。"许多专家称赞这是一个奇迹。

在兵团，像一五〇团一样在戈壁深处建场，与沙漠进行奋战，创造人间奇迹的事迹比比皆是。而创造这些奇迹的人正是当年久经战场的老战士。进疆时，他们是小伙子，他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献给了边疆，献给了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他们的奉献很大，可是不少同志的待遇却很低！但他们一不伸手要官，二不伸手要钱，始终保持人民战士的本色，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他们才是真正高尚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在新疆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中，五六十年代进疆的20万名支边青年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这一批青年响应祖国的号召，离开了繁华的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大城市，告别了父母，为了开发建设新疆，保卫祖国边疆，来到了荒凉的戈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条件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劳动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古时候有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叫做"木兰从军"，说的是花木兰千里迢迢代父从军12载，成为千古美谈。兵团有许许多多的内地姑娘，她们离开可爱的故乡，繁华的城市，来到遥远而偏僻的边疆屯垦戍边。她们用勤劳的双手，使昔日的沙漠成为"塞外江南"，成为"戈壁滩上的花园"。她们实在也是"最可爱的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和战士在征服荒漠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兵团特有的精神和风格，这就是："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屯垦戍边，艰苦创业，开拓奋进。"这个精神，代代相传。60年代，先后有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来到兵团，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最艰苦的生产第一线成长起来的，他们热爱祖国，热爱边疆，以场(厂)为家。与工农朝夕相处，为发展军垦事业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广大军垦战士的真诚欢迎，是祖国的好儿女，以后又有10万转业官兵也参加了这一伟大事业，数十万志愿来疆屯垦戍边的青壮年来到兵团。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这些人从理论和实践中，受着爱祖国、爱边疆、爱劳动、爱人民精神的熏陶。所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于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垦战士。尽管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兵团的精神和风格，却一代代地传了下来。因而保证了部队士气高昂，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这正是兵团的优势所在。



第十九章　十年动乱，兵团解体

正当兵团的事业蒸蒸日上，健康发展，大踏步前进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灾难无情地降到了兵团广大干部、战士的头上。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接着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连续检阅几百万红卫兵。此后，在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席卷中华大地，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连，横冲直撞，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素称闭塞、偏远的新疆也不可避免。

兵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损失惨重。在这次浩劫中，丁盛等人全面否定了兵团17年艰苦创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制造冤假错案，使兵团的各项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后导致了兵团的解体，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

第一节　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文化大革命"期间，丁盛等人在兵团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批"技术专政"、大批经营管理的"条条框框"，说这是"只问粮棉油，不问敌我友"的刘少奇、张仲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复辟资本主义。执行这条路线的就是"走资派"。许多艰苦创业辛勤劳动的老军垦被打倒，使兵团事业伤了元气，生产急剧下降。1966年兵团粮食总产7.2亿公斤，1967年又下降为5.45亿公斤，1968年下降为4.6亿公斤，较1966年下降36.1%。棉花总产1966年为2 494万公斤，1968年下降为1 693.5万公斤，下降32%。



在大批修正主义路线中，许多耕作技术规程被斥为“管、卡、压”而被废弛，许多科技人员戴上“反动权威”的帽子被批、被斗。据1972年统计：全兵团农业科技人员6 992人，而其中有1 046人下放劳动，有1 766人被迫改行。不仅科技人员遭受空前浩劫，而且连兵团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的粮食、园艺、土壤农化、植保、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综合机械化等十个研究室也被撤销，价值150万元的科研仪器和设备全部被分光、拆毁。十个农业师的农科所相继被砍掉，基层的植保小组、积肥小组被解散。科学种田不讲了，精耕细作的传统丢掉了。由于种子混杂，耕作粗放，单产下降，1974年和1966年相比，粮食亩产由140公斤下降到85.5公斤，油料由30.1公斤下降到20.25公斤，甜菜亩产由1 345公斤下降到689.4公斤。

兵团9个土壤改良站，被砍掉4个，改行5个。行之有效的治碱改土措施被废弛，地下水位上升，盐渍面积迅速扩大。据玛纳斯河流域的一四八团、一四七团、一二四团、一二七团、一三三团调查，1966年至1973年，因盐渍化而弃耕的土地有8%~31%；中度以上次生盐渍化的土地有9.2%~13.2%。

兵团从开始垦荒造田，建设农场的时候，就十分注意造林。荒开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大造防沙固沙林，以遏制黄沙侵蚀。大造条田林带，防风护苗；大造道路及房前屋后的林带，以绿化农场。此外还有用材林、薪炭林等。到1966年底，共造林地36.35万亩，桑园17.9万亩，苗圃48 900亩，果园10.6万亩。很多农场林带成网，果园飘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滥砍滥伐，林带损失18万多亩，许多林带被破坏得残缺不全，桑园被挖掉12.4万亩，连果园也被当成修正主义批判，遭受了严重毁坏，被连根挖掉的果树达8 000余亩，说这是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

牲畜年末存栏数1966年为208.57万头，到1969年存栏数为186.84万头，下降10.41%。

兵团的工业、交通和建筑安装企业。由于许多有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不少科技人员被批斗，领导班子和指挥系统瘫痪。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设备遭到严重破坏，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火灾事故和质量事故不断发生，损失浪费惊人。生产成本提高，盈利逐年下降。工业企业利润1966年为8 359万元，1973年下降到3 940万元；交通运输业利润由1966年的2 972万元，下降到1973年的1 438万元；建筑安装业的利润1966年为780万元，到1973年竟亏损423万元。只有商业利润下降较少，1966年是846万元，1973年是837万元。



图 82　裕民孙龙珍烈士墓

以兵团撤销前的1974年和1966年相比，总人口增加了77万人，职工增加12万人，耕地面积却减少了52万亩，粮食总产由7.2亿公斤下降到5.25亿公斤，1966年上缴商品粮2.25亿公斤，1974年粮、油、肉不能自给，吃国家返销粮1 695万公斤，1966年经营盈利1.13亿元，1974年亏损1.96亿元，是全国农垦系统的亏损大户，成了国家的包袱。由于兵团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加上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兵团的解体。

第二节　兵团解体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建设兵团广大干部和职工深受其害。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生产急剧下降，财务亏损严重，群众怨声载道。

1975年1月3日，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联合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改革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当前兵团问题很多，主要是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政策不落实，领导班子特别是兵团党委常委内部不团结，经营方向有问题，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等等。存在这些问题，同兵团的体制问题有很大关系。

1975年2月18日至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的会议，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强对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元化领导和调整体制的请示报告》和自治区党委、军区党委《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3月15日，此两个报告中共中央批准。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中发〔1975〕11号文件批转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的报告，决定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解体，撤销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的番号。1975年5月24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新疆农垦总局，11个地、州也相继成立农垦总局。根据中央文件的规定，自治区农垦总局的职能和任务是：主管全疆国营农场的业务工作。各师的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成立地（州）农垦局，主管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

1975年撤销兵团建制时，兵团所属的主要为农牧业服务的2个汽车团和各师10个汽车营的5 000余辆汽车；为农牧团场维修拖拉机的21个修配厂；为农牧业服务和农产品加工的138个工业企业，以及兵团和各师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部门、商场及服务系统；粮食仓库、勘察设计部门、水利工程建设部队及建筑工程第一师、科研部门、大专院校、通讯线路、垦区医院等全部移交给地方。这样一来，十多年来兵团已经形成的一套为农牧业服务的体系便被拆散，给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农七师改为奎屯农垦局以后，1978年春季，洪水冲垮奎屯河渠首，需要紧急运料抢修，但汽车都交出去了，因为无力运输，不得已只好调





图83　小白杨哨所

拖拉机去运石料和水泥。拖拉机速度太慢，影响工程的修复，结果造成了严重损失。又因供应渠道被打乱，原农垦系统年用化肥12~15万吨，兵团撤销后，只供应6万多吨。撤销之前，兵团向各师年供应钢材、农具、配件达2 500吨；兵团解体之后，这一供应完全断绝，对工农牧业生产的影响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1976年，有18个农垦团场又被下放到县，有的拆散后下放给公社。干部和职工的政治、生活福利待遇也发生了改变，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不仅如此，还撤销了为保卫边疆而建立的400多个值班连队。

实践证明：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原想改变兵团体制以促进生产发展，扭转亏损局面，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1975年到1977年生产继续滑坡，亏损剧增。农垦总局所属农牧团场，除原兵团所属农牧团场外，又增加了44个地方国营农场，农场数目增多了，生产水平却下降了。粮食、棉花等主要作物和总产、单产均有下降。以1977年为例，粮食总产6.25亿公斤，较1966年减少1亿公斤；棉花总产1 250.15万公斤，比1966年减少1 244万公斤。财务亏损剧增，亏损额6.6亿元，每年平均亏损2.2亿元，1976年全疆农场（不包括县管农场）共亏损2.6亿元。金额占全国农场亏损的一半，是全国农场亏损最多的一个省份。

1975年至1977年是新疆农垦史上亏损最严重的三年。

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撤销兵团体制不利于农垦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不利于保卫边疆的安全，不利于场、社团结和民族团结，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第二十章　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第一节　中央加强对农垦事业的领导

1977年年底，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王震同志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把团场下放到县管理进行了批评。[中发〔1978〕20号文件]明确规定："中央确定由省、地管的农场，一律不得再往下放。已经放下去的，要按中央规定收回。农场的管理体制要相对稳定，不能轻易变动。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动，要报国务院批准。"并决定，"将黑龙江、新疆、广东、云南四省区的垦区，改为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和省区双重领导，以省区为主"的体制。这四个垦区的"基建投资和国家统配、部管物资，以及化肥、农药、油料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直接供应"。这样就把断了线的供应渠道重新恢复起来，保障了国营农场的正常生产。

为了加强对农垦事业的领导，1978年7月，自治区党委决定，农垦总局成立党委（以前是核心小组，后为党组），任命自治区党委常委祁果兼任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谢高忠兼任总局局长。农垦总局党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首先调整农业内部经济结构，稳定粮食面积，主攻单产，增加棉花播种面积，1978年播棉62.51万亩，到1981年达到131.42万亩，增长一倍以上。单产也由1977年的27公斤提高到1981年的41.8公斤。总产由1977年的25.29万担，增加到1981年的105万担。

棉花产量大幅度增长，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以1980年为例，这一年工业总产值为7.11亿元，比上年增长18.8%，其中，轻工业增长25.4%。

其次是实行财务包干，促进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从1979年开始，实行利润（或亏损）一年一定，超收留用，超支不补的财务包干办法。同时，根据十一届三

中全会精神,改进了计划管理制度,并给企业因地种植的灵活性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权。1980年还实行"以工补亏"的办法,针对当年多余30万劳力的情况,拿出部分补亏资金,组织劳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改善了生产条件。

其三,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从1978年开始,实行"三定一奖",到1980年普遍推广。在生产连队有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组综合承包,联产计酬(罚)制度;单项承包,联产计酬(罚)制度;全连统包,定额计工,以工计奖(罚)制度;包产班组,综合承包,联产计奖(罚)责任制;作业工资与定包奖相结合的责任制;瓜菜包产到户;季节性计件工资等。在畜牧业实行包群到户,包群到组。其他工种也都分别实行责任制。这些制度,使广大职工从思想上和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其四,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1978年年底,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原兵团三级干部会议。祁果同志作了《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加快原生产建设兵团揭批查和"双打"斗争的步伐,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把十年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是非一一纠正了过来。会议充分肯定兵团17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肯定了广大军垦战士为开发建设新疆,保卫边疆而献身,在亘古荒漠上艰苦创业17年是造福后代,造福边疆各族人民的创举,是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攻击兵团是"全面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驳。会议对原兵团专案办公室立案和直接插手的冤假错案,一律公开平反。

由于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生产走出了低谷,有了较大的回升和发展。粮食总产,1981年为9.23亿公斤,较1977年增长48%;棉花总产达到105.8万担,较1977年增长3倍;工农业总产值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1978年为12.6032亿元,1981年达到17.568 2亿元,增长39.4%,平均每年递增11.7%。

第二节　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1980年,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的支持,民族分裂分子在新疆支持、策动的动乱和暴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不满与不安,人心涣散。民族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并迅速波及全疆。

新疆局势动荡,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对新疆作了关于增强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势的指示,并决定指派王震同志以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的身份,照管新疆工作。王震同志数次来疆,1981年2月,在自治区厅、局级以上干部会议讲话中强调:"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以及新疆的各民族,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都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应有贡献。新疆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共同开发建设新疆。”同时指出：“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生产建设兵团搞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还有交通运输业，它办的完全对。”“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错误的。”

1981年6月20日，王震同志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写信，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月1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如下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同志偕王震、王任重一行来新疆视察工作时，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听取了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各方面的意见后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和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经慎重研究，向中央写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即[中发〔1980〕45号文件]。决定指出：“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求兵团要“实行企业管理，积极推行经济责任制，整顿和发展各项生产事业，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实行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大力兴修水利和水力发电，大力植树造林，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继续搞好农业机械化，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要加强民兵武装值班连队的军事建设，搞好边防”。希望兵团“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作出新的贡献”。中共关于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受到广大农垦战士的热烈欢迎，获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

生产建设兵团是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方针、政策、思想政治工作，公、检、法及其他政府工作，都由自治区领导。生产业务工作，包括年度计划、长期规划、生产、财务、物资供应、劳动工资等，作为农垦部企业，受农垦部领导。同时列人自治区的国民经济计划，成为自治区经济规划的一部分。干部工作归生产建设兵团统一管理，并按中央干部管理的权限审批；军事工作归乌鲁木齐军区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农垦部(后改为农牧渔业部)的双重领导。

1981年12月中旬，农垦部副部长赵凡同志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达新疆，他们和自治区会商决定：兵团财政拨款纳入中央财政预算进行管理，以农垦总局和各地农垦局为基础，组成兵团和师的机关。军事工作要在新疆军区统一领导下，加强建设。

生产建设兵团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实行兵团、师、团(场)三级管理，恢复组建十个农业师和三个农场管理局，兵团和师设司令部、政治部、纪律检查



委员会。1983年中央批准兵团成立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局(处)。

重新组建后中央任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干部:

第一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谷景生兼;

司令员:陈实;

第一副司令员:谢高忠;

副司令员:曾继富、林海清、夏尔西别克·司的克、毛迺舜、王寿臣、李廷智;

政治委员:阳焕生;

副政治委员:刘一村、吐尔逊阿塔吾拉、贺劲南、史骥、刘炳正;

参谋长:曾继富(兼);

政治部主任:赵干卿。

1982年6月1日,由自治区党委主持,隆重召开了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自治区各机关,兵团各师代表1 000余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王震也出席了大会。王震同志强调生产建设兵团是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支产业大军,又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要求军垦战士要继续发扬生产队、战斗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方针。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回顾了兵团的历史:"1954年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0多年来,兵团发扬了南泥湾精神,屯垦戍边,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成绩。""1981年粮食总产9.23亿公斤,占自治区粮食总产23.81%;棉花105万担,占自治区棉花总产46.25%;油料100万担,占自治区油料总产23.26%;甜菜总产24.8万吨,占自治区甜菜总数72.62%。""截至1981年,兵团共向国家上缴粮食24亿公斤,上缴棉花741万担,上缴油料188万担,上缴肉食37 815吨。'文革'前上缴工业利润10.4亿元,兵团从成立到1981年底,共上缴税金12.5亿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发展过程中,曾取得过巨大胜利,但也曾经历过曲折的道路,遭受过严重破坏。""党中央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他希望兵团的同志奋发图强,使兵团的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努力搞好同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努力搞好同地方的关系。努力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联合经营。要加强民兵武装值班连队的建设,保卫祖国边防。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由此,解体近七年的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正式恢复起来,新疆的军垦事业,重又揭开了新的篇章。

兵团党委迅速组建兵团及师领导机构;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党的领导和精神文明建设;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增强民族团结和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此外,重点做了四件事。

一、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要求各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在全国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3年2月，农牧渔业部在湛江召开会议，研究农垦系统如何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加快改革的步伐。会议产生了《加快改革步伐，开创农垦工作新局面》等文件，明确规定："国营农场要求实行大包干的，都应积极支持。"所谓"大包干"就是完成国家的，缴足企业的，剩余都是自己的。

兵团党委决定：坚决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在农牧团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很高，1984年就兴办了6万多个家庭联产承包户。这一改革，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生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出现职工负盈不负亏等问题。兵团党委经过调查研究于2004年出台了《关于深化兵团农牧团场改革的意见》及三个附件，即"1+3"。使农业职工从普通劳动者转变为有一定经营自主权的主人。大力推行"两费自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职工负盈不负亏的问题。这次改革的第二年，农牧团场经济增速达18.3%。

2005年，兵团党委下发了"1+3"补充文件，制定了以"土地承包经营，产权明晰到户，农场集中采供，产品订单收购"为主要内容的团场基本经营制度。这次改革的重大成果是解决了兵团的特殊体制，先进的大农业生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

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稳步推进。20世纪80年代，贯彻《企业法》以扩大自主权。90年代推行现代化企业制度，股份制及企业租赁经营、联合、兼并，组建企业集团等改革措施。党的十六大以后，兵团党委决定：企业开始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推进。一是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运营体系。二是形成多种形式的市场主体发展格局。2007年有责任公司616家，股份有限公司19家（其中上市公司13家），三资企业35家(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1家)。三是通过资产重组和并购，形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家，兵团级30家。四是公司制改革完成80%以上。五是企业社会分离基本完成。1983年湛江会议后，兵团非公有经济从无到有，得到发展。1997年兵团党委以十五大精神为指导，把发展私有经济摆到重要位置，给予优惠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到2006年底，其产值占兵团总值28.3%，外贸进出口占总值49%。

经过改革，兵团推行"龙头企业+基地(农场)+农户"，"龙头企业(市场)+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等多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到2007年底，通过合同(订单)形式参与经营的农户已达80%以上。

二、依托科技，振兴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分重视科技兴农。从1999年起，兵团率先在国内实施以



精准种子、精准播种、精准灌溉、精准施肥、精准收获及田间作物生长与环境动态监测为主要内容的六大精准农业技术。

国家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有关专家考察后认为：兵团精准农业技术总体居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疆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发展节水农业，是关系新疆农业以及一切事业的关键问题。

滴灌的优越性，早已为世界所公认，但推而不广，原因是成本太高，即便是美国、以色列这样的农业发达国家，这项技术也只是用于园艺、蔬菜等高附加值作物。天业集团组织科技人员进行攻关，经过多年努力，自主开发出性能可靠、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的高效实用塑料节水器材——一次性可收回滴灌带，这种滴灌带每米价格0.2元，仅是国外同类产品价格的五分之一。使用这种滴灌带每亩地的滴灌设备平均投放只有350元。与常规的耕作模式相比，应用膜下滴灌技术，一个棉农的管理面积可由25~30亩提高到80~120亩。经石河子垦区试验，膜下滴灌平均亩用水量，节水50%，作物增长30%。现在生产建设兵团已建成全国最大的节水灌溉基地。高新节水灌溉面积已由2000年的25万亩，猛增到2007年的830万亩。

农业信息化技术在大步迈进。农一师三团农工通过智能控制系统，用手机就可遥控灌溉棉田；日夜工作的农田监测信息系统，实时监控水、盐指标，监测土壤信息、棉花苗情、棉叶冠层营养状况以及田间水势分布，通过微机平衡决策施肥，专家推荐系统进行分析评估，就可随时对棉田“对症下药”。

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评价说：三团的农业信息化技术，是解决农业信息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好办法。

兵团是全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2007年，播种棉花919.59万亩（613.06千公顷），总产棉花125万吨，占全国六分之一。自2003年以来，连续5年，棉花单产居全国首位。

兵团科技工作者在棉花、小麦、瓜果的良种培育，成功培育“中国美利奴新疆军垦型”细毛羊，农业航空水稻播种试验，飞机播种牧草，以及工业、建筑业的新工艺、新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从1954年到2004年兵团共取得科技进步奖1 132项次，其中，有13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30多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关于计划单列

1995年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最近十几年来，新疆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制造了260多起恐怖事件，造成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无辜群众、基层干部和宗教人士等160多人丧生，440多人受伤。这三股势力在中国境内外从事恐怖活动，不仅对中国造成危害，也对新疆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们鼓吹“圣战”，训练骨干，建立“根据地”，组织敢死队，筹集武器，通过爆炸、投毒等手段，针对学校、基层干部和汉族群众以及中国政府部门和武装力量进行袭

击，制造恐怖事件。为了保障边疆稳定，中央决定加强兵团的工作，并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种既屯垦又戍边的特殊组织形式，符合我国国情和新疆实际，其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难以替代的。把兵团屯垦戍边的工作放到边疆的历史长河中，放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放到新疆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中加以观察，其深远意义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加强兵团的工作，特别是支持兵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发展壮大，是中央从治国安邦的长远角度考虑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央为更好地维护祖国统一，加快新疆建设开发步伐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随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按行业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实行单列。兵团可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请示、报告工作，联系有关业务。各部门召开有关会议，通知兵团参加，有关文件发给兵团；赋予兵团外贸出口权；兵团享有国家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样的优惠政策；兵团上缴地方的林业特产税、教育附加费，全部返还兵团。

中央对生产兵团实行计划单列，大大促进了兵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兵团的发展壮大，是有深远意义的。

兵团是一个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为了在新形势下加快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壮大，党中央、国务院1997年决定：积极创造条件，参照石河子市的管理方式，在兵团农一师所在的阿拉尔、农三师的图木舒克、农六师的五家渠、农十师的北屯设立自治区直辖县级市。2004年1月19日由国务院批准的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正式挂牌。这三个市在管理上参照石河子师市合一的方式，由生产建设兵团管理。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对兵团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促进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加快城镇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四、加强武装建设，保卫祖国边疆

兵团恢复之后，立即重新组建各级武装工作部门。师以上的武装干部由现役干部中选派，业务直接受军区领导。兵团的特点是劳武结合，寓兵于民。平时生产建设，一旦有事，持枪击敌。各武装工作部门刚刚成立，就迅速组建了民兵10余万人，农忙生产，农闲训练，军事技术提高很快。1988年，新疆军区组织预备役部队、基干民兵军事表演比赛，兵团41人参加五个项目比赛，取得了三个团队总分第一名、两个单项团体总分第二名，有4人名列第一，2人名列第二。在参加兰州军区举办的西北五省民兵大比武中，36人受奖，其中3人获得第一名。受到了新疆军区的记功和嘉奖。

生产建设兵团是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哪里有“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兵团人就战斗在哪里。1990年4月5日，在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策划的武装暴乱。惨杀干部官兵8人，打伤39人，抢夺武警官兵枪支16支，子弹664发，砸毁大小汽车7辆。农三师接到平叛指挥部命令后的5个小时内，调集了一

个民兵团，在协助武警平暴中，农三师民兵抓获暴徒14名，嫌疑分子15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受到军委和解放军三总部的表彰，参战的6个民兵集体、94名个人立功受奖。

1997年2月5日，伊宁市发生严重的“2·5”打砸抢骚乱事件。农四师民兵应急营奉命出动武装民兵500人，平暴制乱，因行动迅速，处置果断，受到解放军三总部通报表彰，并荣立集体三等功。

鉴于境内外“三股势力”猖狂的破坏活动，1997年党中央决定：要进一步加强对兵团内武装力量的领导，由新疆军区一位副司令兼任兵团副司令，从转业军人中选调一批优秀的干部，加强兵团的师和团场一级领导力量。1998年，根据解放军四总部通知，兵团军事部由正师级调整为副军级，所属15个师局人武部由正团级调整为副师级，以加强兵团民兵的建设，提高军事素质，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维护祖国统一。

兵团的53个边境农场中，有38个农场处在边防第一线，守卫着祖国的领土。在保卫边境斗争中，兵团有数千名民兵参加了军民联防，和边防部队一起进行巡逻。仅农九师一个师1988年参加边防执勤和巡逻的民兵达1万多人次，有效地稳定了边境地区，防止了涉外事件的发生。

民兵在生产建设中是骨干、是突击队。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显著作用。1984年9月伊犁边境地区森林起火，农四师立即组织600多名民兵由副师长率领，与解放军及当地群众一起，经过十余天的搏斗，终于将火扑灭。1996年，有16 596名民兵参加抢险救灾915次。1999年，农二、三、六、七、八师人武部先后组织民兵22 000人次，和部队、武警战士一起投入抗洪斗争中，抢救遇险群众2 500多人次。

兵团150多名民兵常年担负兰新铁路、北疆南疆铁路9个点的护路任务，维护着5个车站、2座铁路桥、66公里铁路线的安全，并经常参与铁路公安部门打击偷盗运输物资的行为。以保障大动脉的畅通。

进入21世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年的生产总值441亿元，比2000年的176.41亿元增长149.99%。比1980年10.19亿元增长4 227.8%(生产总值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兵团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6 272元，比2000年增长140.6%，比1980年增长188.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0 521元，农牧工家庭纯收入为6 193元。

胡锦涛总书记亲临生产建设兵团视察时，要求兵团更好地发挥推动改革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大军作用；增强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作用；巩固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铜墙铁壁作用。生产建设兵团百万军垦战士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上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而奋斗。



附　　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区分布

20 世纪 50 年代，兵团屯政的设防布点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需要，即战略防务的需要和生产建设的需要。战略考虑主要是为了保卫祖国边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祖国统一；生产上的考虑主要是不与民争利，另外，选择水土资源有保证的地方，开荒造田以利大规模开发建设新疆。所以，从那时起就依托三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逐步建设了南疆农垦带、北疆农垦带和边境农垦带。大体上是沿着古"丝绸之路"部署的，根据屯垦戍边的需要，主要集中在北路和中路。

到2007年末，兵团共拥有土地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耕地1 044.48千公顷，人口258万多。兵团的领导机关驻乌鲁木齐市。各个垦区，先后经过两次大的调整和发展，现管辖13个农业建设师、1个工程建筑师。各垦区的农场、工交商建企业、学校、科研机构以及大批文化、卫生、勘测设计等机构，分布于全疆14个地、州，57个县、市境内，与新疆的事业融为一体，成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新疆各级党政机关的亲切关怀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

下面介绍各垦区的情况。

北　路

一、哈密垦区（农十三师）

哈密垦区位于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南北宽270公里，东西长297公里。东与甘肃酒泉地区接壤，西到巴里坤县的甘家地，北起中蒙边界，南抵兰新铁路的盐泉车站。全局总面积2 231千公顷，2007年耕地面积20.45千公顷。人口77 707人，其中少数民族16 216人，农牧团场人均纯收入5 291.09元。兰新铁路从东向西横



图 84　条田林网化



图 85　垦区驼群

贯垦区，公路畅通，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哈密和巴里坤是西域咽喉，军事重镇。自汉代起就是屯田基地。历代相沿，唐代和清代都在此大兴屯田，并以此为基地，逐步向西发展，经营和统一西域。1949年六军十六师进驻哈密后，即在此屯垦戍边。1953年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五师，后体制几经变更，1963年农五师师部西迁博乐，哈密垦区仍属农五师建制。以后隶属关系几次变动。1982年兵团体制恢复后，成立哈密农场管理局。2000年中央批准哈密农场管理局为兵团农业十三师，下辖11个农牧团场，工矿企业有年产万吨硫化碱的红星化工厂，年产各种塑料制品1 000吨以上的红星钙塑厂及红星水泥厂等76个，交通运输建设企业10个。2007年工农业总产值121 175万元(现行价格)，其中，工业产值70 792万元。

垦区属大陆性气候。全年积温4 053℃，极端高温35℃，极端低温-27.9℃，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全年日照时数为3 060~3 470小时，无霜期130~190天，平均162天，年降水量为62~180毫米。农牧场水流主要依靠天山融雪水，全垦区河水年径流量2.165 7亿立方米，河水利用量1.055亿立方米。至1986年累计打井714眼，年提水1.03亿立方米。种植业以粮食为主，同时种植瓜菜、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2007年粮食总产20 539吨，棉花28 442吨，果园面积7 475千公顷，水果总产93 366吨。牲畜年末头数为31.29万头(只)。兵团体制恢复后，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在保证粮食逐年增长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哈密瓜、西瓜、葡萄和棉花的生产。

矿产资源以煤、盐、芒硝、大理石为主，还有硫铁矿、金矿、石灰石、白云石、锰、石英等。

兵地融合发展，农十三师走得最早，搞得最好。按照哈密地区与农十三师商定的“经济互融、经验互学、干部互挂、文明共建”精神，团结一心，“区域共同发展，共建和谐哈密”的方针，打破地域和行政界限，积极进行融合共建，统一编制了土地和资源利用计划，合理配制优势资源，双方市场向对方开放，不断拓宽融合共建的领域和空间，定期召开区域融合发展联席会议，确定和落实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重要议题和困难，促进了哈密区域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为生产兵团发展、融合经济，取得了宝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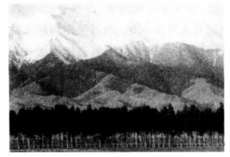


图 86　防护林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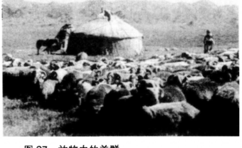


图 87　放牧中的羊群

2007年，农十三师经济效益指数为530.4%，居兵团各师之首。农十三师坚持科学发展，围绕新型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师直属工业企业和团场工业捷报频传，在2007年团场新办工业企业27家，2008年上半年又办了33家，都是通过招商引资办起来的，参股的八个团场，2007年工业分红超过千万元的有两家，2008年可达到5家。红山农场是个边境贫困团场，现有附属工矿企业和参股企业12家，2007年红山农场分红912万元，2008年预计可达1 100万元，该师领导认为，让外来民营企业家控股后，等于把民营企业的人才成为我们的人才，把民营企业的市场变成了我们的市场，同时旧厂房、旧机器等闲置资产被引进的企业盘活了。农十三师的工业正在朝气蓬勃地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融合经济的推动下，农十三师正在阔步前进。

伊吾县的淖毛湖农场

1950年春，战斗英雄胡青山率部在此驻防，被数倍于我军的惯匪围攻，胡部坚守40天。此后十六师即派部在此屯田戍边。

二、昌吉垦区(农六师)

昌吉垦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漠南缘，在天山北麓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师部驻五家渠。总面积168.30千公顷，耕地面积128.91千公顷。人口301 244人，其中少数民族36 120人，辖农牧团场20个，工业企业520个，交通运输建筑企业26个。汉代已开始在此屯田，到唐、元、清代此处均是重点屯田地区。

农六师的前身是鄂、豫、皖、苏区红军。抗日战争时编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后调陕甘宁边区与十六团、二十五团一起编为新四旅。解放战争时期，整编为六军十七师。1952年集体转业，与军区后勤部八一农场、六军军直猛进农场编为农业建设第六师。1982年兵团体制恢复后，地方国营芳草湖农场、新湖农场、军户农场、共青团农场、奇台农场、红旗农场、六营湖农场、土墩子农场划归农六师建制。

昌吉垦区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从南向北分别有山地、黄土丘陵、山前倾斜平原、洪积冲积平原、间杂零星沼泽、风成沙漠地貌等。山地主要是北塔山和天山山地，大部分地带不宜耕种。山前冲积平原是指奇台至玛纳斯县境沙漠以南、山地以北的山前平原。土地辽阔，地势平坦，横贯全师东、中、西三大农区。土壤自



南而北由薄变厚，农田土壤质地为沙质或壤质。中部平原属冲积、洪积平原。土壤多为栗钙土、棕钙土、灰漠土。平原西边和北边有大片盐碱地。西部平原为河系冲积平原，土壤多为荒漠灰钙土和少量盐化荒漠灰钙土，北部沙漠属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一部分，大部为蜂窝状新月形细粉沙丘，是部分团场的冬牧场。

此垦区为典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4℃~6.6℃，无霜期155~170天，极端最高气温40.7℃~44.8℃，极端最低气温-36.6℃~-42.2℃，年降水量120~170毫米，年蒸发量1 800~2 300毫米，全年日照时数2 743.4~3 236.9小时。灾害性气候主要有干旱、霜冻、干热风和冰雹等。

垦区内河川径流量为30.6亿立方米，与各县群众共用。主要引自玛纳斯河、呼图壁河、三屯河、乌鲁木齐河、三宫河、开垦河等12条河。兴修的水库有猛进水库、八一水库、大海子水库、鸭溪沟、西沙河、芨芨庙、下兴湖等15个水库。地下水补给量为5.5亿立方米，总开采地下水量为3.2亿立方米，占兵团开发地下水总量的45.7%。井灌面积52万亩，占全师总播种面积的24.7%。该师竖井排灌，为降低地下水位，进行脱盐、治碱、改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挖灌排渠1 131公里，无森林资源，农区造林12.01万亩。果园2.605千顷，水果总产22 853吨，葡萄22 317吨。矿产资源有煤、滑石粉、芒硝、石英砂。2007年生产总值471 040万元（当年价），工业总产值为202 591万元，产粮食221 701吨，产棉花145 367吨。牲畜年末数为837 100头（只），鱼总产2 426吨。



图88　农六师水库

农六师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全师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思路，即找准农六师、五家渠市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定位，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不断深化各项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推动农六师、五家渠市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近几年农业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经济发展迅猛，煤化工产业链建设顺利推进，团场工业重新起步，五家渠市城市建设不断完善，工业园区凝聚作用不断增强，职工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仅2008年上半年，该师即实现生产总值17.4亿元，同比增长21.3%；五家渠市实现生产总值9.9亿元，同比增长22.4%，实现地方财政收入4 556万元，同比增长50%。

农六师提出：要把农六师、五家渠市建成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的经济增长极和

隆起点，使之成为乌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有分量的一角，努力打造成为展示兵团良好形象的又一窗口。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加快酱用番茄、啤酒花、酿造葡萄、土豆、玉米、畜产品六大基地建设，强化农业产业化的资源优势和基础。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以煤化工产业链建设为重点，紧紧围绕重化工、能源、食品加工、塑料制品、机械装备制造和纺织"六大支柱产业"。大黄山鸿基焦化工程正按计划进行。2008年12月，2号焦炉将竣工。鸿基焦化一期年产80万吨焦炭将如期实现，成为新疆最大的独立焦炭厂。

三、乌鲁木齐垦区（农十二师）

该垦区位于乌鲁木齐市的西郊和南郊。西与昌吉市接壤，以头屯河中心线为界，东与柴窝堡和小盐湖相望，南部伸入和静、托克逊两县境内，北临乌鲁木齐县安宁区和市种苗场。土地总面积381.43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13.61万亩，山区牧场274.78万亩，造林1.91万亩。境内公路、铁路交错，交通便利，经济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局机关设在乌鲁木齐市北郊。管区的总人口69 033人。其中少数民族19 130人。唐代、元代及清代曾在此进行过屯田。

乌鲁木齐垦区的前身是自治区农垦厅西郊农场管理处，成立于1964年4月，下辖4个地方国营农场。1975年与农六师一〇四团场、养禽场合并，成立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直至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恢复。下辖7个国营农牧场，工业企业189个，交通运输建筑企业7个，2007年生产总值90 723万元（当年价），其中工业产值29 875万元。

垦区地处天山脚下，属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4.7℃~6.1℃。极端高温42℃，极端低温-38℃，年均日照2 762~2 881小时。无霜期147~163天，年均降水量177.4~500毫米。山区多，农区少。平均年蒸发量1 780~2 221毫米，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春、秋季常有干旱、倒春寒气候，夏季则干热风多，冬季多风。

垦区水资源主要靠乌鲁木齐河、头屯河引水灌溉，年引水量1.3亿立方米，占灌区总水量的82%。另拦蓄泉水2 141万立方米，到1986年底累计打井173眼，年提水量1 200万立方米。已建的水库5座，库容3 500万立方米，防渗渠道589.5公里。

垦区内矿产资源有煤、耐火土、高岭土、石灰石、红砂、建筑砂石、大理石等。

垦区面向乌鲁木齐市，建立了三大副食品基地，用以满足各族人民需要。它们主要是：

牛奶基地。建立在南戈壁的西山奶牛场。该场引进了优良品种西德黑白花费里森，荷斯坦奶牛，体形高大，产奶量高，质优，经过精心培育繁殖，现已达230头。每头日产奶25.7公斤，乳脂率平均高达4.3%。还陆续兴建了五一农场奶牛场2个、104团奶牛场2个、头屯河农场奶牛场2个，并改建、扩建三坪奶牛场。8个规

模400头的奶牛场分布市郊，总头数3 078头，较1988年增加2 010头，2007年产奶7 723吨。

禽蛋基地。养禽场位于乌鲁木齐市北郊，人口1 823人。该场引进法国“伊沙黄”蛋鸡和“明星”肉鸡。由于干部工人的刻苦钻研，不断提高饲养管理水平，成活率达到95%。法国专家评价已接近法国的饲养水平。该场改散养为笼养。



图 87 红色产业番茄丰收



图 90 番茄外运加工

渔业基地。截至1989年垦区水库水面已达1.6万亩，库库养鱼，并在北郊的五一农场北部修建第一期工程渔塘200亩，已蓄水投放鱼苗。全垦区2007年鱼总产1 040吨。

垦区各农场大量发展蔬菜，推行塑料大棚，四季供菜。

全垦区1988年向市场提供肉类1 602吨，牛奶6 202吨，禽蛋2 846吨，蔬菜12 021吨，瓜果2 900吨。2万多名职工，每人每年为乌鲁木齐市奉献牛奶278.6公斤，蛋133.5公斤，肉类71公斤，蔬菜543公斤。

农十二师根据位于乌鲁木齐市郊区的地缘优势，决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面向乌鲁木齐市。2008年上半年可拿出肉类5 217吨、牛奶8 597吨供应乌鲁木齐市民，并确定每年拿出1 300万元扶持奶牛养殖，并有大量瓜果、禽蛋等供给乌鲁木齐市场。

为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2007年与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组建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十二师分区”。统一享受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计划近期开发15平方公里园区，目前园区现代制造业园、新型能源业园、临港物流园、绿色加工业园、城市综合功能区“四园一区”的格局初步显现。新疆天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增资合作项目正式入驻，重庆万州蓝希络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屠宰、肉品深加工项目正式投产，新赛股份公司、华商物流集团等一批特色支柱企业的扩建项目正在实施。2008年上半年，园区实现招商引资5亿元，年内拟批准并安排在合作区用地的项目25个，如协商成功，投资金额将达数10亿元。

2007年初，农十二师将原来属于4个团场的5座小煤矿实行优势化整合，组建了新疆昌平矿业公司。由于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2007年这个师煤矿总产



图91　葡萄生产基地



图92　葡萄丰收

达34万吨，实现增加值3 791.76万元，实现利润1 145.42万元，分别比整合前增长24.29%、43.12%、40.59%。

四、工程建设第一师

2007年，工程建设第一师有人口41 638人。对外称为“兵团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下辖20个团（对外称建筑安装公司）。还有机械厂、运输公司、商业处、物资处、设计室、科研所……等县、团企事业单位共17个。现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承担民用建筑、铁路、公路、水利、水电建设施工能力的联合企业，师部驻乌鲁木齐市。2007年全师社会总产值120 380万元（当年价）。

有全民、集体大小工业企业26个，从业人员3.49万人。列入国家考核的23种主要产品有水泥、红砖、混凝土构件，乳化沥青、工程机械、钢门窗以及服装、皮靴等。2007年总产值433 722万元（现行价）。

为了保证职工生活需要，这些企业共种地4.15万亩。1988年生产粮食91.8万公斤、棉花7 220担、油料74.8万公斤，甜菜12 530吨。年末牲畜存栏7 002头，肉类总产54吨、羊毛30吨，还生产了大批瓜菜水果。

兵团在成立之初，就十分注意水利工程建设和民用建筑工程建设。先后成立了工程建设第一师，主要承担乌鲁木齐市和兵团的建筑安装任务。工程第二师主要承担兵团的重点水利工程和水电工程以及自治区北疆的道路工程和国防工程。工程第三师主要承担南疆的重点水利工程、道路工程和国防工程。兵团的建筑工程部队踏遍了天山南北的山山水水。各农业师均成立了工程团（支队），到1966年全兵团建筑工程职工达11.6万余人。先后参加了建设大批现代化工厂和水利工程、水电工程、公路工程、国防工程及院校的建筑工程，如：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六道湾煤矿、十月汽车修配厂（现十月拖拉机厂）、新疆水泥厂、乌拉泊水电站、独山子油矿建设、克拉玛依油田建设、红雁池发电厂、新疆制药厂、铁门关水电站、石河子红山嘴电站、八一毛纺织厂、八一糖厂、铁路局配件厂……等等。还参加了新疆医学院、八一农学院、新疆大学、新疆工学院、兵团农学院、自治区党校、军区医院、八一子女学校、军区八一俱乐部以及乌什塔拉基地福利区的建筑工程。为发展自治区的交通事业，兵团工程部队先后参加了南疆铁路、北疆



铁路建设。翻越昆仑山修筑了青藏公路，两进天山修筑了乌—库公路(乌鲁木齐至库车)和〇五〇三工程。在塔克拉玛干大漠深处修筑了库—若公路(库车至若羌)、喀—若公路(喀什至若羌)，在准噶尔戈壁上修筑了独—克公路(独山子至克拉玛依)、乌—克公路(乌尔禾至克拉玛依)以及在乌孙山上修筑了伊—昭公路(伊犁至昭苏)，总长达1万余公里。并和各师工程部队一起，承担了兵团的大型水利工程。如：农一师的上游水库、胜利水库；农二师的大西海子水库、卡拉水库、爱米尔水库；农三师的小海子水库、永安坝水库；农六师的猛进水库、八一水库、大海子水库；农七师的柳沟水库、奎屯水库；农八师的夹河子水库、蘑菇湖水库、大泉沟水库；农九师的乌拉斯台等共96座水库。还修筑了各级渠道4.7万余条，长达63 700公里，打井6 000余眼。兴建了戈壁新城石河子、奎屯、五家渠、阿拉尔、北屯、五五新镇等新兴城镇。兵团的工程建筑队伍为开发建设新疆，为军垦事业的发展，立下了功勋。

兵团解体后，工程第一师交给了自治区(现区建筑工程局)。工二师、工三师也相继解体。1974年国家批准修建南疆铁路，兵团党委组建了铁路工程纵队(师级)，下辖5个支队。同年8月改为铁路工程指挥部，1979年更名为自治区铁路工程局。兵团体制恢复后，1983年改为兵团建筑工程第一师。该师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怕苦，不畏难，年年月月在流动，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从戈壁到雪山，从老风口到冰达坂，风尘仆仆，任劳任怨，以对祖国的忠诚，用自己的双手树立了工程兵的丰碑。

中国第一道冰碛垄隧道——扎亥萨拉隧道；中国西部最大的曲线铁路桥——哈尔嘎哈特大桥，新疆最高的冷却塔——玛纳斯电厂冷却塔，大型电站的短、平、快工程——西大桥水电站，新疆第一座热电厂——石河子热电厂，这些工程都是在设备简陋，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现在全兵团工程建筑安装企业共有275个(含工一师各企业)。其中国有企业143个。2007年末职工人数12.49万人。

五、石河子垦区(农八师)

石河子垦区位于天山北麓中段玛纳斯河流域，准噶尔盆地南缘。地跨沙湾县、玛纳斯县和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4个县、市。2007年耕地面积179.43千公顷。水库15座，蓄水能力54 445万立方米。人口597 068人，其中汉族597 068人，少数民族31 484人，唐代清海军曾在此屯田。

农八师前身为新疆和平起义部队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二十六师。1955年与农十师合并。1975年，兵团体制撤销，成立石河子地区，农八师及农七师下野地垦区7个团场划归石河子地区。1979年撤销石河子地区成立农工商联合企业。1982年恢复农八师，师部设在石河子市，下辖19个农牧团场。有工矿企业432个，交通建筑运输企业96个。2007年生产总值1 020 180万元(当年价)。其中，



图 93　石河子新城

工业产值302 798万元。粮食总产52 597吨，棉花总产297 762吨，是兵团的粮棉及甜菜生产基地。牲畜年末头数为39.80万头（只）。

石河子市是由兵团石河子管理处、农八师及水利工程处等单位在戈壁荒滩上共同开发建起来的一座军垦新城。1976年1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石河子市。工业、商业、教育发达，街道整洁，绿化覆盖率达40%以上，居新疆各城市之首，被誉为戈壁上的明珠。垦区内有山坡、平原和沙漠。农场耕地多在海拔300~500米的洪积平原上，地势平坦。自东而西分布着玛纳斯河、宁家河、金沟河、巴音沟河，总径流量19.45亿立方米，与沙湾、玛纳斯两县群众共用。其中，玛纳斯河流量占64%，是农业灌区的主要水源。垦区内有泉29个，分布于洪积扇、冲积扇下缘。泉水溢出量，50年代约为5.26亿立方米，现约3.9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约6~7亿立方米。

此垦区属典型大陆性气候。冬寒夏热，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雨量稀少。年平均气温在6℃~6.6℃之间，极端高温43.1℃，极端低温-42℃。无霜期160~170天。年降水量110~200毫米，年蒸发量1 500~1 900毫米，全年日照时数平均2 750~2 840小时。灾害性气候有旱灾、冻灾、冰雹、风灾等。

该师经济以农工结合、城乡结合、农工商一体化为特色。以种粮、棉、甜菜为主，油料、瓜果、蔬菜次之。乌伊公路和北疆铁路横贯境内，交通便利。

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

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中部的石河子市。1992年设立，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兵团党委"把开发区建设成为经济开发的先导区，高新技术的密集区和利用外资的高增长区"的要求，紧紧抓住自治区党委"优先发展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兵团党委"做大做强石河子垦区"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优势，借国内外知名企业，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走出了一条发展优势，突出特色，外向带动，资源转换，产业聚集的发展之路。

到1999年底，石河子开发区有注册企业263家，注册资金3.7亿元，实现生产总值1.8亿元，税收3 365万元。



2000年4月，国务批准了石河子开发区升格，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审时度势，制定了"招商先行，服务为本，欲取先予，跨越发展"的思路，使开发区发展速度加快。先后有台湾顶新集团康师傅方便面食品、旺旺集团方便面食品、浙江娃哈哈饮料、江苏华芳纺织、北京燕京啤酒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石河子开发区已成为自治区重要的棉纺织、绿色食品、现代农业装备和化工产业基地。在推进农八师乃至兵团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

生产总值：2007年为35.54亿元，比2000年增加32.52亿元，年均递增50.7%。

财政收入：2007年为3.15亿元，比2000年增加2.5亿元，年增递增30%。

税收：2007年达到5亿元，比2000年的0.42亿元，增长4.58亿元，年均递增51.8%。

固定资产投资：2001~2007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1.39亿元，年均递增21.4%。

石河子开发区正在昂首阔步前进。

六、奎屯垦区（农七师）

该垦区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天山北麓塔城地区乌苏县境内。东接石河子，西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毗邻。2007年末人口218 793人，其中，少数民族7 327人。耕地面积97.66千公顷。下辖10个农牧团场，2个水利工程处，280个工交建企业，以及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科学试验站、教师进修学校、车排子医院、勘测设计队、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等单位。铁路、公路贯通垦区，交通十分便利。

农七师的前身是新疆和平起义后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步兵二十五师。1950年3月进驻垦区，1954年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七师。至1966年发展到3个管理处、3个总场。共23个农牧团场，18个师直属工矿企业单位，兴建了一座奎屯新城。耕地面积126.77万亩，林木面积16万多亩，果园3.17万亩，总人口22万余人。1962年位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精博总场划归农五师，1969年位于塔城的第三管理处9个农牧团场划归农九师，1975年下野地区域的第一管理处6个团场又划归石河子地区。奎屯设市，直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领导。农七师体制多变，现仅为原规模的1/3左右。2007年生产总值353 612万元（当年价），其中，工业总产值199 072万元。粮食总产61 150吨，棉花总产127 030吨，其中，80%供出口，是兵团的棉花基地。牲畜28.04万头（只）。

垦区为山前冲积洪积湖积平原，地势南高北低，坡度在1‰~5‰之间。除个别老沟谷地外，大部分地势平坦，适于农业生产。气候属于中亚大陆性气候。年最高气温为40.2℃，最低气温为-42.3℃，无霜期160~180天左右，年日照时数为2 700~3 000小时，年降水量200毫米。垦区水利资源有奎屯河、古尔图河、四棵树河，年径流量12.6亿立方米，与乌苏县群众共用。有泉水1.04亿立方米，已打井470眼（1985年数），年抽水1 780万立方米。有水库6座，总库容量2.25亿立方米，具有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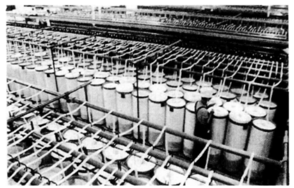


图 94　昌恒纺织有限公司纺织车间

较完善的灌溉系统。

成立天北新区。

奎屯市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自治区天山北坡经济带西端，南与独山子一路之隔，西与乌苏市隔河相望，是312、217国道交汇处，欧亚大陆桥横穿境内，与独山子、乌苏合称“金三角”。

2001年6月，农七师、奎屯市、独山子三家提议联手共建开发区的构想，三家携手共建、共管、共商、共享。2002年7月，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人民政府批准在奎屯市北部农七师师部驻地成立天北新区。规划面积为61平方千米，现有人口5.8万。驻区纳税单位515个，行政单位54个，将天北新区定位为商贸、旅游、休闲的综合生态城区。税收中地方收入部分实行分成制，按照奎屯市六成，农七师四成进行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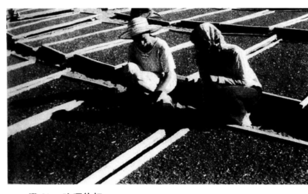
天北新区2002~2007年成立五年来，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兵地融合发展的机遇，以建设、管理、经营、服务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重点，围绕发展这一要务，累计完成生产总值31.9亿元，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亿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95亿元，完成招商引资11.2亿元，房地产开发面积50万平方米，新区面积焕然一新，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社会步入健康发展的道路。

农七师以种植棉花为主，一枝独秀，受市场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往往一荣俱荣，--损俱损。师党委提出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战略。要求各团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突出特色，形成一团一品、一团一特的格局，并力争在全师实现百万亩土地自动化滴灌。

七、博乐垦区（农五师）

该垦区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缘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这里在唐代盛期就是“丝绸之路”的名镇。据《新唐书》记载：黑水向西“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黑水河即今之乌苏。石漆河就是今天的精河。清代精河和博乐都是屯田的地方。农五师的师部在博乐市，是兵团的边境师之一，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该师的前身一部分是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编为一一五师的教导旅，后调陕甘宁边区与陕北红军一部编为教导旅，后编为六军十六师。1953年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五师，1954年兵团组建后隶属兵团管辖。1957年撤销农五师建制改为红星农场总场，下属三个分场、两个牧场。1959年2月恢复农五师建制。1960年在博州开发新垦区，建立了红星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六场。1963年11月师部由哈密西迁博州。原农七师精博

总场沙山子农场、托托分场、运输处幸福农场、精河农场、商业处的红旗农场、工二师艾比湖农场都划归农五师建制。1988年末全师总人口为69 155人，其中汉族60 714人，维吾尔族2 726人，哈萨克族2 550人，回族1 826人，蒙古族1 103人，其他民族236人。职工29 563人。拥有土地面积464.30万亩，耕地面积47.14万亩，林地20.72万亩，草场265万亩，水域6.13万亩。所属农牧团场11个，独立核算工业企业6个。1983年以来，该师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推广先进技术，生产发展较快。1988年社会总产值23 349万元，工农业总产值23 349万元（当年价）。粮食总产56 545吨，上缴36 338吨，棉花总产9 432吨，上缴国家9 115吨，出口5 011吨，1988年全师12.5万亩陆地棉亩产皮棉，居全兵团之首。年末牲畜存栏182 619头（只）。垦区由艾比湖盆地和博尔塔拉河谷地两大地貌单元组成。北、西、南三面群山环绕，西高东低。平原属温带干旱荒漠气候，冬冷夏热，年较差最大值达44℃。光照充足，秋季降温快，降水稀少。年均气温8.3℃~3.6℃，极端高温42.2℃，极端低温-36.4℃，年降水量为90.9~291.3毫米，精河平原不足100毫米，博尔塔拉河中下游年平均降水在70~190毫米。年蒸发量1 555.7~3 421.3毫米。风力平均大于8级的有165天（阿拉山口）~99天（塔斯海）。年日照2 710~2 900小时，无霜期154~194天。


图 95　晾晒枸杞

农五师缺少资源优势，既无作为工业发展基础能源的煤炭，也没有重要的矿产资源，工业发展项目选择余地少。在此情况下，如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农五师在实践中探索出："走出家门办工业，寻求合作图发展"的新路。

2008年9月，农五师与霍城县签订了大型煤化工项目协议。在2010年前投资30亿元，完成年产100万吨煤矿矿井建设。

农五师针对本师实际情况，确定"增能源，强油脂，兴纺织，拓建材，育矿化，精农产品加工"的方针，首先解决电力严重短缺问题。2007年，师电力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新疆北疆电网实现了联网。该师还积极开发阿拉山口风能源，兴建20万千瓦大型风电厂，今年已启动与国家电力总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4.95万千瓦风电厂一期工程。农五师与南岗建材集团共同投资2亿元，兴建博乐南岗建材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水泥项目，目前已生产水泥5万吨，出口哈萨克斯坦4万吨。与此同时，农五师做大做强做优油脂产业，年生产销售的20万吨油脂产品，占新疆市场总量的40%以上。该师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辐射疆内外，集科研、加工和销售为

一体的油脂产业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

农五师以种植棉花为主，由于品质优良，大部分出口。同时该师的枸杞，可与宁夏产枸杞相媲美。

八、伊犁垦区（农四师）

伊犁是祖国的西陲要塞，西邻哈萨克斯坦，为古乌孙国之地。公元前110~105年，汉武帝就以细君公主嫁西域乌孙国王猎骄靡为王后，汉与乌孙国建立起友好关系，并开始在此屯田。以后唐、清均是重点屯田地区。清代统率新疆的伊犁将军府就设在惠远城。三区革命时，首府在伊宁市。1949年后，伊犁区党委和五军军部（原民族军）驻伊宁市。农四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十四师（即前民族军所属各团）、十五师（1952年3月由原二军五师十三团、六军骑兵团、军区通讯团组成）于1953年7月改编而成的。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后改为农六师五零农场，于1965年划属农四师。

伊犁气候温和，水土资源丰富，是亦农亦牧的好地方。从1950年春季开始，驻伊犁的解放军就开始了大生产运动，屯垦戍边。以后生产迅速发展，到1988年年底农四师共有人口230 103人，其中，汉族188 207人，维吾尔族10 600人，哈萨克族20 808人，回族6 787人，蒙古族2 205人，少数民族共41 893人。农作物播种面积101.89千公顷。下辖农牧团场23个，工矿企业465个，建筑企业、运输企业共19个，师部驻伊宁市。2007年生产总值319 391万元（当年价），其中工业产值193 742万元。境内北、东、南三面环山，开口向西。伊犁河及其三大支流特克斯河、喀什河、巩乃斯河蜿蜒其间。形成伊犁河谷地、喀什河谷地、巩乃斯河谷地、特克斯河谷地和昭苏盆地。既有中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基本特征，又有较温和湿润的气候特色。年平均气温2.9℃~9.2℃。日照时数2 400~3 000小时，无霜期87~162天。降水量西部平原200毫米左右，南部昭苏盆地400~500毫米，降水量集中在春夏两季，约占全年60%~70%。蒸发量西部为1 800毫米，昭苏为1 250毫米左右。伊犁垦区是兵团的粮食基地和油料基地。2007年粮食总产350 459吨，商品率73%以上。产油料45 073吨，商品率高达80%。薰衣草油产量和质量，为全国之冠。各类牲畜年末存栏99.38万头（只）。该垦区生产的“伊犁大曲”白酒，被誉为“塞外茅台”，驰名全疆。

伊犁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积极开发新产品，拓展经营领域，制定市场营销战略，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大力推进企业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全面推行质量管理体系，使公司走向快速发展的道路，由一个传统的白酒生产销售企业，发展成为以“伊力”牌系列白酒生产营销为主业，涵盖科研、食品加工、野果综合开发、生物工程、印务、房地产、天然气供应、宾馆、旅游服务等产品和产业相配套的多元化公司制企业。

自1999年“伊力特”上市到2007年底，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19.87亿元，实现销

售收入31.09亿元，利润7.875亿元，累计实现税金8.668亿元。

2002年，"伊力"牌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3、2004、2005、2006年"伊力"被授予中国白酒工业百强企业和中国白酒十家经济效益企业。



图96 口岸外贸储运货场

2007年8月，"伊力"牌以6亿元的身价再次名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2007年公司完成工业增加值4.33亿元，同比增长20.78%；实现利润1.32亿元，同比增长18.9%；上缴税金1.5亿元，同比增长7.14%；职均年收入26 000元，增长10%。

农四师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特别重视节能减排。该师伊犁南岗建材集团全面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将工业废渣及尾矿资源进行再利用。2007年消耗制糖滤泥、煤矸石尾矿共约69万吨，比上年多利用近一倍；集团回收4 000吨粉尘和炉渣作为水泥混合料。伊犁双新焦化厂利用炼焦产生的煤气，建成煤气发电站，每年可节约锅炉用煤5 000吨，发电240万千瓦时，一年完成该企业"十一五"节能目标的52.5%。该师绿华糖业有限公司2008年投资200万元实施的50吨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改项目已接近收尾。项目完成后，燃煤的热利用率将提高20%以上，企业一个榨期可节煤5 000吨左右。南岗建材集团窑头窑尾废气余热发电项目、焦化生产综合利用配套等一批节能减排项目正在抓紧实施。农四师对节能减排抓得实在、抓得具体，确有实效，走在了兵团前列。

九、塔城垦区（农九师）

塔城垦区位于准噶尔戈壁西部，塔尔巴哈台山下的塔城地区境内，与哈萨克斯坦毗邻，是边境师之一，师部驻额敏县。该师是1969年由农七师三管处与工二师十二团、十三团、工三区和红山农场组成的。下辖农牧团场11个，独立工矿企业7个，运输公司2个，建安公司2个，商业、供销企业9个。农作物播种面积76.39千公顷，草场325万亩。2007年人口71 648人，其中少数民族占3.8%。生产总值98 450万元（当年价），其中，工业产值44 482万元。粮食总产115 743吨，商品率63%。油菜10 659吨。牲畜总头数为554 200头（只），肉总产13 941吨。有的团场生产条件很差，是因为戍边任务需要而建场的。

垦区属大陆干旱性气候。年平均温度3.6℃~6.1℃，额敏地区平均5.8℃，极端低温-42.6℃。全年日照为2 457~2 981小时。无霜期118~135天，最短88天，农区年降水量322毫米，其中4~10月降水为223毫米，占总水量的69.5%。垦区有22条河

沟。年径流量3.2亿立方米，丰水年为常年的1.35倍。垦区适于小麦、油料作物生长和发展畜牧业，是兵团的重点粮油基地和畜牧基地。兵团体制恢复后，该师修建了乌拉斯台和乌什水库，积极引进灌溉新技术，1988年喷灌已发展到11.5万亩(其中自压喷灌9.5万亩)。大大改善了灌溉条件，农牧业生产稳步发展，为兵团发展节水农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8年，农九师各团场已向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出口各类蔬菜2 500吨，这是农九师推行"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模式，落实产品订单收购政策的成果。按照国家进出口检验检疫局的要求，该师建立了一六三团、一六五团、一六八团、一七〇团、团结农场5个出口蔬菜种植基地，在农药、化肥、植物调节剂使用中，严格按照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标准，确保了蔬菜品质。通过塔城永利进出口公司，这5个蔬菜基地共签订了9 300吨蔬菜合同，订单面积达2.5万亩，可带动8 000户职工增收。2008年，农九师承包户一座0.5亩地的大棚一茬西红柿收入要比往年增加3 000元以上。

十、阿勒泰垦区(农十师)

阿勒泰垦区位于准噶尔盆地北缘，阿尔泰山以南的阿勒泰地区，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交界，是兵团北部边境师。师部驻阿勒泰市的北屯镇。农十师是1959年初经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批准在原二十八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土地面积61.37千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47.25千公顷。总人口76 634人，其中少数民族2 112人。该师下辖农牧团场22个，工矿企业107个，交、建企业12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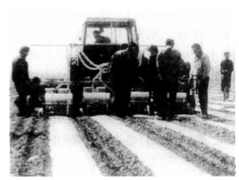
垦区属亚寒带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4.1℃~4.4℃，最高气温41.9℃，最低气温-51.1℃，无霜期平均12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87~188.6毫米。海拔300~700米。该垦区土壤大部属戈壁沙壤，土层薄，有机物少，易碱化。有的农场条件极差，主要是为了屯垦戍边而建立的。主要种植粮食、油料。牧业、渔业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很快。2007年社会总产值为104 064万元(当年价)，其中，工业50 959万元。产粮21 854吨，为阿勒泰地区粮食自给作出了贡献。油料总产36 150吨。大小牲畜113 100头，鱼类总产2 086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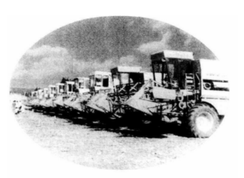

图97　女收割机手

2008年农十师各类作物面积73万亩。入夏以来，垦区遭到5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流经该师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基本干涸，55.78万亩农作物受旱。

为了确保作物丰收，农十师紧急动员，上下一心，采取措施，进行抗旱。首




图98 棉田覆膜


图99 收割机队整装待命

先拿出5 588万元新增加压滴灌面积15.74万亩，使全师节水浇灌面积达到37.74万亩。该师一八四团的12万亩棉花已经100%实现加压滴灌。农十师还投资1 835万元实施渠道防渗、坑塘堵水、围栏水等一批应急抗旱工程，缓解了浇灌用水短缺的矛盾。

农十师一八六团与哈萨克斯坦仅一河之隔，近年，该团所有耕地全部实行喷灌或滴灌。团场城镇化建设日新月异，形成了以团场城镇为中心，以吉木乃口岸为依托，认真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团场工业，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哈萨克斯坦建起了砖厂、建材厂和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预计2008年的工业总产值将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

中 路

一、吐鲁番垦区（二二一团）

二二一团位于天山南麓吐鲁番盆地北缘的吐鲁番地区境内。团部在吐鲁番市交河镇西，距吐鲁番市13公里。交河故城是汉代的屯田地区，公元前76年，郑吉派300名士卒在交河屯田生产。垦区属盆地戈壁砾石地带，几乎无植被。土地面积20千公顷，现种植葡萄、棉花共


图100 吐鲁番葡萄

0.9千公顷，林带1万亩。2007年人口5 856人。该团土层薄，气候酷热。主要引用博格达山大河沿水系（红星三渠）及地下水灌溉。年平均气温13.9℃，绝对最高气温48.6℃，最低气温-24.0℃，昼夜温差14.6℃，全年30℃以上高温达146~151天。年均日照3 000小时，无霜期220天。居吐鲁番"风库"的风口，风力一般8~9级，最大11~12级。大风期多在3~8月。海拔高处为1 252米，最低处为-142米。

二二一团前身是十六师四十七团，后编为红星三场。几经变动，1982年归兵团直属农场。现划归十二师建制。这里适于葡萄生长，1984年以来，葡萄发展很快。到1988年，葡萄面积已达10 108亩；2007年葡萄水果总产15 965吨，葡萄干210吨，是兵团的葡萄生产基地。该场还加工葡萄酒800吨，葡萄罐头500吨。桑椹饮料，品质优良，畅销区内外。种植棉花1万亩，产皮棉8 540吨。2007年生产总值6 892万元（当年价）。

还有1万亩林带，以防风沙。

二、库尔勒垦区（农二师）

该垦区位于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北边缘的库尔勒地区境内。焉耆原是丝绸之路重镇。库尔勒以西的轮台县是汉代南疆最早的屯田地区，西域第一任都护府就设在乌垒（轮台县野云沟一带）。唐代和清代都曾在此屯过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师进驻焉耆，一面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师长张仲瀚率领一批农业和水利专家及团、营干部100余名，于10月先于部队到达库尔勒、焉耆、尉犁、和静等地勘测水土资源，当即决定修渠引水。1950年开荒5万亩，经过40年的辛勤创业，现有土地资源70.04千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6 936千公顷。果园17.288千公顷，水果总产104 768吨，其中库尔勒香梨总产86 638吨，驰名全国。人口204 389人。师部驻库尔勒。下辖农牧团场18个，工、交、商、建企业187个。2007年生产总值330 194万元（当年价），工业总产值139 031万元（当年价）。产粮53 069吨。产棉花93 070吨。牲畜53.29万头（只），其中鹿50 223只，产鹿茸39 930公斤。是兵团重要的粮棉基地，也是香梨和鹿茸基地。有水库5座，库容量36 610万立方米，鱼总产2 625吨。农业区年平均气温7.9℃~11.4℃，极端低温-35.2℃，极端高温42.3℃，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2 886~3 138小时，年降水量平均为23~72毫米，年蒸发量平均为1 300~2 788毫米，无霜期161~220天。

该师的前身是三五九旅和晋绥军区派出的300余名干部于1947年2月在山东渤海地区组建。建军后名为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同年9月编为西北野战军二纵独立旅，后又编为二军步兵第六师。1949年底，进军新疆后驻焉耆。

农二师湖光糖厂，是1984年11月6日由国务院农牧渔业部批准兴建的，日处理甜菜1 000吨（现已达日处理甜菜1 300吨），设有制糖、酒精、颗粒干粕、动力、机修5个车间，生产设备1 009台。总建筑面积55 581平方米，总投资5 134万元。1985年完成了施工现场和建筑材料准备及大部分设备订货和职工培训工作。1987年9



月27日加工甜菜一次试车成功，整个建筑周期仅16个月。建厂速度，列全疆同类糖厂之首。

库西工业园区。

农二师立足果品这一特色优势资源，抓住自治区在南疆环塔里木盆地沿线建设100万公顷特色经济林的机遇，大力发展冷库仓储物流业，通过招商引资，兴建20万吨冷库群，辐射南疆干、鲜果品加工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库(库尔勒)西工业园区，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加快农二师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思路。之前，已投资7 000多万元，安排了二十九团新城镇和三十团沿314国道生态林。

2005年6月，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党委和政府批准农二师成立“库西工业园区”，作为库尔勒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工业园，享受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按照“统一规划，主体开发，企业入园，资源共享”的要求，园区内现有工业企业以2004年底纳税额为基数，从批准日起，园区内新建企业及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后新增生产能力部分缴纳的税收，属地方收入部分，五年内留在园区内用于基础建设，五年后按照地方和农二师5:5的比例进行分成。



图 101　库尔勒香梨

到2007年底，园区累计引进企业11家，其中已建成2家，总投资13 350万元，在建企业4家，2007年总投资额10 750万元；意向入住企业5家，总投资9 000万元。

农二师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依托特有的水土、光热、地缘和物种等优势资源，集中力量，重点推进棉花、番茄、辣椒、制糖、林果、畜产品等优势农产品产业化建设。该师特色农业产业新格局正在形成。

三、阿克苏垦区(农一师)

该垦区位于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阿克苏地区境内。这里原是汉唐重点屯田地区，汉代姑墨国、龟兹国所在地。唐代在西域设安西大都护府，是西域的最高军事指挥部，又是行政首脑机关。大都护府就设在龟兹首都伊罗卢城内(今库车城东郊皮朗古城遗址)。是汉唐“丝绸之路”重镇。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五师进驻阿克苏，即在此屯田生产。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六军团，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曾参加过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后期编为二军五师。1953年部队集体转业，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

第一师，师部驻阿克苏市。

这支部队40年来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共垦荒240万亩。现有土地总面积151.08千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148.23千公顷，修建斗渠以上排灌渠道4 500多公里，建筑平原水库5座，总蓄水能力达51.720亿立方米，并在素有“无缰之马”的塔里木河上修建了长1 600米的现代化大桥和钢筋水泥的拦河大闸。2007年总人口291 388人，其中，维吾尔族18 799人，哈萨克族、回族共2 120人，少数民族共23 189人，汉族268 206人。下属农牧团场17个，工交商建及运输企业173个。2007年生产总值563 412万元（当年价），其中工业总产值270 197万元；粮食总产161 566吨，棉花总产279 348吨。大小牲畜48.56万余头（只），其中，鹿2 191只，产鹿茸1 519公斤。果园22 864亩，产水果119 566吨，所产阿克苏苹果誉满全疆，总产3 415吨。

阿克苏垦区是兵团重点粮、棉、瓜果基地。所属的二团于1988年上缴粮食29 015吨，列入全国100个交粮先进县的行列。垦区高级农艺师杨亚东在塔里木垦区工作已55年，他精心培育出堪与埃及长绒棉“吉扎-45”媲美的新品种。1984年种植30万亩，出口到东欧、日本1万吨以上。2007年种植44.53万亩，长绒棉总产量96 699吨，是全国最大的长绒棉基地。该垦区栽培的优良品种“新海三号”长绒棉，亩产达到134公斤。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农一师直属的新疆阿克苏农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独家发起，社会募集方式设立，是集农业综合开发、畜牧业、林果业、草业、制药业、房地产、良种繁育、节水器材、能源综合利用为一体，具有先进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公司股票于1999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新农开发”。

公司拥有三个农场、六家控股子公司、七家参股公司，至2007年末，公司总资产达27.52亿元，净资产11.17亿元，公司主要产品为棉花、粮食、油料、甘草制品，棉浆粕、乳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众多地区。2004年，被中国企业家协会评为全国优秀企业，“新农”牌棉花被评为全国名牌产品。从1999年到2007年，农业种植一直是公司的支柱产业，积极推进农业的发展，同时努力做大做强相关产业的经营，依靠技术创新，科学管理，促进了公司快速稳健的发展。1999年，净资产71 498万元，到2007年达到111 681.42万元，增长56%。营业利润率2007年达到19.27%。

农一师是兵团植棉大师和经济强师。该师提出紧紧围绕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建设，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建设，抓好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改善民生，加快推进全面小康建设步伐。实施以生产集约化、技术集成化、管理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战略，不断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实施以优势资源转换为重点的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新农棉花”、“青松水泥”、“托木尔酒”、“天山雪米”等产品品牌为主的名牌战略等。在农业上，重点加强棉花产业、米业、酒业、水果蔬菜业、畜牧业、种业等六大支柱产业，建设棉

花、粮食、鲜果、干果、园艺、肉类、牛奶和饲料种植八大特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工业上，重点发展新型建材、纺织服装、农业机械、矿产开发、农副产品深加工、能源化学工业等六大产业，使工业成为建设经济强师的主导力量。



图102 棉花丰收

2007年，全师职均收入已达1.99万元，在兵团名列前茅。

四、喀什垦区（农三师）

喀什垦区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大多数农牧团场建立在叶尔羌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上。这里也是汉唐屯田地区，唐代的“疏勒七屯”就在这些地方。1965年成立农三师，师部设于喀什市。

农三师是以原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加上各师抽调的人员，及相继并入的巴楚农场、伽师农场、莎车农场、东风农场，于1965年组建而成。农三师经过20多年的开发建设，到2007年底，农作物播种面积86.27千公顷，果树面积9.261千公顷，产水果72 424吨，有水库5座，库容83 800万立方米，人口13.6万人，辖农牧团场18个，工交商建及运输企业152个，中、小学校201所。

该垦区属大陆性气候，海拔1 100~1 300米，年日照2 784小时，有效积温4 400℃~4 600℃，光热资源丰富，年平均无霜期220天，降水量61.5毫米，蒸发量2 487毫米。垦区内自然资源丰富，有天然胡杨林和红柳等灌木林44.26万亩，甘草13万亩，罗布麻4万亩，可垦荒地200余万亩。土壤为草甸土、盐土、沼土、风沙土4种。

2007年生产总值226 234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5 100万元（当年价）。粮食总产64 179吨，棉花总产151 250吨，是兵团的粮棉瓜果基地。引进安徽砀山的贡梨，经过人工培育，优于原产地，色泽金黄，香脆多汁，年产4 000余吨，深受香港、新加坡、加拿大人民的欢迎。年末牲畜存栏数为41.99万头（只），鱼类总产1 146吨。

农三师、图木舒克市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师、市经济滞后的局面，必须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协调发展。为此制订了实施100万亩棉花、30万亩林果、20万亩粮食、20万亩饲草的“1322工程”，到2009年全部完成。力争用3~8年时间，将小海子垦区建成80万头（只）肉牛、肉羊养殖基地和25万亩红枣、核桃生产基地；将麦盖提垦区建成2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和20万亩巴旦杏、红枣生产基地；将喀什垦区建成100万只特色

禽养殖基地和15万亩苹果杏子生产基地。

在发展现代工业方面：加快发展棉纺、水泥、电力、药业、食品加工，农业机械组装制造业，全面推进新型化工业化。引进国内外知名棉纺企业，加快万吨浆粕厂项目建设；以昆仑神农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以甘草深加工为重点，发展合成制药、生物制药等产业；以图木舒克前海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为龙头，生产新型干洁水泥，上马20万吨水泥技改生产线；图木舒克市2×5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已于2008年5月7日开工建设，2009年投产。

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推进资产重组市场化，产权结构多元化，依托资源优势，全面进行城镇化建设，不断优化职工的生产、生活环境。喀什地区素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天然区位优势，为农三师、图木舒克市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师、市以三运司国际物流园为中心，力争形成国际出口货物保税区，积极发展转口贸易。

农三师地处反对“三股势力”的前沿阵地，将稳定作为第一要务，严防“三股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大力做好民族团结的工作，加强民兵训练，为保卫地区稳定贡献力量。2008上半年，师、市生产总值5.9亿元，同比增长8.3%。师市决心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南　路

丝绸之路南道，在汉代曾是东西交通的主道，繁荣一时，班超首次出使西域，及以后数次往返，均经此道。待中道畅通，特别是北道开辟后，南道逐渐萧条起来，加上河水改道，黄沙侵蚀，不少名城被湮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南道上的垦区有两处。

一、且（末）若（羌）垦区（三十六团）

垦区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且末县境内，属农二师建制，是汉代古楼兰国的伊循屯田区（现在的突布提城堡）。伊循是汉代丝绸之路南路重镇。区内有三十六团及所属石棉矿，土地2.86千公顷，播种面积2.69千公顷。人口8 411人。2007年生产总值9 603万元，产粮600吨，产棉花4 233吨。这里水土资源丰富，但交通闭塞，是待开发区。该团所属石棉矿，是全国有名的大型石棉矿，年产石棉1.5万吨，自1966年开始生产到1986年，累计税利额7 026.5万元。

二、和田垦区（农十四师）

垦区位于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境内。农作物播



种面积7.70千公顷。2007年总人口32 755人，少数民族23 912人。下辖4个农场，工交建筑企业57个，分别在墨玉县、皮山县、策勒县境内及和田市内。2007年生产总值25 165万元（当年价），产粮8 114吨，棉花3 745吨，安息茴香200~300吨，无核白葡萄干500~1 000吨。年末牲畜头数为10.16万头（只）。有水库3座，库容1 100万立方米。垦区属典型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很大，光照充足，热量资源丰富。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昼夜温差大。全年平均气温11.4℃，极端最高气温42.7℃，极端最低气温-26.1℃。年降水量36.4毫米，年无霜期平均为200天。水源为皮山河、喀拉喀什河、奴尔河为主，年引水7 200立方米。但季节不平衡，春季严重缺水。已开采利用的矿产资源有铁矿、煤矿、石灰石、石膏、玉石、石墨、云母及金矿等。



图 103　精选红枣

四十七团前身是二军五师十五团。后编为农一师前进农场墨玉分场，1969年归属农三师，1982年归属和管局。

长期以来，农十四师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结构单一。为改变这种局面，近两年，该师把结构调整作为农业发展的主线，走上了特色高效农业之路。

2008年，农十四师制定了“保粮、稳棉、增枣，发展蚕桑，稳定山区畜牧业，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全师粮食播种面积3.4万亩，总产9 500吨以上。棉花主要以林棉间作，为了解决幼林果树地块前期收入，棉花稳定在3万亩。利用南疆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加大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和标准园建设，提高红枣产量和品质，做大做强以红枣为主的园艺业，力争建成新疆最大的集中连片有机红枣生产基地。利用“有机红枣”认证这一金字招牌，发展壮大“昆仑山枣业公司”这一龙头企业，扩大红枣深加工和外销，延长产业链，走产业化经营之路，使职工增收。



附　　录
陕甘宁青垦区分布

1962年"伊塔事件"爆发，大批边民外逃，伊宁动乱，新疆局势动荡，兵团奉命进行"三代"(代耕、代管、代牧)，稳定了局势，沿边境建起国营农场带，构筑了国防战略屏障，毛主席接到报告后，高兴地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①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到新疆看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条田平坦，林带成网，渠道纵横，道路通畅，农林牧渔结合，机械化水平高，特别是劳武结合，寓兵于农，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值得在西北地区推广，1965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做出《关于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决定》指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西北地区全党的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除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外，还必须积极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以迅速增加粮食产量。"《决定》强调指出："西北其他各省区，要认真地，因地制宜地学习和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功经验，尽快地把农建师建立和壮大起来。"于是西北各省先后组团由领导带队，来新疆兵团参观，积极组建农业生产建设师。

一、甘肃省河西走廊垦区

早在1963年年底，甘肃省委就作出决定：加速开发河西走廊，在该地区建立新疆生产兵团式的国营农场。邀请农垦部副部长、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进行指导，踏勘河西走廊地区。经西北局批准，按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师的建制序列成立农业建设十一师，省政府将1953年建立的国营机械化农场及以后相继建立的国营敦煌棉花农场、安西农场、张掖农场、八一农场等22个地方国营农场、2个牧场，划交农建十一师管辖。任命省委副书记李龙九兼第一政委，来自新疆生产兵团的老八路李正肃、张兴汉分别任师长和政委，并调178名干部到农十一师。同时支援种子和粮食500多万斤及部分农机具。"兵团模式"在这里显出优势：原来零散耕地改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1985年版。

建成适合机耕的大条田；挖渠排碱、竖井排灌等先进方法，用来开发盐碱地；兵团重科技、重水利、重基础设施的方针，很快改变了河西走廊小农场的面貌。兵团组织化程度高，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也带到了农建十一师。"文革"前，该师已建成8个团场、2个牧场、1个工程团，文教、卫生、商业、工副业已配套，现代化农场已初具雏形。并筹建了黄羊镇糖厂、嘉峪关水泥厂、嘉峪关氮肥厂、祁连山制药厂等师属独立工矿企业。农建十一师集中开发了酒泉以西各场。有复员转业军人5 500余人，支边青年2.8万余人；全师总人口4.4万余人，其中职工3.38万余人。

1969年划归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集中开发了张掖以东各场。到1975年重归甘肃省人民政府管辖。1984年拥有国营农场20个，有土地591万亩，其中耕地59.5万亩，草原265.5万亩。河西走廊扼中西交通咽喉，曾是汉唐屯田重地。这里海拔高，日照长，降雨少，属沙漠性大陆气候。但这里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56条河流可供灌溉，且土地资源充足，适于农牧业生产发展。主要作物有小麦、啤酒花、大麦、玉米、大豆、蚕豆、黑瓜子、棉花、甜菜、红花、西瓜、白兰瓜、黄河蜜瓜、向日葵、黄花菜等。白兰瓜、黑瓜子在国际市场受到欢迎。畜牧业有养牛、羊、猪、鹿、禽等。

有工矿企业88个，商业网点151个。祁连山、河西走廊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农垦系统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生产30多种产品，主要有：石棉、硫磺，石英砂，锰矿石、钨砂、原煤、芒硝、硅铁以及小水泥、化肥、药品、饮料、食品等。其中钨矿砂品位高，质量好，远销国外。

1984年工农业生产总值8 777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52%。到2005年共有农场16个、工矿企业63个、商业企业27个。人口96 646人，其中职工29 970人。耕地面积42 846公顷(642 960亩)。

工农业总产值72 033万元，其中第一产业24 665万元，占生产总值34.2%；第二产业40 965万元，占生产总值56.9%；第三产业6 403万元，占生产总值8.9%。

农场和工商企业，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农垦战线上的干部和职工为河西走廊的开发建设、繁荣昌盛以及保护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宁夏垦区

1950年4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毛泽东主席"军队要成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指示，决定将所属的部分部队转为生产队，创建国营农场。经考察，确定在宁夏灵武县山水沟滩建场。12月1日，灵武农场在县城内一座28孔窑洞的旧军营内正式成立，调宁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高宜之任场长。

国民党第81军于1949年9月19日在中卫县和平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马敦信任军长。除一团担任剿匪任务外，三个团在中卫县城北开荒15 718亩，还帮助政府挖渠30多公里。1950年11月，独二军奉命与陕北独

立一师二团合编为解放军独立第一师，师长马敦信，政治委员张建刚。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一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西北农学院60多位师生在西大滩进行了一个月的勘测和设计，定名为农建一师国营平罗机械农场，下设三个分场。决定1952年8月1日为建场纪念日。1955年10月改建为3个独立核算的前进一场、前进二场和前进三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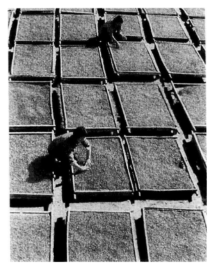


图 104　宁夏枸杞子

1954年7月，宁夏省国营机械农场管理局成立。所辖巴浪湖农场、连湖农场、暖泉农场、芦花台农场先后成立。1959年又相继建立了渠口堡农场和平吉堡农场。1965年11月3日，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师序列，农建十三师正式成立。师部驻银川新市区方家园，师长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来的老八路刘奇功同志担任，管辖原农垦局所属沿贺兰山东麓一线的平吉堡一二场、陈家圈牧场、暖泉一二场、前进一二三场和自治区农科所的南梁畜牧试验场。分别将平吉堡、暖泉、前进、南梁农场改编为农建十三师一团、二团、三团和五团。将10月新建的黄羊滩农场改编为四团，将陈家圈牧场编为师良种繁育场。此后又先后接管银川糖厂、银川灰砂砖厂，组建农垦职工医院、西干渠管理处、建筑工程队、汽车运输队、商业批发转运站等。

农建十三师建立后，推广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提高机械开荒、平田、中耕、收获等作业水平，发展工业、建筑业、商业、运输业等综合经营。

1969年划归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到1975年重归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至1984年拥有国营农场14个，耕地45万亩，主要分布于贺兰山下的河套平原。这里夏季少酷暑，冬季漫长，气候干燥，日照充足。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已有两千年历史，从秦代开始，修有秦渠、汉渠和唐代的唐徕渠。在河套平原上，渠道纵横，林木成行，灌溉系统发达，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灌区内11个农场盛产优质大米，垦区所产滩羊裘皮和枸杞闻名全国。西瓜、苹果及啤酒花品质优良，远销香港及京沪等地。垦区有工厂60个，其中啤酒厂、糖厂在自治区占有重要地位，白糖、啤酒和牛奶产量，均居自治区首位。

1984年工农业生产总值1.08亿元，其中工业占57%。2005年宁夏垦区共有农场18个，耕地面积38 376公顷（575 640亩）；有工业企业34个，商业企业15个。人口101 527人，其中职工29 970人。

工农业生产总值:64 828万元。其中,第一产业31 514万元,占48.6%;第二产业19 815万元,占30.6%;第三产业13 499万元,占20.8%。生产发展较快。

三、青海垦区

经西北局批准,1965年青海省委决定: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师的建制序列成立农业建设十二师。师长由生产建设兵团原农一师副师长郑昌茂同志担任。1969年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该师划归兰州生产建设兵团领导,1975年兰州生产兵团撤销,该师回归青海省人民政府领导。

到1984年青海垦区拥有国营农牧场16个,多以牧业为主,有耕地25万亩,草原462万亩。青海国营农牧场主要分布于青海湖沿岸和青南农牧区。此地是高原大陆性气候,海拔在2 8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日照长,适于小麦、青稞、油菜等作物,一年一熟,产量较高。盛产牦牛、牦牛肉、山羊、山羊绒、骆驼和驼绒以及紫羔皮、野狐皮、猞猁皮等名贵产品,还有被称为"青海三宝"的鹿茸、麝香和冬虫夏草。此外,还出产红花、大黄、黄芪等名贵药材。农业以粮油为主,特别盛产油菜籽,品质优良,一般年景垦区产油菜籽在2 000万斤上下,占全省油菜籽产量约1/3左右。工业以建筑、建材、副食品加工、机修以及芒硝、煤炭等采矿业为主。

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2 677万元,其中工矿业产值占23%。到2005年,青海垦区共有农场19个,商业企业1个,拥有耕地面积14 791公顷(221 865亩)。人口37 882人,职工6 749人。

工农业总产值9 116万元,其中第一产业7 126万元,占78%;第二产业1 065万元,占11.7%;第三产业922万元,占10.1%。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内陆湖。渔业资源丰富,环湖四周,牧草丰茂,是我国优质天然牧场之一。垦区的国营农牧场分布其间。还可看到隋代在此屯田的遗迹。

四、陕西垦区

1965年经西北局批准,陕西省委决定,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师的建制序列成立农业生产建设十四师。1969年划归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1975年重归陕西省人民政府管辖。

到1984年陕西垦区拥有国营农场19个, 工业企业35个, 商业企业及网点79个。占有土地74万亩,其中耕地33万亩。

垦区分布在四个地区:

1.关中东部:有农场和工厂各五个。三门峡库区有农场三个,位于"八百里秦川"东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适于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总面积的83.4%,盛产小麦、棉花、花生、油菜等。工业有纺织,造纸,水泥等行业。

2.西安市郊有五个农牧场、三个工厂,主要生产蛋、奶、禽、果和罐头等食品,

是西安市副食品重要供应基地。西安，古称长安，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都，是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陕西农垦职工，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更热爱家乡的历史名城。在新的历史时期，陕西农垦战线上的职工，决心更好地为古都服务，使它更加繁荣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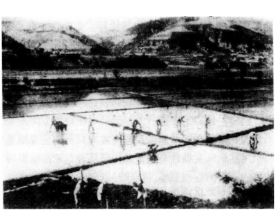


图 105　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3.榆林地区位于毛乌素大沙漠南沿，有农场六个。这里风沙大，无霜期短，自然条件很差。但经过农垦职工连续多年植树种草，固沙造田，自然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场盛产水稻、玉米和高粱。所养榆林滩羊久负盛名。



图 106　1942 年 2 月朱德、贺龙在王震陪同下视察南泥湾

4. 延安地区南泥湾农场。抗日时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延安进行经济封锁，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人民遇到很大的困难。毛主席号召八路军和边区人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王震将军率领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种田，养猪养羊，办工厂，搞商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全军作出了榜样。现在的南泥湾农场，就是在南泥湾大生产的基础上建起来的。以粮、油、菜、药为主，并发展牛、羊、禽等牧业和工商业。

1984年，全垦区工农业生产总值8 023万元，其中工业占52%。到2005年陕西垦区有国营农场11个，耕地面积12 266公顷，工业企业22个，商业63个。人口41 242人，其中职工12 537人。

工农业总产值11 474万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8 505万元，占生产总值74.1%；第二产业产值1 765万元，占15.4%；第三产业产值1 204万元，占10.5%。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撰.《史记》. 中华书局,1975.
2. 班固撰.《汉书》. 中华书局,1975.
3. 黄文弼著.《西北史地论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 范晔撰.《后汉书》. 中华书局,1975.
5.〔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秦汉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6. 陈寿撰.《三国志》. 中华书局,1975.
7. 房玄龄等撰.《晋书》. 中华书局,1975.
8. 魏收撰.《魏书》. 中华书局,1975.
9. 王国维撰.《观堂集林·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
10. 侯灿撰.《高昌楼兰研究论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11. 斯坦因著.《尼雅河尽头以外的古迹遗址》.《尼雅考古资料》.
12.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 李延寿撰.《北史》. 中华书局,1975.
14. 刘光华著.《汉代西北屯田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15.《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6. 徐天麟著.《西汉会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7. 魏徵等撰.《隋书》. 中华书局,1975.
18.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 中华书局,1975.
19. 吴兢撰.《贞观政要》.
20. 杜佑撰.《通典》;刘煦等撰.《旧唐书》. 中华书局,1975.
21. 欧阳修撰.《新唐书》. 中华书局,1975.
22.〔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3. 新疆社会科学院编.《西域研究》.
24. 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简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25. 王溥著.《唐会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6. 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唐六典》.
27. 脱脱等撰.《宋史》. 中华书局,1975.
28. 宋濂撰.《元史》. 中华书局,1975.
29. 柯劭忞撰.《新元史》. 中华书局,1975.
30.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
31. 张廷玉等撰.《明史》. 中华书局,1975.

32.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 中华书局,1975.
33. 蔡美彪等撰.《中国通史》. 人民出版社,1983.
34. 李培浩著.《中国通史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5.〔日〕安部健夫著.《西回鹘国史的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36. 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 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
37. 哈沙尼著.《完者都史》. 德黑兰波斯文刊本,1969.
38. 马大正等著.《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9. 方英楷著.《新疆屯垦史》.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
40. 谈迁著.《国榷》.
41. 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 民族出版社,1990.
42.《明太祖实录》、《明宣宗实录》.
43.〔日〕松田寿男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44. 苏北海著.《西域历史地理》. 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
45. 玄奘,辨机著.《大唐西域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46. 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47. 常钧著.《敦煌随笔》. 禹贡学会1937年《边疆丛书》本.
48. 纪昀著.《乌鲁木齐杂诗》.
49. 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
50. 傅恒等著.《平定准噶尔方略》. 台湾商务印书馆.
51. 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垦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52. 永保著.《塔尔巴哈台事宜》. 边疆丛书续编本.
53.《通俗新疆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54.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 台湾兰溪出版社,1982.
55.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 北京刻版.
56. 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57. 傅恒等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58. 刘锦藻著.《清续文献通考》.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发行本.
59. 祁韵士编撰.《西陲总统事略》. 嘉庆十四年刊本.
60. 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 中华书局,1958.
61. 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 道光元年刊本.
62. 永保撰.《乌鲁木齐事宜》.《边疆丛书》续本.
63. 钟方撰.《哈密志》. 禹贡学会1937年《边疆丛书》本.
64. 魏源著.《圣武记》. 中华书局,1984.
65.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 新疆地方志总编室,1988.
66. 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 岳麓书社印行,1984.
67. 杜荣坤,白翠琴著.《西蒙古史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68. 国家农垦总局政策研究室编.《我国自汉迄清历代屯垦概况》. 1983.
69. 陈华主编.《新疆》.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70.《新疆风物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71. 新疆军区编.《人民军队在新疆》.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72.《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7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74. 曹达诺夫著.《五军的革命历程》. 解放军出版社，1989.
75. 罗元发著.《战斗在大西北》.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76. 杜经国著.《左宗棠与新疆》.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77.《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78. 刘维钧著.《西域史话》一、二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2，1985.
79. 谷苞等著.《新疆历史人物》一、二、三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985，1989.
80.《昌吉回族自治州概况》.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81. 张友德著.《新疆农垦经济概况》.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82. 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兵团发展史资料汇编》.
8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鉴》(1986~198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8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资料》(1950~1989年)，1990.
8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独立核算企业基本情况》. 1989.
86. 王震著.《英勇奋战进军新疆》.《战旗映天山》.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87. 邓力群.《新疆往事回忆》.《新疆党史工作通讯》，1989，2.
88. 陶峙岳.《新疆和平解放纪实》.《兵团史志通讯》，1989，2.
89. 彭雨新.《清初垦荒与财政》.《武汉大学学报》，1987，6.
90. 王希隆.《平准战争中的转输与屯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2 .
91. 王建民.《乾嘉时期新疆屯田分布状况初探》，《西北史地》，1.
92. 吴元丰.《乾隆年间伊犁屯田略述》.《民族研究》，1987，5.
93. 彭慧敏.《西汉在西域屯田论述》.《新疆大学学报》，1985，1.
9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95.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 人民出版社，2008.
96.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元代史》. 人民出版社，1993.
97. 邓立群，马洪主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98. 刘长明，周轩主编.《新疆历史名人》.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
99. 纪大椿主编.《新疆历史百问》.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
100. 齐陈骏.《河西史研究》. 甘肃教育出版社.
101. 蒋中锋.《西汉时期的西北边防与边垦》.《许昌学院学报》，2006，6.
102. 刘盤修.《汉代河西地区的开发》.《史学研究》，2002，11.
103. 李宝通.《隋代屯田的历史作用及其限制》.《西北师大学报》，2001，5.
104. 何诗海.《汉代屯田对西北农业发展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04.
105. 惠富平.《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论述》.《西北农业科技大学学报》，2002.
106. 高志伟.《青海地区古代农业的起源与发展》.《青海民族研究》，2005.
107. 李清凌.《隋唐五代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西北师大学报》，2005.



图版目录





后　记

2008年3月，责任编辑告诉我，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对我10年前写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一书修订再版，要求增补陕甘宁青的屯田历史，增加图片。我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新疆地处欧亚交通枢纽，是各族人民汇合交融的舞台，也是丝绸之路特别重要的通道。古长安(今西安)是汉唐古都，丝绸之路东段的起点，河西走廊则是丝绸之路东段的要道，把陕甘宁青屯田历史增补入本书，读者就能比较完整地了解丝绸之路与中国屯田的关系。我大半生献身于屯垦戍边事业，今年已86岁了，年老体弱，要完成书稿修订工作困难不少，但仍然振作精神，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近些年来，丝绸之路又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欧亚大陆桥架通以后，沉寂了数百年的古丝绸之路又活跃起来了。每年一届的"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上有来自西欧的、俄罗斯的，特别是中亚各国的以及国内各省的客商。他们都带着大批商品，在会上选商品，评质量，议价格，订合同，出售自己的货物，买进自己需要的东西，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交易量一年比一年大。这样互通有无，促进了各国经济繁荣，造福人民，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欧亚大陆桥使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生。欧亚大陆桥是一条友谊之路，但古丝绸之路并不太平，我们有责任爱护它，保护它，使之畅通无阻，造福人民。

书稿在写作过程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聂卫国、司令员华士飞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安排办公厅副主任任炜负责协调有关部门提供资料。新疆大学周轩先

生、新疆人民出版社李春华先生给予多方帮助。由于陕甘宁青的历代屯垦资料甚缺，太原赵玉宏先生给我寄来了《册府元龟》、《唐六典》和《国榷》，兵团党史研究室、兵团史志办公室主任刘和鸣为我从甘肃省找来了《甘肃省志·农垦志》，从宁夏找来了《宁夏农业志》。兵团宣传部、统战部、军事部、党史研究室、统计局提供了大量资料，兵团党史研究室及田丁、晓犁等同志提供了图片，承蒙汪国发、徐钖惠、陈雪梅同志帮助我办了许多具体业务。在此，谨致以真诚的感谢。

赵予征

2010年5月5日于乌鲁木齐